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0）

全 世 界 无 产 者，联 合 起 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目　　录

第十卷说明 …………………………………………………………… Ⅸ—ⅩⅩⅥ

弗·恩格斯。欧洲战争 …………………………………………… 3—8

卡·马克思。*西方强国和土耳其 ………………………………… 9—19

卡·马克思。*东方战争 ………………………………………… 20—31

卡·马克思。*东方的军事行动。——奥地利和法国的财政。——君士坦丁堡的设防 ……………………………… 32—38

弗·恩格斯。欧洲战区最近的一次会战 ……………………… 39—42

卡·马克思。*沙皇的观点。——阿尔伯特亲王 …………… 43—4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君士坦丁堡的设防。——丹麦的中立。——英国议会的成分。——欧洲的歉收 ……………………………………………………………… 48—55

卡·马克思。*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俄国的战时财政 ……………………………………………………………… 56—60

卡·马克思。*蓝皮书。——二月六日的议会辩论。——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联军舰队的行动。——爱尔兰旅。——关于工人议会的召开 ………… 61—68

卡·马克思。*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

---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编者注

皮书。——门的内哥罗 …………………………………………… 69—76
弗·恩格斯。欧洲战争问题 ………………………………………… 77—81
卡·马克思。*普鲁士内阁的声明。——波拿巴的计划。——普鲁士的政策 …………………………………………… 82—84
卡·马克思。议会辩论 ……………………………………………… 85—99
卡·马克思。*二月二十二日的议会辩论。——波茨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西方强国的政策……… 100—109
卡·马克思。奥地利的破产 ……………………………………… 110—116
卡·马克思。*法国和英国的军事计划。——希腊人暴动。——西班牙。——中国 ……………………………… 117—124
卡·马克思。*工人议会开幕。——英国的军事预算 … 125—132
卡·马克思。给工人议会的信 ………………………………… 133—134
卡·马克思。工人议会 …………………………………………… 135—139
卡·马克思。希腊人暴动 ………………………………………… 140—149
弗·恩格斯。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 ………………………… 143—147
卡·马克思。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 ……………………… 148—159
卡·马克思。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 ……………………… 160—177
卡·马克思。*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 … 178—187
卡·马克思。议会的战争辩论 ………………………………… 188—199
卡·马克思。*俄国和德意志强国。——粮食价格 …… 200—206
弗·恩格斯。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 …………………… 207—211
卡·马克思。*列施德—帕沙的照会。——意大利报纸论东方问题 ………………………………………………… 212—216
卡·马克思。*希腊和土耳其。——土耳其和西方强国。——英国粮食贸易的缩减 ………………………… 217—220

卡·马克思。*希腊人暴动。——波兰侨民。——奥地利—普鲁士条约。——关于俄国武装的文件 ……… 221—227
卡·马克思。*炮击敖德萨。——希腊。——门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伊费尔的演说 ……………………………… 228—235
卡·马克思。不列颠的财政 ……………………… 236—243
弗·恩格斯。辉煌的胜利 ……………………… 244—248
卡·马克思。*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在苏格兰对领地的清扫 ……………………… 249—254
弗·恩格斯。战争 ……………………… 255—261
弗·恩格斯。英国军队的现状及其战术、服装置备、军需部等等 ……………………… 262—268
卡·马克思。*奥地利—普鲁士条约。——五月二十九日的议会辩论 ……………………… 269—274
卡·马克思。*英国特别的陆军部的成立。——多瑙河上的军事行动。——经济状况 ……………… 275—281
卡·马克思。*英国军事部门的改组。——奥地利的要求。——英国的经济状况。——圣阿尔诺 ………… 282—288
弗·恩格斯。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 ……………… 289—30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俄土战场的形势 ……… 303—30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俄军的撤退 ……………… 310—314
卡·马克思。战争。——议会辩论 ……………… 315—323
卡·马克思。*马德里的起义。——奥地利—土耳其条约。——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 ……………… 324—333
弗·恩格斯。多瑙河战争 ……………………… 334—339
卡·马克思。*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

鲁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债。——瓦拉几亚 ……… 340—348
卡·马克思。*意大利的紧张。——西班牙事件。
——德意志各邦的立场。——英国法官 ……………… 349—359
卡·马克思。*维也纳会议。——奥地利的公债。
——杜耳塞和奥当奈尔的文告。——英国的内阁
危机 ………………………………………………… 360—367
卡·马克思。西班牙的革命。——土耳其和希腊 ……… 368—374
卡·马克思。议会的战争辩论 ……………………… 375—382
卡·马克思。*奥地利的政策。——下院的战争辩论 … 383—39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无聊的战争 ……………… 395—400
卡·马克思。埃斯帕特罗 ………………………… 401—408
弗·恩格斯。对俄国要塞的攻击 …………………… 409—411
卡·马克思。*撤出多瑙河各公国。——西班牙事
件。——丹麦新宪法。——宪章派 ………………… 412—419
卡·马克思。*撤出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波
兰。——西班牙人民的要求 ……………………… 420—426
卡·马克思。*东方问题。——西班牙的革命。——
马德里报刊 ………………………………………… 427—434
卡·马克思。*西班牙的革命。——博马尔松德 ……… 435—441
弗·恩格斯。博马尔松德的夺取(第一篇论文) ………… 442—446
弗·恩格斯。博马尔松德的夺取(第二篇论文) ………… 447—451
卡·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 ………………………… 453—511
一 ………………………………………………… 455—464
二 ………………………………………………… 465—471
三 ………………………………………………… 472—477

四 …………………………………………………………… 478—483
五 …………………………………………………………… 484—488
六 …………………………………………………………… 489—498
七 …………………………………………………………… 499—504
八 …………………………………………………………… 505—511

卡·马克思。西班牙的反动 ………………………………… 512—518
卡·马克思。*马志尼被捕的传说。——奥地利的强制公债。——西班牙。——瓦拉几亚的状况 …………… 519—524
卡·马克思。*联军舰队的活动。——多瑙河各公国的局势。——西班牙。——英国的对外贸易 …………… 525—534
弗·恩格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 …………………… 535—544
弗·恩格斯。克里木的消息 ……………………………… 545—55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 ……… 551—55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概评 …………………………………………………… 556—559
弗·恩格斯。阿尔马河会战 ……………………………… 560—565
弗·恩格斯。俄国的兵力 ………………………………… 566—571
弗·恩格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 …………………… 572—576
弗·恩格斯。克里木战局 ………………………………… 577—585
弗·恩格斯。巴拉克拉瓦会战 …………………………… 586—593
弗·恩格斯。因克尔芒会战 ……………………………… 594—599
弗·恩格斯。克里木战局 ………………………………… 600—60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战况的进展 ………………… 607—614
弗·恩格斯。奥地利的兵力 ……………………………… 615—619
卡·马克思。克里木战局的回顾 ………………………… 620—625

卡·马克思。报刊和军事制度 …………………………………… 626—629
弗·恩格斯。英军在克里木的灾难 ……………………………… 630—636
卡·马克思。工商业危机 ………………………………………… 637—645
卡·马克思。*四项条款 ………………………………………… 646—651
卡·马克思。英国工商业的危机 ………………………………… 652—657
卡·马克思。啤酒店主和礼拜日例假。——克兰里卡德 ……………………………………………………………… 658—66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评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 …… 661—663
卡·马克思。维也纳谈判的真正目的。——反普鲁士的辩论。——雪球暴动 ………………………………… 664—66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

卡·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一组论文中未发表过的片断 ……………………………………………………………… 669—672
弗·恩格斯。喀琅施塔得要塞 …………………………………… 673—679

附　　录

英国资产阶级 ……………………………………………………… 683—688
注释 ………………………………………………………………… 691—74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 750—765
人名索引 …………………………………………………………… 766—806
期刊索引 …………………………………………………………… 807—811
地名索引 …………………………………………………………… 812—824

插　　图

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和因克尔芒会战的军队配置的示意图 …………… 291
马克思摘有西班牙历史材料的一本笔记本的首页 ………………………… 457
1854年克里木战区 ………………………………………………………… 537

第十卷说明

第十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收集了他们在 1854 年 1 月至 1855 年 1 月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曾经在美国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过。马克思寄给“论坛报”的文章，有一些是同时在宪章派报纸“人民报”上发表的，而且为了使英国工人读者易于理解，有时还作些修改。从 1855 年 1 月起，马克思也利用他和恩格斯寄给“论坛报”的那些文章上的材料，开始为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撰稿。为“新奥得报”撰稿使马克思有可能向德国读者阐明国际政治、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内部状况的重大问题，以及关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论著述，占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这个时期进行的大量的多方面的科学政治活动的很大部分。马克思认为进一步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此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继续进行研究。恩格斯的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军事史和军事理论以及语言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研究过程中作出的许多结论和总结，都反映在他们为“论坛报”和其他报纸所写的文章中。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这些文章，大部分是论述欧亚两洲最重要国家中当时发生的事件以及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这些文章是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分析当代主要问题的光辉范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力求通过自己在报上发表的文章，通过同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的通信，来论证无产阶级在国际生活的最重大的问题上以及在欧洲各国的内政问题上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规定了无产阶级在大多数国家的工人运动还没有超出一般民主运动的条件下的行动纲领，并且针对当时的基本任务和各国不同的条件，具体地阐述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先进作用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因为没有可能像他们曾经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许多文件中以及在“新莱茵报”上那样全面公开地论证无产阶级的策略，所以现在只好有时采用讽喻的笔法在偶尔写的分析具体事件的文章中来表述自己的策略原理。

1854年至1855年，由于克里木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注意国际关系和各个战区上的军事行动的进程。第十卷中的许多文章都是论述这两大问题的。在本卷中，评述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活以及英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占有特殊的位置。有很大一部分文章是谈1854年西班牙革命事件的。马克思的“革命的西班牙”这一组文章就属于这一类，它叙述了十九世纪初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

在研究欧洲各国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对外政策以及研究外交谈判各阶段和军事行动的进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根据工人运动、革命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前途，根据革命利益来分析每一个问题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像在1848—1849年时那样，认为沙皇制度是欧洲封建专制的反动派的主要支柱。他们认为，推翻沙皇制度并消除它对欧洲的反动影响，是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是民主地解决德国、意大利、波兰、匈牙利和欧洲其他国家

历史发展的根本问题——1848—1849年革命过程中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的必要条件。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看到，英法统治阶级切身需要把沙皇制度作为一支反革命力量保存下来，不希望它彻底崩溃，害怕它的崩溃会给欧洲带来革命的后果，并且认为这样对自己的统治地位将是一种威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章中说明，英国寡头政体和法国波拿巴政府的计划，只是想把俄国当作争夺近东领导权的对手除掉、确立自己在巴尔干和黑海地区的统治、削弱沙皇俄国的军事力量。根据这个计划，英法政府的主要努力就在于尽可能防止战争的扩大，使军事行动的范围局限在作为它们争夺对象的那些地区内。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这种为英法统治阶级的私利而进行的有限战争的计划，他们提出了欧洲各族人民起来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战争的口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制定无产阶级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策略时的出发点是：如果反对沙皇制度的战争是一次全欧性质的战争，那末它一定会在欧洲各国引起一个新的革命高潮，使这些国家的反人民的专制制度复灭，使欧洲被压迫的民族获得解放；在这些条件下，已经开始的战争就会变成各族人民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战争。这种战争也会加速俄国本国革命形势的成熟，促进反抗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革命的到来。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进行革命战争反对沙皇制度的口号，必然会引起欧洲的革命运动，使欧洲各国的人民群众起来反对本国政府。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同那些欧洲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原则区别，后者支持英国和法国的反革命政府，认为它们同俄国的战争就是“自由同专制的战争”。

(见本卷第 283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策略,是他们在 1848—1849 年的策略的继续,那时他们已经在"新莱茵报"上号召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战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个策略是 1789—1871 年这个时代的客观历史条件所要求的,因为当时首要任务就是彻底消灭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在推翻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以前,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发展。"(见"列宁全集"1959 年中文版第 21 卷第 280 页)

在本卷第一篇论文即恩格斯的"欧洲战争"的文章中,明确地提出了进行革命战争反对沙皇制度以及革命地改造欧洲的口号。这篇文章是因 1854 年 1 月英法舰队陈兵黑海而写的。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英法统治阶级想要进行的反对俄国的战争和为了民主改造欧洲所必须进行的反对沙皇制度的真正革命战争之间的根本区别。恩格斯深信,当第六强国即革命出现的时候,战争的情况、条件和性质就会发生变化;革命将使所谓五"大"强国全都附属于它,并使每个强国战栗不已。文章认为,不管英法政府的愿望如何,已经开始的军事行动可能成为欧洲革命的推动力。而欧洲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级矛盾的增长、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强烈不满已为这一革命准备好基础。在恩格斯的"战争"这篇文章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况的进展"这篇文章中,也阐述了这一思想。这一思想也是他们论述战争的其他文章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制定了无产阶级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策略,并针对不同国家的特殊条件,加以发展并使它具体化。他们特别注意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认为英国的革命发展前途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文章中分析了英国的

经济和政治状况，分析了英国社会各个阶级及其政党对克里木战争的态度，同时不断地揭露英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对内对外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英国的统治阶级通过自己的对内政策来阻碍英国人民的进步，在对外政策方面，则遵照自私的阶级利益，只是力图把沙皇制度削弱，却把这个欧洲的反动支柱保存下来。揭露英国整个政治制度和各资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尖锐地批判英国外交和作战方法，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英国统治阶级政策的那些文章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在论文中指出，资产阶级贵族寡头政体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的特点是英国外交素有的、并成了英国外交的传统特色的那种背信弃义。马克思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这两篇文章中，根据对许多外交文件的详细分析，揭露了英国的一些国家活动家在战前时期多次企图同沙皇政府达成瓜分土耳其的协议，以保证英国在近东占有决定作用的地位。马克思的结论是：如果沙皇俄国和英国瓜分土耳其的行动不会引起必不可免的对法战争，而对法战争又不会引起欧洲的革命，那末英国政府准会以同样的胃口把土耳其和俄国一起吞掉。（见本卷第174页）

恩格斯曾应马克思的请求写了许多军事评论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这些文章批评了英国政府的作战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批评是他们揭露英国寡头政体这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也把一部分评论发表在宪章派的机关报"人民权"上，认为这是鼓动英国工人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方法之一。

从恩格斯的军事论文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是一个大军事专家，

是一个精通军事的人。他在“战争”、“英国军队的现状及其战术、服装配备、军需部等等”、“英军在克里木的灾难”等许多文章中揭露了英国军事制度的保守性，指出了英国的军事落后于英国的总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恩格斯在“欧洲战争问题”、“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以及其他许多文章中，研究了战局的进程，说明了交战国的实力，分析了各别的战役。第一次发表的恩格斯的手稿“喀琅施塔得要塞”是很值得注意的。恩格斯在“因克尔芒会战”、“战争”、“克里木战局”这些文章中，高度评价了俄国兵士的英勇精神，同时也严厉地批评了地主俄国的军事的落后、很大一部分将官的无能以及在沙皇军队中所采用的“阅兵操练”制度。

恩格斯的很大一部分文章是论述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的，他认为这是战局的新阶段（“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评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等）。在1854年10—11月所写的文章中，恩格斯根据联军在数量上的优势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事的薄弱，认为城市可能即将陷落。但是，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英雄气概以及他们所表现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使以前在向陆一面没有设防的塞瓦斯托波尔能够长期防守。因此，恩格斯在1854年12月底和1855年1月初就指出：“不设防的城市早已成为第一流的营垒了”，（见本卷第624页）由于俄军的努力，目前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固，用强攻来占领它已完全不可能了。（见本卷第662—663页）

在本卷以及在本版第九卷、第十一卷中所发表的恩格斯论克里木战争的文章，包含了军事学术史、军事理论、战略和战术等方面的极有价值的材料和理论性的结论。这些文章反映了马克思主

义军事思想的形成的重要阶段，反映了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总结当时战争经验方面的重要阶段。但是，我们在读恩格斯的军事论文时必须考虑到：恩格斯当时手中有的往往只是西欧资产阶级报刊的故意歪曲的报道，而且军事评论是紧随事件的发展而写成的，所以没有时间也不可能核对这些关于军事行动进程的消息，因此有时片面地估价了某些战役，例如西诺普会战、博马尔松德的夺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露英国寡头政体的对外政策的同时，还揭穿了资产阶级贵族英国的整个政治制度的反人民的实质。马克思在关于议会辩论的许多文章中，出色地批判了英国现行的两党制。他强调指出，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斗争，只不过是粉饰门面而已，因为每个政党“都不愿去破坏自己的政敌的政治‘声誉’……以免统治阶级的统治的基础遭到破坏”。（见本卷第 62 页）这里所发表的马克思的许多论文，都是针对具体的人即当时英国的国家活动家而写的。马克思继续他早就开始的对英国寡头政体的著名代表人物如帕麦斯顿、罗素、阿伯丁、格莱斯顿等人所执行的政策的揭露。

至于谈到在战争年代英国议会中各个政党和派别的立场，马克思指出，议会中的自由主义爱尔兰议员团（所谓爱尔兰旅）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很不光彩的。马克思指出这个议员团的代表实质上出卖了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运动。爱尔兰旅时而支持英国这个政党，时而支持英国那个政党，从它们那里争得一些让步，满足自己的私利，但决不阻止英国殖民主义者对爱尔兰的压迫。它“从来没有阻止过任何一次对爱尔兰的卑鄙无耻的行为和对英格兰人民的不公正的行为”。（见本卷第 67 页）

许多文章如“议会辩论”、“战争。——议会辩论”、“议会的战争辩论”等等都分析了各色各样的议员在议会中就作战、预算、个别改革草案等问题所发表的言论。有几次下院会议是马克思亲自出席旁听的。他用具体事例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揭露它的荒淫腐朽，戳穿统治的政治制度，揭示英国议会制的阶级实质和资产阶级议员所固有的虚伪和欺诈。马克思在“不列颠的财政”一文中分析了财政大臣格莱斯顿所提出的军事预算，强调指出：最后结果，人民群众只得为战争付出代价。马克思的许多论文尖锐地批判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

马克思在好几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界代表人物的言论。这些代表人物纠集在自称“和平拥护者”、反对同俄国作战的所谓曼彻斯特学派的周围。马克思指出，自由贸易派的这种立场决不是出于真诚地爱好和平，而是由于他们深信英国通过和平手段，不花作战费用也能够在世界市场上确立自己的垄断地位。自由贸易派根据英国商品向俄国市场输出的日益增长，证明资本家英国和地主俄国的利益是一致的。马克思强调指出，自由贸易派的首领科布顿和布莱特作为“和平保卫者”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表明了他们在保卫1815年在欧洲建立起来的、有利于大国的反动统治集团而违背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制度。因此，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尽管打着和平主义的旗号，实际上同英国贵族寡头政体一样，是民主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马克思指出，科布顿们和布莱特们用来掩盖他们对革命的仇恨和他们保存沙皇制度这种反动势力的企图的虚伪的爱和平，暴露了“欧洲资产阶级的下流卑鄙的灵魂”。（见本卷第44页）

马克思批判了英国自由贸易派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立场以

后，又尖锐而严厉地批判了他们的对内政策，他们作为人民群众的“保卫者”所发表的装装样子的言论。马克思在“工商业危机”和“英国工商业的危机”这两篇文章中，揭露自由贸易派是工人阶级的凶恶敌人。他写道，科布顿们和布莱特们假惺惺地抱怨战争使“基督徒互相残杀”，但同时他们又赞成无止境地剥削工人，千方百计地达到废除限制妇女和儿童工作日的那些法律。马克思揭露了自由贸易派想用偶然原因，例如用战争的影响来解释在英国日益扩大的经济危机的这种恶劣的意图。自由贸易派企图挽救他们那种把废除谷物法和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当作制止工商业危机的灵丹妙药的教条。

马克思在论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的经济发展的一些文章中，推翻了自由贸易派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当时他依靠的是大量的统计资料和平日对当前经济资料的研究和综合——马克思写作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未来的“资本论”的巨大准备工作的一部分。马克思根据他所发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证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站不住脚的。他强调指出，在英国出现的危机现象是具有对抗性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尽管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个别生产部门的发展，可以为了战争目的利用一部分游资，但这些危机现象还是出现。马克思指出了当时已经表现出来的英国经济的特点，即它同世界市场的紧密联系；由于英国商品向其他国家输出的日益增长，英国工业以及它所受的震荡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就扩大了。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发展时，得出结论说：从1849年开始的英国经济的繁荣时期不可能无间断地继续下去，1853—1854年期间在英国经济中出现的危机现象将发展为严重

的经济危机。1857年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马克思把当前的危机同欧洲掀起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新高潮的可能性联系起来。

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如“工人议会开幕。——英国的军事预算”、“给工人议会的信”、“工人议会”等在本卷中占有特殊的位置。马克思和恩格斯好多年一直同宪章运动保持紧密联系，并且直接参加了这个运动。在五十年代的上半期，他们帮助革命宪章派争取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恢复宪章主义。马克思在文章中用浅近的话叙述了在宪章派刊物上发表的材料，宣传革命宪章派的领袖厄·琼斯的演说，帮助宪章派向劳动群众揭露英国议会的阶级性。马克思在“君士坦丁堡的设防。——丹麦的中立。——英国议会的成分。——欧洲的歉收”一文中，分析了议会的社会成分和现行的选举制度，并且指出英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无产阶级——实际上被剥夺了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和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坚决地向英国无产阶级提出了建立群众性的、真正革命的政党的任务。马克思在给工人议会的贺信中，提出了伟大而光荣的目标：“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见本卷第134页）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中强调指出，英国无产阶级只有组织全国性的政党，才能获得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才能为反对“现代统治阶级的特权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奴役”而斗争。（见本卷第126页）

编入本卷的文章有很多篇幅是论述法国、法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和法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价这种立场时依据的论点是：波拿巴政体——依靠军队的资产阶级专政政体——的性质本身必然使拿破仑第三走上军事冒险的道路。马克思写道：“不是国内革命就是对外战争——他再没有别的出路

了。”(见本卷第109页)他屡次强调指出,波拿巴法国在克里木战争中扮演了主谋者之一的角色。他指出:“现在东方危机的真正根源是波拿巴的篡位。”(见本卷第7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拿破仑第三及其党徒们害怕欧洲革命并不亚于英国寡头政体,因此他们也赞成有限战争。法国波拿巴政府正像不列颠联合内阁一样,在战争中追求的是自私的掠夺的目的,这在法国统帅部的军事计划和行动中表现出来。马克思在文章中系统地揭露了法国政府的阴谋,抨击了煽动群众的沙文主义狂热的波拿巴主义的骗人口号。他坚决反对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派想把路易·波拿巴当作民主的保卫者,当作“自由的代表人物”的企图。(见本卷第283页)马克思揭露了拿破仑第三的反民主反人民的政策,并且痛斥了“十二月政变的文明”的血腥手段。(见本卷第559页)在“英国军事部门的改组。——奥地利的要求。——英国的经济状况。——圣阿尔诺”一文中,马克思以卓越的抨击性文字画出了一个“负拯救文明之责”的人,即波拿巴法国统治集团的典型代表圣阿尔诺元帅——卖身求荣的野心家,路易·波拿巴的恬不知耻的走狗——的嘴脸。

在法国工人运动遭到失败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特别的关切和同情注视着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命运,首先是被看做是法国工人阶级杰出领袖的奥古斯特·布朗基的命运。这方面很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概评”一文中把奥·布朗基同在克里木战争时期作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情绪俘虏的阿·巴尔贝斯对比的那一部分。

编入本卷的马克思的许多文章都对普鲁士的对内对外政策和它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场作了尖锐的批判性的分析。这方面的文

章有:“普鲁士内阁的声明。——波拿巴的计划。——普鲁士的政策”、“俄国和德意志强国。——粮食价格”、“炮击敖德萨。——希腊。——门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伊费尔的演说”、“奥地利—普鲁士条约。——五月二十九日的议会辩论”等等。马克思是从解决1848—1849年革命所没有解决的德意志的主要历史任务——成立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的任务——的观点出发去研究普鲁士在战争中所应采取的立场问题的。马克思认为,普鲁士参加对沙皇俄国的战争,可能成为德意志民主运动新高潮的直接推动力,而工人阶级在这个运动中应起决定性的作用。人民群众的发动的结果将是推翻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各邦中存在的专制政体,建立起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国家。马克思揭穿了反动的普鲁士统治集团所制定的、对人民群众充满了恐惧的政策,包括他们竭力要逮捕所有最著名的民主主义者并把他们押送到东普鲁士要塞,从而使他们没有可能组织人民运动的意图。(见本卷第82—84页)

马克思在文章中特别注意分析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重视奥地利的参战,认为军事行动移往欧洲中部会在那里引起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从而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就连战争本身的性质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恩格斯写道:“当战争限于西方强国和土耳其为一方同以俄国为另一方的冲突时,它就不可能成为我们在1792年以后看见过的那种欧洲战争”。(见本卷第7页)

奥地利的参战可能使奥地利帝国——各族人民的监狱复灭,使受奥地利奴役的各族人民组成独立的民族国家,使欧洲许多国家得到民主改造。马克思指出,“除了德国人之外,对东方纠纷的结

局有最直接利害关系的是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见本卷第21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门的内哥罗”、“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债。——瓦拉几亚”、“俄军的撤退”、“东方战争”等文章中根据对奥地利帝国的情况所作的精细分析得出结论说，奥地利政府在东方危机中所奉行的中立政策，是由哈布斯堡帝国反动制度的不稳固、这个帝国的外交和内政中的困难决定的。奥地利政府好像处在两团火焰中间。它不能让沙皇俄国毁灭，因为那样哈布斯堡王朝就“失去唯一能帮助它跳出最近的革命漩涡的朋友”。（见本卷第313页）另一方面，奥地利政府又不愿俄国强大，它担心俄国军队向巴尔干半岛推进会引起受奥地利帝国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骚动，并促使他们“觉悟到自己的力量和他们在德国人统治下所受的侮辱”。（见本卷第36页）因此，奥地利要求俄国的军队从多瑙河各公国撤退。此外，奥地利政府希望依靠西方强国的帮助摆脱像马克思在“东方战争”、“奥地利的破产”等文章中所指出的那种已经非常严重的财政困难。马克思写道，这些原因就使得奥地利政府采取了摇摆不定的立场。

马克思在分析奥地利帝国的内部状况时指出，奥地利政府所采取的煽动受奥地利压迫的民族间的民族纠纷的政策，可以在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的民族主义立场上，特别是在意大利自由派的立场上找到适宜的土壤。马克思写道：“奥地利帝国长寿的秘密正是包含在这种地方性的利己主义里面，这种利己主义使每个民族陶醉于幻觉之中，以为牺牲其他民族的独立就可以为自己争得自由”。（见本卷第21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受奥地利压迫的各个民族的命运以及加入封建的奥斯曼帝国的斯拉夫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命运同欧洲的革命民主改造，同必然导致这个帝国复灭并促使巴尔干半岛上独立民主的国家建立的革命战争联系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许多西欧政治活动家的意见，包括英国政论家戴·乌尔卡尔特的主张毫不触动反动的土耳其国家的意见相反，认为封建的土耳其帝国是历史进步的最大障碍，因而支持在土耳其征服者统治下的斯拉夫民族和其他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要求。

除了论述克里木战争、分析军事行动的进程以及与这场战争有联系的欧洲革命运动的前途的文章以外，马克思论述1854年开始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如“马德里的起义。——奥地利—土耳其条约。——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维也纳会议。——奥地利的公债。——杜耳塞和奥当奈尔的文告。——英国的内阁危机”、“西班牙的革命。——土耳其和希腊”、“西班牙的反动”等等在本卷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欧洲大陆革命运动的一切表现，认为西班牙的革命事件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们热烈欢迎西班牙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发动，认为这种发动可能成为欧洲革命的序幕。

为了更好地了解西班牙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以及革命中的阶级力量的配置，马克思仔细地研究了过去西班牙革命的历史，阅读西班牙、法国、英国和德国作家的著作。马克思在1854年9—12月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一组文章——“革命的西班牙”就是他研究历史的成果；这组文章深刻地分析了从拿破仑入侵到1820—1823年的革命为止的西班牙人民的斗争。第一次发表的这组文章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马克思曾寄给“纽约每

日论坛报”，但是该报没有刊登）的部分手稿是这一著作的重要补充。

马克思论述西班牙问题的文章，是巨大的科学财富。这些著作中所作的总结，不仅阐明了西班牙历史上的极重要事件——西班牙人同摩尔人的斗争，反对查理五世的专制制度、维护中世纪自由的暴动，反抗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资产阶级革命，卡洛斯派战争等等——而且使人更容易了解世界历史上的一系列共同问题。

在所有阐述西班牙革命史的文章中，马克思首先注重的是人民群众的作用，认为无论是专制独裁政体、“神圣的宗教裁判所”，或者是拿破仑的军队，都不能摧折人民群众的革命毅力。尽管西班牙国家乍一看来多么死气沉沉，在它统治下的西班牙人民的活力还沉睡未醒，拿破仑第一原认为西班牙是一具没有生命的死尸，“但是他发现，如果说西班牙国家死亡了，那末西班牙社会却充满生气，它的每一部分都洋溢着反抗力量，这使他非常不快地大吃一惊”。（见本卷第463页）

马克思很高地估计了在西班牙展开的反抗法国干涉者的斗争，同时辩证地揭露了这个斗争的矛盾特点：人民的目的是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西班牙反动统治集团的意图则是恢复专制制度和维护自己的特权。马克思指出，这是当时所有反抗拿破仑侵犯、争取独立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所固有的现象。因此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必须把民族解放斗争同深刻的内部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结合起来。

马克思拿十九世纪西班牙革命作例子，揭示了以前一切资产阶级革命特有的一系列规律性。他指出了作为这些革命的动力的

人民群众的作用，同时也揭露了领导这些革命的、与人民利益格格不入的、自由资产阶级领导者的不彻底性和阶级局限性（这一点使革命斗争的整个发展受到深刻的影响）。马克思指出，那些实际上仇视革命、只想把运动局限在立宪范围内的自由派分子，经常利用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偏见。马克思在“埃斯帕特罗”这篇论文中写道：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就是：“正当人民似乎临近一个伟大的开端、一个新时代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却让自己沉湎于过去的幻想，自动地把自己好容易才争得的权力、一切影响让给过去时代人民运动的真正的或者冒牌的代表。”（见本卷第401页）马克思对西班牙自由派分子所作的深刻的批判，补充了他在早期著作中对于自由主义这个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中间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派别的论断。而其中马克思指出的西班牙革命领导者在殖民地问题上的沙文主义立场和维持西班牙对拉丁美洲领地的统治的意向，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非常典型的表现。

马克思在分析西班牙历史时，除了揭示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以外，还阐明了这个历史的特殊性，其中包括西班牙人民的民族特点和古老传统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于是马克思以西班牙问题为例指出：在封建制度解体和民族国家产生时期，君主专制并不是到处都起进步的作用。如果说在欧洲的一些大国中，君主专制在当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见本卷第462页）那末在西班牙，由于许多历史原因，君主专制不仅不能起集中统一的作用，而且还直接阻碍历史的发展。马克思的结论是：“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同欧洲的一般君主专制只有纯粹表面上的相似，其实，它应该列入亚洲的政体。西班牙和土耳其一样，仍旧是一堆共有一个挂名君主的治理不善的共和国。”（见本卷第462页）马

克思在分析十九世纪初西班牙的历史发展的特点时指出：由于西班牙的传统，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即“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要采取两个敌对王朝利益的斗争形式”。（见本卷第 672 页）

在马克思所写的一组文章“革命的西班牙”中过去没有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部分手稿，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理论结论，这些结论仿佛总结了这组文章的内容，给人提供了理解其中所叙述的事件的钥匙。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思想：1820—1823 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代表市民阶层利益的资产阶级革命者脱离了农民群众。马克思强调指出，如果革命的政党不善于把农民的利益同城市居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就是把农民群众排斥在革命之外，从而使农民有可能被反革命势力利用。缩小运动的社会基础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革命市民的依赖军队——军队是“对利用他们的人有危险……的工具”（见本卷第 671 页）——也就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论西班牙的文章，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各别民族历史的光辉的范例。

*　　*　　*

本卷中收集了两篇没有发表过的手稿——卡·马克思的“革命的西班牙”一组论文中的片断和弗·恩格斯的“喀琅施塔得要塞”。此外，本卷中还刊载了过去没有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25 篇文章，这些文章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在发表这些新的文章时，曾利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库中所保存的马克思在 1850—1854 年的笔记本，其中除了其他材料以外，还有马克思和他的妻子对寄往“纽约每日论坛报”的

文章的登录。这个笔记本和其他的资料使我们能够确定本卷中各篇文章的作者和写作年月。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曾经多次提到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随意增删他们的文章，特别是那些作为社论发表的不署名的文章。编辑部竭力把恩格斯的许多文章，主要是军事评论改成像是在纽约写的，因此在文章中加进了一些编辑部的文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文章甚至增加了整段的文字。在本版中我们已把显然是编辑部所作的增补放在有关篇章的注释中去了。

在研究本卷发表的文章中所引用的具体历史材料时，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大量时事评论时所能利用的资料主要是资产阶级报刊例如“泰晤士报”、“总汇通报”、“比利时独立报”以及“经济学家”杂志等的报道。他们从这些报刊上获得关于军事行动的进程、交战国的军队数量、各国财政状况等等资料。有时这些资料和以后研究所确定的资料是有出入的。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以及其他报纸上印错了的一些人地名、数字和日期等，本卷中已经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过的资料加以核对和订正。

本版和全集第一版不同，在第一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被分成许多部分并按照它们的标题分类，有时还整段整段的遗漏，而在本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章都按照当时报上发表的原样刊印。凡是报上没有刊登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标题的文章，在标题的上面都加星花。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54年1月—1855年1月

欧 洲 战 争

弗·恩格斯
欧洲战争[1]

久待解决的土耳其问题看来终于达到了这样的阶段，即一贯采取卑鄙的、无结果的拖延搪塞手段的外交，已经不能再阻挠问题的解决了。法国和英国的舰队已进入黑海，企图阻止俄国舰队对土耳其舰队或土耳其沿岸地区的袭击。沙皇尼古拉早就宣称，这一类行动对于他将是宣战的信号。现在他会不注意这个事实吗？

不能期望联合舰队会立刻攻击并消灭俄国分舰队或摧毁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事和海军造船厂。相反地我们可以相信，两国外交官给两位海军上将①的指示是这样规定的，就是以一切方法避免任何冲突。但是舰队行动的命令既经下达，海上和陆上的军事调动，便不再服从外交官的愿望和计划，而服从它自己的规律，违反这些规律，就不免使整个远征军遭受危险。俄军在沃耳特尼察被击败，这决不是外交官的意图；但是既然奥美尔－帕沙被允许有某种行动的自由，并且军事行动已经开始，那末敌对双方司令官的行动便进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不受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监督的范围了。

因此，既然军舰已经由贝科兹停泊地起锚，便没有一个人能

① 即邓达斯和安梅林。——编者注

说，这些军舰将以多快的速度陷入一种无论是阿伯丁勋爵的和平呼吁，或者是帕麦斯顿勋爵同俄国的秘密勾结都不能使它们解脱出来，而它们只得在可耻的退却和坚决的战斗之间进行抉择的境地。像黑海这样使敌对双方军舰都难以隐蔽的狭窄而闭合的海面，恰好是在目前情况下每日都难免发生冲突的地方。此外，指望沙皇尼古拉毫不抵抗地让自己的舰队被封锁在塞瓦斯托波尔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下一步便是欧洲战争，那末这很可能是以俄国为一方同以英国、法国和土耳其为另一方之间的战争。发生这种事变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我们不得不尽力之所及来比较一下双方胜利的机会和作战的兵力。

但是俄国会不会孤立呢?奥地利、普鲁士以及依附于它们的德意志各邦和意大利各国在这一场全面战争中将站在哪一方面呢?据说，路易·波拿巴曾暗示奥地利政府：如果法国同俄国发生冲突而奥地利站在俄国方面，那末法国政府就将利用只需一点火星就足以重新燃起燎原烈火的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风潮，而且法国将试图恢复意大利和匈牙利这两个国家。这样的威胁可能影响到奥地利的态度，可能促使奥地利尽可能长期地保持中立，但是如果发生战争，那也不能指望它长久地袖手旁观。这种威胁的本身就可以在意大利引起局部的起义，这些起义一定会使奥地利更依附于俄国，更听命于俄国。再说，这种拿破仑式的把戏不是已经演过一次了吗?[2] 难道可以期望一个重新使教皇登上世俗的宝座并给那不勒斯王位准备好了后继者[3] 的人，给予意大利人以他们追求得并不亚于脱离奥地利而独立的东西——意大利的统一吗？难道可以期望意大利人民会莽撞地陷入这个圈套吗?无疑地，意大利人深

受奥地利的压迫，但是他们未必会有强烈的愿望来帮助巩固这个甚至在法国本土也已经摇摇欲坠的帝国的威望并维护第一个反对意大利革命的人的荣誉。所有这些情况，奥地利政府是知道的，因此可以推测，奥地利的行动受本身财政困难的影响将比受波拿巴的威胁的影响大；同样可以相信，在决定关头，沙皇的影响在维也纳将占上风，并把奥地利拉到俄国方面去。

普鲁士企图重复它在 1780 年、1800 年和 1805 年所玩弄的那套把戏[4]。它计划建立中立的波罗的海各国或北德意志各邦的联盟，而它居于盟主的地位就可以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就可以投到许给它好处最多的那一方面。历史证明，所有这些几乎是喜剧毁的企图，总是以贪婪的、动摇的、怯懦的普鲁士政府投入俄国的怀抱而结束的。这一次普鲁士也难以逃脱它那往常的命运。它将向各方伸张它的触角，将公开拍卖自己而在两个阵营之间玩弄奸计，将滤出蠓虫吞下骆驼[5] 而丧失它所仅存的一点威望，将要受到打击而终于落到给价最少的人的手里，也就是说，这次将和以往各次一样，落到俄国的手里。对于俄国来说，普鲁士不是盟友，而是累赘，因为普鲁士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使自己满足，它将认为应该先使自己的军队吃败仗。

只要德意志的大邦中有一个没有卷入欧洲战争，战事就只能在土耳其、黑海和波罗的海进行。在这个期间，意义最重大的将是海战。毫无疑问，联军的舰队能够摧毁塞瓦斯托波尔并消灭俄国的黑海舰队；联军能够夺取并守住克里木，能够占领敖德萨，封锁阿速夫海并发动高加索山地居民。如果能够迅速而坚决地行动，这是再容易作到不过的了。假定这需要一个月的奋战，那末下一个月联合舰队的蒸汽舰就可以把行驶缓慢的帆力舰抛在后面而先到达拉

芒什海峡。因为留在黑海要做的事情会很容易地由土耳其舰队完成。为了在拉芒什海峡装煤和作其他准备，可能还需要两个星期。当这些蒸汽舰同法英两国在大西洋和拉芒什海峡的分舰队会合以后，联军舰队便可以在5月底以前以保证攻击成功的足够数量的船只在喀琅施塔得停泊场出现。

在波罗的海应当采取在黑海所采取的措施，是不言而喻的。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同瑞典建立同盟；必要时，还得恐吓丹麦；派出足够数量的部队在芬兰登陆，并提出只有在该省重新同瑞典合并的条件下才签订和约的保证，以发动芬兰的起义。在芬兰登陆的部队可以威胁彼得堡，而舰队则可以炮击喀琅施塔得。的确，这个要塞是一个非常坚固的阵地。通向停泊场的航道几乎不容两舰并列通过，并且在通过时这些舰船的两舷要受到不仅设在主岛上的、而且设在小礁岩、浅滩和周围小岛上的炮台的轰击。不仅人员而且船只的某些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如果在制订攻击计划时预先考虑到这一点，如果决心牺牲某些舰船并且毫不动摇地坚决执行计划的话，喀琅施塔得是一定可以攻克的。它的工事的石砌体不能长久地抵御对石墙破坏力量大的佩克桑重炮[6]的集中火力。装备有一整套这种火炮的大型螺旋推进式蒸汽舰会很迅速地发挥不可抵御的威力，当然这时也得冒自己被击沉的危险。但是喀琅施塔得是俄罗斯帝国的锁钥，占领了它就会使彼得堡失去屏障，相形之下，损失三、四艘螺旋推进式战列舰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敖德萨、喀琅施塔得、里加和塞瓦斯托波尔都失守，芬兰被解放，而敌军逼临首都城下，并且俄国的一切河流和港湾都被封锁的时候，俄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它将变成缺手无眼的巨人，除了根据敌人战斗的杀声忽东忽西地用自己的笨重身躯去乱撞以压倒

敌人以外，毫无办法可想。如果欧洲的海上强国能如此坚决而有力地行动，那末普鲁士和奥地利就可能彻底摆脱俄国的控制以致加入盟国。因为德意志这两大邦，只要感到国内安全，是乐于利用俄国的困难处境的。但是不可能期望阿伯丁勋爵和德鲁安·德·路易斯采取这样坚决的措施。最高当局无意进行决定性的打击；而且，一旦爆发全面战争，统帅们的机断行事的权力将大受限制，以致完全无法行动。纵然得到决定性的胜利，也会把它们归于侥幸的成功，使它们的后果尽可能对敌人无害。

在黑海的亚洲沿岸的战争可能因舰队的行动而迅速结束，但是在欧洲沿岸，战争将继续进行，不会出现长期的间歇。被驱逐出黑海并丧失了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军，不冒很大的危险，就不能渡过多瑙河（除非沿着去塞尔维亚的方向，在那里发动暴动），但是他们只要没有迫于敌人的优势兵力以及后方和翼侧大批部队登陆的威胁而退出瓦拉几亚，就完全可以守住多瑙河各公国。只要没有全面的军事行动，俄军就可以不放弃莫尔达维亚；因为既然霍亭和基什涅夫能保障俄军同俄国本土取得可靠的联络，翼侧和后方的佯动毕竟是意义很小的。

但是当战争限于以西方强国和土耳其为一方同以俄国为另一方的冲突时，它就不可能成为我们在1792年以后看见过的那种欧洲战争。不过，一旦战争爆发，西方强国的无所作为和俄国的积极行动很快就会迫使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到专制君主方面。对于普鲁士，也许可以不必特别重视，因为它的军队，无论素质如何，由于自满，很可能重复耶拿的教训[7]。反之，奥地利，虽然濒于破产，虽然在意大利和匈牙利可能发生起义，它仍将是不可轻视的敌人。俄国本身则因为不得不在多瑙河各公国和高加索边境驻军，不得不占领

波兰，并派兵保卫波罗的海沿岸，特别是彼得堡和芬兰，将只有极少数的军队用于进攻战。如果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在普鲁士尚未被彻底击溃的情况下）在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能集中50—60万人，那末这已经多于根据合理判断所预期的数量。而对付这50万联合军队，单是法军就可以了，不过其将领在素质上不能比敌军将领差；在敌人中间，只有奥军才有真正名实相符的统帅。俄军的将领是不足怕的，而普军根本没有将领；他们的军官是些天生的少尉。

但是不要忘记，在欧洲还有一个第六强国，它在一定的时刻将宣布它对全部五个所谓“大”强国的统治并使它们个个战栗。这个强国就是革命。它已经长久地沉默和退却，但是现在商业危机和饥馑又把它召上战场。从曼彻斯特到罗马，从巴黎到华沙和佩斯——到处都感到有它，到处它都在抬头，从假寐中醒来。它复苏的象征是多种多样的；这些象征在各地无产阶级的骚动和不安中都可以看到。只要一个信号，这个欧洲最大的第六强国就会披戴灿烂的盔甲、手持宝剑昂然地走出来，好像密纳发女神从奥林帕斯神的头脑中出现一样。这个信号将由快要到来的欧洲战争发出，那时，对于列强均势的一切预计都要因新因素的出现而被推翻，这个新的因素将以其创造万物、永葆青春的活力粉碎旧的欧洲强国及其将军们的一切计划，正如同1792—1800年时的情形一样。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1月8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2月2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9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西方强国和土耳其

1854年1月10日星期二于伦敦

对于瑟美列先生泄露匈牙利王冠隐藏地点的责难[8]最初是由公认为奥地利警察当局机关报的维也纳“士兵之友”提出来的，这就足以证明责难的虚伪了。

虽然没有充分的根据就供出本人的同谋不是警察当局的惯例，但它的一个常用手法，就是把嫌疑加在无辜的人身上，以包庇犯罪的人。恐怕不能想像，奥地利警察当局既然事先已经取得了瑟美列先生的合作，会牺牲像他这样一位著名的、有影响的人物。如果秘密不是由科苏特方面的某一个人泄露的（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我就只会怀疑这是目前居住在巴黎的卡·鲍蒂扬尼伯爵的出卖行为。他是知道王冠隐藏地点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而且其中只有他一个人向维也纳法庭请求过**特赦**。这件事，我想他是不会否认的。

不列颠总司令哈丁勋爵被劝收回了辞呈。关于谋福克公爵，根据“都柏林晚邮报”记者的报道，

“大家已从宫廷的复杂关系中知道一些了。暂居宫廷某职、身膺国家最高世袭爵位的某某高贵公爵在女王的筵席上多饮了一些香槟酒，于是在酒宴厅里极其体面地失去了平衡，甚至连女王陛下本人也遭了殃。发生这件可叹的

事情以后，高贵的公爵被撤了职，斯宾塞伯爵被任命为女王陛下宫廷的侍从长。”

爱尔兰旅的经纪人萨德勒先生重又呈请辞去他的内阁职务，而阿伯丁勋爵这一次接受了他的辞呈。萨德勒先生自从在爱尔兰法庭上被揭露依靠卑鄙的诡计钻入议会以后，处境已经十分困难。在这个不愉快的事件以后，“群贤内阁”[9]对爱尔兰旅的影响就不见得能加强了。

星期五和星期六在戴文郡的克勒迪顿地方发生了抢粮风潮[10]，这是人民对政府报纸和自由贸易派报纸所大肆渲染的繁荣的一种回答，这些报纸原来是想在辞送1853年旧岁时让自己的读者们高兴一番的。

“祖国报”[11]从特拉比曾德发来的通讯说，由于驻德黑兰的俄国代办要求解除波斯沙赫两个享有盛誉的大臣的职务，人民中开始骚动，近卫军司令声称，如果满足这样的要求，他将不能对社会的治安负责。这篇通讯认为，波斯沙赫正是慑于人民对俄国的愤怒，才不得不恢复了同英国代办的联系。

原来已经公开的大批外交文件，现在又加上了驻君士坦丁堡的四强国大使于12月12日共同递交土耳其政府的四强照会[12]以及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12月30日在巴黎签署的给法国驻各国外交代表的通令。仔细阅读四强照会之后，就会理解，为什么在君士坦丁堡当知道照会已被土耳其政府接受时就开始骚动；为什么12月21日发生了暴动；为什么土耳其的内阁不得不郑重声明，恢复和平谈判并不会结束军事行动，也不会暂时停止军事行动。事实上，正是在背信弃义而又畏缩不前的西诺普大屠杀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并使整个奥斯曼帝国一致呼吁要复仇之后9天，四强

国却心平气和地邀请(而大不列颠和法国的大使甚至是强迫)土耳其政府,以下列条件为基础同沙皇进行谈判:恢复过去的一切条约;在有关苏丹赐予他的基督教臣民的宗教特权的敕令中对每一强国,自然也对沙皇补充新的保证;土耳其政府委派全权代表签订停战协定;土耳其政府允许俄国在耶路撒冷建立教堂和医院,并对列强(自然也包括沙皇)负有改进本国内部行政制度的责任。土耳其政府不仅不能因俄国人的强盗行为造成的重大损害而得到赔偿,相反地,俄国强迫土耳其戴了二十五年的锁链将被锻打得更结实,而且囚犯将比过去囚得更严。土耳其政府必须听任这个专制君主摆布,低声下气地向他保证施行关于本国基督教臣民的宗教特权的敕令,并对本国内部的行政制度严肃地提出担保。这样,它必须在宗教问题上受沙皇的保护,同时必须在民政管理问题上屈从他的指导。人们则答应土耳其政府"尽快地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军"(克兰里卡德勋爵还把对多瑙河各公国的占领叫做"强盗行径")作为它这次投降的补偿,并且向它保证1841年7月13日条约[13]中的序言——对付俄国的"可靠保证"——将得到正式批准。

虽然这些无耻的"强国"表现了闻所未闻的卑鄙,竟在西诺普会战以后几天就迫使土耳其政府在上述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但是这种无耻手段还是不能使他们摆脱困境。沙皇真做得过火,他绝对不能容忍欧洲任何强国稍稍触犯他所捍卫的对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的保护权。

"泰晤士报"[14]驻维也纳记者报道说:"奥地利曾探询,俄国宫廷是否将反对欧洲任何一个强国对土耳其基督徒的保护。对这问题立即得到了最坚决的回答,俄国不允许任何其他强国干涉正教教会的事务。还说,俄国与土耳其政府订立了条约,而且只能同它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还看到“旗帜报”[15]有这样的报道：

“尼古拉不准备接受非由土耳其君主本人直接提出的任何建议；这样他就否认了欧洲强国进行调停或干预的任何权利，并且使它们受到了不能说是不应受的侮辱。”

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的通令中唯一重要的地方就是说联合分舰队已经进入黑海，目的是希望“采取联合行动，以杜绝俄国海军对土耳其领土或舰队作任何新的进攻”。Non bis in idem.〔一事不重罚。〕La moutarde après la viande.〔事后人情。〕在昨天的“纪事晨报”[16]上刊登了该报驻君士坦丁堡记者12月30日的电讯，报道联军分舰队已进入黑海。

“每日新闻”[17]写道：“大概，舰队进入黑海，只不过是要做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所做过的事，也就是不做什么事。”

“新闻报”[18]则报道说：

“英法两国舰队各有一艘军舰接到进入黑海并挂白旗开向塞瓦斯托波尔的命令。军舰到达该地以后必须通知俄国海军上将：如果他驶出塞瓦斯托波尔港，将立即受到轰击。”

的确，俄国舰队在这个不十分顺利的季节以及在西诺普会战建立了光荣的功绩以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驶入黑海，但是沙皇不会让英法哪怕是在短期内把他从黑海排挤出去；还在1833年，他自己就已经胜利地把英法从这里排挤出去了[19]。如果他不以宣战来回答这个通知，就会失去他的威信。

“新普鲁士报”[20]声称：“俄国向英法宣战比俄土之间立即缔结和约更有可能。”

就俄国无端攻击土耳其一事在纽里(奥尔斯脱)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我很高兴，承岛尔卡尔特先生的盛情给我寄来关于纽里大

会的报告，使我有可能向读者介绍这位绅士演说中最引人入胜的几段话。因为我已经不只一次地陈述过我对东方问题的观点，所以我认为无需再着重指出我无法同意乌尔卡尔特先生的地方[21]。我只想指出，下面的报道可以说明他的观点：

“小瓦拉几亚的农民在瓦拉几亚兵士的支援下起来反抗俄国人。在卡拉法特四周以及沿多瑙河左岸的整个地带都行动起来了。俄国的官员已经离开土尔马耳。”

乌尔卡尔特先生说了几句开场的话以后接着说：

“在牵涉到我们最重大的利益以及我们与别国关系的问题上，没有法律的强制，没有系统的准则，没有对民族的责任，没有对任何失职或任何犯罪的制裁。这里，你们完全被剥夺了一切为宪法允许的进行影响的手段，因为你们不是被封锁了消息，就是只能听到歪曲的报道。因而，这种制度的必然后果，只能是人民被引入歧途，政府受人收买，国家遭到危害。其实，你们都敌视这个最老奸巨滑、始终不变、穷兵黩武、恬不知耻的政府，这个政府依靠了它想要颠复的那些政府的帮助，为建立它威胁全世界的霸权开辟了道路。而我们的处境的特点在于，正如过去在雅典发生的情形一样，俄国在这个具有与它的政策完全相背的代议机构的国家内部已经找到了或是说已造成了它的势力的主要工具。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英国对这类问题一无所知。美国有个总统，享有王权素有的特权。那里还有个参议院，能监督行政权并预先了解行政法令。（注意！注意！掌声）在法国曾多次指定议会委员会去研究国事；委员会要求审阅文件，并召请外交大臣说明情况。同时，那里的人民对得到的情报都是警惕的，至少是仔细的；政府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因为这都决定着内阁和王朝的命运。在奥地利，至少还有一个了解自己臣仆行动的君主。在土耳其和俄国情况是这样：其中一个国家是民意控制政府，而另一个国家则是政府表达民族的意志。只有英国的国王没有权力，政府也没有制度，议会没有监督权，而整个民族一无所知。（注意！注意！）现在回过来谈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目击的事实，我首先应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俄国没有力量进行威胁，它指望的只是虚张声势地把你们吓住，

而绝对不打算对土耳其作战，因为它还没有钱，甚至也没有准备好，它希望你们挡住土耳其，使自己能乘机占领土耳其的领地；而现在俄国正期望你们迫使土耳其实现俄国旨在毁灭奥斯曼帝国的无耻的要求。(注意！注意！)俄国得到你们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帮助，又得到你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分舰队的支援，一定能够达到它的目的。在这里，我必须请你们注意我高贵的朋友切斯尼上校的声明，同时必须弥补他疏忽的地方。他说，从渡普鲁特河以前的形势来看，土耳其比俄国强，但是他并没有向你们说明他现在和过去对土耳其人军事素质的高度评价。他说，即使目前由于你们的帮助俄国处于极大的优势，他仍然怀疑土耳其是否真的比俄国弱。只要具备两个条件，我就绝对不会怀疑土耳其会弱些，请你们容许我把这两个条件讲一下：第一，你们的大使和分舰队都应当召回；第二，土耳其不再以寄希望于外国人来削弱自己的力量。以后他又作了一个有些地方不很肯定的新的声明，这个声明既然出于这样高的权威(在这些问题上再没有更高的权威了)，可能使人体会不到原意，或者遭到曲解。切斯尼上校说，目前情况对于俄国可以说是很有利的，因为多瑙河已经封冻，这使它有可能把它的军队调往保加利亚。但是它能有多少兵力调往保加利亚呢？几个月来，在欧洲听到的一直是夸大的报道，他们煞费苦心地向我们宣传说，俄国集结了大量军队准备军事行动，还估计军队人数达 15 万。人们也几乎相信 15 万人就足以占领土耳其了。不久以前我获得一个官方的消息，说渡过普鲁特河的军队人数总共只有 8 万，而其中因病死亡或住院的就有 2—3 万人。我曾将这个消息寄给一家报纸，但是没有刊登，因为他们认为消息不确。现在，俄国自己公布了一个消息，说军队的总数已缩减到 7 万人。(掌声)我们假如不谈两个帝国调动自己全部军队后兵力的对比情况，那就应该明白，只有这样数量的军队，俄国是不打算作战的。而土耳其有多少兵力用来抵抗呢？以前在巴尔干和多瑙河之间土军人数不下 18 万，现在则已增加到 20 万，他们所驻守的阵地也十分坚固，而俄军人数在缩减，最多也不过 5 万人，并且因为疾病和潜逃，士气不振。关于土军的素质和他们比俄军优越的地方，你们已经听过贝姆将军的证明，而切斯尼上校也是一个目击者，他的话已经由引起整个欧洲惊讶、赞叹的事件证实了。请注意，我们现在关心的不是两个帝国力量对比的问题，而是其中俄国的意图和行动方式。我认为，俄国不准备打仗；因为，一方面它没有准备好必要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可以寄希望于英国内阁。俄国以前不想打，现在也不想打。

还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我就说过，俄国将在英国帮助下侵入并占领多瑙河各公国。为什么我能预见到这点呢？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知道了俄国的意图，对于这种意图许多人都同我一样知道，或许比我知道得更清楚，而是因为我知道英国在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不过现在我们再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不能不谈。切斯尼上校说，关键在于俄国配备普鲁特河对岸的预备队。最近他听到了许多关于这支预备队的消息。有人说，奥斯坦－萨肯为了报沃耳特尼察失败之仇，带了5万兵士完全以行军队形开到多瑙河。后来，5万人变成了18000人，而最有趣的，连这18000人也没有到达目的地。(笑声和掌声)如果我们以切斯尼上校所说的75000人这一数字为准，减去死亡和患病的，还有5万人，再加上有分身本领的预备队中的18000人，那末最后总共也只有7万人，他们必须同已经作好坚固防御工事的20万人相抗衡，而且又是在多山地形和俄军一贯避免作战的季节。

现在让我回顾一下上次战争，即1828—1829年战争中的事件。那时土耳其正发生内乱。穆斯林在杀戮穆斯林，各省发生暴动，希腊起义了，原先的军事力量已经被歼灭，未受严格训练的新兵总共只有33000人。在纳瓦林港不列颠火炮的轰击夺走了土耳其在黑海的统治权；而且那时得到英法支持的俄国在土耳其得到宣战消息以前突然向土耳其攻击，直抵土耳其欧洲领地的中心。你们想，那时俄国估计需要调用多少兵力呢？216000人。(掌声)仅仅因为人们使用了欺骗手段，并且在英国大使（可惜，他已经回国了）的影响下，土耳其才不得已签订了由于突然攻击逼出来的阿德里安堡条约。(听啊！听啊！)你们请看一下现在的土耳其，它团结一致，它充满因人民热爱祖国、憎恨暴力而激发的英雄气概，它权力集中，资源丰富，它可以征召举世无双的斗志最高昂的30万名志愿兵，它拥有在亚洲屡获胜利的训练有素的25万兵士，它拥有黑海的统治权（这种统治权绝对没有在西诺普会战中失去，这点我立即就要谈到），它有一支蒸汽舰队可以一无伤亡地、及时地把军队从帝国最遥远的地方运送到战场。从高加索积雪的山头到阿拉伯荒芜的沙漠，从非洲辽阔的原野到波斯湾——到处人们都义愤填膺，英勇不屈。(听啊！听啊！掌声)但是，正像上次战争中的纳瓦林战斗将哥萨克人引入巴尔干一样，现在英国的螺旋桨可能甚至不经战争就把俄国古老的舰船引进达达尼尔海峡。不过我讲的是俄国的意图。事情的实质也就在这里。今日的胜利应该在唐宁街取得，而不是在东方取得。然而，难道你们没有受到损害吗？难道

今天到会的人中间有人没有受到严重的侵犯吗?有谁不是付出更多的钱去买面包，不是减少了就业的机会或是投资的机会呢？(听啊！听啊!）谁的税负没有增加？难道交易所街[①]不是像得了热病一样吗？难道我们没有亲眼看到因俄国军队的进攻引起的金融市场的混乱已经相当于1847年混乱的三分之二了吗?可是俄国还是丝毫不想作战。难道我们没有亲眼看到欧洲一些政府已经崩溃，暴动和混乱的前提已经产生吗?可是俄国还是丝毫没有作战的意图。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奥斯曼帝国由于俄国调动了7万人的军队（供养这些军队既要土耳其出钱，也要大不列颠工人出钱)，而供养50万人的庞大军队弄得破了产吗?这些情况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你们信任了那些轻信的人，他们认为，俄国非常强大，没有人能同它较量，而土耳其又是这样孱弱，给予任何支援也无济于事。我们真是生活在充满梦呓和神话的时代；我们不但能相信这一切，而且能够相信，俄国比联合起去对付它的全世界列强都要强大。'泰晤士报' 以轻蔑的口吻评论伊斯兰教军队；对法国陆军和英国海军也估计过低，它还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整个欧洲加上土耳其也不见得能阻止俄军进入君士坦丁堡,正如不能阻挡北风吹入萨尔马特平原一样…… 议论欧洲的话同样适合于议论土耳其，但是，如果你们继续按老样行事，土耳其定将灭亡。俄国调动了7万人，结果土耳其充满了恐惧和愤懑，英国恐惧得发抖，俄国也在发抖，它是……狂笑得发抖。(笑声和长时间的掌声）我答应过要回头来谈一下西诺普会战，或者正确地称它为小纳瓦林战斗。我不想把这件不愉快的事件同我们的做法联系起来谈，——我们在这次事件中的做法并不比在其他事件中的做法更丢人——我之所以谈这件事,只是因为它表明了双方力量的对比。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会战一点也没有加强俄国，也没有削弱土耳其，相反，这次会战非常清楚地表明，俄国人有一切理由害怕土耳其人的勇敢。这里，我们看到了我国海军史上从未有过的事迹：巡航舰同战列舰一起作战，指挥官把火炬投入火药舱而为祖国牺牲。为了反抗这个在每一个步骤上，特别在这次事件上受到每个人憎恨和厌恶的政府，他们已做到了一切。请注意，土耳其的海军依然完整无损：没有损失一艘战列舰或一艘蒸汽舰。现在，如果外交官员被召回，土耳其在黑海的统治权就有了双倍的保证；因为正是这些人，而且也只有这些人，造成了所谓西诺普惨剧。可

① 伦敦的一条街道，交易所说在这里。——编者注

是安排这场惨剧是别有用心的，是想以此鞭策巴黎和伦敦的掉队的驮载的牲口，迫使它们将协议条件强加于交战双方。在参加这次大会之前，我听到一位委员会委员说，如果英法希望由它们调停以保持和平，那它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我知道他所说的是所有英国人已有的共同的看法，然而，我听了感到很可怕。谁给予你们权利到处横行，用武力强求和平？反抗侵略是一回事，进行侵略则是另一回事。（听啊！听啊！）要知道，你们除了向俄国宣战就不能进行干预，即使是为了拯救土耳其也好。你们进行调停也还是对俄国有利，这种调停会在俄国的指使下进行，其结果是迫使土耳其接受把自己导向毁灭的条件……　谈判的时候也许你们建议土耳其废除它过去与俄国签订的条约，让它把希望放在全欧协谈上。这种借口实际上已经提出，而且受到那些一贯对荒诞现象欢呼的国家的欢迎。上帝慈悲！欧洲协谈！这就是土耳其所应期望的！可是，你们的维也纳条约当然也是一种欧洲协议，而结果又如何呢？这个协议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建立了波兰；而波兰的情况又怎样呢？当波兰灭亡的时候，你们的大臣又是怎样向你们讲这个协议的呢？他是这样说的：‘英国受权提出关于波兰事件的意见。’接着他说，关于这个问题在事件发生以前他已经提出抗议了，又说：‘可是俄国在这时持另一种看法了。’你们现在的协议情况也会是这样：俄国又将持另一种看法了。（热烈的掌声）这些话都是在下院里说的，而且就是这位过去掌握波兰命运而今又掌握土耳其命运的大臣〈帕麦斯顿勋爵〉①说的。不过现在已经有人预先告诉你们了，而那时你们是一无所知的……　请允许我引用一下‘泰晤士报’几天来所刊登的资料。该报报道说，我们驻波斯的公使同沙赫政府意见不一致，沙赫政府已经准备让步了，俄国公使突然插进来企图使争论尖锐化。请看，结果是，就在俄国把英国排挤出波斯的同时，英国却把俄国的统治强加于土耳其。消息提到了抵达德黑兰的外交代表团；还说，阿富汗人非常激怒，俄国的死敌多斯特－穆罕默德对自己的代表团促使波斯支援土耳其一事的成败十分关切。你们大概还记得，16年前，英国为了推翻多斯特－穆罕默德曾向阿富汗宣战，因为那时他是英国的敌人，是俄国的忠实盟友。也许，你们的政府相信了这点。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奇怪了，因为它不去同俄国作战，而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同阿富汗人作战，也就是将阿富汗人直接推入俄国的怀抱。可是，你们的政府没有这样确信；当时它十分了解，多斯特— 穆罕默德，正像现在看得很清楚一样，是俄国的死敌，正因为这个原因，你们政府就向他进攻。这个事实已经查明，而在下院也已经证明那些把多斯特— 穆罕默德错误地说成是俄国盟友的文件完全是伪造的。英国公使本人把原件寄回国来公布了。(无耻!)这一切就是政府行动偷偷摸摸，而全国人民陷于不明情况（这点我已说过）所产生的自然而然的后果。我看在我们的会上没有一个人不是默认这次罪行的同谋者，也没有一个人不是因为漠视国事和国家的荣誉而堕落到奴隶的地位，虽然，他们还自以为是一个自由的人。(听啊！听啊!）请允许我告诉你们关于外国人对你们的一些看法。不久以前，你们已经听到了许多关于德国人对宫廷的影响的话。你们不想听听女王的德国堂兄们的意见吗？那末让我告诉你们：如果德国受到俄国的影响，那末这是英国干的事。只要仔细听听下面的一段话就够了：

‘只要英国和法国不干预土耳其的事务，土耳其就会胜利。相反，如果一味奴颜婢膝的西方强国不能停止“调停”，即不能停止干预东方的事务，那末土耳其的命运就被法定了，而莫斯科的哥萨克们不久就会成为全世界命运的主宰者！虽然外交官们罪行累累，尽管土耳其错误地把杀人的匪帮当作自己的朋友，但是不幸的土耳其迄今的行动毕竟是高尚的。不用说，事情不好！我时时担心联军分舰队会炮击土耳其的首都，以挫伤它的斗志，强迫它可耻地投降。土耳其人真的可以这样说：《Longa est injuria，longae am— bages，sed summa sequor fastigia rerum!》〔“长期没有正义，长期受蒙蔽，可是我渴望着走向那真理的最高峰!”〕现在土耳其人的行为同英国在同样的情况下的行为真有天壤之别！他们是在战斗，而英国却在做强盗。请你们回忆一下“利马宣言”、对阿富汗的侵略、对哥本哈根的炮击、纳瓦林战斗，再想一想土耳其和它目前的处境就够了。土耳其受到屈辱和威胁，甚至它的领土受人侵犯，它受到“文明世界”的挑衅，可是土耳其在所有这些遭遇面前仍然是沉着、清醒、坚强、果敢而冷静。’

从这里，你们可以看出，你们热情地给我一个特权，使我能够发泄胸中的愤慨，预告今后将发生的事情，对此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们只能枉然叹息而已。请允许我描述一下你们目前的处境。现在不列颠有两个特点：它对国内来讲是个白痴，对国外来讲是个狂人，是武装起来的狂人，它使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都遭到危险。就每个人来讲，你们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加在一

起你们就是这样的人。愿你们个人的洞察力在你们中间苏醒，制服集体的狂人，目前你们还可以治疗这有病的头脑——这是万恶之源。”（热烈的经久的掌声）

对岛尔卡尔特先生的讲话，我可以补充一点：帕麦斯顿勋爵最近一次 coup d’éclat〔功绩〕以及他所得到的人民对他的好感，即使不能使他成为正式的首相，也能使他成为实际的首相[22]。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1 月 10 日
载于 1854 年 1 月 2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88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东方战争[23]

1854年1月14日于伦敦

久待解决的东方问题看来终于尖锐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外交手段失去了左右它的力量，而且已经不能利用它进行变化无常的、永远没有结果的活动了。1月3日法国和英国的舰队已进入黑海，企图阻止俄国舰队对土耳其舰队或土耳其沿岸地区的袭击。沙皇尼古拉有一次曾宣称，他将把这种行动看做是宣战的信号。那末，他现在会不注意这个事实吗？今天得到的消息说，法英两国舰队的联合兵力正和土耳其舰队第一大队共同把17000名土军运往巴土姆。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末这就像直接攻击塞瓦斯托波尔一样，是一种战争行为，而沙皇就只好立即宣战。

但是俄国会不会孤立呢？奥地利和普鲁士在这一场全面战争中将站在哪一方面呢？

据说，路易·波拿巴曾暗示奥地利政府：如果法国同俄国发生冲突而奥地利站到俄国方面，那末法国政府就将利用只需一点火星就足以重新燃起燎原烈火的意大利和波兰的革命风潮，而且法国将企图恢复波兰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但是，可以有把握地推测，奥地利政府受本身财政困难的影响将比受波拿巴的威胁的影响更大。

最近时期，贬值的纸币流通量不断增大，其次，政府不久以前采取了一项紧急措施，以法律规定它发行的纸币贬值 15%，从这些事实中可以推断奥地利国库的情况。这种使本国货币贬值的措施，也许是在征税方面的登峰造极的发明，因为这种作法就是税上加税。根据德国报纸的报道，奥地利 1854 年的预算在经常开支方面的赤字将达 4500 万弗罗伦，在特别开支方面的赤字达 5000 万弗罗伦。奥地利第一百次决定借款，但是看来不会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准备借款 5000 万弗罗伦，显然是为了支付定期债券的利息和应付其他一些刻不容缓的急需。

当联军的分舰队即将进入黑海的消息传到维也纳时，银行家们大忙了一阵，纷纷把纸币换成银币。持有 100 和 200 弗罗伦纸币的人们则拥挤在这些银行家的办公室里，力图挽救受到威胁的积蓄，然而在决定关头，圣彼得堡对维也纳的影响还是占了上风，奥地利将卷入这场即将到来的冲突并站到俄国方面。至于普鲁士，它仍企图玩弄 1780 年、1800 年和 1805 年的那套把戏，即建立中立的波罗的海各国或北德意志各邦的联盟，而它居于盟主的地位就可以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就可以投到许给它好处最多的那一方面。

毫无疑问，土耳其和欧洲的舰队能够摧毁塞瓦斯托波尔并消灭俄国的黑海舰队；联军能够夺取并守住克里木，能够占领敖德萨，封锁阿速夫海并发动高加索山地居民。在波罗的海应当采取在黑海所采取的措施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同瑞典缔结同盟；必要时，还得恐吓丹麦，派出足够数量的部队在芬兰登陆，并提出只有在该省重新归并瑞典的条件下才签订和约的保证，以发动芬兰的起义。在芬兰登陆的部队可以威胁彼得堡，而舰

队则可以炮击喀琅施塔得。

这一切都决定于欧洲海上强国的行动是否坚决有力。

12 月 29 日的“新普鲁士报”证实了俄皇命令帝国所有部队做好战斗准备的消息。他不仅从英国和法国银行提出了他的存款，而且命令在贵族中间进行募捐，并停止修建铁路，以便把腾出来的人力和金钱用于战争的需要。

另一方面，法国比过去更加紧张地扩军；1852 年的 80 万兵员总额中还没有征召的一半也征召入伍了。法国也早就打算发行 2 亿法郎(约合 800 万英镑)的公债，但是粮价昂贵、葡萄歉收、生丝减产、工商业普遍停滞、对 2 月底的支付的严重忧虑、国家有价证券和铁路股票跌价的趋势等等——这一切情况丝毫没有减少发行公债的困难。

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英国政府今年准备把海军陆战队和水兵扩充到 53000 人，即较去年议会通过的数字约多 8000 人，较得比勋爵内阁时期所动员的人数多 5000 人。因此可以说，从 1852 年以来海军人数约增加 13000 人。海军将有 38000 名水兵和见习水兵，15000 名海军陆战队兵士。

西诺普会战的秘密终于揭开了。根据有关俄国和土耳其在西诺普的兵力对比的消息看来，俄国比土耳其多 3 艘两层甲板蒸汽舰、1 艘三层甲板舰和 680 门火炮。因此，西诺普事件丝毫没有使俄国的实力增强，也丝毫没有使土耳其的实力减弱，而且可能正相反。这里我们看到了甚至在英国海军史上也从未有过的事迹：巡航舰和战列舰排成一列，指挥官们把火炬投入火药舱而为祖国牺牲。土耳其海军的主力依然完整无损，没有损失一艘战列舰或一艘蒸汽舰。不仅如此，根据最近的消息，俄国舰队最好的三层甲板舰之

一、装备有120门火炮的“罗斯提斯拉夫号”被土军击沉了。俄国对这个损失一直是巧言掩饰，说“罗斯提斯拉夫号”不是在战斗时而是在战斗后不久沉没的，但现在俄国人已公开承认了[24]。这个损失大大抵销了土耳其舰队的损失。如果这一艘三层甲板舰确实沉入海底，那末可以推测，俄国其他舰船在战斗中也受到了非常重大的损伤，归根到底，西诺普的胜利使俄国舰队受到了比土耳其舰队更大的削弱。埃及的帕沙一听到西诺普惨剧，就立即下令装备6艘巡航舰、5艘轻巡航舰、3艘二桅横帆舰，以弥补土耳其舰队舰船的损失。

埃及的蒸汽巡航舰“彼尔瓦兹·巴赫里号”经过5小时战斗后被击坏，并被一艘比它大得多的俄国蒸汽巡航舰“弗拉基米尔号”俘获。它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以致勉强被拖到塞瓦斯托波尔后就立即沉没了。“彼尔瓦兹·巴赫里号”全靠轮机长英国人贝尔的帮助才开到塞瓦斯托波尔湾，海军上将科尔尼洛夫曾经答应，如果他能顺利完成这一任务，便立即让他自由。但是到达塞瓦斯托波尔后，贝尔非但没有被释放，反而和他的助手们——轮机兵和锅炉兵一起被严密拘禁，每日只给3个辨士的微薄口粮，而且俄国人还要他们在这严寒季节步行80英里到俄国内地去。在塞瓦斯托波尔担任指挥的缅施科夫公爵得到了沙皇和他的大臣们的赞许，后者对敖德萨的英国领事和圣彼得堡的英国大使提出的照会置之不理。大家都已经知道，在西诺普大混战中，有两只因私人事务开到该处的英国商船被毫无理由地无情地击沉了。下面是一家法国报纸发表的关于这两只船被击沉的经过的率真的报道：

“11月30日，从英国南部港口比德弗德开来的‘霍瓦尔德号’二桅帆船，为奥地利驻西诺普的领事皮伦茨先生卸完煤以后，停泊在该处装载压舱物，

准备驶往法特萨装载谷物运往英国。突然俄国舰队出现了，它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也不给外国船只以离开危险区的机会，就对停泊在该处的土耳其舰队进行猛烈的射击。只几分钟‘霍瓦尔德号’只及港内的其他商船就全部被击沉了。”

关于这一粗暴地破坏国际法的情况在敖德萨的战报中已公布了。同时，俄国报纸还用侮辱性的词句宣称，英国舰队不敢开进黑海，英国政府也不敢阻止俄国军舰利用英国的修船厂进行修理。

最近的一批邮件又给我们带来了有关最近期同亚洲军事行动的补充消息。显然，土耳其军队已经被迫全部撤出了俄国的阿尔明尼亚，不过还没有关于迫使他们撤退的那些会战的结果的确切消息。土耳其的一个军走的是从阿尔达汉直通阿哈尔齐赫的大路，而另一个军则在这以南，沿着从卡尔斯经亚历山大罗波尔（格鲁吉亚语为居姆里）到梯弗里斯的道路前进。这两个军大概都遇上了俄军。根据俄国的报道，这两路土军都被击溃，并损失了约四十门火炮；我们没有土耳其的官方战报，但是据一些私人的消息说，撤退的原因是必须返回冬季营地。只有一点是无疑的，这就是除了圣尼古拉堡垒外，俄国领土上的土军都撤退了，俄军追击土军，俄军前卫甚至大胆地进到距卡尔斯一英里的地方，但被击退了。此外，我们知道，土耳其安那托里亚军团是从亚洲各省——旧伊斯兰教的野蛮统治的支柱——征召来的，其中有大量总的说来虽然强悍少见，但是既不正规又不可靠的临时的兵士，他们是冒险家和库尔迪斯坦的强盗；这个安那托里亚军团同安分的、有纪律的而且受过严格训练的鲁美利亚军团毫无共同之处；在鲁美利亚军团中，指挥官了解每天在他管辖下有多少兵士，是什么样的兵士；在这个军团里有军事条例和战地法庭可以制止个人的冒险欲望和掠夺习气。我

们知道，在亚洲战局的初期曾迫切需要部队的俄国人，后来得到中将奥勃鲁切夫第二指挥的第十三步兵师（16000 人）和一支顿河哥萨克部队的增援；我们知道，他们控制住了山地居民，保持住了经过高加索山脊到弗拉基高加索以及由海上到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交通线。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再加上土军的司令官阿勃迪—帕沙不是一个叛徒便是一个傻子（阿勃迪—帕沙后来被召回；被派去接替他的是阿罕默德—帕沙），那末土军的失败就丝毫不足怪了，虽然也没有疑问，俄军的战报照例都是夸大的。

在多瑙河：俄军不久以前攻击了位于该河支流上的曼成堡垒。有一艘蒸汽舰和两艘炮艇开近这个堡垒，它们遭到猛烈的炮击；据说炮艇都被击沉，蒸汽舰也受到严重损伤，因而以赶紧退却为上策。曾经发生过三、四次冲突，其中有的是卡拉法特的前哨战，有的是多瑙河的俄军哨所和渡河偷袭的土军小部队的接触。土军认为自己在所有这些小规模的战斗中都占了上风。只可惜没有更早地使用土耳其的非正规部队（它比其他任何部队都更适合于这类行动）来更积极地进行这种小规模战斗。这些部队完全可以抗击哥萨克，破坏敌人长达 300 英里因而必然很薄弱的前哨线，打乱俄军的计划，出色地侦察敌人的一切调动，并且只要保持应有的谨慎和大胆，在每次冲突中就都能占上风。

刚刚收到的电讯说：

> “1 月 6 日土军一个师 15000 人携火炮 15 门，向距卡拉法特不远、构筑有战壕的切塔特阵地攻击，经过猛攻加以占领；俄军损失 2500 人；从卡腊乌拉开来的俄军增援部队 18000 人，在损失 250 人后，被迫退却。”

另一则电讯说，小瓦拉几亚大部分居民都奋起反对俄军；后者已包围了克拉约瓦。

然而，俄国已经筋疲力尽了，它正在世界各地，在英属印度的边境、在波斯、在塞尔维亚、在瑞典、在丹麦等地使用收买和恫吓的手段。在波斯，英国公使和沙赫政府之间发生了小争执，后者已经准备让步了，但是俄国大使进行干涉，不仅竭力激起沙赫对英国的愤恨，而且企图把他卷入对土耳其政府的积极的敌对行动，并怂恿他对土耳其宣战。但是，据说这个阴谋失败了，因为英国代办汤普逊先生威胁说他将离开德黑兰，沙赫害怕会立即引起波斯人民反俄的怒潮，同时阿富汗外交代表团来到恫吓说，如果波斯同俄国缔结同盟，阿富汗人就要进占波斯领土。

与此同时，大批俄国间谍布满了塞尔维亚。他们到处游串，寻找过去以忠于被推翻的奥布廉诺维奇王朝而出名的人。他们同一些人谈论年轻的米哈伊尔公爵，同另一些人谈论他的老父米洛什，在谈话中时而暗示有希望在俄国的保护下扩大塞尔维亚的疆界，把现在在土耳其和奥地利统治下的全部操塞尔维亚语的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伊利里亚王国，时而威胁说，如敢反抗，就派大军侵入，把塞尔维亚完全征服。俄国尽管不断使用各种阴谋手段，仍然破坏不了塞尔维亚和苏丹的亲密关系。相反，贝尔格莱德正在等待接受君士坦丁堡发出的两道敕令：一道敕令是断绝塞尔维亚同俄国之间原有的一切联系，另一道敕令是把各个时期承认给塞尔维亚人民的所有特权肯定下来。其次，俄国政府还在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积极进行谈判，企图说服瑞典和丹麦政府在欧洲即将到来的冲突中站在俄国一边。俄国企图同这些国家缔结同盟的主要目的，在于封锁松德海峡和贝耳特海峡以对付西方强国。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俄国所争得的却是，瑞典、丹麦和普鲁士之间缔结了武装中立的条约，并进行了显然用来对付俄国本身的武装准备。从瑞

典发出的一些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人们因为俄国未经宣战而无耻夺占的芬兰公国有可能归还斯堪的那维亚王国而感到欢欣鼓舞。至于丹麦，它的（不是人民的，而是宫廷的）态度还不很明确。甚至传闻现任的丹麦外交大臣将呈请辞职，而由雷芬特洛夫— 格里敏尼尔伯爵这位以同圣彼得堡的宫廷有着密切联系而出名的人物继任。在法国，由于俄国的影响，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联合”的问题[25]取得了某些成绩；同时这种影响也正被千方百计地用来破坏英法政府之间的 entente cordiale[26]，并在它们之间散播不信任。某些接受基谢廖夫先生津贴的巴黎报纸企图使人们对英国政府是否真诚产生怀疑，我们也看到，接受布隆诺夫先生津贴的一家英国报纸也在怀疑法国政府是否真诚。另一个主要针对西方强国的打击是俄国禁止波兰输出粮食。

然而，西方强国的外交活动丝毫不带有敌视俄国的性质。正相反，当问题涉及伸张正义的时候，他们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拖延倾向，当问题已经涉及犯罪行为时，他们又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妥协倾向。但是现在每一个人都十分清楚，这样的行动是错误的有害的。最近 6 个星期以来外交方面的主要事件有下列几点：维也纳会议复活了；会议参加者于去年 12 月 5 日拟定了议定书；法国和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给列施德— 帕沙写了一封信；[27]12 月 15 日四大国交给土耳其政府一份共同照会，该照会于 12 月 31 日为苏丹接受；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向法国的驻各国外交代表发出 12 月 30 日通令，告知联军的舰队已进入黑海。关于维也纳会议的议定书，本报读者在读完这几行字后就可以了解它的内容。再没有什么比议定书中的下列论点更荒唐的了：

“俄皇在各个时期所作的保证，消除了任何关于至尊的皇帝怀有某种破

坏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意图的想法。”

也没有什么比议定书中所谓同意签订3个月的停战协定对土耳其是适当的这种声明更恶毒的了。在可耻的西诺普大屠杀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两天以后，即12月5日，列施德－帕沙写信给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和巴拉盖·狄利埃将军，告知西诺普来的消息，并请求联军舰队进入黑海。12月12日，即列施德－帕沙发出照会后一个星期，他收到两位大使非常冷淡的复照，复照中通知他说：

“联军舰队的出现只有‘政治意义’，因而毫无军事意义，这只是‘精神支援’，因而决非军事支援。”

于是，土耳其政府被迫接受12月15日的四强共同照会。这个照会对于土耳其政府因专制君主海盗式的行为所受的损失没有规定任何赔偿，而且坚持恢复过去的一切条约——凯纳吉条约、阿德里安堡条约、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和其他条约[28]，所有这些条约在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成为俄国取得欺骗、干涉、进犯和吞并的武器的武库。这个照会还允许沙皇对土耳其在宗教问题上有保护权，在民政管理问题上有指导权，因为在照会中写明，对各强国，

“土耳其政府应当告知有关它给予所有非伊斯兰教臣民的宗教特权的敕令的内容，同时对每一强国作出相应的保证”，

而且土耳其政府应当宣布它更加积极地推行行政制度和进行内部改革的坚定决心。

虽然从这些新建议的字面上看来，欧洲五强国都有权共同保护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但实际上只有俄国才有这种权利。这一协议的实质是：法国和奥地利是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应当保护土

耳其的罗马天主教居民，英国和普鲁士是信奉新教的国家，应当保护苏丹的新教臣民，而俄国则应保护信奉正教的臣民。但是，由于土耳其信奉天主教的还不到 80 万人，信奉新教的不到 20 万人，而信奉正教的却将近 1000 万人，因此很清楚，沙皇实际上获得保护土耳其基督教臣民的权利。直到 12 月 19 日，即里扎－帕沙和哈利耳－帕沙进入内阁，因而保证了“主和”派或者说“亲俄”派的胜利以后，土耳其政府才接受了四强国的建议。

12 月 21 日，当内阁会议已经通知四国大使接受他们所提出的建议的消息传开的时候，索弗特（大学生）就聚集起来呈递请愿书，抗议政府所作的决定，只是在逮捕了为首的学生以后才阻止了风潮发生。炽烈的怒火席卷了君士坦丁堡，以至苏丹[①]在第二天既不敢到御前会议厅，也不敢像平时一样在外国军舰的礼炮齐鸣和全体舰员的“万岁”声中驾临托普汉讷清真寺；而列施德－帕沙则从自己的伊斯坦布尔的官邸，逃到同苏丹府相邻的一座官邸去避难。第二天苏丹出告示，宣称不停止军事行动，于是舆论才有些平静下来。

在最近的阴郁的 9 个月中，西方国家的这些混乱、畏缩、不可理解的外交活动，几乎使公众再也无法忍耐，使人们对英国政府的诚意发生怀疑。由于无法理解西方强国这样长期容忍的原因，人们开始谈论在幕后的那些势力。传说纷云，有人说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干预朝政，他不仅伴随他的掌握最高政权的夫人参加枢密院的会议，而且还利用他的影响操纵枢密院负责官员的行动；其次，他一方面利用机会参加女王同大臣们的会商，同时同法国除外

① 即阿卜杜－麦吉德。——编者注

的一切外国宫廷(包括俄国宫廷)保持经常的和直接的联系。另外一种传说是:奥尔良派同波旁王朝的长系(法国过去的王族)的“联合”,从英国宫廷那里得到了几乎同俄国宫廷一样的支持。为证明这一点,人们还引证了奈穆尔公爵在同“亨利五世”[1]商谈后立即拜访了维多利亚女王宫廷的事实。

第四种传说是:经俄国同意,关于东方问题的谈判已经完全委托给美延多尔夫伯爵的内弟布奥尔-绍恩施坦伯爵。这一传说被用来证明,英国政府从来不希望进行独立的、有效的谈判,并且假装反对俄国及其同盟者的阴谋,实际上从一开始便尽力促使这些阴谋实现。人们确信罗巴克先生准备向下院而布鲁姆勋爵向上院广泛地提出科堡的影响的问题。毫无疑问,目前科堡家族的影响问题几乎是首都人们的唯一话题。议会将于1月31日重新召开。

从1809年以来,这里还没有过像今年这样寒冷的冬天。但最可怕的并不是严寒,而是温度和天气变化无常。火车行驶极端困难;有些地方的交通似乎完全中断,而且就英国的交通工具来说早已远远落后于时代了。为了减少由于积雪使商业文书的邮递受阻而引起的种种不便,以及防止因无法预先通知推迟付款而引起拒付期票起见,开始使用电报。然而,伦敦有五百多张期票拒付的情况具体说明了寒冬给社会造成的混乱状态。报纸上满篇都是关于暴风雪造成可怕的船只遇难(特别是在东海岸)的消息。虽然不久以前公布的贸易、航行和收入的统计表指出1853年开始的繁荣景象继续存在,但是严寒和生活必需品(特别是粮食、煤和食油等)的涨价严重地影响了下层阶级的生活。饿死人的事件层出不穷。国

① 即尚博尔伯爵。——编者注

内西部的抢粮风潮目前正形成对北部同盟歇业的伴奏。

由于时间不够，关于工商业的详细情况只好留待下文再谈。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1 月 14 日
载于用英文和荷兰文出版的 1854 年
3 月 6 日“南非人报”

俄文译自英文版“南非人报”，
并按荷兰文版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东方的军事行动。——奥地利和法国的财政。——君士坦丁堡的设防

1854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五于伦敦

最近的一批邮件给我们带来了关于不久以前在亚洲发生的战事的一些补充消息。看来，土军被迫全部撤出了俄国的阿尔明尼亚。但是，还没有关于迫使他们撤退的战斗的结局的确切消息。土军走的是从阿尔达汉直通阿哈尔齐赫的大路，而另一个军则在这以南，沿着从卡尔斯经过亚历山大罗波尔（格鲁吉亚语为居姆里）到梯弗里斯的道路前进。这两个军大概都遇上了俄军。根据俄国的报道，这两路土军都被击溃，并损失了大约四十门火炮；我们还没有得到土耳其的官方消息，但是在一些私人信件中则说，撤退的原因是必须转移到冬季营地。

只有一点是无疑的，这就是除圣尼古拉堡垒外，俄国领土上的土军都撤退了，俄军追击土军，俄军前卫甚至大胆地进到距卡尔斯一英里的地方，但是在那里被击退了。此外，我们知道，土耳其安那托里亚军团是从亚洲各省——旧伊斯兰教的野蛮统治的支柱——征召来的，其中有大量总的来说虽然强悍，但是既不正规又不可靠的临时的兵士，他们是冒险家和强盗；这个安那托里亚军团同严格

的、有纪律的而且受过严格训练的鲁美利亚军团毫无共同之处；在鲁美利亚军团中，指挥官了解每天在他管辖下有多少兵士，是什么样的兵士；在这个军团里有军事条例和战地法庭可以制止个人的冒险欲望和掠夺习气。我们知道，在亚洲战局的初期迫切需要部队的俄国人，后来得到了中将奥勃鲁切夫第二指挥的16000人和一队顿河哥萨克的增援；我们知道，他们控制住了山地居民，保持住了经过高加索山脉到弗拉基高加索以及由海上到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交通线。

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再加上土耳其的司令官阿勃迪－帕沙不是一个叛徒就是一个傻瓜（他后来被召回并在卡尔斯被捕；被派去接替他的是阿罕默德－帕沙），那末土军的失败就毫不足怪了，虽然也没有疑问，俄军的报道经常是夸大的。我们在“奥格斯堡报”[29]上读到：

“11月底，沙米尔妄图向南突围，与土耳其人建立直接联系。他的军队的人数是10000—16000人。人们断定，他的军队的精华—— 狂信派已被击溃。”

但是，最近的消息还有待证实。

西诺普会战的秘密终于揭开了。土军在那里击沉了俄国舰队最好的三层甲板舰之一——装有120门火炮的“罗斯提斯拉夫号”。俄国对这个损失一直巧言掩饰，说“罗斯提斯拉夫号”不是在战斗时而是在战斗后不久沉没的，但现在俄国人已公开承认了。这一损失大大抵销了土耳其舰船的损失。如果确实有一艘三层甲板舰被击沉的话，那末可以推测，俄国其他舰船在会战中也受到了非常重大的损伤，归根到底，西诺普的胜利使俄国舰队受到了比土耳其舰队更大的削弱。看来土耳其人在海上也真像土耳其人

一样[1]进行战斗的。埃及的蒸汽巡航舰“彼尔瓦兹·巴赫里号”经过5小时的战斗后被击坏，并被一艘比它大得多的俄国蒸汽巡航舰“弗拉基米尔号”俘获。它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以致勉强被拖到塞瓦斯托波尔后就立即沉没了。这样看来，俄国人的战利品现在还等于零。事实上，俄国人没有能够使一艘被俘的舰船开离西诺普，这证明土耳其人的顽强抵抗以及俄国舰队在会战中的严重损失。

有消息说，法英联合舰队和土耳其舰队的第一大队共同把17000名土军运往巴土姆。如果这一消息属实，那就可能发生相当于直接攻击塞瓦斯托波尔的军事行动，而沙皇就只好立即宣战。就在联军舰队开进黑海以前，沙皇好像曾命令黑海的所有俄国军舰返回塞瓦斯托波尔。12月24日敖德萨来信说：

> “俄国阿速夫海区舰队司令官派了一个副官到塞瓦斯托波尔去报告他的处境如何危急。两个军（每个军拥有12000人）都已作好开往塞瓦斯托波尔的准备，但是联军舰队在黑海的迅速出现这一消息使这次军事行动突然停止了。”

从最近收到的电讯中可以看出，俄军打算在1月13日，即俄历元旦那一天向卡拉法特的土军阵地发动总攻。他们已经调动了切塔特（卡拉法特以北9英里的一个村庄）附近进入战壕的大约1万名兵士，但是他们没有能够集中自己的全部现有兵力，因为土耳其将军比他们先行动了一步。土耳其将军率领15000—18000名兵士向敌人的战壕强攻，在1月6、7、8、9日和10日的几次短兵相接中取得了胜利，最后迫使俄军向克拉约瓦方面退却。俄国

① 双关语：《like Turks》有“像土耳其人一样”的意思，也有“残酷无情”的意思。——编者注

人自己也承认，他们有 1000 人阵亡，4000 人受伤。据电讯报道，“俄军指挥官”安烈普将军“和土伊南特将军均受重伤”。同时有消息说，1 月 10 日在塞里姆— 帕沙（波兰人捷德林斯基）指挥下的土军又撤退到卡拉法特。一直作为关于这些极端重要事件的消息的唯一来源的电讯就是这些。从这个最后还说到俄军撤到克拉约瓦，而土军则撤到卡拉法特的消息看来，恐怕敌对双方又犯了重大的战略性错误。有消息说，奥美尔— 帕沙强令整个军渡过阿留塔河和席尔河之间的多瑙河，从而对俄国在克拉约瓦的一个军的交通线造成威胁。但是，除了已经作好渡河的必要准备的唯一地点——卡拉法特以外，土军怎能在别的地方渡过满是浮冰排的多瑙河呢？

俄军在卡拉法特遭到的失败，从政治上来看也许比从军事上来看更为重要。这次失败加上联军舰队抵达黑海，也就排除了下述的最后可能性：沙皇对于由维也纳会议派往彼得堡的信使转达给他的关于和平的诚恳请求实行让步。另一方面，这次失败的影响立即促进了邻近的塞尔维亚的民族派的加强，引起了俄国的伙伴们的恐惧，这些伙伴最近在贝尔格莱德的行为可耻到了惊人的程度。诚然，亚历山大公爵和塞尔维亚人民群众是不会相信他们的国家有同苏丹断绝关系的必要的，尽管大批俄国间谍布满了塞尔维亚，在各方面进行阴谋活动：他们到处游串，寻找过去以忠于被推翻的奥布廉诺维奇王朝而出名的人，同一些人谈论年轻的米哈伊尔公爵，同另一些人谈论他的老父米洛什。他们时而向这些人暗示有希望在俄国保护下去扩张塞尔维亚的疆界，把现在在土耳其和奥地利统治下的全部操塞尔维亚语的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伊利里亚王国；时而威胁说，如敢反抗，就派大军侵入，

把塞尔维亚完全征服。你们知道，目前住在维也纳的米洛什公爵老早就以梅特涅为靠山，而他的儿子米哈伊尔不过是一个1842年从塞尔维亚丢掉王位逃跑出来的俄国傀儡。此外，俄国在卡拉法特的失败还可以使奥地利消除这样的恐惧：俄军会在贝尔格莱德出现，并唤醒那些与俄军同一族系同一信仰的奥地利臣民，使他们觉悟到自己的力量和他们在德国人统治下所受的侮辱。

关于奥地利，我可以en passant〔顺便〕说，它终于打消了长期以来想得到新借款的希望。关于它的财政状况，可以从不久以前该国政府把纸币行市降低15%这一措施看出来；这种财政手段只能同那些善于找窍门的法国rois faux monoyeurs〔造伪币大王〕的骗人诡计相媲美，后者在需要付款时，就把纸币行市提高，而在需要收款时，则把行市降低。根据德国报纸的报道，奥地利1854年的预算在经常开支方面的赤字将达4500万弗罗伦，在特别开支方面的赤字将达5000万弗罗伦。每当维也纳得到有火药气味的消息时，人们就拥进银行，把纸币换成银币。

大家都知道，法国也早就打算发行2亿法郎（800万英镑）的公债。但是，粮食不够、葡萄歉收、生丝减产、工商业普遍停滞、对2月底的支付的严重忧虑、国家有价证券和铁路股票行市下跌的趋势——这一切情况丝毫没有减少发行公债的困难。波拿巴没有能够在交易所里找到新公债的买主。因此只好采取，coup d’état〔政变〕前夕所采取的一种方法——派培尔西尼到法兰西银行提取5000万法郎（1000万美元），而用同等数目的国库债券作为“担保”。在元旦那天确实是这样做的。实行这一财政上的coup d’état的结果是：有价证券的行市下跌到69%。正如现在官方报道的，政府将从法兰西银行得到用国库债券作担保的200万或300万法郎

的贷款。那些不知道元旦那天在法兰西银行沙龙里所发生的事情的人，自然不能理解这家银行怎么会同意提供交易所拒绝的贷款。

关于波斯的消息仍然是互相矛盾。有些消息说，波斯军队正向埃尔斯伦和巴格达推进，而另一些消息说，俄国的阴谋失败了，因为英国代办汤普逊先生以撤离德黑兰相威胁，沙赫担心波斯人民对俄国的仇恨会立即爆发出来，同时阿富汗外交代表团来到恫吓说，如果波斯同俄国缔结同盟，阿富汗人就要进占波斯领土。

根据在“祖国报”上发表的寄自君士坦丁堡的私人信件来判断，御前会议已经决定在君士坦丁堡向陆一面构筑工事。据说，由欧洲一些国家和土耳其的军官组成的混合委员会已经开始初步视察地形。君士坦丁堡的设防会使俄土战争完全改观，而且对于那些抱有僭称拜占庭帝国皇帝继承者的宿愿的人是最沉重的打击。

关于奥地利在巴纳特集结了将由伯爵施利克将军指挥的一个军的传说，德国报刊已予否认。

据柏林“通讯”报道，各级政府都已经收到作好动员后备军[30]的准备的共同指令。

圣彼得堡方面已经向哥本哈根内阁提出把博恩雷尔姆岛让给俄国的建议。

“每日新闻”正确地指出：“博恩霍尔姆岛可以成为波罗的海的马尔他岛或直布罗陀。该岛距松德海峡和哥本哈根只有一天的航程，它位于波罗的海的入口处。”

雷德克利夫勋爵送交塞瓦斯托波尔总督一份通知书，说联军分舰队已在黑海出现，指出这一次调动的唯一目的是“保卫**奥斯曼的领土**以防任何侵犯和敌对行动”，但是**根本没有提到**保卫**奥斯**

曼舰队。

从巴黎、维也纳、柏林、君士坦丁堡和圣彼得堡得到的消息都说明了战争的可能性，所以拉芒什海峡两岸各个市场的物价普遍下跌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1月20日
载于1854年2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97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欧洲战区最近的一次会战

本报伦敦记者的文章和欧洲报纸上的消息，终于使我们对俄土两军之间的一次长时间的会战有了一个完整的概念。这次会战的地点是卡拉法特以北9英里的一个不大的村庄——切塔特。虽然在所谈的一系列血战中，土耳其军队表现了高度的勇敢精神并且获得了胜利，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既然问题在于把俄军逐出瓦拉几亚，那末这些战斗就没有获得任何实际结果。原因是土军犯了错误，关于这一错误我们已不止一次提起读者注意。我们指的是土军为了切断通往塞尔维亚的道路而派遣一支独立部队到卡拉法特的做法，然而防止俄军侵入这一地区的最好保证应该是在鲁舒克和希尔索瓦附近保持强大而集中的军队。这样的军队会威胁任何一支西进的俄军的交通线，而沃耳特尼察的或附近的桥梁和桥头堡（像卡拉法特的工事那样的桥头堡）就能成为土军在多瑙河左岸的据点。但是即使没有这样的条件，俄军也不可能在上游渡过多瑙河向塞尔维亚推进而不给土军造成从下游渡过多瑙河向布加勒斯特推进的机会。当然，我们在肯定这一点时，是根据双方实际兵力的对比，而且认为土耳其的鲁美利亚军团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俄国的瓦拉几亚军团。

应当指出，土军尽一切力量来使自己的优势化为乌有，并为

自己的最终失败准备条件。他们不是把兵力集中在多瑙河下游，而是把兵力分散。虽然以30000—35000人占领维丁和卡拉法特，但其余的部队则留在多瑙河的中游和下游。土军配置在弧线上，而俄军则配置在这一弧线的弦上。因此俄军要把部队集中到需要的地点，只要通过较短的距离。不仅如此，俄军较短的路线通过平坦的地区，而土军较长的路线要经过山岭和许多溪流。因此，土军的阵地是极其不利的，然而他们还是占领了它以迎合一种陈腐的偏见：要想最有效地阻止敌人前进，必须横断他的去路。

12月20日奥美尔—帕沙在苏姆拉得知俄军准备于1月13日向卡拉法特发动总攻。当时他还有22天的时间。但是根据卡拉法特同其他土军的配置地点的相互位置，奥美尔—帕沙除了可以从索非亚调来极少的预备队以外，看来不可能给卡拉法特增派援兵了。另一方面，俄军当时并没有从国内得到较多的补充兵力，——1月3日，处处露头的奥斯坦—萨肯军还没有到达布加勒斯特，——却敢于把部队远远向西方集中，这一情况说明，或是天气情况和多瑙河的高水位使土军不能在下游渡河，或是哥尔查科夫有其他根据预料该地区的土军不会有任何的行动。卡拉法特的土军奉命在俄军还没有来得及集中兵力以前向它们攻击。为此当时最正确的就是再采取在沃耳特尼察附近的做法[31]。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尽管是冬季而且有浮冰，卡拉法特的桥仍然屹立着，而下游再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修建这种带有桥头堡的桥梁。难道奥美包—帕沙得到了留在河右岸的命令吗？土军的行动这样自相矛盾，这样时而采取大胆机智的措施，时而又造成令人难以容忍的疏忽失策，无疑在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外交阴谋。无论如何，哥尔查科夫如果不是确信土军不会重复沃耳特尼察那样的战法，

他就不会向卡拉法特前进一步。

显然，俄军投向卡拉法特的兵力总数约为 3 万人，因为兵力再少，他们就未必敢于攻击一个拥有 1 万守军、而且至少有 1 万人作为预备队或作为出击兵力的筑垒阵地。因此，俄军在这个地点至少集中了在瓦拉几亚作战的一半兵力。而分散在很长战线上的另一半兵力在什么地方又怎样能阻止土军从沃耳特尼察、锡利斯特里亚或希尔索瓦附近渡河呢？如果保持维丁和卡拉法特之间的联系没有困难，那末在其他地点也可以渡河。这样，俄军由于阵地设在土军配置的弧线的弦上，便能在切塔特战场上集中优势的兵力，而土军虽然早就知道敌人准备攻击，却无法加强在卡拉法特的那个军。土军既不能进行牵制行动以防止整个会战的发生，也不能得到援助，就只有依靠自己的勇敢，指望在敌人来不及集中兵力以前加以各个击破。但是甚至连这一点指望也不可靠，因为土军不能远离卡拉法特，而敌人兵力较少的任何一个军，却可以离开土军活动的区域。这样，土军经过 5 天的战斗（大部分是他们获胜）之后，仍然不得不向卡拉法特周围村庄的工事退却，因为俄军在最后一天又得到了增援，形成了决定性优势。结果，俄军对卡拉法特的攻击很可能被阻止或推迟，而土军表现出不仅能在垒墙和壕沟掩护下，而且能在平地上出色地作战。关于会战的激烈程度可以从布加勒斯特发出的一封信中看出，信中谈到在战斗中俄军一个猎兵团被全歼，一个枪骑兵团只剩下 465 人。

俄军在沃耳特尼察攻击了土军的筑垒阵地，而土军在切塔特攻击了俄军的筑垒阵地。这两次土军都是胜利者，但是没有获得胜利的果实。沃耳特尼察会战发生时，恰好停战的消息正从君士坦丁堡传到多瑙河，而切塔特会战又奇怪地同御前会议接受西方

盟国强加于土耳其的最后媾和建议[32]的消息凑上了。在前一场合，外交上的阴谋诡计被武装冲突化为乌有，在后一场合，浴血奋战却由于某些秘密的外交活动而毫无成果。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1 月 19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2 月 8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97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沙皇的观点。——阿尔伯特亲王

1854年1月24日星期二于伦敦

俄国军队企图在所有作战方向（曼成、茹尔日沃、卡拉法特）同时渡过多瑙河，这与其说是严重的攻势，不如说是侦察行动，因为哥尔查科夫将军未必敢于以他现有的力量来发动这样的攻势。

星期六的“新闻报”（迪斯累里的喉舌）发表了一篇关于沙皇不久同某位“杰出的”英国人士在加特契纳举行会谈的评论。几乎伦敦所有的日报都转载了这篇评论，这篇评论除了大家知道的，已听得相当烦腻的对俄国外交的议论以外，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论点。

沙皇“明确地宣称，缅施科夫的最后通牒并没有受到伦敦的反对，而且当英国政府**被告知土耳其政府可能接受最后通牒**时，它认为这是圆满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一切只能证明，关于土耳其政府的“可能的”意向问题，可怜的约翰·罗素**受了**布隆诺夫男爵的**骗**，而且土耳其政府拒绝立即接受缅施科夫最后通牒[33]的责任无论如何不应当推在联合内阁身上。接着，沙皇告诉这位“杰出的”绅士说：

“当大家都知道了西诺普会战的胜利消息以后，卡斯特尔巴雅克将军（法国大使）曾给他一封信，信的开头大致是这样写的：‘请允许我作为一个基督

徒和军人，为了陛下海军所取得的光荣胜利向皇帝陛下表示我的祝贺。'”

这里，我想指出，卡斯特尔巴雅克是老牌的正统主义者，拉罗什雅克兰的亲戚，他获得将军的佩剑不是由于在战场上献身，而是由于在宫廷前厅中比较不冒风险的值勤，由于狂热地信奉崇高的君主主义原则。波拿巴任命卡斯特尔巴雅克为驻圣彼得堡宫廷的大使以表示尊重沙皇个人的愿望，虽然他十分了解，卡斯特尔巴雅克与其说会关心自己的名义上的君主的利益，不如说必定同沙皇合谋来恢复波旁王朝。因而，这位卡斯特尔巴雅克是“作为一个军人和基督徒”向沙皇祝贺这次无结果的西诺普大屠杀的很合适的人物。沙皇好像说过，“我不相信，英国及其**资产阶级**议会能够光荣地进行战争”。无疑，沙皇很了解他的科布顿们和布莱特们，并且认清欧洲资产阶级的下流卑鄙的灵魂。最后，沙皇说得完全正确：一方面，他没有准备战争（因为他确信通过简单的威胁就能得到他所希望的一切），另一方面，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了，那就是“庸人的战争”，也就是说这些人胆怯地渴望避免战争，却又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最后，自己轻率地投入战争以掩盖自己的错误和保持自己的职位。

“社会舆论几乎有意把阿尔伯特亲王变成某些议论的牺牲品。最初流传的有利于某个政党的窃窃私语已变为怨言，而意味深长的暗语已发展为明显的骇人听闻的捏造。每个有机会觐见女王的人，一定会在女王陛下那里遇到阿尔伯特亲王，这个事实很引起英国社会的赞许和尊重；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亲王也出席女王同大臣们举行的会议；并且，又要大臣们注意亲王的出席，尽管大臣们不希望在讨论问题时有第三者在场，但又不得不这样做，甚至他们必须在亲王面前为自己的意见辩护，亲王实际上已干预了他们同女王的会议；他不仅仅影响女王的意见，而且他由于有机会同外国宫廷自由交往，也就成为女王枢密院同外国君主（也许是英国的敌人）的内阁之间不受检查

地交换情报的途径，——总之，阿尔伯特亲王背叛了女王，犯下叛国之罪，最后，他以叛国罪被捕，并监禁于伦敦塔。这就是前两天不仅英国各地到处在议论，甚至某些人已经信以为真的事件的经过。”

我从“旁观者”[34]引证这一段是要向读者表明，帕麦斯顿的报刊是如何炮制社会舆论，竭力要把这个可怜的目光短浅的年轻人作为负责的大臣们的替罪羊。阿尔伯特亲王是同欧洲大多数专制独裁政府都有亲戚关系的德国亲王[35]。他在高升为大不列颠女王的丈夫以后，就把他的时间一部分用来养猪，一部分用来创制令人发笑的军帽，规划毫不舒适的标准小店，筹办海德公园展览会和耍弄兵形玩具。他被公认为一个和气而不得罪人、智力中下的人，一个多子女的父亲和温顺的丈夫。可是，近来却有人故意把他说成是一个最有影响的人物，说成是联合王国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好像他根据俄国的秘密指示，在左右整个国家机器。当然，未必能够怀疑，亲王对宫廷事务是有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是有利于专制主义的。亲王只能起亲王所起的影响，难道有谁竟这样愚蠢而不以为然吗？但是不必由我提醒读者，女王的权力被不列颠寡头政体削弱到了什么程度；例如大家都知道，威廉四世是俄国的死敌，而他的外交大臣①，辉格党寡头政体的成员，却迫使他同土耳其为敌。只要不是指什么微不足道的宫廷琐事——什么毫无价值的绶带或用金银线做的星章，——如果认为阿尔伯特亲王能够做出违反内阁的意志的事来，该是多么荒谬！他的专制主义的 penchants〔倾向〕被利用来转移人民对那些负责的大臣的阴谋活动和叛国行为的注意。如果说这一切叫嚣和攻击还有一点点意

① 即帕麦斯顿。——编者注

义，那末，这就是把所有这一切当作是对君主制度的进攻。要是没有女王，也就没有亲王；要是没有王位，也就没有宫廷的影响。如果没有了支持亲王的和亲王可以依靠的王位，那末亲王也就失去了权力。但是，请注意，那些最突出地表现自己“惊人的勇敢”、叫喊得最厉害、并且试图从阿尔伯特亲王的事件中赚得一笔政治资本的报纸，正是在效忠王位方面最热心最卖劲、替女王吹嘘得最无耻的报纸。至于托利党的报纸，那就可想而知了。至于激进的“晨报”[36]，正是这家报纸欢迎波拿巴的 coup d’état〔政变〕，并且在不久前攻击一家爱尔兰报纸，因为后者竟敢批评女王访问都柏林；也正是这家报纸指责法国革命者的共和主张，并且老是把帕麦斯顿勋爵描绘为英国的救主。整个事件都是帕麦斯顿的阴谋诡计。帕麦斯顿由于他亲俄被揭露，又由于他反对新改革法案，已经失去了威望。反对改革法案的行动已把他的发霉的五颜六色的蜜糖饼干上的自由派金纸撕下来。但是，为了做一个首相或者至少做一个外交大臣，他需要威望。现在重新装出自由派的姿态，扮演一下受宫廷阴谋迫害的布鲁土斯角色，该是多好的机会！攻击女王的丈夫对于诱惑人民该是多好的食饵！他必将成为当代最有名望的国家活动家。要侮辱自己的同僚，痛斥他们是阿尔伯特亲王的工具，迫使宫廷按照帕麦斯顿自己提出的条件重用他，这该是多漂亮的借口！托利党自然支持这种叫喊，因为比起莱镑和地产来（现在地产正急剧地从他们那里转到棉纺大王的手里），教会和王位对他们又算得什么！当托利党人为了“宪法”和“自由”激烈攻击亲王时，哪一个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不是虔敬地拜倒在他们的脚下呢？

在曼彻斯特贸易协会年会上，主席阿斯皮纳耳·特纳先生谈到罢工、同盟歇业以及一般工潮——他把这些情况正确地描述为

“郎卡郡的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发生的内战”——的时候，声称：“正同曼彻斯特推翻国王暴政和贵族暴政一样，他也必定推翻民主的暴政。”

“新闻报”喊道：“这无意中向我们供认了曼彻斯特学派的政策。在英国，国王具有最高的权力吗？——那就限制国王的权力！贵族政体阻碍你们吗？——那就把它从路上搬开！工人闹风潮吗？——那就把工人消灭！”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1月24日

载于1854年2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00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君士坦丁堡的设防。——丹麦的中立。——英国议会的成分。——欧洲的歉收

1854年1月27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①]中已经指出，君士坦丁堡的设防是土耳其人能够采取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如果君士坦丁堡设防以及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堡垒相应地加固，土耳其或其他任何一个占有这个都城的强国都根本不需要任何外国力量来保证自己的独立。没有比君士坦丁堡更容易设防的城市了。三角形地区只有一面，即向陆的一面，需要筑起绵亘的垒墙；向马尔马拉海的一面和向金角的一面都不需要构筑工事。在离要塞围墙适当距离的地方构筑一条向东伸展的为保卫彼腊、加拉塔和金角东北岸的单堡防线，可以同时用来加强要塞围墙，并阻碍敌人迂回要塞围墙，阻碍他们在位于彼腊和加拉塔后面瞰制市区的高地上构筑围攻工事。

这样的要塞几乎是无法攻破的。它的交通线只有在达达尼尔或博斯普鲁斯海峡被占领时才可能被切断；而在这种情况下，该

① 见本卷第37页。——编者注

城也立即会失守。但是这两个极其狭窄的海峡非常容易加强防务，使任何敌人的舰队都无法通过。从陆上进攻的俄军，为了同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取得联系将不得不走危险的海路，而且也未必能支持到拿下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俄军由于不断减员，经不住城里守军和亚洲来的增援部队的打击。

俄国对丹麦中立的声明[37]的答复于 1 月 20 日送到了哥本哈根。据说俄国拒绝承认中立，而要求丹麦同这一方或那一方联合。在得到这通知以后，法、英、俄的大使①似乎立即同丹麦的大臣们举行了一次会议。但我从非常可靠的方面知道（不过我当然还不能担保消息绝对正确），圣彼得堡内阁的抗议只是一种手法，想以此促使其他强国尽快地正式承认丹麦中立的条件。有人告诉我，不久前，丹麦同英法举行过谈判，决定一旦发生战争，英国海军将占领松德海峡，而法国陆军将占领什列斯维希公国。厄斯特德大臣将这次的联合行动告诉了涅谢尔罗迭伯爵。俄国为了破坏这次联合行动，似乎需要哥本哈根内阁作出一个俄国现在假装表示反对的中立声明；如果法英承认了丹麦的中立，那就不仅破坏了他们原定的计划，而且中立国船只运输的货物也就不受军事法规的限制，从而保证俄国的商品可以通过波罗的海出口。

沙皇对普鲁士占有北海的奥登堡港提出了抗议。不管柏林的公众对这位帖木儿－塔梅尔兰的继承人到处进行干预的这种新的表现感到多么惊奇，但是这个抗议是 bona fide〔完全真实的〕。

“英国人”周刊说业已举行的“曼彻斯特改革拥护者大会”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谬论典范，这个说法很中肯。颂扬阿伯丁的政策，

① 即多特扎克、布坎南和翁格恩－施特恩堡男爵。——编者注

侮辱土耳其，赞美俄国，反对一切对他国事务的干预——这几个话题（因为谈的是对外政策）就成为曼彻斯特学派[38]的主要资本；科布顿先生、布莱特先生和其他一些“质朴而谦逊的人”一再地搬弄这些，希望在英国军队的总司令部找到“和平的拥护者”，并且想向上院宣告同盟歇业，以期出卖英国人民，并且以更低廉的价格拍卖他国人民。

科布顿先生的演讲无非是他在议会会议闭幕时的讲话的重述，而且是恬不知耻的重述。他不惜追求的唯一的新东西就是两点攻击，一点对法国，另一点对美国。当“十二月活动家”的功绩在英国激起愤怒的吼声的时候，在同法国缔结同盟方面起了出色作用的那个人，现在却来破坏亲手做的事，嘲笑这个同盟，宣称它是“考虑欠周的”和“不适时的”。这就使人感到极大的疑惑。

关于美国，科布顿声称，威胁英国经济和民族繁荣的伟大事业的是美国工商业的发展，而完全不是俄国的黩武政策。这怎么能符合他的职业自由贸易派的假仁假义的论断：一个民族的商业繁荣决定于其他一切民族的工商业的**发展**，而两个工业发达的民族之间会有激烈竞争的思想是保护关税主义的“庸医”的错误呢？这又怎么能符合下面的论点呢？

“英国以它的机器生产的惊人作用把两个不相连的半球永远用和平的纽带联合在一起，使欧洲和美洲处于**不可分割的完全相互依赖之中**。”

科布顿已经不止一次地企图转移英国人民对俄国的怀疑和仇恨，而竭力使他们怀疑和仇恨美利坚合众国。1836年，俄国军舰在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对一只英国船的掠夺，圣彼得堡内阁就多瑙河航行问题采取的财政措施[39]，以及“公文集”[40]发表的揭发性的文章，引起了英国人民（主要是商人）对俄国的愤懑。当时还是

“文坛新手，还不惯于公开演讲”[41]的科布顿先生发表了一本匿名的抨击性小册子，标题是：“俄国：医治恐俄病的良药。曼彻斯特一厂主著”[42]。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证明说，“不用 20 年，这些观点（即害怕美国的繁荣，而完全不怕俄国的扩张政策）将为全体英国人民所赞同，而且**政府也将不得不加以承认**”。在这本小册子中科布顿还写道：

“在探讨那些议论这个问题的人所根据的对俄国抱敌对态度的种种理由时，我们非常惊奇而自信正确地发现，百年来英国的**贵族**统治已经使社会上所有的阶级都感染上了他们执政者的那种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习气〈对温顺的俄国〉。假如圣彼得堡政府迁都博斯普鲁斯的海岸，那末用不了 20 年，现在茅舍林立的土耳其首都就会成为一座富丽的欧洲城市；这里就会兴起宏伟的建筑，出现学术团体，产生优美的艺术。假如俄国政府真有这样的力量，它就不会再动干戈，而会用铺设铁路、建造桥梁、促进资本积累、**加速城市发展、发扬文明的和自由的成就**等等方法来克服野蛮现象…… 玷污君士坦丁堡的奴隶制度立即会被消除，而商业和保护生命财产的法律〈例如，像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现在施行的一样〉会占据应有的地位。”

为了证明俄国的文明，并进而证明俄国有权占领土耳其，科布顿先生告诉他的感到惊奇的读者说，拥有 10000—15000 卢布的俄国商人不仅参加对外贸易，而且“**免除了体刑，有权乘坐双套马车**”。既然如此，对于俄皇不久前表示相信“英国及其资产阶级议会不能光荣地进行战争”这一点还能感到奇怪吗？1836 年科布顿先生已经深深地意识到那些敢于指责主宰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的“政论家和演说家行为不端”，所以下面的问题就成了他那本小册子的结论之一：

“这些著作家和演说家是谁？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难道还能允许这些政治骗子一直这样无法无天地煽风点火、扰乱民心吗？”

我们以为他们就是拥有10000—15000卢布、可以乘坐双套马车、至少可以免除**“体刑”**的“官方政论家和演说家”。有些人至今一直认为科布顿先生的亲俄狂是他特有的许多怪癖之一，另一些人则把这点看成是他的和平论的必然结论。可是不久以前，有权自称为过去反谷物法同盟[43]的“文坛驽马，或者可以称为文坛笨驴”的某君①向公众说，科布顿先生在写他的第一本小册子以前，“1834年和1835年曾到俄国作了一次获益匪浅的商务旅行”，“1836年他的心和印花布还在俄国”，而他对“英国的政论家、演说家、著作家、新闻记者”的愤恨是因为他们批评了他的新主顾，主宰全俄的尼古拉。

鉴于过几天就要恢复下院的会议，所以我们认为提供一个关于英国议席的哪怕是很简单的统计，也是适宜的。

	所占席位	百分比
贵族亲属	103 }	17.0
爱尔兰贵族	6 }	
领地贵族	266	41.3
文学科学界人士	20	3.0
陆、海军	30	4.6
财贸界代表	109	17.1
律师	107	17.0
工人	无	—
议席总计	641	

下院中的**爱尔兰贵族**[44]是：梯维尔顿区——帕麦斯顿子爵；伯克郡——巴林顿子爵；格里姆斯比——安斯利伯爵；朴次茅斯——蒙克子爵；雷特沃尔德——高尔威子爵；东约克郡——霍桑勋爵。

① 即亚・索麦维尔。——编者注

文学科学界人士：白金汉郡——本杰明·迪斯累里；爱丁堡——历史学家托马斯·马考莱；格拉斯哥——商务统计学家麦克格莱哥尔；佩特郡——“西班牙艺术家史”等作品的作者威廉·斯梯林；牛津大学——“国家与教会”等作品的作者威廉·格莱斯顿；艾尔斯贝里——“尼尼微城的遗址”等作品的作者奥斯汀·亨·累亚德博士；威斯特贝里——“经济学家”[45]杂志编辑詹姆斯·威尔逊；南威克——霍布斯等人著作的编者威廉·摩耳斯沃思爵士；哈特福郡——诗人、戏剧家、小说家爱·利·布尔韦尔－利顿爵士；奥尔丹——反谷物法同盟的作家威廉·约翰逊·福克斯；赖伊——“文明史”（毫无价值的）等作品的作者威·亚·麦金伦；庞特弗拉克特两名——“旅途观感”等作品的作者理·蒙克顿·米耳恩斯和“东方之行”的作者本杰明·奥利维腊；罗契得尔——神学和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家爱德华·迈奥尔；苏格兰的伦弗鲁郡——“希腊文学史”作者威廉·缪尔；爱尔兰的威斯特米特郡——“弗兰契斯科·斯福察的生平”一书的作者威·波·乌尔卡尔特；威特比——著名的铁路工程师罗伯特·斯蒂芬逊；博德明——医生威廉·迈克尔；利特里姆——外科医生约翰·布雷迪；是否能把约翰·罗素勋爵列入文学家一项，我们不准备探讨。

还有至少一百个议员，名义上是由自己选区选出的，其实都是由公爵、伯爵、侯爵、贵夫人以及靠自己在当地的势力取得政治利益的人指定的。例如，韦斯明斯特侯爵在共有2524名选民的切斯特城就控制了两个席位；诺福克公爵在阿伦德耳控制了一个席位；萨特伦德公爵在纽卡斯尔－安德－莱恩控制两个席位；兰斯唐侯爵在卡耳恩控制一个席位；菲茨威廉伯爵在莫尔顿控制两个席位；里士满公爵在契切斯特控制两个席位；皮尔斯小姐在诺

塔列尔顿控制一个席位等等。

从下面几个例子来看，就可以断定选民人数同居民总数之间以及当选的议员人数同居民总数之间的比例都是不恰当的。

伯克郡的居民是170065人，而选民是7980人。该区选入下院的代表共9名，而有230308名居民和13081名选民的莱斯特郡却总共只有6个席位；林肯郡居民407222人，选民24782人，在下院中占有13个议席，可是有1886576名居民和113490名选民的密多塞克斯选入下院的议员总共只有14名。有居民2031236人的朗卡郡只有81786名选民，并且在下院只占26个席位，可是有163723名居民和8125名选民的白金汉郡却有11名议员。有居民336844人和选民18054人的萨塞克斯选出18名议员，而有居民608716人和选民29607人的斯泰福郡却只选出17名议员。

选民人数和居民人数之间的比例是这样的：

英格兰农业区每个选民代表20．7个郡居民。

威尔士农业区每个选民代表20个居民。

苏格兰农业区每个选民代表34．4个居民。

英格兰每个城市选民代表18个城市居民。

威尔士每个城市选民代表24．4个城市居民。

苏格兰每个城市选民代表23．3个城市居民。

关于爱尔兰的资料还没有像英格兰和苏格兰那样完整。但是下列数字大体还接近1851—1852年期间的实际情况：

农业区每个选民代表36个居民。

爱尔兰城市每个选民代表23个城市居民。

欧洲粮食市场普遍发生困难，情况如下：在法国，并不像

“通报”[46]为了安定人心所说的只缺粮1000万百升，而是大大超过2000万百升，也就是超过800万英制夸特；马铃薯的缺乏不少于5年来平均产量的四分之一，酒、植物油、栗子更为缺乏。比利时和荷兰粮食产品尚少400万百升左右；根据保守的统计，莱茵区的几个省、普鲁士、瑞士缺粮1000万百升以上。至于意大利，则只知道遭到极严重的歉收，即使概略的数字也很难确定。但是最低的数字也要达1000万百升，因此在西欧主要产粮区缺少的粮食至少是4400万百升（1700万夸特）。英国的缺粮已经知道有500万夸特以上，而根据某些非常值得注意的统计资料来看，这只是小麦一项的数字。因此，仅西欧一地，因去年严重的歉收至少缺粮2200万夸特；如果再加上因其他禾本科作物质量很差和歉收以及到处蔓延的马铃薯病害而少收（折合为小麦计算）至少500万夸特，这样缺粮总数就达到2700万夸特。

至于是否可以指望国外市场输入粮食，根据贸易问题方面极有权威方面的消息来看，情况是这样的：

> “波兰粮食收成极低。俄国歉收：波罗的海各海港粮价昂贵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粮价在我国缺粮的消息传到以前，就已经上涨了。多瑙河各公国虽然没有歉收，但是同敖德萨一样，由于向地中海沿岸各国和法国大量出口粮食，存粮已经大大减少了。而美国连200万夸特也不可能拿出来。况且，就是把全世界所有的船只都用来运粮也不够运输现在全英国都知道的我们所缺的粮食的一半或将近一半。”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年1月26—27日
载于1854年2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04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俄国的战时财政

1854年2月3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在陆军总司令部大厦附近看到了去参加议会开幕式的女王的隆重仪仗。人们高声欢呼，欢迎土耳其大使。阿尔伯特亲王面色苍白，街道两边的人群向他愤怒地嘘叫；女王看到人民这样异乎寻常地不满，很少作一般应酬的表示，只是一脸苦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我已经指出反阿尔伯特运动的实际规模，并且也证实了这只是派系斗争的一种手段①。但是对公众的游行示威应该加以足够的重视，因为这证明不列颠人民作出来的忠顺不过是一种表面的形式，虚伪的礼貌，它是经不起轻轻一击的。这次的游行示威说不定会迫使王室解除内阁职务，因为内阁的反民族政策可能使王室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胁。

当不久前奥尔洛夫伯爵去维也纳内阁的使命[47]已经家喻户晓的时候，"泰晤士报"向它轻信的读者报道说，奥尔洛夫正是经常受沙皇委托从事和平活动的人。可是不用我来提醒，你们当然也

① 见本卷第43—47页。——编者注

记得，1833 年春前往君士坦丁堡强迫土耳其政府接受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就是这个奥尔洛夫[48]。现在他得到了维也纳内阁的允许，将俄国的一个军从华沙经过匈牙利开往多瑙河战区。奥地利坚决要求土耳其政府将目前在多瑙河的土耳其司令官塞里姆—帕沙、伊斯马伊耳—帕沙、奥美尔—帕沙当作叛教者和革命者加以免职，这可以认为是奥尔洛夫的维也纳之行的第一个成果。凡是了解土耳其过去历史的人都知道，从奥斯曼帝国存在时起，它所有主要的陆海军将军、外交官员和大臣们一向是叛教者—基督徒，是塞尔维亚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等等。为什么不要求俄国也将它从欧洲各处收罗的并成为它的外交艺术、政治智谋和军事天才方面的全部家底的四五十个人一概撤职呢？与此同时，奥地利在土耳其边境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集结了 8 万军队，并且派出了一个 3 万人左右的捷克军同他们会合。沙皇曾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以俄国的名义并且为了俄国的利益调 10 万军队占领波兰，使驻防在那里的军队可以南调多瑙河各公国作战，而普鲁士政府好像是拒绝执行沙皇的要求。

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①，我已经向你们谈过不久前奥地利政府所采取的财政诡计，它要求缴纳税款时，纸币按票面贬值 15%。在意大利现在也在普遍实行这种巧妙的“税上加税”的方法。1 月 22 日的“米兰报”公布了奥地利财政大臣的命令，宣布“因纸币贬值，海关收税时应按行市将票面贬低 17%计值”。

至于俄国国库的问题，我已经在所谓东方纠纷开始时向读者警告过[49]，不要听信那些努力散布的谣言，说什么圣彼得堡银行的

① 见本卷第 36 页。——编者注

地下室藏有“秘密”珍宝，也不要听信那些令人发笑的夸张的话，说俄国似乎有随时都可以动用的大量钱财。事实完全证实了我的看法。沙皇不得不从英国和法国的银行提取他的金属储备，除此之外，还采取了欺诈的没收手段。帕斯凯维奇公爵通知华沙的贴现贷款银行说，它的资本将作为强制性贷款提出（虽然这家银行的章程规定，除地产之外，不得以任何保证条件贷款）。我们还听说俄国政府打算发行6000万卢布的不兑现的纸币，以抵补军事费用。彼得堡内阁采用类似的巧妙手段已经不是第一遭了。1768年年底叶卡特林娜二世为了抵补同土耳其作战用的开支，建立了一个似乎以发行可兑现的纸币为原则的阿西格那齐银行[①]。但是，同时完全有意地忘记告诉公众，这些纸币将以什么货币兑换，而过了几个月才开始只用铜币兑换。由于另一个不幸的“意外”，这些铜币的面额又高出了所含金属的价值50%，而且它们所以能按票面价值流通，仅仅因为数量很少，零售商业用的小额货币不足。可见，货币的兑换原来不过是一种诡计。最初叶卡特林娜发行的票面25卢布的纸币总数不超过4000万卢布；卢布是按外汇行市折合英币为38到40辨士的银币，相当于一百多个铜戈比。1796年，叶卡特林娜去世以前，这种纸币数量增长到了15700万卢布，也就是比最初的发行量增加了几乎3倍。伦敦的外汇行市从1787年的41个辨士，降到1796年的31个辨士。在以后的两届政府执政期间发行量都增长很快；1810年纸币流通量达57700万卢布，1个纸卢布只值$25^2/_5$戈比，也就是等于1788年时的价值的$^1/_4$，而1810年秋伦敦外汇行市降低，1个卢布不能像以前那样换38—40

① 指发行一种称为阿西格那齐的纸币的银行。——译者注

个辨士，而只能换 11．5 辨士。到 1817 年，据古里也夫伯爵的声明，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量达 83600 万卢布。由于关税和其他赋税都以银卢布计算，政府也就宣布，阿西格那齐按 4∶1 的比例收受，从而也就承认贬值 75%。那时因为还在继续贬值，所以商品价格也在相应上涨而且波动极大。这种情况甚至使政府也开始感到不安，不能不去借外债，以便使部分银行券回笼。到 1821 年 1 月 1 日，官方宣布银行券的数量已减少到 64000 万卢布。由于后来连续同土耳其、波斯、波兰、希瓦等国进行战争，阿西格那齐重又增加，外汇行市重又下跌，一切商品价格重又大幅度地波动。直到 1839 年 7 月 1 日，由于有大量粮食向英国出口，外汇行市才得到了调整，那时沙皇发布一个告示，宣布从 1840 年 7 月 1 日起，全部阿西格那齐必须都转为银行票，而银行票应按足值银卢布即 38 个辨士兑换。沙皇亚历山大过去曾宣布阿西格那齐由税吏按 4∶1 的比例收受；沙皇尼古拉依靠转换的办法，似乎重又恢复了阿西格那齐的全部价值。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附加条件，即规定三张半的旧票作一张新票使用。可见，虽没有宣布旧票贬值到它原有价值的 28%，但是承认了三张半旧票等于一张新票。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俄国政府在财政方面也像对待外交事务那样认真，丝毫不苟，另一方面，单是临近的战争的威胁就足以使尼古拉几乎二十年来一直试图摆脱的财政困难重新产生。

欧洲政府一个跟着一个向自己心爱的臣民发表演说，呼吁要钱。连沉着的荷兰人的国王[①]也向国会要求用 60 万国家达勒来修

① 即威廉三世。——编者注

筑工事和进行国防建设，并且说："情况可能迫使他动员部分军队和派出他的海军。"

如果采取巧妙的会计方法可以帮助解决货币实际不足的问题，而把空钱箱装满的话，那末不久前在"通报"上公布的法国预算的编制人大概已经取得一些成绩了。但是，即使是巴黎最小的商人也不会看错这样的事实：用最巧妙的数字分类决不能把他的名字从债主的账本中勾掉，而且十二月二日的英雄①认为人民的钱财是取之不尽的，不加考虑地增加了国家的债务。

最天真不过的是丹麦内阁在1月17日下院会议上发表的声明，声明说，政府打算把改变丹麦基本制度的计划和实施等待已久的全国宪法（Gesamtstaatsverfassung）[50]推迟到最**适当**的时候。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2月3日
载于1854年2月2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07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① 即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卡·马克思

*蓝皮书。——二月六日的议会辩论。——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联军舰队的行动。——爱尔兰旅。——关于工人议会的召开

1854年2月7日星期二于伦敦

我非常认真地读完了“正教教会和天主教会的权利和特权”(这是人们给政府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51]的俏皮的称呼)，并打算在最近向读者简要地评述一下这个外交上的迷宫。现在我只是肯定地说，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过比这更骇人听闻的表明政府的卑鄙和愚蠢的文献了。让我们也回忆一下贝利先生在下院对这个蓝皮书的评价：

> “至于说到消息，那蓝皮书里有的是，但是请注意，这不是正式的消息，而只是从那个**仔细编写的、对政府乐意隐瞒的一切东西只字不提的**蓝皮书中可以知道的东西。我这样讲是根据自己亲身的经验(喊声：“听啊！听啊！”，政府席上发出笑声)。我很清楚这个给下院的对外政策问题的蓝皮书是怎样编写的。”

我非常清楚，有一次有人责备帕麦斯顿勋爵歪曲了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文件，隐瞒了官方报告中的几个极为重要的地方，甚至

还故意捏造一些地方[52]，帕麦斯顿作了下面这个很机智的回答：

“先生，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那末，是什么东西防碍了接替我们的那两届我们的政敌的政府——其中有一届还执政5年——宣布这件事实并把真正的文件公布出来呢？”

但是我同样地非常清楚，蓝皮书里这种把戏的秘密在于辉格党和托利党轮流执政这种制度本身，在这种制度下面，每个政党为了自己的利益都不愿去破坏自己的政敌的政治“声誉”，相反地，力图使他们有可能替换自己以免统治阶级的统治的基础遭到破坏。而不列颠人还把这一套叫做发挥自己的光荣宪法的职能。

克兰里卡德勋爵曾经预告，他要在定于昨天举行的上院会议上建议开始讨论东方问题。因此，人们对这次会议抱了很大的期望，上院几乎挤得满满的。在昨天的“晨报”上，乌尔卡尔特先生甚至毫不犹豫地称克兰里卡德勋爵为民族派的未来领袖，他还提到在1829年只有克兰里卡德一个人反对俄国人越过巴尔干。但是乌尔卡尔特先生无疑忘记了，也就是这位高贵的侯爵在1839—1840年这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曾任帕麦斯顿勋爵驻圣彼得堡宫廷的大使，而且在1840年缔结单独条约以及同法国断绝关系[53]这些事情上是勋爵的主要工具。

公众对辩论显然感到失望，因为克兰里卡德侯爵以报上所谓“在维也纳某种类似谈判的东西看来还在继续”的消息为借口声明，“他很不愿意引起可能妨碍上述谈判的和平结束的辩论”。因此，他在最后指出，他打算一星期后就同一问题提出建议。高贵的侯爵只是问克拉伦登勋爵是不是“还没有收到俄皇对维也纳建议的答复”，“给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友出的指示”是什么。克拉伦登勋爵回答说，他“今天白天才从维也纳得到关于局势的正式

消息”。俄皇拒绝了维也纳的照会，提出了一个反建议。而 2 月 2 日的会议又拒绝了这个反建议。

克拉伦登勋爵继续说：“俄国提出的新建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些建议不能转交给君士坦丁堡，因此，关于这些建议就不必再提了。我没有根据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将开始新的谈判。至于对保持和平的希望，那我根本没有。”

在回答克兰里卡德勋爵的另一个问题时，他说：

“星期六晚上，布隆诺夫男爵到外交部来拜会我，并交给我一份照会，照会说，他从我那里收到的对于他根据本国政府的指示而提出的问题的答复，使他不能再继续保持外交关系，因此俄国同英国的外交关系断绝了。布隆诺夫男爵星期六晚上同我告别，但当时离开伦敦已经晚了，据我所知，他应当在今天清晨离开。”

据电讯报道，基谢廖夫先生昨天已离开巴黎前往布鲁塞尔。官方的或者说政府的报纸报道说，驻伦敦的大使馆将要关闭，所有的俄国人都将离开英国。而我根据非常可靠的消息所了解的情况正好相反，在英国的俄国人只减少了大使一人，其余的全体 personnel〔人员〕都留在伦敦由大使馆一等秘书贝尔格先生领导。关于英国驻圣彼得堡宫廷的大使的情况，克拉伦登勋爵说：

“因为布隆诺夫男爵是在星期六 6 点半来拜会我的，又因为要事先同法国政府商量，所以当时已不可能向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发出指示，但是我们已经同法国大使商量过这个问题，明天就会给汉·西摩尔爵士和德·卡斯特尔巴雅克将军发出指示，这个指示将使他们处于同这里的俄国大使一样的境况，两国同俄国的外交关系也将断绝。”

约翰·罗素勋爵在下院重复了克拉伦登勋爵在上院的声明，而帕麦斯顿勋爵宣称，

“他打算提出一项把关于民军的各项法律归并的法案——这个法案规定组织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民军部队，而募集的时间应由下院投票决定”。

英国军队将立即增加11000人；此外，还应立即从海岸警卫队里调1500人到舰船上，作为最近准备出航的舰只的新补充的舰员的预备队。女王已经颁布了一道命令，禁止向俄国输出任何军舰、军事物资和弹药。海军当局视察了太晤士河的私营造船厂，查禁了两艘正在为俄国建造的舰船。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在哥本哈根签订了供给总共11000马力的蒸汽舰用煤的合同。海军上将查理·纳皮尔爵士应当担任新编的波罗的海舰队总司令。

据官方报纸“维也纳日报”报道：

“政府已接到通知，说俄国已直接向四强国声明，俄国认为它已经不受它在奥里缪茨提出的在多瑙河各公国保持防御状态的诺言的约束。”

关于奥尔洛夫伯爵在维也纳的使命所追求的目的，传说纷纭；其中最可靠的，看来是今天“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柏林通讯所谈到的传闻。

记者写道：“俄国邀请奥地利和普鲁士同它缔结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的中立条约；俄国建议它们的宣言要宣布整个德意志联邦保持中立，俄国同意在联邦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遭到攻击时帮助联邦，并且保证：如果战后领土有任何改变，应当充分考虑到各德意志强国在领土改变的情况下的利益，否则决不缔结和约。这个关于中立条约的建议，显然援引了1815年神圣同盟的原则和条例。”

至于奥地利和普鲁士可能作出的决定，我只能重述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讲过的意见[①]。只要可能，奥地利将尽力保持自己的中立立场，并且只要有利的时机一到它就会站到俄国方面去。另一方面，普鲁士可能又会放过拒绝中立的适当时机，结果给自己带来新耶拿的耻辱。

① 见本卷第4—8页。——编者注

据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报道，联军舰队不顾“参孙号”轮船代表大使们转交给它的命令而返回了自己在贝科兹的停泊地，这个命令说：

“大使们对海军上将们的出乎意外的决定感到惊讶，特别是在目前，在装载供给安那托里亚军团的弹药和其他物资的土耳其蒸汽舰区舰队已经作好了开航的准备的时候，尤其如此。法英两国政府在命令中正式地、清楚地指示过〈的确是这样，但是这不是指起初给海军上将们的命令，而只是指刚刚接到的命令〉，联军分舰队必须保卫奥斯曼的舰队和领土。因此，再一次请两位海军上将注意这些按照应有的手续交给他们的指令的严重性质。看来，海军上将们认为，不管他们所指挥的兵力在什么地方，——在贝科兹或是在西诺普，交给他们执行的措施一样可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可能认为即使分舰队安然地停在马尔他和土伦，那些指令也能完成。〉但是，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应当完全由他们考虑，由他们负责。”

大家知道，俄国的舰队停在靠近刻赤海峡的卡法，从那里到巴土姆的路程只等于到贝科兹的三分之一。试问，海军上将们是不是“不管他们停在什么地方，——贝科兹或是别的地方”，都能防止“西诺普”事件在巴土姆重演？

大概你们还记得，沙皇的第一个文告曾指责苏丹把全欧的革命“渣滓”收罗到自己的旗帜下面。正当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向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表示，不能帮助他把这些“渣滓”的任何一部分组成志愿军团的时候，沙皇本人就首先成立了“革命”部队，即所谓希腊-斯拉夫军团，直接为了煽动苏丹的臣民暴动。这个部队是在瓦拉几亚组成的，根据俄国的报道，它已有3000多人，对这些人，将不是像对瓦拉几亚人那样付以bons à perpétuité〔无期债券〕，而是答应每天给上校5杜卡特[①]，少校

① 古代威尼斯的金币，十三世纪初见于意大利，以后欧洲许多国家都铸造杜卡特币。——译者注

3 杜卡特，上尉给 2 杜卡特，军士给 1 杜卡特，兵士给 40 分尼；他们的武器应由俄国供给。

然而，法国显然已经不再打算仅在纸上谈兵了。你们都知道，1851 年的预备兵已经应征入伍，而最近几天已经从阿拉斯运了大量的军事装备到麦茨和斯特拉斯堡。佩利西埃将军已经前往阿尔及利亚，按照他接到的命令，他在那里必须为即将远征君士坦丁堡选拔几个军，约·伯戈因先生和阿尔丹上校已经前往君士坦丁堡作扎营的准备工作。

关于奥美尔－帕沙率领的大军调动的传说，还有待证实，尽管实行这个措施未必会有更有利的时机，因为大家知道，俄国军队已经集结在布加勒斯特和卡拉法特之间的克拉约瓦。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英国议会的活动，虽然那里除了提出关于外国船只近海贸易自由航行的法案（而且这个提案没有遭到任何反对）以外，实际上值得提起的事件很少。没有反对这个法案，显然是由于无力抗拒已经赢得了整个世界的现代贸易原则：在最便宜的市场上购买你所需要的一切。至于最便宜的船员是怎么保卫人的生命和财产的。最近“泰勒号”轮船的遇难[54]就已经作了证明。

在昨天下院的会议上，巴特先生说他打算

“在明天提出一项建议，要议院秘书在讲台上宣读今天‘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和以前‘都柏林公民报’（《Dublin Freeman’s Journal》）的一些报道，其中都指责下院的〈爱尔兰的〉议员拿职位卖钱。他还打算建议选出一个委员会来调查上述报道中关于拿职位做买卖的说法。”

凡是还记得前一次会议规定过用任何别的方式做买卖都是合法的人，都会明白为什么巴特先生只是对拿职位卖钱表示愤慨。从

1830年起，唐宁街就处于依赖爱尔兰旅[55]的地位。正是爱尔兰议员擅自任命和支持大臣。1834年他们把詹·格莱安爵士和斯坦利勋爵撵出了内阁。1835年他们迫使威廉四世让皮尔内阁辞职而恢复了墨尔本政府。从1837年大选直到1841年选举，尽管同这届内阁相敌对的英格兰的议员在下院占多数，但是爱尔兰旅的票数力量却大得足以决定大局，使这个内阁仍然执政。建立联合内阁的也是这个爱尔兰旅。虽然爱尔兰旅有了这种建立内阁的能力，但是它从来没有阻止过任何一次对爱尔兰的卑鄙无耻的行为和对英格兰人民的不公正的行为。1834—1841年的奥康奈尔时期是爱尔兰旅最强大的时期。它的强大力量被用来为谁的利益服务呢？爱尔兰的宣传鼓动始终不过是大叫大嚷地支持辉格党反对托利党，以便向辉格党勒索一些职位。任何一个稍微知道所谓利奇菲耳德府邸协定[56]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根据这个协定，奥康奈尔虽然也可以大叫大嚷地**反对**辉格党，但是他必须投票**赞成**辉格党，条件是给予奥康奈尔以在爱尔兰任命负责人员的权利。现在是爱尔兰旅抛掉爱国主义假面具的时候了。现在是爱尔兰人民不再对英格兰人采取沉默的仇视，而要求自己的代表对他们的罪过负责的时候了。

“艺术和骗术协会”[57]最近企图运用自己的艺术，通过一种妄图“制止”英国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不断斗争的手法来破坏工人议会①。在某高贵的勋爵主持下曾召开了一个会议，建议双方代表完全本着在路易·勃朗的主持下在卢森堡宫召开的会议[58]的精神申诉自己的意见。厄内斯特·琼斯先生代表工人阶级对这种欺骗

① 见本卷第125页和编者注。——编者注

提出抗议，老罗伯特·欧文向有教养的绅士们声明，不管用什么仲裁办法，用什么圈套或诡计，永远也不能填满那条把英国和任何一个国家里的两大主要阶级分割开来的鸿沟。大概不用多说，这个会议在成了一般人的笑柄之后解散了。第二天，伦敦的宪章派和外地的宪章派组织的代表举行了公开会议，会上一致通过了召集工人议会的提案，并定于3月11日在曼彻斯特开幕。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2月7日
载于1854年2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08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门的内哥罗

1854年2月10日星期五于伦敦

在丹麦同瑞典订立中立条约时，我就曾确信[①]，与英法流行的看法相反，这个条约根本不能看做是西方强国的胜利，俄国假意反对中立条约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斯堪的那维亚各报以及引述这些报纸的“泰晤士报”记者现在也一致表示同样的看法，并且宣称整个条约都出自俄国之手。

奥尔洛夫伯爵向维也纳会议提出的并已被它否决的建议是这样的：

(1) 恢复过去的条约；

(2) 俄国对土耳其的正教臣民具有保护权；

(3) 将所有政治流亡者逐出奥斯曼帝国；

(4) 俄国拒绝接受任何其他强国的调停，并拒绝举行谈判，除非直接通过土耳其派往圣彼得堡的全权代表。

至于最后一项，奥尔洛夫伯爵是准备让步的，可是会议拒绝了。会议究竟为什么要拒绝呢？或者说，为什么俄皇对会议的最

① 见本卷第49页。——编者注

后一些条件也加以拒绝呢？其实双方的提议是一致的。恢复过去的条约这一项被通过了，俄国的保护权也被接受了，只是作了某些形式上的修改，最后一项俄国自己也放弃了；就是奥地利关于驱逐政治流亡者的要求[59]也不能成为俄国与西方决裂的原因。显然，俄皇现在的处境就是：他不能接受法英提出的**任何**条件，并且**必须**使土耳其屈从于他，而不管这会不会引起欧洲战争。

军界已经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所有战线正进行备战工作。布律阿海军上将已离布勒斯特前往阿尔及尔，并将指挥1万人从这里上船；驻扎在爱尔兰的16个团的英军已奉命准备开往君士坦丁堡。这次远征只可能有两个目的：或者像乌尔卡尔特先生所断言的那样，迫使土耳其人屈从于俄国；或者真的去与俄国作战。这两种情况都必然使土耳其人遭受到同一个厄运。如果他们重新落到俄国手里（即使不直接落在它手里也一样），遭到俄国破坏力的摧残，那末奥斯曼帝国很快就会像当年拜占庭那样仅仅保有同首都直接相连的一片领土。如果土耳其人受法英共同监护，那同样会丧失对它的欧洲领地的权力。

“泰晤士报”指出：“如果我们必须将战争的进行掌握在我们手中，那末我们也必须有可能指导一切军事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政府将处于西方强国大使的直接领导下，土耳其的陆军部将受英法陆军部领导，而土耳其的军队也将归英法将军领导了。原来的土耳其帝国将不再存在。

奥尔洛夫伯爵在维也纳全盘“失败”以后，现在回到了圣彼得堡，他“得到的保证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保持中立”。

另一方面，维也纳的电讯报道说，土耳其政府发生了变动，因

为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已经呈请辞职。“泰晤士报”不能理解，正当英法准备发动战争的时候，主战派怎么会遭受失败。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末我个人认为这次“解救性的”事变只不过是英国联合内阁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造成的，也就是那位因“自己对土耳其内阁的压力目前还远不能达到预期的影响”而经常在他的紧急报告（已在蓝皮书中发表）中表示遗憾的代表造成的。

蓝皮书一开始就是关于法国在圣地问题上提出的要求的报告，这些要求还没有完全被过去的特惠条例[60]承认，而且这些要求的提出显然是企图使罗马天主教会比正教教会占优势。乌尔卡尔特先生认为，沙皇利用在巴黎的潜在影响，唆使波拿巴发起冲突，企图使俄国有借口为正教徒的利益亲自出面干预，这种看法我完全不同意。大家都十分了解，波拿巴不惜 coûte que coûte〔任何代价〕求得天主教派的支持，他从一开始就把这种支持看做他篡夺政权成功的主要条件。波拿巴十分明白，天主教会对法国农民具有多大的影响；要知道，正应该是农民使他违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意志而当皇帝。耶稣会教徒法卢先生是第一届波拿巴政府中最有势力的成员，而 soi—disant〔所谓〕伏尔泰信徒奥迪隆·巴罗只是政府中名义上的首脑。这个政府在波拿巴就任总统以后的第一天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是对罗马共和国的有名的远征。耶稣会派的首领蒙塔郎贝尔先生是波拿巴在推翻议会制度和十二月二日 coup d’état〔政变〕时最得力的工具。1850年时，耶稣会派的正式机关报“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界”每天要求法国政府采取坚决的措施来保护东方的天主教会。波拿巴本来就想讨好教皇，拉他到自己这边来，并由他给自己加冕，所以当然有理由听取这种要求，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最忠于天主教的”[61]法国

皇帝。**所以现在东方危机的真正根源是波拿巴的篡位**。不过，当波拿巴一发现尼古拉皇帝要把他的要求作为把他从欧洲教皇选举会开除出去的理由时，他又聪明地收回了他的要求，而俄国，却与乌尔卡尔特先生所想的相反，是按他一贯的做法，努力在他自己无力创造的环境中取得利益。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都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奥斯曼帝国目前的危机是因为天主教会与正教教会的冲突引起的，而过去这种冲突曾推动这个帝国在欧洲建立起来。

我本不想深入研究“天主教会和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全部内容,所以没有先提到蓝皮书中讳莫如深的极其重要的事件。这里谈的是奥土两国关于门的内哥罗的争吵。预先了解这件事情极其必要，因为这可以揭示奥俄协议的关于消灭和瓜分土耳其帝国的计划是存在的。其所以必要，还因为英国把圣彼得堡宫廷同土耳其政府的进一步谈判交给奥地利的这一事实本身使人对英国内阁在发生东方危机的整个时期中的态度感到困惑。由于没有任何关于门的内哥罗问题的正式文件，我就以刚出版的莱·弗·辛普森的著作“东方问题手册”[62]为依据。

土耳其扎勃利亚克要塞（在门的内哥罗和阿尔巴尼亚接壤处）于 1852 年 12 月受到门的内哥罗部队的攻击。读者还记得，土耳其政府曾派奥美尔– 帕沙击退了这次的进攻。土耳其政府宣布封锁阿尔巴尼亚全部海岸。显然，这个措施只能是用来对付奥地利和它的舰队，这也说明土耳其内阁相信门的内哥罗的叛乱是由奥地利挑拨起来的。

后来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刊登了下面一则由维也纳寄来的日期标明为 1852 年 12 月 29 日的短评：

“如果奥地利真想支援门的内哥罗人，那末封锁也是徒劳的。就是亚得利亚海有土耳其的舰队，只要门的内哥罗人能下山，奥地利就能在卡塔罗供应他们枪枝弹药。奥地利既不支持当前门的内哥罗人的袭击，也不赞助**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基督教居民中即将发生的暴动**。奥地利经常表示反对压迫基督徒，这样做是出于人道的考虑。它对待东方教会的问题不得不保持中立。耶路撒冷最近的消息说明，那里燃起的宗教仇恨的火焰具有多么可怕的力量。所以奥地利的活动家不得不竭尽全力保持奥地利帝国的正教居民和天主教居民之间的和平。”

从这篇短评看来，我们可以知道，首先，人们**坚定地**指望土耳其基督教居民中会发生暴动；其次，奥地利为俄国控诉压迫正教教会准备了根据；第三，预计奥地利的“中立”将使“圣地”问题上的宗教纠纷复杂化。

俄国就在那一个月递交土耳其政府一份照会，建议由俄国出面调停门的内哥罗问题。这次调停被拒绝了，其理由据说是苏丹自己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看到，俄国在这件事上的行为正像在希腊革命[63]时一样：最初向苏丹表示保护他而反对他的臣民，为的是一旦俄国的帮助不被接受，就保护苏丹的臣民夫反对苏丹本人。

从 1852 年 12 月 30 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另一段引文中可以看出，俄奥之间在那时已经有了关于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的协议。

“不久前承认门的内哥罗独立的俄国对事变未必会抱袖手旁观的态度。此外，从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来的事务性函件和旅行者的谈话中可以得知，自沃伦到普鲁特河口的整个地带到处都是俄国军队，而且还不断有增援部队开到。”

就在那时，维也纳的报纸报道说，在奥土边境集结了奥地利的观察兵团。

1852年12月6日斯坦利勋爵曾向马姆兹伯里勋爵询问门的内哥罗的事态，这位波拿巴的高贵朋友曾作了以下的声明：

“高贵的勋爵想询问在同阿尔巴尼亚接壤的名叫门的内哥罗的野蛮国家中政局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认为那里的政局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个国家的首脑具有双重身分：他是这个国家正教教会首领，同时是世俗的国王。他作为教会的首领，应**服从被认为是全正教教会首领的俄皇的管辖**。门的内哥罗首脑（我想他所有的先辈也一样）惯于由俄皇批准和承认他的主教的权力和称号。至于这个国家的独立问题，虽然各种人对上述情况的重大作用有许多看法，但事实仍然是事实：**门的内哥罗作为独立的国家，已存在将近150年了**。虽然土耳其政府多次企图征服它，但是这种企图都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失败。目前这个国家所处的情况正像它200年前所处的情况一样。”

当时托利党政府的外交大臣马姆兹伯里勋爵在这次讲话中满不在乎地将奥斯曼帝国加以分割，把一向从属于它的国家同它分割开来，同时承认俄皇对于土耳其帝国臣民进行精神统治的要求。关于这两个寡头政治集团，他们除了争做蠢事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自然，土耳其政府对不列颠大臣的这一番话感到极大的不安，于是紧接着就在一家英国报纸上登出了一封1853年1月5日发自君士坦丁堡的信：

“马姆兹伯里勋爵在上院竟声称门的内哥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使土耳其政府大为震惊。他这是为俄国和奥地利出力；这样一来，英国丧失了一向享有的威望和信誉。土耳其政府和奥地利之间在1791年（在英国、俄国、荷兰的调停下）签订的西斯托夫和约的第一条中规定得很明确，对两国起来反对本国**合法君主**的臣民应予特赦；当时列举的土耳其帝国的叛乱臣民是塞尔维亚人、**门的内哥罗人**、莫尔达维亚人、瓦拉几亚人。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门的内哥罗人约有两三千，他们都缴纳哈拉志（人头税），并且在法院审理在君士坦丁堡居住的其他强国的臣民时，他们也一直被看成是土耳其的臣

民，而且也没有人提出过任何异议。”

1853年初，奥地利政府派了皇帝的侍卫长克耳纳·冯·克伦施坦男爵到卡塔罗观察事件的进展情况，就在那时，驻君士坦丁堡的俄国代办奥捷罗夫先生也正向御前会议提出抗议，反对在圣地问题上向天主教会所作的让步。1月底莱宁根伯爵到达君士坦丁堡，2月3日被允许单独觐见苏丹，并向他转交了奥皇的专函。土耳其政府拒绝执行专函中所提出的要求，接着，莱宁根伯爵又递交了最后通牒，限土耳其政府4天内答复。土耳其政府立即请求英法保护，而英法并没有给它任何保护，同时莱宁根伯爵也拒绝了英法的调停。2月15日莱宁根达到了他的一切要求（第三条除外），他的最后通牒被接受了。最后通牒包括以下几项：

一、立即撤出门的内哥罗，并恢复 status quo ante bellum〔战前状态〕。

二、土耳其政府声明自己有责任保持克列克和苏托林领土的 status quo〔现状〕，并承认奥地利在 mare clausum〔内海〕的利益。

三、严格追究穆斯林反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基督教居民的宗教狂热行为。

四、清除与奥地利接壤各省现有的全部政治流亡者和叛变者。

五、支付20万弗罗伦给奥地利商人，以补偿他们因原订合同被随意废除而受的损失；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遵守合同。

六、赔偿一个被非法没收船只和货物的商人5万弗罗伦。

七、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黑塞哥维那和鲁美利亚各地设立领事馆。

八、谴责1850年土耳其当局在侨民问题上的行为。

据辛普森先生报道，奥斯曼政府在同意最后通牒以前曾向英法大使送去一份照会，要求它们在发生对奥战争时答应给它实际的援助。“因为两国大使都没有可能用某些义务把自己束缚起来”，

土耳其政府才向莱宁根伯爵的坚决要求作了让步。

2月28日莱宁根伯爵回到维也纳，而缅施科夫公爵到了君士坦丁堡。3月3日约翰·罗素勋爵回答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的询问时厚颜无耻地说，

“奥地利政府在回答我们提交的文件时，已经肯定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同英国政府持有同样的观点；虽然他也不能确切说明这次的协议，但是英法进行的干预很成功，而且他相信最后的分歧也已经消除。英国所采取的方针，就是劝告土耳其保持它的荣誉和独立…… 他自己认为，从正义、国际法、对我们盟国的忠诚这方面来看，同时从整个政策和合理性方面来看，**保持土耳其的完整和独立是英国对外政策中重大的和决定的环节。**”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2月10日
载于1854年2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13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欧洲战争问题

虽然“讷希维耳号”到达后并没有从战区给我们带来任何重要的消息，但是只要注意一下目前的局势，我们就可以知道十分重要的事实。其主要之点就是：现在，在俄国大使已经离开巴黎和伦敦、英法大使已经从圣彼得堡召回、法英两国的海陆军已经集中待命立即行动的最后时刻，——就在这最后的时刻，两个西方国家政府又建议俄国举行谈判，而且建议本身中就已包含了对俄国的几乎一切要求的让步。值得提醒的是，俄国的主要要求是承认它有直接同土耳其政府解决它所谓的仅仅涉及它同土耳其的争端而不受其他强国干涉的权利。现在俄国已被承认有这个权利。建议写在拿破仑的信[64]中（该信另栏发表），归纳起来就是：俄国可以直接同土耳其谈判，但是它们之间签订的条约必须由四强国保证。这种保证缩小了让步的意义，因为它给西方强国留下了在将来任何类似冲突中进行干涉的现成的借口。但是俄国的处境并不会因此而比现在更坏，现在沙皇尼古拉不能不看到他想瓜分土耳其的任何企图都要冒同英法交战的危险。可是，俄国能否得到真正的好处将决定于还没有签订的条约的性质；俄国现在已经看出西方强国如何胆怯地力求避免战争，所以只要将自己的军队保持集中状态，照过去那样使用恐吓的手段，就足以在谈判时在所

有条款上达到自己的目的。何况俄国外交可以不怕同那些提出以失策见称的第一次维也纳照会[65]的声名狼籍的大使们进行争辩。

但是，还不知道沙皇是接受这些建议还是宁愿依靠自己的军队。他不能使自己每五年就这样备战一番，并在整个辽阔的帝国内调遣军队。备战的规模这样大，以致只有取得物质上非常大的好处才能弥补这方面的耗费。俄国居民的战斗热情被精心地激发起来了。我们曾看到一个俄国商人写的一封信的副本，他不是许多定居在莫斯科的德国、英国或法国商人中的一个，而是道道地地的老俄国人，是神圣俄罗斯的真正的儿子。他以经纪人的身分在自己的仓库里贮存着准备出售的英国货物。有人问他如果发生战争，这些货物是否有被没收的危险。这位老俄国人对于在这方面对他的政府表示怀疑的态度感到愤怒，加之他掌握了官方的用语，即所谓俄国与西方“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同，是“秩序、财产、家庭和宗教”的伟大的捍卫者，因而他反驳说：

“谢天谢地，在我们俄国‘**我的**’和‘**你的**’之间的区别还完全有效，因此你们的财产在这里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要安全。我甚至还要劝你们尽量把你们的财产转存到这里来，因为存放在这里可能比它现在存放的地点更好。如果**为你们的同胞担心，你们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是为你们的财产不安，就毫无必要了。”

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也在最大规模地进行备战。法国的远洋舰队从布勒斯特被召回土伦，准备运送部队到近东去。根据各种消息来看，预定派出4—6万人的军队，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非洲军队中抽调的。远征军将由猎兵来大大加强，并将由巴拉盖·狄利埃或圣阿尔诺指挥。英国政府准备派出大约18000名兵士(22个团，每团850人)，在我们最近所收到的消息发出的那一天，

有一部分军队已经运往总集合地点马尔他岛。步兵由轮船运送，而帆船则用来运送骑兵。应于 3 月 6 日在距席尔涅斯不远的太晤士河口集中的波罗的海舰队，将由 15 艘战列舰、8 艘巡航舰和 17 艘小型舰船组成。这是英国人从上次战争[66]以来所编成的最大的舰队；既然这个舰队的半数舰只一定是明轮式和螺旋推进式蒸汽舰，既然现在军舰的体积和舰上的火炮的威力比半世纪以前几乎增大50%，那末波罗的海舰队可能拥有任何一国过去从未有过的最强大的武器装备。指挥这个舰队的将是查理・纳皮尔爵士。如果发生战争，没有人能比他更善于将炮口立即指向有决定意义的地点了。

在多瑙河上，切塔特会战看来使俄军推迟了进攻卡拉法特的时间。这 5 天的战斗使俄军认识到要夺取一座能够进行类似的出击的营垒不是容易的事。也许有了这样的经验以后，就连专制君主本人的圣谕也不足以迫使他的军队轻率地进攻了。专门从华沙派到那里去的工程长官施尔德尔将军的到达，看来甚至造成了同沙皇命令完全相反的结果，因为在一定距离上对工事的观察，已经完全足以使施尔德尔相信不是去加速进攻，而是要增加比短期内所能集中的更多的兵力和重炮。因此，俄军在卡拉法特周围集中一切可能调遣的兵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同时还在向那里运送攻城炮，据说，有 72 门炮已经运到瓦拉几亚。伦敦“泰晤士报”估计俄军兵力为 65000 人，如果回想一下多瑙河各公国内俄军的总数，我们认为这个数目似乎有些夸大。这一支俄军现在除哥萨克、猎兵和其他专业部队以外，有 6 个步兵师、3 个骑兵师和大约300 门野炮；军事行动开始前正式公布的总数为 12 万人。除去伤亡和病员 3 万人以外，估计现在适宜于执行勤务的还有 9 万人，其

中至少有 35000 人要用来防守多瑙河一线、担任重要城市的守备勤务和保障交通线。因此，用来攻击卡拉法特的最多只有 55000 人。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双方的阵地。俄军既不注意多瑙河全线，也不理睬奥美尔－帕沙在苏姆拉的阵地，而把自己的主力甚至重炮都集中在极右翼，集中在使他们距离自己最近的作战基地布加勒斯特比土军距离该地还远的地点。因此他们的后方便暴露无遗了。更糟的是，俄军为了哪怕从后方稍微得到掩护起见，不得不分散兵力，因而在卡拉法特前面就没有那种保证他们取胜、从而证明整个这次机动正确的明显的兵力优势。俄军以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的部队分散配置在主力的后面，而这些部队当然无力抵抗稍微坚决的攻击。因此，夺取卡拉法特是没有保证的，而围攻者的交通线却有被攻击的危险。这个错误如此明显，如此严重，以致只有绝对确凿的事实才能使一个军人相信会有人真正犯了这样的错误。

仍然掌握较大兵力的奥美尔－帕沙，如能率领譬如说 7 万人在鲁舒克和希尔索瓦之间的任何一点强渡多瑙河，那末俄军不是全部被歼，就是只好到奥地利去避难。奥美尔－帕沙曾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以用来集中这样数量的军队。既然现在河上已没有流冰，为什么他不强渡呢？为什么他甚至不重新占领沃耳特尼察附近的 téte－de－pont〔桥头堡〕以便能随时出动呢？说奥美尔－帕沙没有看出俄军因严重失策而给他造成的机会，那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因此可以推测，他受到外交活动的限制。显然，他按兵不动一定会冲淡联军舰队在黑海漫游所造成的印象。把俄军歼灭或驱逐到奥地利是不行的，因为这样会给缔结和约造成新困难。正

是为了迎合这些投机外交家的阴谋诡计和不正当的活动，奥美尔－帕沙才只好容忍俄军轰击卡拉法特；他只得看着俄军把全部军队、全部攻城炮都置于他的打击之下，却无权利用这一机会。事实上，如果俄军司令官没有得到完全肯定的保证而相信他的翼侧和后方不会受到袭击，我们认为他决不敢对卡拉法特采取行动。否则，不论他接到过什么样的指示，他都会受到战地法庭的审判并被枪决。如果今天或至迟最近这几天轮船开到后，我们得不到奥美尔－帕沙渡过多瑙河并向布加勒斯特进攻的消息，我们就很难放弃这样的结论：西方强国相互之间签订了正式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卡拉法特不得不作为牺牲品来满足俄国的军事虚荣心，同时土耳其不得使用唯一可靠的手段，即在多瑙河下游采取进攻行动的方法来保卫卡拉法特[67]。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2 月 13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3 月 6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1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普鲁士内阁的声明。——波拿巴的计划。——普鲁士的政策

我们从伦敦非常可靠的来源得到了以下消息。这些消息如被证实，将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英国报纸只是部分披露了这些消息，而且加以歪曲[68]。

一、2月3日普鲁士内阁向巴黎和伦敦送去了如下的声明：

“⑴ 经奥尔洛夫伯爵说明以后，毫无疑问，在圣彼得堡内阁那里继续进行调停的企图是徒劳无益的，所以，普鲁士特此声明不再调停，因为调停的条件不再存在了。

⑵ 奥尔洛夫伯爵关于缔结**正式的**和具有约束力的中立条约的建议遭到了坚决的拒绝，并在专门的照会中已通知了他，因为即使没有有奥地利的同意，普鲁士自己也要坚守最严格的中立，并且决定在适当的时候用**相当的武装**来保证这种中立。

⑶ 普鲁士是否将和奥地利共同提出武装全德意志联邦的建议——将取决于海上强国对德意志的态度。”

二、路易— 拿破仑派他的代表（布朗尼埃先生）携函前往都灵晋见皮蒙特国王和卡富尔先生。函件内容如下：帕尔马、皮阿琴察、瓜斯塔拉、摩地那在一定的时刻将会爆发革命运动。那时撒丁必须占领这些地方，把目前在那里进行统治的君主们赶走。拿破仑向皮蒙特国王保证将前三个公国，可能还有摩地那都并给撒丁；但必须

把萨瓦伯爵领地让给法国作为交换。英国在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反对后，可以说也同意了这种勾当，虽然十分勉强。后来布朗尼埃先生继续在意大利旅行，最后到了那不勒斯，他在那里的出现留下了“非常难堪的印象”。布朗尼埃先生的使命是在意大利制造起义，因为拿破仑当真认为自己不仅能在意大利燃起一场大火，而且能确定火焰蔓延的确切界限。他预定把军队集中在以下地点：

⑴萨瓦边境 10 万兵士；

⑵麦茨 6 万兵士；

⑶斯特拉斯堡 8 万兵士。

二、普鲁士并不反对在萨瓦边境驻扎 10 万法国军队，但是它认为把一个军团集中在麦茨，把另一个军团集中在斯特拉斯堡是对它的直接威胁。它仿佛看到起义已经席卷了巴登、黑森、维尔腾堡等地，10 万农民从南德意志走向普鲁士边境。所以普鲁士对这两个措施提出抗议，而普鲁士声明的第三项的内容正是对这一点的暗示。无论如何，在 3 月底**以前**，也可能**更早一些**，普鲁士军队的人数将增加到相当于战时的水平。普鲁士打算根据情况征集 20 万到 30 万人。但是，普鲁士政府已经**决定**，如果拿破仑坚持把两个军团集中在麦茨和斯特拉斯堡的话，它将把自己的军队增加到 50 万人。据说，柏林内阁充满了恐惧和惊惶。在那里，国王和很大一部分大臣都倾向于同俄国合作，只有曼托伊费尔在普鲁士亲王的支持下，才使中立宣言得以通过（曼托伊费尔最初建议同英国结成正式同盟）。现在已经作出正式的内阁决议（Kabinets-Beschluss），根据这个决议，在一定的情况下，必须在一夜之中把王国境内，首先是莱茵普鲁士境内的所有最著名的民主主义者逮捕起来，并送往东普鲁士要塞，在那里他们将不再有可能

协助实现拿破仑的叛乱计划（die Umsturzpläne Napoleon's!!）和普遍地组织人民运动。预定只要在意大利一开始骚动，或者拿破仑把军队集中在麦茨和斯特拉斯堡，这个措施就立即付诸实行。听说，这个决议曾获得**一致**通过，虽然还没有规定出内阁认为需要实行这个措施的**一切**情况。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2月17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3月9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2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议 会 辩 论[69]

1854年2月21日星期二于伦敦

陆军预算和海军预算都已提交议会。下一年度的全部陆军人员规定为112927人，即比上一年度增加了10694人。在国内外服役的陆军的总开支，在到1855年3月31日为止的财政年度内，是3923288英镑，其中不包括澳洲各殖民地的军饷和东印度公司所担负的开支。总数是4877925英镑，这笔钱可以养活军官5719人，军士9956人，兵士126925人。到1855年3月31日为止的年度的现役海军预算是5979866英镑，比上一年度增加了1172446英镑。军队和炮的运输费用是225050英镑，相应地增加了72100英镑。全年拨款总额为7447948英镑。全体人员计有水兵41000人，见习水兵2000人，海军陆战队兵士15500人，再加上116个辅助人员，共为58616人。

上星期五晚上累亚德先生声称，他打算促使人们注意东方问题，并且，正当下院议长准备离开议长席，使议院能够转而审查海军预算[70]的时候，他要求发言。刚过4点钟，议会大厅四周的走廊上都挤满了人，5点钟，议员全部到齐了。整整消磨了两个钟头的时间空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使得议员和公众都表现出明显的不快。那些尊敬的议员们居然产生了这么大的好奇心，为了参

加大辩论的开场竟把晚餐推迟到8点钟，这种情况在下院议员们的议会生活中是少有的。

累亚德先生的发言不断为掌声打断，他在开始时声称，政府使议员们处于如此奇怪的境地，以致他们很难确定自己的态度。在他们对请求的贷款进行表决以前，政府应当说明，**它的意图是什么**。但是在质问政府打算做什么以前，发言人想问问**它已经做了什么**。去年他就讲过，如果政府具有同我国更相称的风度，它也许不会被卷入战争；而现在，在他详细地研究了最近出版的厚本的蓝皮书之后，他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见解。发言人对比了来自各方的各种报道，得出这样的结论：内阁忽略了最明显的事实，不了解最肯定的倾向，相信了分明是虚伪的保证。发言人说西诺普悲剧败坏了英国的声誉并且要求作出详细的说明，然后他根据已公布的文件证明，如果没有英国政府的胆小怕事、含糊不清的命令，联军分舰队的海军上将们本来是能够防止惨剧的发生的，土耳其人自己也能够防止惨剧的发生。根据政府最近的一些声明，发言人得出结论说，政府仍旧想以 status quo ante bellum〔战前状态〕为基础进行谈判；发言人谴责这种作法。他要求政府履行自己的义务，他相信英国人民是会履行自己的义务的。

詹姆斯·格莱安爵士以他所特有的无耻态度回答道，议员们应当是或者信任大臣们，或者把他们赶走。而“再在我们不准备在蓝皮书上**白白浪费时间**”。

他说，政府受了俄国这个大不列颠的忠实老盟友的欺骗，但是“在崇高的心灵里是不容易产生阴暗和恶毒的怀疑的”。这个老狐狸精，罗伯特·皮尔爵士的“小跑腿”和屠杀邦迪埃拉兄弟的刽子手[71]，在谈到“崇高的心灵”和“不爱怀疑”这些话的时候，

真是动听极了。

接着发言的是乔斯林勋爵和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他们的发言在第二天登满了报纸，但是使当天晚上的议院空无一人。下一位发言人是罗巴克先生，他先替大臣们的行为辩解，说他们陷入了容易被人误解的境地，最后则声称，现在是政府**清楚地说出它打算做什么**的时候了。约翰·罗素勋爵似乎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起来发言的，他在为政府辩解时，逐一地叙述了近来发生的意见分歧的来由，但是他知道这不会有任何结果，于是装出一副样子，好像要告诉议员们"政府打算做什么"，虽然他自己并不见得确切地知道这一点。据他说，政府同法国不是通过条约而是通过交换照会结成了一种类似非固定同盟的东西。英国和法国现在也建议土耳其缔结一种类似条约的东西，根据这个条约，土耳其政府不得到它们两国的同意不得求和。沙皇的难以置信的背信弃义行为使政府失去了信心。他（罗素）对保持和平的可能性感到失望。政府并非没有参战的可能，因此他要求预算拨款比上一年度增加300万英镑。秘密是战争取胜的条件，所以他现在不能告诉议院，政府在战争的情况下打算做什么。他的发言的结尾部分，或者更加确切些说是有戏剧性的一部分讲得非常有力，并流露出对沙皇"刽子手"的不满，所以很受欢迎，热情洋溢的议院已经打算批准预算了，可是忽然间迪斯累里先生起来发言，他做到了把辩论推迟到星期一晚上的会议上继续进行。

昨天晚上又继续辩论，直到夜里两点钟才结束。

第一个发言的是科布顿先生，他曾经保证他要紧紧地抓住这个具体问题。他拿蓝皮书作根据，竭力证明谁也没有否认的事实，即法国政府以拉瓦累特先生的圣地问题的使命，以及他迫使土耳

其作出的让步[72]，引起了这场“伤心的争论”。当时有可能做皇帝的法国总统以天主教基督徒的名义向土耳其提出了这些要求，大概是想捞一笔政治资本。因此俄国的最初一些措施可以拿法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来解释。维也纳照会没有签字，罪过不在土耳其政府而在盟国。如果用从贝捷克湾撤出舰队的手段来威胁土耳其政府的话，它是会立即签字的。科布顿说，我们现时面临着战斗，因为我们已经要求土耳其用照会通知俄国，说土耳其拒绝把我们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即关于更好地对待基督徒的保证给予俄国。土耳其帝国绝大多数居民都贪婪地注视着俄国现行政策（例如在莫尔达维亚— 瓦拉几亚）的成就。发言人根据同样的蓝皮书证明，基督教居民所遭受的侮辱和迫害是不能容忍的，同时他还着重地引证了克拉伦登勋爵所写的显然是为沙皇效劳的那些报告。克拉伦登勋爵在其中一份报告中写道：

“土耳其政府应当决定，它是否不怕牺牲盟国对它的同情和支持而继续坚持错误的宗教原则。”

科布顿先生因此问道：

“议院是否认为像土耳其的狂热的伊斯兰教居民那样的民族有可能放弃自己的宗教？要知道不彻底放弃可兰经的戒律，就根本不可能使居住在土耳其的基督徒同土耳其人享有平等权利。”

我们也可以问一下科布顿先生，在现行英国国教和现行英国法律的条件下，英国工人是否能够同科布顿之流和布莱特之流享有平等权利呢？

接着科布顿先生根据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和英国各代理领事的信件竭力证明，在土耳其的基督教居民中笼罩着普遍不满，有酿成大暴动的危险。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再问一下科布顿先生，在欧洲各国人民中是否也笼罩着对本国政府和本国统治阶级的普遍不满并有很快地酿成大革命的危险呢？如果德国、意大利、法国甚至大不列颠也像土耳其那样遭到了敌视它们政府并激起暴动情绪的外国军队的侵犯，那末这些国家是否也能像土耳其的基督教居民那样长久地保持平静呢？

科布顿先生得出结论说，如果英国参加保卫土耳其的战争，那它就是为争取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居民的优越地位和反对我国大多数居民的利益而战。俄国军队和土耳其军队之间所进行的纯粹是宗教性的争执。英国的利益把英国同俄国结合在一起。英国对俄国的贸易具有巨大的规模。诚然，它向俄国的输出总额现在只有 200 万英镑，但这只是俄国还常常受到保护关税的幻想的影响所造成的暂时的结果。可是英国从俄国输入 1300 万英镑的商品。除了美国，英国没有同任何一个国家进行过像同俄国这样的广泛的贸易。如果英国打算打仗，它为什么把自己的陆军开到土耳其去而不是光用自己的舰队呢？如果哥萨克人和共和主义者互相战斗的时刻已经到来，为什么普鲁士、奥地利、德意志其他各邦、比利时、荷兰、瑞典和丹麦等国依然保持中立，而法国和英国却要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作战呢？如果这个问题对整个欧洲都有意义，那末谁离危险地近，谁就应当第一个投入战斗，这样一个假定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科布顿先生在结束发言时声明，“他反对同俄国作战”。他认为，“最好是回到维也纳照会上来”。

约翰·曼纳斯勋爵认为，政府的漠不关心和过分的自恃应当受到谴责。克拉伦登勋爵在他最初给俄、法、土三国政府的一些通知中，就不是声明同法国一致行动，而是坚决拒绝同它合作，并

且通知俄国政府说英国将不同法国合作，这就促使俄皇给缅施科夫公爵下了一道引起了莫大灾难的命令。当英国最后通知说它打算在君士坦丁堡采取有效措施的时候，法国政府对女王陛下政府的真诚势必有几分怀疑，这并不奇怪。不是英国劝土耳其政府拒绝缅施科夫公爵的最后通牒，恰巧相反，而是苏丹的大臣们自己冒风险采取了行动，并且他们根本没有指望得到英国的帮助。英国政府在俄国人占领了多瑙河各公国之后进行的长期的外交谈判使土耳其利益受到了重大损失，而给俄国带来了很大好处。俄国不经宣战就占领了多瑙河各公国，以防过去作为它压迫土耳其的实际工具的条约被废除。因此，现在，当土耳其已经宣战的时候，要求恢复这些条约作为谈判的基础已经是愚蠢的了。主要的和真正现实的问题是：政府加入这个可怕的战争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曼纳斯说道，人们总是泛泛地向我们声明，应当维持土耳其的荣誉和独立；但是最迫切需要的是非常具体地谈一谈怎样理解这种声明。

霍斯福耳先生竭力驳斥科布顿先生的错误论据。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土耳其现在是什么样子，而在于如果土耳其包括在俄国的版图之内，俄国将变成什么样子；问题在于俄国的皇帝是否也成为土耳其的皇帝？霍斯福耳说道，俄国只有一个公认的目的，这就是通过战争来加强自己的政治实力。它所追求的是扩张领土；从标志着俄国专制君主在这方面的最初措施的惊人骗局起，直到西诺普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止，俄国专制君主的活动的特点就是残酷、虚伪和罪恶，这种罪恶甚至在俄国这样一个全部历史就是一部充满罪恶的历史的国家的年鉴中也是罕见的，尤其骇人听闻的是，沙皇极其粗暴地践踏基督教教义的基础，竟又亵渎地援引这

一教义。相反地，上述牺牲者的行为却非常好。接着霍斯福耳先生竭力用政府现在所处的困难的处境替政府的动摇辩护。他说，这就是政府在外交方面不坚定的原因。即使所有欧洲政府、所有谙练的外交家一起来反对这个专制君主，也不能使他所处的境地比他现在由于我国大臣们的错误或者是他自己大臣们的狡猾而陷入的境地更艰苦、更困难、更绝望、包含着更多危险和损失。半年以前，尼古拉皇帝还是欧洲秩序和法制的主要支柱；而现在他已经撕下了假面具，以一个了不起的革命者出现。沙皇在政治阴谋上失利，在亚洲也没有获得战果，在多瑙河上又被土耳其人打垮，现在他已经开始非常迅速地失去自己的地位，这只会令人称快。目前英国政府的责任就是，一旦军事行动恢复就要做到只有在提供了将来不会再发生类似进攻的充分可靠的保证的条件下才能缔结和约。发言人认为，恢复和平的条件之一就是，俄国应当赔偿土耳其被迫用掉的费用，而土耳其则应当收回被俄国夺去的领土作为物质保证。

德拉蒙德先生认为，英国正被卷入宗教战争，并开始进行新的十字军征讨来保护被破坏得无处可坐的布尔昂的哥特弗利德的坟墓。已经查明，罪魁祸首从一开始就是罗马教皇。英国对土耳其问题丝毫不感兴趣，而英俄之间的战争也不可能决出胜负，因为两国将长久地打下去，但是彼此永远不会给对方以任何危害。

“在目前这场战争中，除了受到沉重的打击而外，我们不会得到任何东西。”

德拉蒙德回忆起不久以前科布顿先生曾经建议约制俄国；如果他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他就会使英国摆脱好多麻烦。事实上现在争论的是：应该由谁来打扮圣墓上的偶像，是贩卖时新货

品的巴黎商人，还是彼得堡商人呢？英国政府突然发现，土耳其是它的老盟友，没有它就不能够保持欧洲的均势。但是英国怎么没有更早地发现这一点，没有在整个希腊王国从土耳其手里被夺走以前发现，也没有在纳瓦林战斗 73（仿佛记得圣海伦斯勋爵曾把这次战斗描述为卓越的会战，只不过认为还没有把致命打击加在应该打击的人身上）中遭受失败以前发现这一点。为什么当俄国人越过巴尔干半岛时，当英国能以自己的舰队给土耳其以实际帮助时，英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只是现在，当奥斯曼帝国老朽不堪时，才认为有必要在保持欧洲均势的借口下支持这个即将崩溃的帝国。德拉蒙德先生对出人意外地表现出来的对波拿巴的好感挖苦了一番，然后问道：应该由谁当陆军大臣？大家都有机会确信掌握国家大船的是软弱无力的舵手。发言人不相信，在现政府下面某个海军上将或某个将军的美名会不受到玷污，因为现政府准备牺牲任何人来讨好议院中的这一集团或那一集团。如果下定决心要打仗，那就应当打击俄国的心脏，而不是在黑海白白浪费炮弹。首先应当宣布恢复波兰王国。发言人特别想知道政府的意图是什么。

德拉蒙德先生说道：“政府首脑引以自豪的是他善于保守秘密，有一次他曾说过，他倒想看一看谁能够从他那里弄到他不打算公开的消息。这种说法使我想起了一次我在苏格兰听到的一个笑话：一位苏格兰人到印度游历，回英国时带了一只能说会道的鹦鹉送给妻子作礼物。他的一位邻人不甘落后，到了爱丁堡，从那里为自己妻子带回了一只大猫头鹰。有人告诉他永远也不可能教会猫头鹰说话，他回答说，这话说得倒是不错，可是你们注意瞧它那副用心思考的神气。”

巴特先生说，内阁出席议会，并对自己的提案不作明确而详细的说明就请求军事拨款，这种情况自从革命以来还是第一次。就

法律意义上讲，英国现在还没有处于战争状态，议院在表决提出的拨款时有权知道，是什么东西阻碍着对俄国宣战。要知道英国舰队在黑海的处境是很暧昧的！海军上将邓达斯接到了把俄国船只赶到俄国的一个港口去的命令。在同俄国的和平关系还没有正式破裂的时候，如果他执行这个命令时击沉了某一艘俄国军舰，那怎么办？诸位大臣是否准备为这样的行为辩护？发言人希望有人出来向议院说明，它是否应当支持如此令人屈辱的条件，因为根据这些条件，土耳其为了同俄国缔结和约就应当受英国和法国的支配。如果英国的政策是这样，那末，要求议会现在批准补充军备就是为了奴役土耳其而不是为了保证土耳其的独立。巴特先生有点怀疑：现在所议论的备战是否只是大臣们为了准备缔结可耻的和约而玩弄的花招。

陆军大臣悉·赫伯特先生的极其庸俗而愚蠢的发言，简直不像一个联合政府的大臣在如此严重的关头能够发表的言论。政府处在两团火焰中间；它怎样也弄不清议院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见解是什么。可敬的绅士们，亦即反对派的代表们处于可以利用事实的优越地位；他们批评过去；而政府没有可以利用的事实，它只能对未来作一些假设。它所以乐于参加这个战争，与其说是为了保护土耳其，不如说是为了抵抗俄国。这就是议院从可怜的赫伯特先生嘴里所知道的“关于未来”的一切。但是他还透露了某种完全新的东西。据赫伯特先生说，“科布顿先生反映了英国人民中人数最多的那个阶级的情绪”。当从议院各个角落都来驳斥这种说法时，赫伯特先生补充说：

“极可尊敬的议员如果不是人数最多的阶级的代表，起码也是我国工人阶级中很大一部分工人的代表。”

可怜的赫伯特先生！继他之后发言的是迪斯累里先生，一位真正的辩论家换下了一个空谈家，可令人高兴了。

迪斯累里先生影射约翰·罗素勋爵于星期五晚上发言结束时的戏剧性的言词而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我一向认为，任何一国人民，特别是我国人民，如果他们真正知道是为什么而战，那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承受战争负担的决心和愿望就会比在人家用激昂的号召煽动他们的热情，并利用他们的激动情绪驱使他们进行战斗的情况下要大得多。后一种手段也许一开始对某个大臣是有利的，但是几个月之后，就会造成不可避免的难以设想的后果，这些后果可能因军事失败而更加严重。”

1828—1829年的战争就是这样，在这次战争中英国站在俄国方面，而不是土耳其方面。应当认为，土耳其目前所形成的复杂局势和它最近期间所处的绝境一样，完全是由上述的英法联合对土战争造成的。当时没有一个下院议员真正知道英法为什么加入战争，或者它们打击土耳其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因此，现在必须弄清当前战争的原因和目的。这只有从蓝皮书中才能知道。至于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局势，这可以直接从这张桌上放着的许多报告中知道。这些报告所叙述的政策准备了一种可以完全吸引住——如果相信大臣们所说的话——他们的注意力的未来。因此发言人反对詹姆斯·格莱安爵士的空谈。赫伯特先生刚才反对只宣读这些报告中的个别篇章。但是迪斯累里先生不会答应在议院中把所有的蓝皮书一一宣读。如果极可尊敬的绅士的反对意见被认为是正确的话，那他显然也只好这样做。根据所有熟悉东方问题的人的一致见解，以及根据他个人的见解，俄国没有任何意图想用强力征服奥斯曼帝国，它只是想依靠巧妙的政策和完善的方

法来获得对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居民的影响，这种影响为它树立的威信大概不下于它占领苏丹国家的首都。在这些谈判开始时，涅谢尔罗迭伯爵本人在他的 1853 年 1 月和 6 月的报告中就明确地叙述了俄国的政策。俄国想在土耳其帝国内获得优势，给占苏丹臣民绝大多数的 1200 万人以特别的影响。在俄国给英国政府的急件中，不仅清楚地叙述了这个政策，而且同样直率地把实现这一政策的方法（不是通过征服而是通过保持现行条约并对这些条约作广义的解释）告诉英国政府。因此还在这次严肃的争论刚刚开始时，在库楚克—凯纳吉所签订的条约就成了外交活动的根据。由于这项条约，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将受苏丹的特殊保护。俄国对这次条约的解释不同，它说苏丹的基督教臣民将受沙皇的保护。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可以要求保护自己的新教堂（贝伊奥格鲁街的建筑物）；俄国人把条约的这一条款解释为，俄国有权保护一切正教教会，自然也有权保护在苏丹领土内占苏丹臣民绝大多数的一切信仰正教的宗教团体。这就是俄国人对凯纳吉条约的直率解释。另一方面，从 1853 年 1 月 8 日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涅谢尔罗迭伯爵告诉汉密尔顿爵士说，“必须举行实力示威来支持俄国的外交”，而汉密尔顿爵士又把这一点告诉克拉伦登勋爵。根据同一个报告，涅谢尔罗迭伯爵相信问题将得到满意解决的根据是“女王陛下驻巴黎和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应当作出的努力”。因此俄国公开宣称，实力示威只不过是示威而已，而目的则应当靠和平途径来达到，靠英国驻巴黎和君士坦丁堡大使的努力来达到。

迪斯累里继续说道：“这样一来，我倒想知道一下，这些大使们——在这样叙述了目的、描写了方法以及最后有了这样的外交之后，——是怎样对待

这种计谋的?”

迪斯累里认为，谈论圣地问题是多余的。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君士坦丁堡很快就得到了解决。甚至涅谢尔罗迭伯爵在谈判刚开始时就表示惊奇和满意，而且证明法国是爱好和平的。尽管如此，在整个这段时间内，俄国军队却在土耳其边境集结，而涅谢尔罗迭伯爵一直都对克拉伦登勋爵说，他的政府要求等价偿还正教教会在耶路撒冷失去的特权，而特权问题是在没有他的政府参加的情况下解决的。当时还提到了缅施科夫公爵的使团，这是可以从汉密尔顿·西席尔爵士的各种报告中看出来的。约翰·罗素勋爵上一次曾经说，涅谢尔罗迭伯爵的行为像一个骗子。另一方面，同一个约翰·罗素勋爵又承认，涅谢尔罗迭伯爵不止一次说过，他的皇帝要求给正教教会等价赔偿；同时他又埋怨，涅谢尔罗迭伯爵从来不讲他要讲的话。

“不中用的涅谢尔罗迭伯爵！(笑声)俄国国家活动家骗人的两面手法！(笑声)为什么高贵的勋爵不能够知道他需要知道的东西?既然不可能从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得到需要的情报，为什么还让他呆在圣彼得堡呢?”

如果说涅谢尔罗迭伯爵从来没有向高贵的勋爵讲过他要讲的话，那是由于高贵的勋爵一次也不敢向他提出相应的质问。在谈判的这个阶段，大使们应当向圣彼得堡的内阁提出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如果俄国政府不能够明确自己的要求，那末声明英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君士坦丁堡进行友好的帮助，是完全适宜的。当约翰·罗素勋爵辞职而由克拉伦登勋爵接替时，外交活动的性质就起了有利于俄国的变化。克拉伦登勋爵担任了外交大臣的职务以后，必定给赴职的女王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拟出指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指示呢?在土耳其外在灾难深重、非

常危急的情况下，教它必须在内部行政和贸易方面进行改革。还开导它说，土耳其政府的行为应当极端温和而明智，也就是说，它应当同意俄国的要求。同时政府仍旧不要求俄国对俄国的意图作出确切的解释。缅施科夫公爵到了君士坦丁堡。克拉伦登勋爵接到了罗斯上校的令人万分焦虑的信件和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警告性的报告之后，在他给英国驻巴黎大使考莱勋爵的信中，谴责罗斯上校下令出动不列颠舰队，对命令法国海军上将开进希腊领海表示遗憾，并且以轻蔑的口吻教训法国说，“怀疑的政策是不明智的、危险的”，并宣称他完全相信俄国皇帝，因为俄国皇帝曾经庄严地向他保证，他一定保全土耳其帝国。然后克拉伦登勋爵写信给自己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说，他完全相信，缅施科夫公爵的使团所追求的目的，“不管怎样，都不会使苏丹政权或者苏丹领地的完整有什么危险”。不仅如此！克拉伦登勋爵甚至还对留在英国方面的唯一欧洲盟友加以责难，说什么如果东方的危局威胁到英国，那完全是由于法国在圣地问题上所一度采取的立场。因此涅谢尔罗迭伯爵祝贺阿伯丁勋爵在使法国处于《isoiée》〔“孤立状态”〕方面所起的《beau rôle》〔“崇高作用”〕（在蓝皮书中翻译为“重要作用”）。4月1日英国从罗斯上校那里知道了俄国向土耳其提出的**秘密**协定。仅仅过了10天，斯特腊特弗德勋爵来到了君士坦丁堡，证实了罗斯上校所报告的一切。在这以后，克拉伦登勋爵于5月16日在给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的信中写道：

> “俄皇所作的解释〈即蓝皮书中所没有的解释〉使我们有理由不去分担，而是漠视与俄国南部的备战相配合的缅施科夫公爵的行动所必然在整个欧洲引起的忧虑。”

此后，涅谢尔罗迭伯爵得以毫不客气地于6月20日通知克拉

伦登勋爵说，俄国已经占领了多瑙河各公国。在这个文件中，涅谢尔罗迭伯爵声明，

“俄皇打算拿这些地方作为抵押，直到他得到满足时为止；他的行为依然忠于他向英国政府所作的声明；在同伦敦内阁交换有关在开始谈判的同时进行备战的问题的意见时，他直言不讳地说可能有一天他不得不向英国求助，并且欢迎英国政府所表现的友好意图，同时把英国政府的行为同法国的行为加以对比，并把缅施科夫公爵后来的失利完全归咎于斯特腊特弗德勋爵。”

在这一切之后，克拉伦登勋爵于 7 月 4 日写了通令，依然指望俄皇的正直和温和，并引证了俄皇多次关于不打算侵犯土耳其帝国的声明。而 7 月 18 日他在写给斯特腊特弗德勋爵的信中说：

“严肃对待问题的法国和英国，完全能够粉碎俄国的力量，不过土耳其在这个期间不免要遭到彻底的崩溃，因此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和平谈判。”

但是迪斯累里认为，如果这个论据在当时是适用的话，那现在它也适用。或者是政府表现了过分的轻信，或者是它犯了姑息的罪过。战争是女王陛下政府在最近 7 个月来进行谈判的结果。如果英国政府犯的是轻信，那就是俄国以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速了一场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使欧洲独立、英国安全和世界文明得到保障的冲突。如果英国政府犯的是姑息，那末这将是一场怯懦的战争，一场不坚决的、没有结果的战争，或者更正确些说，是一场恰恰导致最初就考虑到的结局的战争。4 月 25 日克拉伦登勋爵在上院发表了虚伪的声明，说什么缅施科夫是奉命来调解圣地争论的，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接着迪斯累里先生简短地叙述了维也纳照会的经过，以证明政府或者表现极大的愚蠢，或者姑息圣彼得堡的宫廷；然后他又转来谈论第三个时期，即从维也纳照会的失败到西诺普会战这一个时期。当时财政大臣格莱

斯顿先生在公开会议上发言时，曾以极其轻视的口吻谈论土耳其。一些半官方的报刊也是这样。只是由于土耳其人自己的毅力才使土耳其的局势和命运发生了变化，结果政府不得不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讲话。但是沃耳特尼察会战刚一发生，无论是拥护轻信政策的人还是拥护姑息政策的人又干起肮脏的勾当来了。尽管如此，西诺普溃败还是引起了人们对土耳其的同情。各分舰队已经接到了向黑海挺进的命令。但是它们是怎样行动的呢？它们竟开回博斯普鲁斯海峡！至于谈到未来，约翰·罗素勋爵非常含糊地叙述了英法同盟的条件。迪斯累里先生劝大家不要把保持欧洲均势同保持欧洲现有的领土划分混淆起来。意大利的未来主要决定于是否承认这个真理。

在迪斯累里先生作了精彩的发言（自然我只是大体上引证了他的发言）之后，帕麦斯顿勋爵起来发言，但是遭到了惨败。他的发言部分地重复了他在上届会议闭会时所讲的话，他为内阁政策的辩护毫无说服力，而且竭力注意不说一句包含任何新消息的话。

后来根据詹·格莱安爵士的建议，没有辩论就通过了对海军预算草案的某些修正。

最后，最有趣的是，在经过了如此热烈的辩论之后，议院完全没有做到使大臣们向俄国正式宣战并指明英国将要参战的目的。结果无论是议院或公众，都没有获知比这以前更多的东西，都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消息。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2月21日
载于1854年3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22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二月二十二日的议会辩论。——波茨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西方强国的政策

1854年2月24日星期五于伦敦

报刊上充满了大量的关于科苏特的“好战的准备”和他的计划中的“调动”的无益空谈。然而我偶然从一个现在到君士坦丁堡去，并且曾同科苏特商量过这件事情的波兰军官那里听说，从前的执政者劝他不要离开伦敦；科苏特以一种极不赞同的态度谈到匈牙利和波兰军官可能参加这次土耳其战争，他所持的理由是，他们将被迫或者在查尔托雷斯基的旗帜下行进，或者放弃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他认为前者是与他的政策相矛盾的，后者是与他的原则相矛盾的。

迪斯累里先生对政府的政策的巧妙揭露所造成的印象是那样地深刻，以致“群贤内阁”认为必须作一次事后的尝试：用一出小小的喜剧使事情不了了之。这出喜剧已经由大臣们和休谟先生在下院星期三上午的会议上演出来了。迪斯累里先生挖苦地说二者必居其一，不是过分的“轻信”，就是背叛性的“姑息”。帕麦斯顿勋爵对此作了软弱无力的回答，最后说，他要撇开反对派转

而请求全国的公正判决；于是像在“匹拉麦斯和雪丝佩的最惨酷的死”[①]中扮演狮子的木匠史纳格那样代表全国作答复的这份光荣，就落在休谟先生身上了。休谟先生在自己的整个议会生涯中，都竭力把反对派变得令人喜欢，为了以后把这些修正收回而提出修正，并且永远充当辉格党内阁的后卫的所谓独立的反对派，只要辉格党内阁的正式拥护者刚一显露出动摇的迹象，它一定会去援救这个内阁。休谟 par excellence〔主要〕是一个最伟大的议会“灭火器”。他不但是议会的最老的议员，而且是议会的独立的议员，不但是独立的议员，而且是激进派，不但是激进派，而且是一个学究式的，大家所公认的看守国家钱袋的塞卜洛士[②]；他的使命是在为了不到一个法寻而争吵的时候让好些英镑悄悄地失去。

休谟先生洋洋得意地声明，在他的议会活动的整个时期中，他第一次不是为了斥责国家预算草案，而是为了赞成国家预算草案而发言。他没有忘记指出，这次异乎寻常的事件应当不可辩驳地证明，内阁在受到了反对派的莫须有的诽谤性的指责以后呼吁全国的合理判断不是徒劳的，它受到的所谓轻信和姑息的指责是应当郑重取消的。他的证明是很特殊的。为了把大臣们从不是轻信就是姑息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指责中解救出来，他证明大臣们在同俄国谈判上表现出了轻信。由此可见，他是明白帕麦斯顿勋爵呼吁的真正用意的。内阁想竭力求得的，不过是取消所谓蓄意背叛的指责。至于说到轻信，难道高贵的詹姆斯·格莱安爵士不是说过“在崇高的心灵里是不会轻易产生怀疑的”吗？既然可能爆发的战争是大臣们自己在外交上失策的结果，那末战争自然是他

①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一幕第二场。——编者注

② 希腊神话中看守冥府门的三头怪犬。——译者注

们的战争，因此，根据休谟先生的意见，他们比任何人都更能胜利地进行这次战争。在休谟先生看来，这次提出来的预算比较小，这就极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正在打算进行的战争的规模。帕麦斯顿勋爵自然感激休谟先生代表全国作出的判决，而且为了奖励，他还发表了关于国家文件的议论以饱自己听众的耳福。在他看来，在事情还没有混乱到公布文件已经失去任何意义的时候，文件不应当向议院和全国公布。这就是联合内阁在考虑成熟以后能够做到的事后英明。落在联合内阁的领导人帕麦斯顿勋爵身上的任务，不仅是要冲淡政敌的发言所造成的印象，而且要把自己那种戏剧性的从议院转而向全国呼吁的作用化为乌有。

星期二晚上，利物浦的议员霍斯福耳先生提出了下面的质问：

“同外国缔结的条约，或者女王陛下政府在战争发生时打算采取的步骤，真的能够有效地阻止给私掠船舶装备索具来对付在中立港口的不列颠船只？”

帕麦斯顿勋爵回答说：

“极可尊敬的绅士和议院自己应当明白，在目前情况下，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释性的回答的。”

帕麦斯顿私人的 moniteur〔正式通报〕“晨邮报”[74]，在谈到自己主人的这个回答时说：

“高贵的勋爵不对这个最棘手、最困难、目前可能是谈判内容的问题进行研讨就不可能给予别的回答（不管政府对这件事是多么了解）。如果希望这个问题能够顺利地解决，就必须相信不希望在我们这个文明的世纪再恢复合法的海盗行为的各强国所具有的自然的正义感。”

一方面，帕麦斯顿勋爵的喉舌宣称，所谓“困难的问题”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谈判的内容，另一方面又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应

当相信有关强国的“自然的正义感”。如果备受赞扬的丹麦和瑞典之间的中立条约不是圣彼得堡内阁授意的，那末，不言而喻，这个条约就应当包括禁止这些国家在自己的港口给私掠船舶装备索具这样一条。实际上，全部问题只可能涉及美国，因为波罗的海预定由英国的战列舰占领，荷兰、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意大利的地中海港口都完全操纵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手里。如果土耳其战争引起了英俄战争，那末，在圣彼得堡内阁看来，美国会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只根据1825年秋天波茨措—迪—博尔哥给涅谢尔罗迭伯爵的紧急报告[75]，就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确切的回答。俄国当时决定入侵土耳其。同现在一样，俄国当时也是打算从和平占领多瑙河各公国开始。

波茨措—迪—博尔哥说:“假定采取了这个计划，那末，适当的做法是心平气和地同土耳其政府进行谈判并向它保证，如果它不愿使自己卷入战争，皇帝同意和平解决这些分歧。”

波茨措—迪—博尔哥在列举了一切必须采取的措施以后，继续说：

“最好是把所有这些行动都通知美国，以表示皇帝内阁的尊重，并证明皇帝内阁重视美国舆论的正确报道甚至它的支持。”

波茨措—迪—博尔哥说，一旦英国同土耳其联合起来向俄国开战，

“它〈英国〉**将会依靠自己臆想的在海上反对各中立国的权利**，封锁我们的港口。**美国是不能容忍这样做的！这就会造成严重的分歧和危险的局势**”。

因为用俄国历史学家卡拉姆津的正确说法，“我们的〈俄国的〉对外政策丝毫未变”[76]，所以我们可以假定，俄国在现在，也

许还从1853年2月起，就“把自己所有的行动通知美国”，并且采取了各种措施，用献媚的办法使华盛顿内阁至少采取中立立场。同时它希望在同英国作战时发生关于“中立国的海上权利”的争论，因为这种争论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分歧和危险的局势”并且使美国同圣彼得堡建立某种程度的公开的同盟。

既然我已经引用了波茨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中最著名的一份紧急报告，那就顺便把关于奥地利的那一段也引出来。这一段就是在1825年以来在加里西亚、意大利和匈牙利发生了一些事件以后，也丝毫没有失去它的现实的意义。

波茨措说：“我们的政策要求我们对这个国家采取威胁性的立场；我们的准备应当使它相信，要是它采取什么行动来反对我们，那末，**它就会碰到一场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暴风雨**。梅特涅公爵可能向土耳其人宣布，我们进入多瑙河各公国是由土耳其人自己挑起的，或者可能擅自侵入**奥斯曼帝国的其他省份**。第一种情况，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谈妥了，**第二种情况就意味着我们将会达成协议**。我们应当担心的唯一的事情，是采取公开反对我们的行动。如果，梅特涅公爵是英明的，他一定会避免战争，如果他想使用暴力，**那他就要受到惩罚**。对待一个处于像他那样情况的内阁，像我们这样的政府，必要时会找出上千种途径来消除分歧。”

约翰[1]勋爵的煽动性的发言，关于英国的荣誉的叫嚣，对俄国的背信弃义所表示的正当的愤慨，巡航于塞瓦斯托波尔和喀琅施塔得城下的英国浮动炮台的幻影，战争威胁，示威性的派军队上船——这些戏剧性的插曲把舆论弄得糊里糊涂，像一层雾似的遮住了舆论的眼睛，使它除了自己的幻觉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在看到对蓝皮书的种种揭露之后，还认为这个内阁突然变了，变得不

① 即罗素。——编者注

但能进行一般的战争，甚至还能同俄国进行别的不光是做做样子的（也就是恰恰有利于似乎是与之作战的敌人的）战争，难道会有比这更大的自我欺骗吗？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备战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

根本没有正式向俄国宣战。内阁甚至不能公开说明战争的目的。连正在被装上军舰的军队开到什么地方去也不十分清楚。要求的拨款用来进行大战争是太少了，进行小战争又太多了。这个以擅长伪造破坏自己最庄严的诺言的借口和拖延最迫切的改革的理由而出名的联合政府，突然天良发现，感到自己必须履行过分匆忙地许下的诺言，而且提出了一项使举国惊讶的新改革法案，使全国所经历的严重危机更加复杂。议会改革的最热烈的捍卫者认为提得不合时宜的这个法案，不是在任何外部压力下提出来的，各方面对它的提出抱着极其冷淡和怀疑的态度。计划就在于提出一个具有重大国内意义的问题来转移舆论对于对外政策的注意，难道这还不清楚吗？

竭力使公众对英国同外国的关系产生误解，这是相当明显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同法国缔结任何约束性的条约，然而制造了一个条约的代用品，这就是“交换照会”。但是英国早在1839年就同路易－菲力浦的内阁交换过这样的照会，根据这些照会，联军舰队应当进入达达尼尔海峡，阻止俄国单独一国或同别的强国一起干涉东方的事务。我们知道这种交换照会的结果是出现了反对法国的神圣同盟和达达尼尔海峡条约[77]。人们究竟是多么严肃认真地考虑法英同盟，这从下院昨天的会议上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来。你们在“通报”上可以看到，波拿巴威胁希腊暴动者，并且给奥托国王政府一个相应的声明。当约翰·华尔希爵士就这一点质问

内阁的时候，约翰·罗素勋爵说：

“他一点也不知道法英两国政府关于上述问题的协议，他没有能够同外交大臣谈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印象是法国政府没有发出任何声明，至少是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意或者参与。”

如果不列颠政府真正打算同俄国开战，那为什么它那么顽固地避免使用国际上通用的宣战方式呢？如果它打算同法国结成真正的同盟，那为什么它那样用心地避免使用通常结成国际同盟所使用的方式呢？关于德意志各邦，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声明，它们同英国缔结了联盟，而约翰·罗素勋爵则与他相反，在当天晚上就断言似乎目前与这些邦的关系同东方开始发生纠纷的时候是一样的。大臣们说，他们现在正打算搞好同土耳其的关系并建议同它缔结条约。他们没有预先同土耳其签订条约，就派兵去占领君士坦丁堡。因此，当我们从君士坦丁堡的来信中知道，土耳其政府的一个秘密代表奉命从维也纳到圣彼得堡去向沙皇建议缔结非正式协议时，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惊奇。记者写道：

“土耳其人在认清了自己的假朋友的背叛和愚蠢以后，同英明的敌人结成同盟，给这些朋友以报复，这是很合情理的。打算强加于土耳其的协定，其条件的危害性比缅施科夫的要求要大十倍。”

关于英国内阁认为英国军队负有使命去完成的行动，从联军分舰队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切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了解。它们在进入黑海 20 天以后回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在这以前不几天，有消息说：

“土耳其政府的大臣们出于对不列颠大使的声明的尊敬，应当把希腊报纸‘博斯普鲁斯电讯’（《Télégraphe du Bosphore》）的编辑逮捕入狱，因为他在自己的报纸上声称，英国和法国的舰队不久一定会从黑海回到博斯普鲁

斯海峡。‘君士坦丁堡日报’的编辑受权声明，两支舰队仍继续留在黑海。”

俄国海军上将为了感谢英国和法国的海军上将们给他的指点，于2月19日派了两艘蒸汽舰去炮击舍夫卡捷尔的土耳其人；俄国的蒸汽舰以特拉比曾德为目标进行巡航，而当时除了一艘英国军舰和一艘法国军舰在塞瓦斯托波尔以外，联军分舰队在黑海没有自己的舰只。西诺普会战和俄国蒸汽舰炮击舍夫卡捷尔——这是联军分舰队唯一可以夸耀的功绩。大使和海军上将们之间的争吵弄到彼此的关系完全破裂。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竟拒绝接待邓达斯海军上将，而巴拉盖·狄利埃不让法国海军上将和他的军官参加自己的正式舞会。但是，这种争吵只有从属的意义，因为外交界的吹牛家，由于自己的紧急报告在伦敦和巴黎被发表而感到自己的名誉受了损害，显然要竭尽一切来挽回失去的威信，而不管这样做会损失多少军舰，牺牲多少水兵。

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发给大使们的公开的指令被一系列发给海军上将们的秘密指令撤销了，海军上将们的确不能执行相互矛盾的指令。既然在发指令以前没有宣战，指令又怎能不是这样呢？一方面，命令他们攻击黑海的俄国舰只，迫使它们退回塞瓦斯托波尔，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应当越出单纯**防御**的状态。最后，如果这是一场严重的战争，那末，不列颠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怎能把他成功地撤去土耳其政府里的主战派领袖穆罕默德—阿利—帕沙的陆军大臣职务，而以“和事佬”里扎—帕沙来代替他，同时把总司令的职务交给列施德—帕沙的亲信穆罕默德—帕沙这件事描绘成一大胜利呢？

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只是在关于阿尔巴尼亚爆发了希

腊居民的暴动[78]、暴动已蔓延到特萨利亚和马其顿的消息传到了伦敦和巴黎之后，他们才着手派遣不列颠和法国的军队。正如罗素、克拉伦登、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的急件所表明的，英国内阁一开始就很不耐烦地等待这次暴动。这次暴动给英国内阁一个最好的口实，使它可以借口充当土耳其人和俄国人之间的调停人而去干涉苏丹同他自己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纠纷。从天主教徒开始干涉希腊人（我在这里只是在宗教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①）的事务的时候起，就可以有把握地指望欧洲土耳其的 1100 万居民同沙皇达成协定，沙皇在这种场合下就会真正成为他们在宗教上的保护者。在穆斯林和他们的正教臣民之间是没有任何宗教上的纠纷的，但是在宗教上对天主教徒的仇视可以说形成了土耳其境内信仰正教的各种民族之间的唯一的共同联系。自从穆罕默德二世包围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起，自从希腊的海军上将、拜占庭帝国最有势力的人鲁卡·诺塔腊斯公开声明，他乐意在首都看到土耳其的缠头的胜利，而不乐意看到罗马帽子的胜利的时候起，这方面就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另一方面，曾经流传过一个匈牙利的预言，说只有消灭了可诅咒的正教异教徒，只有土耳其人毁灭了君士坦丁堡，基督徒才能真正幸福。因此，西方强国对苏丹同其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的任何干涉都将有利于沙皇的计划。如果奥地利打算像自己在 1791 年[79]那样，借口反对俄国派在塞尔维亚的叛变性的阴谋而去占领这个公国，那结果也是一样。还要补充的是，伦敦传说伊皮罗斯的暴动的居民似乎得到从伊奥尼亚群岛来加入他们中间的希腊人的支持，英国当局在这方面没有阻挠

① 在原文中《greeks》——“希腊人”，这个字也作“正教徒”解释。——编者注

这些希腊人，而且联合政府的机关报“泰晤士报”在星期六的报上把希腊暴动的消息看成是一个非常称心的事件。

我自己决不怀疑在联合内阁的这些大叫大嚷的备战后面隐藏着背叛的行为。当然，波拿巴进行这次战争是十分认真的。不是国内革命就是对外战争——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他已经不可能继续像从前那样，把拿破仑第一的残酷的专制同路易—菲力浦的那种卖身的和平政策结合起来了。如果他不能把法国军队派到国外，他就得同时停止把一批一批的囚犯不断地流放到凯恩。但是，波拿巴的未加掩饰的企图和联合内阁的秘密计划之间的矛盾只能使局势更加混乱。我决不会根据这一切得出战争不会发生的结论；相反地，战争将具有联合内阁的小人们连想也想不到的那种可怕的规模，那种革命的性质。他们的背信弃义本身就是使局部冲突变成全欧战火的手段。

但是，即使不列颠内阁不是像今天这样十分虚伪而表现出十分真诚，它的干涉终究只能加速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英国人不要求土耳其政府给予其基督教臣民以保证，就不能进行干涉，而只有使土耳其政府灭亡才能取得这些保证。甚至我上面提到的那个显然是亲土耳其分子的君士坦丁堡记者也不得不承认，

“西方强国要使土耳其帝国所有的臣民在世俗和宗教关系方面完全平等的建议，将会立即使帝国发生混乱和内战，从而使帝国彻底地、迅速地毁灭”。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2月24日

载于1854年3月1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25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奥地利的破产

尽管有着战争的威胁和迫切的需要，但不论是法国政府或奥国政府直到现在都未能使 nervus belli[80]健全起来，就是说未能巩固自己的财政状况。虽然法国财政大臣盛宴招待财政部门的要员、Crédit Mobilier[81]的领导人和巴黎的大银行家，可是这些资本家仍然无动于衷，仍然抱着一种慎重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习惯于损害国家的利益来满足个人的利益，从国家那里取得最大的好处。所以推销预定为两亿法郎的法国公债的条件至今没有肯定下来。

至于奥地利，那末毫无疑问，它对西方强国采取友好态度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希望以此恢复财政界的信任，摆脱财政困难。的确，维也纳的一家政府报纸刚刚透露了关于奥地利中立和同法国亲善的消息，又立刻刊载了使公众惊讶不已的一则关于打算把600 万英亩的官地的很大一部分出卖的意外消息和 1854 年 2 月23 日的敕令——敕令规定按强制性行市流通的总数为 15000 万弗罗伦的国家纸币必须全部交归国民银行，并逐步换为银行券。在兑换完结以后，所有国库发行的纸币将停止流通，而按强制性行市流通的国家纸币今后将停止发行。实行这种兑换办法时，帝国政府向银行担保对转交给它的国家纸币负责，并且必须向银行偿

付这种转换所需的一切支出;政府每年至少要花1000万弗罗伦来清偿因此所负的债务;政府给予银行从国家关税收入中提款的权利,作为按时支付的保证;支付应用硬币,其比率与收税时收受金属货币的比率相等。同时,政府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银行有可能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恢复硬币支付。从银行方面来讲,为了使银行券的持有者随时能把银行券换为用硬币付息的有息证券,银行开始发行完全与国债证券相等的有息债券。此外,政府打算把所谓赎买证书和预付证书集中到自己手里,使它们完全停止流通。

把按强制性行市流通的国家纸币换为不兑现的银行券并不能减少纸币的数量和提高它的行市,而只能简化所发行的纸币的名称。因为国家拥有它给予银行赎回纸币的资金,所以,如果国家不知道它已经这样信誉扫地,以致只有依靠不是国有财产的银行才能恢复它的信用,那末它自己是会利用这些资金的。这样一来,奥皇对维也纳的犹太银行家的依赖程度,随着他的统治的军事性质的加强而增长。1852年1月,他把格蒙登、奥斯泽、施塔尔莱因的盐场抵押给他们了。1854年2月,他们取得了整个君主国的关税抵押权。银行一步步变成了帝国的真正主宰者,而政府则不过是名义上的主宰者罢了。奥地利越是拒绝满足资产阶级参加政权的要求,它就越要被迫向这个阶级中的一派——金融家–债权人的无限的专制屈服。

我们在这里已指出了实质的那个法令使举借新债的企图具有这样一种形式,就是帮助银行券的持有者把银行券换为用硬币付息的有息债券。1852年政府还保证用硬币来支付各种小额款项和债款,但是由于税收使用的只是国家纸币或银行券,政府不得不在伦敦和法兰克福签订了3500万弗罗伦的借款契约。显然,新的

借款增加了原有的赤字，结果引起了新币的再次发行，而新的借款本应该防止纸币过多和相应贬值的。政府虽然规定了硬币支付和银行券支付之间的重大差额，但是就像把银行的支付手段增加15000万不能使银行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恢复现金支付一样，这种差额也不能消除银行券的恶劣声誉。政府必须按照收税时的硬币比率用硬币给银行付款；可是，大家知道，在奥地利，不仅农民而且小城市的居民都像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喜欢攒钱；1850年甚至把铜币都积蓄了起来，而在1854年，所有税收全是用纸币缴纳的，虽然用纸币纳税要多缴17%。

熟悉奥地利国库历史的人，不管在新法令的诺言中，或者现在采取的财政措施中，都找不到任何新的东西。奥地利是在玛丽—泰莉莎女皇统治时期七年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第一次发行纸币的。最初发行的是一种必须在国家机关中兑换成白银的银行票。在1797年，对法战争引起的财政困难迫使政府取消了兑换白银的制度。玛丽—泰莉莎女皇统治时期第一次的发行量为1200万弗罗伦，而到1809年，银行票的总数达到了1060793653弗罗伦，同时银行票的贬值到了极点。1811年2月20日政府公布了一项命令，规定银行票完全停止流通，并按照100克20的比价赎兑成称为Wiener Währung〔维也纳货币〕的新纸币（赎买证书的名称由此而来）。政府宣布这些证书为国家的真正货币，并且许诺发行量决不超过兑换银行票所需要的数量。1811年5月Wiener Währung比价就跌了8%，并且发行了预付证书，其所以称为预付证书，是因为用这种证书提前12年预付了部分税款。的确，第一次发行的预付证书只有4500万弗罗伦。为了兑回这些预付证书，在12年中每年要在土地税账下拨支375万弗罗伦。

但是由于战争的缘故，满不在乎地接二连三地发行新的预付证书，每一次都引起相应的贬值。1815 年白银的贴水已达 Wiener Währung〔维也纳货币〕的 400%。1816 年 6 月 1 日，敕令宣布，国家今后绝不发行不兑现的纸币，正在流通中的纸币必须逐渐停止流通，金属货币必须重新成为标准的流通手段。为了履行这些诺言，1818 年 1 月 18 日成立了享有特权的国民银行。政府同国民银行事先签订了协议，责成银行兑回不兑现的纸币。虽然如此，1852 年 6 月我们在一家政府的报纸上却又看到了财政大臣发表的一个声明，说今后绝不会再有强制公债、特别税和货币贬值的现象，而奥地利的纸币如果现在不能，那末无疑将来会毫无损失地换为金属货币和目前正在讨论之中的用于收回国家纸币和还给银行国债的公债。这些诺言的周期性的重复最好不过地证明了它们是不可靠的。

在玛丽－泰莉莎时代，奥地利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发行它自己的可兑换硬币的银行票，在兑换白银时甚至还有贴水。1818 年，为了兑回纸币，国家不得不成立属于私人资本家的财产的享有特权的银行；这个银行获得一种对国家是非常沉重的负担的特权，但是银行必须发行可兑现的银行票。1854 年政府求助于银行，但是银行发行的银行票像国家发行的纸币一样，也贬值了，变成不能兑现的了。

虽然 1815—1846 年期间奥地利几乎没有间断地享受和平和内部平静的好处，但是在这长期的和平以后，第一个打击就弄得它完全束手无策。1846 年 2 月底的克拉科夫起义和加里西亚骚动[82]使国家的开支比 1845 年增加了 1000 万弗罗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军队的开支：1845 年军队开支为 50624120 弗罗伦，1846 年

就增加了700万弗罗伦，同时帝国各省的民政管理费用也增加了200万弗罗伦。1847年由于商业危机和农业歉收，税收大大减少了，可是，军事预算却增长到6400万弗罗伦，其主要原因是意大利发生了骚乱。这一年的赤字是700万弗罗伦。1848和1849年不仅整个整个区域的收入断绝，而且还加上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军事开支。1848年的赤字是4500万弗罗伦，1849年的赤字是12100万弗罗伦。1849年发行了7600万弗罗伦的强制性行市的三厘国库券。在此以前银行早就停止了硬币支付，它发行出来的东西被国家宣布为不能兑现的。1850年赤字为5400万弗罗伦，而与普鲁士作战的危险使纸币的行市降低了60%。1849—1851年期间发行的国家纸币的总数为21900万弗罗伦。1852年的赤字比1849年增加了800万弗罗伦，比1847年增加了4600万弗罗伦。1851年的军事预算为12600万弗罗伦，就是说正好比1847年增加了一倍。1852年用于警察的开支为900万弗罗伦，即比1848年增加了三倍。而1853年警察和军队的费用又有增加。

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解答奥地利怎样陷入了财政的困境，而在于说明它虽然陷于虚金本位和债务之中，为什么仍能避免公开的破产。1850年国家收入比1848年增加了19600万，比1849年增加了4200万。1851年国家收入超过1850年21900万。1852年的国家收入总额达22600万，超过1851年的收入600万。总之，国家的收入在不断地增加，虽然1852年的收入不像1851年增加得那样多，而1851年的收入又不像1850年增加得那样多。

收入增加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把撒丁的军事赔款和在伦巴第—威尼斯没收的财物[83]这些特别收入搁在一边不谈，那末奥地利农民向自由的土地所有者的转变，当然增加了农村纳税的潜力

和土地税的收入。同时由于撤销了财产继承法院，从而把贵族过去依靠他们的司法权而享有的收入转入了国库。从1849年起这方面的收入越来越多。其次，1849年10月29日的敕令所规定的所得税也使得收入大大增加。在奥属意大利各省，由这种税提供的收入特别多。例如，1852年德意志和斯拉夫各省的所得税总共才增加了60100万弗罗伦，而仅意大利各省就增加了63900万弗罗伦。但是，使奥地利帝国免于正式破产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对匈牙利的征服以及对匈牙利征收与其他各省同等的捐税。

土地税可以说是整个奥地利税收制度的基础。1817年12月23日公布了一项敕令，弗兰茨皇帝在这个敕令中宣称，他决定在德意志、斯拉夫和意大利所有省份实行划一的土地税征收制度。敕令中有一条曾规定今后不得“因土地所有者或房产所有者的个人特权”而免缴土地税，这个原则大体上已经实行。1834年在奥地利大公国实行了新的土地清册，这个公国是在奥地利君主国的世袭领地中新制度首先生效的地方。奥地利的伦巴第从查理六世以来就已具有叫做Censimento Milanese的很完善的土地清册。但是，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根本没有同帝国其他各省一样承担繁重的土地税和其他税。根据匈牙利宪法，拥有大部分土地的匈牙利地主免缴直接税，甚至别的省份都缴纳的某些间接税，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也不缴纳。1846年，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边屯区[84]的人口是14549958人，而君主国其他地区的人口是24901675人，这样，前几个地区所缴的税款应该占全部收入的7/18。实际上，1846年这些地区只缴纳了2300万弗罗伦，不到全部税收16400万弗罗伦的$^1/_7$。奥地利君主国的全部面积为12123平方德里，其中匈牙利各省占5855平方德里，也就是说占奥地利领土的一半。

皇帝约瑟夫二世恣意在匈牙利推行新制度，使匈牙利的地位同其他省份的地位相等，其主要目的是要使奥地利君主国集中化和完全德意志化。可是他的措施大大激怒了匈牙利的舆论，以致他在临终前担心匈牙利人会像尼德兰人一样实行起义[85]。

列奥波特二世、弗兰茨一世和斐迪南一世这几个皇帝都不敢重复这个危险的试验。自从匈牙利革命在俄国的干预下被扼杀以后，匈牙利宪法阻碍课税平均化的情况就不存在了。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从来没有宣誓忠于匈牙利宪法，正因为如此他才取代斐迪南当了皇帝，立刻在匈牙利实行了像在奥地利其他领地已经实行的那种土地税。此外，从1850年10月1日起取消了匈牙利的内部税卡，从而使奥地利君主国整个境内的关税也像其他赋税一样统一起来了。从1851年3月1日起在匈牙利也开始征收消费税并实行烟草专卖。1851年匈牙利各省，仅仅直接税就增加了1150万弗罗伦，而在1852年又增加了约800万弗罗伦。

由此得出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结论：奥地利帝国的生存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依靠占有匈牙利和伦巴第的；只要一失去匈牙利和伦巴第，这个国家的延缓已久的破产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3月3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3月22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3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法国和英国的军事计划。——希腊人暴动。——西班牙。——中国

1854年3月3日星期五于伦敦

正像我在最近一篇文章里所说的，查理·纳皮尔爵士被任命为波罗的海舰队总司令，要归功于他曾公开表示不信任同法国的同盟，并且指责法国在1840年对英国的背叛行为，然而实际上那时英国政府是同尼古拉秘密勾结起来反对路易—菲力浦的。我还应该补充一句，黑海的第二个海军上将艾德蒙·莱昂斯爵士在他出任英国驻希腊公使的期间，曾表现出他是法国的公开敌人，而且他由于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的报告而被免去这个职务。这样，内阁用自己的任免令竭尽所能地不仅制造英法统帅部之间的不和，而且制造海军上将们同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之间的不和。

不能认为波拿巴在他对议员们的御前演说中祝贺他同英国结成紧密的同盟是同这些事实矛盾的，更不能认为是推翻这些事实的。Entente cordiale[86]当然要比帝国商标的恢复更早些。波拿巴的演说中最精彩的地方不在于重弹路易—菲力浦的老调，也不在于揭穿沙皇的野心勃勃的计划，而应该说在于他宣布他是保护德国特别是奥地利反对它们的国内外敌人的人。

2月5日刚在君士坦丁堡交换了土耳其政府同西方强国的条约的批准书（其中一条规定：土耳其政府未经四强国的同意不得同俄国签订和约），四强国代表就同土耳其政府开始了关于土耳其基督徒今后状况的谈判。星期三的“泰晤士报”透露出这次谈判的真正目的：

“土耳其帝国的某些地区已经根据苏丹的敕令和某些条约得到了在承认土耳其政府主权的条件下的充分的内部自治权，这些地区的状况可以作为对双方都无损害的今后可以推广的先例，其次似乎指出一条在目前情况下援助土耳其欧洲领地的最好途径。”

换句话说，联合内阁打算保持土耳其帝国欧洲部分的完整，办法就是把波斯尼亚、克罗地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鲁美利亚以及特萨利亚变成像多瑙河各公国那样的国家。如果土耳其政府接受这些条件，那末在土耳其军队取得胜利的时候势必引起土耳其人自己之间的国内战争。

现在大家都知道，维丁密谋的被揭发只是促进了希腊人暴动，而在布加勒斯特，人们在希腊人暴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认为暴动是已经完成的事实。斯库塔里帕沙正在集结自己的全部军队，以阻止门的内哥罗人同暴动的希腊人联合起来。

既然谈到英国政府的目前意图，那就只能把英法的远征看做是一种新的欺骗行为。已经指定罗多斯托为法国人的登陆地点，埃内兹作为英国人的登陆地点。埃内兹城是在河口附近的一个不大的半岛上，它的背后是马里乍河谷的一片宽阔的沼地，毫无疑问这对营地的卫生情况是十分有利的。该城不仅处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区域以外，而且处在达达尼尔海峡区域以外，军队要抵达黑海，必需重新上船，尝尝逆海峡水流绕海行250英里的滋味，或者沿

着无路可行的地带走 160 英里，走一趟就得花上两个星期。到罗多斯托的法国人至少还在马尔马拉海上，离君士坦丁堡总共还有 7 天的路程。

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军队目前需要做些什么呢？显而易见，军队奉命或者到阿德里安堡去掩护首都，或者至少是在色雷斯的赫尔松涅斯地峡集中起来保卫达达尼尔海峡。“泰晤士报”就是这样说的，它还援引“绝对可靠的消息”，甚至还援引马尔蒙元帅的战略性意见来证明这一计划的英明。

用 10 万名法英兵士来保卫没有受到任何人威胁，也许在最近 12 个月内也不会受到威胁的首都！老实说，他们呆在家里也可以取得同样的成就。

如果这一计划执行了，那末老实说，这是可能想出来的一个最坏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以进行防御战的最坏的方法为基础的，也就是以那种在绝对无所作为中寻找力量源泉的方法为基础的。即使预先规定了远征主要应当具有防御性，那末只要给拥有这样的预备队的土耳其人以转入进攻的机会，或者至少是占领一个可能采取局部进攻的阵地的机会，这一点显然是很容易做到的。其实在埃内兹和罗多斯托的法英军队是完全没有用处的。

最糟糕的是有充分的蒸汽运输工具并且得到拥有 20 艘战列舰的帆力舰队支援的 10 万军队，本身就是一支能够在黑海任何地区进行最坚决的进攻的力量。这一支力量应当占领克里木和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和赫尔松，封锁阿速夫海，摧毁在高加索沿岸的俄国要塞，俘获俄国军舰并把它毫无损伤地送至博斯普鲁斯海峡，不然就是它不了解自己的力量和自己作为作战部队的职责。拥护内阁的人硬说，这样的军事行动只能在这 10 万人在土耳其集中

以后才能进行，并且说头几个师在埃内兹和罗多斯托登陆只是为了迷惑敌人。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不直接在黑海沿岸地区的某一据点登陆，就等于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敌人是不会受骗的。只要尼古拉皇帝一听到这个有10万人的喧嚣一时的远征的消息，他一定会把他手下的所有兵士统统派到塞瓦斯托波尔、卡法、皮列柯普和叶尼卡列去。决不能先用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吓唬自己的敌人，然后使他相信，不想用这些使他受到丝毫损失。这个花招太容易看穿了，如果打算用这种可怜的手法来迷惑俄国人，那末不列颠外交在这里又犯了一个大错误。

因此我认为，想出这种远征的人不过是想欺骗苏丹，假装想使俄国引起最大的恐怖，却要想方设法使它受到最小的损害。

如果法国和英国将占领君士坦丁堡和鲁美利亚的一部分，奥地利占领塞尔维亚，也许还占领波斯尼亚和门的内哥罗，而俄国将得到加强它在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阵地的机会，那末这不是瓜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又是什么呢？土耳其现在的处境比1772年还坏。当时普鲁士国王为了迫使叶卡特林娜女皇撤出多瑙河各公国（因为多瑙河各公国被占领有引起欧洲冲突的危险），曾建议对波兰实行第一次瓜分，这样可以补偿俄土战争的费用。我们还记得，当初土耳其政府投入对叶卡特林娜的战争，是为了保卫波兰不让俄国染指，而结果波兰成了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完整"的牺牲品。

联合内阁所实行的叛卖性的拖延政策，使得俄国密使有可能筹划、准备克拉伦登勋爵迫不及待的希腊人暴动。暴动于1月28日开始，据维也纳最近的紧急报告说，到2月13日已经具有十分危险的规模。看来，阿卡尔纳尼亚和埃托利亚的一些地区以及伊鲁萨和德洛尼亚一些区域已经卷入暴动。有人说，埃维厄岛的首

府埃格里波举行了暴动，其严重性不亚于阿尔巴尼亚的暴动。土耳其人放弃阿尔塔和亚尼纳这两个城市而由希腊人去占领。这个情况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瞰制这两个城市的要塞仍在土军手中，而在阿尔巴尼亚，我们根据基督徒和土耳其人之间的多次战争知道，最后占据这两个城市总是先要占据要塞。康太斯湾和萨罗尼加湾地区以及阿尔巴尼亚沿岸一带将宣布戒严。我在另一篇文章①里曾指出，希腊人暴动对土耳其政府的最不利的后果之一，就是它会给西方强国以干涉苏丹和他的臣民之间的关系的借口；西方强国不去进行反对俄国的斗争，而去唆使希腊基督徒同沙皇结成同盟。从同一班邮件就接到了如下的消息，这就表明西方强国多么急于利用这一借口。这个消息说，土耳其政府接受了英法提出的条约，英法大使派了两艘蒸汽舰去帮助土耳其人，同时不列颠驻雅典的全权公使却把英国干涉暴动地区事件的意图通知了奥托国王政府。维也纳记者今天在"泰晤士报"上从军事观点对暴动的直接结果作了十分清晰的说明：

"最近几天内，维丁的司令部里开始出现某种颓丧情绪，因为期待中的增援部队接到了向相反方向开进的命令，他们现在正在去土耳其西南地区的途中。伊皮罗斯基督徒暴动的消息，在多瑙河一带的阿尔纳乌特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中间引起了震动，他们坚决要求准许他们回家去。休森—贝伊准将和苏里曼—帕沙准将已经丝毫不能影响自己的不受约束的军队。有人担心，如果试图用武力来控制他们，结果就会形成公开的叛乱。但是如果准许他们回去，那他们在回去的路上就会把基督徒居住的地区劫夺一空。如果西部基督教居民的敌对运动具有更加危险的规模，那末土耳其军队的西翼将不得不退却，这就完全等于受到一次和联军舰队开进黑海给俄国的打击同样大的打击。"

以上就是格莱安、罗素、克拉伦登和帕麦斯顿为了替内阁在

① 见本卷第108页。——编者注

东方问题上的政策进行辩护而大肆吹捧的那种拖延政策的最初后果。他们在星期五的夜晚收到消息说，沙皇不等英国召回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的命令到达，就毫不客气地断然命令他离开，在这之后他们举行了两次内阁会议，一次在星期六，另一次在星期日下午。他们的会议的结果是：用照会的形式给沙皇再拖延三、四个星期，照会中说：

“坚决请沙皇在收到这一通知的6天内作出庄严的保证，答应命令自己的军队在4月30日以前撤出多瑙河各公国。”

应当注意，如果照会遭到沙皇拒绝，**是不会有宣战**的危险的。当然可以说（“泰晤士报”也这么说），尽管又实行了拖延，不过积极的备战活动仍在继续进行。但是应当指出，一方面，由于西方强国答应直接参战，土耳其政府就不可能在多瑙河一带采取任何积极行动，而在这一地区每拖延一天都会使土耳其人的状况更加恶化，因为这就会使俄国人有可能加强它的前进阵地，并且把多瑙河军队后方的希腊暴动者变成越来越严重的实际威胁；另一方面，军队在埃内兹和罗多斯托登陆会增加苏丹的困难，而登陆当然不能阻挡住俄国人。

曾经谈妥不列颠的远征军将是3万人左右，法国的远征军将是8万人左右。如果在事件的进程中发现，奥地利只是想掩饰它同俄国之间的协议而假装同西方强国联合，那末波拿巴势必对这种极不明智的分散自己军队的作法感到很后悔。

另一个暴动，也可以看做是有利于俄国的牵制行动，这就是**西班牙**的起义。西班牙的任何运动都必然会引起法英两国之间的摩擦。我们从沙多勃利昂著的“维罗那会议”[87]一书中可以看出，在1828年，俄国是法国干涉西班牙的鼓舞者。从1834年英法干涉[88]

的发起人是帕麦斯顿这一点可以得出结论，这次使得两国间的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终于破裂的干涉是由同一个原因造成的。“西班牙的婚姻”[89]为推翻奥尔良王朝开辟了道路。在目前，“无辜的”伊萨伯拉被推翻会使路易—菲力浦的一个儿子蒙潘西埃公爵有可能提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同时也会使波拿巴想起马德里有一个时期曾经是他的伯父①的驻在地。奥尔良王族会得到科堡王族的支持，但是也会遇到波拿巴王族的反对。因此，西班牙起义决不是人民革命，而只能成为摧毁像英法同盟这样不坚固的建筑物的有力工具。

据说，俄国、希瓦、布哈拉和喀布尔之间签订了同盟条约。

至于多斯特—穆罕默德（喀布尔的艾米尔），如果他现在想对英国——他的背信弃义的盟国进行报复，那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在1838年，多斯特—穆罕默德曾命令把沙皇派到他那里去的代理人杀死，然后他建议英国宣布俄国是永久的**不共戴天的世敌**，如果英国政府愿意的话；多斯特—穆罕默德在1839年阿富汗远征时被迫起的那种作用，重新激起了他对英国的愤怒，在这次远征期间他的王位被废除，他的国家被残暴地、无耻地劫掠一空[90]。希瓦、布哈拉和喀布尔的居民是正统的逊尼派穆斯林，而波斯人信奉什叶派的异教教义，所以未必能够设想前者会同俄国——前者一向憎恨并且蔑视的波斯人的同盟者——联合起来，去反对被他们认为是一切正统教徒的最高首领的钵谛沙赫的公开同盟者——英国。

俄国很可能指望把中国的西藏和鞑靼②皇帝作为同盟者，如

① 即约瑟夫·波拿巴。——编者注

② 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鞑靼这个名词，是十九世纪西欧著作界用来表示居住在东亚的蒙古族、满族和其他突厥族的。——编者注

果鞑靼皇帝被赶到满洲并且放弃中国本土的王位的话。你们都知道，汉族起义者开始了反对佛教的现代十字军征讨，烧毁佛教的寺庙，杀死和尚。[91]但是鞑靼人信奉佛教，而承认中国主权的西藏是大喇嘛的所在地，被信仰佛教的人看做是圣地。因此，如果天王能够把满清王朝赶出中国，以后他将不得不同鞑靼人的佛教政权进行宗教战争。由于佛教信仰盛行于喜马拉雅山的两边，英国不能不支持新的中国王朝，所以毫无疑问，沙皇将站在鞑靼族方面，唆使他们进攻英国，并千方百计地在尼泊尔挑起宗教暴乱。从最近东方来的邮件我们知道，

> “中国皇帝预见到北京会失守，曾命令各省总督把皇帝的收入交到热河——这是皇帝的旧的氏族领土和他现在在满洲的夏宫，在长城东北约八十英里的地方”。

总而言之，不久就要在汉人同鞑靼人之间发生宗教大战，这个战争一定会波及印度。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3月3日

载于1854年3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30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工人议会开幕。——英国的军事预算

1854年3月7日星期二于伦敦

昨天上午10时，工人议会[92]的代表在曼彻斯特的民众文化馆里召开大会。第一次会议当然只讨论了一些准备工作问题。斯托克波尔特的代表詹姆斯·威廉斯和伦敦代表詹姆斯·布莱提出的邀请马克思博士作为名誉代表出席工人议会会议的提案（得到厄内斯特·琼斯的支持）被一致通过。对于路易·勃朗先生和纳多先生，也通过了同样的决定。不管工人议会的直接成果如何，召开工人议会这个事实本身就标志着工人阶级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也许可以把二月革命后在巴黎卢森堡宫举行的会议[93]看做是它在这条道路上的先驱者。但是，一眼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卢森堡委员会是由政府发起成立的，而工人议会是由工人自己发起成立的；成立卢森堡委员会的意图，是要把临时政府的社会主义者成员从活动中心排挤出去，使他们丝毫不能认真过问国家的当前事务；还有，组成卢森堡委员会的代表完全是各种或多或少相当于中世纪的行会或现代工联的所谓 corps d' états即同业公会的会员；而工人议会则是全国范围的各行各业的工人的真正代表机关。工人议会能不能取得成就，主要甚至完全取决

于它是不是从这一原则出发：当前问题不在于所谓劳动组织，而在于工人阶级的真正组织。

现代统治阶级的特权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奴役，都同样是以现行的劳动组织为基础的，现代统治阶级当然要用它拥有的全部工具（其中之一就是现代国家机器）来维护和支持现行的劳动组织。因此，要废除现行的劳动组织，并用新的组织来代替它，就需要力量——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需要不仅用于抵抗而且用于进攻的力量；但是要取得这样的力量，就需要组成一支拥有足够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力量以同敌军进行斗争的军队。如果工人议会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纯粹理论性问题的讨论上，而不是为真正组织全国范围的党开辟道路，那末，它就会像卢森堡委员会一样地遭到失败。

根据宪章派全国协会[94]章程，重新选举了宪章派执行委员会。已经宣布，厄内斯特·琼斯、詹姆斯·芬伦（伦敦）和约翰·萧（里子）按照规定被选入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任期6个月。

波拿巴在交易所订立借款契约的企图，由于巴黎资本家的消极抵抗而遭到了失败，所以波拿巴的财政大臣向参议院提出的预算包括如下的一条：

“为了国库和法兰西银行业务的需要，授权财政大臣发行一种定期偿还的有息长期国库债券。国库债券的流通总额不得超过25000万法郎（1000万英镑），但是，根据1833年6月10日的法令转为偿债基金的债券不包括在上述总额内，并且不能当作保证金交给法兰西银行和其他的贴现机构。”

在补充条文中规定，经过参议院的追认，“皇帝有权用普通法令来增发债券”。

巴黎来信告诉我，这个建议使得整个资产阶级非常恐慌，因

为，一方面国库债券不得超过 25000 万法郎，而另一方面，又可以超过上述总额，只要皇帝认为有必要下命令超过多少就可以超多少，而且法兰西银行或者其他贴现机构还不得接受这样发行的债券作为保证金。你们都知道，银行已经用国库债券支付了它取自 Caisses des depôts et consignations〔储蓄银行〕的 6000 万法郎。

十二月的英雄们甚至千方百计地利用战争的幽灵来打破尚在阻挠他们干预国库的一些最后的微小障碍。已经大大动摇的国家信贷的必不可免的瓦解会吓坏资产阶级，而提出增加盐税以及其他类似的非常少有的杂税定会引起人民群众的愤怒。因此，无疑会使波拿巴在外国赢得一定的威望的战争，很可能加速他在法国的崩溃。

我曾预言目前西班牙的困难一定会导致英法之间的严重误会，这一点从伦敦一家报纸的如下报道得到了证实：

“法兰西皇帝通过瓦列夫斯基先生问克拉伦登勋爵，如果伊萨伯拉女王被推翻，不列颠政府是否同意帮助他把卡洛斯派王位追求者立为西班牙王。据说，克拉伦登勋爵回答道，幸好伊萨伯拉女王还稳稳地坐在王位上，在如此忠于君主制度的国家里，革命只是在遥远的将来才有可能发生；但是，即使西班牙万一爆发了革命，而且女王被推翻了，不列颠内阁也应该拒绝受任何义务的约束。

皇帝要立德·蒙太莫林伯爵为王的建议，是通过不让蒙潘西埃公爵夫人继承她姐姐的王位这样一个十分自然的愿望暗示出来的；皇帝认为，让路易－菲力浦的儿子，西班牙女王的丈夫作自己的邻居，是很不方便的。”

约翰·罗素勋爵在星期五的下院会议上宣称，他不得不把他的改革法案暂时收回，但是，如果在这一期间向俄国皇帝提出的新建议被接受而使东方问题得到解决，那就在 4 月 24 日审议这个法案。诚然，在沙皇对他的臣民的宣言以及给波拿巴的信[95]公布以

后，这种解决的可能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小了。然而政府的声明还是表明，提出改革法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联合内阁的外交达到恢复俄国的 status quo ante bellum〔战前状态〕的时候，转移并缓和社会舆论。在“晨报”（帕麦斯顿的喉舌，他的最热烈的拥护者之一）对帕麦斯顿在这些内阁阴谋中所起的卓越作用，作了如下的描写：

“阿伯丁勋爵是名义上的而不是真正的首相。女王的首席大臣实际上是帕麦斯顿勋爵。他是内阁思想的主宰。自从帕麦斯顿重新回到政府以来，他的同僚经常担心他又会突然离开他们，他们对于实现他的那些据他们知道是他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自然不敢加以阻挠。因此，他总能达到目的。上星期，有一个鲜明的例子说明帕麦斯顿阁下在女王陛下的内阁中的影响。新改革法案已正式提交内阁审查，当时存在一个问题：在目前的议会会议上是讨论这个法案还是把它撤销。阿伯丁勋爵、约翰·罗素勋爵、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和威廉·摩耳斯沃思爵士都赞成把这一法案提出来讨论。帕麦斯顿勋爵建议撤回这个法案，并且正像我们在几天以前描写的那样大声宣称，如果他在内阁中遭到失败，他将在下院里投票撤销这个问题。这次讨论或者说座谈的结果，是帕麦斯顿取得了胜利。他的反对者——其中包括执政党在上院的领袖以及该党在下院的领袖都遭到了失败。帕麦斯顿勋爵在上个星期取得的另一次胜利，就是任命查理·纳皮尔爵士为波罗的海舰队总司令。大家都知道，无论约翰·罗素勋爵或詹姆斯·格莱安爵士都反对这项任命，但是帕麦斯顿勋爵却主张任命，结果还是任命了。高贵的勋爵将在今天晚上主持在改革俱乐部举行的庆贺英勇的海军上将的宴会，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昨天晚上，格莱斯顿先生向下院提出了这一代人所不知道的新玩艺儿——军事预算。从他的发言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决定这样早把自己的财政措施提交议院审查，目的就是预先说出战争对私人钱袋极不利的后果而抑制国内的战争热情。他的发言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他要求的只是在战争突然停止时把打算离

开不列颠海岸的25000人**弄回来**所需要的那一笔款子。

他首先叙述最近一个财政年度的实际收支状况。格莱斯顿强调指出，这一个年度还没有结束，因此对最后一个月的收入只能根据概算推断。到1853年4月18日截止的一年的全部收入，根据概算为5290万英镑，而实际收入达到了54025000英镑；可见，实际收入超过预计收入1035000英镑。另一方面，支出比概算节省了1012000英镑。因此，格莱斯顿计算出，如果不发生国家目前所遇到的特殊情况，这一年度的收入大约会超过支出2854000英镑。

然后，格莱斯顿谈到他执行的**降低税收**的结果。关税尽管降低了，1853—1854年度的收入仍然达到了2060万英镑，而1852—1853年度的收入只有20396000英镑，即增加了204000英镑。降低茶税带来的亏损只有375000英镑。用1辨士的单一税来代替3辨士至10先令的印花税，没有造成预计的亏损，而是增加了36000英镑的收入。

接着，格莱斯顿谈到了上次会议通过的**增加税收**的法律的结果。所得税的征收在爱尔兰受到了种种情况的阻挠，但是仍比原来估计大约多收2万英镑。由于扩大收入税的征收范围(由150英镑改为100英镑)，看来在大不列颠要比预定的概算多收10万英镑，即收入25万英镑。在苏格兰每一加仑酒精征收1先令的附加税，这项收入仅仅增加了209000英镑的收入，而根据概算，这项收入要增加278000英镑。

另一方面，爱尔兰的酒精税的收入比原来估计多收的198000英镑还多收了213000英镑。在整个财政年度中应当征收的遗产税不过50万英镑。以上就是格莱斯顿先生关于截至今年4月5日止

的这一年度大不列颠财政状况的报告。

1854—1855 年度收入概算

（单位：英镑）

关税	20175000
消费税	14595000
印花税	7090000
普通税	3015000
所得税	6275000
邮税	1200000
国家财产	259000
过去的结余	420000
其他收入	320000
共收入	53349000

支　出　概　算

（单位：英镑）

长期国债	27000000
非长期国债	546000
统一基金	2460000
陆军	6857000
海军	7488000
炮兵	3846000
军需	645000
其他开支	4775000
民军	530000
侦察勤务	792000
东方勤务	1250000
共支出	56189000
赤字	2840000

格莱斯顿先生在谈到弥补赤字的来源以前，先列举了政府不

打算建议下院通过的措施。他不愿意恢复他去年提出减低税率并已取得法律效力的那些税，哪怕是部分地恢复也罢。他不愿意要求无益地恢复过去的政府已经放弃的那些税。但是，如果国家现已投入的战争再拖延一年，政府未必能够长期地保持这样的降低税率。总而言之，格莱斯顿不打算建议提高间接税。他也不愿意发行公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财产状况像英国这样负债累累。最后，格莱斯顿在谈了以上这些开场白以后，进而谈到政府的建议。这里指的是在 6 个月内把所得税税率提高一倍和完全废除现行的把期票分为国内期票和国外期票的作法。汇票的平均税率，虽然不是平均分配的，直到现在每 100 先令是 1 先令 6 辨士。格莱斯顿曾建议去掉比率的零头，把它减为 1 先令。根据他的计算，这一改变应当增加 6 万英镑的收入。至于所得税税率，收入在 150 英镑和 150 英镑以上的，每英镑应当从 7 辨士增加到 $10^{1}/_{2}$ 辨士，收入在 100—150 英镑的，每英镑应当从 5 辨士增加到 $7^{1}/_{2}$ 辨士。同时，格莱斯顿建议，由下院通过一项提案，授权他在税款收到以前发行 175 万英镑的国库券，这些国库券用增加的所得税收入来偿还。最后，格莱斯顿先生试图为他的旨在减少国债的最新措施辩护（没有完全成功），你们都知道，这些措施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了。

有许多议员参加了这一报告以后的辩论，但是唯一值得指出的是迪斯累里先生的发言。他说，他丝毫不反对政府为了保证战争能够全力而胜利地（如他希望的）进行而认为自己必须负责向下院提出的建议。但是，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他反对把直接税变成战费的唯一来源。至于格莱斯顿报告中第二部分，即有关国内目前财政状况和游资的部分，他认为不明确是这一部分的特点，它

不像财政报告，至少不像在目前情况下提出来的报告。他认为目前的国家收支状况是有缺点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现政府上台的时候，国库收支表的存额，在1853年1月3日达到900万英镑。而过了一年，到1854年1月，就减少了一半。迪斯累里计算出，国库收支表上的存额，在4月5日定将降低到300万英镑，因为支付国家贷款利息以及进行债券转换的费用总共要900—1000万英镑。极可尊敬的绅士说，用不着把它列入国库收支表，而应当把不足的数目加到赤字里面。迪斯累里断定，在目前把收支作到完全相符合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现在发生的问题不像过去那样，是收支相符还是收支表上有些剩余的问题，而是收支大致平衡还是有很大的赤字的问题；事实上，不是收支勉强相符，而是有了很大的赤字，这个赤字是财政大臣从两个方面造成的。第一，他在币值提高的时候把国库券的利息降低到1．5%；第二，南海公司[96]债券的不幸的转换措施，这个措施不仅把他的存额消耗殆尽，而且给他留下了200万英镑的赤字。

在其他的议员提出了不太重要的意见以后，就结束了关于概算报告的审查，并且通过了决议。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3月7日

载于1854年3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35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给工人议会的信

1854年3月9日于伦敦
索荷广场第恩街28号

非常遗憾，我不能，至少目前不能离开伦敦，因此不可能亲自来表达我在接到要我作为名誉代表参加工人议会的邀请时所感到的骄傲和感激的心情。召开这个议会的事实本身，证明世界历史上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这个不平常的事件的消息将会唤起欧美各地工人的希望。

在世界各国当中，大不列颠是资本专横和劳动被奴役达到了顶点的国家。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对于拥有整批产业军的百万富翁和勉强度日的雇佣奴隶之间的中间阶层，都没有消灭得这样彻底。这里已经没有欧洲大陆各国那样的几乎在同等程度上依靠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劳动的人数众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阶级。在大不列颠，财产同劳动已经完全分离。因此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组成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都没有这样巨大的规模，没有这样清晰可见的轮廓。

正因为这样，大不列颠的工人阶级最先准备好并且最先负有

使命来领导最终必然使劳动得到彻底解放的伟大运动。它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数量上的极大优势，过去的艰苦斗争的经验和现在的精神力量。

大不列颠的千百万工人第一个奠定了新社会的真实基础——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变成了人类的生产力的现代工业。英国工人阶级以不懈的毅力、流血流汗、绞尽脑汁，为使劳动变成高尚的事业并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能造成产品普遍丰富的水平创造了物质前提。

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创造了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就实现了解放劳动的第一个条件。现在它应当实现解放劳动的第二个条件。它应当把这些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使它们受生产者的集体监督，这些生产者直到今天还在听任自己劳动的产品本身转过来反对自己，变成压迫他们自己的工具。

工人阶级征服了自然，而现在它应当去征服人了。工人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来胜利地完成这个事业，但是需要把所有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

如果工人议会仍然忠于使它产生的那个思想，未来的历史学家将这样来写：1854 年英国有两个议会——伦敦议会和曼彻斯特议会，即富人的议会和穷人的议会，——但是真正的人只出席了工人的议会而没有出席老板们的议会。

忠实于你们的　**卡尔·马克思**

写于 1854 年 3 月 9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4 年 3 月 18 日“人民报”第 98 号　　俄文译自“人民报”

卡·马克思
工　人　议　会

1854年3月10日星期五于伦敦

大不列颠是资本专横和劳动被奴役达到了顶点的国家。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对于拥有整批产业军的百万富翁和勉强度日的雇佣奴隶之间的中间阶层，都没有消灭得这样彻底。这里已经没有欧洲大陆各国那样的几乎在同等程度上依靠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劳动的人数众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阶级。在大不列颠，财产同劳动已经完全分离。因此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组成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都没有这样巨大的规模，没有这样清晰可见的轮廓。

正因为这样，大不列颠的工人阶级最先准备好并且最先负有使命来领导最终必然使劳动得到彻底解放的伟大运动。它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数量上的极大优势，过去的艰苦斗争的经验和现在的精神力量。

伦敦的每日报刊对工人议会的活动实行“沉默政策”。它们希望以大规模的《conspiration de silence》〔“缄默阴谋”〕来扼杀它。几个月来，它们发表的许许多多关于这种议会是否有可能召集的文章已经使公众腻烦了，而现在却有意只字不提工人议会已经出世，并且已经开始工作的事实。这种以为只要假装看不见危险就能逃避危险的鸵鸟的才略在我们的时代是不中用的。以后报刊将

被迫谈论工人议会，而且不管它们装作怎样漠不关心，未来的历史学家将这样来写：1854年英国有两个议会——伦敦议会和曼彻斯特议会，即富人的议会和穷人的议会，——但是真正的人只出席了工人的议会而没有出席老板们的议会。

下面是制定工人议会行动纲领的委员会所提出的报告：

"委员会认为，工人议会的任务是：

——促使这个时期举行的罢工和同盟歇业在有利于工人的条件下胜利结束，采取今后可以避免罢工和同盟歇业的措施；

——保证工人在工作期间的合理待遇；

——帮助妇女和儿童摆脱工厂制度的压迫；

——筹备工人教育资金，禁止克扣工资和暗降工资。

其次，委员会认为议会的任务是，为保证劳动者合理地分得自己劳动所创造的利润而斗争，首先是为创造出使他们能够成为自己劳动的支配者以便**完全摆脱雇佣奴隶制**的条件而斗争，委员会深信，筹备必要的活动资金是这方面的有决定意义的步骤，因此提出以下各项请你们审查：

1．募集作为建立全国工人基金的资金；

2．保管所募集的基金的措施；

3．基金的使用和工人权利的保障；

4．群众运动的组织。

一、建立全国工人基金

(1) 根据工资的水平，每周从工资中扣除如下的数目：

每周 4先令以下—— $^1/_2$ 辨士

每周 8先令以下—— $^3/_4$ 辨士

每周 12先令以下——1辨士

每周 15先令以下——$1^1/_2$ 辨士

每周 20先令以下——2辨士

每周 30先令以下——3辨士

每周 40先令以下——4辨士

⑵ 参加群众运动的各工人组织的负责人员将募集的资金送交运动理事会。

二、基金的保管

⑴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员把他们为群众运动募集的钱每星期向运动理事会送交一次，详细办法将在下面说明。被指定接收资金的负责人员应立即把收款收据交给募集人。

⑵理事会理事应把全部所收到的为群众运动募集的钱以理事会理事的集体名义存入银行（留于手头的不得超过50英镑）；从银行提取全部存款或部分存款，必须交验载有经理事会法定多数理事签字的有关决议的理事会记录。

⑶ 按此手续提取的活期存款（如果超过5英镑）应该是银行券，银行券的号码记在便于审查的本子上，并在报上公布；取出的银行券应分成几份，委托理事会理事分别保管；提取大笔款项时，应分成相等的几份由每个理事保管。

⑷按这种方式保管钱款的每个理事应出一张从银行领得相应一份钱数的字据，事先款项必须根据理事会理事的人数分成相等的份数；在根据决议需要用钱时，如果他拒绝交出他所保管的那部分银行券，便可立即根据他所立的字据对他进行追究，只有在他归还了那部分银行券后，字据才可作废；这种字据应存放在保险柜或保险箱中，保险箱应交给非有关人员（非理事会理事）负责保管，只有当理事会全体理事在场时，保管人员才允许取出字据。

⑸为了支付或购置而从银行领出的款项，只有在理事会全体理事在场时，理事会才能支付。

三、基金的使用

⑴ 募集的资金的用途如下：资助所有举行罢工的城市和地方，清偿过去和现在罢工和同盟歇业期间积累的一切债务。对各城市的援助按现有失业人数的比例等量分配。这里也根据海船上当粮食快完的时候所实行的各取相等的一份的原则，不管工资水平的高低，对每个人的资助应当相等。虽然对于现在罢工和同盟歇业的参加者将一律给以资助，但是在将来将仅仅援助那些承认和支持群众运动的组织。

⑵ 必须建立调整劳动价格的部门，为此每月必须公布关于凡有工人参加群

众运动的一切生产部门所用的原料价格、劳动价格、成品出售价格和其他生产费用的账目。理事会根据这些资料公布关于企业主利润的资料，而且必须把所有能够从企业主那里得到的关于同生产有关的任何特别费用或补充费用的资料包括在内。劳动价格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整，并且相应地规定工资率。在农业部门也应该采取类似的办法。

⑶ 工人除了具有分享企业主的利润的不可争辩的权利之外，还具有另一种更加不可争辩的权利，即成为自己劳动的支配者的权利。为了这一点，而且为了更有效地调整工资，除了剥夺企业主因为有了剩余劳动力而得到的权力之外，群众运动的资金应该用于购置土地。土地以非理事会理事的个人的名义购置，并根据土质，根据个人租用或大合作社企业使用等不同用途分成大小不同的农场。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属于群众运动，不得转让。土地将按照公平合理的价格短期出租，在租借合同中有专门的条文规定，无力支付租金者立即剥夺租借权。根据合同的另一条规定，租借者必须将租金付给交接书(关于交接书下面将有说明)所规定的受托人。出面购置土地的人必须在交接书上签字，交接书规定租借人不向出面购置土地的人缴纳租金，而缴给当时群众运动理事会的理事。理事会理事应立写字据，保证在离职时如果不向理事会的继任人签具所收租金数目的交接书，每人应向两位被指定的不是购置土地的人员缴 5000 英镑的罚款；继任人应受同样的字据的约束。

⑷ 为了更好地保障工人成为自己劳动的支配者的权利，为了避免劳动市场劳动力过剩，委员会还建议你们投资开设作为群众运动财产的合作社工厂、作坊、货栈。在这些企业工作的人员，除了得到按照工资率规定的工资（这一点上面已经谈到）以外，还可得到企业出售产品的纯利润的一半；另一半利润应列为群众运动的收入。由工人选举的每个合作社企业的管理人员应当经过理事会的批准。每个企业的管理人员对采购和销售进行调整，每月向理事会提出关于采购、销售、支付、亏损或赢利的报告。当对于工人同管理人员之间的分歧提出有充分理由的申诉时，工人有权撤换管理人员，选举新的管理人员，但是需经总票数四分之三以上的大多数通过。管理人员必须把每个合作社企业纯利润的一半送交群众运动理事会。对于群众运动将来为合作社企业购置的财产，应该像对待地产一样，采取妥善保管的措施。”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委员会的报告到第二部分为止已在工人

议会星期三的会议上通过。参加制订这个群众运动行动纲领的委员会的有厄内斯特·琼斯、詹姆斯·芬伦、詹姆斯·威廉斯、阿伯拉罕·罗宾逊和詹姆斯·布莱。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3月10日

载于1854年3月2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39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希 腊 人 暴 动

引起巴黎和伦敦很大不安的苏丹希腊臣民的暴动，现在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人们认为，再度暴动的可能性还存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我们在仔细地阅读了有关整个事件的文件以后，得出了如下的坚定的看法：暴动者只能从品都斯山脉南坡的山地居民中得到补充；他们除了门的内哥罗自由逃民中的虔诚教徒，得不到土耳其其他基督教臣民的同情；特萨利亚平原的居民是还处在土耳其统治下唯一人口众多的希腊移民，他们怕自己的同胞比怕土耳其人更厉害。不应当忘记，这部分居民由于胆小怕事，甚至在希腊独立战争[97]时期也不敢暴动。其余一部分希腊居民估计不过 30 万人，散居在土耳其帝国的各个城市，他们得不到其他民族的基督徒的好感，以致凡是人民运动胜利的地方，如塞尔维亚和瓦拉几亚，所有希腊籍教士都被赶走，由本地牧师来接替他们。

虽然这次希腊人暴动本身一般来说意义并不大，但是从它使西方强国有了干涉土耳其政府同它的大多数欧洲臣民（其中希腊人只占 100 万，而信仰正教的其他民族却有 1000 万人）之间关系的借口这一点来说，它仍然具有意义。居住在希腊王国的希腊人以及居住在伊奥尼亚群岛受英国统治的希腊人，自然认为自己的民族职责就是在一切操希腊语的地方把土耳其人赶走，使特萨利

亚和伊皮罗斯并入希腊国家。让他们甚至幻想恢复拜占庭吧——虽然整个说来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民族，他们是不会相信这种幻想的。但是希腊人关于扩大民族国家和关于独立的这一切计划，在当时曾得到俄国的阴谋活动的支持（不久前被揭露的阿法纳西神甫的阴谋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受到山地强盗的宣扬，但没有得到平原农民的响应，——这一切计划同土耳其臣民的宗教权利问题没有任何关系，而人们却企图把这个问题扯进去。

我们从英国报纸以及舍夫茨别利勋爵在上院作的和蒙克顿·米耳恩斯先生在下院作的报告中得悉，英国政府部分地由于这次希腊居民的运动的缘故将采取措施来改善土耳其帝国基督教臣民的处境。在这个报告中清楚地指出，西方强国所追求的伟大目标，就是使土耳其境内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享有平等权利。这一点或者根本不意味着什么，或者意味着不论谁信哪一教，根本不分教别地赋予穆斯林和基督徒以政治权和公民权，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国家同教会、宗教同政治的完全分离。但是土耳其国家同所有东方国家一样，是以国家和教会、政治和宗教紧密交错而且几乎两位一体为基础的。对于土耳其帝国及其当权者来说，可兰经同是信仰和法律的源泉。但是在可兰经面前，能不能使正统教徒和异教徒、穆斯林和莱雅[①]享有平等权利呢？这实际上必然意味着用新的民法典来代替可兰经，换句话说，就是破坏土耳其社会的结构，在它的废墟上建立新的秩序。

另一方面，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和教会、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混为一体。在拜占庭帝国，国家

---

① 土耳其用语，从十九世纪初起通常指受压迫的非伊斯兰教居民。——译者注

和教会是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以致不叙述教会的历史，就不能叙述国家的历史。在俄国也是这样混为一体的，不过同拜占庭的情况相反，教会变成了国家的普通工具，变成了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按照土耳其人的东方概念，在奥斯曼帝国，拜占庭的神权政治可以发展到这种程度：小教区的教士同时是法官、村长、教师、遗嘱执行人、税吏和在民事生活中到处出头露面的受委托人，他不是小公务员，而是百事通。这里可以对土耳其人提出的主要责难，并不是他们限制了基督教教士的特权，相反地是在他们统治之下，这种无所不包的专制监护，这种教会监督和干涉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法耳梅赖耶尔先生在他的“东方来信”中十分开心地描述了一位正教神甫在听到他说天主教神甫没有任何世俗权力、不承担世俗职能后如何惊讶的情况。这位正教神甫惊呼：“那末我们天主教弟兄们用什么来填满自己的时间呢？”

从上述一切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土耳其实施新的民法典，即同宗教完全没有关系的并以国家和教会完全分离为基础的民法典，不仅意味着废除伊斯兰教，而且意味着消灭在土耳其帝国存在的那种形式的正教教会。难道会有人幼稚到真的相信，似乎参加英国现政府的胆怯而软弱的反动派会想到要在土耳其这样的国家里担负起实现彻底的社会改革这样巨大的任务吗？这是十分荒谬的。他们只可能有一个目的，这就是自吹自擂地欺骗英国人民和欧洲人民。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3月10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3月29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39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98]

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了，而且据说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作战计划。这就是耗尽瓦拉几亚的最后一些资源的 3 个月进军中所作的努力和饱尝艰险的光荣结局。这就是看来完全忽视了最基本的战略原则而莫名其妙地向小瓦拉几亚进军的战果。为了夺取土军在多瑙河左岸所控制的唯一的桥头堡卡拉法特，俄军把自己的主力部队集中在极右翼，从而使兵力已经削弱的中央和左翼在遭到敌人任何攻击时完全没有掩护，并且对于交通线和退路表现了战史上从未有过的漠不关心。奥美尔─帕沙没有利用俄军的这一失策，这只能说是因为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从中干预。至于俄军为什么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不得不可耻地撤退，这一点我现在打算来谈谈。

我们所以说这次撤退是可耻的，是因为在进攻开始时曾大肆喧嚷，结果只占领了一个有威胁性的阵地，而最后则偃旗息鼓，乖乖地撤退了，甚至没有试图进行一次认真的战斗，其次，是因为一连串的错误和荒谬行动所造成的战局，除了使将领有可能相信自己当了傻瓜以外，毫无所得；这一切是最可耻的。

现在我们来谈问题的实质。

1853 年年底俄军在瓦拉几亚、莫尔达维亚、贝萨拉比亚有以下的部队：

(1) 第四军（丹年别尔格军）：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4个炮兵旅；除去伤亡，共有45000人；

(2) 第五军（利迭尔斯军）的一部分：1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2个炮兵旅，总共有15000人；

(3) 第三军（奥斯坦—萨肯军）：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4个炮兵旅，总共55000人。

除了非战斗人员和利迭尔斯军驻在敖德萨近郊的一个师（它必须执行守备勤务，所以不应把它计算在内）以外，共约115000人。

到12月初，多瑙河各公国的俄国部队只有由丹年别尔格和利迭尔斯指挥的部队。奥斯坦—萨肯军的移近，应该是大规模集中兵力向卡拉法特进攻的信号。奥斯坦—萨肯在布格河和普鲁特河的阵地应由从莫斯科开出、正在途中的第六军（切奥达也夫军）接替。在同第六军会师以后，多瑙河军团约有17万人，如果西南各省的新兵能够直接派往战区，那末它将会更加增强。

但是俄国的总司令认为，只要115000—120000人就足以防守多瑙河沿岸从布来洛夫到尼科波尔的整条战线，并且可以分出足够的兵力集中在极右翼去进攻卡拉法特。

当这个计划在12月底以前开始执行的时候，卡拉法特的守军恐怕不超过10000—12000人，在维丁还有8000人，但是指望他们的支援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必须在雨季渡过水势湍急的河流。然而由于俄军移动迟缓，哥尔查科夫公爵优柔寡断，更主要的是由于卡拉法特的司令官伊斯马伊耳—帕沙的勇敢、刚毅，土军得以向这个受威胁的地点调集4万人，把卡拉法特从一个无力抵抗两倍于守军兵力的敌军的攻击的普通桥头阵地，变成一个能够至少掩蔽3万人并抵御敌人一切袭击（除了正规围攻以外）的要塞。

有句话说得很对，野战工事构筑者的最大胜利就是迫使敌人构筑堑壕。如果俄军实际上没有这样做，那只是因为他们知道即使用这些最极端的手段也不可能在规定期限夺下卡拉法特。从此，卡拉法特将和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崩采耳维茨的营垒、托列斯－柴德拉斯的工事和卡尔大公在维罗那城外的堑壕[99]那样的野战筑城的巨大成就一起作为军事学术的典范而载入史册。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俄军进攻所采取的手段。他们运到克拉约瓦的攻城炮的总数可以证明，他们的的确确想夺取卡拉法特。我们顺便指出，用军事观点无法理解而只能用外交影响来解释的事情之一，就是奥美尔－帕沙听任俄军把火炮调来调去而不加阻挠。俄军现在唯一的需要是要有足够的兵力以击退土军，保卫堑壕和炮队，并在缺口被打开时立刻向缺口强攻。这里，伊斯马伊耳－帕沙又采取了一个有毅力、有才干的统帅所应采取的行动。1 月 6 日他在切塔特的出击，他使兵力占优势的俄军终于失败的勇猛攻势，他在俄军继续集中兵力和俄军的优势兵力把他完全封锁在小小的多瑙河半岛以前一直反复采取的那种进攻行动，——总之，他对俄军正面上各个地点进行集中攻击以各个歼灭（只要力所能及）敌人的防御方法，正是像他这样处境的统帅所应当做的，并且同奥美尔－帕沙在沃耳特尼察采取的消极防御，或在多瑙河下游驻守的整个时期内的懈怠不振、毫无作为形成有趣的对照。因为，如果奥美尔－帕沙也曾在什么地方采取过规模不大的进攻，——看来，这些进攻从来不是适可而止，而是盲目地、顽固地在同一地点继续好几天，甚至明知不会有什么结果却仍然如此，——那末当需要调 4—6 万人渡过多瑙河的时候，这些小规模的进攻就算不上什么了。

到 1 月底俄军终于在卡拉法特周围集中完毕。在平地上他们

占了明显的优势，因而那里一定有3—4万人。从115000人中除去3—4万人，另外再除去防守布来洛夫到海边一线所必需的2万或3万人，在整个大瓦拉几亚连守备部队在内还剩下将近50000—65000人，这支军队远不足以防守这样一条漫长的战线和**与战线平行**、在战线后面很近的交通线。甚至以不到65000人的军队对某个据点进行猛攻，也能够使所有这些分散的俄军最后彻底失败，夺得俄国的所有弹药库。奥美尔- 帕沙迟早会说明他为什么放过了这个机会。

总之，俄军虽然尽了自己一切努力，也不过勉强地在卡拉法特前面集中了足以击退土军前哨、然而不足以进攻要塞本身的兵力。他们几乎用了5个星期的时间才取得了这一暂时的、虚假的战绩。工程长官施尔德尔接到了攻占卡拉法特的直接命令。他来了，看到了并决定，在切奥达也夫没有到达因而不能从中央和左翼调来生力军以前，不采取任何行动。

俄军5个星期来一直处于翼侧和后方完全暴露的危险境地，似乎是有意诱敌进攻，实际上他们对于这种进攻连一分钟也抵抗不住。5个星期以来奥美尔- 帕沙一直在威胁着俄军的翼侧和后方的阵地上一动不动，尽管他从这个阵地上不用眼镜和望远镜就可以看到俄军的弱点，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的确，在盟国庇护下进行的这一套现代作战方法是无法理解的！

突然有消息传到伦敦说，俄军从卡拉法特全部撤退了。“泰晤士报”叫道：啊！这是我们同盟国奥地利人的胜利，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军队集中在俄军的后方特兰西瓦尼亚。自然，这是同奥地利结成的光荣的同盟的胜利，也是阿伯丁勋爵的光荣的政策的胜利。阿伯丁万岁！但是在第二天却出现了奥地利真正的声明，说

同奥地利不存在任何同盟，奥地利人至今没有说过，而且看来直到现在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支军队派到现在的驻地去。因此，现在大家根本弄不清俄军撤退的原因。

现在有人告诉我们，俄军试图像 1828—1829 年那样在布来洛夫和加拉兹之间的地区渡到多瑙河对岸，直扑阿德里安堡。如果俄军同英法分舰队之间没有互相充分的谅解，这种进军在战略上是不可能的。我们还听说俄军撤退的另一个原因。据说命令切奥达也夫停止进军，是为了在敖德萨以北建立一个 3—4 万人的兵营。如果这是事实，那末他就既不能替换普鲁特河和塞勒特河地区的任何部队，也不能增援卡拉法特的哥尔查科夫。因此，哥尔查科夫公爵就只得像他来时那样秩序井然地撤退了。俄军向卡拉法特进军的一出伟大的悲喜剧就是这样结束了[①]。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3 月 13 日

载于 1854 年 3 月 18 日“人民报”第 98 号，并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3 月 3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40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并根据“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① “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刊登的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因此，我们的不列颠伙伴完全不了解俄军撤退的原因。究竟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很简单：法国和不列颠的军队正开往君士坦丁堡。从那里派军队到敖德萨或贝萨拉比亚去切断俄军的交通线是最轻而易举的了。

不管盟国的真正意图怎样没有恶意，外来的压力却会迫使它认真地行动起来。显然，哥尔查科夫并不相信西方军队是在执行纯粹外交的使命。他甚至可能完全相信英国，但是对于法国他就不可能这样信任了。他甚至可能相信所有内阁，但是他不可能相信将军们。在当地只有土军的时候，他可以采取冒险的侧敌行军，但是在法国和不列颠的军队可能逼近和威胁他的翼侧的时候，他就不能不更严肃慎重地对待问题了。因此命令切奥达也夫停止进军是为了叫他在敖德萨以北建立一个 3—4 万人的兵营。因此，他不可能把军队调到普鲁特河或塞勒特河地区。因此，决不能期望有任何部队来增援在卡拉法特的哥尔查科夫。因此，在这个地方进行强攻是不可能的。因此，哥尔查科夫公爵不得不像来时那样秩序井然地撤退了。俄军向卡拉法特进军的一出伟大的悲喜剧就是这样结束了”。——编者注

卡·马克思

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

1854年3月21日星期二于伦敦

目前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大臣们被迫公布了他们在上台后最初3个月中同俄皇来往的秘密公文[100]以及关于1844年沙皇同阿伯丁勋爵会见的备忘录，阿伯丁勋爵是为了向“圣彼得堡报”[101]应战才公布这个备忘录的。

现在我就从分析涅谢尔罗迭伯爵给英国政府的“备忘录”开始，这个备忘录是根据1844年6月俄皇访英之后的通报写成的。备忘录指出，奥斯曼帝国的现状“最符合于保持和平的共同利益”；英国和俄国在这个基础上已经达成协议，并且共同努力来维持这个status quo〔状态〕。“要达到这个目的，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打扰土耳其政府，没有必要就不要用外交上的争论去惊动它，非到万不得已就不要干涉它的内部事务。”但是怎样才能够有效地执行这个“不干涉制度”呢？第一，大不列颠不应当妨碍俄国认为必要时对俄土条约所作的解释，相反地应当促使土耳其根据俄国对条约所作的解释来行动；第二，应当使俄国能够“经常地”干预苏丹和他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总之，对土耳其政府的“不干涉制度”就等于俄国的参与制度。但是这个奇怪的建议表达得远不是这样坦率。

看起来备忘录说的是“一切大国”，但是实际上分明在暗示，除了俄国和英国之外，不存在其他任何大国。备忘录说，法国“**必须**根据圣彼得堡和伦敦之间取得协议的那种行动方式来行动”。奥地利被描绘成俄国的一个简单附属物，既说不上独立存在，也没有什么确定的政策，有的只是“通过**完全一致**的原则”同俄国的政策保持“紧密联系”的政策。普鲁士被认为是不值一提的区区小国，因而也就根本没有被提到。因此所谓“一切大国”无非是对圣彼得堡内阁和伦敦内阁的一种修辞性的说法，而一切大国应当据以联合起来的行动方式也无非是由圣彼得堡规定而伦敦必须遵循的行动方式。备忘录中说：

“土耳其政府总想摆脱它在同其他国家缔结的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它希望不受任何惩罚地作到这一点，因为它指望各国内阁之间相互竞争。它认为，如果它不执行它对某一内阁的义务，其他内阁就会站到它的方面来，使它摆脱任何责任。

重要的就是不支持土耳其政府的这种错误打算。每当它不执行自己对某大国的义务时，其他一切大国的共同利益要求——迫使它认识自己的错误，严肃地促使它对于向它提出正当要求的内阁给以满足。**一旦土耳其政府看到其他内阁都不支持它，它也就会让步，这时所产生的争论将通过协商得到解决而不会引起任何冲突。**”

这就是俄国为了要求英国帮助自己迫使土耳其根据旧条约作出新让步而向英国提出的公式。

“根据目前欧洲人们的思想情绪，各国内阁对于土耳其基督教居民所遭受的残酷压迫和宗教迫害不能漠然置之。应当经常使奥斯曼的大臣们认识到这个真理，并使他们确信，只有在他们对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采取宽大而温和的态度时，他们才能指望得到各大国的友谊和支持。

遵循这些原则的外国代表们，应当本着彼此完全一致的精神行事。他们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照会时，应当使这些照会表现出真正的一致性，但是仍然

不采取命令的形式。”

俄国就这样温和地提示英国，要它支持自己对土耳其基督徒实行**宗教保护**的要求。

俄国在如此叙述了自己的“不干涉政策”的前提之后，就不能向自己的亲密朋友隐讳：正是这种不干涉要比任何侵略政策更加危险，它会非常可怕地促使奥斯曼帝国现有的“分解成分”增加起来，因此有朝一日“**难以预料的情况**会加速奥斯曼帝国的**崩溃**，那时各友好内阁就无力阻止这种崩溃”。接着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旦这种难以预料的情况使土耳其遭到不可挽回的灾难，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备忘录指出，一旦土耳其遭到不可避免的崩溃的威胁，唯一必须做的就是**英国和俄国“在采取行动之前事先达成协议”**。备忘录肯定地说，对于这一点，“在俄皇最近访问伦敦期间已经原则上取得一致了”（经过这位专制君主同威灵顿公爵、罗伯特·皮尔爵士和阿伯丁伯爵长时间的会商）。结果，**“俄英两国承认约定的义务**：一旦土耳其发生**某种突然事件，双方应事先就共同行动达成协议”**。

这个**约定的义务**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第一，俄英两国应当事先就**瓜分土耳其**问题取得相互谅解；第二，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应当同俄国和奥地利即所谓俄国的 alter ego〔第二个我〕结成神圣同盟来反对法国，使法国“**不得不**”，也就是被迫按照它们的目的来行动。这种相互谅解的必然结果就是英国被卷入对法的流血战争，这样就会使俄国放手在土耳其实行自己的政策。

备忘录非常坚持地一次又一次地强调那些能够加速土耳其崩溃的“不可预料的情况”。但是在备忘录的末尾，这些隐晦的词句不见了，而代之以比较明确的说法：“如果我们看到奥斯曼帝国要

崩溃的话”，英国同俄国就应该事先达成协议等等…… 这样一来，唯一难以预料的情况就是俄国关于奥斯曼帝国现在要崩溃了这种难以预料的声明。约定的义务的主要结果就是使俄国有权随时看到土耳其的即将到来的灾难，并迫使英国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就这种不可避免的崩溃进行谈判。

因此，在备忘录写好十年以后，英国按规定的形式得到通知说，奥斯曼帝国的生命力已经枯竭了，现在已经到了事先就排除法国的问题，即背着法国和土耳其来策划阴谋的问题达成协议的时候了。由于这个建议，也就出现了圣彼得堡和联合内阁之间来往的一系列秘密文件。

1853 年 1 月 11 日不列颠驻圣彼得堡大使乔·汉·西摩尔爵士向当时的外交大臣约·罗素勋爵送去了第一个秘密报告。1 月 9 日晚间，他“荣幸地”在叶列娜大公妃的宫中见到了俄皇，叶列娜大公妃敬请爵士夫人和西摩尔勋爵来同皇室会见。俄皇和蔼可亲地走到他跟前，表示对联合内阁成立的消息非常满意，并祝贺联合内阁长期执政；他请大使向年迈的阿伯丁转达他的祝贺，并请大使告诉约翰·罗素勋爵：

“现在最重要的是两国政府——英国政府和我，我和英国政府——要保持最好的关系，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像目前这么必要。”

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话是在 1853 年 1 月讲的，恰恰在这个时候，奥地利，也就是备忘录所说的，“在土耳其问题上同俄国原则上完全一致”的奥地利，在门的内哥罗问题上公开地兴风作浪了。

沙皇说：“只要**我们**达成协议，别人怎么想，怎么做，都无关紧要。”他以假慈悲的口吻继续说道：“现在土耳其的局势非常危急，这可能会给我们大家招来很多麻烦。”

沙皇讲了这些话之后，和蔼可亲地向汉·西摩尔爵士伸出手，仿佛要向他告别。但是汉密尔顿爵士“立即想到话还没有讲完”，于是鼓起“很大的勇气”谦恭地请求专制君主“就土耳其问题稍微详细地谈一谈”。

汉密尔顿爵士指出：“皇帝的谈话和态度尽管依然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但是表明皇帝陛下不打算同我谈论他**准备在南方举行的示威问题**。”

必须指出，汉密尔顿爵士在1853年1月7日的报告里就已经告诉不列颠政府：

“第五 corps d’armée〔军〕已经奉命向多瑙河各省的边境推进，而第四军将奉命整装待发。”

他在1853年1月8日的报告中说，涅谢尔罗迭曾经把自己对于“必须用武力示威来支持俄国外交”的意见告诉他。汉密尔顿爵士在报告中继续说：

“皇帝的讲话开始时还拘谨，但是后来便直言不讳无拘无束地谈论起来，他说：‘现在土耳其的情况混乱得很。看来国家本身已经处于灭亡（menace ruine）的前夜。它的崩溃将是巨大的不幸，现在十分重要的是，英国和俄国应就这个问题达成充分的协议，两强国的任何一方，没有通知对方就不采取决定性的措施。’

皇帝提高了声音说：‘瞧，在我们手中的是一个病人，一个病得很重的人！我坦白地告诉您，如果在最近的某一天这个病人死去，特别是在一切必需的准备工作做好以前死去，这将是巨大的不幸。但是现在还不是同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俄国熊认为病人已经奄奄一息了，**应当**吃掉他。汉密尔顿爵士对于俄国医生的这种“难以预料的”诊断有些吃惊，他毕恭毕敬地回答道：

“仁慈的陛下，请允许我再讲一点。陛下说，这是一个病人，完全正确；但是请陛下恕我冒昧地说，宽宏大量和身强力壮的人应当怜悯病人和弱者。”

不列颠大使感到自慰，因为他觉得他同意沙皇对于土耳其和病症的看法，他要求对病人采取宽大态度等等“至少没有使皇帝感到难堪”。汉·西摩尔爵士关于他第一次同沙皇秘密谈话的报告就是这样结尾的；虽然在这次vis-à-vis〔会见〕中他表现出是一个十足的内侍臣，但是他还是有足够的理智来用下面的话提醒自己的内阁，他说：

“提出这样一类的任何一个建议的目的，只是要使对方进行左右为难的抉择。我认为这种抉择就在于：如果女王陛下政府不同俄国就土耳其突然崩溃时应当采取的措施问题达成协议，那末后果一旦对英国不利，女王陛下政府就更没有理由来埋怨别人。反之，如果女王陛下政府参加讨论这些可能性，那末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促使灾难发生的因素，而女王陛下政府最关心的却是尽量延缓这种灾难的发生。”

汉密尔顿爵士用以下警句似的箴言来结束自己的报告：

“根据上面所说的一切，看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英国来说，最好是同俄国取得密切的协议以阻止土耳其的崩溃；而对于俄国来说，最好是这种协议能造成足以引起土耳其崩溃的事件。”

乔·汉·西摩尔爵士在1853年1月22日给约·罗素勋爵的报告中说，1月14日他又同沙皇进行了秘密谈话，这次沙皇“单独接见他”。专制君主同意给英国大使讲一讲东方问题。对于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的理想和计划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是他并不赞成。他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对俄国来讲也许只存在一个危险，这就是进一步扩大它本来已经过于广阔的领土。（读者该记得，我在引证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的报告的摘要时已经提出过这一点。）土耳其的status quo〔状态〕最符合俄国的利益。一方面，土

耳其人已经丧失了军事上的进取精神；另一方面，“这个国家还有足够力量，或者说**到目前为止还有**足够力量来保持自己的独立和保证自己得到别国的尊重”。但是在这个帝国内住有几百万基督徒，他必须关心他们，尽管这个任务有时是困难的，“棘手的”。他的权利、他的义务和他的信仰都同时要求他这样做。后来沙皇突然转到他那个关于一个病人、一个病得很重的人的比喻上来，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个病人“在他们手中突然死去”（de leur échapper〔从他们身旁消失〕）。“如果**在某一未来计划制订好以前**突然发生灾难，那就会同时发生混乱、骚动和不可避免的欧洲战争。”

沙皇在对奥斯曼帝国的必然死亡作了这种新的暗示之后，紧接着又一次要求英国——根据“约定的义务”——同俄国一道来考虑遗产问题。但是沙皇不暴露自己的未来“计划”，而宁愿以议会的用语来指出瓜分时应当注意的主要之点。

“我想把您当做朋友和**君子**来谈一谈。如果英国和我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那末其他问题对于我是不关重要的。别人怎么做，怎么想，对我都无所谓。因此我要开诚布公地告诉您，如果英国打算最近在君士坦丁堡建立自己的统治，我是不允许的。我并不是说你们一定有这种打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直率地讲出来。我自己也愿意保证不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统治，——当然是作为永久的占领者，——至于作为暂时的保护者，我是不拒绝的。如果不事先采取措施，如果一切凭偶然，那末情势可能迫使我占领君士坦丁堡。”

这样，英国就被禁止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统治。而沙皇却可以做，即使不是作为永久的占领者，至少也是作为暂时的保护者。不列颠大使感谢皇帝陛下这种直率的解释。然后尼古拉援引了他以前同威灵顿公爵的谈话——这次谈话的记述或者说谈话概要已写入1844年的备忘录。谈到沙皇对圣地的要求这个迫切问题时，不

列颠大使表示了这样的担心：

“一旦出现俄国军队就会有两种后果：或者是法国可能进行反示威，或者是（这更加严重）基督教居民举行暴动来反对本来就因秩序混乱和财政危机严重而削弱的苏丹政权。皇帝向我保证，到目前为止他的军队没有前进一步（n' ont pas bougé）；而且他希望他的军队也不需要前进一步。**谈到法国远征苏丹领土**，皇帝陛下暗示，这种步骤会立即引起危机；荣誉感会迫使他毫不犹豫地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开赴土耳其；如果这样的行动方式使土耳其苏丹（le Grand Turc）遭到崩溃，他只能对这种后果表示遗憾，但是仍然认为这是迫于不得已而做的。”

这样，沙皇现在就为英国出了一个当前就要研究的题目：英国应当制订一个消灭奥斯曼帝国的“未来计划”，“并就取代现行制度的新制度问题事先达成协议”。他鼓励自己的学生，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好，还能够得到奖赏，并以父亲般的口吻谆谆叮咛：

“如果有可能用不破坏普遍和平的办法，也就是由两个最关心土耳其命运的主要政府采取预防的措施来填补由于欧洲伊斯兰教统治的消失所形成的空白，那将是十九世纪的文明的伟大胜利。”

在沙皇向英国提出这种要求之后，罗素勋爵出场了，他于1853年2月9日用密件答复了沙皇。如果约翰勋爵对沙皇的阴险计划（利用英国同沙皇秘密谈判将来瓜分盟国的问题而置英国于一种令人怀疑的处境）有充分了解，他就会也像沙皇那样，只限于口头上答复布隆诺夫男爵，而不是向圣彼得堡发去正式的政府文件。在秘密文件提交议院以前，“泰晤士报”曾把约翰勋爵的文件说成是对沙皇的建议的有力的、“愤怒的驳复”。可是“泰晤士报”在昨天收回了对罗素勋爵的赞扬，并且声明：“那个文件不值得赞扬，这种赞扬是因为消息不确切而造成的。”约翰勋爵使“泰晤士报”感到恼火的是他在星期五下院会议上的声明，他说他没

有向**这家**报纸提供消息的习惯，关于那篇影射他给乔·汉·西摩尔爵士的复信的文章，他只是在文章发表三天以后才读到。

凡是了解1814年以后所有英国大臣们（甚至包括坎宁在内）同俄国讲话时的那种卑躬屈膝、阿谀奉迎的口吻的人一定会认为，约翰勋爵的这份密件可以算是这个矮子的英雄行为。

因为这个文件是对历史的卓越贡献，它能够说明谈判的进程，所以，如果读者不嫌，我就把它 in extenso〔全部〕引录出来。

约翰·罗素勋爵致乔·汉·西摩尔爵士

（机　　密）

1853年2月9日于外交部

阁下！

您于1月22日寄来的秘密报告已经收到并呈交女王。像以往一样，这次女王陛下也满意地注意到皇帝陛下的温和、坦率和友好愿望。女王陛下命我以同样温和、真诚和友好的态度来讨论问题。皇帝陛下所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鉴于土耳其帝国可能崩溃，甚至即将崩溃，也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在未来计划制订好以前突然发生灾难，那就会同时发生混乱、骚动和不可避免的欧洲战争，与其如此，那末预先采取一些对策岂不更好。皇帝陛下说："这就是我希望您提请贵国政府注意的一点。"女王陛下政府在研究这个重要问题时首先根据以下的考虑：过去还没有发生任何实际危机使我们必须解决这一广泛的欧洲问题。关于圣地的争论曾经发生过，但是这种争论同土耳其内部管理问题没有关系，关系更多的是俄国和法国而不是土耳其政府。土耳其人进攻门的内哥罗造成了奥土关系的某些不和；而这里涉及的也只是威胁奥地利边界的危险，而不是威胁苏丹权力和安全的危险；总之，没有充分根据向苏丹宣布，他没有能力维持国内秩序或保持同邻邦的友好关系。其次，女王陛下政府应当指出，不能肯定地说，什么时候将发生这种事件。当威廉三世和路易十四签订条约来确定西班牙查理二世死后的继承制度时，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只是针对为时不远的事件。西班牙君主的罹病和任何一个人生命的必然完结都足使预定的事件无疑地很快地到来。西班牙国王的死亡决没有因

瓜分西班牙的条约而提前。关于上个世纪所签订的预先决定托斯卡纳在梅迪契家族的最后君主死后的命运的协议，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奥斯曼帝国崩溃的可能性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这种崩溃也许会在20年、50年或100年之后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预先就分配苏丹所统治的领土，与同样鼓舞着俄国皇帝和大不列颠女王的那种对苏丹的友好情感未必相称**。除了上述考虑以外，还应当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必然会加速它所针对的那些情况的凑合。如果不让奥地利和法国知道这个协议，那是不公正的，而且这种隐瞒行为也是同防止欧洲战争这一任务不相容的。事实上，皇帝陛下也不可能有这种隐瞒的打算。应当认为，只要大不列颠和俄国就适当的行动方式达成协议，并且想要使它生效，它们就会把自己的打算通知欧洲各大国。这样签订出来并且这样通知欧洲各大国的协议是不能长久保持秘密的；而关于这种协议的消息一传出来，除了使苏丹感到不安和不愉快而外，还将煽动他的所有敌人加紧采取强制行动，进行更顽强的斗争。他们在斗争中确信，他们一定获得最后胜利，而苏丹的将领和军队则会感到，任何暂时的胜利都不能够挽救他们的事业而不致最后垮台。现在人们担心的那种无政府状态正是会这样造成并且日趋严重的，而病人的朋友们的预见将成为病人死亡的原因。对于执行任何这一类协议所带来的危险，女王陛下政府恐怕用不着再作更多的叙述。“王位继承权战争”的例子充分证明，这种协议在人们为强烈诱惑力驱使而加以破坏的时候是不会受到多大尊重的。由于俄国人民长期以来的要求以及欧洲国家的竞争，俄国皇帝作为君士坦丁堡的暂时保护者而不是作为永久占领者的这种地位却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最后的占领者不管是谁，恐怕都不会满意穆罕默德二世后裔们那种无所事事和委靡不振的作为的。君士坦丁堡的占领者由于控制着地中海和黑海的大门，对于欧洲事务自然具有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用来为俄国谋利益；也可以用来控制和限制它的实力。皇帝陛下正确而英明地说道：“我的国家幅员广大，各方面都很美满，因此对我来讲，如果希望再扩大现有的领土和实力，那就是愚蠢的。”他接着说：“相反，对我们说来巨大的危险，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进一步扩大本来就已经很大的帝国版图。但是代替土耳其政府的一个强盛而好大喜功的国家可能会使俄国皇帝或者他的继承人必须进行战争。”为了防止欧战而提出的手段可能正是引起欧战的手段，因为无论英国、法国，可能还有奥地利，都不会容忍君士坦丁堡永远留在俄国手里。至于大不列颠，那末女王陛下政府

声明，它没有任何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打算或愿望，这是永远不会变更的。皇帝陛下可以完全相信这一点。政府还愿意提出这样的保证：如果事先没有同俄国皇帝磋商，决不签订任何关于土耳其崩溃时应采取的措施的协议。总之，女王陛下政府完全相信，皇帝陛下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政策是最英明、最无私并且对欧洲最有益不过的政策，这个政策使他比起那些从完全不正当的侵略和瞬息的荣誉中寻求不朽业绩的最显赫的君主更加扬名于世。要使这个政策取得胜利，最好是尽最大的克制对待土耳其；最好是使欧洲各大国向土耳其提出的各种要求成为友好谈判的对象，而不是成为无条件的要求的对象；尽量避免反苏丹的陆海军示威；对于涉及土耳其和属于土耳其政府职权范围的问题的意见分歧，要根据大国相互的协议来解决，而不要强迫弱小的土耳其政府接受。除了预先提醒这些问题以外，女王陛下政府还要补充它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劝告苏丹根据欧洲各文明民族所普遍采用的公正原则和宗教自由原则来对待本国的基督教臣民。土耳其政府愈是实行平等的法律和公正的管理，皇帝陛下就愈认为没有必要在实际上行使那种他认为非常麻烦和不便的专有的保护权，虽然毫无疑问，行使这种权利是义不容辞的，是条约规定的。您可以把这份密件宣读给涅谢尔罗迭伯爵，如果认为适当的话，甚至可以把密件的副本交给皇帝本人。在这种情况下，您在转交副本时，应该向皇帝陛下保证女王陛下对他的友谊和信赖——他的行动方式所理应赢得的友谊和信赖。

您的忠诚的

约·罗素

我的叙述不得不在下一篇文章中结束[①]。但是在结束本文以前，我想供给你们一些广大公众无法弄到的最新材料，作为我以前所说的关于普鲁士的立场和计划问题的补充。

当俄国同英法同盟之间的冲突达到某种顶点时，尼古拉皇帝给自己在柏林的内弟[②]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虽然法国和英国能够在海上使他遭受某些损失，但是他在陆上不怕它们，因为到

① 见本卷第160—177页。——编者注

② 即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4 月底他就能准备出动 60 万大军。其中 20 万他准备交给弗里德里希—威廉支配，只要后者答应进军巴黎，推翻路易—拿破仑。愚蠢的国王对这个计划是如此热衷，以致**曼托伊费尔**为了劝止他不要接受这个建议竟花了 3 天的时间。这是关于国王。

至于**冯·曼托伊费尔**先生这位普鲁士资产阶级引以自豪的“伟人”本人，只要我们看了他给普鲁士驻伦敦大使本生所发的秘密指令，就对这位人物的全貌了如指掌了，他的这些指令正是在接到上面所说的俄国来信的时候发出的，并且落到了我的手里，虽然落到我手里的途径与我的私人信件落到本生手里的途径是完全不同的[102]。这些指令由于无耻的模棱两可的笔调暴露了这个学究兼军士的真面目，指令的内容大致如下：

“要好好地看一看刮的是什么风。如果您看到英国同法国结成紧密同盟并下定决心进行战争，那您就要坚持土耳其的‘完整和独立’。如果您看到英国在政策上摇摆不定，无意进行战争，那您为了国王即我的和您的君主的荣誉和尊严，就要勇敢地投入争吵。”

瞧，俄国专制君主把普鲁士看做一个区区小国不是很正确吗？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3 月 21 日

载于 1854 年 4 月 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45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

1854年3月24日星期五于伦敦

如果总的说来，约翰·罗素勋爵的密件①可以看作是对沙皇的建议——就可能发生的瓜分土耳其问题事先取得协议——的婉言谢绝，那末它毕竟包含了一些非常奇特的地方，我想请读者加以注意。约翰勋爵写道：

“**没有充分根据向苏丹宣布**，他没有能力维持国内秩序或保持同邻邦的友好关系。”

但是，在汉·西摩尔爵士的秘密报告中，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沙皇曾建议向苏丹宣布类似的东西。因此，我们只好假定，或者是罗素勋爵假装反对这个步骤，而实际上自己要提示别人这样做，或者是汉密尔顿爵士的某些秘密报告被压下了，没有收集到提交议会的文件中去。尤其令人怀疑的是，仅仅16天以后，即1853年2月25日，克拉伦登勋爵在就任外交大臣时给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发出了如下指令：

“阁下，请用谨慎而又不触犯苏丹尊严的态度开诚布公地向苏丹说明，是哪些原因使女王陛下政府担心奥斯曼帝国目前莫不是处于特别危险的境地。

① 见本卷第156—158页。——编者注

外国的要求有增无已，而土耳其政府又没有能力满足或者不愿意满足这些要求，**土耳其内政非常糟糕，土耳其执行机关日益软弱无能**，这一切使得它的盟国近来改用了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语调。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可能引起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的普遍暴动并成为对帝国的独立和完整的致命威胁，这将是女王陛下政府深感遗憾的一场灾难，女王陛下政府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一点通知土耳其政府，但**某些**欧洲大国认为这种灾难是可能的并且已经临近。”（见关于正教教会和天主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蓝皮书第 1 卷第 31、32 页）

然而，难道这不是英国明确地向苏丹“**宣布**”，“他没有能力维持国内秩序或保持同邻邦的友好关系”吗？沙皇曾经非常不客气地对汉密尔顿爵士说，他**不允许**英国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统治，但他自己却打算在那里建立统治，即使不是作为**永久占领者**，至少也要作为暂时保护者。约翰勋爵对这个横蛮无礼的声明如何回答呢？他以大不列颠的名义否认有“任何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打算或愿望”。他没有要求沙皇提供这种保证。

罗素说：“由于俄国人民长期以来的要求，以及欧洲国家的竞争，俄国皇帝作为君士坦丁堡的暂时保护者而不是作为永久占领者的这种地位却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危险。”

欧洲国家的竞争，而不是英国的反对！至于英国，它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然而约翰·罗素勋爵不敢用俄国对英国说话时所用的口吻对俄国说话，——“如果君士坦丁堡**永久**在俄国手里”，英国“**是不会满意的**”。这样说来，如果君士坦丁堡**暂时**处在俄国手里，那它是会满意的。换句话说，英国完全同意沙皇本人所提出的建议。它不容许那些沙皇本人拒绝去做的事情，但是准备容忍沙皇打算去做的事情。

约翰·罗素勋爵不“满意”把沙皇作为可能的保护者安置在

君士坦丁堡，却用英国政府的名义声明，“如果**事先**没有”同俄国“磋商，英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关于土耳其崩溃时应采取的措施的协议”。换句话说，尽管沙皇向汉·西摩尔爵士说过，他**已经**同奥地利签订协议，而事先并没有将此事通知英国，但是英国却保证在同法国签订协议以前一定同俄国磋商。

约翰勋爵说道：“总之，俄皇陛下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政策是最英明，最无私并且对欧洲最有益不过的政策。”

哥萨克陛下始终不渝地奉行的正是他即位时就已宣告的政策，也就是自由主义者约翰勋爵现在宣布为多么无私，对欧洲多么有益的政策。

在目前东方的纠纷中，明显而主要的争论之点就是，俄国要求对奥斯曼帝国境内信奉正教的基督徒实行宗教保护。沙皇决不隐讳自己的要求，他直截了当地对汉密尔顿爵士说，“保护这几百万基督徒的权利是条约规定属于他的”，他“一直温和而谨慎地行使着这种权利”，这使他“有时承担很不便的义务”。约翰·罗素勋爵是否向他暗示过，这种条约并不存在，沙皇没有这种权利，他无权干涉土耳其正教臣民的事务，就像英国无权干涉俄国新教臣民的事务或者法国无权干涉大不列颠的爱尔兰人的事务一样呢？我们让罗素本人来说明吧：

“女王陛下政府还要补充它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劝告苏丹根据公正原则和宗教自由原则来对待本国的基督教臣民…… 土耳其政府愈实行平等的法律和公正的管理，俄国皇帝就愈认为没有必要在实际上行使那种他认为非常麻烦和不便的**专有的保护权**，虽然毫无疑问，行使这种权利**是义不容辞的，是条约规定的**。”

俄国对土耳其臣民的“**专有的保护权**”**是条约规定的**！这是

毫无疑问的，——约翰勋爵说。而约翰勋爵是诚实人；约翰勋爵是用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说的，而且约翰勋爵是向专制君主本人说的。英国同俄国还有什么争执呢？为什么要把所得税增加一倍呢？为什么要用备战来惊动全世界呢？约翰勋爵怎能在几个星期以前在议会中以卡桑德拉①的精神发表演说，那样装腔作势并且傲慢地痛骂沙皇背信弃义和阴谋狡诈呢?难道不是他向皇帝说,皇帝要求**专有的保护权**“是义不容辞的，是条约规定的”吗？

联合内阁可以埋怨的不是沙皇的不坦率或者过分矜持，恰恰相反，而是他的无耻的坦率，因为他曾坦率地对大臣们倾诉衷肠，使他们成为执行自己最隐秘的计划的心腹，从而把唐宁街的内阁变成涅瓦大街皇帝陛下的办公厅。有一个人信任你而对你说，他打算杀死你的朋友，并建议你同他事先商定分赃问题。如果这个人是俄国皇帝，而你是英国大臣，那末你就不是把他拉到被告席上去，而是十分奴颜婢膝地感激他对你的高度信任，并像约翰·罗素勋爵那样认为自己非常幸福，能够看到“他的温和，坦率和友好愿望”。

但是我们现在回头来谈谈圣彼得堡吧。

2 月 20 日晚上，即缅施科夫公爵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前不过一个星期，在皇太子夫人——大公妃举行的 soirée〔招待晚会〕上专制君主走到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身边，于是两位“君子”进行了以下的谈话：

沙皇：“怎么，您已经接到复信，明天应当把它交给我。”

---

① 希腊史诗中特洛伊国王的公主。阿波罗钟情于她，授以预言的才能；但是她拒绝了阿波罗的爱情，因此阿波罗处罚她，使她的预言永远没有人相信。——译者注

汉密尔顿爵士：“我将荣幸地这样做，不过陛下已经知道，复信的内容和我曾经提议陛下注意的话是完全一致的。”

沙皇：“我听到这一点很遗憾，但是我觉得，贵国政府不正确地理解了我的意图。我主要的不是想知道**当一个病人快死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而是想同英国商定，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做些什么**。”

汉密尔顿爵士：“但是，皇上，请允许我说，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病人快要死了……　国家不会死得这样仓猝。如果不发生难以预料的危机，土耳其还会存在很长一个时期。皇上，正是为了预防那些可能引起这种危机的情况，女王陛下政府指望得到您崇高的协助。”

沙皇：“应当告诉您，如果有人硬要使贵国政府相信，**土耳其还有什么生机**，那末贵国政府大概是接到了不正确的情报。我**向您再说一遍，‘病人’快要死了**。我们决不应让这种情况弄得我们措手不及。我们应当达成某种协议……　请注意，我并不要求签订条约，议定书。**一个大体上的协议**——此外，我没有别的要求；**君子之间**只要这一点就够了。但是今天不多谈了。请明天到我那里来。”

汉密尔顿爵士“衷心地感谢皇帝陛下”，但是，当他刚刚离开皇宫客厅回到家里，便发生了怀疑。于是他坐近写字台，给约翰勋爵写这次谈话的报告了。末了，他在信边写上以下值得注意的意见：

“皇帝**如此坚持地谈到邻国即将崩溃**，他心中早已**认定**，如果不是瓦解的时刻，至少也是引起瓦解的时刻已经临近了。这一点未必有什么疑问……但是，**如果在俄国和奥地利之间没有取得某种大体的然而无论如何是密切的相互谅解**，他恐怕不敢这样武断。

如果我的怀疑有根据，那末**皇帝的目的就是促使女王陛下政府同他的内阁和维也纳内阁共同制定一个彻底瓜分土耳其的计划，同时不让法国参加**。”

这个报告于3月6日送到伦敦，那时克拉伦登勋爵已接替罗素勋爵担任外交大臣。大使的惊惶预告对这位胆小怕事的土耳其

崇拜者的心理的影响十分令人惊讶。克拉伦登既然已经完全知道沙皇不要法国参加而瓜分土耳其的背信弃义的计划，他却向法国驻伦敦大使瓦列夫斯基伯爵说，“同法国相反，他倾向于信任俄国皇帝”，“不信任的政策既不明智，又无益处”，“尽管他希望英法两国政府始终共同行动，**因为**它们的政策和它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他仍然应当坦率地说，**法国政府最近以来的行为不能指望获得这种所希望的结果**”。（见蓝皮书第1卷第93、98页）

应当 en passant〔顺便〕指出，恰恰在沙皇开导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的时候，伦敦的“泰晤士报”天天重复说，土耳其已陷入绝境，奥斯曼帝国正在土崩瓦解，它留下的不过是“土耳其人缠着头巾的脑袋”的幻影而已。

在皇帝的 soirée〔招待晚会〕谈话后的第二天早晨，乔·汉·西摩尔爵士如约拜会沙皇。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小时零十二分的谈话”。关于这次谈话他又在1853年2月22日的报告中向约翰·罗素勋爵作了汇报。

俄国皇帝一开始就请汉密尔顿爵士向他大声宣读约翰勋爵2月9日的密件。当然，他宣称这份密件中的声明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他“只能希望，声明再详尽一点”。他重复说，土耳其的灾难每一分钟都可能爆发，

> “在当前任何时刻这个灾难都可能发生，发生的原因或者是对外战争，或者是旧土耳其派同‘主张按照法国方式进行新的表面改革’的党派之间的内讧，或者是大家知道的基督徒迫不及待地要抛掉伊斯兰教的枷锁而发起的暴动”。

他不放过机会来讲他那套已经讲滥了的大话，说什么“要不是他在1829年阻止了吉比奇将军的胜利进军，苏丹政权早就完蛋

了”。然而，大家都知道，当时他派到土耳其去的20万人只有5万人生还。如果不是土耳其帕沙同外国大使们一起叛变，吉比奇的残部早已在阿德里安堡平原被歼灭了。

他强调指出，他根本不要求有一个由英国和俄国完全同意的预先决定苏丹管辖下的领土的命运的计划，尤其是两个内阁之间的正式协定，他只是要求某种大体上的协议或者是交换一下意见，以便每一方都秘密告知对方，它不希望做的是哪些事情，

“哪些可能同英国的利益发生矛盾，哪些可能同俄国的利益发生矛盾，以便遇到这种情况时，每一方都能够避免采取违背对方意愿的行动”。

通过这种**反面**的协议沙皇会达到他所追求的一切。首先，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可以被俄国和英国看成 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尽管是以反面的假定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因为现在全看沙皇颠倒黑白以致能够有点像真有其事地向英国宣布，预计的情况**已经**出现了。其次，英国和俄国一致行动的秘密计划，不管它带有如何不确定的和反面的性质，必然会使英国同法国互相对立，因为计划是在没有法国参加和背着法国的情况下拟定的。第三，由于英国受到关于它将**不**做什么的这种反面诺言约束，沙皇就有可能完全放心地制定他的正面的行动计划。此外，很明显，双方商定在一定情况下它们**不**允许对方做什么，其实就是以隐蔽的形式商定它们**允许**对方做什么。这种反面协议形式只是为这两个伙伴中更机灵的一个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汉密尔顿爵士胆怯地嘟囔说：“陛下，也许您能惠然告诉我关于这种**反面政策**的本意。”起初沙皇假装谦虚地谢绝了，但是后来好像受不了温和的压力，发表了以下极为精辟的意见：

“我不允许俄国人**永久**占领君士坦丁堡；我这样讲以后就要指出，君士坦

丁堡永远不会落入英国人、法国人或者任何其他大国之手。同样地，我也绝不允许人们试图恢复拜占庭帝国，或者把希腊扩大成一个强国；我更不允许把土耳其分割成许多小共和国，使它变成科苏特、马志尼和其他欧洲革命者的避难所。我宁愿发动一场战争，而且只要还有一兵一枪，就要继续打下去，我也不愿容忍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出现。”

不要拜占庭帝国，不让希腊的版图大大扩展，不要小共和国的邦联，这一类的东西都不要！那末他要什么呢？不列颠大使是用不着苦猜的。在谈话过程中皇帝忽然道出了以下意见：

“实际上，多瑙河各公国是在我的保护下的独立国家。可以照旧不变。塞尔维亚也可以采取这种政体。保加利亚也是一样；看来，没有根据说明为什么这个地区不能组成一个独立国家。至于埃及，我完全理解这块领土对于英国的重要意义。因此我只能说，如果在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分配帝国的遗产时你们占据了埃及，我是绝不会反对的。对于干地亚也可以这样说；这个岛也许对你们有用，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不能属于英国。”

这样他就证明了，“一旦土耳其帝国瓦解，领土问题的完满解决，在他看来并不像通常所想的那样困难”。他坦率地声明，他想做的是些什么——**瓜分土耳其**，并且再清楚不过地描绘了这种瓜分的轮廓，无论是说出来的或者是避而不谈的都很清楚。埃及和干地亚——归英国；多瑙河各公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成为俄国的藩属；土耳其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些地方他故意避而不谈）将并给奥地利；希腊的扩大“不宜过分”，譬如，可把下特萨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并给它。君士坦丁堡应暂时由沙皇占领，然后成为由马其顿、色雷斯和土耳其欧洲地区的残余部分组成的国家的首都。但是谁将成为这个小国（它或许还会扩大到安那托利亚岛的某些部分）的最后占有者呢？关于这一点他没有说；但是人们都知道，他心目中早已为这个位子

物色好了一个人物，这就是他的幼子[1]，后者正渴望有自己的王国。而法国呢？难道它什么也得不到吗？或许如此！但是，不，它也将得到一份礼物，这就是——谁会相信这一点！——**突尼斯**。沙皇对汉密尔顿爵士说，“法国的目的之一无疑就是占领突尼斯”，因此在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时候，他或许真的表现很慷慨，满足法国对突尼斯的胃口。

讲到法国，沙皇总是用一种特别引人注意的傲慢的轻蔑口吻。他说：“看来法国政府正竭力使我们大家在东方争吵。”至于他本人，那根本没有拿法国当一回事。

“从他这方面来说，他不大担心究竟法国认为在东方问题上采取什么行动路线合适；一个多月前他通知苏丹说，如果苏丹需要他的支持来反抗法国人的威胁，他完全愿意为苏丹效劳！

皇帝继续说，总之，‘正如我已经对您说过的，我的全部希望，就是同英国达成善意的协议，并且这个协议不是规定应该做些什么，而是规定不应该做些什么。只要达成了协议，只要英国政府同我，我同英国政府达到彼此充分信任，其余一切对我说来都无所谓’。”

“但是陛下，您忘了奥地利！”——汉密尔顿爵士高声说道。

“啊”，皇帝使他非常吃惊地反驳道——“您应当懂得，**我谈俄国，也就是谈奥地利；凡是对前者适合的东西，对后者也是适合的**；在土耳其问题上我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总之，他谈俄国，也就是谈奥地利。关于门的内哥罗他毫不含糊地声明，“赞同奥地利内阁的立场”。

如果在以往的谈话中他把苏丹称为小歌剧中的Grand Turc〔苏丹〕的话，那末现在他则按保尔·德·科克的手法称他 ce mon—sieur〔这位先生〕。而且他多么爱护这位先生呵！他仅仅把

---

[1] 即米哈依尔。——编者注

缅施科夫派到君士坦丁堡去，“而我如果愿意的话，本来可以把军队派到那里去——什么也阻挡不住它”；后来他在沃尔特尼察和切塔特证实了这一点，而他的军队从卡拉法特英勇退却也证明了这一点。

哥萨克陛下在同汉密尔顿爵士分手的时候说：“总之，请敦促贵国政府把这些事情再写一下，写得详细些，而且不要犹豫不定。”

3月7日，即这次非常有趣的对话（或者更正确些说是独白）之后不久，涅谢尔罗迭伯爵邀见了不列颠大使，并将一份“非常机密的、遵照皇帝陛下的圣谕拟就的、并且作为对约翰·罗素勋爵的通知的答复或者说是注解的备忘录”交给了他。涅谢尔罗迭伯爵请他把这个“规定给他的”文件读一遍。为此，汉密尔顿爵士研究了这个文件。而他这位先前没有找出一个字眼来抗议俄国人对法国的显然蓄意侮辱的人，突然哆嗦起来了，因为他发现“备忘录是根据一种错误的印象拟出来的：女王陛下政府似乎在俄国和法国的分歧中倾向于后者”。第二天一早他就急忙给涅谢尔罗迭伯爵送了一封 billet doux〔情书〕，向他保证说：

“在最近非常严肃的谈判期间，女王的顾问们**不仅没有倾向于**法国，如备忘录中所说的那样，而且相反，他们希望——在**被迫**〈!〉采取**中立**立场的政府**一般许可**〈!!〉**的范围内**希望——皇帝陛下的**有根据的**要求得到充分满足。”

由于这封阿谀奉迎的信，汉密尔顿爵士自然“同总理大臣”有了另一次“非常友好而满意的谈话”。总理大臣安慰这位不列颠大使，说他没有了解皇帝备忘录中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绝不是指责英国偏袒法国。涅谢尔罗迭伯爵说：“这里仅仅是希望女王陛下政府能尽力开导法国的大臣们，向他们**指出皇帝的宽宏大量和正义感**。”因而，“**这里**”仅仅是希望英国对“卡尔梅克人”卑躬屈

节，而对法国人采取严峻专断的口吻。为了使总理大臣相信英国政府多么忠诚地执行这个任务的第二部分，汉密尔顿爵士念了一段约翰·罗素勋爵的密件，作为“一个例子，说明英国大臣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同法国政府说话的”。涅谢尔罗迭伯爵相信，这超出了他最大胆的期望。他感到“遗憾的只是早先他手中没有这样**重要的证据**”。

汉密尔顿爵士认为俄国答复约翰·罗素勋爵的密件的备忘录乃是“出自皇帝枢密机关而不是出自俄国内阁办公厅的最出色的文件之一”。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没有必要细谈它，因为它不过是沙皇在“对话”中已经发挥的那些观点的简述。备忘录竭力暗示英国政府，“不管这些谈判的结果如何，两国政府都应当保守**秘密**”。备忘录指出，沙皇的做法，“正如英国内阁自己**承认**的，**一向**是以宽大态度”对待土耳其政府。法国采取了另外的行动方针，从而迫使俄国和奥地利也采取威胁的行动。在整个备忘录中俄国和奥地利是相提并论的。备忘录**直截了当**地提出，可能造成土耳其立即崩溃的原因之一，就是**圣地问题**，以及“正教徒因对天主教徒让步而感到受辱的宗教感情”。末了，备忘录宣称，“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受托向皇帝转达的关于**女王陛下政府的友谊和信赖的证明**”，同罗素密件中所提供的保证是“同样珍贵的”。这些表明维多利亚女王像藩臣一样忠于沙皇的“**证明**”，被十分周密地瞒着英国公众，但是，它们或许很快就会在“圣彼得堡报”上发表出来。

汉密尔顿爵士在解释他同皇帝的谈话以及俄国人的备忘录时，再一次提醒自己的内阁注意奥地利的立场。

“如果以为两位皇帝在土耳其问题上业已达成协议或签订条约是一个确定不移并且已经得到公认的事实，那末打听清楚它们彼此承担了多少义务就是非常重要的了。至于签订这项协议的方式，在我看来，未必能引起怀疑。

毫无疑问，这个协议的基础是由去年秋天两位皇帝几次会见中的一次奠定下来的，以后，这个计划大概又由俄国驻奥地利宫廷公使美延多尔夫男爵进一步加以制定。男爵是在圣彼得堡度过冬天的，而现在还在那里。”

怎么，在这些事情揭露出来以后，英国政府要质问奥地利吗？不，它仅仅谴责法国。在俄国侵入多瑙河各公国之后，它使奥地利成为一个调停人，而且从所有城市中恰恰挑选了维也纳作为协商地点，把谈判交给布奥尔伯爵领导，并且直至今日继续愚弄法国，硬要法国相信，在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独立而对俄国人进行的战争中，奥地利可以成为忠实的盟国，尽管英国政府在一年多以前就清楚地知道，奥地利是同意瓜分这个帝国的。

3 月 19 日，关于汉密尔顿爵士和沙皇的谈话经过的报告送到了伦敦。现在克拉伦登勋爵已经接替了约翰勋爵的职位，他竭力要超过他的前任。在得到这份沙皇已经认为没有必要掩饰自己对法国和土耳其的阴谋，而公开加以承认的令人惊异的报告之后 4 天，高贵的伯爵向汉密尔顿爵士发出了以下急件：

“女王陛下政府感到遗憾的是，笼罩着巴黎的惊惶和忿怒促使法国政府下令把自己的舰队开往希腊领海；不过法国政府的处境在许多方面都同女王陛下政府的处境不同。据女王陛下政府所知，法国政府一直没有从俄皇那里获得有关他打算奉行的对土政策的保证。”（见蓝皮书第 1 卷第 102 页）

如果沙皇也告诉法国，“病人快要死了”，现在有了一个瓜分遗产的详细计划，那末，法国自然既不会感到惊慌，也不会对土耳其的命运、缅施科夫使团的真正目的以及俄国皇帝维护他所谓已经没有“生机”的帝国的完整和独立的不可动摇的决心感到疑惑了。

在同一天（3 月 23 日），克拉伦登伯爵给汉密尔顿·西摩尔爵

士发出了第二份急件，这份急件虽然不是为蓝皮书而“编造”的，但是包含了对圣彼得堡的秘密报告的秘密答复。汉密尔顿爵士在他的关于谈话的报告的末尾审慎地提出了如下建议：

“我不揣冒昧地建议，**在将发给我的急件中写上一些要结束进一步研究**，至少是**结束进一步**讨论那些极不适宜当作应该讨论的问题的**词句**。”

克拉伦登伯爵感到自己是最适于解决棘手局面的人，他根本不顾自己大使的预告而完全遵照沙皇的指示行事。他在急件中一开头就声称，女王陛下政府“对皇帝希望继续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的愿望表示欢迎”。皇帝从英国政府方面“**得到了**”“最开诚布公地表明意见”的“**权利**”，因为他具有“崇高的信念”，认为英国政府会帮助他瓜分土耳其、出卖法国以及在奥斯曼的统治被推翻时帮助他镇压基督教居民企图成立自由独立的国家的任何活动。

自由民出身的英国人继续写道：“女王陛下政府完全相信，假使由于新产生的情况，签订某种协议是适合的或者是真正可能的，那末**皇帝陛下的话**将比任何可能签订的条约都更值得重视。”

在任何情况下他的话都可以抵得上同他签订的任何条约；**要知道，不列颠女王的顾问们早已声明过，同俄国签订的一切条约由于俄国方面的破坏已经不再生效了。**

“女王陛下政府仍然相信，土耳其仍然具有生机。”为了证明这种信念是真诚的，伯爵温和地补充道：

“如果皇帝关于土耳其帝国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的意见公布于世，土耳其帝国的崩溃可能比皇帝陛下所预料的还要早些。”

这样，只要“卡尔梅克人”一说出自己的意见，说病人要死了，他就真的会死去。这就是所谓生命力！这里甚至连耶利哥的

羊角[1]也用不着。只消皇上的尊口轻轻一吹，奥斯曼帝国就化为灰烬了。

"女王陛下政府**完全**赞同皇帝的意见：由任何一个大国占领君士坦丁堡是同保持各大国之间的现有均势，同维持欧洲和平不相容的，并且应立即认为是不可能的；没有恢复拜占庭帝国的条件；希腊的长期的混乱局势无助于扩充它的版图；**由于没有建立区、镇自治的基础**，如果让土耳其各省各自为政或者允许它们成立特殊的共和国都会造成无政府状态。"

请注意，对自己的鞑靼主子卑躬屈节并奴才般地重复主子的话的不列颠大臣，甚至恬不知耻地重复弥天大谎，说什么土耳其没有"建立区、镇自治的基础"，然而正是区、镇生活的大力发展使土耳其直到今日还能抵挡住国内外的极其残酷的打击。不列颠内阁既然赞同沙皇所提出的一切假设，也就承认沙皇有意从这些假设中作出的一切结论是正当的了。

英勇的伯爵继续说道，一旦土耳其帝国崩溃，"欧洲会议将是达到和平结局的唯一手段"。但是他害怕这个会议的后果倒不是因为俄国诡计多端（俄国在维也纳会议上把英国摆布得连拿破仑在圣海伦岛上都感慨地说："如果我在滑铁卢获胜，我也不会强迫英国接受更屈辱的条件。"），而是因为害怕法国。

"在这种情况下，1815年条约应予修改，法国大概会甘冒欧洲大战的危险，以便摆脱它认为有辱自己民族尊严的义务，这些义务既然是获胜的敌人强加于它的，也就成为经常触怒它的根源。"

女王陛下政府"希望保存土耳其帝国"，不是要使它充当反对

① 根据圣经传说，公元前2000年的下半年占领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兵士用吹羊角的声音使耶利哥攻不破的城墙塌陷（见"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6章第2—5、12—20节）。——译者注

俄国的堡垒，也不是因为土耳其的崩溃会迫使英国反对俄国以保卫自己在东方的**截然相反的**利益。啊，不是的！——伯爵说道，——“**俄国和英国在东方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英国想保存土耳其帝国并非根据某种同东方问题有关的理由，而是“由于它相信，任何一个重大的东方问题被提出来，**都会成为西方纠纷的源泉**”。因而，东方问题势必引起的不是**西方强国对俄国的战争**，而是西方强国之间的战争，**英国对法国的战争**。也就是这位写出这些话的大臣和批准这些话的同僚，却要欺骗我们，硬要我们相信，他们实在打算联合法国来同俄国进行战争，而且这场战争是“由东方产生的问题引起”的，尽管“俄国和英国在东方的利益是一致的”！

威武的伯爵还往前走。

用他的话来说，**对法国战争**应当是土耳其帝国瓦解和被瓜分的“必然结果”。为什么他害怕这场战争呢？对法国战争本身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但是，这牵涉到一个微妙的情况，这就是：

“在西方，任何一个重大问题，都将带有革命的性质，而且包含了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审查，大陆各国政府当然不愿意这样做。

皇帝完全知道社会的表层下面经常动乱的力量，知道它们的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会爆发的能力；由于这个缘故，皇帝陛下大概会同意这样一种意见：第一响炮声可能成为造成一种甚至比战争必然带来的灾难还要危险的局势的信号。”

坦率的和平使者感叹道：“因此，女王陛下政府便产生了**防止灾难**的热烈愿望。”如果在瓜分土耳其的后面没有隐藏着对法战争，而在对法战争后面没有隐藏着革命的怪影，那末英国政府会以同样的胃口把Grand Turc〔苏丹〕和“哥萨克”陛下一起吞掉

的。

忠实于由汉·西摩尔爵士转来的俄皇办公厅的指令的英勇的克拉伦登，在其急件末了要求“皇帝的宽宏大量和正义感”。

在我们这位伯爵于1853年4月5日给汉密尔顿爵士的第二个急件中曾委托后者通知俄国总理大臣：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已奉命返任；女王陛下的亲笔信使子爵的使命具有**特殊的性质**，因为人们认为，土耳其政府会比较乐于接受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深谙土耳其问题的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的**中庸适度的**忠告，即土耳其政府必须以最温和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基督教臣民。”

就是这位发出这些**特别**指令的克拉伦登，在1853年3月23日的密件中写道：

“对待基督徒并不残酷。土耳其对待这一部分臣民是宽大的，这种宽大态度倒可以成为某些把土耳其蔑视为野蛮国家的政府的榜样。”

这个密件承认，斯特腊特弗德勋爵是作为一个对苏丹施加压力的最机伶最听话的执行者而被派往君士坦丁堡的。而在当时内阁的报纸上却把派遣他说成是对沙皇的强烈示威，因为高贵的勋爵早就在扮演俄国的私敌的角色了。

向议院提出的一批秘密文件的最后一个是俄国的备忘录。尼古拉在备忘录中表示庆幸，因为万一东方发生非常事件，在那些首先应当避免的政治局面的问题上，他同英国内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备忘录上注明的日期是1853年4月15日。备忘录保证说，“支持土耳其政府继续存在的最好办法是，**不要用有损它的尊严和独立的过分要求来干扰它**”。这恰恰是在缅施科夫表演自己的喜剧的时候。缅施科夫曾于4月19日递交了一份无耻的普通照会，这

份照会，正像克拉伦登伯爵在上院所说的，“是用一种幸好在外交界非常罕见的语言写成的”。然而伯爵阁下更加坚定地相信，沙皇打算宽恕病人。当哥萨克侵入多瑙河各公国的时候，他的信心就更加坚定了。

联合内阁只找到了一个裂缝可以躲避这些揭丑的文件。它硬说，缅施科夫公爵使团的明显目的是圣地问题；而就瓜分土耳其交换意见，只涉及遥遥无期的未来。但是沙皇在他的第一个备忘录中明确地说：土耳其崩溃的问题“在他看来绝不是一种幻想或者渺茫的可能性”；英国内阁错了，它“认为门的内哥罗和圣地这两个问题是跟外交上通常碰到的那些困难问题没有区别的普通争执问题”；圣地问题“可能发生最严重的变化”而“引起灾难”。内阁本身不仅同意，沙皇在这个问题上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而且同意，沙皇对苏丹的1100万臣民享有“条约所规定的专有的保护权”。如果联合内阁没有促成土耳其政府接受缅施科夫的要求，那末沙皇就仅仅根据1844年的备忘录的精神，根据同这个内阁达成的协议以及他对汉·西摩尔爵士的口头声明——“他不允许别人跟他开玩笑。”——来行动而打算搞死ce monsieur〔这位先生〕。这里甚至不产生他对内阁的态度是否正确的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内阁自己对待他的态度，甚至在目前，是否“合宜”。每一个仔细读完这些文件的人都该清楚，如果这个可耻的内阁继续执政，那末只消国外局势一复杂化，就足以把英国人民推向可怕的革命，而这场革命将把王位、议会和已经没有保持英国的世界地位的意志和能力的统治阶级一扫而尽。

尼古拉通过“圣彼得堡报”向联合内阁提出了挑战——公布证明这个内阁的鲜廉寡耻的秘密文件；这一次他的行动也是恪守

自己的箴言的：

《Je hais ceux qui me résistent；je méprise ceux qui me servent》.〔“我痛恨那些反抗我的人；我鄙视那些为我效劳的人。”〕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3月24日

载于1854年4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0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103]

1854年3月28日星期二于伦敦

终于宣战了。女王的诏书昨天已由阿伯丁勋爵和约·罗素勋爵分别在上院和下院宣读。诏书谈到了“为了积极反抗俄国对土耳其的侵犯”将要采取的种种措施。明天“伦敦官报”将公布正式的宣战书，议会将在星期五讨论对女王诏书的复文。

在英国发表宣言的同时，路易－拿破仑也向参议院和Corps Législatif〔立法团〕发出了类似的文告。

布莱克伍德上尉曾把英法两国的ultimatissimum〔紧急最后通牒〕送交沙皇，而于上星期六带回的答复说，俄国根本不打算答复这个文件，这样一来，对俄宣战已经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但是，布莱克伍德上尉的使命并不是毫无结果的。由于这个使命俄国赢得了一个3月——这是一年中对俄军最危险的月份。

沙皇和英国政府之间秘密往来的公文的公布，不仅没有使社会愤懑爆发出来，反而产生了一种incredibile dictu〔不可思议的东西〕——使各种日报和周报有了祝贺英国有一个真正的民族政府的理由。但据我所知，将召集一个群众大会来使盲目的英国公众看清政府的真正行为。这次大会将于下星期四在货栈街音乐厅

举行；预料庞森比勋爵、累亚德先生、岛尔卡尔特先生等人将参加这次大会。

“汉堡记者”刊载了如下一则简讯：

“据此间3月16日得自彼得堡的消息称，俄国政府准备公布有关东方问题的其他各种文件，其中包括阿尔伯特亲王的几封信。”

令人诧异的是，就在下院宣读女王诏书的那一个下午，政府在这次议会会议上遭到了第一次**失败**。尽管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是关于强迫贫民迁返原居住地的法案[104]的二读，仍以209票对183票的多数决定延期到4月28日进行。政府这次遭到失败，原因不在别人，而在帕麦斯顿阁下。

“泰晤士报”写道：“阁下**善于**把他和他的同僚置于两团火焰之间〈托利党和爱尔兰党之间〉而不寄很大希望于不经过外人的干涉而解决问题。”

我们得悉，3月12日法国、英国和土耳其签订了一个三国同盟条约[105]，但是，尽管苏丹亲自向受乌列玛[106]**协会**支持的伊斯兰教大高僧提出要求，后者还是拒绝作出批准关于改变土耳其境内的基督徒地位的决议的决定；这些决议似乎违背了可兰经的教义。看来，这个消息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使得比勋爵不得不发表下述声明：

“我只想表明自己的真诚希望：政府将发表一个声明来说明近日来流传的一则消息是否属实，这则消息说英国、法国和土耳其之间订立的协定中包含一些规定我们具有保护权的条文，这种保护权至少应同我们曾加以反对的俄国的保护权一样受到指责。”

“泰晤士报”今天说，政府的政策同得比勋爵的政策完全相反，还说：

"如果某种严重违抗这一政策的行为是伊斯兰教高僧或乌列玛的宗教狂热的结果，我们将感到非常遗憾。"

无论要了解土耳其政府和宗教当局的关系的性质，还是要了解目前土耳其政府在保护土耳其帝国基督教臣民的问题（初看起来好像是目前东方纠纷的根源的问题）上所面临的困难，都必须先追溯一下这个问题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可兰经和以它为根据的伊斯兰教法律把各个不同民族的地理和人文归结为一个简便的公式，即把他们分为两种国家和两种民族——正统教徒和异教徒。异教徒就是"哈尔比"，即敌人。伊斯兰教宣布异教徒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并在穆斯林和异教徒之间造成一种经常互相敌视的状态。在这种意义上说，贝尔贝莱国家[107]的海盗船曾是伊斯兰教的神圣舰队。但是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如何能同可兰经并存呢？

伊斯兰教法律规定："如果某个城市投降，其居民同意成为**莱雅**，即信奉伊斯兰教君主的臣民，而又不放弃自己的信仰，那末他们必须缴纳**哈拉志**（人头税）；他们和正统教徒订立停战协定，无论谁都不能侵犯他们的房屋或财产……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旧教堂被看做是他们所有的财产的一部分，允许他们在这些教堂中举行祈祷仪式。但是不允许他们修建新教堂。他们只有权修缮和恢复教堂的坍塌的地方。各省总督定期派专员巡视基督徒的教堂和圣殿，检查是否有以修缮旧房为名增添新建筑的情况。如果城市是经过战斗而夺取来的，那末居民可以保存自己的教会建筑，但是只是作为他们居住处或避难所，不允许在里面举行祈祷仪式。"[108]

因为君士坦丁堡同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大部分地区一样是投降的，所以那里的基督徒享有在土耳其政府的保护下作为**莱雅**而存在的特权。他们之所以享有这个特权，仅仅是因为他们同意把自己置于穆斯林的保护之下。因而，仅仅是由于按照伊斯兰教法律

基督徒应服从穆斯林管理，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即他们的宗教首领，同时也就成为他们的政治代表和最高审判官。凡是奥斯曼帝国境内我们看到有正教的**莱雅**聚居的地方，根据法律，大主教和主教都是市政委员会的委员，并在总主教的领导下管理向正教徒分派赋税的事宜。总主教对自己的教徒的行为向土耳其政府负责。总主教由于有权审判本教的莱雅，他可以把这个权利转托给大主教和主教在他们管辖的教区内行使，而他们的判决，必须由土耳其官吏和法官等等执行。他们有权判处罚款、徒刑、笞刑和流放。此外，他们的教会还赋予他们开除教籍的权利。除了罚款以外，他们还对民事和商业案件课收各种税款。教阶制度中的每个等级都有一定的价格。为了获得举行授职仪式的权利，总主教向御前会议缴纳很重的贡赋，但他也把大主教和主教的职位卖给本教会的僧侣，而后者则靠出卖下一级职位给别人并从教士身上征收贡赋犒赏自己。教士又把从上级那里买来的权力零售出去，并在他执掌的洗礼、结婚、离婚、遗嘱等执事上大做其生意。

从这个 exposé〔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土耳其对信仰正教的基督徒的宗教统治系统以及整个基督徒团体都是以莱雅服从可兰经这点为基础的，而可兰经则把莱雅看做异教徒，也就是看做宗教上的一个单独的民族，准许把教会和世俗权力集中在他们的教士的手中。因此通过世俗的解放来废除他们对可兰经的从属，也就是同时废除他们对教会的从属，并引起他们在社会、政治和宗教各方面的革命，这场革命首先不可避免地会把他们推入俄国的怀抱。谁想用 code civil〔民法典〕来代替可兰经，谁就必须按照西欧的式样来改造拜占庭社会的全部结构。

穆斯林和他们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但是又产

生了一个问题：穆斯林和异教徒的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又怎样呢？

因为可兰经把一切外国人都宣布为敌人，所以谁也不敢没有预防措施而到伊斯兰教国家去。因此，第一批冒险去同这样的民族做生意的欧洲商人一开始就力图保证个人享有特殊条件和特权，后来，这种特殊条件和特权扩大到他们的整个国家。这就是特惠条例产生的根源。特惠条例——这是土耳其政府发给欧洲各国的帝国文书，即特权证件，它允许这些国家的臣民通行无阻地进入伊斯兰教土地，在那里从事自己的营业并按照本国的仪式进行祈祷。它和条约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建立在相互基础上的协定，不是经过有关双方的共同讨论磋商，也不是在互利互让的基础上经双方批准的。相反地，特惠条例是由一个政府单方面赋予的优待，因此也可以由它自行决定废除。而事实上，土耳其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地使它赋予某个国家的特权化为乌有，其办法就是把这些特权也赋予其他国家，或者完全废除这些特权，再不就是拒绝继续加以遵守。特惠条例的这种不稳定的性质使它永远成为各国大使争执和埋怨的根源，并且造成了永无休止地交换矛盾的照会和敕令（每当新王即位就被重新颁布）的情况。

外国列强的那种不是对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莱雅，而是对去土耳其旅行或者作为外国人在那里侨居的本教教徒的**保护**权，正是从这种特惠条例开始产生的。获得这种保护权的第一个强国是法国。在1535年苏里曼大帝和弗朗斯瓦一世时代，1604年阿罕默德一世和亨利四世时代以及1673年穆罕默德四世和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和奥斯曼政府之间签订的特惠条例于1740年在一本条约汇编中得到了修订、确认、重申和增补，这本汇编的标题就是：“法国宫廷和奥斯曼政府之间的新旧特惠条例和条

约。——公元1740年（回历1153年）修订和增补。由御前翻译秘书、奥斯曼宫廷首席翻译官德瓦尔先生译于君士坦丁堡”[109]〈这是经土耳其政府批准的第一个正式译本〉。这个协定的第三十二条规定法国有权将自己的保护权扩大到一切传播“法兰克”宗教的寺院（不管这些寺院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一切到圣地去的法兰克朝圣者。

俄国是第一个在1774年把仿照法国的先例而编制的特惠条例列入**条约**的国家。这个条约就是凯纳吉条约。同样地，拿破仑在1802年认为，使特惠条例成为条约的一项条款而保留下来，并使它具有相互约束的协定的性质是有益的。

圣地问题同保护权问题又有什么联系呢？

圣地问题是关于保护耶路撒冷的正教徒的宗教团体和它们在圣土上占有的建筑物，特别是圣墓神殿的问题。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的占有意味的不是所有权（这是可兰经拒绝给予基督徒的），而只是**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决不排斥别的团体在同一个地方进行自己的祈祷仪式的可能性；占有者只有权掌管**钥匙**、巡视和修缮庙宇、燃点圣灯、打扫屋舍、铺置地毯，此外没有其他特权，而这一切在东方被认为是占有的象征。因为圣地可以说是基督教的体现，所以关于保护问题也就由于圣地的关系具有最尖锐的性质。

占有圣地和圣墓神殿的有天主教徒、正教徒、阿尔明尼亚人、阿比西尼亚人、叙利亚人和科普特人。在这些觊觎者中发生了冲突，欧洲君主们认为这些宗教纠纷是一个有关自己在东方的影响的问题，于是他们便首先注意到了土地的主人——滥用自己职权的、狂热的和贪婪的帕沙们。奥斯曼政府和它的官吏非常出色地掌握了很麻烦的 système de bascule〔秋千法〕，他们对问题的解决

是使天主教徒、正教徒和阿尔明尼亚人输流得到好处，从而向这些人或那些人要求和索取黄金，并拿所有的人来开心。土耳其人刚刚把占有争议地区的敕令授给了天主教徒，阿尔明尼亚人就带着更沉重的钱袋来了，转瞬之间就得到了一道相反的敕令。他们对正教徒也使用这样的策略。除了土耳其政府的各种指令和它的官吏们的“哈德热茨”（命令）所正式证明的东西以外，正教徒还千方百计地为自己伪造各种各样的名义来占有。有时，由于叙利亚的帕沙们和下级官吏们的自私自利和居心不善，苏丹政府的决议实际上等于一纸空文。这样一来就必须重新商谈，任命新的专员并再牺牲一笔钱。土耳其政府过去为了钱而干的事情，现在由于害怕才去干，以便获得偏袒和保护。它向法国的要求和天主教徒的野心让步之后，赶忙又向俄国和正教徒作出同样的让步，企图用这种办法来躲过它无力反抗的风暴。真可以说没有一个圣物，没有一座小礼拜堂，没有一块圣墓神殿的石头，不曾被用来挑起各基督教团体之间的争端。

我们发现在圣墓周围聚集着多不胜数的基督教教派，在它们的宗教野心后面隐藏着同样多的政治的和民族的角逐。

在耶路撒冷和圣地居住着各种不同的民族，依照宗教信仰划分为天主教徒、希腊正教徒、阿尔明尼亚人、科普特人、阿比西尼亚人和叙利亚人。希腊正教徒有 2000 人，天主教徒有 1000 人，阿尔明尼亚人有 350 人，科普特人有 100 人，叙利亚人有 20 人，阿比西尼亚人有 20 人，共计 3490 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有 1373 万希腊正教徒，240 万阿尔明尼亚人和 90 万天主教徒，其中每一种人又划分为若干较小的支系。我在上面谈到过的承认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的希腊正教教会同俄国正教教会根本不同，后者的最

高宗教首脑是沙皇；它也同希腊正教教会根本不同，后者的最高首脑是国王和雅典正教最高会议。同样，天主教徒也分为罗马天主教徒，希腊东方礼天主教徒和马龙派；阿尔明尼亚人分为格里哥里派和阿尔明尼亚天主教派；科普特人和阿比西尼亚人同样也划分为许多支系。在圣地的三大教会是希腊正教、天主教和阿尔明尼亚教。天主教可以说主要是代表拉丁民族的；希腊正教主要是代表斯拉夫人、土耳其斯拉夫人和海伦人[①]的，其余的教会则主要是代表亚洲和非洲民族。

不难想像，所有这些敌对的分子是怎样包围圣墓的，僧侣们是怎样进行战争的，而战争的表面理由是占有伯利恒星、随便一块什么样的帷幕、圣殿的钥匙、祭坛、陵墓、宝座、圣枕——一句话，追求某种可笑的特权！

要了解僧侣们的这个十字军征讨，首先必须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其次是他们的住所的性质。

关于这一点，一位旅行家不久以前叙述道：

> “各民族的所有这些宗教渣滓彼此隔绝地居住在耶路撒冷，他们互相敌视和竞争；这是一些流浪居民，他们从朝圣者中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并经常死于鼠疫和贫困。过了若干年，欧洲人死去了或者回到欧洲去了，帕沙和他们的近卫军到大马士革或君士坦丁堡去了，而阿拉伯人则跑到沙漠里去了。耶路撒冷——这是每个来的人短时客居的地方，但谁也不想在那里定居。在这个圣城中每种人都在自己的宗教中找到生活的来源——希腊正教徒和阿尔明尼亚人依靠每年到耶路撒冷来的 12000 或 13000 朝圣者的施舍过活，天主教徒则依靠他们在法国、意大利等地的教友的津贴和周济过活。”

除了寺院和圣所之外，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还占有一些造在圣

① 海伦人是希腊人的自称。——译者注

墓神殿旁边的矮小的住房或单人住所，其中居住着日夜守护着这个圣地的僧侣。履行这些职责的僧侣定期更换。单人住所只有一道通向神殿内的房门；担任看守的僧侣的食物是从小窗口由外面送进来的。神殿的大门经常锁着，由土耳其人看守，他们只是为了钱才把门打开，并且由于任性或者贪财，就擅自把它关上。

马扎里尼说，教士之间的争吵总是最恶毒的。对于这些不仅全都靠圣地为生，而且住在圣地并且全都住在一起的教士又有什么可说的呢！除了这个情景之外，还要提醒一句，天主教神甫几乎完全是由罗马人、撒丁人、那不勒斯人、西班牙人和奥地利人组成的，他们全都同样嫉妒法国的保护，而都渴望代之以奥地利的、撒丁的或那不勒斯的保护；不仅如此，撒丁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都自封为“耶路撒冷国王”。还要补充的一点是，耶路撒冷的定居居民有15500人，其中有4000穆斯林，8000犹太人。不言而喻，约占全部居民四分之一并包括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摩尔人在内的穆斯林在所有各方面都是主人，因为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政府的软弱无能完全没有影响他们的地位。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所遭受的贫困和痛苦非笔墨所能形容，他们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最肮脏的地区，即锡安山和莫里亚山之间的一个叫做哈莱特—厄尔—雅胡德的地区（那里有他们的教堂），他们经常遭到穆斯林的压迫和排斥；他们受到正教徒的侮辱，受到天主教徒的迫害，仅仅依靠从他们的欧洲弟兄那里获得的微薄的施舍为生。但是这里的犹太人不是当地居民，而是出生于遥远的不同国家的人，他们之所以被吸引到耶路撒冷来，只是希望居住在约萨法特河谷一带，并在救主应当出现的那些地方死去。

一位法国作家说道：“他们在忍耐和祈祷中等待死亡。他们眼巴巴地望着

莫里亚山，那里曾经矗立着一座所罗门神庙，但他们是不许走近这座山的，他们为锡安山的不幸而落泪，为他们不得不散居天下而哀泣。”

不仅如此，英国和普鲁士在1840年又派了一位英国国教的主教到耶路撒冷来，其明显的目的就是使这些犹太人返回原籍。在1845年，他受到了犹太人以及基督徒和土耳其人的痛打和嘲弄。实际上，他可以说是使耶路撒冷一切宗教联合起来的第一个和唯一的原因。

现在我们很清楚，为什么基督徒在圣地共同进行祈祷仪式会变成各种不同教派之间的永无休止的拚命的“爱尔兰式的争吵”；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神圣的争吵不过掩盖着不仅是各个国家而且是各个民族之间的卑鄙的战争，而在西欧人看来是如此可笑的、在东方人看来却是如此异乎寻常地重要的保护圣地问题，仅仅是经常出现的、始终被掩盖着的和永远不能解决的东方问题的一个阶段。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3月28日

载于1854年4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4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议会的战争辩论

1854年4月4日星期二于伦敦

英国悲剧的特点之一就是崇高和卑贱、恐怖和滑稽、豪迈和诙谐离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它使法国人的感情受到莫大的伤害，以致伏尔泰竟把莎士比亚称为喝醉了的野人[110]"。但是莎士比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让丑角在英雄剧中担当念开场白的任务。这个发明的荣誉属于联合内阁。阿伯丁阁下扮演的角色就算不是英国的小丑，那也是意大利的潘塔隆[111]。眼光短浅的人总以为，好像一切伟大的历史运动终究都会变成滑稽戏，或者至少变得平庸无奇。但是这样来开场，这正是一出名为**对俄战争**的悲剧所独具的特色，这出悲剧的序幕已经于星期五晚上在议会两院同时揭开了；两院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内阁对女王诏书的复文，而且打算在昨天午后把这个复文呈交端坐在白金汉宫宝座上的女王。上院的情况用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克拉伦登勋爵阐明了政府的观点，得比勋爵阐明了反对派的观点。一个讲的是执政者的话，另一个讲的是在野者的话。

阿伯丁勋爵，这位领导政府的高贵的伯爵，这位沙皇"机智的"代理人，路易—菲力浦的"可爱的、真挚的、卓越的"阿伯丁，庇护九世的"尊敬的绅士"，虽然也是用通常的哀求和平的声

调结束了他的说教，但是在他发言的大部分时间里一再引得议员们哄堂大笑，因为他不是在向俄国宣战，而是在向伦敦周报“新闻报”宣战。马姆兹伯里勋爵对高贵的伯爵表示了异议。布鲁姆勋爵这个“愚蠢的老懦夫”（威廉·科贝特就是这样称呼他的）发现，开始进行的这场斗争“并不轻松”。本着自己特有的基督教精神别出心裁地把不列颠的殖民地变成惨绝人寰的地狱的格雷伯爵，竟提醒不列颠人民说，关于战争的辩论的声调和情绪以及对沙皇和他的哥萨克的敌意是不符合一个基督教民族开始战争时所应有的精神状态的。哈德威克伯爵认为英国所拥有的手段不足以和俄国舰队相抗衡。英国在波罗的海的兵力至少应当有 20 艘装备齐全、火器精良和乘员训练有素的战列舰，而不应当像过去那样用一伙刚刚招募来的兵士去作战，因为作战时这样一伙人在战列舰上的作用比其他任何人都差。兰斯唐侯爵出来为政府辩护，他希望，战争期短，而且得到胜利，因为（这充分说明了这位高贵的勋爵的理解水平）“这并不是一场通常都会引起极严重后果的和极难结束的王朝战争”。

经过这场愉快的、每个人都讲上一句两句的 conversazione〔谈话〕，诏书就 nemine contradicente〔无异议地〕被通过了。

我们从这次 conversazione 中所获悉的一切新东西全部包括在克拉伦登勋爵的几个正式声明和关于 1844 年的秘密备忘录事件的某些材料中。克拉伦登勋爵确认，“当前**同法国达成的协议**只限于**交换**纯属作战指示方面的**照会**”。因而，目前英法之间不存在**任何条约**。关于奥地利和普鲁士，他说，前者将保持武装中立，而后者将保持普通中立，但是“在这样一场即将在两国边境爆发的战争中，它们将不可能保持任何中立”。最后，他声明说，“如果能够保证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享有平等权利和自由”，未来战争结

束时所获得的和平才是光荣的和平。

但是我们知道，伊斯兰教总教长已经由于拒绝作出决定来批准确立这种平等权利的条约而被撤换了；君士坦丁堡的老土耳其居民非常愤懑；而从今天收到的电讯中我们得知，沙皇向普鲁士声明说，如果西方强国能够迫使土耳其政府接受这种条约，他就准备把自己的军队撤出多瑙河各公国。除了推翻奥斯曼的统治以外，他没有其他的目的。所以就是西方强国打算越俎代庖，他自然也不会冒失得同它们打起仗来。

现在我们来谈谈秘密备忘录事件，这是我从得比、阿伯丁、马姆兹伯里和格兰维耳等人的发言中弄清楚的。备忘录“应当是俄国、奥地利和英国之间就涉及土耳其的某些准备工作所达成的临时的、有条件的和秘密的协定。这些准备工作应当不取得法国的任何同意而迫使它参与”。马姆兹伯里勋爵用这样的话来描述的这个备忘录，是沙皇、阿伯丁伯爵、威灵顿公爵和罗伯特·皮尔爵士之间秘密磋商的产物。而沙皇之所以同公爵和罗伯特·皮尔爵士商量也正是听了阿伯丁的忠告。在阿伯丁勋爵和他的反对者的争论中，有一点还没有弄清楚：这个文件是沙皇于 1844 年从英国回到圣彼得堡后由涅谢尔罗迭伯爵拟定的呢，还是由英国大臣们自己拟定作为皇帝声明的笔录的。

阿伯丁伯爵对这个文件的关系，同一个大臣对任何一个正式文件的普通关系不同，这一点，按照马姆兹伯里勋爵的说法，可以由**另外一个没有提交给议院的文件**来证明。尽管阿伯丁肯定地说，他已经把备忘录的“实质”通知了法国，但是备忘录被认为是极端重要的文件，而且是不得通知其他强国的。沙皇无论如何也不知道他已经通知法国了。威灵顿公爵和罗伯特·皮尔爵士赞

同并批准了备忘录。但是备忘录并没有通知皮尔内阁，并提交内阁讨论，当时得比勋爵是这个内阁的成员之一。备忘录没有和外交部的普通文件放在一起；在内阁更动的时候，外交大臣亲自把它交给自己的继任人保存。在外交部该项文件没有任何副本。所以得比勋爵虽然是1844年皮尔内阁的成员，但是他在就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关于备忘录的事。阿伯丁伯爵离开外交大臣的职位时把装有备忘录的小匣交给了帕麦斯顿勋爵，后者又把这个潘多拉的盒子[112]交给了他的继任人格兰维耳伯爵，而格兰维耳伯爵，据他自己说，他是根据俄国大使布隆诺夫男爵的要求在马姆兹伯里伯爵进入外交部的时候把这个盒子交给了他，但是，这时文件上的真正的签署看来是被更改了，或者确切些说，被赝造了，因为格兰维耳伯爵在把它交给马姆兹伯里伯爵的时候说明，这是根据俄皇、罗伯特·皮尔爵士和阿伯丁勋爵会谈的结果而由**布隆诺夫男爵**拟定的备忘录，根本没有提到威灵顿公爵的名字。这种不正确的说明，除了企图把备忘录说成是大使的普通札记，而不是从圣彼得堡宫廷办公厅发出的正式文件，以便抹煞它的重要性之外，想不出有其他任何理由。

俄国对于这个文件非常重视，在马姆兹伯里勋爵就任48小时之后，布隆诺夫男爵就拜访了他，并问他是否读过这个文件。但是马姆兹伯里当时还没有读过，因为文件在几天以后才交给他。布隆诺夫男爵执意向他指出，必须阅读这个文件，男爵肯定地说，这个文件**是理解同俄国的一切谈判的关键**。然而，自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同得比政府的成员谈过这个文件，因为显然他是认为托利党政府太软弱太不稳定，不能很好地执行俄国的政策。1852年12月得比政府辞职了，不久，即1月11日，当联合内阁成立的消息刚

刚传到圣彼得堡，沙皇就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就足以证明他认为“群贤内阁”能够继续根据这个备忘录行事。

这样，我们看到了一些最权威的见证人在上院中进行的有损政府名声的揭露，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当时都是大不列颠的首相或者外交大臣。备忘录中说，英国外交大臣私自同俄国签订“有条件的协定”，不仅未经议会批准，而且也背着他自己的同僚，其中只有两个人晓得这个秘密。这个文件十年来都没有交给外交部；它由历任外交大臣们秘密保存起来。每当一个外交大臣退出舞台的时候，俄国大使就出现在唐宁街[113]，并通知继任人说，希望他好好研究一下条约，研究一下根本不是由国家的合法代表，而是由内阁的某些大臣和沙皇签订的秘密条约；希望他遵循圣彼得堡宫廷办公厅拟就的俄国备忘录给他规定的行动路线。

如果这还不是对宪法的公然破坏，如果这还不是阴谋和叛国，如果这还不是同俄国的秘密协定，那我们就不知道这些词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同时从这些揭露中我们知道了，为什么罪犯们感到自己太平无事，并且就是在对他们不断秘密勾结（这点他们已被揭露）的俄国公开作战时还能够从容地继续为国家掌舵；我们还知道，为什么议会反对派纯粹是一种讹诈力量，是使政府伤伤脑筋，而不是去阻碍政府的活动。1844年以来的历任外交大臣，以及一届接一届的政府都是同谋犯；这些人在抽不出工夫控告自己的前任，而心照不宣地把那个神秘的小匣接到自己手里来的时候，就成了他们的同伙。单是一个掩盖秘密的念头就使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罪人。对议会隐瞒阴谋使每一个人都成了阴谋的参加者。法律认为窝主与盗匪同罪。因此无论进行什么审判，不仅联合内阁，而且

还有它的对手，不仅现任的大臣们，而且还有他们所代表的议会党派，不仅这些党派，而且还有英国的统治阶级都会陷于毁灭。

En passant〔顺便〕指出，在上院中唯一值得注意的发言是得比伯爵的发言。但他对备忘录和秘密往来的公文的批评——关于下院的辩论情形我也可以这样说——并没有包含什么超出我在泛论这个祸患无穷的备忘录和这些绝非寻常的往来的公文时[①]告诉你们的那些内容。

“宣战权——这是国王的特权，真正的特权；女王如果向议会提出并通知议会说，她认为必须进行战争，那末下院就不能申述它认为战争是否合适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议院的职责就是团结在女王周围，而只有在以后，在一个适当的和符合宪法的时机，才能讨论导致战争的那项政策。”

迪斯累里先生在下院就是这样声明的，下院全体议员也是这样说的，“泰晤士报”也用了整整十七栏的篇幅来刊登对这项政策的评述。为什么？正因为这是“不适当的时机”，并且他们的空谈必然毫无结果。然而，累亚德先生应当算例外，这位先生直截了当地声明：

“如果议院听取他的意见后确认，大臣们的行为使议会有理由提出质问，那他不会推诿由此而承担的义务，并准备请大臣们在最近期间指定一个时间让他提出这种质问。”

现在非常清楚，为什么“泰晤士报”要开始怀疑累亚德先生的亚述发现[114]的真实性了。

约·罗素勋爵在下院宣读了诏书，他和克拉伦登勋爵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当他读到不可侵犯性、独立自主、自由、文明等

① 见本卷第148—159、160—177页。——编者注

字眼时用了一种特殊的声调，这种声调使他博得了比较单纯的公众的掌声。

累亚德先生在回答问题时有两个极大的疏忽，使他总的说来非常精彩的发言的效果遭到了损害。第一，他企图证明在联合内阁中存在着两个对立的因素——俄国因素和英国因素，阿伯丁派和帕麦斯顿派，其实除了向俄国阿谀逢迎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方式以外，这两个派别彼此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区别。一个领袖不了解俄国，所以拥护俄国，另一个领袖虽然了解俄国，但还是拥护俄国。前者因此是俄国的公开拥护者，而后者则是它的秘密代理人。前者因此是无私地为俄国效劳，而后者则是有报酬地为俄国服务。前者的危险性比较少些，因为他公开违背英国人民的感情；而后者则会造成无法挽救的祸害，因为他把自己装成对俄国的民族仇恨的体现者。至于说到累亚德先生，那就只好假定，他不了解他认为是同阿伯丁对立的那个人。而对于援引这种对立性的迪斯累里先生，这种原谅就不成立了。因为没有人比这位反对派领袖更了解帕麦斯顿勋爵，他还在1844年就声明过，对英国的利益说来，从来还没有一位大臣的外交政策比这位高贵的勋爵的政策更具有危害性。累亚德先生的第二个疏忽是，他硬说“泰晤士报”是阿伯丁派的公开机关报，根据是，“泰晤士报”往往在秘密往来的公文到后两三天就用其中的材料撰写社论，企图说服全国同意在圣彼得堡策划的无耻勾当；其中最突出的是去年二、三月间所登载的那些文章。如果累亚德像帕麦斯顿勋爵那样，假定这些材料是俄国驻伦敦大使供给报纸的，那他会做得好些；这将使他有可能同时揭露“泰晤士报”和外交部，说它们两者都是圣彼得堡内阁的机构。

我姑且假定，“泰晤士报”真正比联合政府更有力量，不是由

于它所持的见解，而是由于那些揭露了这一秘密通信的叛变性质的报道，因此我把累亚德先生反对这家报纸的声明全部转引在这里。

“英国收到第一份密件是在1853年1月23日，当月26日在‘泰晤士报’上就发表了本人所引证的那些文章中的第一篇文章。第二份密件是在1853年2月6日收到的，而在当月11日，即4天以后，‘泰晤士报’上又发表了一篇专论，其中有一段摘在下面。文章中说：‘我们并不认为，俄国政策的目的是加速东方灾难的来临；英国将再度诚挚地为缓和一触即发的危局而效劳。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企图延长土耳其人在欧洲的粗野和衰朽的权力只有付出重大代价——使肥沃的省份和众多的基督教居民受野蛮统治——才能实现；如果文明和基督教能克服奥斯曼的征服所造成的罪恶，我们将感到高兴。’

1853年2月23日的‘泰晤士报’在说了许多关于土耳其已经衰弱不堪的话后又声称：

‘土耳其政府政治上极端衰朽，统治者中根本没有能干的和廉洁奉公的人，伊斯兰教居民日渐减少，国库已趋空虚，同时它又统治着南欧某些最肥沃的区域，最优良的港口和最精明能干、有天才的人民，这形成了某种离奇的对照…… 很难了解，这样深重和无可置疑的罪恶竟然在如此长久的时期内还能在政治活动家（他们把这种恶视为相对的善）中找到保护人；尽管我们也知道在如此庞大的帝国的领土上进行任何变革会引起多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仍然愿意预见到（不是惊惶不安地而是满意地预见到）那个时刻’——‘泰晤士报’从何得知，这个时刻已经很近了呢？——‘那时候像土耳其政府这样的政府再也不能继续统治像它现在统治着的这样的国家了。或许，这个时期比一般想像的要短一些，或许，某些聪明的国家活动家已在准备措施来对付这种结局，因为他们再也无法继续无限期地推迟这种结局了。我们并不认为而且也不打算假定，奥地利和俄国目前已经有了或者已经背着其他欧洲强国预先制定了一种对奥斯曼帝国的领土野心怀有敌意的计划。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当‘泰晤士报’这样声明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缅施科夫公爵作为特使从圣彼得堡被派往君士坦丁堡所负的专门使命是代表尼古拉皇帝声明，作为正教首脑的沙皇本人不能接受也不能强迫东方教会接受不久前法国大使所收到的苏丹关于圣土上的圣地问题的敕令所规定的条件。’

关于缅施科夫公爵使团的第一个消息包括在2月14日和21日收到的汉·西摩尔爵士的紧急报告中。必须指出，1853年3月6日又接到一份紧急报告，转达了俄皇关于瓜分土耳其的全盘计划。前面已经指出，对这个紧急报告的答复直到3月23日才送出去；3月13日以前内阁一次会议都没有举行，虽然政府的某些成员在此以前一星期就已收到了皇帝的建议。这个建议直到3月13日才通知他们的同僚；然而‘泰晤士报’却早就得悉了，因为在3月7日，即在接到紧急报告后的第二天——当时除了两三位内阁成员以外还没有人能够知道，连外交部的职员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见到，——在‘泰晤士报’上就发表了一篇详细的文章，（听啊！听啊！）这篇文章中提到：

‘土耳其帝国的局势和欧洲强国对东方的态度——对这个问题，政治家们和独立自主的报刊必须认真考虑一下，以便提出并表述自己的观点，尽管实现相应的计划现在还不是时候，还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国家活动家不得不处理日常政治事务，不得不经常坚持所谓国家必要性的准则，因此受到很大限制，显然，如果一种新的或独创的思想事先没有受到公众的注意和没有经过公众缜密思考，他们也就提不出来。’

高贵的勋爵应当特别注意‘泰晤士报’上所说的下面一些话，因为这些话同勋爵的反驳有关，它说：“正因为这样，所以约翰·罗素勋爵的表现丝毫也不使我们感到惊奇，他在提到不久前在土耳其，特别是在它的欧洲边境发生的困难时，表示不同意不久前人们对这个问题所表述的那些观点，他也重复了——以一个官方人士的庄重态度重复了——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独立的古老的神话。但是，这类论据对我们是没有用。’

该文作者怎样知道高贵的勋爵不同意呢？（听啊！）文章继续写道：

‘我们不同意约·罗素勋爵的意见，好像除了必须讨论如果产生瓜分土耳其帝国的问题应当做些什么而外，对于欧洲说来也不可能有更大的灾难了。’

希望议院注意下面这段话，它们和俄皇的话几乎如出一辙：

‘我们认为，如果在讨论分割土耳其的问题以前，就开始分割土耳其，这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听啊！听啊！）这也就是那些话。往下该文作者继续写道：

‘对于一个国家活动家竟把他在土耳其帝国一旦崩溃时应当奉行的政策和导致瓜分波兰的政策混为一谈，我们只能表示惊奇。自然，从国家必要性

方面所作的考虑对于保存土耳其帝国不受侵犯和独立依然是有效的。但是这些可以有许多否定因素与之对立的考虑，实际上只是意味着害怕去解决重大和复杂的问题。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许多根深蒂固的成见（近年来尤其变本加厉），以致连讨论真正的问题的尝试在某些人士看来都是政治腐化和破坏各个国家赖以联系的一切法律的行为。'

下一篇文章发表于3月10日。也许议院认为在此以前所引用的表明'泰晤士报'撰稿人一字不差地使用紧急报告中的用语的证据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现在将要宣读的文章，会消除我们在这方面的任何怀疑。3月10日发表的文章一开头是这样写的：

'缅施科夫公爵此行负有更明确的外交使命。我们有理由认为，比起莱宁根伯爵的指令来，缅施科夫公爵的指令带有比较和解的性质。'

类似的词句在汉·西摩尔爵士2月21日的紧急报告中可以找到：

'涅谢尔罗迭伯爵阁下希望使我确信，缅施科夫公爵将接到的指令，带有和解的性质。'

文章继续写道：

'我们敢说，当代国家活动家一碰上涉及某些大地方的文明、恢复基督教曾经一度在全欧洲享有的优越地位、保证千百万人的进步和福利的问题，往往就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他们能够达成协议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用缠头把土耳其人打扮起来，并继续认为这是力量和权力的象征。'

3月19日内阁举行了会议，讨论了3月6日收到的紧急报告，3月23日发出了对紧急报告的答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虽然女王陛下政府认为必须坚持约翰·罗素勋爵2月9日密件中所阐述的那项政策的原则，但仍然乐于赞同皇帝希望继续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的愿望。'

当天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可以找到克拉伦登勋爵密件中的一些句子，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们对于奥斯曼帝国的现状及其前景的看法同约·罗素勋爵所持的并告知下院的观点不一致。我们这些看法同我国过去在许多场合所奉行的政策不同，也同大多数伦敦报刊并不那么出色和特别顺利地加以维护的体系根本不同。'

不列颠报刊可以以它没有坚持'泰晤士报'的观点为荣，尽管它并没有那些曾经动摇过殖民大臣的地位而且几乎把内阁推翻的利箭。'泰晤士报'的

这篇文章的末尾写道：

‘他〈皇帝〉声明说，他所希望的是同我国保持良好关系和博得我国的信任。他就这个问题进行的商谈将是对他的保证是否真诚的考验；但是，再不可能有比他准备今后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同不列颠政府合作的意愿更能证明他对土耳其以及欧洲其他地区的温和态度和善良愿望了。’

就在‘泰晤士报’宣布它使不列颠公众容忍瓜分土耳其的企图没有成功的那一天，拖延了整整16天的对紧急报告的答复送到了圣彼得堡。(听啊！听啊！）没有必要再从‘泰晤士报’上摘录一些引文来麻烦议院了。”

布莱特先生支持科布顿先生，为的是使帕麦斯顿勋爵能再次用咒骂俄国和假殷勤地坚持战争政策的办法来为自己博得声誉。帕麦斯顿在一个地方说：

“但是，我想，凡是长期以来密切注视欧洲事态发展的人都知道，俄国对土耳其的观点不是昨天也不是不久以前形成的。(听啊！）大家都知道，长期以来俄国的政策就具有明显而不变的目的，这就是至少占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然后再占领它的亚洲部分。这个政策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着，从来没有被忽略过。情况顺利就前进一步，遇到阻碍就后退一步，但这只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利用即将出现的时机。(听啊！听啊！）拖延日期决不是使俄国驯服并迫使它放弃自己计划的妥当办法。它的政策就是始终不忘自己的目的——不慌不忙，不过早地掠取它窥伺的东西以免得而复失，但密切注意其他欧洲国家政府的政策方针并利用每一个可乘之机朝着既定的终极目的迈进，哪怕只是很小的一步。”

如果把帕麦斯顿勋爵的这个声明同他在1829、1830、1831、1833、1836、1840、1841、1842、1843、1846、1848和1849这些年发表的声明对照一下，那末就可以看出，这次声明与其说是对布莱特先生的回答，不如说是对他自己过去的政策[115]的回答。但是，正当这个狡猾的敌人力图用对俄国的猛烈攻击来获得公众的同情的时候，另一方面他又以下述意见来博取沙皇的欢心：

“先生们，难道我因为俄国政府奉行类似政策而指责它吗?用合法手段执行的扩张政策是这样一种政策，你可以认为它对你说来是危险的，你可以把它当成威胁其他国家的独立和自由的政策而与之作斗争，但是只要这个政府所使用的是光明正大的、诚实的和公认的手段，不隐瞒，不规避，不欺骗，这种政策就不能成为谴责奉行它的政府的理由。遗憾的是，我应当承认，俄国政府在最近事变进程中所选择的道路，不是一条能够证明它公开承认和大胆宣布的政策是正确的公开直接的道路。”

但是，正如迪斯累里先生所说的那样，对俄国政府可以提出的唯一责难，恰好就是它的**无可救药的坦率**。由此可见，帕麦斯顿指责的是俄国没有做的事情，而完全赞同它在实际上所做的一切。

迪斯累里先生对秘密文件提出的批评像往常一样是聪明的，但并未达到目的，因为他声明说，批评现在是不合时宜的，他之所以要向议院发表演说，唯一的目的是拥护女王的诏书。令人懊丧的是，这样一个聪明人由于渺小的升官发财思想和出于党派政策的考虑竟然不仅在议会中，而且在自己的很有分量的喉舌“新闻报”上向任何一个帕麦斯顿大献殷勤。

在昨天的议院会议上，詹·格莱安爵士通知说，已接到关于舰队驶入黑海，现在正停泊在瓦尔那附近的消息。

阿伯丁勋爵在上院说，他打算在4月11日（星期二）建议议院会议延期到4月27日（星期四）举行。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4月4日
载于1854年4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俄国和德意志强国。——粮食价格

1854年4月7日星期五于伦敦

克拉伦登勋爵昨天在上院宣称，“他有理由认为”从敖德萨乘运输船出发的4000名俄军在多布鲁甲登陆的消息是不确实的。他不知道俄国舰队离开了塞瓦斯托波尔，因为塞瓦斯托波尔几乎一直是处在英国或法国军舰的监视之下。关于联军舰队看来没有动静的问题，他本来想说：只有投入整个联军舰队，才能对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进行封锁，但由于处在阴雨时期，这样做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此他认为，先让舰队停泊在贝科兹是非常妥善的。“泰晤士报”驻维也纳记者同意克拉伦登勋爵的这种见解，此外，还揭示了他采取这种策略的真实原因。自从关于“解放基督徒”的谈判公开以后，担心君士坦丁堡暴动就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了。因此，在有一支足以迫使土耳其人沉默的陆军以前，就把舰队撤出博斯普鲁斯海峡，是极其“不妥善的”。

约翰·罗素勋爵在下院宣称，雅典宫廷应对希腊的风潮负责，因为它——起初是秘密地，而现在则公开地——支持那些风潮。

这个星期议会的辩论，除了对穆尔先生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来审查任命赫·斯托诺尔为维多利亚殖民地法官案件的建议的争论外，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在议院的不公开会议上查明，这

位斯托诺尔在1853年斯来果镇选举时有贿赂行为。议院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但是实际上，对斯托诺尔先生的追究只是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已经分裂的爱尔兰旅[116]的两个派别之间斗争的一种借口。至于格莱斯顿先生的假仁假义的党羽和皮尔派拥护者们被吸引和卷入这出爱尔兰丑剧中的程度如何，这可以从“晨邮报”的下面短评中看出来：

“在所提交的信件、流传的谣言和最近几个星期向议会委员会提出的文件中，有许多令人更加怀疑的地方：参加联合内阁的皮尔派从前些时候起就不断利用一些爪牙来影响爱尔兰的选举，并且为此提供大量资金。名声特别坏的是纽卡斯尔公爵。正如所发现的，曾举行过（看来是根据他的指示）一次会议来讨论关于提拔那些搞选举阴谋的人员的问题。”

“每日新闻”今天发表了法国、英国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不过内容只是有关军事行动的协定。西方强国在条约中有意不写明自己“援助苏丹”的真正条件。这些条件是由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 in loco〔就地〕用威胁手段强加于人的，可是后来都作为土耳其政府的自愿行动被提了出来。

梅克伦堡公爵在柏林的和平使命，除了给普鲁士国王多添一个不参与西方同盟的借口以外，没有其他目的。我接到柏林来信，说俄国只有在国王保证重新命令瑞典港湾司令遵守旧的规定，即在海岸炮火射击区内至多允许4艘外国军舰抛锚停泊的情况下，才同意承认瑞典的中立。这个命令同瑞典和丹麦所采取的中立的规定有重大的差别，因此需要等待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谈判来确定。斯德哥尔摩正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俄国人将不再占领阿兰群岛，他们正在那里拆除自己的工事，并且运走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今天接到的电讯说，这些都已经做

了[117]。奥地利驻在匈牙利东南地区的corps d'observation〔观察兵团〕现在完全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并已进入给它们指定的在各地的阵地。集中起来需要10—12天。德国报纸一般认为，这支部队是在奥地利积极参加俄国一方的情况下被派去从翼侧向土耳其军队进攻的，而且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奥地利人只有通过麦哈提亚或贝尔格莱德才能深入土耳其，在麦哈提亚他们将碰上土耳其军队，而在贝尔格莱德则他们同土军拉开的左翼防线处于一条线上。因此非常可能的是，如果奥地利人怀着敌意进入土耳其，那末他们就会从贝尔格莱德通过克鲁谢伐茨和尼什向索非亚推进。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土军从维丁直接南下到索非亚的路程还是比较短的。

在普鲁士债务委员会向下院提出的报告中，阐明了普鲁士在东方问题上所实行的政策，并且发表了尚未被英国报刊掌握的某些外交文件，因此我打算从这个报告中摘引一些重要的材料。

1月底，在奥尔洛夫伯爵向奥地利宫廷提出有关建议的同时，俄国驻柏林大使向普鲁士政府提出了一个建议：邀请三国宫廷——普鲁士宫廷、俄国宫廷和奥地利宫廷——签订一个共同的议定书。在这个议定书草案的序言中提出，制定这个共同义务的动机是，希望三国同盟在面临着威胁欧洲和平的危险情况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希望调整三国之间以及在现有局面下三国同西方强国之间的关系。

这个草案包括以下三点：

(1) 两个德意志强国在英法积极参加俄土战争的情况下正式保证遵守严格的中立；其次它们声明，在西方强国施加新的压力或威胁时，如有必要它们决心用武力来维护自己的中立。

⑵ 三国将把法国或英国对奥地利、普鲁士或德意志其他任何一个邦的领土的侵犯，看做对本国领土的侵犯，并将根据情况和共同的军事协定（这个军事协定现在正由海斯将军和普鲁士陆军大臣在柏林拟定）相互援助，抵抗侵略。

⑶ 俄国皇帝重申自己的愿望：**将在他的尊严和他的国家的更所当然的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快**结束战争。但是鉴于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改变土耳其的现状，因此陛下保证，如果在这一点上同各海上强国订立协议，那末，不事先同**自己的德意志同盟者**协商，就不作任何决定。

这个草案附有一份涅谢尔罗迭伯爵的急件，在急件中总理大臣提醒普鲁士和奥地利注意长时期以来就是欧洲盾牌的三国同盟的重大意义。由于战争的威胁，皇帝陛下认为自己有向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发出庄严的号召的义务。他们的共同利益要求他们把对待如此重大事件的立场明确规定下来。他强调指出西方强国所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同时提请注意它们对德意志各邦的利益所采取的蔑视态度。而俄国却不是这样。它准备单独挑起战争的重担，而不要求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任何援助或牺牲。两个大邦和整个德意志的幸福取决于它们的联盟。它们用这样的办法阻止危机蔓延，而且也许会促进危机的解决。其次，俄国的急件中指出了德意志强国面临的三种互相排斥的可能性：同俄国联合起来对付海上强国，同海上强国联盟反对俄国，以及严格遵守中立。至于同俄国联盟，那末沙皇并没有这种需要；至于反对沙皇，那末只要德意志强国不让西方强国来吓倒自己，也没有可能。最后一点则是意味着屈从侮辱性的需要和迎接悲惨的未来。本土不可攻破的俄国，它不怕任何军事侵略，也不怕更为有害的革命精神的侵袭。

如果同盟者们离开它，那末它能够利用本国的资源，争取做到在今后没有它们的援助也行。(涅谢尔罗迭先生是用德文写的急件，他担心把急件译成别国文字会是一件绝望的难事。我引用原文中最后一句作为他德文写作的一个例子：Wenn seine Alliierten es verliessen，so würde es sich gesagt sein lassen sich auf sich selbst zurückzuziehen und sich so einrichten，ihrer in Zukunft entbehren zu können.）但是沙皇信赖他所了解的朋友和同盟者的感情，信赖他们的早已通过共同流血(Bluttaufe)和不可否认的原则的一致性同俄军发生联系的光荣军队。因此俄国内阁认为选择第三条道路是唯一的、值得德意志宫廷考虑的道路，是符合于他们的利益，并有助于（因为这条道路给他们保留了调停人的作用）实现俄国的特殊愿望的道路。当然，这种中立不应当是暧昧不明的，或者是十分短暂的，或者是待机行事的，否则它将被各交战国、特别是俄国认为是敌意的中立。这种中立最好应以在艰难的时刻不止一次地保证了普遍秩序和国际和平的原则（神圣同盟的原则）为依据。德意志强国的职责就是在必要时拿起武器来保卫他们的政策所依据的这些原则。如果两个海上强国之一（法国）有对德意志侵犯的意图或进行侵犯，那末另一个国家（英国）就一定会立即改变自己的立场。如果这样的事件发生，那末俄国无论如何会全力以赴地保卫德意志。

这个建议起初在柏林遭到拒绝，过几天又在维也纳遭到拒绝。当时还扮演着独立的国家活动家角色的曼托伊费尔给圣彼得堡发去了一份急件，急件中说，俄国虽然假装着似乎不需要普鲁士的援助，但是提出恢复三国同盟的要求来间接强求这种援助。曼托伊费尔指出，“至于俄国似乎并不害怕的革命精神，普鲁士也是在不请求外国援助的情况下把它压制下去的”。作为反革命首领“拯

救了”普鲁士的独立大臣，并不能掩盖他对于把没有自己的匈牙利的普鲁士同奥地利相提并论这一点表现恼怒。

正当普鲁士这样夸耀自己的安全时，在报告中暗示的其他一些文件都证明了在2月的最后几天奥地利把四强公约草案转给了普鲁士。普鲁士在3月5日的急件中拒绝了这个草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国家同时发表了一项声明，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政府仍然认为四强联合是顺利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因此连奥地利也不得不放弃可以结束两个德意志强国模棱两可的态度的公约。

普鲁士3月16日的急件中包括下列主要的一点：

“普鲁士内阁了解了奥地利为维护自己东南边境的利益而采取的措施。当然，普鲁士同其他德意志各邦一样，应当维护本身的特殊利益。但是这并不排斥同奥地利取得协议。相反地，普鲁士准备进行协商，因为这涉及维护德意志利益的问题。因此普鲁士等待着关于下列问题的较为详细的通知：

⑴奥地利是否打算占领与它接壤的土耳其领土以保证它边境地区的安宁？

⑵ 奥地利是否有意占领这些地区作为和平恢复以前的抵押？

⑶ 奥地利是否有意积极参加战争？”

对于普鲁士来说，这些问题的答复关系到弄清楚这样的问题：为了维护德意志的利益，可以提出什么要求，以及普鲁士为了缓和**西方强国**（而决不是俄国！）对奥地利所施加的压力，能否采取什么行动。

3月14日，普鲁士政府和奥地利政府分别给德意志宫廷送去两封彼此完全相反的通函，普鲁士的通函断定，日益逼近的战争将纯属局部的性质。相反地，奥地利却坚持这样的看法：战争的发展会十分密切地影响到奥地利本国的情况。只要情况允许，它将不参加战争，但仍然必须指出有参加的可能性。这里所涉及的

利害关系，对于德意志各邦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因此帝国内阁估计，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宫廷就把自己的力量同奥地利的力量联合起来。那时德意志联邦必将表明，尽管它采取防御立场，它在这一问题上准备起积极的作用。一旦西方强国同俄国真的宣战，奥地利就会发表新的宣言。如果一般说来还有防止目前威胁欧洲的危险继续增长的办法，那末这种办法就只能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意志联邦各邦支持下的联合行动。

其次，曼托伊费尔先生在这封通函中对委员会成员所提问题的忧郁的回答决不是没有意义的：俄国丝毫没有把自己的瓜分草案告诉普鲁士政府。

最后，我们从这个文件中知道，维也纳会议[118]的骗人把戏仍然没有结束。相反地，这个文件引用了普鲁士首相的话，认定新的议定书正在草拟，其中将确定**四强国之间要经常相互了解**。

粮食市场上的价格又上涨了。不久以前法国和英国的粮食价格下降的原因是投机商的活动发生了困难，他们由于资本不足和银根吃紧不得不大量抛售，以致粮食市场商品过剩。另一个原因是商人、磨坊主和面包商以为将有大批粮食运来欧洲各港口，因而决定销光自己的全部储备。因此我依旧认为，价格还远未到达最高峰。毫无疑问，在粮食市场的可能储备上，还从来没有一年有过像今年这样错误的和不可靠的投机行为，产生过这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受自由贸易派报纸的伪善行为激励的幻觉。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5月7日
载于1854年5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9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

当最初得到俄军占领多布鲁甲的消息时，以及在他们渡过多瑙河的真正意图能够从他们后来的行动中看出来以前好久，我们就说过，俄军这次机动的主要目的无非是改善他们的防御阵地。他们从那时起所采取的一切步骤以及对方所采取的步骤，都证明事实确是如此。俄军派往多布鲁甲的兵力有4—5万人，根据最可靠的消息判断，这些部队最远前进到切纳沃达—居斯坦杰一线。看来他们向锡利斯特里亚对面的卡拉腊什派遣了同样多数量，甚至更多的兵力，他们企图威胁这一要塞，并在条件有利时向它攻击。俄军把配置在布加勒斯特西面的部队，除后卫外全部撤走。而后卫由于无力在卡拉法特前面长久地支持下去，大概是向多瑙河对岸的塞尔维亚境内实行了小规模的进军，其目的可能是要表明俄军对塞尔维亚的中立抱着蔑视态度，并观察一下，少数穿军服的俄国人的出现会在塞尔维亚农民中引起什么反应，也可能是为了给奥地利占领这一国家制造借口。

毫无疑问，我们不久将会听到俄军撤离整个小瓦拉几亚的消息。那时他们的阵地又将如何呢？他们的正面将由特果维希特经沃耳特尼察和卡拉腊什通向切纳沃达，再过多瑙河由切纳沃达到黑海边的居斯坦杰。这是一个得不偿失的阵地。对俄军来说也确

是如此，尽管缩小正面本身对他们是有利的。同时，这也说明俄军部队向左移动了，因此原来好像是正面延长线的退却路线，现在已位于正面之后并且同它垂直。两个月以前，奥美尔－帕沙只要在锡利斯特里亚和希尔索瓦之间的任何一个地方渡过多瑙河，就可以切断俄军的退路，现在已经不可能了，除非是派遣部队在德涅斯特尔河口附近登陆。俄军这次机动的主要好处就在这里，甚至把多布鲁甲的一个军按长方形配置（一面和敌人的坚固阵地相连接，另一面靠海，其余两面是多瑙河的两个弯曲部，而且总共只有3座桥梁可以用来联系、增援或撤退）而造成的危险，也不能贬低这一好处。

但是，俄军的有利之处也只限于这一点。他们所得到的是能退不能攻的阵地。在沃耳特尼察到切纳沃达的一段正面前是多瑙河，只有几个地点可以渡河，而且这些地点，不是有设在较高的对岸的威力强大的炮台防守，就是有像锡利斯特里亚那样的永久性要塞防守。往下，由切纳沃达到海边的一段是卡腊苏湖泊和沼泽地、图拉真垒墙（这里的所有通路都重新改建得适于防御）、居斯坦杰要塞，而在翼侧，即在黑海上则有联军的舰队。在多瑙河以及图拉真垒墙的南面是比较荒瘠的地区，大部是高地，四面八方交错着由无数河流形成的陡峭的雏谷，没有任何桥梁。当然，这一地区不能认为是军队无法通过的，但是只有在军队坚信会到达有利的阵地、只会遭遇兵力薄弱的敌人而且通过后可以找到大量粮秣的情况下，才会去通过它。但是，当前的情况恰恰相反。如果俄军从图拉真垒墙向巴扎尔吉克以及从沃耳特尼察和土尔图凯向腊兹格腊特进攻，那末他们必须留下部分军队来封锁锡利斯特里亚和监视鲁舒克。他们在这样削弱了自己的兵力以后，通过这

一难以通行的地区到腊兹格腊特和巴扎尔吉克，那时他们会处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就会直接处在巴尔干山的支脉面前，这些支脉截断了他们的作战方向，而他们必须分成几支独立的部队，沿几条不同的道路通过。假设他们试图这样做，那末这几支独立的部队就有被从苏姆拉来的、兵力集中的敌军各个击破的危险，而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切断敌军的退路。我们甚至假定俄军克服了这一切障碍，而且，有 10 万人到达了瓦尔那和苏姆拉的近郊，那时又将如何呢？苏姆拉的地形不仅可以使 4 万土军抵抗 10 万进攻部队，而且可以使这支优势兵力甚至无力抵挡数量上居劣势的土军出击。同时苏姆拉还可以掩护瓦尔那，而瓦尔那的另一翼侧又有联军的舰队掩护。瓦尔那和苏姆拉合起来所形成的阵地，甚至比 1848 年拉德茨基元帅受皮蒙特人和意大利起义者四面围攻时所防守的维罗那到列尼亚哥的阿迪杰河阵地还要坚固得多。不仅如此，同苏姆拉和瓦尔那相呼应的，还有位于敌人翼侧方向上的鲁舒克和锡利斯特里亚，尽管它们看来薄弱，但是只要土军的主力还能从苏姆拉朝任何方向出击，那就不能成功地攻击它们。这两个要塞都在多瑙河岸，锡利斯特里亚对着俄军现在的阵地中央偏右之处，而鲁舒克则在它的右翼。只有在河的右岸才能将它们封锁住，这就是说，围攻部队应当直接配置在这两个要塞和苏姆拉之间，而根据一切情况来判断，奥美尔－帕沙正把他的大部分军队调往苏姆拉。因此，任何围攻鲁舒克和锡利斯特里亚的军队都必须拥有足够的兵力，不仅要对付这两个要塞的守军，而且要对付集中在苏姆拉的、至少占全部土军三分之二的兵力。另一方面，如果俄军经巴扎尔吉克进攻，那末同样需要足够的兵力，以便在平地上对抗从苏姆拉来的、占全部土军三分之二的兵力。此

外，俄军必须分兵封锁瓦尔那，至少要从北面，可能时还要从南面封锁，因为如果封锁不住瓦尔那也就不能夺取它，如果夺取不下瓦尔那，俄军就不可能越过巴尔干。如果再考虑到保障从鲁舒克到瓦尔那整个距离上各个军之间的交通线以及保障补给所必需的兵力，那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为了顺利地进攻苏姆拉和瓦尔那——土军在巴尔干半岛东部防御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两个据点，俄军的兵力必须超过土军在苏姆拉所能集中的兵力的两倍。

从上述一切可以看出，土军的行动是非常明智的。撤离多布鲁甲这件事，第一次清楚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奥美尔-帕沙具有高度的军事学术水平。死守这一地区及其要塞是没有价值的。这位土耳其将军不是让人员和武器遭到损失，而是立即命令他的部队在不使总退却的安全受到打击的情况下，只要一有可能就放弃各个据点，退向图拉真垒墙。因此，虽然俄军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土军却给他们以重创，占领了自己的真正的防御阵地，而没有给敌人反击的时间。土军只在重要据点以及主力或黑海上的舰队可以支援的地点才留有守军。因此在必要时，土军在瓦尔那和苏姆拉之间至少可以集中8—9万人，而且如果将派往卡拉法特的一部分兵力迅速调回原阵地（本来派遣这些部队就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只不过是由于政治上的惊慌失措），还可以加强这支军队。但是俄军要以两倍于这一数目或者更多的兵力渡过多瑙河是不可能的，至少在这次战局中如此。我们肯定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假定俄军是企图坚决进攻的，而且我们没有把英法辅助军队可能开到的情况估计在内，如果他们开到，那末俄军越过巴尔干的任何尝试都是不理智的。我们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因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说明目前交战双方的真实

情况。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战争只在俄土两国之间进行，那末即使土耳其因外交上的拖延而失去了进攻所必需的优势，至少在今年，君士坦丁堡不会遭到俄军侵入的威胁。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4月13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4月28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6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列施德—帕沙的照会。——意大利报纸论东方问题

1854年4月18日星期二于伦敦

据传英法两国政府终于互换了攻守同盟条约的批准书。条约包括五项条款，内容不详。

奥普之间的条约还没有签订——分歧在于普鲁士宫廷中有一部分人不同意占领俄属波兰的边界。

4月6日在雅典举行了纪念希腊独立一周年的《Te Deum》[1]。西方强国的大使们没有参加祈祷仪式。同一天雅典"观察家报"公布了国王的16道ordonnances〔敕令〕。国王在这些敕令中宣布撤销21个军官的职务，其中有将军、上校和其他军阶的军官，因为他们企图投向暴动者。第二天雅典获悉暴动者在阿尔塔遭到惨败。发生会战的地点本身就表明，暴动波及的范围并不大，它的唯一牺牲者目前还只是农民，即居住在和希腊王国接壤地区的希腊人。

读者大概还记得，1827年俄、英、法三国大使曾要求土耳其政府从希腊召回所有土耳其人，不管他们在那里是长期居住还是暂时居住的。在土耳其人拒绝这样做的时候，就发动纳瓦林会战

① 祈祷，在进行祈祷时唱《Te Deum laudamus》（"赞美我主"）。——编者注

来强迫他们服从。现在，土耳其政府向希腊人发布了类似的命令；列施德— 帕沙致希腊大使梅塔克萨斯先生的照会和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给不列颠领事们的通令还都没有在伦敦报纸上发表，因此我从 4 月 5 日的“君士坦丁堡日报”上把这两个文件译了出来。

“外交大臣列施德— 帕沙致梅塔克萨斯先生的照会的复照

1270 年 7 月 3 日（1854 年 4 月 1 日）于君士坦丁堡

我读了您在 3 月 26 日在决定离开我国首都时交给我的一份照会。鉴于土耳其政府就当前事件所提出的公正的抗议没有得到希腊政府的满意的答复，以及土耳其政府的 chargé d’affaires〔代办〕已奉命离开雅典，阁下如果也离开君士坦丁堡那将是适宜的。因此，我根据您的请求，特将您的护照送给您。由于从今天起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已经中断，我们决定，设立在我帝国各省的希腊办事机构以及希腊领事应立即撤回。居住在土耳其的希腊商人以及其他希腊臣民也应离开君士坦丁堡；但为保护希腊贸易的利益起见，我们给予他们两周的期限。对于那些居住在各省的希腊人，这个期限将自他们接到离境命令之日算起。业已证实，对我国边境诸省的侵犯，不是出于某种疏忽，而是出于希腊政府的姑息。尽管帝国政府完全有权扣留并没收停泊在我国港口内的一切船只，以抵偿我们所遭受的极其重大的物质损失，但我的至尊的皇帝认为，在仅仅涉及希腊政府的事情上不使希腊臣民遭受任何损失，更合乎他宽厚的本意。当希腊政府恢复比较符合正义的精神并尊重国际法和律令——jus gentium①时，才宜于研究当前的暴动所造成的损失的问题。因此，所有希腊舰船在规定期限内都可以不受阻碍地返回祖国。政府已下令各有关部门协助生活特别困难的希腊臣民离境，并对病人和体弱者尽可能给予方便。〈最富于基督教精神和最文明的奥地利政府是本着一种不大一样的精神来处理这类事情的，驱逐德森人的事件[119]就是一例。〉我认为，有必要重申，迫使我们作出这个决定的是希腊政府，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应全部由希腊负责。

列施德— 帕沙”

---

① 直译是：万民法（国际法的拉丁文名称）。——编者注

根据这道命令，3000名希腊人已于4月5日在君士坦丁堡被送上船，据悉，士麦那的帕沙已对居住在这个城市中的希腊人发布了命令。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向不列颠驻土耳其和希腊的领事发出的通令如下：

“1854年4月1日星期六于君士坦丁堡

阁下！我已得悉，侵入土耳其边境各省的希腊人正唆使苏丹的希腊臣民举行叛乱，并宣称，法国和英国政府准备支持他们推翻苏丹政权的企图。同时我还知道，他们采取了许多类似手法，使人相信，如果土耳其政府由于同希腊断绝了外交和贸易关系而一旦宣布准备将土耳其的希腊臣民逐出苏丹领土，法国和英国大使将保护土耳其的所有希腊臣民。因为这些推测会使人产生错觉，使那些心地善良的人陷入迷途，罪恶地加重任何战争期间所固有的灾难，所以我急于要向你们切实说明，这些论断根本没有丝毫根据。谁要是哪怕只有一瞬间相信如此明显、如此违背常识和事实的臆造，那他就是太无知和过于轻信了。然而遗憾的是，在那些比较闭塞的国家里情况正是这样。你们和我一样知道得很清楚，在苏丹抗击残酷的和不义的进攻的崇高举动中，英国和法国是完全站在苏丹这一边的。由此必然得出结论，两盟国政府对运动只能表示愤慨和憎恨，因为这个运动只能使俄国获益，即使替运动辩护也不能说运动是自发产生的。这一运动归根到底会使土耳其政府和它的盟国处于困难境地，它除了使那些为了极其虚幻的空想不惜牺牲生命的人遭到毁灭外，绝不会有什以好的前途。当然，我们怜恤那些由于暴力和无原则的政策而遭受苦难的无辜的家庭；但是我们既不能同首领们保持任何关系，也不能掩饰由于轻举妄动的党派的行为而在我们身上自然而然引起的那些感情。务请你们利用一切机会把本通令的内容告诉那些容易相信在本通令中遭到驳斥的谬论的人。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

除了德国人之外，对东方纠纷的结局有最直接利害关系的是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因此，了解一下这两个国家的不同党派的意图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没有意义的。都灵“同盟报”上的

一篇文章(我特地把它译了出来)使我们能够判断意大利立宪党[120]的观点。看来，这个党完全准备牺牲匈牙利，以恢复意大利的独立。奥地利帝国长寿的秘密正是包含在这种地方性的利己主义里面，这种利己主义使每个民族陶醉于幻觉之中，以为牺牲其他民族的独立就可以为自己争得自由。

“英国报纸竭力想使人们把当前的对俄战争看成似乎是争取欧洲自由和独立的战争。然而事实上它们所重视的只不过是英国的贸易利益而已；约翰·罗素勋爵所说的话可以证实这一点。他劝告我们意大利人要乖乖地呆着，要我们了解，奥地利迟早总会变得讲点人道的。可见，至少他承认了，奥地利在目前绝不能说是讲人道的。但是慈悲为怀的英国为了‘**欧洲的自由和独立**的胜利’硬要同奥地利结成同盟。至于法国的报刊，它们是不自由的。报纸违法，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是查封，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它们总是重复政府喜欢听的话。除此以外，法国报刊是不善于广泛阐述当前政治问题的，它们太喜欢赶时髦了。德国的自由派报纸对俄国怕得要命，只要想想俄国在两个最重要的德意志邦获得了多大的影响，这种恐惧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究竟希望什么呢？—— 意大利的独立。但是，只要还在谈论土耳其的领土的完整和以维也纳条约为基础的欧洲的**均势**，那末很自然，我们应当十分满意这种完全违反我们愿望的 status quo〔状态〕。俄国图谋什么呢？图谋消灭奥斯曼帝国，从而消除 status quo 的均势，并重新划分欧洲的版图。这也正是我们所希望 的。但是，可能有人反驳我们，说俄国是希望按照自己的主张重新划分欧洲的版图。然而正是这种情况可能对我们有利，因为不管是法国、英国或德国都不会容忍一个无论在领土或声势方面都已经过分的帝国再扩张它的领土和声势。因此，它们就不得不寻求反对俄国的支柱。而能够成为这个支柱的只有奥地利。对于奥地利，西方强国不得不慷慨万分，答应把从沃尔肖伐起到黑海止的整个多瑙河盆地，以及多瑙河下游的多布鲁甲和通向巴尔干的要冲都给它。那时归奥地利占领的土地将有：

(1) 居住着和奥地利本土民族同源的居民的广大地区；

(2) 对于德国贸易非常必需的那条大河的整个流域。

在这种情况下，至少从防御目的看来，奥地利将不再需要意大利；它统

治的除了现有的300万南方斯拉夫人和大约同等数量的达克·罗马尼亚人而外，还将加上大约600万南方斯拉夫人和400万达克—罗马尼亚人。

土耳其的完整和独立！两个夸大其词的说法。如果你们所理解的独立是人民自由地根据自己的原则管理自己的事务，使任何外国人都无权干涉，那末这种独立已经被凯纳吉条约大大地破坏了，并在不久前同西方强国签订的条约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colpo di grazia）。根据这项条约，土耳其已经不是由苏丹统治而是由西方强国统治，如果穆斯林和基督徒、胜利者和被征服者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如果占居民五分之四的莱雅能够携带武器，这就是说，土耳其已经不再存在，这就是说改造已经开始了，而这种改造除非通过暴力，通过严重的骚乱，通过400年来一直互相敌视的两种信仰的人们之间的肉体上的冲突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不想再多听关于土耳其独立的高调，这只不过是神话而已。

而领土完整呢！难道不是法国和英国按照同俄国达成的协议从土耳其夺走了包括伯罗奔尼撒、阿提卡、贝奥提亚、佛基达、阿卡尔纳尼亚、埃托利亚、涅格罗庞特岛①等地在内的有数百万居民的希腊王国吗？不是它们又是谁呢？难道不是法国从土耳其夺走了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英国和俄国让埃及得到部分独立吗？难道不是英国人在15年前占领了红海上的亚丁而现在正在觊觎埃及吗？难道奥地利不也是在觊觎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吗？既然正在酝酿着种种阴谋来反对现状，而现状也不能按照惯性再保持下去，那又为什么要谈保持现状呢？

因此，我们认为，俄国想消灭土耳其是打了一个好主意；而西方强国打算反击俄国的侵略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这些强国真正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它们不应当抛弃他们用以掩盖自己真面目的虚伪的外交手腕，而坚决决定消灭土耳其并重新修改欧洲地图。它们是会作出这个决定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4月18日

载于1854年5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68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即埃维厄岛。——编者注

卡·马克思

*希腊和土耳其。——土耳其和西方强国。——英国粮食贸易的缩减

1854日年4月21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们从“普鲁士通讯”中得知，著名的本生男爵并非奉召回国，而是根据他本人的请求延长了休假。伯恩施托尔夫伯爵受命做他的临时 locum tenens〔代理〕。

瑞典议会制宪委员会以12票对11票的多数决定，各大臣由于不久前研究简化税收制度问题时的表现，一律要受王国最高法院的审讯。

据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领事梅罗尼先生报告，奥地利人可以预料：如果他们把军队开进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人将以武力来抵抗他们。

4月3日梅塔克服萨先生离开了君士坦丁堡，因为在不到两星期的期间内竟有4—5万同胞来纠缠他。没有一个大使馆愿意暂时替希腊大使馆来办理日常事务。奥地利大使拒绝的理由是：既然法国和英国是希腊的保护国，那末正是它们的代表机构在此刻应当维护希腊的利益。普鲁士因为奥地利拒绝也表示不同意。英国和法国的大使却声明在这个时候要他们作为梅塔克萨斯先生的

代表出面是不适宜的。那些中小国家的代办则认为竭力回避表示同情或反感才是上策。因此，梅塔克萨斯先生只好把自己的随员留在君士坦丁堡。然而不久发现这位代理滥用土耳其政府所授予的职权，尽力地把护照发给希腊的莱雅，使他们有可能加入阿尔巴尼亚起义者的队伍。因此希腊代表机构的活动被完全取缔，而把签发护照的事宜交给由两个土耳其人和两个莱雅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办理。

与此同时公布的一项通告声称:任何一个希腊王国的臣民,如果愿意作苏丹的臣民，只要他找到两个可以信赖的人担保他是可靠的，就可以获得批准。侨居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公开威胁说要在临走前火烧和洗劫城市，因此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土耳其兵士日日夜夜在街上巡逻，在彼腊的大街上架着 50 门火炮。从日落到午夜，城内或郊外的行人和车辆都得点灯；而午夜以后禁止任何通行，并且特令禁止粮食外运。希腊天主教徒在彼腊的主教担保的条件下，被允许留在城市。这些提诺斯岛、安德罗斯岛和锡罗斯岛出生的人大都属于家仆等级。基德里亚岛居民上书土耳其政府，一致谴责希腊人暴动，同时恳求政府在执行反希腊人的一般措施时不要扩大到他们身上。特里卡拉的土耳其帝国属下的希腊人臣民的代表团也到特萨利亚来请求立即保护他们免受希腊强盗的迫害，这些强盗把整座整座的村庄焚毁，而对居民，则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赶到边界附近去受极为残酷的折磨。

土耳其人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西方盟友，不信任他们和敌视他们。土耳其人开始把英国和法国看做是比沙皇更危险的敌人，下面这两句话反映了一种普遍看法：“他们企图推翻苏丹和瓜分帝国，想把我们变成基督教居民的奴隶。”联军不在瓦尔那以北而在

君士坦丁堡南面登陆以后，在加利波利构筑工事来专门对付土耳其人。这座村庄所处的地带是个与大陆相连的狭长的半岛，它很适合作侵略军的据点。过去热那亚人就是从这里向君士坦丁堡的希腊皇帝进行挑衅的。此外，正统的穆斯林对新伊斯兰教总教长的就任表示愤慨，因为他们几乎把他看作是希腊宗教界的工具；同时，在土耳其人中间逐渐传播着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即宁愿满足尼古拉的单一要求，也不愿作一群贪得无厌的列强豺狼的玩物。

对联合内阁的不满和它的作战方法所引起的民愤是这样强烈，甚至连“泰晤士报”（它不能不或者用自己的发行量来冒险，或者停止对“群贤内阁”逢迎）也认为在星期三那天的报上猛烈抨击内阁是适时的[121]。

“晨邮报”驻魁北克记者写道：

“英国太平洋舰队十分强大，足以占领俄属美洲部分沿岸地区的所有堡垒和工事（这些堡垒、工事在国内是没有的），以及他们设置在福克斯群岛、阿留申群岛和千岛群岛（它们联成了一条从美洲海岸至日本的锁链）上的各个筑垒要点。这些岛屿盛产毛皮和铜，气候温和，而且有许多优良的港湾靠近没有好港湾的亚洲大陆，只要能占领这些岛屿以及俄属美洲部分，我们在太平洋的影响必将迅速增长，而且正好是在太平洋各国开始具有它们按理早就该有的作用的时期。我们的舰队可能在锡特卡岛上的新阿尔汉格尔斯克遇到有力的抵抗，这里是个天然形成的有利阵地，同时构筑有坚固的工事，配有六、七十门火炮。岛上约有1500人，其中500人是守军，还有一所建造过很多军舰的造船厂。其他据点大部分都有50到300人，其中为数不多的据点筑有相当结实的工事。假使我们占领了这个阵地，而法国希望得到一些领土作为我们占领这个阵地后对它的补偿的话，可以让它占据堪察加及其毗连的海岸。”

“官报”上登载的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贸易中心出售小麦的数字，表明小麦的出售量比1853年同时期有了惊人的缩减，而这一

点可以作为确定以往每次粮食收成数量的标准。

小麦出售量如下：

	1月	2月	3月
1853……	582282 夸特	345329 夸特	358886 夸特
1854……	266477 夸特	256061 夸特	227556 夸特

上周出售 36628 夸特，而 1853 年同一周内则出售了 88343 夸特。总之，这些数字说明 3 个月内出售的小麦比 1853 年同期几乎少了 50 万夸特，同时异常显著地证明了最近一次收成很差。

“粮食交易所快报”报道：

“到现在为止，由于从国外大量输入，人们没有严重地感到本国供应的不足；目前还有大量小麦和面粉正在从各国运往英国途中；但是，能否指望在未来一次收成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一直保持这么大规模的输入呢？美国已把它海港里储备的全部都给我们了；虽然我们不怀疑它在遥远的西部还有大量储备，但是把这些储备运到东部沿岸，再从那里运到英国，这当然需要付出昂贵的运费。北欧各港口差不多耗尽了旧有的储备，而对俄战争又排除了继续从黑海和阿连夫海沿岸得到供应的可能性。”

我们把上述这一切想法提供给读者们研究，不再作进一步解释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4 月 21 日

载于 1854 年 5 月 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72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又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希腊人暴动。——波兰侨民。——奥地利—普鲁士条约。——关于俄国武装的文件

1854年4月28日星期五于伦敦

最近从土耳其来的可靠消息完全证实了“论坛报”对俄国人撤离卡拉法特并进占多布鲁甲以及对希腊人暴动性质的看法。

“劳埃德氏报”[122]证实了这样的传说：俄国人解除了对卡拉法特的包围，并且撤出小瓦拉几亚的行动已告结束。在君士坦丁堡得到的最新的消息也证实俄国人没有进攻，而是相反地在加强多布鲁甲的防御。

至于希腊人暴动，“通报”昨天登载了4月25日来自维也纳的一封信：

“希腊人暴动没有在伊皮罗斯蔓延，但它的真实性质开始显露出来了。如果有人认为民族和宗教利益不曾成为一种无聊的借口，那末希腊王国的海伦匪帮首领们的行为就会消除此类谬见。大家知道，格里瓦斯和察韦拉斯一开始就为谁应当领导暴动者这个问题争执起来。这两个首领继续单独行动并且一有机会就毫不客气地相互攻讦。尤其是林里瓦斯，他自封为基督徒的解放者，但给他们带来的只是掳掠和火灾。苏利奥人决定禁止这些希腊首领进入自己领土，他们特别指责格里瓦斯，因为他在上月初曾请求在希腊大主教德温集斯特那里过夜，但第二天劫走了主人的财物和妻子。为了向这种兽行报

仇，大主教要求在阿勃迪— 帕沙手下当差。然而格里瓦斯的抢劫技艺在梅措房表现得最为高明。这个被俄国人的宣传蒙蔽了的城市，主动地给这位‘大元帅’ 格里瓦斯打开城门。于是他首先向基督教居民勒索了 20 万披亚斯特‘爱国’ 捐。这个数目还不十分人，人们也就缴纳了。可是格里瓦斯并不满足。他亲自访遍最有名和最富裕的市民，劝他们把自己所有珍贵的金银财宝，以捐款的形式送交银行。这种招摇撞骗的伎俩引起了不满，进行得既不顺利，也没有捞到什么便宜。于是格里瓦斯又忽然想出一个主意，这个主意可以说是抢劫技艺的杰作。他借口奥斯曼军队迫近梅措房，宣称为自卫起见必须把几乎整个城市焚毁，因此让市民们连同自己家眷在市大教堂集中。很快就在那里聚集了差不多 4000 人。正如格里瓦斯所期望的，他们随身携带了金钱、珠宝和最珍贵的东西，于是梅措房的全部财产就落在他手中了。这时候他开始把人们小群小群地放出教堂，然后让自己的爪牙异常粗暴地抢劫他们。这些就是在此以前在伊皮罗斯暴动中起了最主要作用的希腊首领的功绩。当时格里瓦斯对土耳其人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焚毁城市后他退往拉多维察方向的阿基鲁斯。在伊皮罗斯，除亚尼纳和布阿特以外，梅措房算是最繁荣的城市了。现在它变成了一片废墟，它的居民则变得一贫如洗。在整个城市里保全下来的房子不超过 100 幢。”

据传科苏特和马志尼打算到君士坦丁堡来，为此，列施德—帕沙发表声明说，不允许他们踏上土耳其国土。

建立波兰军团一事似乎没有遭到法国和英国大使的反对，但是碰到了另一种阻碍。维索茨基将军把一份有几千人签名、授权他全权代表很大一部分波兰侨民的文件呈递给土耳其政府和雷德克利夫勋爵。而上校扎莫伊斯基伯爵（查尔托雷斯基公爵的侄儿）也呈递了有许多人签名的类似文件，根据这个文件来看，另一部分波兰侨民则授权他来代表他们办事。英国大使考虑到他们彼此的矛盾，想调和一下双方的要求，并利用维索茨基和扎莫伊斯基为自己效劳，便提议不建立一个而建立两个波兰军团。

4 月 17 日帕斯凯维奇元帅到达雅西并在当天前往布加勒斯

特。

据“汉诺威日报”报道，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的攻守同盟条约[123]包括以下主要条款：

“1.奥地利和普鲁士互相保障它们德意志的和其他的领地（in und ausserdeutschen Besitzungen），对两国中任何一国的进攻，将被另一国视作对自己的进攻。

2.奥地利和普鲁士有互相支援的义务并在必要时采取联合进攻，如果缔约国一方认为德意志的利益处于危急之中，而另一方也同意这种论断的话。需要给予支援的特殊情况，在作为这个条约的组成部分的单独文件中另有规定。为保证条约的效力，有关的军事力量将在一定的规定期限内处于准备状态。关于这种期限以及军事力量的数量和使用方法将另行协议。

3．邀请德意志联邦全体成员参加这个攻守同盟并遵照联邦法所规定的义务给这个同盟以支援。”

把这个条约同涅谢尔罗迭伯爵向普鲁士宫廷提出的中立协定比较一下，就可以在它们中间找到许多共同点。同时也必须指出，条约实际上仅仅符合防御政策的需要，如果实行进攻政策时，一切决策还得由有关宫廷另行决定。

4月25日普鲁士第一议院根据该院委员会的建议批准了3000万塔勒的公债。曼托伊费尔先生就此事引用了内阁提出的根据，这些根据，对于力图以爱国的姿态和愚蠢的傲慢态度来掩饰自己内在软弱的普鲁士外交来说，是十分典型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文件 in extenso〔全部〕引出来。曼托伊费尔先生说：

“俄土之间产生的、后来波及西方强国的纠纷，是人所共知的。普鲁士政府考虑到自己的处境和利益，认为调解这些纠纷和消除各种分歧是适当的。但它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仿佛有一种什么恶运和这个问题纠缠在一起似的。很多本来有助于恢复和平的尝试并没有得到什么效果——这也许是因为它们作得不合时宜和方法不当。于是分歧的加剧便导致战争。普鲁士和奥地

利为保证维持和平所作的努力，可以说为恢复谈判奠定了基础。这就是维也纳会议的主要目的。在这次会议上普鲁士政府一直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和平。它本着和解的精神〈作为尼古拉皇帝的“和平使者”〉行事，但它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所以又始终不渝地保持坚决和果敢的态度〈和俄国皇帝在密函中所说的一模一样〉。正因为普鲁士政府〈对于成为俄国的一个省份和改变局势〉没有利害关系，正因为它无私的（uninteressiert）立场已为别国公认，所以它也就能够公开和果断地说话。敌对双方对它的倡议和努力的态度时而感激，时而抱憾。然而政府不想离开它既定的道路。独立是任何大国存在的首要条件。普鲁士政府善于维护这种独立，为和平而行动，并不因这个或那个国家对它的行动是否喜欢而有所顾虑〈大国独立的十分微妙的定义！〉。由于时局更加恶化，政府决定一方面为维护和平作出巨大努力，同时也有责任首先维护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利益。为此目的，它和奥地利签订了条约。德意志联邦的其他成员也将加入这个条约。因此，我们可以切实地指望奥地利和全德意志的合作。政府认为，这个合作是对德意志各邦最好和最可靠的保证。在结成这个紧密的同盟的同时，以前普、奥同西方强国在维也纳会议决议基础上缔结的协定仍然有效。普鲁士并不像英国报刊所说的那样已经同西方强国疏远了。和西方强国的这种协定至今仍然有效。把协定固定下来的议定书已经由普鲁士大使签署，但是还不能呈交议院。这四强国保持着自己先前的地位并将像过去一样为恢复和平而努力，尽管其中两国开始了军事行动〈而这就证明战争是为了转移视线而进行的，和平谈判才是西方政府真正要作的大事〉，至于说到俄国，圣彼得堡内阁最近采取了比较友好与和平的步骤，虽然现在对恢复和平只抱微弱的希望，但它毕竟为新的和谈打开了大门。普鲁士政府表示自己准备到最后一分钟也相信可能实现和平。只要和平还有最后一线希望，普鲁士绝不放弃自己的一切尝试和努力（Mühen）。对于普鲁士有决定性的时刻一旦到来，〈Trema Byzantium!〉〔发抖吧，拜占庭！〕，**政府将**毫不迟疑、绝不犹豫和毅然决然地**行动起来**。普鲁士必须准备好迎接这一时刻。只有它每分钟都准备好拿起武器，它的话才具有更大的分量。当俄国和土耳其发生冲突时，西方强国表示了强硬态度，支持了奥斯曼政府。当时普鲁士没有受委托作调停人。除了第三国的权利遭到破坏外，它最为关心的是本国臣民的安宁。东方问题涉及普鲁士比涉及奥地利的程度小，因为奥地利在这个问题上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于是它坚决请求普鲁士

不要拒绝和它合作。普鲁士和奥地利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限制双方过分的、使恢复和平的使命受到阻碍的要求。正是它们的努力促成了维也纳会议的召开，这个会议被公正地看作是值得庆幸的事件。我国政府不能避开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它还可以对西方强国起良好的〈对俄国来说〉影响。政府可以充当联系这些国家的纽带，也许还将为增强实现和平的希望作出贡献。至于四强国给俄国政府的照会的草案，那末不应忘记，俄国一直不承认会议，同时不能忘记，由于新情况的出现，这个草案已成为土耳其所不能接受的了。新的维也纳议定书〈在这里曼托伊费尔先生给我们揭开一个很重要的秘密〉可以为普遍和平，至少为防止普鲁士和德意志参加战争，提供新的可能。早些时候奥地利要求德意志联邦议会遵守对普鲁士来说也必须遵守的严格的中立，然而政府按自己的打算行事，认为不能同意奥地利的要求。它认为牺牲独立强国的地位和放弃决策的自由都是办不到的。况且，这种中立可能会被其他国家看作是对我们采取敌对立场的借口，只要它们认为这个立场适合自己的利益。现在西方强国的处境由于它们的新情况〈维也纳议定书[124]〉而发生极大的变化。最不利的情况是，和平将不能实现，然而最有利的情况是，战争所引起的一切严重灾祸不会涉及我国；这是巨大的、无法估价的好处。〈假如谁能理解这样的抉择，我准备给他智能的敏锐以应有的赞扬。〉俄国与西方强国之间在波罗的海和黑海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使得普鲁士不得不考虑到它作为大国的地理位置〈与其说大，不如说是长〉，并且为保卫自己利益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手执武器，以防万一。不管怎样，政府面对过去是不畏缩的〈如果这一般能意味着什么的话，那就意味着，它并不以自己的过去为耻〉，同时为它能有机会畅抒己见而感到高兴。”

不言而喻，委员会认为这一番解释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在“圣彼得堡报”上刊载了下面一些新文件：

“警察司命令

1854 年 4 月 15 日

兹奉皇帝陛下旨意，命令如下：当目前交战之际，近卫军和海军部队退伍的兵士，凡自认为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勤劳能干者，如愿再度服役，可享有近卫军和陆军退伍军官之待遇。

将军衔侍卫长 **加拉霍夫**

给政府化了的参政院的命令

鉴于建立桡桨战船后备队是加强芬兰湾沿岸警戒措施的良策，特命令如下：

1. 组织四个海上非常后备军战斗队作为配备该战船队之桨手；

2. 此种战斗队由下列省份征集的自愿者组成：圣彼得堡省、诺夫哥罗德省、奥洛涅茨省和特维尔省；

3. 责成由海军部长官康斯坦丁·尼古拉也维奇大公殿下以及国家产业大臣、皇室地产大臣和内务大臣组成之委员会采取必要措施来建立此种战斗队。

尼古拉

1854年4月14日于圣彼得堡

海上非常后备军条例

一、海上非常后备军建立的目的和组成人员：

1. 海上非常后备军建立的目的，在于配合桡桨战船后备队，以防卫芬兰湾沿岸；

2. 该后备军由四个战斗队组成；其编制和内部机构由海军部订定；

3. 身体健康者，不论其出身如何，均可按下述原则自愿参加后备军。

二、招收办法：

4. 自愿加入海上非常后备军者必须通过合法手续，地主的农民应持有地主或庄园管理人的特别许可书；

5. 圣彼得堡的自愿者一律在海军检察署报名，各省城的向各省长官报名，各县的向各地方警察当局报名；

6. 报名者必须呈交身分证，然后立即发给一张注明报名时间的普通证件。身分证须立刻送到海军检察署，自愿报名者亦须同时前往检察署，如果需要路费，可提前发给一月薪金，并在证件上注明；

7. 责成地方警察当局严格督促自愿者迅速前往圣彼得堡，并予以多方协助，万一自愿者中途生病，应给予必要的关照。

（第八和第九两点无关重要。）

三、服役条件：

10．参加海上非常后备军者从向检察署报名之日起可以领到：

(a) 月薪8银卢布。

(b) 与海军兵士等量的口粮和海上食品。

(c) 农民式的服装，而且准许留à la paysanne〔农民式〕的胡须和头发。

11．服役期限到1854年11月1日为止；

12．期满后对任何一个自愿者不得加以阻留；

13．立功者奖赏办法与现役兵士同；

14．俘获或在炮艇协助下击沉敌方舰船时，在炮艇上服役的自愿者依据法律有权分享缴获的财物；

15．参加非常后备军的自愿者如受伤或残废，同军人一样得到照顾和优待；

16．责成地方当局和社会团体在自愿者服役期间，对其家属予以特别照顾。

康斯坦丁
基谢廖夫伯爵
彼罗夫斯基伯爵
德米特利·比比科夫”

再也找不到比上面引用的文件对俄国的描绘更简要、更好的了：皇帝、官员、农奴、à la paysanne胡须、警察司、海军陆战队桨手、村社、陆地和海洋——这是“整个俄罗斯”的全景。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4月28日
载于1854年5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79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炮击敖德萨。——希腊。——门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伊费尔的演说[125]

1854年5月2日星期二于伦敦

联军多次幻想实现的对敖德萨的炮击终于进行了。但是迄今为止所收到的电讯很少而且非常不详细，因此还不应加以评论。据最可靠方面消息，这次炮击是4月22日开始的，于4月23日停止（这一天建议城防司令投降），而于4月24日又恢复炮击。有的报道说城市很大一部分已被完全摧毁；又有的报道说只有堡垒受到燃烧火箭和爆炸弹的毁坏。某些方面人士甚至断言这次炮击根本没有任何结果。有些电讯则报道说击毁了8艘俄国船，当然是商船，因为在敖德萨没有停泊俄国军舰。据4月26日敖德萨发出的最后消息说，整个联军舰队就在这一天早晨离开了。

法国政府为了制造对这一事件的舆论，在“通报”上立即发表了海军上将安梅林最近向海军大臣所作的报告中的以下一段话：

“4月6日，英国蒸汽巡航舰‘怒涛号’驶近敖德萨，要求接运领事和因战火逼近而希望离开这个城市的英法臣民…… 虽然在巡航舰和小艇上都挂有军使旗，俄国炮台在小艇离开防波堤几分钟以后背信弃义地向它开了7

排炮…… 我同邓达斯海军上将正在讨论惩罚这种野蛮行为的办法。”

俄国人对于整个事件有另一种说法。他们断定，派遣挂有军使旗的船只是侦察他们的防御工事的一个借口。不久前“复仇号”军舰以递交急件为名驶抵塞瓦斯托波尔港，而实际上是为了描绘港口内炮台的分布图，这使沙皇大为震怒，尤其是英国报刊对这一功绩的大事喧染证实了沙皇的怀疑。因此发布了一项向一切在俄国务港口出现的船只开炮的命令。“比利时独立报”[126]发表了有关这些事情的一封信，这封信看来像是一位俄国军官自敖德萨发出的，而实际上显然是基谢廖夫先生捏造的。

“3月27日（4月8日）清晨6时，没有挂军使旗的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蒸汽舰‘怒涛号’驶近敖德萨的卡兰亭港的防波堤。尽管军港司令得到过向一切英国军舰开火的命令，但是他还是决定暂缓执行这个命令，估计这艘军舰可能还没有接到英国已经宣战的通知。‘怒涛号’抛了锚，放下了小艇，派它挂着军使旗向岸边划去。军港司令立该派自己的副官迎接坐在小船上的军官。这个军官声明说，他被派来接运英法两国的领事。当时告诉他说，这些先生早已离开敖德萨，因此要求他立即离开；这样小艇就被放到了船上，军使旗也收下了，但是并没有起锚，船上的军官们都在描绘炮台的图样。当时为了阻止他们，曾向‘怒涛号’放了空炮，而‘怒涛号’竟置之不理，因此向该舰的一个轮子打了一炮。‘怒涛号’立即驶离了港口。”

英法舰队在对俄国港口采取军事行动以前，先要等待俄国人提供“借口”，但即使在这个时候，它也没有能够夺得这个港口，而只是受到好几排炮的款待，这显然太可笑了。

大约在“怒涛号”被派往敖德萨的同一时候，在君士坦丁堡收到的敖德萨的来信证实，俄国政府没收了所有存放在仓库中的粮食，而根本不顾这是外国商人的私人财产。一共没收了80万夸特粮食。此外，俄国政府还要外国商人提供15万个麻袋和15000

辆大车，以便把没收的粮食运往内地。总督在答复抗议时说，正是西方强国的政策促使俄国政府采取这种极端行动，只有没收他们的财产，才能使这些财产免遭愤怒的居民的抢劫。留在敖德萨的中立国家的领事提出抗议以后，总督最后同意不偿付没收的商品，而只发给所有者简单的收据。

我们再从斯德哥尔摩的一家报纸引证一段话：

“整个城市挤满了从芬兰逃出的难民，其中有很多人是为了躲避俄国人征兵而从阿兰群岛逃出来的〈显然阿兰群岛仍旧被俄国人占据〉。俄国舰队感到水兵非常缺乏，而且当局不分老少地抓人。家长在夜间被赶出了家，连一分钟收拾时间也没有。为了躲避这种横暴行为，人们阖家带着日用杂物逃往瑞典。”

4月23日“圣彼得堡报”刊载了沙皇给臣民的告示，其中说同西方强国的这场战争是正教教会反对异教徒、为解放受奥斯曼帝国压迫的教友而进行的战争。

我们今天在巴黎“新闻报”上读到：

“我们驻君士坦丁堡的一个记者向我们报道了关于不久前被揭发的俄国阴谋（关于这一阴谋的侦讯刚刚结束）的重要细节。侦讯清楚地表明，俄国早就在制造危机，由于这个危机，‘病人’应当让自己的医生亲眼看着而走进坟墓。侦讯证明，埃尔斯纳男爵过去在土耳其警察局供职，只是为了更好地欺骗自己的 surveillants〔监视人〕。根据表报，他每月得到1000披亚斯特。尽管他很狡猾，但是他玩的两面派手法还是这样被揭露了：他同在土耳其供职的医生阿斯帕先生结交，认为他可靠，便坦白地对他说，虽然他从土耳其警察局领取薪津，但并不停止为俄国服务。据埃尔斯纳先生说，俄国打算从居住在土耳其的希腊人和斯拉夫人中间招募一支由6万个阴谋者组成的军队，准备根据预定的信号动手，从内部给予君士坦丁堡以坚决的打击。在这个城市里领导这个阴谋的是一个叫做普兰塔詹纳·哈里逊的英国人。阿斯帕先生假装赞同埃尔斯纳的意见，然而把他的情况告诉了土耳其警察局。早就

怀疑埃尔斯纳的警察局，对他加强了监视，并且发现他经常向哥尔查科夫公爵送报告。最后警察局截获了一份报告。一向行动很谨慎的埃尔斯纳不慎把这份报告交给阿斯帕先生看(阿斯帕马上把他的情况向土耳其警察局的一个密探帕拉马里先生作了汇报)，并且当着阿斯帕的面把这份报告交给了腊德施奇(他是奥地利来的斯拉夫人，同埃尔斯纳和他的同谋者保持着联系)。在搜查时，从腊德施奇身上搜出的一封信也是一个物证。后来又查明，埃尔斯纳同希腊商船船长康斯坦丁诺所有过协议，他们曾商定再吸收 40 名希腊船长参与这个阴谋，而这些人必须在指定的日期把弹药运到君士坦丁堡，并供给在首都希腊居民中间举行暴动所必需的一切物资。康斯坦丁诺斯不仅同埃尔斯纳保持经常的联系，而且同希腊驻土耳其大使梅塔克萨斯先生保持经常的联系。俄国上校博迪纳罗夫担任埃尔斯纳和哥尔查科夫公爵之间的联络人。”

在“奥格斯堡报”上出现了一些非常敌视俄国的文章，这些文章在德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因为该报在此以前一直非常热心地捍卫俄国利益；而且大家都知道，奥地利内阁是该报的后台。在这些文章中说，在汉·西摩尔爵士的秘密往来的公文的内容被揭发以后，奥地利应当认为自己不受对俄国所承担的义务约束。我们在一篇文章中读到：

“俄国的行动迫使奥地利向圣彼得堡提出了抗议书，而圣彼得堡在接受这个抗议书时态度非常傲慢，对维也纳内阁如此无礼地加以鄙视，以致自君士坦丁堡发出的每份新的紧急报告郡引起沉重的预感。由于缺乏应有的尊重和重视，门斯多尔弗伯爵不得不请求任命他担任旅长以免去他在圣彼得堡的职务，尽管他个人没有理由抱怨。”

因此，他的职务就由埃斯特哈济伯爵接替。在另一篇文章里则有这样一段话：

“当俄国皇帝到奥里缪茨时，他对待布奥尔—绍恩施坦伯爵非常无礼，甚至可以说是侮辱，大家把觉察到了这一点，涅谢尔罗迭和美延多尔夫感到非常难堪（我要提醒你们读者，涅谢尔罗迭惯于挑拨他的至尊的皇帝干这种无

礼的事情，然后再为他悲痛〉。年轻的皇帝是亲眼见到人们怎样对待他的大臣的，他忘记不了这件事。汉·西摩尔爵士的信只能促使更快地作出为皇帝陛下早已认可的决定〈阻止俄国对奥地利侵犯〉…… 奥尔洛夫伯爵在驻维也纳期间拒绝代表君主承担在任何条件下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的责任。”

“泰晤士报”驻君士坦丁堡记者特别强调指出这种局势：希腊人暴动必然会导致希腊的革命，即必然会导致民族派同俄国的拥护者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帕沙在保加利亚的残酷镇压显然会使人民向往俄国。请允许我举出一些能够说明希腊同西方强国关系的事实。在“马赛新闻”可以读到4月17日发自君士坦丁堡的如下一则消息：

“居住在雅典的欧洲人现在正遭受着一切可能遭受的凌辱。甚至有人拿棍棒来对付他们，而希腊的宪兵队根本不制止这种行为。3月15日，法国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前驻雅典的法国领事的儿子加斯帕里先生被打倒在地上，当时有3个宪兵在场，竟然袖手旁观。就在同一天，其他法国人得到消息说，将遭到‘惩罚’的96个‘法朗克人’的名单已经拟定。这种过火行为迫使英法两国的代表向奥托国王政府提出一个联合照会，说明任何一次对英法臣民施加横暴行为都将立即赔偿25000德拉马。4月12日又向希腊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限期在5天内，即在4月17日以前答复。在这个最后通牒中，要求奥托国王赔偿法国人所遭受的损失，严厉谴责暴动，以及追究由于奥托国王的姑息而造成的罪行。谁也没有期望国王会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大使们在接到否定的答复以后，决定同该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同时根据议定书（议定书确定建立希腊王国）以英法两国的共同名义开始执行‘希腊行政官’的职务。”

希腊政府向驻各国外交代表发了通令，为希腊不久前在同土耳其政府发生争执时所采取的行为辩护，据帕伊科斯先生说，土耳其政府最近对待希腊臣民的一些措施是由于土耳其对现在已经

不能把希腊看做是自己的领地这一点的恼怒而引起的，这也正是土耳其20年来对希腊阴谋活动的根本原因，特萨利亚和伊皮罗斯的暴动只是进行这种活动的借口。

4月28日维也纳“新闻报”[127]刊载了丹尼洛国君向门的内哥罗族首领发出的呼吁书：

“我希望你们门的内哥罗人应当以我们的胜利的祖先（他们遗留给我们自由，我们为此在全世界面前感到骄傲）为榜样，使自己在今后成为像希腊人和其他民族那样的英雄。因此，我想从已经入伍的兵士那里了解我是否能够信赖他们，并且命令每个首领把本族基干召集起来。让每一个兵士自愿地申述他是否愿意跟随我去同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国家的共同敌人——土耳其人作战。你们首领们应该接收所有的志愿者，并把报告寄交策丁耶我处。但是我号召所有不愿意英勇牺牲的人留在家里。跟随我去的人必须忘掉自己的妻子儿女，忘掉他所爱的世界上的一切。我要告诉你——我的勇敢的人民和你们——我的弟兄们：谁不愿意同我一起去死，那末就不要离开原地；因为我知道，一个跟随我去作战的人要比50个胆小鬼宝贵得多。我号召所有心还没有变冷的勇敢的人，所有决心为祖国、为正教教会、为神圣的十字架而毫不犹豫地去流血的人们同我共享光荣和美誉。我们不愧是战胜了3个土耳其大臣、打败过法国军队并冲击过苏丹的要塞的门的白哥罗先辈的儿子。我们决不出卖自己的祖国，决不放弃我们祖先的光荣，为了上帝，让我们去战斗吧。

丹尼洛

1854年3月15日于策丁耶”

在“阿格拉姆报”[128]上可以读到：门的内哥罗各族首领为了响应对狂热的门的内哥罗流民发出的这个号召，召集了年轻的战士，向他们宣读了呼吁书，并且有4000个人在圣坛前宣誓“为信仰和祖国”去战胜敌人或战死。不能不指出这一运动同普鲁士独立战争[129]（在科尼斯堡的多纳将军和整个普鲁士Treubund[130]都非常虔

诚地纪念这次战争）的口号和愿望有奇怪的类似。通过尼克希奇向黑塞哥维那前进的门的内哥罗人部队将由丹尼洛国君亲自指挥。从南方经过扎勃利亚克向阿尔巴尼亚推进的部队将由格奥尔基·彼得罗维奇将军率领。

“阿格拉姆报”写道：“山地居民得到很好的弹药供应，并且这两个军都将拥有12门三磅半的加农炮。”

开始军事行动的信号将由直接从圣彼得堡得到指示的柯瓦列夫斯基上校发出。

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得到了3000万塔勒后，分别解散了两院的议员，并发表了告别演说，现在我引用其中一段最有代表性的话：

“先生们！你们同意这个贷款，这就使政府有可能沿着过去所走过的道路继续前进，在这条道路上，它一直同奥地利和整个德意志保持完全一致（in voller Einigkeit），并且同其他强国一致；这就有可能使普鲁士在解决目前欧洲所关心的重大问题时保持它所应起的作用。”

请允许我指出，在英国报纸登载的关于这篇演说的电讯报道中，把“同其他强国一致”误译为“同西方强国一致”。普鲁士抱有更大的目的。它希望在同似乎是交战的双方一致的条件下争取缔结和约——究竟希望同谁一致呢？

就在冯·曼托伊费尔先生解散议院的那一天，他又幸运地在自己的党的réunion〔会议〕上发表了第二篇演说，这篇演说比上面引用的那些官场行话要精确得多、动听得多。这篇演说是最典型的普鲁士现代作品。它蕴藏着普鲁士国家的全部智慧的in nuce〔萌芽〕。

他说：“先生们，有一个词被大家用滥了，这个词就是自由。我并不反对

这个词，但是我的座右铭是另一个词，这个词就是**服务**（Dienst）。先生们，在这里开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上帝和皇上服务，我引以自豪的是我能为这样的皇上服务。**服务**这个词正在把普鲁士国家团结起来，虽然它还在整个德意志的国土上（in deutschen Gauen）被乱用。这个词应该把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不管我们所处的地位怎样。**为皇上服务**，这就是我的旗帜，同时也是在这里开会的所有的人的旗帜，现在救星就在这里。先生们，为皇上服务万岁。”

曼托伊费尔是对的，因为现在除了为皇上服务的普鲁士以外没有其他的普鲁士。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5月2—5日

载于1854年5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80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不列颠的财政

1854年5月9日星期二于伦敦

虽然炮击敖德萨这种毕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行动曾经引起人们很大的激动，但是目前更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另一种炮击——炮击公众的钱袋。在分析格莱斯顿先生昨晚在下院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财政状况的报告之前，必须首先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他所实行的财政措施。

迪斯累里先生在任大臣时，曾把国库期票的利率降低到每天$1^1/_4$辨士，即降低到从未有过的最低限度。但是格莱斯顿先生竭力超过他的前任，进一步把利率降低到1辨士，而不考虑迪斯累里先生降低国库期票利率时货币十分充足而且不值钱，但在格莱斯顿先生打算超过他的对手时货币很少而且非常值钱。因此，这位伟人不得不为了国库期票而付出300万英镑；如果他不去干涉，国库期票还会按照过去的利率继续流通。不仅如此！政府还没有来得及依靠使国家财政受到巨大损失的办法来收回国库期票，就不得不发行利率更高的新的债券了。这就是牛津诡辩家的卓越天才的第一个明证，他总认为在自己身上集中了全部天才，因为群贤的联合内阁把托利党政府的财政计划推翻后才替换了托利党的政府，这样也就是宣布财政是联合内阁政策的最强有力的一个方面。

格莱斯顿先生并不以短期国债的这些措施为满足，他在长期国债上又进行了一个更不寻常的试验。1853 年 4 月，他向下院提出了一项关于转换南海公司股票和其他国家有价证券的十分复杂的计划，结果在半年到一年之后他不得不付出 950 万英镑。有一点指出得十分公正，这就是他这么作的时候，已经得到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的密件以及罗斯上校和坎宁根领事的警告，因此他对于俄国政府的敌对意图和欧洲战争的临近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了。大概读者还记得，就在格莱斯顿先生提出他的计划的时候，我曾预言[131]，这个计划将要失败，而且由于这个计划，政府在会计年度结束时将不得不借 500 万或 600 万英镑的债。我这样断言时，决没有估计到东方的复杂局势。除了东方的复杂局势以外，格莱斯顿先生计划的不切实际的形式未必能迷惑得住证券交易所里的那一伙投机分子；不需要有特别的远见，就可以预见到将要发生歉收，因为淫雨使播种面积比往常大大减少了；而收成不好势必引起国内黄金和白银的外流；金银外流当然不会制止已经出现的金融市场上利率提高的倾向，而在金融市场上利率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如果认为提供贷款的公众肯让自己的有价证券的利率降低，或者认为他们不去利用格莱斯顿先生的试验给他们提供的可能，即要求按票面价值偿付自己的有价证券，以便在第二天再把得到的巨款加上纯利重新存放，那是十分可笑的。事实上，在会计年度结束时，格莱斯顿先生不得不按照票面价值为南海公司的分年偿还的债券付出 600 万英镑，如果不是他干预的话，这种债券目前在证券交易所里每 100 英镑只值 85 英镑。这样一来，他没有任何必要而浪费了 600 万英镑的国家资金，而且，由于实行这一杰出措施，公众事实上至少损失了 100 万英镑；而国库的结余在 1853

年 4 月是 780 万英镑，到 1854 年 4 月战争的期间已经降到 2778000 英镑，即减少了五百多万英镑。格莱斯顿先生提出的这个毫无用处的转换计划，是政府现在不得不努力克服的一切财政困难的基础。格莱斯顿先生在 3 月 6 日，即在宣战前 24 天说，他的全部措施的前提是用于今年开支的资金应当在今年筹出来；还说由于他采取了种种措施，战争负担只是在目前才感觉出来，根本谈不到要在金融市场上寻找贷款。这番话他在 3 月 22 日重复过，甚至在 4 月 12 日又重复一遍。然而在 4 月 21 日议会休假期间，就发出正式通告说，需要借债并将发行 600 万英镑的国家债券。读者们大概还记得，国库债券是格莱斯顿先生发明的，并且是和他的转换计划同时实行的。

普通国库期票是一种为期 12 个月的债券，通常在期满时掉换或者偿还，而且期票的利率是随着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波动的。相反地，国库债券规定了几年内一定的利率，这种债券本身就是一种可以用简单的签写转让背书的方式实行转让而不需要买方或卖方出任何附加开支的定期利息。总之，可以称它们为铁路证券的仿制品。格莱斯顿先生在 1853 年第一次发明这种债券时，得到了发行 3000 万英镑债券的权利，并且十分赞赏自己的发明，认为这 3000 万英镑不能满足需要，实际价值将大大超过票面价值。但是"公众吞下 40 万英镑稍多一点就饱了，这一数目大约等于格莱斯顿估计一定会售完的总额的 $^1/_7$"。格莱斯顿先生为了筹集他所需要的 600 万英镑，发行了流通期为 4 年、5 年和 6 年的三类国库债券。为了使这些债券更容易为交易所接受，他决定在还未到期支付时就付息。他宣称，债券按票面价值出售，利息三厘五，同时他注意到新式的有价证券的极不寻常的优点，它的利息等于国家

付出的全部利息的10—16%。在开始认购时就发现，1858年还本的第一类债券，总共只要了80万英镑，而其他两类即1859年和1860年还本的债券，根本还没有人要。但是，还不仅如此。格莱斯顿先生不得不减价推销自己的商品，按98．75%的最低价格出售，并再加上几个月的利息；这样一来，他不是维持南海公司的三厘股票，而简直是按4厘利息借债，因而损失百分之十五的资本和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尽管作了这些让步，他仍然遭到了彻底失败，因为他不得不把认购债券期限延长到4月8日，而且不像早先那样要求600万英镑，而只好满足于“令人可笑的区区之数”200万英镑了。这次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格莱斯顿先生的有价证券既不适用于长期的投资，也不适用于暂时的投资；因为在1859年和1860年还本，在目前行情下是大成问题的；最后，因为在市场利率提高的时候，这种规定了好多年的固定利率的债券不会像利率必须随着币值的增加而提高的国库期票那样被人欣然接受。

格莱斯顿先生把三类国库证券投入市场，他还嫌不够，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向下院提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甚至三个或四个预算。格莱斯顿不同于前任财政大臣，他在3月6日即财政年度结束前作了关于预算的报告，据他说，这是为了明确地向全国表明，目前国家所处的是什么情况。他告诉下院说，预算中的结余为300万英镑，但是由于十分严重的局势，政府不得不增加600万英镑的开支，因此在今年要准备好应付300万英镑的赤字。在这之后，还不到两个月，他又向下院要求大约700万英镑，虽然早在3月里他就完全能够准确地计算出他要向居民索取多少钱。

他所要求的追加的预算拨款的分配如下：

海军 …………………………………………………	455050000英镑
陆军 …………………………………………………	300000英镑
炮兵 …………………………………………………	650000英镑
民军补充额 …………………………………………	500000英镑
意外开支 ……………………………………………	2100000英镑
	8100000英镑

用于陆军、海军和炮兵的开支，已经在星期五晚上被一致批准了。我要简单地说明一下，这些开支的用途：有30万英镑用于增加14799名陆军官兵（增加的结果，陆军的名额将比去年增加40493人，即达到142000人）。炮兵的追加开支总共是74132英镑。海军的追加开支为4553731英镑（其中包括一部分炮兵的追加开支），可以列成下表：

一

1.（一）水兵和海军陆战队的薪金，因为舰队补充了兵员11000人，即2500名海岸警卫队兵士和8500名志愿兵………………………………………………………	461700英镑
（二）支付超役6个月的5000名水兵的薪金，应当在1855年3月31日年度结束时支付 …………………	110000英镑
（三）支付水兵的超额薪金，即对2500名海岸警卫人员和现在服役于舰上的索具兵的超出水兵薪金部分的贴补金 ……………………………………………………	51700英镑
（四）用于征募5000名后备水兵………………………………	220000英镑
（五）超役6个月（到1855年3月31日止）仍在服役的5000人的给养 ………………………………………………	50000英镑
（六）追加储备粮，粮食运费以及几种粮食涨价的支出 …	50000英镑
（七）在海军服役1年的5000名补充兵员的给养等………	100000英镑
（八）白厅和索美塞特宫各办公厅因战争需要而增添的低级公务员的工资 …………………………………………	5000英镑

(九) 英国各海军机关、粮食机关和卫生机关中的补充工作人员的薪金 ………………………………………… 2000 英镑
(十) 英国军械库以及其他各海军机关、粮食机关和卫生机关的工人的贴补金 ………………………………… 47000 英镑
(十一) 国外军械库以及其他海军机关的工人的贴补金 … 1000 英镑
2. 用于海军的补给 ………………………………………… 697331 英镑
(一) 购置蒸汽舰的用煤和其他燃料 …… 160000 英镑
(二) 购置补充已经发给舰队的物品的储备品 40000 英镑
(三) 蒸汽机的购置和修理,因为已经决定,预备舰队中应当以蒸汽舰为主 ……… 252674 英镑
(四) 购买蒸汽舰、炮艇以及其他船只 … 244657 英镑
3. 造船厂的建设、改进和修理 …………………………… 7000 英镑
4. 药品和医疗器材 ………………………………………… 30000 英镑
5. 其他各项供应 …………………………………………… 6000 英镑

共 计………………………………1457031 英镑①

二

有些项目虽然已经列入海军概算内,但与其说是属于海军不如说属于陆军,这些项目共请批准…………………… 3096700 英镑

其中:

1. 按月支付的包括蒸汽舰在内的船只运费,购买船只以及租用 8 艘新蒸汽舰和 86 艘帆力舰其中包括装载骑兵的 75 艘巡航舰…………………………………………2610200 英镑
2. 租用装运军队及其给养的船只的运费,因为政府已经租用 18 艘蒸汽舰和 86 艘帆力舰,租期 1 年……………………………108000 英镑

总 共………………………………… 4553731 英镑

① 这个总数不包括 (二)、(三)、(四) 三项,这三项列入第二类总数。——编者注

格莱斯顿先生打算用下列办法多收一些税，即把加倍征收所得税的办法延长到战争结束，把麦芽消费税从 2 先令 9 辨士提高到 4 先令，把苏格兰的酒类消费税每加仑提高 1 先令，把爱尔兰的酒类消费税每加仑提高 8 辨士，并把本来要在今年 7 月 5 日实行的降低食糖的消费税的措施推迟实行。关于酒类、麦芽和食糖的决定很快就通过了。

酒类消费税的提高不会增加收入，因为它使酒类的需求量大大降低。新的麦芽消费税将是对小酒店主和他们顾客的一种惩罚，因为他们的正式喉舌“晨报”曾表现自己是那么热烈地拥护战争。食糖的消费税一定使今年的醋汁和果酱发苦。至于所得税，正像大家十分清楚的那样，3 月 6 日，即收到罗斯上校和坎宁根领事的关于俄国备战的消息 3 天以后，格莱斯顿先生曾经宣称，再过 7 年，所得税将不存在了。大家同样十分清楚，格莱斯顿在 4 月 18 日宣称，所得税增加一倍只要实行半年就够了。格莱斯顿先生如果不是一位从未有过的最无远见、目光短浅的财政大臣，那就是他故意装做在摸索前进，使公众迷失方向、莫名其妙并且产生错误认识。

不列颠的小市民不仅必须为对俄战争、为格莱斯顿先生的教友派学说和伪善的拘泥细节而付出费用，还应当供给沙皇本人以进行对英战争所需的资金，这一点可以从约翰·罗素勋爵在星期五晚上的说明看出来，他说不列颠政府将继续偿还所谓俄荷贷款协定[132]的本息；这项协定包括在维也纳条约内，其中规定的主要条文之一说，波兰应当成为独立的立宪王国，使克拉科夫成为受保护的自由城市，欧洲各河流因而也包括多瑙河有航行自由。

对爱尔兰人忠诚的怀疑看来是很大的，因为帕麦斯顿勋爵宣

称，女王陛下政府今年不打算招募爱尔兰人加入民军。就是这个帕麦斯顿曾以约翰勋爵没有把民军法推行到爱尔兰去而激起了爱尔兰的愤怒为借口，推翻了罗素内阁。内阁同它的铁路法案一起遭到实际的失败，因为这个法案只包括为了这个目的而召开的议会委员会所建议的条款一小部分。因为铁路线老板们的行动十分一致，英勇的卡德威尔先生在代表内阁发言时宁肯把原来的法案撤回，用另一个由铁路经理们本人制定的法案来代替它，而这个法案既没有给经理增加任何义务，也没有规定比现行规章更严格的规章。当这个法案在议院里讨论时，除了身为议员的铁路公司的经理外，会场中没有任何人。

一家周刊写道："看来，大臣和议会既不能保护股票持有人的财产和旅客们的口袋，也不能保证公众不受铁路公司的侵犯，因为铁路公司硬说它们有权擅自任意处理这些财产。"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5 月 9 日

载于 1854 年 5 月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86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辉煌的胜利

英国报纸对于沙皇奖励奥斯坦— 萨肯将军参加最近一次联军舰队同保卫敖德萨港的岸防工事之间的战斗一事，不惜发表了大量尖酸刻薄的评论。它们认为，在这次战斗中联军获得了全胜，而敌人的狂欢是俄国人吹嘘和沙皇撒谎的又一个例子。我们对沙皇或奥斯坦— 萨肯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尽管后者无疑是一个聪明而果断的人 (他是指挥多瑙河各公国的一个军的另一位奥斯坦— 萨肯将军的兄弟[133])，但是我们还是认为敖德萨的这一次“胜利” 是比较值得重视的，而且弄清到底是哪一方自吹自擂和造谣诽谤也是有好处的；何况到目前为止，这是联军和俄军之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我们了解一些情况的战斗。

从双方公布的正式文件中可以看出，联军舰队在敖德萨出现的目的，是要求总督交出停泊在该港的英、法、俄的所有船只，作为射击不列颠军使旗的赔偿。联军明知这样的要求是不会得到任何答复的，因此，他们显然已准备好以武力来夺取他们所要求不到的东西。如果这个目的没有达到，那就是就不管他们如何重创敌人，他们也是遭到了真正的失败。

双方兵力的对比究竟怎样呢？从俄国政府任命奥斯坦— 萨肯为紧靠多瑙河军团后方的广大地区的长官这一命令本身，以及奥

斯坦—萨肯把自己的指挥地点选在敖德萨这一事实，都表明俄国人多么重视——而这是完全有根据的——这个地点。正是在敖德萨，敌人的登陆才可能使俄军遭受最大的损失。敌人在那里不仅可以得到一个大城市的资源，而且可以得到全欧洲的粮仓；到了这里，他们距离在土耳其作战的俄军的交通线和可能退却的路线也最近。在这种情况下，联军的海军上将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城市有大量的守军防守，以他们现在所能派出的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去登陆的任何尝试都将立即破产。但是不派兵登陆，不占领敖德萨，——哪怕只是短时间的占领，如果不能占领城市，即使占领港口也好，——他们就不能指望解救被扣留在那里的英法船只。实现这个目的的唯一希望，就是对这个城市进行最猛烈的炮击，使任何部队继续在城内停留都有危险，那时才能试图解救自己的船只。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非常宽阔的街道和广场，而且可能中弹起火的建筑物占地较少的大城市进行炮击，能否达到这一目的还不知道。因此，海军上将们应当了解，如果奥斯坦—萨肯拒绝他们的最后通牒，他们是无力坚持自己的要求的。但是他们认为，在军使旗受到射击以后，必须对敖德萨采取某种行动，于是他们就开始行动了。

敖德萨的海口由 6 座大概拥有 40—50 门二十四磅和四十八磅火炮的炮台防守。其中参加战斗的只有 2—3 座炮台，因为进攻者一直在其余炮台的射程以外。联军用来对付这些炮台的有 8 艘蒸汽巡航舰，舰上约有 100 门火炮，但是由于这次战斗的特点只能使用一边舷上的火炮，联军在火炮数量上的优势就大大减弱了。从火炮的口径来看，双方的力量显然大致相等，因为二十四磅的加农炮虽然不如三十二磅的长管炮，但四十八磅的重炮同不能使

用全装药的、发射爆炸弹的五十六磅和六十八磅的加农炮无疑是相等的。最后，军舰比胸墙更容易被攻击，军舰的运动使瞄准不精确，这些都使得岸防炮处于比舰炮优越的地位，甚至当舰炮在数量上占更大优势时也是如此。什列斯维希的埃克恩弗尔德战斗(1849年)[134]就是一例。在那次战斗中，拥有20门火炮的两座炮台击毁了一艘装备有84门火炮的军舰，打坏了并俘获了一艘有44门火炮的巡航舰，还击退了两艘装备精良的蒸汽舰的攻击。

总之，由于参加这次战斗的只有岸防炮和8艘蒸汽舰，即使把战斗过程中显示出来的英法两国火炮的射程较远、射击比较准确的情况估计在内，也可以说这次战斗大致上是势均力敌的。因此，破坏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许多小时炮击的唯一战果，是击毁了俄军两门火炮。最后，联军向前推进并改变了战术。他们不再对炮台的石墙射击，开始用大量炮弹和燃烧火箭轰击俄国舰船以及港口内和港口周围的军事建筑物。这样收到了效果。现在瞄准的目标已相当大了，以致每一发炮弹都能落在某个易受攻击的地方；不久，一切都淹没在火海中。位于防波堤顶部的那座抵抗得最顽强、一开始就受到主要攻击的炮台后面的军火库爆炸了。这次爆炸以及火势向周围蔓延，迫使炮台内的守军撤退了。同往常一样，这一次俄军炮兵又显示出他们本领很差，却非常勇敢。他们的火炮和霰弹看来质量很低，而且火药的威力很小。

其实，整个战斗的结果也就只有这些。在防波堤顶部的俄军炮台的4门火炮的火力被压制了，所有其他的炮台则未必受到什么损失。显然军火库爆炸的破坏力并不特别大。根据军火库直接配置在炮台后面的这一情况判断，它是只供这一座炮台使用的，其中只储存一天的弹药，4门火炮每门约60—100发炮弹；如果减去

当天可能已经消耗的炮弹数，那末可以说那里所剩的不超过 300 发炮弹。我们没有任何材料来确定其他建筑物遭到损失的程度;联军当然无法查明这次损失,而俄军断定这次损失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从俄国人的报道中可以看出，被烧毁的船只**并不是**英法两国的报道所断言的军舰；可能，这是几艘商船加上一些运输船只和政府的客轮。应当指出，以前我们也没有听说过在敖德萨有什么俄国军舰。

在战斗期间,有两艘法国商船和一两艘英国商船逃出了港口。直到今天还有 7 **艘英国商船**被扣留在那里。因此，“英勇的”海军上将们没有能实现自己的要求;既然他们没有获得一定的战果,只击毁了 6 座炮台中的一座而不得不退却，那末他们就应当承认自己的进攻被击退了。他们的伤亡非常少，但是有几艘军舰的舰体被击伤，而且法国蒸汽舰“沃邦号”被炽热的炮弹击中起火，不得不暂时退出战斗。

这就是不列颠报纸所说的“从敖德萨传来的光荣消息”，而在英国人心目中也抵销了海军上将邓达斯过去的一切失策。不仅如此，这次战斗竟大大鼓舞了英国人的斗志，以致有人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海军上将们确信自己的炮兵在射程方面大大优于俄军炮兵，才毅然决定轰击塞瓦斯托波尔；好像他们甚至已经到过那里并进行了几次齐射。但是这纯粹是异想天开。无论什么人，只要一看塞瓦斯托波尔的平面图就会了解，对这个城市和港口的任何进攻（不论是不是进行炮击)，如果不想成为在海湾外的一次简直是装样子的战斗，那末就必须在狭窄的水域内、甚至在野炮的射程内进行。

我们对这种枯燥无味的 exposé〔叙述〕还要补充一点，我们

的英国同行们对这次战斗（他们的进攻完全被击退，而预定目的又没有达到）的大吹大擂，同他们过去对战争进程所作的评论和推断的总的腔调很少有什么区别。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我们认为，公正的历史家一定会指出，英国在使用斗争最初阶段所特有的诽谤、诡辩、欺骗、外交手腕、军事吹嘘、谎言等手段方面同俄国是一模一样的。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5月15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6月6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9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在苏格兰对领地的清扫

1854年5月19日星期五于伦敦

今天报上登载了“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第一次攻击”的电讯，看来这次攻击像对敖德萨的炮击一样（在这次炮击以后，双方都宣称自己胜利了），是一次光荣的英勇事迹。根据所描述的情况看来，这一次攻击是借助于“远射程”炮的轰击的，炮火攻击的目标是外围工事。要对塞瓦斯托波尔港口和城市本身攻击，如果不进入港湾和逼近城防炮台，无论用什么火炮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大量登陆部队的支援，要占领这个城市一般也是不可能的。这只要看一看地图就很清楚，而且所有的军事权威都承认这一点。因此，必须把这场战斗（如果它确实已经进行的话）看成是给那些gobe-mouches〔头脑简单的人〕看的假的英勇事迹，这些人的爱国主义是受到了敖德萨的荣誉鼓舞的。

法国政府派布雷先生到希腊去执行特别的任务。随同他前往的有福雷将军指挥的一个旅，他受权要求奥托国王立即偿付法国在1823年借给希腊政府的1亿法郎贷款的全部利息。如果遭到拒绝，法军就要占领雅典和王国的其他一些地点。

读者大概还记得我所叙述的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清扫领地的过

程，由于这种清扫，本世纪前半期有千千万万的人被从祖居的土地上赶走[135]。这种清扫还在继续进行，而且是以只有模范国家英国的有美德的、高雅的、笃信宗教的、仁慈的贵族才会有的那种毅力进行的。那些无保护的居民的房子不是当场被烧掉，就是被捣毁。去年秋天，在诺伊达尔特的尼加特庄园里，根据大地主的命令，向受人尊敬的、诚实的、爱劳动的唐纳・麦克唐纳的房子进行了袭击。他的妻子卧病在床，不能迁移；但是管理人和他的一伙帮凶把麦克唐纳的 6 个孩子赶到街头，其中最大的一个还不满 15 岁，整座房子被捣毁了，只剩下了正对着病床的一块不大的屋顶。

麦克唐纳被这一切激动得发疯了。医生认为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现在他到处徘徊，在被烧毁和捣毁的住房的废墟中寻找自己的孩子。他的饥饿的孩子们哭哭啼啼地跟在他后面，然而他不认识他们。他得不到帮助和关照，因为他患的是文静的精神病。

两个即将分娩的已婚妇女亲眼看着自己的住房被捣毁。她们不止一天在露天下过夜，结果二人都早产，忍受了很大的痛苦，弄得精神失常；现在她们带着她们的一大群孩子到处流浪，得不到任何帮助，毫无恢复健康的希望。这是揭露所谓的不列颠贵族阶级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

甚至孩子们也由于受惊和受迫害而精神失常了。在诺伊达尔特的杜恩，被赶出自己住所的贫农佃户栖息在空无一物的仓库里。深夜，地主的代理人包围了这个仓库，并放火烧这个仓库，因为这些不幸的贫农想要在这个仓库里藏身。被吓得发狂的不幸的人们从火中跳出来，其中有些人完全失去了理智。“北方旗帜报”写道：

“一个男孩完全疯了，因此不得不把他隔离；他每夜都跳起来叫喊‘火！火！’，并要周围的人相信，在燃烧着的仓库里还有男人和小孩。天黑以后，他

一看到火光就害怕。正是杜恩这种骇人的景象—— 仓库燃烧着，照红了四周，一些吓疯了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在旁边东奔西窜—— 使他失去了理智。”

贵族就是这样来对待为他们创造财富的完全有劳动能力的贫农的。现在请听一听贵族的教区的慈善事业吧。现在我根据格拉斯哥的唐纳·罗斯先生和“北方旗帜报”的材料举出以下的事实：

1.寡妇马瑟逊，96岁，从斯凯岛斯特拉斯教区只领到2先令6辨士；

2.默多·麦金托什，36岁，14个月前被大车压伤而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他有妻子和7个从1岁到11岁的孩子；他每月从斯特拉斯教区只领到5先令；

3.寡妇赛米尔·坎伯尔，77岁，住在斯凯岛布莱得弗德半倒塌的破屋里，她每月从斯特拉斯教区领到1先令6辨士。她抱怨说，这一点钱不够用，教区当局拖延了很久以后，才把她的补助金增加到每月2先令；

4.寡妇麦金伦，72岁，她从斯凯岛斯特拉斯教区每月领到2先令6辨士；

5.唐纳·麦克杜加，102岁，住在克雷达特。他的妻子77岁，两人身体都很弱。他们每月从格伦涅尔格教区只领到3先令4辨士；

6.玛丽·麦克唐纳，寡妇，93岁，卧病在床。她的丈夫服兵役时失去了双手，20年前去世。她每月从格伦涅尔格教区领到4先令4辨士；

7.亚历山大·麦克伊萨克，53岁，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他的妻子40岁，有1个双目失明的18岁的儿子和4个不满14岁的孩子。格伦涅尔格教区每月只给这个不幸的家庭6先令6辨士，平均每口人不到1先令；

8.安格斯·麦金伦，72岁，他的妻子66岁，有病，他们每月领到2先令1辨士；

9.玛丽·麦克伊萨克，80岁，身体很弱，双目完全失明，每月从格伦涅尔格教区领到3先令3辨士。她要求增加补助金，视察员回答说：“别人比你领得还少，你要求增加补助金怎么不害羞”，视察员说完以后就再也不听她说的话了；

10.詹纳·麦克唐纳，也叫麦吉利奥雷，77岁，完全没有劳动能力，她每月只领到3先令3辨士；

11.凯瑟琳·吉利斯，78岁，完全没有劳动能力，她每月从格伦涅尔格教区只领到3先令3辨士；

12.玛丽·吉利斯，也叫格兰特，82岁，已轻有8年卧病在床，她每月从阿德纳美尔汉教区领到28磅面粉和8辨士。济贫所的视察员已经有两年没有到她那里去了；她得不到医疗，也得不到衣服和食品；

13.约翰·麦克伊肯，86岁，卧病在床，住在阿德纳美尔汉教区奥赫纳克雷，教区每天给他1磅面粉，每月给他8辨士。他没有衣服，也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4.埃文·麦卡勒姆，93岁，有眼疾。在阿盖尔郡的纳普迭尔教区，我发现他在克林楠运河两岸求乞。他每月领到4先令8辨士，他没有衣服，得不到医疗，没有燃料，没有住房。这是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一个可怜的叫化子；

15.凯特·麦克阿瑟，74岁，卧病在床，她孤单地住在纳普迭尔教区的丹纳迪。她每月除了从教区领到4先令8辨士以外，什么也没有。医生从来不到她那里去；

16.詹纳·克尔，也叫麦卡勒姆，寡妇，78岁，健康状况不好；她每月从格拉萨里教区领到6先令。除此以外，她什么也没有；她没有住房；

17.阿契波德·麦克洛林，73岁，住在阿品教区，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他的妻子同他一样；他们每月从教区领到3先令4辨士补助金，他们既没有燃料、衣服，也没有住房。他们住在不适于人居住的最坏的草屋里；

18.寡妇玛格丽特·麦克劳德，81岁，住在洛克布鲁姆教区的拉斯加克；她每月领到3先令；

19.寡妇约翰娜·马肯集，81岁，住在洛克布鲁姆教区的阿拉普耳；双目完全失明，身体很弱；她每月只领到2先令；

20.寡妇凯瑟琳·麦克唐纳，87岁，住在基尔布兰登教区的卢英岛；双目完全失明，卧病在床。她每月领到7先令生活费，其中包括付给助理护士的费用。她的住房倒塌了，但是教区不答应给她房屋，她睡在屋檐下的泥地上。视察员拒绝给她任何帮助。

但是残暴行为还不止这些。不久以前在斯特腊特卡隆发生了一件真正的暴行。一大批被已经进行的逼迁暴行和可能再被逼迁

弄得精神失常的妇女，听说有一队警察要到她们的地区来驱逐佃户，就聚集在街头。然而来的并不是警察，而是税吏；税吏们听说他们被当作了另外的人，却不向人们进行解释，反而决定利用这种误会：他们冒充警察，说来这里是为了叫居民迁移。妇女们开始激动起来，官员们就用子弹上膛的手枪威胁她们。至于以后的情况，在唐纳·罗斯先生的信中作了描述，他是从格拉斯哥抵达斯特腊特卡隆的，并在这个地方逗留了两天以收集消息和探望伤员。我们从他 1854 年 4 月 15 日在沃温市的“皇家旅馆”写的这封信中读到这样一段话：

“我所收集的消息证实了郡长的可耻行为。他没有事先向他们提出警告，说要派警察来对付她们。他没有宣读惩治暴乱的法令。他甚至没有给他们以散开的时间，相反，他带着自己的队伍向她们逼近，紧握着木棍高喊：‘滚开！’没有喘一口气，接着又喊：‘打她们！’在这句话喊出以后，立刻出现了一幕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情景。警察开始用沉重的木棍打这些不幸的妇女的头部，把她们推倒在地上，用脚野蛮地踢她们，践踏她们。不久整个草地染满了鲜血。倒卧在血泊中的妇女和少女们的喊声震撼了天地。一部分逃脱了警察的追击的妇女跳到了水深流急的加农河，认为它比警察和郡长要仁慈一些。一些妇女的头发被警察的木棍一束一束地打落下来；一个少女遭到了木棍野蛮的毒打，从肩上打掉了一块 7 英寸长、1 英寸多宽、$^{1}/_{4}$ 英寸多厚的肉。一个少女只是要看发生的事情，就遭到 3 个警察的毒打，他们打她的前额，砍伤了她的头，而在她倒在地上以后又用脚踢她。医生从伤口里取出了一块被凶狠的警察打进伤口的头巾布。妇女的背上留下了钉有铁掌的靴子的痕迹。现在在斯特腊特卡隆还有 13 个妇女由于遭到警察的推残而处于危险状态中。其中 3 个人情况很不好，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根据这些妇女的外貌、她们受伤的严重程度以及我所收集的医生的诊断书，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中能够活下来的不超过一半；甚至那些还能活一个时候的人，也将在身体上上保留着她们所遭到的极端残暴的迫害的可悲的证据。在伤势特别严重的人中有一个孕妇。她并没有站在郡长对面的人群中，而是站在稍远的地方，并且仅

仅是一个旁观者；然而她也遭到了警察的木棍的毒打和脚踢，她的状况非常严重。”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遭到袭击的妇女有 18 人。郡长姓泰勒。

这就是 1854 年不列颠贵族阶级的面貌。

地方当局和政府商定，只有在停止对普雷斯顿治安法官和棉纺大王的活动进行调查的条件下，才能停止对考威尔、格林姆肖和普雷斯顿罢工[136]的其他领导人所提出的司法追究。而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做了。

邓科布延了两星期才向议院提出成立调查普雷斯顿治安法官的活动的委员会的建议，似乎正是由于这种勾结的缘故。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5 月 19 日

载于 1854 年 6 月 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95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国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战　　争[137]

我们终于有可能来报道英国水兵的功绩了。纳皮尔海军上将的舰队经过8小时的炮击后，摧毁了古斯塔夫斯维恩要塞(瑞典文是古斯塔夫堡垒或要塞)并俘获守军1500人。这是对俄罗斯帝国领地的第一次严重攻击，同松弛的、沉寂的敖德萨战事比较，它至少证明，查理·纳皮尔只要有可能，就不会同意牺牲自己的荣誉和祖先的荣誉。古斯塔夫斯维恩堡垒位于形成芬兰西南角的半岛的顶端，并在所有航行于芬兰湾的船长所熟悉的汉古特灯塔附近。堡垒的军事意义并不大，只保卫着很小一片水域和陆地，因此进攻的舰队可以毫无危险地把它留在后方。根据守军的数量判断，堡垒本身也不会很大。但是，关于俄国波罗的海沿岸防御的实力和价值，连英国海军部和陆军部也心安理得地毫无所知，因此，我们在得到详细情报以前暂不对这件事的战术意义作任何评论，也就情有可原了。

我们现在只能说，8小时的炮击证明俄军的防守即使不是非常巧妙的，也是很勇敢的，并且预示着他们在防守这一海湾内的头等要塞时，将进行比预料顽强得多的抵抗。另一方面，1500人被俘对于俄国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损失(这等于多瑙河上平均每两天病死的人数)。但是这些俘虏将给纳皮尔造成很多困难。的确，他将怎样处理他们呢？不管他们是否作了保证，他都不能放走他们，

而可以遣送他们的最近的地点是英国。要保证顺利地运送这 1500 人,至少需要 3 艘战列舰或多一倍的蒸汽巡航舰。这一战果本身会使他的行动迟滞两三个星期。此外,如果没有陆战队,他怎能扼守已夺得的领土呢?我不能想像,假如他不再度削弱人员配备本来就已不足的舰队,假如不再一次减少每一艘舰上的水兵和海军陆战队的名额,他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想提一下目前在不列颠报刊上已引起非常热烈的讨论的一个问题,——当然,这种讨论照例是太迟了。

不列颠的报刊突然发现,一支舰队无论它怎样强大,如果不载有足以用来登陆和巩固战果的大量部队,那它的作用就是很小的;而为了登陆和巩固战果,仅仅靠舰队对沿岸要塞射击,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远远不够的。可见,一直到上月末,不论是指导战争的英国官方人士还是指导英国舆论的官方人士,都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同时,现有的全部军队和运输工具都已经派往黑海;预定用于波罗的海的陆军一共只有 2500 人的一个旅,并且一个人都没有出发,因为连司令部本身还根本没有组织起来!

法国人同样是缓慢得可怜。至于他们预定用于波罗的海的舰队,那末——我们想起杜科大臣大言不惭的报告:“陛下命令装备第三舰队;陛下的命令业已执行!”——这一支本来应该在 3 月中旬就准备启碇并由 10 艘战列舰编成的声势壮大的舰队,实际上还只有不超过 5 艘的战列舰,它们现在正同巡航舰和小型舰船一起沿着大贝耳特海峡缓慢地前进。这些舰船由布勒斯特到达那里整整用了 3 个星期,虽然一直刮着西风。所谓为了波罗的海远征集结 15 万人,必要时集结 20 万人到圣奥梅尔大兵营的计划,写在纸上已经三、四个星期了,但事实上连一个旅都还没有调去。其实法军

很容易从他们的沿岸守军中抽调 10000—15000 人来组成步兵和轻野战炮兵，而不必慌慌忙忙、装腔作势地建立什么野营。还有，到哪里去找运输工具呢?必须租用英国的商船;以法国舰队的平均速度计算，这些商船需要 4—6 个星期才能相继到达战区。然而在什么地方可以登陆，集中旅和师，组织司令部和军需机构呢？联军陷入了循环论证：要在波罗的海地区拥有陆军，就必须先夺得可以用来集中并组织军队进行攻击的岛屿或者半岛;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得先在当地拥有陆军。不过，只要有一位通晓陆战、足以指挥陆军的优秀的海军上将，就不难摆脱这种困境。查理·纳皮尔就完全可以胜任，因为他已多次在陆上作战。但是，只要最高权力掌握在阿伯丁[①]手中，只要有 4 个不同的部干预军务，只要陆军同海军经常对立，只要英法联军相互嫉妒对方的成功和荣誉，也就很难期望有什么行动上的统一了。

因此，在 6 月底以前，不可能建立一支相当数量的陆军调到波罗的海地区去。其次，如果在今后 4 个月中战争不能结束，和约不能签订，那末就必须放弃已经取得的一切战果，——必须把军队、火炮、舰船和粮食运回或者遗弃在当地，而俄军在冬季的 7 个月中将仍然是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主人。从这里可以看出，今年对于俄国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是谈不上什么重大的和坚决的进攻的。太迟了!只有瑞典同西方强国联合，后者才能在波罗的海地区拥有在芬兰进行冬季战局的作战基地。但是，在这里又陷入了循环论证，——当然，这同上面谈到的一样，只有对于怯懦者才是无法解决的。如果西方强国不派遣陆军并占领芬兰的一部分领土，不用事

① 本文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刊出时，此处增加了“和帕麦斯顿”几个字。——编者注

实向瑞典证明自己意图的真切，怎能期望瑞典同它们联合呢？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确保瑞典成为作战基地，能不能向波罗的海派遣这些兵力呢？

实在说，大拿破仑这个采用大胆、坚决和歼灭性的作战方法杀戮过千百万人的“刽子手”，同领导这次对俄战争的那些优柔寡断的“国家伟人”比较起来，堪称人道主义的模范，因为只要这些“国家伟人”还继续像过去一样地行动，那末最终造成的人力和财力的损失要大得多。

如果我们现在看一看黑海的情况，那末我们就会发现，联军舰队怎样在塞瓦斯托波尔前面从远距离对这个要塞的几个可怜的外围工事进行毫无损伤的射击以寻欢取乐。据报道，4天以来，大部分舰船一直就在作这种无关痛痒的游戏；而俄军因为仅有12艘适于航行的战列舰，所以在这个期间始终没有出港，这使安梅林海军上将惊愕不已（见他在5月1日和5日的报告）[138]。诚然，这位海军英雄年事很长，理应记得法国舰队不仅曾被兵力弱得多的英国舰队封锁，甚至在港内遭到袭击的年代。其实，如果以为兵力较弱的俄国舰队会离开塞瓦斯托波尔，以便让数量上多一倍的舰船把它击溃、击沉，从而抵偿它在西诺普犯下的“可恶罪行”，那倒是令人奇怪的！

在同一个时候，两艘战列舰（螺旋推进式蒸汽舰）和7艘蒸汽巡航舰正在开往切尔克西亚。它们的任务是侦察克里木海岸，然后破坏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的堡垒。但是，在攻击堡垒时只准3艘蒸汽巡航舰参加，另外4艘一结束对克里木的认真的侦察，便立即返航。据我们所知，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仍为俄军占领的3个堡垒——阿纳帕、苏胡姆－卡列和列杜特－卡列，——都有相当坚固的

工事，并且都构筑在瞰制海面的高地上（列杜特— 卡列除外）。因此，派出的兵力是否足以完成这些任务，很值得怀疑，何况在舰船上没有登陆部队。海军少将莱昂斯指挥的分舰队应该在这个时候同切尔克斯人取得联系，特别是同他们的首领沙米尔取得联系。至于莱昂斯少将应该同沙米尔联系些什么，没有确实的消息；但是有一点不能怀疑：他不可能给沙米尔运去最急需的东西——武器和弹药，因为在作战期间，军舰上没有多余的仓位装载货物。两只装载着这类贵重货物的破商船或者帆船，比 5 艘军舰毫无实效的精神支援要有用得多。同时，我们知道，给切尔克斯人运送必要的军用品的土耳其舰队正开往那里。因此，联军的两支舰队在执行着同一任务，而彼此互不知道。这就是计划和行动的统一！也许，一支舰队还会把另一支舰队误认为是俄国舰队，那时两个舰队彼此射击，切尔克斯人将有一场好戏可看！

在这个时候，联军的陆军也在别有风趣地尽情欢乐，他们在斯库塔里和加利波利消耗了大量浓烈而甘美的当地葡萄酒。其中偶尔没有喝醉的那些人被派去构筑野战防御工事，这些工事构筑在永远不会遭受攻击、因而无需加以防守的地点。无论英国政府或者法国政府都从来没有意思使它们的朋友尼古拉遭受重大损失，如果这一点还需要证实的话，那末只要看看联军怎样消磨时间就够了，这连瞎子也可以看清楚。为了给军队远离战场找借口，联军统帅部命令他们构筑横贯整个色雷斯的赫尔松涅斯地峡的绵亘防线。每一个工兵，特别是每一个法国工兵都知道，在野战筑城中几乎在一切场合都不宜采用绵亘防线。但是在加利波利的英法军队仍然被迫构筑这种工事，而且构筑工事的地区有三分之二可能遭到敌人从高地按照预计方向进行的扫射。他们虽然想尽一切方法

尽可能缓慢地前进，甚至用蜗牛爬行的速度前进，但是终究不免前进一点，所以据传有 15000 名法军正开往瓦尔那，——但是这又为了什么？作为要塞的守军吗？在那里又干些什么呢？无非是让他们去患热病和疟疾送死。

如果对战争的指导多少有一点理智，那末统帅部应该知道，土军恰恰缺少英法军队所擅长的那种在平地机动作战的本领，而他们却出色地掌握了防守城墙、垒墙、甚至缺口以抵抗敌人强攻的技能，在这一点上无论英军或者法军都不能和他们相比。由于这个缘故，同时又因为土军所防守的瓦尔那作出了任何一个要塞迄今从未作到的事情，——也就是当城墙被打开了 3 个适于强攻的缺口以后，仍支持了 29 天之久，——正因为这一点，所以把未经严格训练的土军由瓦尔那调出来，派到平地上去对付俄军，同时把训练有素、长于攻击而不善于长期防御的法军派去防守瓦尔那要塞。

根据其他方面的材料来看，所有这些调动无非是一种欺骗，大的事件正在酝酿中。联军似乎完全无意在巴尔干作战；他们要在舰队协助之下在俄军后方建立丰功伟绩；他们要在敖德萨登陆，切断敌人的退路，并在敌人的后方同特兰西瓦尼亚的奥军会合；此外还要派遣部队到切尔克西亚；最后，他们要派出 15000—20000 人从陆上强攻塞瓦斯托波尔，而舰队则夺取港口。关于这些消息，只要回顾一下这次战争的全部历史过程和战争前夜的外交谈判，就可以明了它们的来源。这些消息是在勒卢阿（通常叫做圣阿尔诺）元帅来到君士坦丁堡以后立刻从该地传开的。凡是知道这位可尊敬的先生的经历的人[①]，都可以立刻在这些吹嘘中认出这位在当军

① 本文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刊出时，此处增加了一句话：“我将设法把这些材料寄给你们”。——编者注

官时曾被三次革职、但仍以善于吹牛而攀踞目前高位的人物。

简单地说，目前的战争形势如下。英国，特别是法国，“虽然并非出自本意，但一定”要把大部分兵力驻在东方和波罗的海，也就是驻在整个军事部署的两个突出的翼侧上，这一部署的最近的中心是法国。俄国则打算牺牲它的沿海地区、舰队和一部分军队，以便把西方强国完全吸引到这个同一切战略相矛盾的运动里来。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了，一旦必要数量的法军从本国派到遥远的地方，奥地利和普鲁士就会立刻声明它们站在俄国一边并以优势兵力直取巴黎。如果这个计划实现，路易– 拿破仑将没有任何军队来抵御这个突击。但是还有一支力量，它在任何意外的事件中都可以“动员起来”，同时它还能“动员”路易·波拿巴利他那些卖身投靠的侍臣，就像它以前曾经动员了许多统治者那样。这支力量可以抵抗所有这一类入侵；它已经一度向联合的欧洲表明了这一点。这支力量就是革命，它是不会在需要它行动的时候迟疑等待的，这请放心。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5月22日
载于1854年5月27日“人民报”
第108号，署名：卡·马·，并作为
社论载于1854年6月9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410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弗·恩格斯

英国军队的现状及其战术、服装置备、军需部等等

1854年5月26日星期五于伦敦

即使东方战争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它也会使已故的威灵顿公爵的军事荣誉部分地失去光彩。在这个被过高评价的统帅还活着的时候就熟悉英国的人一定记得，那些时候甚至把拿破仑看做是一个在某方面同战无不胜的“铁公爵”相匹敌的军人，都会被认为是对英吉利民族的侮辱。现在这位光荣的公爵已经去世并安葬了，在这以前的四十年内他是英国军队的实际上的指挥者。过去还没有过比他更具有独立性和更缺乏责任感的军事长官。公爵曾是高于一切权威的权威，无论国王还是女王，对于涉及他的工作范围的事情都不敢有所异议。“铁公爵”饱尝了几十年通常为幸运的庸碌之辈所享受的荣耀和欢乐（这同拿破仑这样的天才人物通常所不可分离的悲剧性动荡生活比较起来，真有天渊之别）以后，与世长辞了，英军的指挥权也转到了别人手里。他死后大约十八个月，英军要和俄国人打仗了，可是还在第一团队伍准备登上军舰以前，就发现“铁公爵”留下的这支军队根本不能执行任何战斗勤务。

总的说来，公爵尽管也具有英国人的健全理智，但在许多方面是一个目光短浅、智力贫乏的人。谁都知道，他对自己的德意志盟

友在滑铁卢会战结束时所起的作用的评价是多么不公平，他把胜利的全部光荣攫为己有，但是要不是布吕歇尔及时赶到的话，这个胜利就会变为失败。他顽固地把英军中的各种荒谬习惯和怪诞作法保存下来，对一切批评的回答是"这类习惯和怪诞作法使我们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胜利者"，这种顽固不化和他作为一个保守派所特具的信念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信念就是似乎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传统的愚昧无知和叛卖行为，才能正确发挥"无与伦比的"宪法的职能。如果说在紧急关头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他还善于作一些让步，那末在军事方面他却越发顽固地死抱着陈旧的观点和传统的怪诞作法不放。在英国军队中，假如不算炮兵纯粹技术上的改进，在他掌权的全部时期就没有作过任何一件多少像样的改善。然而，在这里绝对不能忽视工业和技术科学的高速进展。因此，就算英国炮兵拥有世界第一流的兵器，它的组织累赘的程度也不比其他兵种轻些，至于说到制服、装具和一般组织，英国军队没有一件不是落在任何一个欧洲文明国家的军队的后面的。

我必须再次提醒读者注意一种情况，这就是英国的军事领导权不像其他国家那样集中在某一个部门里。有四个各自为政而又互相妨碍的部门。有一个军务大臣，他不过是一个出纳员或记账员而已。在英军总司令部里有一个总司令，属他管辖的是步兵和骑兵。有一个军械总长，他指挥负责军械事务的军官们，也就是说他管理的是军队的兵器。还有一个殖民大臣，他负责派遣军队到海外各属地并且调度这些军队的装具供应。同时还有军需部，最后，为了统管驻印度的部队还委派一个该地驻军总司令。只是在威灵顿死后这些怪诞的制度才成为公众议论的对象，因为 1837 年议会委员会有关这问题的报告，遵照他的命令被束之高阁了。现在战争爆

发了，这种制度到处都显得无能为力，但人们又反对改变它，因为担心完全破坏了办事的秩序和连贯性。

为了说明这种制度产生的混乱现象，我已举出这样一个事实来作为例证：一个团可以不必向不同的各自为政的部门交涉的两件东西是找不出来的，比如，制服由一个特命的上校发给，而军大衣则由军械部发；武装带和背包由总司令部发给，而火器又由军械部发。国外任何一个海军基地的军官、军械主任、仓库主任和军需官都或多或少地各自为政，并且各自向宗主国的也是不同的各自为政的部门负责。此外，还保留着像“管理制服的上校”这样一种畸形的现象。每一个团里有一个上校级的军官，他的职责是从国库领取一定数目的款项作为本团的被服费，但他只把一部分用于预定目的，其余的被他用作对自己奔波劳碌的报酬。

由于买卖军官官衔证书的缘故，军队中的所有高级职位几乎全由贵族把持。一个军官在当上几年中尉、上尉和少校以后，有权购买新近出现空缺的更高的军衔，只要没有另一个同级而资格较老的军官同他竞争就行。这样一来，有余钱的人就能够迅速晋升，因为他的许许多多资历较久的同事买不起空着的高一级军衔。显然，这样的制度大大缩小了用来补充军官队伍的有才干的人的范围。因为高级军官的提拔差不多只取决于资历或贵族关系，所以只由有限的一部分人补充高级指挥职务，这样一来必然会排斥很多有才能、有知识的人。毫无疑问，大部分英国军官关于军事科学的一般的和比较带有理论性的部门的知识所以如此可怜贫乏，主要应该归咎于这种制度。

就同兵士人数的比例来说，军官的人数过多。在任何别的地方也看不到像在英军部队里那么多的金银饰绦和带穗肩章。因此军

官们无事可做，由于进行任何稍微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都会和他们的 esprit de corps〔等级精神〕相抵触，于是他们把自己的光阴消磨在各种胡作非为的事情上，认为如果真的发生战斗，他们天生的勇敢精神和“女王陛下的操典”将完全足以引导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在乔宾建立野营[139]的时候，很多军官的无能已完全暴露出来了，这一点凡是比浸透伦敦市侩习气的既可怜又狂热的雇佣作家稍微认真一点评论演习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而这些雇佣作家对自己平生首次见到的不平常场面的每一个细节都大加吹捧。

副练制度和操典非常陈旧。部队的机动性异常差，因为各种动作都很复杂、缓慢，而且在执行时又一成不变。英军把旧的横队运动方法作为一切战术机动的主要形式，它保持这种方法的时间比奥军还要久；在地形有利的情况下，这种方法是有一定的优越性的；但是在许多场合下这些优越性便化为乌有，而最重要的是这种方法本身仅仅适用于特殊条件。大陆上各优秀军队所采用的展开成纵队（尤其是连纵队）的方法能保证更大得多的运动性，而且在需要时又能同样迅速地构成横队的队形。

英国兵士的武器由优质材料精工制成，但是在很多场合被陈规旧套弄得畸形了。旧式大口径滑膛枪做得不错，但大概超过了应有的重量。老的不伦瑞克式步枪本也不坏，但它已被更好的枪超过了。不久以前才使用的普里契特式步枪被认为是改进了的法国米涅式步枪，它也许是最优良的武器，然而只有在一番激烈斗争后当局才迫不得已采用了它。就是现在，它的使用仍然毫无系统并且非常混乱，有时候一个团的这一半使用旧式火枪，而另一半使用步枪，这造成了装备上的非常混乱的现象。骑兵使用的马刀质量很高，比大陆上各国军队的马刀更便于刺杀和砍劈。马匹也是精壮

的,但是骑手和武器太重了。野战炮兵拥有世界上最优良而且在很多方面非常简便的兵器,可是这些兵器的口径和重量的大小非常纷繁,因此也需要种类繁多的弹药。

相反地,英国兵士的制服和个人装具却是世界上最别扭的东西。紧束着脖子的高而硬的衣领,使人显出一副可怜相的、紧身的、带后襟的上衣,裁剪拙劣的、令人难堪的窄裤子,式样丑陋的大衣,难看的便帽或高筒帽,还有那些连普鲁士人也不能赞赏的子弹带及背包。关于这些东西近来报纸上谈得很多,因此不必赘述了。但是不应忘记,英国兵士穿着这些似乎是故意弄得笨拙的制服,却不得不肩负比任何人都多的重荷。同时,好像是为了把“运动性”作为军队的最高原则,给军队还加上了一支任何军队中所没有的庞大的**辎重队**。这主要是军需机关笨拙不灵的过错;像这样的团辎重队,特别是这样多的军官行李,只有在土耳其或印度才能看到。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支军队在到达土耳其时的行动是怎样的。法国军队由于不断把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证实有效的一切改进列入自己的军事制度中,他们还未登陆,就已经把一切安排妥当了。他们随身带的东西虽然不多,但都是必需的,而缺少的很快就由法国兵士天赋的会想办法的才能所补足。这个制度甚至在路易·波拿巴和圣阿尔诺集团的欺诈统治时期执行得也是无可非议的。而英军呢!他们比自己的军需仓库还早到加利波利;他们比兵营所能容纳的人数多3倍;对于他们的登陆没有作任何准备,没有行军面包房,没有真正负责的管理机构。朝令夕改、出尔反尔的现象达到了最惊人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最可笑的地步。上士或下士都很精通如何在卡弗尔的密林中或印度河赤热的平原上找地方安置下来,而在这里,他们中却不只一个人感到自己是束手无策的。

任何别的军队的指挥官都能在行军中实行的各种改进，在这里却只能在当前行军中暂时采用；当各个团刚刚往各个方向散开时，过时的女王陛下的操典重又发生了效力，于是行军中获得的全部经验便都落空了。

这就是“铁公爵”以铁一样的顽固所坚持的声名显赫的制度，这种制度被宣布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因为他就是靠这种制度击溃了比利牛斯半岛上的拿破仑的将军们。英国兵士的确可以因自己光荣的“铁公爵”感到自豪，因为他赏赐给了他们种种恩惠：他们穿着勒得紧紧的皮制胸甲，在疟疾发作时常常曳足而行，由于军需官们的玩忽职守和因循守旧而弄得给养不足，还要负着六、七十磅的东西在保加利亚草原上跋涉。

从公爵的僵硬不变的制度必然产生的可悲后果，由于英国政体的寡头性质而变得越发严重，在这种政体之下，最重要的职位都委派给这样一些人，他们在议会中的支持对现时掌权的升官发财主义者集团也许是需要的，但他们缺乏最起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就拿联合内阁的军械部秘书贝尔纳·奥斯本先生来说吧。任用贝尔纳·奥斯本先生是对梅费尔激进派[140]的一个让步（他们在内阁中的代表人物是威·摩耳斯沃思爵士，霍布斯的著作的“谦虚的”出版者）。贝尔纳·奥斯本先生

……喜欢拾人牙慧，
就像鸽子啄食青豆，
一碰到天赐的机会，
就要卖弄他的伶牙俐齿。
他是个智慧的稗贩，
宴会里，市集上，到处向人兜卖①。

① 莎士比亚“爱的徒劳”第五幕第二场。——编者注

即使贝尔纳·奥斯本先生以卖弄他的没有意义的伶牙俐齿为生，但他未必能区别一般的火枪和米涅式步枪。然而，他却是个女王陛下议会的军械部秘书呢。

读者也许还记得，不久前奥斯本请求议会给军械部拨款，以便生产海陆军需用的枪械。他说美国官办工厂制造的武器比私营工厂的便宜，又说，在英国由于承包单位不能按时交出武器，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困难。

下院的表决终于搁下了，因为门茨先生建议委派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解决"关于探索一条最经济、最迅速和最满意的途径使女王陛下军队的火器得到保证"的问题。这个委员会的报告现在已经公布了，好吧，看看委员会作出了些什么结论。报告说，私营企业不能按时完成定货，"是由于军械部对制成的武器采取无谓的、吹毛求疵的**验收方式**以及把武器许多零件分别交给不同承包单位制造的惯例"。报告接着说，"军械部恐怕不了解美国制造武器的价格，同时也不知道那里采用机器生产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还说"在部里从未见有美国官办工厂制造的武器"。

最后，我们从报告中得知，"政府打算兴建的工厂，在今后一年半以内连一枝枪也生产不出来"。

从议会报告中所作的摘录，足以评定联合内阁专有的军械部秘书奥斯本先生的业务能力了。Ex ungue leonem〔根据爪子可以辨认狮子〕。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5月24日
载于1854年6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4102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奥地利—普鲁士条约。——五月二十九日的议会辩论

1854年5月30日星期二于伦敦

“泰晤士报”对于不列颠的将军下令禁止“本报记者”随不列颠军队采访,感到非常愤慨。如果这次战争是bona fide〔认真进行的〕战争,那末反对这种措施就是愚蠢的了。威灵顿公爵早就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报告中埋怨过,拿破仑可以把他从英国报纸上看到的关于他威灵顿的军队预计的调动和部署的情报寄给法国在西班牙的将军。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命令只能有一个目的,就是使英国社会对远征军的背叛阴谋茫无所知。苏丹在十二月二日的英雄们的压力下所颁布的并已在各个清真寺宣读的一道禁止土耳其人谈论任何政治的命令可以作为英国将军的那道命令的很好的补充。而实际上,为什么土耳其人在这方面的情况会比英国人好一些呢?

在昨天下院的会议上,布莱克特先生问约·罗素勋爵,在最近的维也纳议定书[141]上,大不列颠有没有对1854年4月20日的奥普条约第一条作了什么承认或同意。这一条规定缔约国

“相互保障它们对德意志和非德意志的领土的占有,因此,对这两个国家中的一国的领土的任何进攻,不管这种进攻来自何处,都将被看成是对另一

个国家的领土的进攻”。

约翰·罗素勋爵回答说:“在议定书中没有什么**专门**承认或同意奥普条约的这个第一条的地方。”不管是专门的承认或者不是专门的承认,而我们在昨天法国的“通报”上读到,

“最近的维也纳议定书把英法进行目前战争的协定同奥普防备战争的条约联结在一起了”,

也就是说,把目前英法同俄国的战争与可能发生的奥普维护俄国的战争联结在一起了,总之,这个议定书是西方强国对普鲁士和奥地利不受侵犯地占有波兹南、加里西亚、匈牙利和意大利的保证。约翰·罗素勋爵接着还承认,这个议定书

“有巩固和保持各次维也纳议定书里的基础——土耳其帝国的完整和俄军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趋向”。

实际上这意味着保持 status quo ante bellum〔战前状态〕的新的义务。西方强国不能夸口说,有了这个议定书,他们就取得了对俄国的某种优势。因为奥普条约明确地规定:

“可能引起两个缔约国采取进攻或防御行动的,第一是多瑙河各公国并入俄国,第二是俄国进攻巴尔干或越过巴尔干。”

这两个条件显然是俄国自己迫使奥普两国接受的。俄国一开始就表示过,它根本不打算并吞多瑙河各公国:它只想保持住它们作为满足它的要求的“物质保证”。面对 8 万法军而越过巴尔干——俄国的作战计划中从来没有这种打算;俄国的计划的唯一目的不过是保证自己的军队在多瑙河右侧有几个要塞作为 têtes-de-pont〔桥头堡〕,以便经常有可能侵入保加利亚。我们 en passant〔顺便〕指出,“泰晤士报”在提到这个新的议定书的时候,满希望西方强国也许促成奥地利站到自己方面来,因为普鲁士现在“分

明”受着“俄国代理人”的操纵，而“纪事晨报”甚至对于奥地利有多少诚意表示绝望。如果是大拿破仑，就会迫使奥地利和普鲁士同情国结成公开的联盟；而小拿破仑则让俄国强迫他同德意志各国订立一个使他的军队尽可能远地离开军事行动区的联盟。

约翰·罗素勋爵在回答米耳恩斯先生的质询时说：

“法国已经命令大约6000人的军队去占领比里尤斯；上周离开英国的英国步兵团同样是派去占领比里尤斯的。”

这个措施是由于希腊政府同俄国的勾结造成的。军队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应当占领雅典。我们在今天法国的报纸上读到：

“奥托国王接受了最后通牒，并且答应只要撤退，就使马夫罗科尔达托内阁回来。否则，他决定把自己政府所在地迁往内地，并把自己的军队集中到那里去。”

这种抉择并不是一句空话，这从约·罗素勋爵下面这段话里可以看出。

“如果希腊国王不赞同本国人民的要违反中立国义务的尝试，那他就会从派去的军队那里得到保卫和迫使人民履行这种义务的手段。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希腊政府那里得到的庄严的保证是不真诚的，那末，这些军队就会用别的办法带来利益。”

由此可见，不管希腊政府怎样做，希腊总是要被占领。

“泰晤士报”有点气忿地报道说：

“目前罗马、雅典和君士坦丁堡这三个古代世界的伟大首都的守备部队大部分都是法军。”

老拿破仑习惯于占领现代世界的首都。而小拿破仑则满足于舞台式的大场面，把自己的军队分散到一些小国里，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军队赶到culs de sac〔死胡同，偏僻地方〕。

昨天在议院的晚间会议上，收回关于防止贿买选民的法案引起了小约翰、迪斯累里和布莱特三人一场非常滑稽可笑的争吵。迪斯累里先生指出：

"政府在会议期间提出了七项重要的法案。有三项法案在讨论时，政府遭到了失败；有三项法案政府收回去了，而在讨论第七项法案时，政府遭到了虽然不是完全的，却是相当大的失败。在关于根本修改强迫贫民迁返原居住地法令的法案、关于苏格兰国民教育的法案和关于全部修改议会誓词的法案上，政府都遭到了失败。政府收回了现在这个关于防止贿买选民的法案，收回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关于完全改变文职的法律草案；收回了议会改革的草案。牛津大学改革法案被议院通过以后，一定会面目全非。"

如果政府对于通过这些法案并没有什么希望，那就不该把它们提出来……有人说，现在的政府没有原则，而有"群贤"，并且可以指望，既然每个大臣都牺牲了自己个人的信念，那末这种英雄主义至少会给国家带来某种好处。

约翰勋爵的愤怒并没有使他的回答增加什么力量。他把被否决的和已经收回的法案的优点过分颂扬了一番。他补充说，不管怎样，议院并没有站到迪斯累里先生及其朋友那一边。迪斯累里先生指责政府在执行对外政策中不是轻信就是姑息，但他从来也不敢询问议院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他装出不愿妨碍政府备战的样子；然而他还是提出一项使政府没有进行战争的手段的提案。这项提案被一百多票的多数否决了。对于犹太人权利的法案(迪斯累里先生扮成一个捍卫犹太人的权利的人)，迪斯累里先生的态度是看情况而变化的。

这个回答使可怜的下院领袖遭到了他的政敌的新的比第一次更为猛烈的攻击。

迪斯累里先生说："好像高贵的勋爵认为，他没下台我会感到惊奇。恰好相反，如果他这样做了我倒会感到异常惊奇。(哄然大笑)如果可能的话，还需要遭到许多次新的更不光彩的、更彻底的失败，高贵的勋爵才会感到有必要走这一步。(掌声)我对高贵的勋爵太了解了。在他执政的时候，我充当反对派的时间太久了。我看到他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太多了。我曾多次看到他在遭到极其重大的失败以后，仍然怀着他那令人不胜钦佩的爱国精神和坚定态度执掌政权。(掌声和笑声)关于战争，政府曾向议会表示，一定把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文件摆到桌上来。然而实际上，政府把其中最重要的文件隐瞒起来，如果不是'圣彼得堡报'的揭露，全国就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经过这些揭露之后，他迪斯累里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说，已经不容作任何假设，而干脆必须说，政府只可能是犯了轻信或者姑息的罪过。他相信，不久这一点就会成为全国普遍的看法。"

然后，迪斯累里先生开始为得比勋爵的政府辩护并证明当时约翰勋爵所持的反对立场是"叛逆性的"。约翰勋爵作了很大的牺牲：

"他为了紧紧拥抱着一向否认他的才能、公开斥责他的活动的那些老仇敌，离开了他一生中忠实于他的同志。他辜负了信任，——我可以这样说，——他几乎使这样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政党的存在处在危险之中，而这个政党的信任对于像高贵的勋爵这样一个人来说，应当是同女王的宠爱一样可贵。(掌声)而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过去忠实于伟大的原则，满怀实行伟大措施的决心。但是现在，他的措施一个一个地破产了，他仍然执掌着政权。至于自己在犹太人问题上的行动，迪斯累里明确地、断然地表示反对高贵的勋爵所作的论断。"

其实在迪斯累里发言以后，约翰·罗素勋爵除了谈到自己的"失败"并把联合的继续描绘成一种不可避免的坏事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布莱特先生表示了这样的看法：

"高贵的勋爵在辩论中蒙受了不小的损失。由于政府本身的成分，从它组

成的第一天起就很清楚，它不可能为国家谋福利。他想起了下院的一位很机智的绅士，高贵的勋爵的和整个政府的好朋友曾说过，内阁如果能不管政治，就会取得出色的成绩。政府过去所采取的也大致是这样的方针。除了自由贸易以外，在任何问题上，政府既不能向议院提出建议，指导议院，也不能控制议院。十分明显，人们客气地称之为下院领袖的这位高贵的勋爵，实际上并不领导议院，议院也不跟着高贵的勋爵走，政府提出的法律草案最不客气地被否决。你把我们拉到战争中去，就应当把我们从战争中引出来。我们不愿意承担责任。这就是政府给我们造成的处境。政府在破坏和摧毁土耳其的国家制度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和摧毁了我国的议会制度。”

请问：这种制度干吗要存在呢？内政问题不能提，因为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但是，因为国家处在战争状态，军事问题也不能涉及。那末还保存议会干什么呢？老科贝特揭穿了这个秘密：作为对付国内沸腾着的激烈情绪的安全阀。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5月30日

载于1854年6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03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英国特别的陆军部的成立。——多瑙河上的军事行动。——经济状况

1854年6月2日星期五于伦敦

成立特别的陆军部的决定已获通过，现在的问题全部在于谁被选来担任大臣了。至今一直身兼殖民大臣和军务大臣两职的纽卡斯尔公爵，早就表示很不愿意放弃其中任何一个职位；而且根据“纪事晨报”的口气来看，他打算无论如何要继续主掌陆军部。今天的“泰晤士报”第三次建议任命帕麦斯顿勋爵。

“由帕麦斯顿勋爵担任陆军大臣来领导国家武装力量**反对我们可以称之为他的宿敌的俄国**，当然要比他同教区会议和排除污水委员会争吵不休更为合适。”

“每日新闻”也推荐了帕麦斯顿勋爵。在昨天的“先驱晨报”[142]上，登载了一篇乌尔卡尔特先生揭露这整个阴谋的文章。不管怎样，对“战争”说来，唐宁街的这些事件比在加利波利和斯库塔里的历次军事示威有更大的意义。

也许你们还记得，有人曾企图使公众产生一种希望，以为远征军司令官们一到君士坦丁堡就会立即采取紧急的和坚决的措施。

5月18日，圣阿尔诺元帅、腊格伦勋爵和土耳其陆军大臣到瓦尔那，5月20日要在那里同奥美尔一帕沙和海军将领举行军事会议。昨天伦敦收到一份电讯，说"在瓦尔那军事会议上，决定把联军从加利波利调往阿德里安堡"。同时"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叙述了整个作战计划，并报道了关于瓦尔那会议的消息。

"泰晤士报"说："这次会议显然是当俄军在帕斯凯维奇指挥下对锡利斯特里亚要塞发动猛攻的时候举行的，因此，联军的高级军官们有了很好的机会来决定关于支援这个要塞所必需采取的措施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他们命令部队从加利波利开往阿德里安堡去援助锡利斯特里亚；**正因为如此**，他们作出了下面这个英勇的决定：

"假若仅仅为了击退俄军对那些保卫多瑙河右岸的要塞的进攻而使土耳其军队冒一场总会战的危险是不适当的……同样地，把联军的相当一部分军队调到沿岸地区去立即同俄国前哨发生冲突也是不适当的。"

换句话说，联军的将军们已经决定：绝不阻止俄军夺取多瑙河右岸各要塞的坚决企图。"泰晤士报"承认，这种军事计划"会使那些自然感到不耐烦的公众失望"；但是另一方面，该报又发现"这些筑垒要点实际上不过是土耳其的**外围工事**，决不是它的主力所在"。以前，我们听说过，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只是土耳其的外围工事，土耳其把它们让给俄军不见得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现在我们又听说，土耳其也可以放心地把保加利亚让给俄军。

"巴尔干才是奥斯曼帝国的真正堡垒，如果俄军在继续前进中不断遇到可怕得多的新障碍，那末他们付出沉重的牺牲去占领外线工事是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他们在巴尔干以北地区越向前推进，他们的处境就越糟糕……入侵的军队会在攻击多瑙河沿岸的筑垒要点和敌人的分散部队的过程中耗尽自己的力量；而与此同时，保卫敌人的主要阵地的部队仍然是比较精力充沛而完整无损的。"

毫无疑问，只要吃牛肉长胖的[①]联军能够避免同敌人相遇，他们的部队就会是精力十分充沛的。但是，如果俄军在巴尔干以北地区不再前进，而满足于占领这些作为通往保加利亚的咽喉的要塞和多瑙河各公国，那又怎样呢？那时又怎样使他们从这些地区撤退呢？

“在巴尔干防线后的欧洲军队，正准备在适当时机以不可遏止的力量**转入进攻**，这样，这次战局的最后几个月**就会**把敌人消灭。”

这种不可遏止的进攻，由于多瑙河要塞都落在俄军的手中，当然是异常轻松的，而联军所不能做到的事情，**阴雨季节**将会毫不费力地办到。

诚然，“通报”报道说，奥美尔－帕沙正准备援助锡利斯特里亚。可是“纪事晨报”对刚才引证的那篇“泰晤士报”的文章感到不满，它指出：

“制定这个计划的人，看来是希望当时奥地利的外交在满足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而不断取得的胜利之后，就促使沙皇把自己的军队撤回去；另一方面，大概人们在指望，一旦俄国人在巴尔干继续前进，奥普条约所规定的遥远的可能性将会得到实现。”

但是，大家知道，“通报”把自己的新闻这样报道出来，是想使巴黎人保持良好的情绪；而“纪事报”评论“泰晤士报”的计划时所用的方式，只是更加证实了这样的推测：这也是联合内阁的计划，另外一些消息也证实了这种推测。“纪事报”驻君士坦丁堡记者在5月18日的报道中指出：

“多瑙河在盛夏不见得会有什么战局，因为这时候由于患热病和其他疾病而死的人会比由于其他原因而死的人更多。”

---

① 原文是：《beef－eating》——讽刺英国近卫军的称呼。——编者注

此外，内阁的报纸“地球报”[143]昨晚也刊登了一篇同“泰晤士报”的那篇文章的精神完全一样的文章。“地球报”报道说，第一，目前在土耳其的联军“**只有**”45000人——29000名法军和16000名英军；在下一栏接着说，第二，俄军在锡利斯特里亚附近只有9万人，而土耳其的作战部队达104000人。但是“地球报”还是认为这个将近15万人之多的土耳其、法国和英国的军队总数，不足以阻止9万俄军占领保加利亚的要塞，更不必说3支强大的舰队所能给予联军的那种援助。“地球报”认为土军或联军同俄军作任何斗争都是多余的，因为“季节将同他们作对”。“地球报”在叙述联军司令官们搞出来的作战计划时，比“泰晤士报”更进了一步，它说：

> “不管多瑙河各要塞的命运如何，必须集中适当力量，使侵略者不能**继续**推进，并使它因冒失进攻而受到惩罚。”

这里清楚地向我们证明，英法在最近的维也纳议定书上同意了奥普条约。他们决定把多瑙河各要塞和保加利亚让给俄国，只有俄国**继续**推进才能成为进行战争的理由。

在最初15000名俄军渡过普鲁特河侵入莫尔达维亚的时候，人们劝土耳其按兵不动，据说是因为土耳其反正不能阻止这个15000人的非常厉害的力量把瓦拉几亚也占领去。后来俄军果然占领了瓦拉几亚。当土耳其政府宣战的时候，已经不能同俄军进行任何战役，因为已经冬天了。春天到来以后，奥美尔－帕沙却奉命不得发动任何攻势，因为联军还没有到来。他们到来以后，已经什么也不能做了，因为夏天已经到来，而夏天是一个对健康不利的季节。等到秋天到来，而那时又会发现，“要开始作战已经太晚了”。这种方法，“泰晤士报”称之为战略和战术的配合：显然，这家报纸认

为战术的实质，是牺牲军队以保存“精神充沛的”后备力量。同时请你们注意，自从这种欺骗行为公开地在反对派报纸面前和英国广大公众面前进行以来，“晨报”和“泰晤士报”就一直竞相攻击普鲁士、丹麦和瑞典没有同西方强国“联合起来”！至于所有小国为什么都倒向俄国方面，这不是没有非常重大的根据的，——比如从丹麦政府报纸的口气里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例如，“纪事晨报”驻哥本哈根记者写道：

“内阁执政党用来对民族派进行严厉控制的那种威胁在于：英国对丹麦一直是背信弃义的；如果丹麦同西方强国联合起来，那末10万普鲁士军队，也许还要加上奥地利一个军，就会把日德兰半岛直到埃德尔河洗劫一空并把丹麦全部领土占领。”

联合内阁可能期待并且一定在期待，由于自己曾经客客气气地为俄国“正义事业”效过劳（在外交、军事和其他方面），它会看到专制君主多少表示一点客客气气的谢意。但是一点也没有；联合内阁从专制君主那里挨揍的次数比实际上应该挨的还要多。为了说明俄国宫廷对自己假想的敌人抱怎样一种高傲的蔑视态度，我把不久前在“北方蜜蜂”上发表的一篇匿名的俄国梯尔泰的寓言给你们译出来。寓言的语言和结构之所以简单浅显，是因为诗人是给那些不大开化的人写的，这正像“圣彼得堡报”之所以用一种讽刺的委婉口吻批评了安梅林海军上将最近关于敖德萨的报告，是因为这家报纸在这里是对欧洲外交家写的。寓言的标题是：“山鹰、叭喇狗、公鸡和兔子”。内容如下：

一只又大又壮的雄健的山鹰，站在山岩之巅，环视着波罗的海彼岸的整个世界（Weit hinter in Belt die ganze Welt）；它就这样安安静静地站着，满足于自己那点微薄的饮食，也不想到下面山谷中去猎取食物，因为它随时都可以取得一切东西。叭喇狗嫉妒地望了山鹰一眼，就对公鸡说：“作我的伙伴吧，

让咱们联合起来—— 你是为了报仇，我是出于嫉妒—— 把这只山鹰扔下去。”说干就干。它们开始了。一路上它们谈到怎样打倒山鹰最好，公鸡说：“停一停！你瞧它的脚爪，瞧瞧它的翅膀—— 谁要想试试它们的力气，谁就倒霉；我不只一次听到我的前辈一想起山鹰的翅膀给他们的打击，就在诅咒。”叭喇狗说：“这是真的，但是咱们要用巧计来捉山鹰。咱们暗中派兔子走近它。它一定会抓住兔子，这时，你就使出你十分擅长的又叫又跳的本领来转移它的注意，并且装出你想参加进去打架的样子。当咱们这样把它的注意力引开并把它的爪子缠住的时候，我就从后面向它进攻，这样一来，它就没法防卫，只要几分钟它就会被我锋利的牙齿咬个稀烂。”这个计划很合公鸡的意，它就在附近担任起了望哨来了。叭喇狗跑进树林，大声狂吠，把兔子朝着正在安静地等着的山鹰跟前赶去。兔子吓掉了魂，拚命冲向山鹰爪下。忠实于签订的协定的公鸡叫了起来，跟着兔子飞跑，但是—— 真可怕！山鹰原地不动，只是振一振翅膀，看也不看兔子，就把它撵开，然后抓住公鸡，公鸡顿时一动不动，也不叫了。大家都知道兔子爱跑；这时它失魂落魄地跑，一直跑到海里，然后咽了气。山鹰看见肥肥的叭喇狗在远处搞鬼—— 有什么能够逃过山鹰的眼睛呢？山鹰发现了这位藏在灌木丛后面的英雄。它展开了强壮的翅膀，雄健地腾空而起。叭喇狗汪汪地叫，竭力想溜走。可是白费劲，已经晚了。山鹰从空中直向它扑下来，把利爪扎进了叛徒的背部，于是叭喇狗倒下了，并被撕成了碎片。

由于丰收在望，又因为没有投机倒把，上周粮价略有下跌。然而回升是必然的，因为，“根据与此有关的一切材料看来，应该认为农民的储备比常年这个时候少得多”（“粮食交易所快报”）。但泽、施特廷和罗斯托克等地的消息都一致证明，现有储备很少，郊区农民没有什么或者几乎没有什么可卖的了，只有用高价才能指望从这些地区运来一些粮食。从法国运来的谷物，大概也没有增加，而国内市场上的小麦的供应，未必能够满足要求。

我还从私人的消息中听说，“泰晤士报”关于曼彻斯特周围工厂区的工业状况的报告总的说来是不符合实际的，除了北明翰以

外到处都是营业不振。“曼彻斯特卫报”[144]证实了这一点，还补充说，有那么多数量的罢工工人复工，一定会使价格下跌。

至于詹·格莱安爵士上星期一在下院会议上发表的声明，即关于阿尔汉格尔斯克港不予封锁的声明，“先驱晨报”用下面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来评论它：“财政大臣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有一所房子。”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6月2日

载于1854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05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英国军事部门的改组。——奥地利的要求。——英国的经济状况。——圣阿尔诺

1854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于伦敦

科苏特在设菲尔德的演说是他在居留英国的整个期间发表的历次演说中最有内容的一次;然而不能不指出这次演说的缺点。其中离开本题追溯历史的地方有一部分是不确切的。例如,认为土耳其的衰落开始于萨比斯基援助奥地利首都[145],这是绝对没有任何根据的。哈麦尔的研究 146 无可辩驳地证明,土耳其帝国这一组织当时已经处在瓦解状态,并且在这以前的一段时期,奥斯曼的时代就已经快要告终了。说拿破仑放弃从海上进攻俄国的念头,不是因为他没有舰队以及英国人使他失去了海洋上的霸权,而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这种论点也是错误的。威胁说,如果英国同奥地利联盟,匈牙利就会同俄国联盟,这是非常轻率的。第一,这给政府的报纸提供了武器,而“泰晤士报”也就广泛地利用这个武器,把所有的革命者都“斥”为俄国代理人。第二,他说出这种话,听起来是很奇怪的,因为他的政府早在 1849 年就表示可以把匈牙利王位让给俄国皇太子。最后,他无法否认,他的这个威胁,不管是他倡导的还是

别人倡导的，如果一旦变成现实，那就是对马扎尔民族的存在宣判了死刑，因为匈牙利的很大一部分居民是斯拉夫人。把同俄国的战争说成是自由同专制的战争同样是错误的。且不说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就会成为自由的代表人物，就以公开宣布战争目的是保持强国均势和维也纳条约（正好是那些消灭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条约）这个事实来说，也是同科苏特的论断相矛盾的。

乌尔卡尔特先生在北明翰发表的演说，也比平常强烈，他在演说中又一次指责联合内阁背叛。但是，这个寡头政体的联合内阁是建立在腐烂透顶的议会基础上的，既然乌尔卡尔特先生同那个唯一能消灭这个基础的政党有根本分歧，那末他所有的演说就像对老天讲的一样，很少能达到目的。

约翰·罗素勋爵昨天晚上在下院宣布即将成立一个特别的陆军部，但是这个部不应把现在各军事部门所属单位合并进去，只是在名义上对所有这些单位进行监督。这一变更的唯一优点就是多设了一个大臣职位。至于新的任命，昨天“晨邮报”报道说，皮尔派[147]在内阁占了上风，纽卡斯尔公爵将任新的军务大臣，而殖民地则交给约翰·罗素勋爵来管。昨晚出版的“地球报”证实了这个消息，并且补充说，由于约翰勋爵很可能表示拒绝，殖民大臣一职将由乔治·格雷爵士担任。当皮尔派的报纸继续装模作样，好像不知道最后决定的时候，帕麦斯顿的报纸今天证实说，纽卡斯尔公爵和乔治·格雷爵士已经得到了任命。

“晨邮报”就奥地利的“绝对要求”写道：

“我们有根据认为，俄国不会以沉默来回避奥地利的要求，不会加以拒绝，所以，如果我们不久知道，俄国准备在奥地利为了进行谈判而采取步骤来签订停战协定的条件下，接受奥地利关于从土耳其领土完全撤退的建议，我

们是不会感到惊异的。”

今天的“纪事晨报”也承认，“这个要求可能具有极大的意义”。但该报仍然补充说，不应把这个要求看成是最后通牒，这个要求是用通常的客气的口吻提出的，而且只有在俄国完全不理睬这个要求的时候才会决裂。如果俄国作出模棱两可的回答或者作出局部的让步，那末新的建议和谈判就会随之而来。

我们暂且假定“晨邮报”的推测是正确的，并且是可以实现的：显然，奥地利的效劳只能保证再订立一个对俄国有利的停战协定。很可能有某种类似的考虑，而且作这种考虑的根据是锡利斯特里亚那时将会陷落，“沙皇的光荣和尊严”将会得到保持。然而，如果锡利斯特里亚守住了，土耳其人的英勇终于使联军违背自己的司令官和政府的愿望而采取了军事行动，那整个计划就会破产。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粉饰一下这场大战中无穷无尽的疏忽和失策的无聊场面，那就是英国公众和报刊在估计西方强国和德意志强国建立联盟的现实性和利益时所表现的那种可笑的踌躇不决的态度。奥地利为了使大家都满意刚刚提出了自己的“绝对要求”，奥地利君主和普鲁士君主会见的消息又立即引起了大家惊惶不安，这次会见，用“泰晤士报”的话来说，“对西方强国不是什么好的预兆”。

贸易部上月的统计数字已经公布。这些数字不如前几个月那样好。输出的申报价值比1853年同期减少了747527英镑。同曼彻斯特市场有关的各项输出，情况最为不妙；而且亚麻纺织业、毛纺织业、丝纺织业也都有了减少。

从北明翰的斯特治先生等出版的这一期每月简讯中，我们得知小麦生长情况不好，简讯中关于这一点是这样报道的：

“因为种子价格高，每一英亩土地播下的种子也就比常年少，而因为播种所用的去年的小麦质量差，今年的收成看来不如假设去年收成较好时今年可能达到的收成那样好。”

“粮食交易所快报”谈到这个消息时指出：

“这种推论我们觉得是非常可能并且值得注意的，因为质量坏的种子未必能长出在比较好的条件下可能长出那种茁壮的苗来。人们将特别关心庄稼的生长情况，因为大家都知道，由于1853年严重歉收，不但在英国而且几乎在世界各大洲，粮食储备都少到了极点。今后粮价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天气而定；现在麦价太高，不足以刺激投机，虽然，今后3个月从国外输入的粮食非常可能比过去少得多，但是，如果不发生任何使即将到来的收成前景更为不好的情况，那末囤积剩余粮食的人就将设法尽快把这些粮食脱手，而磨坊主等则将采取观望政策……同时应当注意，全国都感到粮食缺乏。”

现在你无论在伦敦哪条街上走，都会看见一群人站在那里看爱国画，上面画着几个有趣的人物：“文明的三个救星”，即苏丹、波拿巴、维多利亚。为了使你们能够充分认清那些在已经“拯救社会”以后现在又被托付拯救文明的人们是些什么人物，现在我把关于最高统帅圣阿尔诺元帅的特写继续下去[148]。

著名的七月的日子[149]把雅克·勒卢阿（原名）即雅克·阿希尔·勒卢阿·德·圣阿尔诺（现名）从他的债权人的爪子下救了出来。于是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困难问题：他应当怎样利用当时法国社会由于旧制度突然崩溃而造成的十分混乱的环境。阿希尔没有参加三日战斗；他连冒充参加也不可能，因为大家都非常清楚，在这些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他被关在圣珀拉惹牢房里。因此，他不能够仿效当时其他许多冒险家，冒称自己是七月**战士**之一而要求某种奖赏。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制度**的成功看来也丝毫不能有利于这个巴黎名士派的渣滓的著名代表人物，他一直盲目地信仰正统主

义，根本没有参加过“自助者天助之”会(他这个没有先见之明的缺陷因他成为十二月十日会最早的会员之一而得到弥补)[150]，没有在伟大的“十五年的喜剧”中扮演过任何角色。然而，阿希尔还是从他旧日的老师厄·德·普先生那里学会了一点作即兴诗的本事。他大胆地来到陆军部，声明自己是复辟时期出于政治动机而退职的尉官。至于他被赶出Gardes du corps〔国王近卫军〕，被科西嘉军团开除，以及离开了开赴殖民地的第五十一团等情节，他都很容易地把它们变成他的奔放的爱国热情和受到波旁王朝迫害的证明。诚然，履历表证明他的话是假的，但是陆军部却装出一副相信他的样子。当时许许多多军官不愿向路易—菲力浦宣誓而纷纷退职，以致有许多缺额需要补充，因此，篡夺者的政府很乐意接收任何一个公开背弃正统主义的人，而不管他们转过来的动机是什么。于是阿希尔就被派到第六十四常备团，但并不是没有受委曲：他复职后仍然是尉官，没有像其他在复辟时期退职的军官那样得到提升。

岁月和他原来的军衔终于使他得到了中尉头衔。同时他还得到了一个表现他那种奴颜婢膝的变节者的特殊才能的机会。1832年，他的团队驻扎在帕特讷，即正统主义者在万第省举行暴动的中心。他同聚集在贝里公爵夫人周围的一些前Gardes du corps的旧关系，使他有可能把军人的职责同警探的职责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同他在伦敦赌场和巴黎cafés borgnes〔下流地方〕成熟起来的天才非常相适。贝里公爵夫人被犹太人多伊茨出卖给梯也尔先生而在南特被捕了。于是阿希尔奉派把她押解到布累，他应当在毕若将军指挥下在那里担任看管她的狱吏之一。他热切希望不放过公开表明自己对保卫王朝利益极度热心的机会，但做得太

过火了，他对警察局的那种卑鄙的巴结和对公爵夫人的粗暴态度，连毕若都感到厌恶。但是毕若无权解除这个副官的职务，因为他是警察局专门派来看管公爵夫人的，他直接受警察局长若利先生的领导，而且归根到底主要是听命于内务部，而不是听命于陆军部。未来的英法联军最高统帅当了接生婆，因为他的特殊使命是用证人的证词来确定并证明公爵夫人已经怀孕，怀孕的被揭发使旧制度的拥护者遭到了致命打击。由于这样一种品质，圣阿尔诺先生的名字第一次在“通报”上被提到了。我们在 1833 年 5 月的“通报”上读到：

“阿希尔·德·圣阿尔诺先生，今年 34 岁，通常住在巴黎，是毕若将军的副官，他接到了一项命令，要他根据自己的正式地位签署一项证明公爵夫人于 1833 年 5 月 10 日在狱中生了一个孩子的文件。”

好巴结的圣阿尔诺以后仍然忠于自己的狱吏职务，并乘轻巡航舰押解公爵夫人到巴勒摩。

阿希尔一回到法国，就成了全团取笑的对象和替罪羊。他受到军官们的仇视，被开除出他们的 réunions〔俱乐部〕，他为人们公开对他表示的极端轻蔑的态度所苦恼，遭到全团的唾弃，他终于不得不到当时正好在贝多上校领导下在巴黎组成的阿尔及利亚外籍军团里去避难。这个外籍军团完全可以叫做欧洲军十二月十日会。坏透了的暴徒、负债累累的冒险家、各国的逃兵、欧洲军队所有的渣滓组成了这支 corps d’élite〔精锐部队〕的核心，这支军队完全有资格取名为 refugium peccatorum〔罪犯的避难所〕。阿希尔的天才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像在这种军队的圈子里那样发挥得充分，这种军队的正式使命防止了警察局的毒牙的侵害，而这种军队的成员的道德面貌消除了通常限制着正规军军官的种种路障。但是，

在各方面都很挥霍的阿希尔，对于证明自己在军事上的勇敢和才能却很吝啬，所以他在外籍军团第一营中尉这个不大的军衔上继续混了 4 年，一直到 1837 年 8 月 15 日新的委任状才给他一个上尉的军衔。非常可惜的是，法国军队的行军金库是由上尉监督的，上尉负有发放兵士薪饷和供应粮食的责任。但是金库正是我们现在的阿希尔所特别垂涎的。所以，在他被提升以后不过几个月，他属下的金库就出现了惊人的亏空。视察的将军德·吕利埃尔先生发现了这种盗用公款的行为，坚持要惩办上尉。给部里的报告已经写好了，眼看就要付邮，德·圣阿尔诺先生眼看就要永远完蛋了，而这时他的长官贝多先生被自己部下的绝望处境感动了，他出来过问这件事，并且使得吕利埃尔将军的怒气平息下去了。

圣阿尔诺有一种他所特有的报恩方式。他在 coup d'état[151]的前夕被任命为陆军大臣以后，便下令逮捕贝多将军并把吕利埃尔将军从军官团的名册中除名。吕利埃尔给他写了下面这封信，这封信曾给巴黎的朋友们看过，并在比利时的报上登载出来：

“1837 年，吕利埃尔将军不想使勒卢阿·德·圣阿尔诺上尉名誉扫地，所以没有剥夺他的军职。1851 年，陆军大臣勒卢阿·德·圣阿尔诺虽然不能败坏吕利埃尔将军的名誉，但是剥夺了他的军职。”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6 月 9 日
载于 1854 年 6 月 2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14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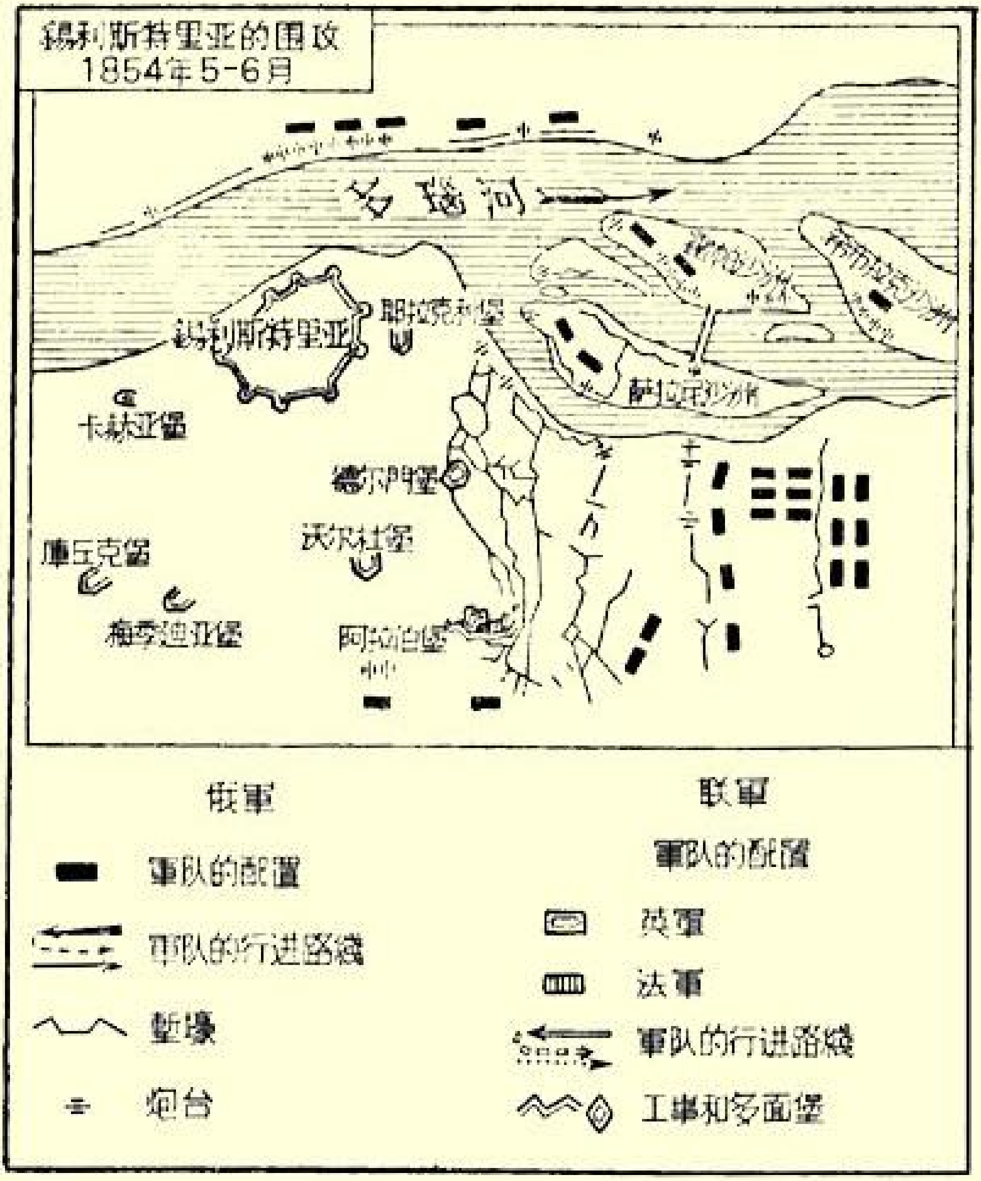
前一个时期尽是一些不值得评论的军事行动，因为采取这些军事行动与其说是出于战略战术上的考虑，不如说是出于外交和议会方面的考虑；经过了这段时期以后，终于出现了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和强攻这样一个有军事意义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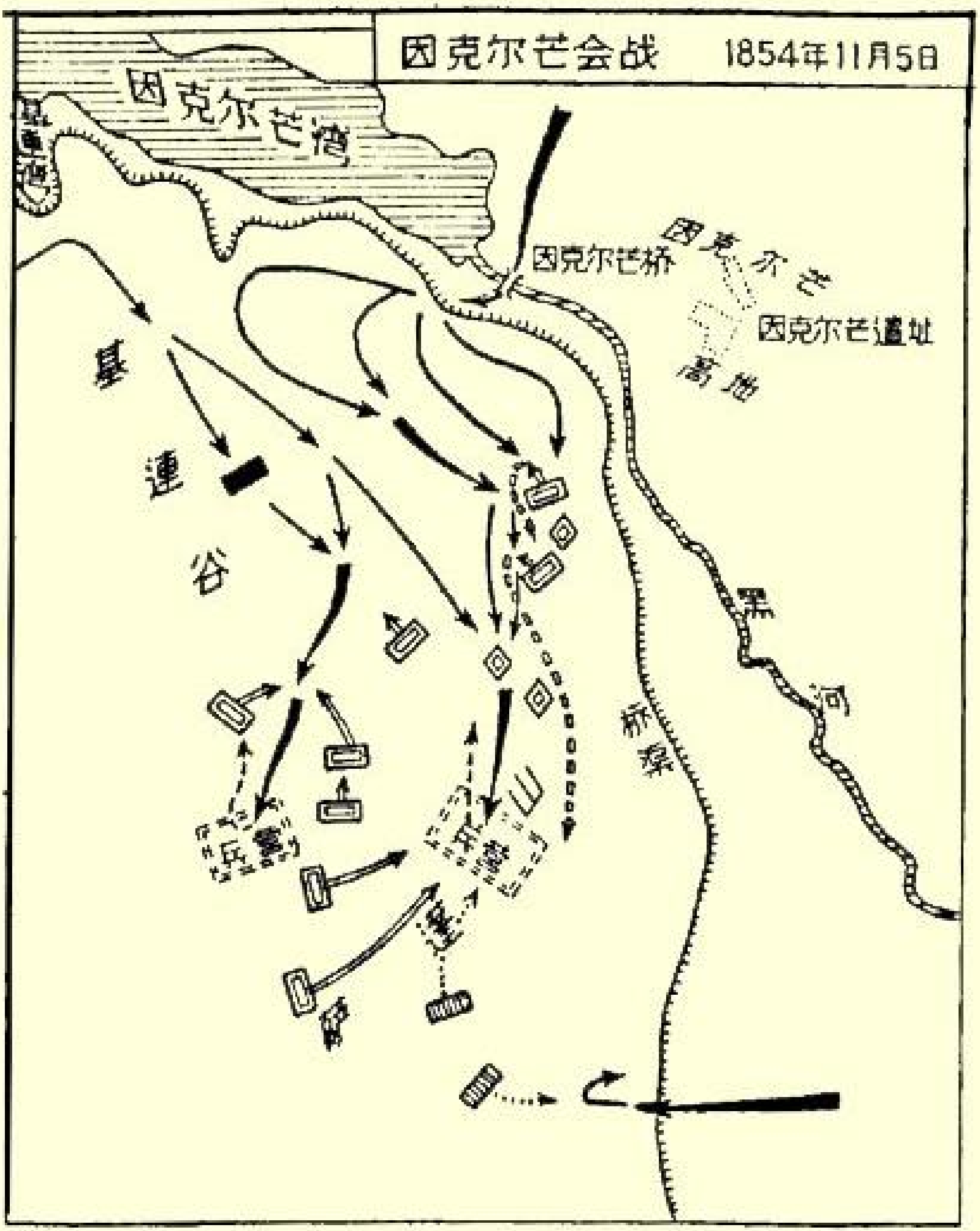
这次强攻表明：俄军继续握有主动权，并且到目前为止，土军、联军陆军和舰队的行动仍为俄军的行动左右。联军舰队本能地、不由自主地被塞瓦斯托波尔可靠的掩蔽地点内的俄国舰队吸引；由于没有陆军的帮助就不能攻击这个要塞，结果这支舰队就被在船只数量和质量上都差得多的舰队牵制住而不能自由行动。甚至高加索沿岸堡垒的守军在英法舰队眼前及时撤退，也表明俄军决心尽可能长久地掌握主动权。在战争中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能掌握主动权，就证明军队或者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或者在指挥艺术上具有优势，而且在一切失利和退却的情况下，除了决战失败以外，这也可以维持士气。正是这种主动权，既把威灵顿那支被数十万法军包围在西班牙的小小的军队团结起来，又使它在历时5年的战争中成为一切事件的中心。你可能被迫退却，你可能被击败，但是只要你能够左右敌人的行动，而不是听任敌人摆布，你就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占有优势。而更重要的是，你的每个兵士和整

个军队都将感到自己比对方高出一筹。此外，对锡利斯特里亚的攻击是俄军从完成多瑙河口的占领以来第一次真正的进攻行动。开入多布鲁甲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防御，这既是为了缩短战线，同时也是攻占多瑙河口的一个步骤。而对锡利斯特里亚的攻击，则不仅是大胆的行动，而且是估计得极为正确的行动。

在1828—1829年，当时统治着黑海的俄国人由于要首先攻占瓦尔那而没有重视锡利斯特里亚，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攻占瓦尔那就开辟了一条通往俄国本土的新的海上交通线。尽管如此，锡利斯特里亚仍然是相当重要的地点，他们在越过巴尔干之前，仍然必须先夺取它。但是在目前联军舰队统治着黑海的时候，瓦尔那对俄国人来说就大大失去了它的意义，而锡利斯特里亚和苏姆拉成了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现在瓦尔那对于俄军仅具有间接的重要性，因为夺取它以后，他们并不能得到一个广阔的作战基地，只不过使敌人丧失一个可以称做海岸桥头堡的阵地；在这个桥头堡的掩护下，敌人也许会利用舰船突然集中相当数量的军队来进行某种行动。例如，丹麦人在1849年把普鲁士军队诱到日德兰半岛以后，突然把一支强大的部队海运到弗雷德里西亚附近的海岸桥头堡，仅以一次出击就消灭了在要塞前面准备进行围攻的、优秀的但薄弱得多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一支部队。因此，如果说退出了黑海的俄军不占领瓦尔那就决不能穿过巴尔干的话，那末他们至少不占领锡利斯特里亚就不能进攻瓦尔那。

但是在目前看来，这些推断都是次要的。没有奥地利的帮助，俄国休想在现代的敌人的眼前穿过巴尔干。现在锡利斯特里亚对于俄军具有头等的防御意义，并且意义如此重大，以致不夺取它，俄军就可以认为今年的战局失败了。锡利斯特里亚的位置正对着


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
1854年5-6月
多瑙河
锡利斯特里亚
梅季迪亚堡
阿拉伯堡
俄軍
軍队的配置
軍队的行进路綫
塹壕
炮台
联軍
軍队的配置
英軍
法軍
軍队的行进路綫
工事和多面堡


因克尔芒会战　1854年11月5日
因克尔芒湾
因克尔芒桥
因克尔芒遗址
黑河

俄军从茹尔日沃经卡拉腊什和切纳沃达到居斯坦杰的阵地的中心。既然在这一阵地的前面有坚强的要塞体系，既然奥美尔－帕沙坐镇苏姆拉像蜘蛛在它的网里监视着猎取对象的每一个动作一样，既然在卡姆契克河和迭夫年斯卡河可能出现联军，那末，俄国用于多瑙河战争的军队在无外援的情况下将很少可能向色雷斯盆地突进（这个盆地的青翠景色曾经诱惑过越过巴尔干山的吉比奇的疲乏的兵士）。俄国在奥地利没有同它联合以前，或者在它的最厉害的敌人——英法军队没有因某种情况而遭到削弱或被迫撤走以前，至少在今年只能单纯防守它目前已夺得的领土。防御战需要有野战防御工事体系或者（在可能时）永备防御工事体系。但是只要锡利斯特里亚仍在敌人手中，俄军除开多布鲁甲的一些小型堡垒便没有任何永备工事，并且这些小型堡垒在瓦拉几亚失守时就会毫无用处。俄军可能修复布来洛夫和鲁舒克的一些工事，并在布加勒斯特附近建立一个营垒，但是在他们没有占领锡利斯特里亚以前，他们真正可用的第一道防线将远在后方，即在塞勒特河—福克夏尼—加拉兹—伊兹马伊尔这一线上。

假定锡利斯特里亚是在俄军手中，那末军事形势便会立刻不同了。锡利斯特里亚是俄军作为多瑙河桥头堡的一个最好的地点。它位于多瑙河河湾的内角上，对上述用途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位置。在西北方面有一个大沙洲，上面横贯着一条通向卡拉腊什的堤坝。大沙洲瞰制着要塞以西的平原，距那里 1000 码，这个距离对于对堑壕进行纵射和对纵队进行炮击是足够近的了。在东面有两个小沙洲，从这里可以射击东面的接近地，水浅时在沙洲上构筑的临时炮台，将会极严重地威胁围攻者。因此，北面受到攻击的土军在防御时所不能利用而不得不让给敌人的那一部分领

土，倒成了俄军炮兵对从南面进攻的敌人进行侧射的一个很好的阵地。这样，暴露给攻击者的正面仅仅是以锡利斯特里亚为顶点的三角形的底边，换句话说，只是南面向陆地的那一面；所以土军或联军至少在瓦拉几亚仍为俄军掌握时，休想大举进攻锡利斯特里亚。

但是主要的优点与其说是战术上的，不如说是战略上的。俄国占有多布鲁甲和锡利斯特里亚，就可以控制多瑙河并可根据情况或从图拉真垒墙方面或从锡利斯特里亚采取短促的进攻行动。敌人在兵力上如不比俄军多一倍，要在锡利斯特里亚以西任何一个地点渡河，都不能不把苏姆拉暴露给俄军。至于在锡利斯特里亚以东渡河，那根本谈不上，因为在希尔索瓦附近没有渡口，而要到达那里，得首先占领卡腊苏河的各个阵地，然后再占领希尔索瓦，而希尔索瓦可以有力地抵挡住陆上的攻击，却极其容易被河上的敌人攻破。

因此，俄军占领锡利斯特里亚以后，多布鲁甲的堡垒对他们就有了很大的意义。他们获得一个双重的轴心，可以围绕它自由机动而不致使自己的交通线受到威胁。即使由于两倍优势的兵力，敌人能在沃耳特尼察或茹尔日沃附近渡河占领布加勒斯特并把俄军击退到雅洛米察河彼岸，但要保障安全地向贝萨拉比亚坚决进军，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仍然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在锡利斯特里亚真正陷落以前，俄国人即使在瓦拉几亚没有一兵一卒，也可以认为自己是瓦拉几亚的占有者。总之，俄军占有锡利斯特里亚就等于说可以多占领瓦拉几亚 6 个月，而 6 个月后已到冬季，那时在这个地区是根本不能进行任何围攻的，这就等于把俄国人的统治又延长 4 个月。占领锡利斯特里亚就是打了胜仗，而从锡利

斯特里亚撤退差不多就是打了败仗。

这样一来，便出现了例外的情况，不管怎样玩弄外交手腕，怎样贿买、怯懦和犹豫不决，但由于战争的内在规律的作用，我们已经接近到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或者是对锡利斯特里亚听任不管，——那末它的陷落将成为可以用数学方法准确计算出来的事实；或者是联军开往援助，——那末就将发生决战，因为俄军如果从锡利斯特里亚城下不战而退，就不能不涣散自己的军心，丧失自己的威信，——但是，看来，他们也是不准备这样做的。

没有一个要塞曾经遭遇过像锡利斯特里亚那样变化莫测的命运。1810年，俄军经过9天的围攻和5天坚决的强攻后夺取了它。1828年，虽然要塞的情况完全和从前一样，但俄军于6月21日用陆军包围它，8月10日又增加了36艘炮艇。然而攻城炮在9月才到达，并且没有一点弹药，因此就不能采取正规的攻击。11月10日，由于冬季来临和多瑙河上出现浮冰，俄军不得不撤围。在退却中组织涣散、士气沮丧的俄军遭到守军猛烈的追击；俄军的一部分攻城炮被遗弃在炮位上，其余的被在拉索瓦方向上追击的土军缴获。第二年，吉比奇又去围攻，在把土军从俄军前一年构筑的战壕和多面堡逐出以后，于5月7日包围了要塞。他们大概没有经过任何事先的准备便把31门重炮配置在距城约九百码的高地上并开始轰击。5月26日，在距围墙约六百码处配置了破坏敌人火炮的炮队，同时构筑了第二道平行壕；第三道平行壕于6月4日筑成，而在6月12日开始向斜堤顶推进。17日，在一处通过了斜堤，但是整个行动直到26日即在距主墙30码的壕沟边设置好了5个炮队以后才完成。同时，在目前围攻中指挥工程作业的施尔德尔将军，当时曾大规模地进行了他最擅长的地道爆破。埋在外岸和主墙

下面的大包炸药在6月21日爆炸，立刻炸开了一个可通行的缺口，在6月25、27、28和29日又相继爆炸，要塞终于在29日投降了。要不是那些迷信的、未经正规训练的兵士被地下爆炸吓得丧魂落魄，看来当时也不是非投降不可。在整个被攻击的正面和第二道垒墙的后面筑有coupure〔二重堡〕，即一道新的战壕，要占领它无疑又需进行地道爆破或炮兵轰击。这样，这个令人惊异的要塞，虽然与1810年相比毫无改善，却在敌人掘壕后支持了35天，在主墙被打开能通行的缺口后支持了9天。它迫使俄军在炮击中消耗了3万发炮弹，在地道爆破中消耗了336英担①火药。

由于财政的困难和埃及的战争，土耳其人在阿德里安堡和约以后对这个重要据点竟没有加以照顾，以致直到1836年，不仅1829年打穿的洞孔没有完全堵塞，壕沟没有清除，甚至连1810年强攻的痕迹仍然历历在目。苏丹当时曾考虑修建独立堡垒，但这个主意在相当一段时期没有实现。现在，锡利斯特里亚的情况已完全不同，这主要应归功于在土军中服务的普鲁士军官格拉赫上校的努力。原来构造上就有缺点的要塞看来未必能作很大的改进，但是在高地上构筑的独立堡垒已经显示了它们的作用。要塞形成一个半圆，其直径沿着多瑙河岸，长约1800码。要塞有10个棱堡面，平均每个长500码。其构造同十六和十七世纪所有的土耳其要塞一样，存在着意大利旧式筑城所固有的全部缺点：中堤长；棱堡不大而且狭窄；侧面短，几乎不能掩护壕沟；壕沟本身很浅（深度不超过8英尺）；没有隐蔽路；只有顶端高出外岸顶部刚4英尺的简陋斜堤。围墙本身高8英尺，厚20英尺，用土筑成。内岸

① 1英担等于112磅，或等于50.8公斤。——编者注

和外岸的高度，按壕沟深度计算为 8 英尺。壕沟本身由于位置较高，必然是干燥的。在中堤前面甚至连眼镜堡都没有。这便是 1836 年前的锡利斯特里亚。此外，在距围墙 600 码处，有一连串向南延伸的高地瞰制着要塞，这就使上述缺点更严重了。这些高地是保加利亚台地的支脉，台地有非常平坦的顶部，延伸到距城 1500 码处，然后向河流方面缓斜而下，它的一面是狭窄的小支流，一面是高地，为炮队提供了一个正射和纵射用的优良的梯阶阵地。曾在 1836 年视察过这个要塞的莫尔特克少校（上面叙述的具体材料便是从他论 1828—1829 年战局的著作中引来的）发表过以下意见：

“如果不在高地上增建 4 个独立堡垒，不在对面的大沙洲上构筑一个桥头堡，就不能使锡利斯特里亚具有坚强防御的能力。”[152]

在属于瓦拉几亚的那个沙洲上构筑桥头堡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土耳其人根据和约规定已经撤出瓦拉几亚；但是现在堡垒已经筑成，而且，如果我们所得的消息是正确的话，这些堡垒差不多正是构筑在莫尔特克少校所指出的那些地方。

究竟格拉赫上校在消除要塞主墙缺点方面采取了什么措施，这还很难说。但有一点大概可以不必怀疑：他至少构筑了隐蔽路，并在中堤中央开了射孔，以便沿所有最受威胁的、防御较弱的正面上的壕沟射击。至于 4 个独立堡垒，它们构造的特点目前我们还一无所知，但鉴于格拉赫上校是普鲁士人，并且节省费用对于土耳其政府又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可以说，这些堡垒很可能是按照目前欧洲大陆几乎到处采用，特别是在普鲁士采用的那种体系建筑起来的，就是说，这些堡垒是顶部平坦的方形堡或八角堡，每隔一个角筑有炮眼。它们的位置可以根据形成为台地向城市方向突出的末端并为 3 个雏谷隔开的 4 个地角来确定。它们和主墙的

距离平均应为1500码，因此要塞的火力不能对它进行多少有效的掩护。但这也不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在离城较近的斜坡上，看来也没有任何地褶可用来很好地掩蔽堡垒，使它不受台地边缘的瞰制。

除了这些永备工事以外，格拉赫上校还在台地上构筑了临时性的土堡，叫做阿拉伯堡，位于两个中央堡垒之前约一千码处。根据一些报道，我们可以推断还筑有其他的野战多面堡，好像一道外国堡垒线一样，所以，前后共有3道防线。但是阿拉伯堡仍然是这些阵地的锁钥，必须先夺取它才有可能接近内围堡垒线。这样的工事配置使锡利斯特里亚有了巨大的防御力量和进攻力量。因为正规攻击只有从要塞的南面进行才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所以守军如有15000—18000人，便可以派出大批兵力出击。担任出击的部队可以在独立堡垒后面的斜坡上找到很好的掩蔽阵地，从这些阵地他们可以沿着雏谷接近到距敌人很近的地方而不被发觉。因此，在阿拉伯堡遭到强攻时，解决问题的与其说是这个堡垒的守军，不如说是由锡利斯特里亚出击的部队。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次围攻本身的情况。

自4月底以来，俄军不时从多瑙河对岸炮击锡利斯特里亚。5月，他们开始在城市对面的大沙洲上，在通向卡拉腊什的堤坝附近挖掘正规的接近壕，到5月10日把炮队沿河岸配置完毕。11日，对城市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并对北堡进行了平射。5月12日，进行了同样的射击，当时刚刚到达的孟加拉炮兵中尉奈斯密斯观察了炮击的情况，写了一篇报道，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射击的主要目标是东北部的奇申格尔棱堡，土军从这里进行了特别猛烈和非常准确的还击。与此相反，俄军的射击却显得很不认真，在城市中发现的大量榴弹，在发射前竟连信管上的帽盖都没有取

下，所以既不能燃烧，也不能爆炸。这样的疏忽，虽然在战局开始时期在野战条件下进行快速射击时是常见的，但是在射击速度总是较慢的攻城炮击中却是闻所未闻的。这种疏忽说明，俄军是多么急于用光他们的弹药。此外，在夜间，俄军还在锡利斯特里亚以东希布拉克沙洲上安置了一个炮队（1829年，他们在这个地点有两个炮队）。这个炮队的4门炮大概是用来对整个北部正面进行纵射的。

自5月13日到16日，显然没有任何重大的行动，至少在报道中完全没有提到。很可能俄国将军们发现炮击达不到夺取土耳其要塞的目的（这是他们完全可以预料到的），便准备在右岸进行攻击。因此，5月16日在锡利斯特里亚以东架了一座桥，2万人由桥上过了河，据说很快又有从多布鲁甲调来的2万人和他们会合。俄军为了把兵力集中在锡利斯特里亚和土尔图凯的方向上而进行了总的调动，因为一旦决定在右岸进行攻击，便需要兵力作掩护，以防备驻在苏姆拉的奥美尔–帕沙和可能在瓦尔那登陆的英法军队的袭击。

5月19日，对阿拉伯堡进行了首次侦察；大批部队集中在火炮射程以外不远的地区，散兵线开始向前推进。穆萨–帕沙在短时间的炮击后向台地派出了一队巴希布祖克[153]，击退了这些散兵。5月20日，俄军重新出动，这次出动作为单纯的侦察，未免声势过大，而作为真正的攻击，又嫌不够有力。21日，对阿拉伯堡进行了第一次攻击，详细情形虽不知道，但俄军受到很大损失后被击退了。逃到土军方面的两个俄国军官报告说：敌军兵力达9万人，由3个军编成（这同实际符合，就是第三、四、五军），由康斯坦丁大公指挥。最后这一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康斯坦丁正在指挥在芬兰的海陆军和海岸防御。关于次日再度进行

攻击的消息，没有被事实证实。俄军已作好战斗准备，但是没有向堡垒接近。以后，我们又没有得到至5月26日止的战况的消息。5月27日拂晓，俄军以极大的兵力重新进攻阿拉伯堡。三次发起猛攻，但三次都是攻击者受到很大的损失而被击退。土军的报告称，俄军1500人被击毙，3000人受伤，这可能有些夸大，但还不是十分不可信的。以后帕斯凯维奇决定按照苏沃洛夫的，à la〔方法〕夺取堡垒，他在第二天早晨再度使纵队作好攻击准备。看来伤亡惨重，谢耳万将军阵亡，伯爵小奥尔洛夫上校眼部中弹而死，另一个上校身负重伤。俄军自己承认死186人，伤379人，但这个数字很可能还不到实际损失的三分之一；从他们投入攻击的兵力来看，他们可能遭到的最小伤亡是2000人。

当天夜间土军进行大规模的出击，突然袭击了俄军的防地，驱逐了他们，并使他俩受到很大的损失（据报告，为1500—1800人）。由于这一次出击成功，以及由于俄军在最后一次猛攻中尽管出动骑兵来督促部队前进并阻止他们退却，仍然没有能够使他们同敌人进行格斗，帕斯凯维奇公爵不得不放弃以白刃冲击夺取堡垒的企图。毫无疑问，这个多面堡的防御不仅是这次战争中而且一般地说是所有俄土战争中最光辉的战绩之一。在这个地形上可以用极大的兵力进行攻击，而俄国人也不是那种肯错过机会而不把他们所能使用的兵力都投入强攻的人。因此，俄军方面在数量上一定占有极大的优势，要击退他们，土军不仅要有很大的勇敢精神，而且要有计划周密、行动协调的出击。如果俄军面对的是1829年的土军，也许已经攻占了要塞，这一点大概可以不必怀疑。他们目前屡次的失败说明，土军，至少一部分土军，既在战术上和军事科学上取得了成就，又没有丧失自己的勇敢精神。就这方面

来说，阿拉伯堡的防守和切塔特会战是整个战局中最出色的事件。

至于俄军的攻击，没有什么优点可谈。看来，帕斯凯维奇十分急于夺取锡利斯特里亚，以致他甚至没有时间采取为达到这个目的所绝对必需的一些措施。他的犹豫不决是大家一眼就可看出的。首先，他试行炮击，虽然他应当知道，这样做对这个土耳其城市是多么无济于事。炮击只能使俄军耗费大量弹药，而且只能在靠河这一面的围墙上打开缺口，而那里距宽 1000 码的多瑙河天堑很近，根本别想进行强攻。此后，俄军便攻击陆上防线，但是看来既没有压制住阿拉伯堡的火炮，也没有作过一次真正的努力去破坏这个堡垒的工事。在苏沃洛夫的后继者看来，所有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正如这位大俄罗斯将军所说的："枪弹是笨蛋，刺刀是好汉"，如果这话对于能穿透阿尔卑斯山（也是这位英勇的军事权威说的）的俄国刺刀来说是正确的，那末对于老是有无法克服的射击偏差的俄国枪弹来说毫无疑问就更正确了。因此，虽然规定强攻，进行强攻，反复强攻，但总是徒劳无功。结果是，规模不大但构造坚固的土耳其堡垒的土质胸墙，比苏沃洛夫所刺穿的阿尔卑斯山的花岗石还要结实，土耳其的炮弹和枪弹并不像俄国的炮弹和枪弹那样是笨蛋。结果，帕斯凯维奇将不得不回到老规矩上来：在未压制住要塞的火炮和破坏要塞的防御工事以前，决不能强攻要塞。因此，大约在 5 月 30 日或者 31 日便开始正规围攻，而帕斯凯维奇最后还是依靠"枪弹笨蛋"了。

但是不然！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1829 年的名将施尔德尔将军出场了，他发誓要用他那个地道爆破的老办法来粉碎这个要塞，并且要在几天内完成。用地道爆破对付野战筑城，这是陷入绝境的敌人在军事上彻底失望和暴怒的表现。如果必须使用地道爆破，保

证成功的第一个条件是通过**斜堤**。但在通过斜堤以前，应当压制对方的火炮，而这就是说要开掘一条、两条或三条平行壕并配置相应的炮队。实际上，地道爆破是围攻的最后阶段，而不是它的开始。如果施尔德尔不打算在约二十平方英里的地区开凿地道或者在多瑙河下面挖掘隧道，他就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正规围攻。和苏沃洛夫的说法相反，枪弹是必需的。

对阿拉伯堡的正规围攻无疑地会在几天内结束，因为这个堡垒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而且长期的防御会过多削弱守军。但是，这意味着至少要对两个堡垒采取正规围攻，然后再对城市本身进行正规围攻。5个星期无疑是俄军在草率围攻的情形下能够完成上述行动的**最短**时间。要是土军的粮食和弹药充足，又不遇到任何意外的情况，在7月初以前，要塞可以说是安全的。当然，我们假定堡垒的坚固程度是中等的，而围墙也不过分陈旧。不过，既然1829年锡利斯特里亚在敌人掘壕后还支持了35天之久，那末在它有了新的改进，而且有智勇双全的指挥官、经验丰富的炮兵司令和头等的守军的情况下，在1854年至少也可以支持同样的时间。假使能够得到联军援助，我们就可以放心地说：这个战局必定使俄军完全失败，也可能更糟。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6月10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6月26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1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俄土战场的形势[154]

且不谈俄军由瓦拉几亚撤退和奥军进驻该地相巧合的有趣的事实，单是如何决定、如何进行以及最后如何撤除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这一点，就足以表明这里根据的决不是纯军事的理由，而完全是另外一些理由。从俄国公报（其中发表了截至5月28日下午为止的战况，仅在死伤人数上与土军报告不同）中可以看出，俄军行动非常仓卒，他们最早也是在事实证明已不可能用强攻夺取锡利斯特里亚的时候才竭力破坏外围工事，并且这次进攻比俄军围攻史上的任何一次进攻都更缺乏组织，更违反军事科学。关于5月28日到6月15日的军事行动只有一些极其零星的报道，因而我们无法详细地叙述事件的经过；但俄军在反复拚命地攻击时，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都负伤离队——帕斯凯维奇、施尔德尔（后来截去一条腿）、哥尔查科夫、利迭尔斯以及奥尔洛夫（眼部中弹），——这个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俄军奉命不仅要不顾一切地夺取这个要塞，而且必须在严格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任务。他们在整个这个过程中的行动，与其说像是进行现代的正规战，不如说像帖木儿－塔梅尔兰在库尔迪斯坦夺取城市时的野蛮行径。另一方面，英勇而巧妙的锡利斯特里亚保卫战，无论在盟国方面或者在奥斯曼帝国的御前会议方面都显然引起了同样的惊愕。读者们

也许记得，大约在6个星期以前，联军的指挥官们①在瓦尔那会见时曾发现巴尔干是土耳其的天然屏障；现在，许多英国报纸对法英军队未曾派遣一兵一卒增援锡利斯特里亚的这个事实不仅承认，而且大加吹嘘。最后，决不能否认：锡利斯特里亚是军事上极其重要的地点，这个要塞的命运决定整个战局的命运，俄军在放弃围攻而突然向塞勒特河退却后，已经丧失了他们在今年和去年所夺取的全部领土。

不过仍然要指出，许多英国报纸过分夸大了俄国人这次失利的程度。当然只有最容易受骗的人才会相信6月13日锡利斯特里亚守军的出击和据传从奥美尔－帕沙那里得到的2000名援军使俄军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并迫使9—10万人在15000人面前逃走。根据我们的判断，俄军的突然退却同他们的突然进攻一样是不可思议的，这只有用俄国和奥地利事先达成了由奥军占领瓦拉几亚的协议才能解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从"纪事晨报"驻君士坦丁堡记者6月10日（即奥土条约缔结前4天）揭露这个阴谋的通讯中发现的下面一段话就特别值得注意：

"土耳其人认为，外交活动正在玩弄他们，企图把锡利斯特里亚让给俄军。这个猜疑为这里收到的消息证实，消息说在**维也纳正在准备新的议定书**，其中似乎已把锡利斯特里亚的陷落看做**既成事实**；**现在当俄国的军事野心得到满足的时候**，奥地利便认为进行由它参与解决问题的军事干涉的时机已轻到来，认为**占领俄军将要撤出的多瑙河各公国**的时机已经到来。"

因此，如果俄军及时攻占锡利斯特里亚，那就一切顺利。而现在，虽然俄军没有能够满足沙皇的军事野心，但由于同奥地利

① 即圣阿尔诺和腊格伦，见本卷第276页。——编者注

有约在先，也只好相当不光彩地撤退。在俄军退过塞勒特河的同时，奥军就向塞勒特河和多瑙河前进，这样，他们就处于俄国人同土耳其人及其同盟者的中间。奥地利人处在这个地位，成了争端的调停人，他们不让任何一方前进。俄军留在莫尔达维亚，然而维也纳会议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忙于拟制议定书，这样，俄军就可以赢得冬季时间。如果会议一无所成（无疑，结果必然如此，因为俄皇新从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公司得到一笔3700万美元的贷款）①，俄军在多瑙河和塞勒特河以北的地位也将比它原先在布加勒斯特和居斯坦杰之间的战线巩固一倍。把在锡利斯特里亚前面、在保加利亚境内的俄军兵力（他们目前正向塞勒特河以北撤退）同在巧妙部署的情况下一般可以起作用的联军兵力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联军即使作最好的打算，也不可能破坏奥俄的联合。

在欧洲的黑海沿岸同土军和联军作战的俄军兵力由13个步兵师组成：第三军的3个师、第四军的3个师、第五军的1个师、第六军的3个师和3个预备师。此外，在这个地区还有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轻骑兵师以及第三、第四和第五炮兵师。这些兵力几乎达到主要的作战军队的一半，据官方统计，其中每一步兵师有16000人，每一骑兵师有5000人，每一炮兵师有160门火炮；全部约25—26万人，包括辎重队和兵营勤务人员在内。但是，如果我们根据俄国军队在匈牙利战争[155]时的实际情形来判定它的人数，那就应当认为俄军一个步兵师不会超过13000—14000人，并且骑兵和炮兵的人数也要相应减少。因此，俄军先后开入多瑙河各公国的部队实际上应当减少到21万人左右，并且其中至少还要

① 见本卷第324页。——编者注

除去战斗减员和因病死亡的20000—25000人。如果我们回忆一下1828—1829年疟疾在俄军中造成的大量减员，并拿俄国外科医生在“维也纳医学周刊”[156]上发表的通讯来比较，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认定：俄军的损失达到总人数的8—10%。这样一来，俄军只可能有18万人左右了。

弄清俄军有多少兵力可用于对锡利斯特里亚作战，这是很有意思的。战线后方的交通线和仓库需要大量部队保护，布加勒斯特和多布鲁甲战线必须占领。部队的两翼和一部分正面需要一部分兵力掩护。如果我们除去为完成这种种任务所需的6万人，那末用来围攻锡利斯特里亚并掩护这一行动的兵力还有13万人。而且这只能是过高的估计，而不是过低的估计。但是由于锡利斯特里亚位于大河附近，围攻的部队就不可避免地要分成几路，以便从四面包围要塞。其次，必须在北岸配置强大的预备队，以便在失利时支援从南岸退回来的部队。最后，占领南岸（即右岸）的部队也要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负责围攻和抗击被围者的出击，另一部分则负责掩护围攻部队并击溃可能派来援救要塞的敌军。这样，为了占领右岸和在左岸进行围攻①大约需要35000—40000人。因此，俄军可用来同解围的敌军进行积极的野战的兵力为8万人，这就是俄军在保加利亚境内锡利斯特里亚周围10—20英里半径内的最大兵力。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联军有多少兵力可以同目前的18万俄军相对抗。关于苏姆拉的土军，不久前的报道说，他们约有八万人，但是他们缺乏在平地作战所需的一切条件，据腊格伦勋爵和法军

---

① “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原文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年）德文版第10卷更正为“占领左岸和在右岸进行围攻”。——编者注

参谋人员最近的报告说，军官的素质很差，而且总的说，土军的现状严重地影响了进攻行动。我们不想核对，同时现在也不可能核对这些报道是否正确。但只要说这是联军对土耳其主力军队的状况的官方意见就够了。从那时起，土军便由卡拉法特派往鲁舒克，据说那里设了一个可容 4 万人的兵营。这种把整整一个军搁置不用的策略是很难理解的，而这个军如果不派往鲁舒克而派往布加勒斯特，就能够迫使俄军立即撤除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但是战争的指导权是完全操在外交家手中的。如果除去鲁舒克目前的守军以及苏姆拉的守军和预备队，那末土军能否提供装备齐全的 5 万人在平地上解决他们当前的任务是很值得怀疑的。如果按西方军事权威的估计，一个英国兵或法国兵至少可以抵得上两个俄国兵，那末联军仍然要有 65000 人的一支军队，才能够同俄国占领军势均力敌。因此，联军在瓦尔那集中起这样的兵力以前，如没有极端需要，未必会转入积极的行动。

其实，联军是非常谨慎的，他们没有一下子出动这样大的兵力，以免失掉逃避往后积极行动的借口。除目前正在开往土耳其的 15000—20000 人（包括了几乎所有的炮兵和骑兵）以外，目前在土耳其的英法军队，一共不过 8 万人。不管是否有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运输船只的数量非常有限，因而如果部队必须单由海道向瓦尔那运送，那就需要多次往返航行。但是，根据最近的最正确的消息，——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位记者这样说，——到目前为止仅有 12000 名英法兵士由海道运送，而法军主力则由加利波利向君士坦丁堡和阿德里安堡缓慢地前进。因为道路非常不好而且军队的粮食供应非常困难，所有这些便成了使法军的声名狼籍的圣阿尔诺将军一直留在瓦尔那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待命开

拔”的情况。我们可以确信他决不会错过利用御前会议内任何阴谋的机会，以便攫取巨款中饱他那无底的私囊。关于英军两个师仍然留在斯库塔里的消息，我们也是由上述记者那里得到的，他说：“他们看来还没有准备好出发，虽然整个运输船队停泊着等待装载。”

根据这一切事实，每个人都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盟国非常担心的是怎样才不致破坏俄奥之间目前的协议。如果盟国想要破坏这一协议，只要作一个简单的选择就能达到目的，那就是或者在波罗的海结成英瑞（瑞典）同盟，给辅助部队建立作战基地，便于他们进入芬兰和从陆上迂回斯维阿波尔格和喀琅施塔得两个要塞；或者对克里木和塞瓦斯托波尔进行海陆联合攻击。至于第一个可能性，我们很有趣地看到：伦敦“泰晤士报”在不到三星期以前还坚持认为必须把黑海分舰队派到波罗的海，现在却主张只封锁波罗的海各港湾而立刻把大部分波罗的海舰队召回黑海，突然变成了占领克里木的积极拥护者。也正是这家报纸，对纳皮尔在法国舰队同他会合之前不可能有所作为曾经装腔作势地表示惋惜。现在，当这个会合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却又认为结局**将是一事无成**，认为英法舰队最好还是再作一次经过卡特加特海峡、拉芒什海峡和直布罗陀海峡到黑海的航行。如果注意一下这两个舰队的会合已经花了多少时间，而另一方面为了把它们置于海军上将邓达斯的统一指挥之下又将需要多少时间，那就可以完全明了，这些建议的主要目的是要在波罗的海或者在黑海什么也做不成。

俄军如果不算在锡利斯特里亚出乎意外的失败，那末他们遭受重大损失和充满危险的唯一地点便是高加索，虽然关于这点还没有十分可靠的消息。他们放弃了黑海东岸的几乎所有的要塞，但这不是由于害怕联军舰队，而是为了加强他们在格鲁吉亚的兵力。

据说，俄军通过达尔雅尔峡谷撤退时，前卫和后卫突然遭到大批山地居民的攻击，而且前卫被消灭了，本队和后卫受到很大的损失而被迫退却。同时，塞里姆—帕沙的军队也由圣尼古拉堡垒推进到奥苏尔盖特，并迫使俄军撤出该要塞，在这以前，俄军是常常从那里扰乱并威胁土军的；这个胜利保障了塞里姆—帕沙同在卡尔斯的土军主力之间的交通线。如果回忆一下甚至这支部队在冬春两季都非常可怜地毫无作为，那末俄军的机动至少证明，他们感到自己在格鲁吉亚的地位已不稳固，迫切需要从沿海地区调兵增援。如果在达尔雅尔战败的消息全部地，或者哪怕是部分地得到证实，那末就应该得出结论：沃龙佐夫军队的退路已被切断，他们必须设法在梯弗里斯建立巩固的基地以便坚守到今年冬季（而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不然就得考虑不惜任何代价冲过这个峡谷。无论如何，采取这一行动也比向里海退却好，因为通往里海的峡谷比达尔雅尔峡谷不知要危险多少倍。但是关于这类问题，只有从这些地方得到更全面和更可靠的消息以后，我们才能够比较确切地加以评述。暂时我们只能够说：俄国由于最近的几次行动，不可否认地得到了两次胜利，一次是霍普公司的贷款，另外一次是奥地利同土耳其的条约；同时它也遭到了一次失败，即在锡利斯特里亚的失败。至于这些胜利能否造成永久的优势以补偿失败的耻辱，那要在将来才能见分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年6月14—16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7月8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2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俄 军 的 撤 退

俄军退出土耳其，比我们预料的要彻底得多，而且比目前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从军事观点来看所必需的那种撤退还彻底。看来，沙皇对奥地利皇帝承担的义务以及他给俄国将军们发布的命令，都是要求俄军全部撤出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使土耳其领土上不留俄国的一兵一卒，而强大的奥军则应当立即代替俄军，把不久前还彼此厮杀的两国军队隔开。但是，如果以为俄军的撤退是由于他们在锡利斯特里亚的失败造成的，或者对英国报纸的吹嘘信以为真，那就错了。这些英国报纸把这次失败描绘成复灭，并且一心要世界相信，从要塞出击的 15000 人或者至多 17000 人能够把 10 万名或者至少 9 万名敌兵打跑。毫无疑问，俄军一次又一次地被坚决击退并遭受重大损失，这正是他们轻率的、考虑不周的和违反军事科学的混乱的攻击——不论这些攻击进行得多么勇敢——所应得的结果；土军作战异常英勇果敢，表现出高度的军事学术水平，因而使这次反围攻永垂史册；但是我们仍然没有理由相信，正是他们才迫使敌人撤围。事实上，据最可靠的消息说，在守军最后一次出击后，俄军仍继续坚守左岸的炮台，并利用它们向要塞射击，但是某些电讯过急地报道说，这些炮台在那次出击中似乎已被守军攻占。事实的真相显然是，最后从锡利斯特里

亚撤退，只不过是因为沙皇同奥地利曾约定俄军在一定期限内撤出多瑙河各公国。他曾命令俄军先要攻占锡利斯特里亚，以便在离开土耳其的时候能够取得哪怕一次胜利来提高自己的威望；可是军队没有完成这个命令，于是他们只好蒙受失败的耻辱而撤退了。但是，这次撤退并不是在敌人跟踪追击下的溃退。俄军没有攻占锡利斯特里亚，也许甚至采用正规的围攻也攻占不了它；可能，他们在这一战局中什么也得不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得退到塞勒特河；不过，他们仍然比联军（土军和其他军队）强大，至少在防御方面要强得多。此外，他们还不曾同联军交过锋，还没有进行过一次决战。因此无可争辩，俄军向普鲁特河撤退是由于外交上的考虑，而不是由于奥美尔－帕沙和他在土耳其的同盟者的优势兵力或更巧妙的战略所产生的军事上的需要。

但是，如果说俄军慑于武力而被迫从锡利斯特里亚撤围的这种假设是错误的，那末，看不到目前整个战局对俄军不利而奥地利的干涉才是俄军改善处境的最好办法，同样是错误的。这里我们不是指俄军在沃耳特尼察、切塔特、卡腊卡耳或锡利斯特里亚的一连串失败，——这些都只是较小的战斗（在这些战斗中土军给俄军以打击，而俄军则从未能给予土军以同样成功的打击）。所有这些冲突加在一起也没有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可是，在亚洲俄军一直在挨打，他们在那里现在已经有彻底失败的危险。俄军在黑海沿岸的许多要塞现在只剩下两座；而在国内，沙米尔和他的山地居民不仅在附近的山地和谷地上肃清了所仇恨的俄国人，而且还切断了沃龙佐夫伯爵同俄国的联系，并在南面同土军一起行动，向梯弗里斯进发，其兵力之大可能迫使伯爵投降和交出俄国所有那些得来如此不易、而守卫又如此艰难的外高加索领地。对

沙皇来说，丧失这些以大量鲜血和金钱换得的省份，比起在土耳其决战的失败来，也许是更大的耻辱，同时，没有疑问，只要他的军队回转来渡过普鲁特河，他立即会派出所有不用于防守克里木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部队去收复高加索的各山口并支援沃龙佐夫。沙米尔的胜利大概有力地促使俄国接受了奥地利提出的关于从多瑙河各公国撤退的要求。

在这件使战争的前景发生这样变化并且更加复杂的重大交易中，奥地利占有极重要的和有利的地位。这是它在外交上的一大胜利，也是它的军事力量使交战双方敬畏的证明。它作为交战双方的朋友进行干涉。俄军乖乖地退走，给它让出了地方；而土耳其政府完全按照法国和英国的主意，在允许奥地利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的条约上签字。总之，这是一个得到交战双方同意而进行干涉的武装的调停人，因为每一方都认为这种干涉对自己有好处。西方强国公开宣称，奥地利是为了它们的利益行事的；而俄国根据圣彼得堡和维也纳之间的协议（事实证明，早在全世界知道奥地利从中干涉以前，在帕斯凯维奇的军队在锡利斯特里亚遭到回击以前，就已达成协议了），无疑也认为奥地利是为了它的利益行事的。究竟是谁受骗呢？奥地利打算出卖哪一方呢？

当然，奥地利和任何其他强国一样，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它的利益要求俄国不占领多瑙河各公国，不控制多瑙河口和黑海，因为奥地利在这方面进行着大宗的、日益增多的贸易。此外，俄国并吞土耳其全部或一部分土地，都会在奥地利帝国内的斯拉夫人中间引起骚动，因为在他们中间已经有很多人拥护泛斯拉夫主义，主张同俄国结成同盟。因此很明显，要奥地利同意俄国并吞土耳其，只有使它有可能同时向另外某个方向扩张霸权

和扩充版图，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奥地利的政策是完全同情沙皇而反对法国和英国的；它真正的方针将始终是同西方强国为敌。俄国在它发动的这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中罪有应得地蒙受了耻辱，这在维也纳是不会感到难过的；然而奥地利永远不会听任俄国受到严重的削弱，因为这会使哈布斯堡王朝失去唯一能帮助它跳出最近的革命漩涡的朋友。我们认为，这些就是支配着维也纳内阁在战争今后各个阶段中的行动的全部动机。奥地利将出卖交战的任何一方，或者一下子把双方都出卖，这完全决定于它的利益和王朝的利益的需要，——如此而已，再无其他。

俄军撤退和放弃占领，并把退出的地区转交给奥地利这一事实，使奥地利承担了在今后维护俄国以防止任何不愉快事件的义务。即使奥地利与盟国保持名义上的友谊，这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盟国今后对沙皇的一切行动都遭到失败。可以相信，它将为此去做除真正宣战以外的任何事情，——宣战这一手段它无论如何是不会下决心采用的。因此，它必然要执行出卖西方强国的政策。在允许奥地利军队占领土耳其地区的条约中，西方强国是受骗的一方，在战争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它们总有一天会相信这一点。

看来，战争进一步的发展不在英国首相阿伯丁勋爵的计划之内，他极力主张按照奥地利的愿望，在恢复 status quo〔状态〕，可能还把多瑙河各公国的保护权由俄国移交给哈布斯堡王朝的基础上来解决冲突。然而现在可以认为，由于阿伯丁勋爵在他那次臭名远扬的发言中所作的自我揭露以及接着的议会辩论（辩论详情我们在今天本报上另有报道[①]），这些计划已经破产了。被这些揭

---

① 见本卷第315—323页。——编者注

露出来的事实所激动的不列颠人民，在没有得到比简单地恢复原状更重要的某种赔偿来抵补他们因战争而支出的巨额费用以前，是不会同意缔结和约的，至少在目前是不会同意的。他们认为必须粉碎俄国，使它不能很快地重新破坏全世界的安宁；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建立某种例如攻占喀琅施塔得或塞瓦斯托波尔那样的赫赫战功。不得到这种因参战而荣获的重大奖赏，他们是不会同意缔结和约的。英国人民的这种情绪大概会引起内阁的立刻更换，并使战争继续下去。可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如果战争继续进行，俄国将不断受到比它过去所受的更加沉重的打击，——除非土耳其人和切尔克斯人在没有西方任何援助的情况下能夺取俄国的外高加索各省。从那些在阿伯丁勋爵辞职后可能在伦敦掌权的人物来看，从他们在战争爆发后直到今天的作为来看，完全可以预料，他们有朝一日将在阿伯丁勋爵现在所主张的、也因此失掉职位的同一基础上缔结和约。到目前为止，奥地利的外交是成功的；很可能最后的胜利也属于它。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年6月19—23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7月10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2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战争。——议会辩论

1854年6月27日星期二于伦敦

布加勒斯特的俄国 moniteur〔正式通报〕正式宣布，遵照圣彼得堡的命令，锡利斯特里亚已经撤围，茹尔日沃已经撤军，全部俄军正准备调回普鲁特河左岸。“泰晤士报”昨天在第二次增刊中发表了该报驻维也纳记者拍回的类似的电讯：

“俄国皇帝出于对奥地利这个老盟国的深深的尊敬，满足了它的要求，已下令将自己的军队调回普鲁特河左岸。”

约翰·罗素勋爵昨天在下院晚间会议上证实了锡利斯特里亚已经撤围的消息，但是他还没有收到俄国答复奥地利要求的正式通知。

由于奥地利的干涉，土军和俄军之间将树起一道壁障，这道壁障将保证俄军撤退，并使他们有可能加强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里木的守军，甚至重新同沃龙佐夫的军队取得联系。此外，当盟国拒绝简单地恢复 status quo ante bellum〔战前状态〕（这种简单的恢复最多不过使沙皇作一些有利于奥地利的微小让步）的时候，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神圣同盟的恢复将可以说是一个既成事实。

这个堂皇的“决定”据说是梅特涅的杰作。但是现在，由于老阿伯丁的饶舌和帕麦斯顿的阴谋，这个决定的全部妙策就被破坏了。

这里应当提醒一下，在最近一次内阁改组中，一切企图任命帕麦斯顿勋爵主持陆军部——帕麦斯顿的报刊最急切地要求成立这个部——的努力都落空了，皮尔分子，纽卡斯尔公爵把自己眼下这个为高贵的勋爵垂涎的位子抓到了。显然，这次失败提醒了帕麦斯顿勋爵：早就该解散整个内阁了。因此，他选中阿伯丁勋爵发表的反驳林德赫斯特勋爵的考虑欠周的发言[157]作为借口，掀起了目前这场反对内阁首脑的风暴。所有英国报刊都立刻抓住了这次发言，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先驱晨报"还在这次发言之前就已公开指出有一个反对阿伯丁勋爵的阴谋。累亚德先生于上星期五在下院发了言，宣布他将在下星期四提出下述意见：

"女王的首席大臣所使用的言词蓄意要引起舆论对战争的任务和目的的重大怀疑，并减少缔结光荣而长期的和约的机会。"

这个意见有两个弱点：第一，它违反宪法，也就很容易被驳倒，因为它违背了关于禁止下院议员批评上院中的发言的议会规则，第二，它仿佛要把首相对于某一个别事物所发表的言论同联合内阁的全部活动分割开来。然而，这个意见使阿伯丁勋爵感到如此震惊，以致在它被宣布后两小时，他就要求发言，并以异常激动的口气声明，

"下星期一〈也就是说比累亚德先生早三天〉他将向议院提交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签订后他致俄国的急件的副本，并利用这个机会来稍微说明一下不久前他在上院关于战争问题的发言所受到的曲解"。

大家对累亚德先生的意见会使阿伯丁勋爵离开内阁这一点如此深信不疑，以致"晨报"——举个例说——都已经公布了将接替他的内阁的名单，由罗素勋爵任内阁首相，帕麦斯顿勋爵任陆军大臣。不难想像，昨天晚间上院的会议吸引了非常多的爱看热闹的兴

致勃勃的贵族**阴谋家**，他们都希望看到阿伯丁勋爵如何摆脱他的困难而又微妙的处境。

在概述阿伯丁勋爵的发言和克兰里卡德侯爵对他的攻击之前，我应当先追述一下两位发言人主要涉及的时期和情况；这就是1829年阿伯丁勋爵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时期。当时，俄国舰队在海军上将葛伊甸的指挥下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萨罗斯湾和埃内兹湾以及阿德腊米提和士麦那等港口，从而违背了1815年圣彼得堡内阁和伦敦内阁之间签订的协定——按照这个协定，俄国不得在地中海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这种封锁威胁到了英国在列万特的贸易，使当时英国的通常是蒙眬欲睡的舆论激动起来了，并引起了对俄国和对内阁的抗议怒潮。结果俄国大使利文公爵和马土舍维奇伯爵同威灵顿和阿伯丁举行了会谈。关于这次谈判的性质，利文公爵在1829年6月1日(13日)从伦敦发出的紧急报告中说道：

"大约一小时后〈在同威灵顿公爵进行了不能使这位俄国外交官完全满意的谈话以后〉同阿伯丁勋爵进行的谈话同样是值得注意的。他还不完全了解我同首相的谈话，但在获悉谈话的详细内容之后，他就极力设法**冲淡**他在谈话开始时可能使人留下的不愉快的印象。他再三保证说，**英国从来不打算借故同俄国争吵**；如果英国内阁力图影响我们，要我们放弃对埃内兹湾的封锁，那末它之所以这样做只是想防止有人提出令人厌烦的要求以及巩固两个内阁之间的良好关系；**我们有或许比我们自己设想的还要多的理由来庆幸我们从**英国的**这种成功而经常的协助中得到好处**。他认为他的功劳是，为了保持这种协调一致，他可以容忍封锁埃内兹湾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暂时利益；但是他担心，圣彼得堡没有很好了解英国内阁的立场。阿伯丁有时提出的那些反对意见，例如，在不久前发生的事件上提出的反对意见，都被归咎于他心怀叵测和敌意，而事实上这类居心和 arrière— pensées〔暗计〕同他的情绪和政策都大相径庭。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处境是极其微妙的。英国舆论随时准备对俄国进行敌意的攻击，**不列颠政府对此就不能经常置之不顾**，而且在同民

族偏见密切相关的问题上〈指海上权利〉向舆论挑战是危险的。但是俄国仍然能够指望得到**正在反对它们**〈指民族偏见〉**的英国内阁的**好感和友情。

对于这一点我反驳道：‘我知道舆论在英国的意义，我也观察了它在几天之中的变化。在这次战争中舆论反对我们，因为它认为我们是侵略者，虽然我们遭到了侵犯；它指责我们企图推翻奥斯曼帝国，然而我们**声明**，这并未列入我们的计划；最后，它硬说我们奉行**我们自己所反对的**那种好大喜功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使舆论了解真相**是纠正舆论的最可靠的办法。’

阿伯丁勋爵回答我道，事情并不完全像我所说的那样；舆论反对俄国是因为在英国舆论通常都是热烈地支持辉格党人，au reste〔**然而**〕，**不列颠内阁绝不希望我们失败**；相反地，**它希望我们迅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因为它知道，这是结束战争的唯一办法，这场战争只能看做是一个极大的不幸，因为它的后果无法预料！在结束谈话时，英国大臣发表了长篇议论以证明我们把他不可能有的意图强加于他了，最后他声明说，伦敦内阁希望，战争的结束能够**使俄国得到光荣和利益**。”[158]

令人奇怪的是，阿伯丁勋爵的敌人中谁也不认为援引这个报告是恰当的，而这个报告对于阿伯丁勋爵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签订以前那个时期的行为揭露得如此令人信服，以致这位阁下在这个条约签订**以后**所写的秘密报告的内容丝毫不值得重视了。公开上面引用的那个报告，就会一举摧毁阿伯丁勋爵在昨晚发言中用来为自己辩护的唯一论据。他的真正的辩护只能是公开地反过来责备帕麦斯顿勋爵，因为参加这次“打架”的只是俄国的这两个彼此勾心斗角的老仆役。

阿伯丁勋爵在开始时声明，他既没有什么要收回的，也没有什么要驳斥的，他只是想作一点“解释”。有人错怪了他，以为他要邀草拟阿德里安堡条约之功。他根本没有草拟这个条约，而是反对这个条约，上院从他现在建议宣读的这个报告中可以深信这一点。这个条约使他和他的同僚感到的惊恐如此之大，以致单单这个条约

的存在就使政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改变了它的全部政策。政策的这个改变表现在哪里呢?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签订以前,无论是他,阿伯丁勋爵,或者是威灵顿公爵(在当时情况下他们都遵循坎宁的政策)绝没有想到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希腊王国,而只是想建立一个诸如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之类的在土耳其政府保护下的藩属。阿德里安堡条约签订之后,土耳其帝国的局势在他们看来是如此危急,土耳其帝国的存在是如此不稳,以致他们建议把希腊从一个藩属变成一个独立王国。换句话说,既然阿德里安堡条约大大促使土耳其衰落,那就决定**夺走**土耳其的若干省份来抵销这个条约的危险后果。"改变"就在这里。

尽管他们对这个条约可能引起的后果的担心被夸大了,但是,阿伯丁勋爵毕竟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个条约是极端有害的。他当时曾说过,"俄国并没有由于这个条约而获得广大的领土"。而且现在他还相信,俄罗斯帝国最近50年来并没有像林德赫斯特勋爵所断言的那样大大扩展欧洲的版图。(按照高贵的勋爵的意见,贝萨拉比亚、芬兰和波兰王国都不算是大大扩展的结果)但是,正如他在1829年12月的紧急报告中所说的,如果说俄国扩展的领土不大,然而它毕竟有巨大意义:其一是让俄国"单独控制了多瑙河的航行,其二是让俄国控制了亚洲的一些港口。诚然,这些港口不大,但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俄国人在高加索获得的大片领土这件事又从阿伯丁勋爵的记忆中消失了。)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断言阿德里安堡条约是俄国政策改变的开始,而自从条约签订以来,俄国与其说力图获得新的领土,不如说力图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政策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意图的改变。"撒旦只是变得比过去更聪明了"。俄国曾同查理十世商量妥了一个通过一系列条约而不通过引起惊恐

的占领来吞并土耳其的计划，这一事实竟被一字不提地回避了。阿伯丁勋爵也认为不宜提到：俄国甚至还在阿德里安堡条约和安吉阿尔— 斯凯莱西条约（他把后一个条约算作俄国政策改变的证据）签订以前，早在1827年就向法国和英国承担了义务，即不打算利用对土战争来攫取新领土；而且俄国没有英国的许可，就不可能在1833年向君士坦丁堡进军。

往下，阿伯丁勋爵断定，他所说的"如果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签订后，我们能够获得哪怕只有25年的和平，那就不坏了"这句话，被人曲解成好像他准备回到类似阿德里安堡条约这样的条约去，其实他只想说，

> "如果由于某项因战争而签订的条约得以保证25年和平，那末，从人类事务变幻莫测来看，这样就不坏了。**他完全不是建议恢复** status quo〔状态〕，但也不反对它。在宣战以前，除了status quo外他们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期待和希望；他们不曾希望获得更多的东西，土耳其政府也同意这一点，而这比他们有权期待的东西要多得多。但是，一经宣战，整个问题的提法就改变了，一切都将取决于战争……　谁也不能说将会离开status quo多远，因为这取决于谁也无力操纵其进程的那些事件。但有一点他能够说：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完整应当得到保证，得到确实的保证"。

应当如何保证呢，这一点他阿伯丁勋爵，就不可能说了，因为这仍然要取决于战争进程。人家这样来看他，似乎他不相信俄国进攻的威胁，或者说他怀疑这种进攻的现实性；实际上他非常担心俄国对土耳其的进攻，虽然，他对俄国进攻欧洲这一点并没有感到很大的不安，而且，"这种不安还在逐日平静下来"。他认为法国比俄奥两国加起来还强大。然后高贵的勋爵抱怨"他所遭到的极端荒谬和恶毒的人身攻击"。事实上在国内除他外再没有别的和平拥护者了，然而恰好就是他的热爱和平使他特别适宜于以最大的精力进

行一场战争。

“他的同僚不否认，他个人或许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要求迅速前进，并把联军的兵力集中在巴尔干半岛上，以便支持奥美尔－帕沙的英勇的军队，并向奥地利伸出手，使它有可能更积极地参与军事行动。”

这就是阿伯丁始终不渝地坚持的行动路线。他在回答波门特勋爵的质问时说，“虽然他过去也是梅特涅公爵的挚友，但是自从他执政以来，即最近18个月中，他和公爵既没有直接联系也没有间接联系；只是在前几天他的一位女友通知他说，她打算写信给梅特涅，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转告公爵；阿伯丁回答说：‘请向他转达我衷心的问候。’”。

阿伯丁的发言在议院中大体上顺利通过了，但有趣的是：对于克兰里卡德侯爵（绝望的外交大臣职位的追求者、前帕麦斯顿勋爵驻圣彼得堡大使）给他的挖苦的回答，内阁阁员中竟没有一个人进行任何反驳，而且没有一个人发言证实阿伯丁是第一个极力主张进行战争的人。

克兰里卡德侯爵特别详细地谈到了阿伯丁参加草拟阿德里安堡条约这件事，谈到了对他以往政治活动的总的评价以及他在目前执政过程中所犯的过失。他说，阿伯丁勋爵在几个月前拒绝把急件通知两院的其他议员而现在却为了一己私利，纯粹出于个人的动机将它公开出去。但是这个急件的内容同高贵的勋爵在1829年9月阿德里安堡条约签订之后，于同年12月写给圣彼得堡的内容完全不同。问题的实质在于，当时他给英国大使发出的是些什么指令，他为了**阻止**这一条约的签订又采取了哪些步骤。当时统率阿德里安堡俄军的将军部下最多不过有15000名兵士，而且从这个数目中还需减去因病或因伤而根本hors de combat〔丧失战斗力的〕

5000—6000人。另一方面，率领着25000名阿尔巴尼亚兵士的土耳其将军就驻在附近。俄国将军只给土耳其一个很短的期限来决定签订还是不签订提出的条件，因为他知道，如果给土耳其人更多的时间，他的真实情况就会被人知道。因此，他也就给土耳其人不过5天到8天的时间来考虑。在君士坦丁堡土耳其大臣邀请奥英两国大使和普鲁士公使来商讨对策并征求他们的意见。英国大使遵照阿伯丁勋爵的指令建议尽速签订这个条约，而这个条约现在都被高贵的勋爵说成是极端有害的东西。

有一个情况是高贵的侯爵不想提起的，这就是正因他的朋友、当时在野的帕麦斯顿勋爵尖锐地攻击阿伯丁勋爵，指责他过分反俄，才迫使阿伯丁下令签订条约的。

侯爵然后又责骂首相，说他一向是欧洲专制制度的最热心的、最坚定的和最有力的拥护者，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用了葡萄牙、比利时和西班牙的历史，并暗示阿伯丁曾经反对1834年著名的四国同盟[159]。的确，需要有老辉格党人的冷静沉着和恬不知耻的本领才能在这个时候吹捧比利时的“光荣”，吹捧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宪政”，吹捧欧洲因四国同盟而得到的普遍幸福，而对于四国同盟，帕麦斯顿在自己的辩护词中曾不顾真相地说这是达莱朗而不是他帕麦斯顿出的主意。

关于目前这场战争的战况，克兰里卡德说道，作战计划是由俄国最高军事当局于去年12月制定的，不列颠政府也知道这个计划，计划规定不单要占领多瑙河各公国，而且要强渡多瑙河，占领锡利斯特里亚，迂回苏姆拉并进军巴尔干。高贵的勋爵掌握了这个情报，却向议院发表了几次关于和平问题的演说，并且不认为需要把内阁在当时和2月底3月初发给陆军部的命令通知议院。

如果克兰里卡德勋爵记得帕麦斯顿勋爵在下院是怎样回答迪斯累里的，而克拉伦登勋爵在上院又是怎样回答他本人的，他也许不会使自己陷入可笑的境地：仅仅责备阿伯丁勋爵一个人这样玩忽职守，而不同样指责他的辉格党朋友，虽然整个内阁都应当受到指责。

侯爵感叹道："如果，如果政府在15个月前走上了应走的，我甚至想说是走上了光明磊落的道路，那末战争就可能根本不会发生。"

这正是迪斯累里先生向约翰·罗素勋爵所说的话。

最后，侯爵竟达到如此荒唐的地步，以致把联合内阁的一切错误，内阁在议会中在一切重大问题上所遭到的不断失败都归咎于阿伯丁勋爵个人，而且只归咎于他一个人。他竟没有记起，还在这个内阁组成的时候，头脑清醒的人就说过，内阁如果不公开一切立法问题，不放弃一切政治手腕，就连6个星期都支持不下去。

布鲁姆勋爵发表了一个愚蠢的演说，声明他对阿伯丁勋爵的第一个发言，尤其是第二个发言感到完全满意。在他演说之后问题便解决了。

整个这个事件的实质在于，在维也纳草拟的秘密议定书的意义被一笔勾销，而这意味着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继续战争，而人们却如此确信战争会很快结束，以致尽管在市场上有了大量公债，统一公债还是上涨了3%，而在军人俱乐部已有人打赌说，战争不会超过4个星期。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6月27日

载于1854年7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26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马德里的起义。——奥地利—土耳其条约。——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

1854年7月4日星期二于伦敦

早在意料之中的马德里的军队起义，终于在奥当奈尔将军和杜耳塞将军的领导下爆发了[160]。法国政府报纸急急忙忙地向我们报道说，根据它们得到的消息，西班牙政府已经克服了危局，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是，“纪事晨报”驻马德里记者详述了这次起义，并引述了起义军的宣言全文，他说，起义军撤出首都只是为了同阿耳卡拉的驻军汇合，如果马德里形势仍然不利，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开拔到萨拉哥沙。如果这次运动比不久前这个城市里的起义[161]顺利，这就会迫使法国放弃它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引起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分歧，可能还影响到西班牙和美国之间现存的纠葛。

据悉，正如我上次根据伦敦和曼彻斯特交易所发表的公告所指出的①。俄国新的公债显然还没有由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先生等最后办妥手续，这些银行家不肯给俄国国库预支任何现金。他们只同意请欧洲的各个交易所承担这项公债，自己则不承担任何义务。

① 见本卷第305页。——编者注

有消息说，这次公债能否成功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同时，据我们所知，柏林和法兰克福对它不表同情。汉堡的参议院禁止它由官方挂牌，如果相信“纪事晨报”的报道，则英国外交代表和领事已经向不列颠臣民发出通告，警告他们不得认购“旨在进行反对女王的战争”的公债。

关于俄军从锡利斯特里亚撤围后的去向，各种消息的说法不一。“通报”说俄军已撤到普鲁特河左岸，而维也纳的“新闻报”却断定，这种说法丝毫不能令人相信。看来，恰恰相反，俄军目前甚至还不打算撤出瓦拉几亚，因为利普兰迪将军占领了普洛耶什特和肯皮纳一带的阵地，并把前哨布置在罗瑟土姆山口的入口处，而主力部队据报道经过斯洛博德捷亚，沿多瑙河左岸，进驻到布来洛夫一带。另一方面，占据多布鲁甲的利迭尔斯军还没有放弃图拉真垒墙防线，即使继续撤退，该军也未必会交出曼成和伊萨克查。据说，大批联军正向莫尔达维亚开拔，看来，俄军准备在那里集结大量兵力：帕纽亭将军率领的军已经从波多利亚调到这里，补充兵员正在从贝萨拉比亚向这里开拔。在上莫尔达维亚的雅西、罗曼和博托夏尼之间，俄军兵力似乎达到了 6 万人，还有 2 万人的一个师驻在卡缅茨一带。“东德意志邮报”报道：“帕斯凯维奇声称，他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放弃多瑙河口。”俄军说，他们所以撤退只是因为多瑙河上游发生了时疫。

奥军的行动目前还完全不清楚。据传说，科罗尼尼的那个军已奉命乘船开往沃尔肯伐，以便顺河而下，取道茹尔日沃开赴布加勒斯特。奥地利政府机关报“意大利信使报”报道，这一行动的唯一目的是要占领瓦拉几亚的中立地带；同时，我们获悉，俄国拒绝了奥地利的“最后通牒”。“纪事晨报”登载的一则电讯说：

“俄皇在答复奥地利要求的复文中表示愿意同四强国谈判除苏丹的基督教臣民的特权问题以外的一切问题。关于特权问题他只想同土耳其政府直接谈判，不允许四强国干涉。他也拒绝提出关于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的任何保证。”

因此，这样拒绝的后果完全可能引起奥俄之间一场装装样子的战争。这种战争会变成一场像著名的布隆采耳战斗[162]（当这场战斗结束了1850年普奥之间的假战争的时候，各报还在惊惶地揣测这次“中欧危机”的可怕后果）那样的光荣的rencontre〔决斗〕。与其对奥地利现行政策可能产生的作用作这类假设，倒不如来看一看真正存在的6月14日的奥土条约。这个条约已经正式全文公布了。

这里需要注意到两个因素：奥土之间的关系以及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人民对土、奥或其他外国的态度；实在令人奇怪，完全受外交家们左右的欧洲舆论完全忽略了后一个因素。

条约的第一条内称：

“奥地利皇帝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外交的以及其他的手段，争取外国占领军撤出多瑙河各公国，必要时，甚至派出必要数量的军队来达到这个目的。”

这一条使奥地利皇帝有全权不用事先向俄国宣战，就可以调任何数量的军队进入瓦拉几亚。这样一来，土耳其的藩属就会随时遭到攻击而变为奥地利统治下的反对土耳其的中立领地。第二条规定，

“军队行动的指挥权仅属于帝国总司令。而后者则要注意将他所要采取的行动及时通知奥斯曼军队的总司令”。

有了这条协议，奥地利人不仅摆脱了土耳其对任何被认为适

当的军事行动的任何监督，而且还取得了对土耳其统帅部在瓦拉几亚领土上所能采取的一切行动的绝对监督权，因为他们只要通知土耳其统帅部他们打算占领某个据点，就足以阻止土军开赴到那里。如果考虑到除多布鲁甲这块不大的地方之外，多瑙河各公国是唯一可能成为土俄战争的战场，那末显而易见，奥地利的干涉既能完全阻止土耳其扩大胜利又能惩罚侵入它的领土的敌人。

第三条规定：

“奥地利皇帝必须根据与奥斯曼政府相互之间的协议，**尽可能**恢复多瑙河各公国的法定秩序——根据土耳其政府在该地区的内部管理方面所赋予的特权而产生的法定秩序。但是，**以此种方式恢复起来的地方政权**不得把自己的职权扩大到对帝国军队作某种监督。”

这样一来，奥地利皇帝只要认为可能，就有充分的自由来恢复现存秩序；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可以完全仿效俄国将军布德贝尔格那样，恢复地方政权不过为了使它们服从奥地利军事法规。

第四条规定：

“奥地利宫廷必须不同俄国宫廷缔结任何触犯苏丹主权和苏丹帝国的完整的协定。”

第五条又规定：

“一旦土耳其政府和俄国宫廷的和约签订而使本协定的目的达到，奥地利皇帝应尽可能立即采取措施，撤出他的军事力量。有关奥地利撤军的详细条件将与土耳其政府专门协商。”

在这两条的前一条中，奥地利保留了同俄国缔结协定的权利，只要协定根据维也纳照会[163]中所确定的stanus quo〔状态〕原则就行。在后一条中，奥地利答应不是在它同俄国签订协定之后，而只是在俄国同土耳其之间的条约签订后才撤出它的军队。“物质保

证”已经不再稳稳当当地操在俄国手中，它正在转到奥地利手中，而奥地利则有全权保持它——经土耳其政府的同意——直到土耳其同意“两个帝国宫廷之间的协定”为止。

第六条规定奥地利人有权甚至不需有形的偿付，而将俄国人撤走后留在多瑙河各公国的一切生活用品据为己有。这项协定的好处只有在德国才能够理解，因为德国居民已经习惯于把奥军作为一种对自己的革命罪的惩罚来接受，因为在德国从 1849 年到 1850 年，奥军曾把整片地区劫掠一空。

这个条约实质上就是把多瑙河各公国转让给奥地利并使土耳其不再对它们行使宗主权。同时，土耳其人像以前俄国人一样，对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人民的权利进行了令人发指的破坏。土耳其人就像有权把多瑙河各公国宣布为俄国行省一样，有权把它们让给奥地利占领。

土耳其政府要求对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宗主权是根据 1393 年、1460 年和 1511 年的三个条约。1393 年瓦拉几亚和土耳其之间的条约有以下几条：

“**第一条**　我们，即巴耶济德等本着对隶属于我们不可战胜的帝国的瓦拉几亚的宽厚精神，和它的执政国君共同决定，这个国家将继续根据本国的法律进行统治，瓦拉几亚国君将有充分的自由自行选择方式和时机同邻邦宣战和媾和。

第三条　国君（基督徒）由大主教和贵族选举产生。

第四条　瓦拉几亚国君有义务每年给帝国国库纳贡 500 披亚斯特。”

1460 年瓦拉几亚国君符拉德五世和穆罕默德二世签订的条约规定：

“**第一条**　苏丹同意并且保证由他本人和他的继承人保护瓦拉几亚和防

御任何敌人的进犯，为此仅要求瓦拉几亚承认苏丹对作为主权公国的瓦拉几亚具有宗主权，地方长官为此必须每年向土耳其政府纳贡1万披亚斯特。

第二条　土耳其政府不以任何方式干涉该公国的地方行政，任何一个土耳其人无重大原由，均无权进入瓦拉几亚境内。

第三条　地方长官照旧由大主教、主教和贵族选举产生，土耳其政府承认这种选举是合法的。

第四条　瓦拉几亚人民仍享有按本国法律进行管理的自由，它的地方长官享有对其臣民生杀予夺的权力以及宣战和媾和的权力，他们自己的行为不对苏丹负任何责任。”

第三个条约就是1511年的条约。莫尔达维亚在条约中承认土耳其政府的宗主权并为自己争取到比瓦拉几亚所取得的更为有利的条件。

俄土之间签订的条约当然不能使莫尔达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自己同土耳其政府签订的条约失效，因为这两个民族从来没有跟俄国人进行过谈判，也没有给土耳其政府代他们达成协议的权利。而且值得指出的，俄国本身在阿德里安堡条约中已经承认上述特惠条例。这个条约的第五条规定：

“鉴于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两公国根据特惠条例服从土耳其政府的宗主权，而俄国保障它们的繁荣(!)因此，显而易见，它们继续享有它们的特惠条例所赐予的一切特权和豁免权。”

上面援引的几个特惠条例现在依然有效，因为后来的任何条约并没有废除它们，根据这些特惠条例可以看出，多瑙河两公国是两个受土耳其政府庇护的主权国家，它们是在土耳其政府保卫它们不受任何外敌侵犯，同时决不干涉其内部管理的条件下向土耳其政府纳贡的。土耳其人不仅无权将瓦拉几亚交给外国占领，而且他们自己没有重大理由也不得进入瓦拉几亚的领土。不仅如此，由

于土耳其人这样违反了同瓦拉几亚人签订的特惠条例而丧失了宗主权，俄国人只要有瓦拉几亚人向他们提出请求，甚至可以援引被土耳其违反的条约来论证自己有权将奥地利人赶出两公国。而且，这一点决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俄国采取的政策一贯不仅鼓励，甚至还唆使土耳其人破坏瓦拉几亚人的权利，以便在他们之间煽起敌意，从而给自己制造干涉的借口。就拿1848年来说罢，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年春天，几个贵族向莫尔达维亚国君呈递了请愿书，要求进行某些改革；在俄国领事的影响下，不但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甚至连写请愿书的人也被投入了监狱。这个做法所引起的骚动以后就成了俄国于6月25日越过边境向雅西推进的借口。同时，瓦拉几亚国君仿效欧洲其他国家政府的做法，答应进行瓦拉几亚贵族自由派所要求的若干改革。这是6月23日的事情。不用说，这些改革丝毫没有触动土耳其政府的宗主权。但是，它们破坏了俄国依靠在1829年占领期间颁布的并为上述改革废除了的根本法[164]而取得的一切影响。代替这个根本法而制定出来的宪法废除了农奴制并把农民耕种的一部分土地转归农民所有，而地主可以从国家领取赔偿费，以补偿他们所失去的土地和占有他们的农民的劳动的权利。后来，执政国君在俄国人的怂恿下放弃了王位，一个临时政府成立起来主持国事。而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无权干涉公国的内部事务，并且错过了抗议俄国人进入莫尔达维亚的时机的土耳其政府，派遣苏里曼－帕沙率领土耳其军队进入瓦拉几亚并发表了威胁性的苏丹告居民书；这些措施自然是御前会议在俄国压力之下通过的。瓦拉几亚人出来迎接帕沙和土耳其人并同他们结成盟友。于是签订了一项协定：临时政府将由Lieutenance Princière〔公国总督〕接替，后者开始时本来由6人组成，

以后改由3人组成。这个政府得到了帕沙的承认，而且在帕沙的坚持下，也得到外国领事的承认。新宪法又经过了某些修改之后也被苏丹批准了。

然而，俄国政府在向全欧洲发出的宣言中大发雷霆地攻击瓦拉几亚人民，指责它建立了共和国并宣布了共产主义。1848年8月1日，大批俄国军队渡过普鲁特河，向布加勒斯特进发，苏里曼—帕沙突然被土耳其政府召回；苏丹拒绝接见应他本人的邀请前来君士坦丁堡的瓦拉几亚代表，而9月25日，傅阿德·埃芬蒂率领土耳其军队到了布加勒斯特城下，声称此行纯粹是为了消除俄国侵入多瑙河各公国的任何借口。布加勒斯特城和城郊的十万多居民听信了土耳其人的话，不带武器，穿上节日服装，以僧侣为首，出城欢迎他们。傅阿德·埃芬蒂让他们派代表团到他的兵营接受训示。布腊提昂诺先生在关于这些事件的报告中说：

“代表团还来不及向傅阿德·埃芬蒂说明身分，便已经被捕了；同时，土耳其军队以急行军奔向布加勒斯特，土军的骑兵的铁蹄践踏了把土耳其人当作朋友来欢迎的和平居民，撕毁了他们的旗子，折断了十字架，开枪乱射路上见到的兵营和城内的整个街坊区，用霰弹射击兵营里的瓦拉几亚兵士，迫使他们投降和缴械，还杀死病员；军队进城后大肆抢劫、屠杀以及干下其他骇人听闻的暴行。”

这里，俄国全权代表杜加美尔将军支持了并且实际上指挥了土耳其军队。在他后面俄军跟着开到；结果签订了巴尔塔利曼尼条约[165]。这个条约除了其他一切之外，还恢复了俄国拟定的根本法，即所谓的法规，而这正是奥地利目前有义务在瓦拉几亚恢复的那种status quo〔状态〕。

很明显，如果奥美尔—帕沙现在率领他的常胜军进入瓦拉几

亚，那末接受了不久前的教训并同俄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土耳其人，就会恢复1848年宪法及其全部后果，即“共和国、共产主义”和1848年全部产物。没有人会相信，奥地利会比俄国更喜欢这个前途。另一方面，也很明显，土耳其政府一定受到非常强大的压力，才会同意再次破坏自己同瓦拉几亚人订的条约，虽然它根据经验知道这个步骤会有怎样的后果。能施加这种压力的只有英国大使。因此，回忆一下同一个雷德克利夫勋爵以及他的唐宁街上司在1848—1849年对俄国人和土耳其人破坏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权利的态度，是很有趣味的。

1848年6月，当俄国军队初次开进莫尔达维亚国境时，帕麦斯顿勋爵在下院回答忠实不变的达德利·斯图亚特的质问时说：

“俄军没有得到圣彼得堡内阁的命令开进了莫尔达维亚；它的目的只是维持或建立秩序，事后将立即撤出；它进入国境曾得到国君的同意，俄国无意占据这块地盘。”

1848年8月，当俄国军队再次渡过普鲁特河开往布加勒斯特，而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人派遣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御前会议曾向英法两国大使征求过意见并从雷德克利夫勋爵那里得到关于遵循俄国所规定的政治方针的建议。

10月，当土耳其人和俄国人共同占领瓦拉几亚时，俄国人追查某一个普通的瓦拉几亚军官一直找到布加勒斯特土军总司令奥美尔－帕沙的寓所，后者曾和傅阿德·埃芬蒂一起就此事提出抗议。土耳其政府知道这次受辱以后，声明它不愿意再跟俄国人打交道，并且命令它的军队撤到多瑙河右岸，不再参与实行俄国人在多瑙河各公国的政策。同时，土耳其政府威胁要向各大国提出一项严正的抗议并以说明多瑙河各公国发生的全部事情的详细备忘录作

证明。又是那位大使再次出面干涉，并打消了土耳其政府的这一意图。

最后，当 1849 年俄土的联合占领具有恐怖制度的性质，并且瓦拉几亚非正规军首领马基耶罗孤军抵抗的时候，他不得不撤到喀尔巴阡山北，而"屈从于不列颠总领事提出的理由，这个总领事向他指出，他的军队在这里有碍外交家们的活动，并且指出他的国家不久将重新享有它的权利"。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7 月 4 日
载于 1854 年 7 月 19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34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多瑙河战争[166]

大约八十年前，当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常胜军从土耳其手中陆续夺取了现在改称为南俄罗斯的那些省份时，诗人捷尔沙文在一次诗兴勃发时（在这种时候他通常是对女皇本人的荣誉甚至美德以及对女皇帝国的伟大未来大加歌颂），写了一首值得注意的二行诗，这首诗就在现在也能概括地表现出沙皇政策的傲慢和自负。他写道：

> 俄罗斯啊，同盟对你有什么用？
> 迈步前进，全世界就是你的。①

假如俄罗斯果然能够迈步前进，这些话甚至在今天也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俄国的前进遭到极其严重的阻碍。因此，至少在目前它不得不稍微推迟一下夺取全世界的计划。不过特别伤害它尊严的是它退却了，它不仅不能夺得世界霸权，甚至对于誓欲夺取的多瑙河上普通要塞锡利斯特里亚的锁钥阵地，都只好让它们原封不动地留下。而且更惨痛的是遗下了约五万具同胞的骸骨，他们都是在这场独特的战局中阵亡和病死的。

从军事观点来看，围攻锡利斯特里亚无疑是这次战争开始以

---

① 捷尔沙文“占领华沙颂”。——编者注

来最重要的事件。正由于俄军没有能够夺取这个要塞，这个战局对他们说来就完全失败了，而他们目前向塞勒特河对岸的撤退更使沙皇感到耻辱和不高兴。关于围攻锡利斯特里亚的前几个阶段，本报读者已经看到了详细的、在我们看来是完整的分析；现在，在终于得到“太平洋号”轮船带来的俄国公报以后，我们就可以从头至尾把这一次行动整个研究一番，并对每一方作出应有的评价。除了俄国公报（它写得清晰、确切、实事求是，不过在内容上有很多遗漏的地方）以外，现在我们还有奈斯密斯中尉（属孟加拉炮兵）给伦敦“泰晤士报”写的一篇报道[167]。这是完整的围攻日记，其中有许多有趣的情节，但写得相当粗糙，有时日期也不确切。应当指出，我们以前对围攻提出的那些看法和结论，都被这些更近更详细的报道完全证实了，只是下面情节有出入：土军并未放弃阿拉伯堡的防守，而就们曾估计土军在围攻的最后阶段将不得不放弃它。同样很清楚，俄军的行动比我们所预料的还要轻率。起初，他们从东面的多瑙河低地对要塞展开正规围攻，希望能完全绕过那些同要塞隔开的堡垒，并立刻在锡利斯特里亚的主墙上打开缺口。如果说这个尝试有某种优点的话，那末这个优点也只在于它新奇。它可能是第一个在这种不仅侧面受到敌人筑有工事的高地的威胁，而且还被后面的高地瞰制的地形上构筑堑壕和接近壕以攻打要塞的例子。但是以后，俄军便对这些高地进行了另一次非正规围攻，并且围攻进行得如此巧妙，以致虽然侦察和强攻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数千名俄军在强攻中被击毙受重伤，还是不得不对这些高地发动正规围攻。关于俄军这种高超的打法，我们不想再说什么，现在来谈谈围攻的详情。

6 月 1 日，俄军从多瑙河左岸又运来一批攻城炮，组成了攻击

阿拉伯堡的炮队。土军挖掘了竖井并在堡垒的外岸和斜堤下面埋放了炸药。6月2日，锡利斯特里亚守军的司令官穆萨—帕沙被爆炸弹炸死。傍晚，俄军在阿拉伯堡的一个棱堡下进行了一次爆破。既然他们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能够到达斜堤顶，所以炸药无疑是埋得不很准确的。距离和最小抵抗线显然算错了，结果这次爆破不仅没有使土军的防御工事受到损失，反而向后爆炸，石头和土块雨点般地落进俄军的堑壕。这时作好攻击准备的强攻部队正集中在堑壕中，因此，这些雨点般的石块会对他们起什么作用也就很容易想像了。至于俄军封锁要塞的效果低到什么程度，根据下面事实便可以判断出来：在这一天，5000名土耳其非正规部队从锡利斯特里亚以西的腊兹格腊特突入了这座被围的城市。

从6月4日到8日继续进行攻击阿拉伯堡的掘壕作业。俄军到达了斜堤，大胆地把地道挖到斜堤顶，不过俄军对它的炮火掩护很弱。他们开始在壕沟下面埋放炸药，一直埋到棱堡的内岸。当帕斯凯维奇元帅在6月9日又采取他那难以理解的显示威力的行动，即以31个步兵营、40个骑兵连和144门野炮对要塞进行侦察时，这些作业仍在进行中。至于他希望从这种行动中得到什么，这是任何人都无法说明的。看来这是显示威力的行动之一，采取这些行动仅仅是希望找机会采取重大行动或者至少使敌人相信抵抗是无益的。但是对于土军，并没有发生这样的影响。相反地，他们派出了4000名骑兵迎击俄军。据俄军公报称，这些骑兵被彻底击溃了，但奈斯密斯肯定说，在这次战斗中他们是缴获了俄军的60匹战马而回来的。就在这个时候，帕斯凯维奇不但没有在这次侦察中获得好处，反而被土耳其球形弹侦察上了，这颗炮弹使他 hors de combat〔负了伤〕，以致他不得不被送到雅西。

6 月 10 日，围攻达到了顶点。施尔德尔寄予最后希望的大包炸药爆炸了。它确实在阿拉伯堡的前棱堡上炸开了一个可以通行的缺口。俄军发起了强攻。但是，正如他们所应当预料到的，土军早在主墙后不远的地方构筑了有壕沟的 coupure〔二重堡〕，即第二道工事，当俄军接近这里时，就被迫停止前进并遭遇致命的射击。强攻的部队既已被阻前进，那就是被打败了，因为敌人依靠着围墙的掩护，依靠着从近距离发射而使每发炮弹都可以击中目标的炮兵的支援，他们的火力简直可以迫使攻击者在数分钟内退却。因此，俄军不得不从他们所打开的缺口仓卒退却，土军一直跟踪追击到俄军的堑壕，并破坏了一部分围攻工事。这次攻击是俄军对锡利斯特里亚的最后一次重大的行动。如果说在停止围攻的命令到达以前，围攻在表面上和形式上仍在继续，那末这只是为了维持面子而已。6 月 12 日，封锁已非常不严，以致来自苏姆拉的一些欧洲军官毫无困难地进入了要塞。

俄军从 5 月 19 日起开始在多瑙河低地挖掘堑壕，5 月 22 日以 7 个炮队开始轰击阿拉伯堡。次日，又增加了 15 门火炮对付这个堡垒。尽管如此，俄军的报告说，对阿拉伯堡的正规围攻是在 5 月 31 日才开始的。看来，这说明在 5 月 21 日和 22 日配置的炮队只担任第一线任务，而装备重炮也仅仅为了对堡垒进行纵射。自 5 月 31 日到 6 月 10 日，俄军炮队推进到距堡垒 100 码的地点，即从第一道平行壕推进到斜堤脚下的第三道平行壕。斜堤顶上没有王冠形壕，也没有构筑堑壕式炮台，但是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俄军挖掘了通向斜堤坡的对壕，以便在斜堤顶埋放炸药。

从所有的报道中可以看出，阿拉伯堡不过是规模虽大但不能进行长期抗御的野战工事，所以，休森— 帕沙指挥的包括 4 个步兵

营和500人非正规部队的守军的行动，当然值得大加赞扬。远射程火炮轰击9天、在暴露的堑壕中停留11天、两次地道爆破和四、五次强攻，这一切都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像阿拉伯堡这样一个普通的外围堡垒能够支持这样久，确实在战史上难以找出第二个例子。这很像普军的1807年科尔贝克防御战和法军的1813年但泽防御战。

在整个围攻期间，奥美尔－帕沙根本没有设法支援和解救这样重要的地点，这看来是非常奇怪的。但是从他给维丁总督萨米－帕沙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出，当俄军向多瑙河左岸退却时，他确实曾准备前来援救锡利斯特里亚。

他在这封信里写道："你知道，我已把我们所有的部队集合在苏姆拉地区，准备去援救要塞。6个骑兵团和3个炮队已从苏姆拉向那个方向开拔。俄军知道了这个行动以后，带了他们的全部炮兵仓卒退到左岸。在围攻要塞的40天中，他们被击毙的有25000人。"

至于俄军现在打算做什么，还无法断定。如果相信某些维也纳报纸报道，俄军则企图在布泽乌河对岸占领阵地，但是，也就是这些报纸又断言，俄军由于害怕奥军才撤退，而且布泽乌河的阵地已被奥军迂回。如果俄军企图扼守莫尔达维亚，奥军就会从加里西亚和布柯维纳方面迂回。但是，如果俄国驻波兰的部队同驻波多利亚和沃伦的前多瑙河军团及时会合，也可以反过来迂回奥地利，而使加里西亚的东北部一直到桑河和德涅斯特尔河为止的地区处于俄军的打击之下。

如果我们暂时撇开政治上的原因不谈而假定奥地利准备同联军一起进攻俄国，那末情况就会是这样：奥地利可能出动20—25万兵力同联军一起行动，而联军则拥有大约10—12万土军和6万

英法军队。为了对抗这些兵力，俄国可以出动多瑙河军团的4个军和它们的预备队，除去一定的伤亡，约有20万人。帕纽亭指挥的第二军、3个骑兵后备军和一些步兵预备队以及由新兵组成的增援部队，总共可能有18万人左右。因此，俄国的全部兵力可达35万人，其中还须除去克里木和南俄某些地区的守军。此外，为了防守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省，还须留下近卫军、掷弹兵和第一军，15000左右的芬兰军还不计算在内。把这一切都考虑进去，那末交战双方兵力的相差就不是大得连俄军进行狭义的防御也没有取得某些胜利的希望。

如果像我们从最近外交报道以及奥地利在莫尔达维亚边境毫无举动的情形作出的结论那样，奥地利除了在交战双方之间充当调停人外别无其他意图，那末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在莫尔达维亚或者在贝萨拉比亚，今年内都不会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7月6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7月25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39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债。——瓦拉几亚

1854年7月7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们现在收到的关于马德里军队起义的消息，仍然是矛盾百出、零星片断的。所有马德里的电讯，当然都是政府的消息，也同登在“日报”[168]上的公报一样，是值得怀疑的。我能向你们提供的，就是就我手边的贫乏材料写的一篇评论。

读者们大概还记得，奥当奈尔是今年2月被女王流放的将军之一；他拒不服从而在马德里躲藏起来，并且从自己的避难所同马德里的守备部队，包括同骑兵总监杜耳塞将军，保持秘密通信。政府知道了他还留在马德里，而陆军大臣布拉塞将军和新加斯梯里亚军事总督拉腊将军在6月27日夜间得到了关于由杜耳塞将军领导的策划中的起义的警告。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防止或者镇压萌芽状态的起义。因此杜耳塞将军能够在6月28日毫不费劲地借检阅为名集中了大约2000名骑兵，并且在奥当奈尔的陪同下带领这批骑兵一起出城，打算劫持住在厄斯库里阿尔的女王。但是计划没有成功，当6月29日起义军在首都四郊布防的时候，女王已经在内阁首相圣路易斯伯爵的陪同下到了马德里，并在那里进

行检阅。埃查古埃上校和夺取了团部金库(库中有100万法郎)的亲王团的400名兵士,也参加了起义。29日晚,从马德里派出了一支由拉腊将军率领的纵队,包括7个步兵营、1个骑兵团、1队骑兵宪兵队和2个炮兵连,以便迎击驻扎在文塔斯— 德耳— 埃斯皮里士— 桑托和维卡耳瓦罗村的叛军。6月30日,两军进行了会战,关于这次会战有三个报告:一个是拉腊将军写给陆军大臣并在“日报”上发表的官方报告,第二个是登在“贝云信使报”上的报告,第三个是“比利时独立报”驻马德里记者——会战的目击者的报告。第一个报告可以在所有的伦敦报纸上看到,没有什么特殊东西可谈,在报告中拉腊将军先说,他向起义军进攻,后来又说起义军向他进攻,他抓到了俘虏,后来又说他失掉了俘虏,说他取得了胜利并且返回马德里,enfin〔最后〕,他使战场上躺满了“敌人”的尸体以后,让起义军控制了局面,而他自己的损失总共只有30人受伤。

“贝云信使报”对作战过程作了如下的报道:

“6月30日早晨4时,凯萨达将军率领两个旅离开马德里去进攻叛军。会战没有继续多久,凯萨达将军受到了有力的还击。晚上7时,陆军大臣布拉塞将军也集中了马德里的全部守备部队(这里指出,这支守备部队大约有7000—8000人)去出击。会战立即开始,而且几乎不停地一直继续到深夜。被人数众多的起义军骑兵吓倒了的步兵,列成了方队。卡里哥上校率领几个骑兵连十分猛烈地进攻其中的一个方队,而且打散了这个方队,但是他受到由5门火炮组成的伪装起来的炮兵连的炮火的袭击,炮兵连的霰弹打散了他的骑兵连。卡里哥上校落到了王国军队的手里,但是奥当奈尔将军毫不犹豫地,立刻集中了自己的骑兵连,十分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步兵,把他们的队伍打散了,救出了卡里哥,缴获了5门火炮。王国军队受到这一打击后,便向马德里撤退,并在晚上8点到了马德里。王国军队的一个将军曼西纳受了轻伤。由于这场激战,双方都有很大的伤亡。”

现在,我们来谈谈“独立报”上的报告,上面注明:马德里7月

1日。这个报告向我们提出了最可靠的消息。

“文塔斯— 德耳— 埃斯皮里士— 桑托和维卡耳瓦罗是激战的战区，在这里王国军队被击退到康乐饭店方面。依次设在各个据点的3个方队，按照陆军大臣的命令都自行解散了。第四个方队设在雷提罗的后面。起义军的10个骑兵连在奥当奈尔和杜耳塞两将军的亲自指挥下进攻了它的中央(?)，同时游击队占领了它的翼侧(?)〈既然是向方队进攻，就很难理解，记者指的中央(!)和翼侧(!)是什么意思〉。起义军曾两次冲击炮队，但是都被霰弹打退了。起义军显然想夺取摆在方队各个角落上的火炮。然而夜晚降临了，于是政府军队排成梯队向阿耳卡尔门撤退，在那里一个仍然可靠的骑兵连受到隐蔽在斗牛场后面的起义军的枪骑兵的突然袭击。起义军趁这次突袭所引起的混乱状态，夺获了仅存的4门火炮。双方的损伤大致相等。起义军的骑兵受到霰弹的重大损伤，但是他们的枪骑兵几乎消灭了王国的一个团和一个骑兵宪兵队。最近的消息报道，起义军得到了来自托勒多和伐利亚多利德的增援。甚至传说纳尔瓦艾斯将军今天将到巴利耶卡斯，杜耳塞、奥当奈尔、罗斯·德·奥兰诺以及阿尔梅罗等将军将在这里接待他。在阿托查门附近挖好了堑壕。好奇的人群挤满了火车站，从这里可以看到奥当奈尔将军的前哨。但是，马德里的所有城门都有严密的戒备……

同日下午3时。起义军的大量兵力占领了离马德里3英里的巴利耶卡斯镇。政府今天在等待外省的军队，其中包括一个国王营的到来。如最后的消息可靠的话，这一部分军队已经加入起义。

下午4时。现在，几乎全部守备部队都离开马德里并在向巴利耶卡斯进发，以迎击信心百倍的起义军。商店全关闭了。雷提罗和所有政府机关的警卫队很快都武装起来了。我刚才知道，守备部队有几个连昨天加入了起义军。指挥马德里守备部队的有卡姆普萨诺将军(有人说他已经向起义军投诚，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维斯达·埃尔莫萨将军和陆军大臣布拉塞。政府等待的援军，到现在还没有到来；但是第四基干团和第一骑兵团似乎已经离开伐利亚多利德，并且以急行军向马德里进发。关于由土朗将军率领的布尔果斯的守备部队，也有同样的说法。再有，里韦罗将军亲自率领大军离开了萨拉哥沙。由此看来，将要发生更激烈的流血冲突。”

到7月6日止，没有从马德里来的报纸和信件。只有“通报”登

载了一则简短的急电,上面注明:马德里 7 月 4 日。

“马德里和外省仍然平静无事。”

据一则私人消息说,起义军现在在阿兰惠斯。如果“独立报”的记者 7 月 1 日所预言的会战是政府取得了胜利,那就不会连信件,报纸和公报都没有。尽管马德里已经宣布戒严,“人民呼声报”、“民族报”、“西班牙日报”、“西班牙报”以及“时代报”又重新出版了,而且没有预先通知政府,政府只是从它的官员那里才得悉这一不幸的事实。在马德里被逮捕的人中,有银行家安东尼奥·吉埃尔莫·莫兰诺和霍赛·曼努埃尔·科耳亚多。还下令逮捕西霍腊·塞维耳昂诺以及纳尔瓦艾斯元帅的挚友杜罗的富安特斯侯爵。芒先生和皮达尔先生都受到监视。

判断这一起义的一般性质,为时尚早。但是可以说,起义显然不是进步派[169]干的,因为圣米格尔将军——该派在军界中的代表还若无其事地蹲在马德里。从种种消息来看,阴谋的主谋多半是纳尔瓦艾斯,而克里斯亭娜女王——她的影响近来由于女王的宠臣圣路易斯伯爵而大大降低了——也参与了这个运动。

在欧洲,除了土耳其以外,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西班牙那样被人了解得那么少,那么不正确。无数次的地方政变和军事叛乱,已经使欧洲习惯于把西班牙看成御用军时代的罗马帝国。这同有些人对土耳其的肤浅的判断一样是错误的。这些人认为土耳其这个国家的生命之所以枯竭,是因为近百年来土耳其的正史尽是宫廷政变和近卫军的émeutes〔叛乱〕。这种误解的根源仅仅在于,历史学家们不是从这些国家的外省和地方组织中,而是从宫廷年鉴中寻找这些人民的生命力的源泉。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的范围

内发生的变动，很少涉及西班牙人民，而西班牙人民也完全把这个有限的领域交给宫廷的宠臣、将军、冒险家和少数所谓国家活动家的反复无常的热情和渺小的阴谋去摆布了，直到现在他们很少有理由对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感到后悔。对于西班牙现代史，就其性质来说，应当给以迄今它所得到的完全不同的评价，所以我要趁机在我以后的一篇文章里详细谈谈这个问题。现在我只能指出下面一点：如果比利牛斯半岛的纯粹的军事叛乱发展成普遍的起义，那丝毫也不奇怪，因为政府最近的财政法令[170]十分成功地把税吏变成了革命的宣传员。

目前，决定战争命运的是奥地利。如果奥地利的军队到现在还没有进入瓦拉几亚，那只是因为奥地利在等待俄国皇帝的答复。正如电讯所报道的，哥尔查科夫已经到达维也纳，他带来了不祥的答复。6月3日送出的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第一次在“科伦日报”[171]上登出来。奥地利要求的要点如下：

“奥地利皇帝认为停止俄国军队渡过多瑙河以及得到俄国皇帝关于停止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的期限——我们希望不会太遥远——的明确表示是有意义的。俄国皇帝在英明地权衡了向他提出的所有理由以后，一定会考虑到这一意义。我们决不怀疑，尼古拉皇帝是希望和平的；因此，他一定会寻找办法来改变日益成为奥地利和德意志国内不安的根源的状况。我们相信，他不希望无限期地占领或者提出我们不能接受的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条件，而使弗兰茨-约瑟夫皇帝自己采取措施来保护在目前情况下受到如此重大威胁的利益。”

目的在于支持奥地利“要求”的普鲁士照会[172]最后这样说：

“国王希望，皇帝同意把争论的问题移到能够实际解决的基础上，以便采用限制和规定双方行动的确切范围的办法，促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因此我们至尊的国王希望目前的措施将被接受，以符合于产生这一措施的愿望，

希望我们以及维也纳内阁以与问题的重要性相一致的关切心情等待着的俄国皇帝的答复，能够使国王摆脱他的义务和责任所加在他身上的沉重负担。”

东方军团的总司令海斯想把他的大本营设在切尔诺维茨。维也纳的“士兵之友”刊载了海斯将军的小传：

“冯·海斯元帅于1788年生在维也纳，1805年入居莱团任少尉，1815年底任参谋，1822年是中校，被任命为都灵的军需官。从1829年起是上校，1831年被任命为上意大利的机动军的军需官。1842年得到了中将军衔，1848年被任命为拉德茨基军队参谋长。1848年进军曼都亚、库尔塔唐和维琴察以及1849年以诺瓦拉会战而结束的短期战局的计划，就是他制定的。”

谈到公开承认的奥地利占领瓦拉几亚的意图，我要引用奥地利各报自己说的话。

奥地利在联邦议会的代办处的机关报“法兰克福邮报”指出：

“奥地利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必须最坚决地促进和平的恢复，用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的办法实际上把交战的双方分开，并且占据它们之间的最重要的据点。如果俄国人退到普鲁特河以东，土耳其人及其盟国就不能够越过多瑙河了。如果我们再注意到，每一方都已经取得了某些经验，并且丢掉一定的幻想，〈俄国人丢掉自己在军事上占优势的幻想，海上强国丢掉自己的海军强大无比的幻想〉，那就很明显，目前局势就会使和平谈判的恢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劳埃德氏报”指出：

“现在争论的领土即多瑙河各公国，可能置在中立国的保护之下。这样，土耳其军队就不可能占领普鲁特河两岸的阵地。武装调停人就会站在西方强国军队和俄国军队之间，防止它们在多瑙河各公国冲突起来。这样，在最重要的战区就会实际上停战。如果真的还存在着和平的可能，那末这一措施就会加速和平的到来。不论圣彼得堡，或者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会有丝毫怀疑：奥地利决定占领多瑙河各公国是为了保证和平，同时这一决定也是防止全面战争的最后一个可行的措施。”

最后，我们在柏林出版的“施本纳报”[173]上看到这样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

“有消息证实，四大国的大使即将在维也纳再召开一次会议，第一，是为了介绍奥地利和土耳其政府之间签订的公约，并宣布这一公约同过去的会议的议定书是一致的；第二，是为了商谈修改4月9日维也纳议定书所规定的原则，这次修改可以成为将来的以和平而不是以战争为目的的预防行动的积极基础。”

然而奥地利利用这一情况制定了新的公债计划，官方公布的这一公债的条件如下：

“1.公债总数大约规定为35000万到50000万弗罗伦。如果认购额达到了这个数目，债款将视认购总额在3年、4年或5年内偿还。

2.发行价格规定为95银行票。

3.利率为5%，并且以硬币偿还。

4.认购不带强制性质；帝国政府将通过各省现行政权激发臣民的爱国心。

5.公债用作偿还国家欠银行的总数约为8000万的债务，以恢复银行票的行市。剩余〈把总额的4/5叫做剩余，真是太聪明了〉将作为近几年追加预算的来源。”

当然，“劳埃德氏报”肯定地说，这一庞大的财政措施会像人们现在(几乎是第一次！)所计划的那样，将永远结束目前奥地利通货贬值的现象。读者都记得，在这个世纪，几乎每次发行奥地利公债的时候提出的都是这个借口。但是在这个庞大的措施中，总还有某几点也许是读者看不到的，因为这几点在上面所引的报道里被用心地省略了。关于这一方面，“地球报”昨天晚上写了如下的话：

“这次公债将成为全国性的，就是说，每个纳税人都应当按照纳税的多少认购公债。开始时采用道义上的办法，以后就实行直接强制性的办法。因此，

事实上这一措施就等于规定一次附加税，并答应这笔钱将偿还。”

有趣的是，全部措施所提出的理由以及实行的方法，都很像成了革命序幕的西班牙国王的最近几项命令。

在我的最近一篇文章里①，曾请你们注意瓦拉几亚人民的权利和他们的状况，同时驳斥了所谓外交冲突是由于这些权利遭到破坏才产生的论调。在巴黎的“世纪报”[174]上，刚刚刊出了小瓦拉几亚的美格定茨地方官巴尔布·比伯斯库先生写给土耳其政府外交大臣的报告。在这里，我们终于听到保护多瑙河各公国人民的呼声，虽然“文明的维护者”是以十分可耻的冷淡态度对待多瑙河各公国人民的命运的。报告一开始就说：

“俄国人为了对手无寸铁的人民的消极抵抗进行报复，从小瓦拉几亚撤退时，竟干出最丑恶的暴行和破坏活动。俄国人抢劫了整个国库、印信、地方管理局的档案和教堂里的家具。他们在离开前，把过去的无数次征用中幸存的牲畜杀掉，并且不是把牲畜带走，而是留下来腐烂，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使人民感到他们残酷和可恨。”

关于当时流传奥地利人即将进入瓦拉几亚的传说，比伯斯库先生指出，“即使是最友善的外国军队，对于它占领的国家也永远是一种负担”。他说，瓦拉几亚不需要奥地利人；它自己就能提供5万名受过训练、有纪律的战士。在瓦拉几亚的17个省中，每个省目前都有3000名宪兵、林务官、猎兵以及过去的兵士，他们只是需要武器，以便一遇到信号就向俄国人猛攻。他最后说了以下的话：

“我们缺少的只是武器；如果在你们的军火库里武器不足，在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许多工厂里武器多得很，我们准备出钱买。武器，还是武器，阁下，

① 见本卷第328—333页。——编者注

不要 3 个月，多瑙河各公国就不会留下一个俄国人，土耳其政府将会得到 10 万同奥斯曼人一样热烈地渴望驱逐并惩罚自己的共同的死敌的罗马尼亚人以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

可怜的美格定茨的地方官不懂得，奥地利正是为了阻止瓦拉几亚人武装起来，不许他们同奥斯曼人一起驱逐和惩办俄国人，才使瓦拉几亚人屈服于自己占领之下的。

根据伦敦小市民报纸报道，查理·纳皮尔爵士企图把沙皇的海军将领诱出喀琅施塔得，使他们离开掩蔽部，据说，他们在掩蔽部的花岗石围墙的后面，对着英法舰队“发抖”。但是，为什么英国海军不离开自己的木制掩蔽部，以便在俄国人认为最如意的地方，在陆地上同俄国人斗争呢？应当指出的是，不管英国人怎样吹牛，俄国人还是走出了塞瓦斯托波尔并且把“富里娅号”蒸汽舰“打伤了”。

巴拉盖·狄利埃被任命为应当在 7 月 14 日上船去波罗的海的一个师的指挥。英国应当提供运送 6000 人的船只。同样数目的军队以及一个野战炮兵连将乘法国船。如果加上菲埃隆上校指挥下的一支海军陆战队，那末整个波罗的海师将有 13000—14000 人。同时在马赛，装运军队去黑海的工作尚未停止；很明显，法国的裁军过程还没有达到预期的“安全”程度。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7 月 7 日

载于 1854 年 7 月 2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36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意大利的紧张。——西班牙事件。——德意志各邦的立场。——英国法官

1854年7月14日星期五于伦敦

查理爵士①已从喀琅施塔得安然回来了，除了几名英勇的水手患霍乱之外，无一伤亡。为了使民众保持良好的情绪，现在有必要在塞瓦斯托波尔重演敖德萨的滑稽剧：在敖德萨，人们已经看见联军舰队的50艘军舰“开往”该地。

法军原订今日在加来登船，现已延期到7月20日，据说是为了等待弄清西班牙事件的真相。

布德贝尔格将军逼迫多瑙河各公国的人民发表声明，感谢尼古拉皇帝占领他们的国家和保卫它免受“残忍的土耳其生番”的蹂躏。7月5日离开君士坦丁堡、7月13日抵达马赛的“幼发拉底号”带来一则重要的消息说，俄国人根本没有撤出多布鲁甲，“赫赫有名的”不幸的②列施德-帕沙重新担任了外交大臣。

据7月8日来自克拉科夫的消息说，帕斯凯维奇公爵已抵达

① 即海军上将纳皮尔·查理。——编者注

② 双关语：“不幸的”一词英文为《wretched》，和列施德的名字同音。——编者注

他在立陶宛领地的哥美里宫,已经不再参加目前的战争了。另有消息补充说,不仅他本人被免职,而且他的作战计划也被否定了;尤其近乎情理的消息是说,已经开始向莫尔达维亚退却的俄军,在哥尔查科夫公爵的指挥下又在向前推进。他似乎打算在布加勒斯特正面集结相当的兵力。目前俄军的部署是这样的:它的右翼在雅洛米察河上游一直伸展到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在那里它可以依靠24门重炮扼守泰梅希山口;它的中央占领从福克夏尼到布加勒斯特的一带地方;它的左翼在利迭尔斯的指挥下驻扎布来洛夫一带,而极左翼在乌沙可夫指挥下驻在多布鲁甲。

最近从战区发来的消息说,土军很大一部分兵力(4万人,其中有12000名联军)已渡过多瑙河,占领了茹尔日沃。法国报纸报道,苏利纳河口附近的俄国小村落曾遭到联军舰队的炮击并已被摧毁;当然,对这个消息最好同对波罗的海的博马尔松德再次被炮击和被摧毁的故事抱同样的态度。圣阿尔诺元帅在东方的军事行动似乎引起了土伊勒里宫内的某种忧虑,害怕它的规模会太大。任何一则消息都透露,法国政府已经派出了一位专门的总视察官——当然是**财政家**——去制止这种过分的热心(son excès de zèle)。

在意大利,政府也好,民众也好,都令人惊异地紧张起来。皮蒙特的陆军大臣拉·马尔摩拉将军发布了关于在萨瓦、圣莫里斯、亚历山大里亚、甚至在撒丁岛上建立兵营的命令。无限期归休的大批兵士应召入伍了。同时,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卡萨勒的要塞里也存足了储备品。另一方面,拉德茨基元帅也发布了关于在维罗那和沃尔塔之间建立兵营的命令,那里每天有两万多兵士在接受进行小规模战争(petite guerre)的方法的训练。在科多尼约、卡萨勒、普斯特

拉尔佐和伦巴第的其他一些城市因食品价格的飞涨而发生了骚乱。约有二百人被捕并被押送到曼都亚。从那不勒斯的来信看来，那里曾经大规模地进行逮捕；在西西里岛也这样，卡拉法伯爵的儿子是在这里被捕入狱的。炮弹国王①正在采取非常措施在陆上和海上武装起来。他命令加埃塔要塞做好战斗准备以防万一。他宣布，全欧洲正流行鼠疫，因此对一切入境船只要规定严格的检疫期。从葡萄牙、格拉斯哥和撒丁王国来的一切船只要经过10天检疫期，从托斯卡纳和罗马国家来的船只要经过7天检疫期。因为对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施行这样的限制，所以任何一只船只的自由入境都是少有的例外。对于经陆路入境的外国信件要执行对鼠疫流行的国家所采用的一切预防措施。与教皇国的交通可以经过蒙特卡西诺和索拉，也可以经过阿布鲁威，不过，防疫哨大概很快就会布满整个国境线。

该从马德里经过波尔多来的最近的邮件，到昨天晚上还没有到达巴黎。据说，王国军队正在继续追击叛军，它似乎已经追到并正在动手消灭他们。最初我们听说，叛军正向埃斯特勒马杜腊逃跑，企图退到葡萄牙边境。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似乎正在前往安达鲁西亚的途中，情况表明叛军并不渴求很快离开自己的祖国。从私人的来信中知道，塞拉诺将军率领300名骑兵加入起义军：“日报”报道，他是一个人参加的。在马德里到处传说国王的一个团（del Rey）已经投到起义军方面。“纪事晨报”记者补充说，加入起义军的有各兵种的200名军官、驻扎在托勒多的各团的一些连和马德里志愿者的2个营。“日报”说，奉命追击叛军的一个师在7月5日

① 即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晚上从马德里出发，它包括3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2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和军事部门的一批工人。这个师是在维斯达·埃尔莫萨将军指挥下出征的，但是，第二天，他就被陆军大臣布拉塞将军接替。7月7日的王国法令临时任命圣罗曼将军在布拉塞将军离职期间代行陆军大臣的职务。“日报”报道，该师已到达帖姆勃列克并正沿着瓜的亚纳河谷向勒阿耳城方向移动。同一天，布拉塞发出告叛军兵士和下级军官书，号召他们回到他的旗帜之下，并以女王的名义向他们保证既往不究。我们在“贝云信使报”上看到如下的一段消息：

“根据最近我们得到的消息，奥当奈尔将军正向巴耳德佩尼亚推进。王国军队的先头部队已在帖姆勃列克地区集结。奥当奈尔将军正在利用空隙时间来训练他那一支由2000名骑兵、6门火炮和800名步兵组成的不大的部队。”

奥当奈尔和杜耳塞的呼吁各有不同：前者援引1837年的宪法[176]，而后者援引古老的加斯梯里亚法即反对违背加冕誓言的君主的法律。建立瓦伦西亚共和主义游击队伍，这是一个新的特点。从7月6日收到的消息中可以看到，有些城市和乡村已经起来反对政府，其中有阿鲁拉、哈提瓦和卡勒特。退休上校奥罗斯科前往卡勒特领导武装队伍，没收了全部枪枝，并出告示号召居民参加运动。政府派出骑兵、步兵和国民近卫军去镇压瓦伦西亚的起义。

关于俄国给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照会[176]，“比利时独立报”提出了一种完全新的说法。根据这家报纸——它可以看做是布鲁塞尔的俄国退职外交家的私人moniteur〔通报〕——的说法，俄国的照会没有直接交给奥地利政府，而是交给了哥尔查科夫公爵，他把照会的副本转交给德·布奥尔先生，同时表示希望奥地利要求俄军

撤出多瑙河各公国只是指建议停火，因为奥地利不可能希望撤退的俄国军队遭到联军的袭击。可见，奥地利的意思只是指停火。因此，土、英、法军应当放弃任何进攻行动和任何对俄国的新的敌对行动。关于俄军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问题，照会强调说，俄国在这些地方要无条件保持一定的战略据点以等待签订和约，否则，它同联军比起来会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照会否认俄国有依靠上述战略性的占领来威胁奥地利的任何意图。从这些前提出发，照会表示俄国愿意在下面的基础上开始新的和平谈判：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俄国政府从来无意加以侵犯）；正如 4 月 9 日的议定书所规定的那样，土耳其帝国基督教臣民和伊斯兰教臣民一律平等；最后，修改有关海峡的条约。照会允许各国对土耳其的基督徒有共同保护权；但是，在俄国对正教徒的保护权问题上，“比利时独立报”认为照会中补充了若干供不同的解释留下充分根据的模棱两可的词句。这家报纸报道，哥尔查科夫公爵的口气比照会本身更为和缓。他的急件不是俄国**最后的态度**；如果有希望促使奥地利开始新的谈判，他有全权再采取其他措施。然而，7 月 9 日维也纳内阁仍然没有作出任何抉择。

“独立报”，或者更正确地说，布隆诺夫男爵说：“目前，我们不应当无视这样一个情况：无论圣彼得堡的意图怎样，只要发生任何一个事件，采取任何一个军事行动，例如英法联军进攻喀琅施塔得，或者更可能进攻塞瓦斯托波尔，甚至占领阿兰群岛，都足以改变这些意图并且使反对作任何让步的一派占上风。”

无论如何普鲁士对这次俄国照会是满意的，并把它看做是恢复谈判和阻止奥地利人进入瓦拉几亚的手段。就连“通报”也认为，普鲁士反对奥军进驻是维也纳宫廷重又犹豫不定的原因。另一方

面,假仁假义的“纪事晨报”报道说:

“在柏林人们确信,普鲁士宫廷所承担的保卫奥地利领土不受敌人侵入的约定义务,使它有权抗议俄国的任何新的挑衅。”

另外,大家知道,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条约[177]恰恰规定得使两国之中的任何一国在确信另一国制定的军事措施的必要性以前可以停止自己的军事行动。因此,奥地利即使表示愿意和西方强国共同行动,也会因为普鲁士抗议而不得不拒绝参加。我个人确信,所有这些可能性,北方三强国事先已经共同研究过了,甚至为奥地利设下的新的困难,目的也不过是要使它占领瓦拉几亚的行为具有英勇抗俄的外观。像 1850 年奥普战争一样的小规模的假战争可能也由这个协定预先规定了,因为它仅仅有助于在缔结和约时使奥地利的意见更具有决定意义。必须注意到,“奥地利通讯”[178]斩钉截铁地说,**除了**可能侵犯俄国现有边界这一项,奥地利在所有各项上都同意西方强国的政策。

为了估计奥地利的立场,注意一下根据 6 月 22 日的质问而现在提交下院的塞尔维亚政府对奥地利占领的抗议书[179]是很重要的。这份抗议书是塞尔维亚政府交给土耳其政府的。抗议书一开头就指出“奥地利总是答应塞尔维亚帮助保护多瑙河各公国边境不受任何敌人进犯,但是奥地利本身对塞尔维亚的态度,却要看奥地利认为塞尔维亚政府同俄国或同土耳其的关系是好是坏而定”。后来,在塞尔维亚边境上集结了重兵。塞尔维亚政府曾“直接向维也纳内阁和间接向土耳其政府”询问,“奥地利的这种军事上的调动的目的和意义何在”。奥地利作了支吾搪塞的答复,然而土耳其政府和西方强国驻君士坦丁堡的代表则声明他们完全不知道奥地利示威的目的,甚至他们似乎也同塞尔维亚政府一样感到不安和

怀疑。“贝尔格莱德的帕沙没有指令可遵循，或者更正确地说，有的还是那些旧的指令，根据这些指令，他应当把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任何军事干涉，看成是针对奥斯曼帝国本身的敌对行动，并应给予最坚决的反击。”奥地利似乎是越来越倾向于西方强国了，所以它驻贝尔格莱德的代表开始发表关于它的意图的令人放心的言论。同时，维也纳内阁向塞尔维亚政府保证说，所谈的军事措施不包含对塞尔维亚的任何敌意；奥地利只希望保卫本国边境；它只有在俄军进入塞尔维亚领土或者那里发生反对合法政权的暴动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干涉；所以，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它的干涉还是友好性质的，目的是援助政府和合法政权。奥地利的保证没有能使塞尔维亚政府安心。塞尔维亚政府认为，奥地利一方面觊觎调停人的角色，另一方面以希望和西方强国共同援助奥斯曼帝国为借口采取了单独行动。最后，塞尔维亚政府怀疑奥地利企图制造它似乎多么渴望预防的那种混乱。因为奥地利的备战活动一天比一天具有威胁性，所以塞尔维亚政府和伊塞特—帕沙在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共同采取了坚决的步骤，以便抵制任何可能使奥地利成为塞尔维亚今天的命运的调停人的阴谋。这就是阿集斯—帕沙起初被派到维也纳，而现在又在君士坦丁堡的原因。同时，根据同土耳其代表达成的协议，曾采取了一切国防措施。奥地利干涉塞尔维亚可能有两个借口：(1) 俄国人的入侵和 (2) 塞尔维亚的叛乱。第一个借口是荒谬的，因为战区距离塞尔维亚太远了，即使俄国人企图侵入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和土耳其军队也完全能够加以反击。如果需要辅助军队，塞尔维亚宁愿要其他国家军队，也不要奥地利军队。

“塞尔维亚人民对奥地利不信任，甚至可以说是仇恨，以至每个塞尔维亚

人都会把奥地利人进入塞尔维亚看成是极大的危险，莫大的不幸，塞尔维亚人会立即全力以赴地跟奥军作斗争；整个民族会全力来反对这个一贯体现奥地利在塞尔维亚所奉行的以保护塞尔维亚为借口的贪婪、自私的政策的敌人。”

至于说国内的叛乱，那只是由于奥地利的干涉，才会使人担心。塞尔维亚将永远忠实于土耳其政府。

“塞尔维亚政府所要求的一切，不外是希望土耳其政府今后继续给予它至今所表示的那种高度的信任，希望不把塞尔维亚置于奥地利占领之下（无穷的灾难的开始）。在这种条件下，塞尔维亚政府完全负责维持塞尔维亚的社会安宁和秩序。”

塞尔维亚的这份抗议书同时清楚地表明，瓦拉几亚人民多么热情地期望奥地利人开进瓦拉几亚。

关于小国对英国采取中立或者更正确地说是敌对的态度，任何人只要留意看一看英国目前对俄国采取的军事行动、英国波罗的海舰队的掠夺性远征以及为了使瓦尔那附近的军队不能进行任何战斗而采取的种种措施（要知道，不列颠军队在土耳其的机动卫生队直到现在才刚刚乘“喜马拉雅号”军舰离开南安普敦），他就不会感到奇怪。因此，瑞典宣布它最后决定保守中立，不同西方强国采取共同步骤；丹麦和荷兰作为德意志联邦[180]的成员国表示可以同意奥地利5月24日的公报，不过有绝对的保留条件，即这个公报的唯一目的是保护最完全的中立和恢复和平。

弯街的治安法官贾丁先生审理了一桩远比波拿巴在布伦的演说或查理从喀琅施塔得光荣退却更使伦敦轰动的案件[181]。一位德国佩特曼博士被禁闭了4天之后，作为一个无责任能力，因而不能自由行动的人被押解到法庭。司法稽查官雷诺斯先生要求公众

和报界人士退出去，于是，案件也就在法官的私人办公室内极为秘密地进行审理。被告的朋友，下院议员奥特韦先生愤怒地抗议不许他参加审理案件的作法，后来他被允许参加了；律师路易斯先生也请求允许他作为被告的辩护人参加，他也被允许了。路易斯先生质问，为什么不经法官审讯就把佩特曼博士在犯人牢里关了 4 天。贾丁先生对这一点答复说，他得到两位医生署名的关于被告精神错乱的证明书，因而他不得不将被告送到疯人院。路易斯先生请求法庭让他提出反面的证据，但是，贾丁先生拒绝考虑任何延搁案件的建议，因为他要根据他现有的文件办事。当时路易斯先生声明，他将向上一级司法机关上诉，那里审理案件不会有偏见，并且将听取双方申诉。于是他告诉他的被辩护人，虽然法官提出要求，也不要回答问题。奥特韦先生对整个审讯的 ex parte〔片面〕性表示抗议并警告说，由于佩特曼博士曾经在审前被拘押并被关进疯人院，将把整个案件提交下院审理。被告又被解到科尔奈─ 哈奇 。

现在，我们将今天“晨报”刊登的不久前刚刚把佩特曼博士从贝德勒姆②解救出来的医生派西沃先生的声明转引在下面：

“佩特曼博士是一位德国教授，曾先后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和哈雷大学求学。他是曾经为乔治三世作战并在战场牺牲的一位汉诺威军官的儿子，又是普鲁士地方行政长官李普皮尔特男爵的继子。大约在 30 年前，他来到了英格兰，并且很快就熟习了我国寄宿学校和学院现行的腐败透顶的教学制度，于是便到牛津和剑桥去讲授这一主题的课程。1835 年，他被介绍给诺曼比侯爵，在侯爵保护下到了爱尔兰。因为诺曼比夫人已经为马尔格雷夫勋爵找到了教师，她就把佩特曼博士介绍给一位爱尔兰贵族，后者请他当自己两个儿

② 精神病院的名称。——编者注

子的教师。7个月后，发现大儿子深深地爱上了家中的萨克森出生的女仆，并使她怀了孕。年轻人的母亲请求佩特曼博士帮助她把这个姑娘打发回德国，但博士拒绝干涉这桩事。他辞去这家的工作并在都柏林着手公开讲学。1836年3月，这个姑娘突然来到这里，这时她已经在贵族庄园生了孩子，境况十分贫困。她告诉佩特曼博士说，她打算雇请律师控告贵族的儿子诱骗她，而且他将会被召去当证人。佩特曼博士当时决定去找管理诺曼比侯爵的庄园并同侯爵家庭关系非常密切的斐普斯上校。佩特曼博士几次前去拜访这位斐普斯——诺曼比的兄弟和阿尔伯特亲王的现任秘书，但都没有得到他的任何答复，也没有被接见。最后，他被叫到都柏林的治安法官斯塔德特先生那里，斯塔德特先生根据那个斐普斯的证词，没有任何其他说明佩特曼博士破坏社会秩序的文件，就在1836年5月把博士送进了疯人院。在诺曼比勋爵当爱尔兰总督期间，佩特曼博士被根据一个叫利顿的医生的证明转送到迪恩·绥夫特医院，而按照这个医生的意见，根本没有根据认为佩特曼博士是疯子。9个月后，经过圣巴特里克大教堂的首席神甫道逊博士的交涉，他被从医院放出来。此后经道逊博士介绍，他在都柏林皇家协会讲学并被邀请到福特德斯居勋爵家中。当阿尔伯特亲王来到英格兰时，佩特曼博士曾请求亲王让他担任图书馆管理员，允许他实施他的学校改革。在佩特曼博士和萨塞克斯公爵的长时间交谈后，后者指示他的图书馆管理员允许佩特曼博士自由出入他的图书馆。在这之后，佩特曼博士向阿尔伯特亲王递了呈文，并附上本人的证书和11册著作。亲王对呈文不予答复，最后，佩特曼博士请求给予接见，不然就归还文件。大概正在这个时候，年轻的牛津向女王行刺，**而一位在亲王逗留波恩期间**（在波恩他和佩特曼博士在同一位教授那里学习）**同亲王关系密切的女士又从德国来了**。宫廷上下不安，而佩特曼博士的倔强引起了怀疑。有人把这一切都报告了内务大臣诺曼比侯爵（佩特曼博士曾经控告侯爵毫无根据地把他送进都柏林疯人院）；在1840年6月的一个早晨，一名便衣警察被偷偷派到佩特晨博士在白厅的住宅。诺曼比勋爵召见了他的兄弟斐普斯上校，值班法官根据上校的证词命令把佩特曼博士搬进贝德勒姆，他在那里住了14年。他在那里的行为一贯非常好；一次也没有被隔离过，也从来没有服过任何药物。他专心于改善对病人的护理和组织能够接受他的讲解的病人学习。被释放以后，他根据朋友的建议向女王递交了呈文；他以为现在可以自

由行动了，用不着担心被人扣留，于是在上星期六到白金汉宫的皇家教堂去，参加那里的祈祷仪式，以便女王注意到他。然而他在那里又被逮捕了。”

这个例子可以向各位读者表明，在自由的英国引起宫廷神经过敏，以及与闻道貌岸然的英国贵族的家丑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7月14日

载于1854年7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42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马克思

*维也纳会议。——奥地利的公债。——杜耳塞和奥当奈尔的文告。——英国的内阁危机

1854年7月18日星期二于伦敦

7月13日在维也纳召开了在人员上同最近几次著名的会议稍有不同的会议。在这一天，奥地利首相布奥尔伯爵设宴招待俄国大使哥尔查科夫公爵，这位大使的任务是掩护多瑙河各公国的总司令哥尔查科夫公爵的立场。除了俄国使馆的personnel〔人员〕以外，出席宴会的有：在阿尔宁伯爵缺席时代表普鲁士的弗莱明伯爵、瑞典公使曼所巴赫将军，丹麦公使比列－布腊赫伯爵、荷兰公使德·赫克林先生、希腊国王的被流放的秘书德·温特兰德先生，还有比利时的全权代表和corps diplomatique〔外交团〕的团长奥修尔利万·德·格拉斯伯爵。总之，你们可以看到一大张公开在俄国旗帜下行动的人员的名单。其实班堡当然也派了代表[182]，不过没有把这些伟大的人物的名字列出来。

英国的官方报纸无法掩盖自己由于奥地利的停止科罗尼尼伯爵向瓦拉几亚推进的命令，以及由于送交巴黎和伦敦的急件（据这些急件说，俄国建议接受4月9日的议定书作为和谈的基础，但是附有一定条件）而产生的恶劣情绪。半官方的“奥地利通讯”认

为，尽管俄国的建议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是其中的确有值得西方强国注意的东西。“泰晤士报”、“纪事晨报”以及“观察家报”[183]聊以解嘲地说，这一切都是普鲁士的过错。如果还需要什么来加深宴会所产生的印象的话，那末俄国军队的重新部署就充分证明俄国是多么相信奥地利的意图。我们在“新普鲁士报”这一柏林的俄国 moniteur〔正式通报〕上，读到最近俄国军队在多瑙河各公国的调动的情形：

“按照哥尔查科夫公爵的指示，几天以前发布的全部命令都取消了。曾经命令从布加勒斯特撤走守备部队并且退出布加勒斯特；丹年别尔格将军应当在最近几天内同宪兵队一起离开该城，并且在福克夏尼设立后卫的大本营。按新的指示，现在应当守卫住沃耳特尼察—布加勒斯转—布泽乌河—福克夏尼这条战线。”

根据其他方面来的消息我们知道，俄国骑兵重新向阿留塔河左岸的斯塔提腊前进。撤离布加勒斯特的意图是多么认真，这可以从为了运出这个城市中的档案而采取的严格措施看出来，据说，档案里有一些使彼得哥弗宫廷名誉扫地的文件。

俄军的所有这些从表面上看来稀奇古怪、互相矛盾的行动，都是土耳其军队对外交谈判的不合时宜的干涉引起的。维也纳外交家先后作出的决定，都被土军在沃耳特尼察、切塔特和锡利斯特里亚的功勋推翻了，正像不久以前的外交阴谋被奥美尔－帕沙军队的全面推进打消了一样。

“那些狡猾的信口发誓的坏东西——那块耗子咬过的霉腐的陈年干酪奈斯托尔和那头狗狐乌利斯——定下的计策，简直不值一颗乌莓子！……所以那些希腊人都像野蛮人一样胡作非为起来，计策权谋把军誉一起搞坏了。”①

① 莎士比亚“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

要是星期六你在伦敦街头走走，就会听到所有的报贩子都在喊：

“英国、土耳其、法国军队在茹尔日沃大胜俄军，联军占领了布加勒斯特。”

当我谈到新内阁的危机问题的时候，你们慢慢就会弄清楚为什么会这么洋洋得意地发布消息。至于英法联军在茹尔日沃会战中的联合行动，我们根据7月4日瓦尔那来的邮件所提供的消息知道，兵营里没有“任何行动”。据7月13日维也纳的最后消息说，辅助部队正在沿经过苏姆拉的道路向鲁舒克迅速前进，法国的一个师于7月8日到达鲁舒克，英国的一个师直到7月9日才到那里。然而8日早晨4时结束的茹尔日沃会战是在7日拂晓开始的，在这天中午停止了几个小时以后一直继续到8日早晨。因此很明显，不论是法国军队或是英国军队，都没有能够参加战斗。土军发现有8门俄国加农炮坏了，于是立即在茹尔日沃周围挖战壕。尽管土军从鲁舒克及其附近岛屿发射了榴弹，但是城市本身并未遭受损失。在俄国军队撤退以后，奥美尔－帕沙发出通告，号召居民保持安宁，因为他们的城市再没有什么危险了。占领茹尔日沃的是很小的一支正规军，因为土军的主力都驻扎在城市四周以及多瑙河的三个岛上。奥美尔－帕沙驻在茹尔日沃，赛义德－帕沙驻在鲁舒克。土军控制了沿多瑙河左岸从茹尔日沃到沃耳特尼察的公路。

至于第二次会战（据说在这次会战后接着就会占领布加勒斯特），法国的“通报”自己说，不过是给茹尔日沃到布加勒斯特的路上的弗雷特什提附近的俄国后卫一个小小的挫折。“通报”补充说，英法25000人的一个军同土军汇合在一起，联军的兵力大约

有 6 万人；哥尔查科夫公爵率领了大致相等的兵力；可能发生决定布加勒斯特命运的大战。弗雷特什提是一个大约离茹尔日沃 12 英里、离布加勒斯特 30 英里的设防很差的据点。据“通报”说，这个地方的会战是在 7 月 11 日发生的，而据“辩论日报”184 说是在 7 月 14 日发生的。据说，俄军在这场战斗中有 700 人受伤，其中包括两名将军。

最近从君士坦丁堡到马赛的轮船带来消息说，英国“惊骇号”船占领了多瑙河的苏利纳河口。据说，“惊骇号”船进入停泊场，击毁了俄国的工事，打散了他们的守军，并且捉住了他们的司令官。我认为，这一消息还需要更可靠的消息加以证实。

英国报纸报道了一个连一家法国报纸都没有报道的传说，说什么莱昂斯海军上将在阿纳帕巡航，以便接应布律阿海军上将的远征，据说，布律阿的船上有 7000 人用于登陆。

君士坦丁堡的来信说，土耳其政府在英法大使提出意见后，看来已经同意立即恢复同希腊的贸易关系，条件如下：(1) 希腊必须在一定期限内支付军事费用并赔偿暴动者在最近造成的损失；(2) 希腊应在两个月内签订它一直拒绝的通商条约。在这一条约中，承认两国之间目前存在的边界。

没有波罗的海来的消息。“汉堡记者”对英国到芬兰海岸进行掠夺性远征的结果以及在芬兰人中造成的印象，作了如下的描述：

“据证实，俄国政府在布腊赫斯塔德和乌列阿博尔格焚毁以后，确信住在两个海湾沿岸的芬兰人的情感，命令把武器分发给有战斗能力的居民，使他们能够抵抗英国军队登陆的任何新尝试。已经批准立即成立两个芬兰猎兵营，每营为 1000 人，将在亚波、瓦查和乌列阿博尔格等地区招募。其他各省也应逐步编组类似的营。”

奥地利的公债正像我预言过的[1]，已经变成勒索。现在，这一公债应当完全由帝国各领地分摊。例如，上奥地利应当认购11500万弗罗伦，下奥地利应当认购1500万弗罗伦，维也纳应当认购250万弗罗伦，匈牙利应当认购7000万弗罗伦等等。如果说俄国皇帝没有为自己弄得什么，那他至少是促使其他国家的政府同臣民在财政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普鲁士人不得不在8月1日前缴纳提高了的所得税。波拿巴似乎也在计划再发行5亿法郎的公债，由于目前的葡萄和小麦的收成的情况以及已经到来的——特别是西班牙起义后在里昂——商业停滞，这次公债在法国将产生极为强烈的印象。联合内阁也打算让英国人掏一掏腰包，并且在最近一周内就要实行。

西班牙起义显然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可以从杜耳塞和奥当奈尔的文告中看出来；杜耳塞是埃斯帕特罗的拥护者，奥当奈尔是纳尔瓦艾斯的坚定信徒，也可能是克里斯亭娜女王的秘密的坚定信徒。奥当奈尔深信目前单靠宫廷革命不可能使西班牙各城市动起来，于是突然把自由派的原则拿出来作幌子。他的文告是在拉曼彻的离勒阿耳城不远的曼萨那累斯镇发表的。文告说，运动的目的是保存王位，但同时要排除权奸，严格遵守根本法，改进选举法和出版法，减轻税赋，文职按功提升，实行地方分权制并在广泛的基础上成立国民军。文告建议委托各省洪达[2]和马德里的议会大会审查各种法律。杜耳塞将军的文告是用更有力的词句写的。文告说：

“再没有什么进步派和温和派了。我们都是被1822年7月7日的人们的

① 见本卷第346—347页。——编者注

② 西班牙语，团体、会、委员会等意思。这里指委员会。——编者注

榜样鼓舞的西班牙人。恢复1837年的宪法，支持伊萨伯拉二世，终身流放女王的母亲，要现在的内阁辞职，恢复我国国内的和平——这些就是我们不惜任何代价极力追求的目的，并且我们要在战场上让叛徒们（他们的疯狂的罪行，我们一定要加以惩罚）知道这一点。”

据“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说，在马德里曾经查获了许多文件和信件，似乎它们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起义者的秘密目的是宣布王位虚悬，把伊比利安半岛合并成一个国家，建议把王冠让给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唐·彼得鲁五世。“泰晤士报”对于西班牙起义的令人感动的关心以及上面说到的唐·彼得鲁的来到英国，似乎都证明在事实上进行着一个新的科堡王族的阴谋。西班牙宫廷显得十分惊慌，因为已经试遍了各种各样的内阁的组合；曾经求助于伊斯土里斯以及马丁涅斯·德·拉·罗萨，但是没有结果。“贝云信使报”硬说，德·蒙太莫林伯爵收到起义的消息后立即离开了那不勒斯。

奥当奈尔到了安达鲁西亚，他的军队分三个纵队越过了摩勒纳山：一队经过拉—卡罗利纳，一队经过波索布郎科，一队经过德斯佩尼亚斯佩罗斯。“日报”承认，布塞塔上校突然占领了昆卡，因此起义军得以同瓦伦西亚取得联系。在这个省里，除了阿鲁拉（政府军在那里遭到了惨重失败）以外，目前起义还席卷了4个或5个城市。

有人又证实说，在雷乌斯和卡塔卢尼亚爆发了起义，而“贝云信使报”补充说，在阿腊贡也发生了混乱。

Aimes—tu le front sevère,
Du sa (i) ge Napoléon?
Aimes—tu que l'Angleterre,
T'oppose lord palmerston?

〔你喜欢英明的
拿破仑的严峻的脸孔？
你喜欢英国用帕麦斯顿勋爵来反对你？〕

在这首歌谣里，歌颂了离开加来的法国军队上船的情形。

从上星期六到星期一在伦敦一直是惶惶不安，因为要用帕麦斯顿来代替纽卡斯尔公爵的职务，以便真的用帕麦斯顿勋爵来反对沙皇。无论在政府阵营中或者在反对派阵营中，人们的心情都十分紧张。大家已经知道，新的陆军部的预算将在星期一晚上提交议院，有人要利用这一情况给联合内阁以毁灭性的打击，并把不败的帕麦斯顿安插到陆军部里去。

“星期六下午2点钟左右召开了内阁会议。大臣们直到3点才到会。除了外交大臣因谒见女王未能到会外，所有大臣都到了。克拉伦登勋爵直到4点才到他的同事们这里来。会议一直开到6点半钟，会后，阿伯丁勋爵立即到王宫去谒见女王陛下。”

从“先驱晨报”的这段令人不安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些“重大的”事件在托利党人中引起了多么大的希望。约翰·罗素勋爵在星期一把拥护他的人请到白厅[185]去，迪斯累里先生也召集了反对派议员。有179位绅士到了白厅，几乎是歇斯底里地预感到罗素将要向他们进行大揭露。他们十分可悲地受了议会中斯库伊尔斯[186]的欺骗，这个人冷淡地向他们宣称：因为摆在日程上的是对军事预算草案进行表决，他期望他们沉着行动：

“内阁很快又会需要钱来继续进行战争，因此，信任或者不信任联合内阁的问题，将在下周由议院表决财政问题的时候决定。”

既然没有让他与闻克拉伦登勋爵的秘密，他就无法告诉他们关于外交方面的情况。结果，罗素在这次会议上拯救了整个联合

内阁；要知道，如果信任要是由于陆军部的预算草案提出来的，那末失败就意味着帕麦斯顿对纽卡斯尔的胜利；然而，要是由于整个军事预算草案而投不信任票，这就会是托利党对联合的辉格党和皮尔派的胜利，——意外的情况当然完全是不能允许的。

因此，对陆军部的表决，是昨天晚间议院在十分平静、没有发生任何事故的情况下进行的，只有罗素和帕金顿说出了大量令人讨厌的关于目前军事指挥管理的状况的陈词滥调。

遗憾的是，女王顽固的反对使帕麦斯顿没有被安插到陆军部，因为把他安插到那里，就会使激进派现在还用来维护英国对外政策的最后一个欺骗性的借口破产。

当奥特韦先生在上星期五的下院会议上说，他打算把佩特曼博士的遭遇通知议院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他准备作随便什么解释，同时一切都会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然而，佩特曼博士在“晨报”上发表了一封信，这封信证明，虽然在其他方面他从来不是疯子，他仍然相信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宽宏大量，他恳求他们准他回德国，也就是做他们希望做的事。

所谓的激进派报纸的卑鄙的奴颜婢膝也在它对下面的这一空前的情况保持绝对沉默中表现出来：根据 lettre de cachet〔秘密拘票〕，活活葬送一个 18 岁的人，只不过因为他不幸知道了一点点关于王室的和贵族的某某人同德国女仆的暧昧关系。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7 月 18 日
载于 1854 年 8 月 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47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马克思

西班牙的革命。——土耳其和希腊

1854年7月21日星期五于伦敦

古老的加斯梯里亚谚语说：《Ne touchez pas à la Reine》（不要触犯女王）；然而，冒险家蒙尼奥斯夫人和她的女儿伊萨伯拉老早就越出了甚至赋予加斯梯里亚女王的一切权利，所以西班牙人民已经不再盲目忠诚了。

1843年的政变[187]持续了3个月，1854年的政变勉强超过了3个星期。内阁解散了，圣路易斯伯爵逃跑了，克里斯亭娜女王偷偷地跑向法国边界，而在马德里，无论军队或者城市居民，都表示反对政府。

从这一世纪初起，除了维护各省和各地方的特权的运动以外，西班牙北部各省周期地爆发的一切革命，都十分相似：在每一次宫廷阴谋之后，接着是军事叛乱，而军事叛乱必然引起地方的政变。这个现象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知道，人民的生活没有越出各行省的界限，因此在今天我们所说的国家的范围以内，军队是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抵抗宫廷的唯一力量。第二，西班牙的特殊形势和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188]造成了一些条件，使西班牙民族的一切富有生命力的力量只能集中在军队里。因此，民族情感的唯一表现（在1812年和1822年[189]）是出自军队；因此，民族的最积

极的部分总是把军队当作一切民族起义的自然工具。然而，在1830—1854年的动荡不安的年代，西班牙城市居民已经逐渐相信，军队已经不是为民族事业服务，而变成了那些竭力树立自己对宫廷的监督的野心勃勃的将军们进行竞争的工具。因此我们看到，1854年的运动甚至与1843年的运动也大不相同。人民对奥当奈尔将军的émeute〔叛乱〕有各种看法，就是没有把它当作反对宫廷统治势力的阴谋，何况这次叛乱是受到退职的宠臣塞拉诺的支持的。因此城市和农村都不肯响应马德里骑兵发出的号召；因此奥当奈尔将军为了不陷于孤立和遭到失败而不得不完全改变自己行动的性质。他不得不在自己的文告中提出同样是反对军队最高当局的三点：召开议会，成立节俭政府，组织国民军；最后一个要求是由于城市渴求恢复对军队的独立而来的。总之，军队起义只有服从人民起义所提出的条件，才能得到人民起义的支持，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且看，军队起义是否将不得已而保持对这些条件的忠诚并履行这些诺言。

除卡洛斯派[190]外，一切党派——进步派、1837年宪法拥护者、1812年宪法[191]拥护者、联合派（要求兼并葡萄牙的人）和共和派——都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对于有关共和派的消息，应该特别慎重，因为这些消息是经过巴黎警察当局的检查的。除各党派之间的斗争外，军人领袖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埃斯帕特罗一听到奥当奈尔取得胜利的消息，马上就离开了他在列加涅斯的避难所，而且宣布自己是运动的领袖。但是凯撒—纳尔瓦艾斯刚听到关于自己的老庞培的行动的消息，马上就表示他要为女王效劳；他的建议被接受了，纳尔瓦艾斯将组织新内阁。我在下面要谈到的细节将表明，军人远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掌握了主动权，相反地有

些地方他们不得不向不可遏止的人民压力让步。

除了我在前一篇文章①中谈到的瓦伦西亚的政变外，在阿利康特也发生过政变。在安达鲁西亚的格拉纳达、塞维尔、哈安发生过政变。在旧加斯梯里亚的布尔果斯发生过；在累翁的伐利亚多利德发生过；在比斯开的圣塞瓦斯田和维多利亚发生过；在纳瓦腊的托洛萨和潘普洛纳发生过；在阿拉贡的萨拉哥沙发生过；在卡塔卢尼亚的巴塞罗纳、塔腊果纳、列里达和赫罗纳发生过；据说在巴利阿里群岛也发生过政变。据卡塔黑纳7月12日来信说，木尔西亚也将发生政变，信中说：

> “根据当地军事总督发布的bando〔命令〕，卡塔黑纳有枪和其他武器的居民，都必须在24小时内把武器送交民政当局。根据法国领事的请求，已准许居住在该地的法国人援引1848年的先例把武器交给领事馆。”

在所有这些政变中，只有四处值得谈一谈，这就是：比斯开的圣塞瓦斯田的政变，卡塔卢尼亚首府巴塞罗纳的政变，阿拉贡首府萨拉哥沙的政变和马德里的政变。

在比斯开，政变是自治机关发动的；在阿拉贡，是军人发动的。当响起要求武装人民的声音时，圣塞瓦斯田的自治机关已经决心支持起义。城市立即武装起来。直到7月17日，还没有说服两营驻军站到人民这一边来。但是在城市居民和军人联合起来以后，有1000名武装市民在一些军队协助下向潘普洛纳进发并且在纳瓦腊组织起义。正是圣塞瓦斯田的武装市民的来到，支援了纳瓦腊首府的起义。萨巴拉将军稍迟也参加了运动并动身去贝云，号召不久前在萨拉哥沙遭到失败而逃到那里去的哥多瓦团的兵士和

① 见本卷第365页。——编者注

军官马上回到祖国来，到圣塞瓦斯田同他汇合。据一些消息说，后来他到马德里去投效埃斯帕特罗；同时另一些消息说，他到了萨拉哥沙，目的是同阿拉贡的起义军汇合。巴斯克各省的司令官马萨尔雷多将军拒绝参加维多利亚的政变，被迫跑到法国去了。萨巴拉将军的军队共有波旁团的两个营和一营马骑兵，一队骑兵。在叙述巴斯克各省的事件的结尾，我要告诉读者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吉普斯科阿省总督任命的巴腊斯帖基准将，是埃斯帕特罗过去的副官之一。

在巴塞罗纳，政变显然是由军人发动的，但是根据我另外得到的消息判断，说这次发动政变完全出于自愿是很可怀疑的。7月13日下午7点，驻扎在圣普艾勃洛兵营和布恩-苏塞索兵营的兵士，受到人民示威提出的要求的影响，宣布了政变，口号是：Vive la Reine! Vive la Constitution!〔女王万岁！宪法万岁！〕处死大臣！打倒克里斯亭娜！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并且同群众一起沿河堤前进的兵士，停在宪法广场上。由于不被统帅部信任而在最近6天内被禁止离开巴塞罗奈塔的骑兵也宣布了政变。从这时起，全部驻军就都转到人民方面来了，当局采取任何抵抗都已经不可能。在整个压力之下，军事总督马尔切西将军到10点钟也让步了；而在深夜，卡塔卢尼亚军区司令官也宣布他决心参加运动。他到了地方自治机关广场并且向聚集在那里的人民发表演说。7月18日组成了洪达，参加洪达的有军区司令官和其他著名人士，提出的口号是："宪法、女王、道德"。后来从巴塞罗纳传来的消息说，根据新当局的命令，有几名工人因为破坏机器、侵占财产被枪决了；又说在邻近城市开会的共和派委员会委员被逮捕了；不过不应忘记，所有这些消息都是经"十二月二日政府"之手发出来的[192]，而

这个政府的使命就是诬蔑工人和共和派。

在萨拉哥沙，据说政变是军人发动的，然而这个说法被另外的消息推翻了，这个消息说这里已经着手组织国民军团。无论如何大家都知道，而且连马德里“日报”也承认，在萨拉哥沙政变发生前，蒙托斯骑兵团的150名兵士，在去马德里而在托列杭（离马德里5西班牙里①）宿营的时候举行了起义，离开了他们的指挥官，这些指挥官在7月13日晚上带了该团的辎重到了马德里。兵士们在上尉巴腊伊班的命令下骑上马，沿着去威特的道路前进，据估计，他们企图在昆卡同布塞塔上校的队伍汇合。至于说到马德里（似乎率领“中部军队”的埃斯帕特罗和率领北部军队的萨巴拉都是反对它的），那末这个靠宫廷过活的城市为什么最后参加起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日报”早在7月15日就发表了陆军大臣的公报，公报硬说，叛军正在逃跑，军队的忠诚和热情正在增长。圣路易斯伯爵对马德里形势的估计看来是很正确的，他曾对工人说，奥当奈尔将军和无政府主义者会使他们失掉任何工作，而政府如果胜利，将使全体工人都有社会工作，每天工资6雷阿耳②（0.75美元）。圣路易斯想用这个花招把最容易煽动的一部分马德里居民召募到自己的旗帜下来。然而他的行动也像1848年巴黎“国民报”派的行动[193]那样顺利。他用这个方法获得的同盟者，不久就变成了他的最危险的敌人，因为用于付给他们工资的资金只够用6天。拉腊将军（总督）的禁止散布任何关于起义胜利的消息的文告表明，政府是多么害怕首都发生政变。再有，布拉塞将军的策略看来只限于竭力防止起义者同军队有任何接触，以免

① 西班牙里等于4.83公里。——编者注

② 西班牙古代银币。——译者注

疫病侵入军队。据说，奥当奈尔将军最初的计划预定在极便于骑兵行动的拉曼彻平原同政府军遭遇。然而同安达鲁西亚的几个主要城市保持联系的前宠臣塞拉诺的来到，迫使他放弃了这个计划。这时立宪派的军队决定离开拉曼彻到哈安和塞维尔去。

我们要 en passant〔顺便〕指出，布拉塞将军的 boletinos〔公报〕很像受到弗朗斯瓦一世嘲笑的十六世纪西班牙将军的勤务命令，很像受弗里德里希大帝讥笑过的十八世纪的命令。

很明显，这次西班牙的起义一定会成为英法政府分歧的原因；一家法国报纸说，奥当奈尔将军在起义以前曾藏在英国大使官邸，这个消息未必会缓和波拿巴对英国的不信任。在波拿巴和维多利亚之间已经积下一大堆恼人的事情。波拿巴希望在他的军队在加来上船的时候能同女王会晤，可是女王陛下对这个希望的回答是：这一天她要拜访前王后阿梅莉亚。此外，当英国大臣们在议会中被质问为什么没有在白海、黑海、阿速夫海进行封锁的时候，他们把同法国结盟当作辩护的借口。波拿巴对这一点的答复是在“通报”上宣布封锁上述几个海面，而不等得到英国的正式同意。此外，因为法国军队搭乘的完全是英国船，在法国引起了很不好的印象，所以波拿巴公布了指定用于这一目的的法国船只的名单，而且使用了这些船。

土耳其政府交给四大盟国的代表一份关于许可希腊商船重新进入土耳其港湾的照会。这次许可的有效期为两个月，条件就是希腊政府没有任何可能使土耳其政府取消这种许可的行动。如果在这个期限内，希腊政府没有给土耳其得到应分的满足，土耳其政府有权恢复目前的 status quo〔状态〕。希腊船只在土耳其港湾将服从地方当局的命令，而且不能向其他国家申请保护。在两个

月内应订出缔结协定和通商条约的基本原则。土耳其政府由于在希腊人暴动中受到巨大损失而要求的赔款数目，应该由仲裁法庭根据在各地进行调查的委员会的报告确定，委员会将由法国人、英国人、土耳其人、希腊人组成。

沙米尔从土耳其政府正式得到了切尔克斯和格鲁吉亚军团大元帅的称号。

在法军中服务的三个译员在瓦尔那被枪决，因为发现他们同俄国人有联系。其中两个是希腊人，一个是阿尔明尼亚人。在处决前，其中有一个吞下了破坏声誉的文件。

7 月 16 日，有人从海尔曼施塔得告诉我们，在弗雷特什提区还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关于联军到达鲁舒克的消息，当然是虚构的。在现在的条件下，联军的任务只限于阻止得胜的土军的——用“泰晤士报”的说法——野蛮的残暴行为。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7 月 21 日

载于 1854 年 8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48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议会的战争辩论

1854年7月25日星期二于伦敦

在上星期五晚间举行的下院会议上，给·罗素勋爵在答复迪斯累里先生的质询时声称，女王陛下曾有意下令解散议院，因此，他打算在星期一提出投票表决300万英镑拨款的提案；召开筹款委员会是没有必要的。约翰勋爵没有答复迪斯累里先生提出的关于今年议会秋季会议是否举行的问题。请拨的款项在昨天举行的两院会议上分别被一致通过。

在上院，阿伯丁勋爵为拨款作了辩解，这次发言是在他担任首相以来使我们饱尝耳福的一切发言中最短、最枯燥无味的一次。他说，他不能不申请300万，并且他确信勋爵们不会表示异议。他们在看法上可能有分歧，但是他们有一点应该是一致的，这就是“必须赞同一切最能导致战争早日顺利结束的措施”。为此目的，首先要求“英法同其他强国共同作出积极的顽强的努力”。阿伯丁勋爵没有说明他所说的是否指军事或外交的努力；他甚至没有把俄国排出于英国和法国应当与之共同行动的“其他强国”之外。由于议会即将解散，保证政府有钱用尤其重要。也许在高贵的勋爵当中有人宁肯把钱托付给别人，而不愿意托付给他，然而这种使气任性的愿望不应该在讨论事情的地方产生。问题，而且是刻不

容缓的问题，就在于对300万英镑进行表决。

一向以信口开河这种特殊的天才著称的埃伦伯勒伯爵“认为，现在是建议政府在与战争无关的一切民政管理部门中厉行节约的大好机会”。

哈德威克伯爵认为，在波罗的海有一支准备应付任何意外情况的极其强大的舰队，在黑海也有这样一支舰队，而且是过去从英国海岸出发的所有远征军中人数最多的一支舰队。他不知道政府打算怎样使用这些兵力，所以他呼吁所有的高贵的勋爵批准所要求的拨款。

在野的辉格党人菲茨威廉伯爵反对“似乎我国在所有欧洲国家中税负最重的说法；相反地，应该说，我国人民的税负比欧洲集团的其他任何部分都轻得多”。如果高贵的勋爵的这番话说的是勋爵们，而不是人民，那他是说对了。“至于说到我的那位领导政府的高贵的同事的讲话”，那末，从来还没有在类似的场合发表过一次讲话可以使“人们有充分的根据说，它几乎没有向议院提供任何一个新的思想”，而高贵的勋爵应当清楚地知道，议院在思想方面的要求是怎样的。菲茨威廉伯爵想从阿伯丁勋爵那里了解到，他如此热心于与之共同行动的“其他强国”是哪些国家？也许是奥地利？他担心的是，这个国家会怂恿英国政府认定撤出多瑙河各公国或多瑙河的航行自由这类次要问题可以成为签订和约的充分理由。(这种担心是可笑的，因为，自然没有人会怂恿阿伯丁勋爵提出这样过分的要求。)伯爵还想知道，应当怎样理解土耳其的完整？是把这个术语理解为阿德里安堡条约呢，还是理解为其他什么东西？最后，他指出，议院处于非常奇怪的地位，因为议会没有得到任何有关政府意图的消息。由于所有这些考虑，他将投

票赞成拨款。

随着就任内阁职务的希望日益渺茫而心情也日益忧郁的克兰里卡德侯爵，要求哪怕多少解释一下从呈请上述拨款以来已取得哪些成就和已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以报答他至今对政府所表现的无比的容忍；他希望多少知道一点关于战争的条件和前途，本国与盟国的相互关系。已取得某些成就的是土耳其人，而不是不列颠政府和不列颠的武器，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去吹嘘波罗的海和黑海的英国水兵的英勇精神。至于与盟国的关系，他打算提出关于公布土耳其和奥地利最近签订的条约，以及其他有助于阐明当前形势的文件的建议。

“从广泛流行的一些传说中可以看出，由于不列颠政府的压力和坚持，御前会议和土耳其公使不久前同奥地利签订了协议，虽然御前会议以前反对这样做。根据协议，奥地利军队应当开进多瑙河各公国并占领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

奥地利在千钧一发之际不是从速调动军队，反而放弃这一做法并开始新的谈判，这是怎么回事呢？发言人还希望知道维也纳会议是否还在继续和会上正讨论些什么问题。总而言之，他认为英国过分依赖德意志强国了。

为了证明奥地利“应当”是最好的盟国，克拉伦登勋爵指出了俄国正在包围奥地利的一些领土并对它进行恐吓等情况。奥土条约还不可能提交议院，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该条约的批准书。克拉伦登勋爵认为，使议院相信奥地利同英国采取共同行动的时候已经不远这一点是可能的，“但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打保票”。不过从对奥地利的总的评价和克拉伦登掌管外交部的事实来看，高贵的勋爵们是可以做出最令人快慰的结论的。克拉伦登勋

爵曾因散布最无耻的谎言两次被人揭穿，现在自然期望人们绝对相信他这样的声明：

“政府无意恢复 status quo〔状态〕，也无意满足于仓猝达到的和平，这种和平只不过是一种糟糕的休战，它将使新的战争成为不可避免。”

勋爵们为了显示他们本身的高度文化教养的辉煌范例，自然要把话题扯到国民教育的问题上去——在这一点上我们跟他们告别了。

在上院进行辩论期间，下院在讨论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直到获悉阿伯丁勋爵发表的给人留下“不愉快的印象”的演说的消息才结束。约翰·罗素勋爵立刻感觉到有必要造成一种相反的印象。

当政府打算要求第一次特别追加拨款时，它调动了“威武壮观的”波罗的海舰队；著名的炮击敖德萨事件，则是要求第二次追加拨款的理由；现在被选作口令的是塞瓦斯托波尔。

约翰勋爵首先对议院在慷慨支持政府第一次请求追加拨款时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了应有的赞扬，并对议院至今没有给政府制造难题这一点表示感谢。这就有可能获得许许多多的东西，即保证有大批船只和人员。英国现在拥有 17 艘一、二、三级蒸汽舰，17 艘帆力战列舰和 57200 名海军人员，而在 1853 年 1 月 1 日以前，只有 1 艘蒸汽舰，11 艘帆力战列舰，33910 名海军人员。此外，在土耳其沿岸地区还有一个有三万多名兵士的军登陆，“其中许多人不久前驻扎在瓦尔那”。这就是当时的军事力量。至于军事行动，它们还

“刚刚开始，而目前只能说土耳其军队完成了勇敢精神的奇迹。现在谁也不会说，俄皇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打垮整个奥斯曼强国。除了土军的辉煌功绩之外，法英两国军队的完全协调一致是这次战争的光荣”。

接着，约翰勋爵转到请拨的款项问题，他说，他不可能向议员们确切地说明什么地方需要款项。军需、炮兵和交通运输需要二百来万；此外，土耳其军队的一个庞大的分队可能并入不列颠军队，它的给养将由不列颠政府负担。而总的说来，请求议院拨款不是根据什么详细的预算，而是供政府“不时之需”。

高贵的勋爵说，奥地利甚至比法国或英国更关心保卫土耳其。沙皇确立了他对多瑙河各公国的统治并在土耳其赢得了占优势的影响以后，就会使奥地利政府完全屈从于自己。但是，为了正确地评判奥地利，必须记住它所处的困难条件是什么。俄军可以在好几个地点逼近奥地利首都，而另一方面，在一些属于奥地利的地区情况相当不安，如果参战，那对奥地利来说是很危险的。因此，只要有可能，它是会力求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不久前，它曾给俄皇发出一份照会，俄皇的答复不能说是含糊其词的。

“第一，俄国不准备规定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期限。它认为，一旦宣战，一旦英国和法国参战，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兵力就超过了俄国，而俄国舰队又离不开本国的港口，那末作为战区的依然只有多瑙河各公国和多瑙河航道，在这里俄国可以指望重建均势并以它的武器的长处取得胜利。因此，它拒绝在这样的条件下撤出多瑙河各公国。”

除了允许土耳其加入欧洲强国体系这一项以外，俄国曾经愿意接受4月9日的议定书中所陈述的原则。至于说奥地利下一步的行动，约翰勋爵认为它目前的政策是错误的，同时他不相信它会背弃它所承担的义务。根据与西方强国和土耳其签订的这些义务，奥地利必须参与反击俄国的努力。然而，它也许企图重新获得圣彼得堡的更为有利的答复。盟国当然不能控制奥地利政府机关，同样，奥地利也不能控制普鲁士国王。由此可见，对所有强

国，来说，存在着共同进攻俄国的最有利的条件。

然后，约翰勋爵又详尽地，兴高彩烈地来叙述英国和法国打算采取的措施。土耳其的完整同恢复多瑙河各公国的 status quo〔状态〕是不相容的。约翰勋爵说：

“然而，阁下，俄国的阵地还从另一方面威胁着土耳其的独立和完整。我指的是一个坚固要塞的建立，这个要塞构筑得十分内行，是目前军事学术难以攻克的，而且在它的港口还有一支准备随时顺风开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最大的战列舰舰队。我认为这种形势对土耳其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致任何和约只要给俄皇保留这个威胁性阵地都不可能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热烈鼓掌)像以往一样，今后我们还准备跟法国政府讨论这个问题，并且我有一切理由认为，法皇政府在这一点上同我们是完全一致的。”(鼓掌)

关于迪斯累里先生的秋季会议的提案，约翰勋爵说，他“拒绝接受这个院的成员提出的任何限制大臣们自由的条件”。

如果一一转述休谟、班克斯、奈特、阿耳科克和 tutti quanti〔他们一流〕就这个问题发表的全部看法，是令人厌倦的，也是多余的。

科布顿先生听信了约翰勋爵的话并且以为他把议院变成了军事委员会，所以竭力设法说明为什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里木。他提出英国是否和一些反人民的政府结成了同盟的问题，也就触及一个更有趣味的议题；人们以为战争似乎是用来保卫被压迫民族的，是大错了；实际上，战争是为了使束缚匈牙利和意大利于奥地利统治之下的锁链更加牢靠。议院里有一些可尊敬的但是被弄糊涂了的议员，他们

“说，政府没有很好地进行战争，政府应当指派另外的人来领导军事部门，甚至有时有人说——来领导政府。他们认为这个人就是帕麦斯顿勋爵。这一切做法似乎是为了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利益。可是，发言人从匈牙利和意大利人民的两个最伟大的领袖的言论中听到，他们不仅不把希望寄托在这

位勋爵身上，相反地，他们知道，当他有可能给予他们以道义上的支持的时候，他甚至不肯以弹指之力来维护他们。如果说英国现政府里有一个人是这两位领袖最不信任的人，那末这个人正是高贵的勋爵。科布顿不认为高贵的勋爵觉察到以他的名义制造的大骗局，幸而，现在迷惑已经消散了”。

累亚德先生和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只是重复了他们以前的发言；达德利勋爵仅仅补充了一句话，说他现在对“帕麦斯顿”这个名字的魔力的信仰“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定”。

迪斯累里先生轻轻一吹就把约翰勋爵的言论的肥皂泡吹破了。他引用西诺普会战和去年秋季休假期间发生的其他壮举简要地论证了他关于秋季会议的建议，接着他说，关于即将摧毁塞瓦斯托波尔和占领克里木的消息使他感到异常惊奇和惶恐不安。约翰勋爵坐在座位上辩驳了几句；而迪斯累里先生也坐着硬要他解释清楚。于是，约翰勋爵用小心翼翼的腼腆的声调说：

“我只能说我刚才所说过的话：依我之见，不能容许俄国再继续保持它所占领的那个威胁性的阵地，在塞瓦斯托波尔拥有这样庞大的舰队。”

一听到约翰勋爵的这番供认，迪斯界里先生就猛然起来作了一番最尖酸刻薄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值得 in extenso〔全部〕读一遍。他用下面这段话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真的，我们听了这番话以后，如果还把阿伯丁勋爵的政策和他的一些同僚的政策精细地区分开来——正像人们所做的那样——那是很不公正的。我不崇拜，也不拥护阿伯丁勋爵，然而我也不崇拜那种认为必须牺牲一些阁员来保全另一些阁员的议会政治。在刚才这位高贵的勋爵就他所说过的话作了解释之后，可以看出，他在俄国问题上的政策本质上和阿伯丁勋爵的政策毫无区别，而这一点终究会使英国人民感到有些满意。就是说，我们内阁里没有分歧；这次会议至少可以在大臣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的情况下结束。可见，作战应当为了渺小的目的，伟大的政治意图必定导致毫无价值的、

微不足道的结果，在这一点上联合政府是一致的。”

帕麦斯顿勋爵的诙谐没有产生任何印象。在迪斯累里先生讲话和其他许多声称自己曾被约翰勋爵的第一次发言弄糊涂了的下院议员发言之后，请求拨款的提案被批准了，但附带一个条件：辩论今晚将继续进行。同时，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宣布，他打算上奏女王，“请求陛下在她能够向议院提供关于同其他强国的相互关系，以及陛下在她被卷入的斗争中的看法和计划的更全面的情报以前，解散议会的措施暂缓执行”。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7月25日
载于1854年8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50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奥地利的政策。——下院的战争辩论

1854年7月28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①中，已经向你们分析了6月14日的奥土条约，并且指出，这个有趣的外交勾当的目的在于：第一，给联军不渡过多瑙河和不跟俄军接触提供借口；第二，阻挠土军重新占领整个瓦拉几亚并把他们从已占领的瓦拉几亚的部分领土上挤走；第三，在多瑙河各公国恢复俄国曾于1848年强加于罗马尼亚人的旧的反动制度。现在我们果然从君士坦丁堡方面得知，奥地利已经声明抗议奥美尔－帕沙渡过多瑙河的意图；它要求取得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的专有权利和封闭不仅是英法军队，甚至包括土军进入该地的通道的权利。为答复这项抗议，土耳其政府似乎已经命令奥美尔－帕沙目前不要渡过多瑙河，但是原则上拒绝承认奥地利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的专有权利；从自己的老师和保护者帕麦斯顿勋爵那里学会了一点东西的不幸的列施德－帕沙，当然不会认真反对这种做法：实际上容许那些被他在原则上拒绝的事情。可以认为，奥地利已经破坏了并在事实上废除了6月14日的条约，因为在俄军向三个方向溃退，并且没有立即退到塞勒特河

① 见本卷第326—327页。——编者注

左岸而把翼侧和后方暴露在奥地利的攻击面前的时刻，奥地利并没有进入瓦拉几亚。但是应当想到，根据这个著名的条约的条款，奥地利既没有义务立刻进入多瑙河各公国，也没有义务在一定期限内肃清多瑙河各公国的敌人，甚至没有义务迫使俄国人在规定的某一期限内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现在有消息说，奥地利人的确正在进入小瓦拉几亚，而俄国人正在把自己的军队调离喀尔巴阡山的山口并在福克夏尼集中。但是，这只是说明奥地利不是在把俄国人挤出大瓦拉几亚，而是决定把土耳其人驱逐出小瓦拉几亚并且用这种方式来阻碍他们在阿留塔河两岸的活动。当时除非使土耳其军队撤离它所占领的地区并由英法军队（他们尽力避免同俄军冲突，并使土耳其几乎处于被包围状态）来占领保加利亚，想不出更好的计划以引起土耳其军队内部的暴动了。这一点从英法统帅部联合告保加利亚居民书中可以明显看出来。这个告居民书几乎是从布德贝尔格、哥尔查科夫和 tutti quanti〔他们一流〕那里逐字抄来的。我早已向你们预言过，西方强国将为进步事业效一次劳——它们使土耳其这个衰老的欧洲制度的基石革命化起来。

奥地利不仅反对土耳其人占领土耳其地区的意向，而且要求恢复现在居住在维也纳的两位国君的权利；冯·布鲁克先生通知土耳其政府，两位国君应当同奥地利军队返回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列施德－帕沙答复说，土耳其政府将讨论恢复两位国君的权利到什么程度适宜的问题，但冯·布鲁克先生坚持要履行条约的第三条即恢复旧政府。读者们或许还记得，我曾请诸位注意这项条款[①]的模棱两可的措词。列施德－帕沙反对说，在土耳其政府

① 见本卷第327页。——编者注

确信这两位国君没有违背他们的效忠苏丹的责任以前，不可能恢复他们的权利。土耳其政府对莫尔达维亚国君吉卡并不十分反对，但是瓦拉几亚国君施梯尔贝的行为曾经具有强烈的挑衅性质：他曾以最可耻的方式表示支持俄国，所以土耳其政府非驱逐他不可。于是，布鲁克先生便请苏丹作主。后者召开了非常会议，制订出一个折衷方案。这个方案规定两个国君**暂时**复位，而土耳其政府任命一个高级专员负责调查他们的行动，然后再作最后决定。列施德并不十分反对的国君吉卡重新掌政自然只是名义上的，因为莫尔达维亚仍在俄国人的手中。相反地，被土耳其政府亲自赶走并被斥骂为俄国代理人的国君施梯尔贝的复位却是真正的现实，因为俄国人已经撤出了瓦拉几亚的一部分领土，其余部分看来也将很快撤出。

可是，奥地利的外交活动并不只这一些。我们在昨日的“晨邮报”上看到一则 7 月 19 日的贝尔格莱德电讯：

“昨日从君士坦丁堡接到立即停止进一步武装和一切军事演习的命令。据私下透露，下一个命令就是裁军。这些消息立即被转告给亚历山大公爵。”

看来，这就是土耳其政府对于塞尔维亚抗议奥地利占领的答复。不幸的土耳其政府就这样失去抗击它的公开的敌人的可能性，同时卷入对它自己忠实的藩属的敌对的篡夺活动中。土耳其政府用 6 月 14 日的条约撕毁了它同多瑙河各公国的协定，而用裁军的命令破坏了塞尔维亚的根本法。同一个政治上的步骤既使土耳其军队内部有发生叛乱的危险，又把塞尔维亚和多瑙河各公国推向俄国的怀抱。奥地利的要求撤出多瑙河各公国变成土耳其人的被禁入这两个公国，而奥地利的声名狼籍的备战却变成塞尔维亚的裁军。

愚蠢的奥地利，既然成了沙皇和他的英国同谋者手中的简单工具，也就不过是准备着使它本身成为第一个牺牲品的普遍革命的因素，对这个革命的到来，只有戴维·乌尔卡尔特之流空想主义反动分子会感到懊丧的。

读者已经知道在意大利已经开始了的运动。报纸正在报道热那亚、摩地那和帕尔马等地的风潮。但是，依我看，费拉拉发生的事件比其他一切事件更像1848年的普遍起义。

我一开始就对傲慢的和遭到破产的奥地利政府发行的“爱国自愿”公债作了正确的分析，这一点读者会从布尔格尔男爵不久前的告伦巴第臣民书中看出来。告臣民书宣布，伦巴第应摊的自愿公债规定为4000万弗罗伦，相当于10440万法郎；如果按人口分摊，每人摊到40法郎。

“同盟报”写道：“这个自愿公债正在变成庞大的军税：每个省，每个自治机关，每个人都**应当自愿**支付规定的一份。”

为了使人对这种“自愿”公债的真正性质不再存在任何怀疑，布尔格尔男爵的告臣民书最后说：

“每个人都必须明白，如自愿公债失败，那就要征收特别的强制军税。这种军税将以适当方式从土地、资本、商业和工业的各项收入中征收。”

在星期一的下院会议上枢密院院长兼下院领袖[①]发了言，仿佛是要详尽地陈述内阁的意图，可是6个小时之后，发生了一件议会史上空前罕见的事实——他就在同一个地方把他所讲过的话完全收回了。晚上7时他宣布：遭到炮击的塞瓦斯托波尔已经被摧毁并且已经从俄国手中夺下；午夜1时15分，他宣布俄国舰队

① 即约翰·罗素。——编者注

在塞瓦斯托波尔损失了一艘或两艘战列舰，而“目前俄国依然保持着它的威望和地位”。6小时内，小约翰①在下院议员面前骂人、摆架子、吹牛皮、喧嚷、胡闹、道贺和瞎扯。在6小时的过程中，他强使议员们在云雾中漫游，但是，只要迪斯累里先生寥寥几句尖刻话，就把这个肥皂泡捅破了，使假狮子不得不重新把习常的小羊皮披在自己的肩上。对内阁来说，这是一个“耻辱日”，但是它实现了它的300万英镑的提案。

星期二的会议就斯图亚特勋爵的延期解散议会的提案进行了辩论。拨款案已经表决批准了；除了对内阁的信任案进行表决外，还有什么可做呢？因为极可尊敬的议员们完全了解这一切，所以出席会议的议员不多，辩论冷冷清清，内阁比任何时候都嚣张，而达德利·斯图亚特的提案被一致否决了。内阁巧妙地把它自己的耻辱变成对下院议员的胜利。这对议会来说是一个“耻辱日”。不过，由于沃龙佐夫的内兄弟不列颠军务大臣赫伯特先生所代表的军事部门的辩护，由于海军部部务委员贝克莱的狂妄自大和由于小约翰关于英国内阁的内部情况的傲慢的激昂慷慨的讲话，会议还是值得注意的。

从前的“年轻的托利党人”，长着一个漂亮的小脑袋瓜儿的赫伯特先生，用对军需长官菲耳德的赞扬来答复人们对不能令人满意的军需机构的抱怨。他说菲耳德这个人无疑是最适合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因为50年前他曾得到“铁公爵”②的信任并在他手下担任过很高的职位。赫伯特先生用“军队的最好的军需官”的经过粉饰的报告和一些法国军官的言不由衷的恭维话来驳斥报纸记者

① 即约翰·罗素。——编者注

② 即威灵顿。——编者注

们的令人不快的通讯。他只字不提军队完全没有运输工具，军队里没有骡子，也没有马来运输军队从瓦尔那和迭夫尼亚向多瑙河转移时所必需的行李和用水以及其他许多行军时所必需的东西。他只字不提缺乏购买军粮的经费。他不反驳这样一个事实：军需部只是在许多师出发之后和舰队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后才成立的。他不敢反驳这种说法：据腊格伦勋爵本人说，由于军需部工作的糟糕，他的军队在两个月内一直停在一个地方无法前进，虽然他们在同饿得精疲力尽的敌人的距离几乎只有相当一炮的射程。

沃龙佐夫公爵的能找窍门的内兄弟也以同样的手法答复了对于炮队的装备的抱怨。他冗长地答复了他本人提出的指责，即在土耳其的军队中只有一些六磅的火炮。可是他竭力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军队里没有攻城炮，几乎没有骑兵这个在瓦拉几亚平原作战最必需的兵种来支援步兵，在瓦尔那一个4万人的军团甚至不能配备40门火炮去对付俄军，而俄军的一个4万人的军却拥有120门火炮。

沃龙佐夫的内兄弟在回答对政府供应军队必需的战斗装具方面所表现的漫不经心提出的指责时，令人气愤地为统帅部辩护，似乎后者是无可非议的。

至于不幸事件和英国人对这些意外事件（在法国远征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意外事件）的垄断，极可尊敬的赫伯特先生宣称，第一，的确有一只载运第六龙骑兵团的部分人员的船成了火灾的牺牲品，然而，船长，“一个高贵的老水手，在面临人们所能遇到的最可怕的死亡时，却不顾船员们的请求，拒绝离船。可惜呀！当时离船还不算迟，他终于殉职了”。受愚弄的下院议员们以赞同的呼声迎接了这种毫无意思的回答。至于“老虎号”的损失[194]，

应当算为意外事件。“而波罗的海上的可悲事件，——呶，它只能说明我国水兵的有勇无谋”。

然后，长着漂亮的小脑袋瓜儿的先生转到向他提出的问题：“我国海军和我国陆军是否取得了什么实际的结果?”他吹嘘了一番“对俄国港口的全面的、成功的和无法突破的封锁”。这一封锁是如此成功，以致，例如，有8艘俄国军舰虽然遭到炮击，经历了战斗和重重困难，仍然从塞瓦斯托波尔到达了敖德萨。这一封锁是如此成功，以致俄国在波罗的海上的贸易继续在大规模进行，俄国商品仍然在伦敦出售，只是价格略高于战前；敖德萨完全跟去年一样在进行贸易，甚至对黑海和白海的名义上的封锁还是几天以前由波拿巴强迫英国人去做的。

然而，姓赫伯特的高贵的年轻人断言，英国政府作过的事还要多。难道英国政府没有使俄国无法利用黑海运送增援部队，没有切断俄国出海的一切通道吗？不过他完全忘记了，英国政府在4个月中让俄国人控制了多瑙河；它让俄国人仅用15000人就占领了欧洲的谷仓——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夺走了就在它眼前的多布鲁甲的丰富牧群，它阻挠土耳其舰队消灭西诺普附近的俄国舰队。英国人对土耳其人的军事胜利给了不小帮助，因为他们既是土耳其军队的预备部队，也就给了土耳其军队利用每个兵士和每门火炮以对付入侵军队的可能性。

需不需要提醒读者，当俄国人还没有能够在两个公国集结优势兵力的时候，英国政府却阻止奥美尔－帕沙利用他的军队的数量上的优势和最初的胜利成果？英国军队还干了些什么呢？

“俄国在构筑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的堡垒线上花了多少英镑？可是在一个短暂的战局中，所有这些像一条链子锁住切尔克西亚的坚固要塞，除了一

个堡垒之外，都落入了英国人或他们的盟国的手中。”

沃龙佐夫！沃龙佐夫！难道你忘记了，当人们在会议一开始就建议你攻占这些堡垒的时候，你拒绝这样做，也就使俄军能够把这些堡垒的守军移到塞瓦斯托波尔？你所占领的仅是俄军自己打算放弃的那些堡垒，而唯一没有摧毁、也没有占领、甚至没有去进攻的“例外”，正好是唯一值得占领的、并且俄军认为应当守住的堡垒，是唯一打通同切尔克斯人联系的堡垒——阿纳帕。

赫伯特先生的庸俗的饶舌达到了顶点，他说，英国参加了光荣的锡利斯特里亚保卫战（这次保卫战不仅英国自己不支持，而且还不许奥美尔－帕沙支持），因为在阵亡者中有一个叫巴特勒上尉的年轻人。关于活着的奈斯密斯中尉，当然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应当说，巴特勒上尉仅仅在政府拒绝派他到锡利斯特里亚以后才到那里的，因而赫伯特元帅现在尤其有一切理由称赞他的行动方式。至于说奈斯密斯中尉，他是属于那种即将被逐出英国兵营的人物，而且他是以战地记者的身分到锡利斯特里亚的。

由于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攻击政府没有购置吃水量在3英尺以下并装备一两门重炮的蒸汽舰，在赫伯特将军之后发言的贝克莱海军上将就请高贵的勋爵“教会造般督察如何建造这样的船只”。这就是辉格党的英勇的海军上将对于海军部如不保证建造大量炮艇，能否装备一支用在波罗的海作战的舰队的问题的答复。英勇的贝克莱和他的学识渊博的造船督察与其向一无所知的令人发笑的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讨主意，还不如求教于瑞典和俄国的海军部。

我们不再谈文雅的赫伯特和英勇的贝克莱为不列颠统帅部所作的辩护。现在来谈谈这位贝克莱脱口而出的真心话。如果说昨

天晚上小约翰通破了塞瓦斯托波尔的肥皂泡，那末今天，喀琅施塔得的肥皂泡也因贝克莱的发言而破灭了。既然多瑙河各公国的全部战斗将完全由奥地利单枪匹马地进行，那末，对于“装备空前精良和任何国家都不曾派出过的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连同它们的螺旋推进式蒸汽舰、佩克桑炮和其他杀伤力极大的武器，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威武的贝克莱从威武的波罗的海舰队总司令[1]的信中引用了这样一句话：

“我不能率领这支强大的舰队从事任何活动，因为对喀琅施塔得或斯维阿波尔格的任何进攻都意味着必然的灭亡。”

不仅如此。威武的贝克莱一面陶醉于这支最强大的舰队无所不能的想法，一面继续嘟囔说：

“科学知识之渊博在一切人之上的查兹海军上将也就这一点写道：经过从灯塔上的两天的观察并对堡垒和船只的周密的察看，我深信，对我们舰炮来说，堡垒太坚固了。这是大块大块的花岗石。要进攻停在停泊场的敌舰，简直不可能。”

关于纳皮尔，威武的贝克莱作了这样的结尾：

“从来还没有一个不列颠军官在作战上得到过这样的 carte blanche[2]。政府不但没有缚住他的手，相反，还千方百计地鼓励他前进”——从博马尔松德到喀琅施塔得和从喀琅施塔得到博马尔松德。

托利党人希尔德亚德先生指责说，“他有生以来还未听过有人这样把什么都随便泄露了的”；贝克莱的讲话像一个公然的俄国代理人；一切关于喀琅施塔得的高谈阔论终究都是得到他的默许的。为应付这种指责，英勇的贝克莱部分地收回了他的没有分寸的话，

① 即查理·纳皮尔海军上将。——编者注

② 直译是：“空白的格纸”，此处的意思是：“活动的自由”。——编者注

并且声明，纳皮尔所指的只是目前他只有舰艇而没有陆军支援的情况。从纳皮尔离开英国海岸时起，我就一再地说，没有陆军，没有同瑞典的同盟，就不可能在波罗的海取得任何成就，这个见解也博得一切有科学头脑的军人的赞同。

现在我来谈谈这些难忘的辩论中的最后一点，即约翰·罗素勋爵的趾高气扬的讲话。300万的支票一拿到手，他就变得如此厚颜无耻，就同20小时前他在迪斯累里的冷嘲热讽的打击下进行狡辩时显得那样羞羞答答一样。

“他根本不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澄清他昨晚所作的发言”。对于有人企图在阿伯丁和阿伯丁的同僚之间制造“不愉快的分歧”，他说：

“至于战争方面的一般措施，组成所谓内阁的女王陛下的顾问们天天都在讨论这些措施，阿伯丁勋爵和他的内阁的全体同僚对所作的决定向议会和国家负有同样的责任。”

他甚至不冒任何危险地对议院说：

“如果认为我们配作女王的大臣，那末，我们就应当有权斟酌召开或不召开议会会议；如果认为我们不配享有这种权利，那就是说我们更不能当大臣。”

旁听了星期一和星期二的英国议会会议之后，我才明白，1848年我在“新莱茵报”上斥责柏林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议会生活的最可悲的表现[195]，是多么糊涂。

如果拿沃龙佐夫的英国内兄弟的声明，拿罗素的平淡无味的吹牛和“泰晤士报”社论的吼叫同“泰晤士报”驻瓦尔那不列颠兵营记者7月13日的最近的报道比较一下，读者是会感到兴趣的。现在把这次报道摘录如下：

“昨晚所有人都确信很快就要缔结和约了，因为据报道，奥地利公使和布朗将军曾经共进午餐，而这位公使正从他同奥美尔—帕沙进行过长时间谈判的苏姆拉前往瓦尔那，他将在该地同腊格伦勋爵和圣阿尔诺元帅磋商。据报道，剑桥公爵已宣布，骑兵于11月前返回英国，步兵于5月前返回英国。不能肯定，目前我们是否处于战争状态，联军真是作战的一方还是他们在土耳其登陆后只作了作战的姿态。我们的阅兵、检阅、演习和检查都同在萨托里和乔宾进行的一样是不会得罪人的，而我们在陆上的全部行动仅仅是：第一次是卡迪根勋爵的侦察性的游览，第二次是派出几个工程师和工兵到锡利斯特里亚和鲁舒克，第三次是派赴该地几个法国架桥兵，第四次是又派一个工兵小队和150名水兵到鲁舒克，架设此岸到岛屿和从岛屿到对岸之间的桥。”

英国没有巴士底狱，但是有疯人院，完全可以根据lettre de cachet〔秘密拘票〕把任何一个不合王室心意的或有碍家庭和好的人关进去。这一点在星期三辩论佩特曼博士的案件①时，已经由汉利先生所支持的奥特韦先生充分证实。帕麦斯顿勋爵，这位civis romanus[196]和“不列颠臣民的权利和特权”的著名的维护者几句话就把问题压下了。帕麦斯顿甚至不肯定说佩特曼真是个疯子，而只是说，“看来，他自以为有权向政府提出某种诉讼”而且正打算非常固执地要向女王，或者更正确地说，向一个匿名要人——阿伯特亲王提出这种诉讼。科堡家族已经无孔不入；目前他们想使西班牙完全受自己支配。

政府的“地球报”说：“这是博士和女王的权利问题，我们深信，议会内外没有一个人会在判断这些权利时摇摆不定。”

如果托马斯·倍恩的“人的权利”在这个自由的极乐国度被公开焚毁，也用不着惊异。

① 见本卷第356—359页。——编者注

在同一个星期三晚上，还演出了一出议会的小喜剧。在上星期五的会议上，巴特先生提出了一项禁止不列颠臣民买卖俄国政府的有价证券、违者受惩处的提案，但是这个提案只对这次战争时期发行的俄国公债而言。不列颠政府没有提出这样的法案，但又不能断然反对，因为波拿巴已经在“通报”上发表了一则假消息，说什么英国政府和他见解一致，认为认购俄国公债是非法的。因此，帕麦斯顿支持巴特的提案，但是遭到了“经济学家”杂志的精明的出版者、财政部秘书长威尔逊先生的相当不客气的反对。于是这一位在星期一为联合内阁辩护、星期二一言不发从而事实上保证了联合内阁的成功的帕麦斯顿，星期三毕竟不能放过重新扮演内阁的“受气的女人”的角色。他以男性巫女的傲慢态度抑扬顿挫地、一本正经地说，他完全受他的爱国热情支配，而他这个被自己官方地位的铁的纪律束缚的可怜人，在前两个晚上却不得不压制这种热情。极可尊敬的受骗的听众的不可避免的热烈欢呼淹没了他以下的话：

“这个法案只不过是肯定不列颠臣民不应向俄国人提供作战费用的原则。财政部秘书长提出的理由是想强迫我们废除叛国法。类似的论据纯粹是胡说八道。”

必须指出，正是这个人，他 24 年来一直把俄荷贷款协定强加于英国，而目前是内阁——这个内阁仍然在为这种国债还本付息，从而向他这位帕麦斯顿提供“作战费用”——的最有影响的阁员。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7 月 28 日
载于 1854 年 8 月 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52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无 聊 的 战 争

自从土军两个步兵营组成的一支不大的部队成功地从沃耳特尼察对岸的土尔图凯附近渡过多瑙河，在那里构筑起野战工事，并且当俄军向他们攻击时，他们经过短短的、但非常激烈的战斗（这次战斗作为这次战争的第一次冲突而获得了沃耳特尼察会战的赫赫大名）而把俄军击退以来，已经快一年了。当时，土军是单独同俄军对抗的，在他们后面既没有英军或法军作预备队，甚至也不能指望联军舰队的任何支援。虽然如此，他们仍在瓦拉几亚的多瑙河岸的沃耳特尼察附近扼守阵地达两星期之久，而在卡拉法特附近扼守了整整一个冬季。

从那时起，英国和法国对俄国宣战了。联军不止一次地表现出英勇精神，虽然效果令人怀疑。黑海分舰队、波罗的海分舰队和将近十万英法陆军，准备援助土军或者把敌人的兵力吸引过来。但我们看到这一切的结果不过是沃耳特尼察附近那种战事的更大规模的重复而已，而胜利似乎比去年更小了。

俄军包围了锡利斯特里亚。他们在围攻中的行动是不明智的，然而是勇敢的。他们每天每夜都遭到挫败，但这不是因为对方用兵高明，也不是因为巴特勒上尉和奈斯密斯中尉这两位英国军官在场（按“泰晤士报”的说法，是他们拯救了锡利斯特里亚）。不是这样，俄军遭到失败是由于土军的十足无知，土军甚至不知道堡垒或

者垒墙在一定的时刻不能再扼守下去,而继续死守着敌人企图夺取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座小丘。此外,俄军遭到失败还由于自己将领的昏庸无能,由于霍乱和热病的流行,以及由于威胁其左翼的联军和威胁其右翼的奥军对他们的精神上的压力。战争一开始我们就指出,俄国从来不善于进行正规围攻,而对锡利斯特里亚军事行动的拙劣指挥,只是证明俄军从那时以来什么也没有学到。就这样,俄军遭到了失败,不得不极其可耻地退却,不得不在最有利的季节,在被围守军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外援的时刻,停止对这个极不完善的要塞的围攻。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是百年难遇。不管俄军在秋季将采取什么行动,这个战局是已经失败了,而且是可耻地失败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问题的另一方面。锡利斯特里亚解围了。俄军退到多瑙河左岸。他们甚至准备放弃多布鲁甲,并且正在逐步实现这个计划。希尔索瓦和曼成被破坏了。看来塞勒特河是俄军选来保卫本土而不是选来保卫占领区的防线。狡猾的老克罗地亚人奥美尔—帕沙(他"为了职责"可以缄口不言,也可以信口胡说,在这方面他不比别人逊色),在把一个军派到多布鲁甲的同时,把另一个军派到鲁舒克,这样就立刻包围了俄军的两翼。当时,本来可以有另外的比这好得多的作法,但看来老奥美尔对土军和联军了解得比我们清楚。从军事观点来看,让军队通过多布鲁甲或者卡拉腊什进到敌人交通线上可能更正确些,不过当我们看到一切情况以后,就不能再非难奥美尔错过了好机会。大家知道,他的军队的给养很坏,几乎得不到什么供应,因此不能进行远离基地的或者开辟新作战线的迅速移动。如果用足够的兵力进行这样的移动,那末会获得具有决定意义的结果;但是对一支半饥半饱而且要通过不毛之地的军队来说,这样的移动是不能胜任的。大家知道,奥美尔

— 帕沙曾去瓦尔那向联军的将军们求援，当时这些将军率领75000名精兵驻在距多瑙河只有4天行程的地方；但是无论圣阿尔诺或腊格伦，都不认为有必要把部队派到可能同敌人相遇的地方去。因此，奥美尔就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了。他把25000人派往多布鲁甲，亲自率领其余的兵力向鲁舒克进发。在这里，他的部队接连越过了许多沙洲，一直到渡过多瑙河为止，随后又突然向左行进，从背后夺取了茹尔日沃，并从这里赶走了俄军。第二天，俄军退到茹尔日沃以北的高地上，在这里遭到了土军的攻击。一场血战发生了，从竞相以首先战死为荣而且如愿以偿的英国军官的数量来说，这是一场非凡的战斗。这些英国军官一个个中弹而死，但这无论对谁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认为土耳其兵士仅仅因为看见英国军官阵亡就变得不可战胜，那是荒谬的。不管怎样，在那里仅仅配备了前卫（由科累万团和托姆斯克团编成的一个旅）的俄军被击败了，土军巩固了在瓦拉几亚境内多瑙河岸上的地位。他们立刻着手构筑工事，而且无疑地筑成了坚固的阵地，因为有英军工兵同他们在一起，并且他们自己在卡拉法特也已经证明，他们是满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但是土军只能到此为止，不能再前进一步。那位在过去8个月内竭力扮演局外人角色的奥地利皇帝突然出面干涉了。因为曾经答应过他，由多瑙河各公国供养他的军队，而他也想得到多瑙河各公国。土军在那里干什么呢？让他们回到保加利亚吧。因此，君士坦丁堡就发出了命令，叫土军从多瑙河左岸撤回，并让奥地利兵士在“整个这块不大的地区”为所欲为。外交高于战略。不管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奥地利有意要在边境外占领几码土地来保卫自己的边境；为了这个重要目的，甚至那些从军事观点看最为必要的措施也应退居次要地位。难道奥美尔— 帕沙不是奥地利的逃

兵吗？奥地利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掉什么。在门的内哥罗它曾经妨碍过奥美尔－帕沙的胜利前程，现在它又重复同样的做法，要使这个变节者感到自己对那合法的君主还负有臣民的义务。

详细分析这一阶段的军事行动是毫无益处的。就战术观点来看，这些战斗行动并没有多大意义，它们只是些简单的、直线的正面攻击。双方军队的移动与其说是由于战略上的需要，不如说是由于外交上的需要。很可能，战局就在没有什么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结束，因为在多瑙河上完全没有作好大举进攻的准备，至于我们已经听厌了的夺取塞瓦斯托波尔的行动，看来将被推延到冬季，到那时，又不得不推延到来年。

欧洲一切抱有保守观点的人，看到东方问题无法解决，似乎也应改变自己的观点了。全欧洲已经有60年之久显然不能解决这个细小的争端。最后，法国、英国和俄国投入战争。战争进行了6个月，但直到现在，除了因错误而引起的战斗或规模极小的战斗以外，还没有真正交战。在瓦尔那城下驻扎着八、九万英法兵士，他们由老威灵顿的前军务秘书[①]和法国元帅[②]指挥（顺便说一句，这位元帅最突出的功绩是在伦敦当铺里建立的）；法军什么也不做，而英军也尽力在这方面帮他们的忙；大概因为这种行动在他们看来还不够十分隆重，所以舰队也开到巴耳契克的停泊场看一看这两国军队中哪一个更会享受这 dolce far niente〔悠哉游哉的乐趣〕。虽然到目前为止联军只是坐吃土耳其军队所指望的储粮，而且两个月来在瓦尔那城下天天闲暇无事，但他们仍未准备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指望他们援救，那末锡利斯特里亚也许要到明年5月才

① 即腊格伦。——编者注
② 即圣阿尔诺。——编者注

能解围。正是这些军队征服过阿尔及利亚，并在一个最复杂的战区里研究过作战理论和实践[197]；也正是这些兵士曾在比保加利亚野蛮得多的国家里作过战——在印度河的沙岸上同锡克教徒以及在南非的荆棘丛中同卡弗尔人作过战[198]，——而现在这些兵士却束手无策，毫无用处，什么事也做不了，而且还是在一个输出谷物的地区呢！

然而，如果说联军不能夸耀自己的功绩，那末俄军的情形也并不好些。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而且也作了所能作的一切，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知道将会遇到怎样的抵抗。但他们究竟作出了什么成绩呢？什么成绩也没有作出。他们没有能够从土军手里夺得一寸他们所力争的土地，没有能够夺取卡拉法特，而且无论在哪一次战斗中都没有能够打败土军。要知道正是这些俄军，曾在米尼希和苏沃洛夫的指挥下占领了由顿河到德涅斯特尔河的黑海沿岸地区。然而施尔德尔不是米尼希，帕斯凯维奇也不是苏沃洛夫，虽然俄国兵士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兵士都更能忍受鞭笞，但是如果要经常退却，就是这样的兵士，也会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兵士一样失去他们的坚毅性。

真实的情况是：保守的欧洲——这个“秩序、财产、家庭和宗教”的欧洲，这个君主、封建主和资本家的欧洲（无论他们的相互关系在各个国家中怎样不同），——再一次暴露出它是完全虚弱无力的。即使欧洲腐朽了，战争也应该唤醒其中的健康因素，也应该重新发掘出潜在的力量。在25000万人中间，当然会有人进行真正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双方都能取得在战场上运用智慧和力量所取得的那种荣誉。可是不然，不仅资产阶级的英国和波拿巴法国不能进行真正的、坚决的、顽强的战争，甚至俄国这个受“无神论的和使

人软弱的文明”影响最少的欧洲国家，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土军善于采取突然的进攻行动，也适于在防御时进行顽强的抵抗，但是和大军采取大规模的、复杂的联合行动，看来就不适合了。因此，一切都归结为虚弱无力，归结为双方相互承认自己虚弱，以致任何一方似乎都不再因此感到惊讶了。如果目前这样的政府存在下去，那末这个东方战争还可以继续30年而仍然得不到什么结果。

但是，当整个欧洲的当权派表现出无能的时候，在这个大陆的西南部却兴起了一种立即表明毕竟还存在另外的更有积极作用的力量的运动。无论西班牙起义的性质和结果如何，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它与未来的革命的关系将同1847年瑞士和意大利的运动与1848年革命的关系[199]一样。在这次起义里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自1849年起实际上统治着大陆的军队从内部分裂了，它为了对抗政府，实现自己的主张，而拒绝执行维持秩序的使命。纪律教会军队认识自己的权力，而这个权力反过来又削弱纪律。第二，我们已经亲眼看到了成功的街垒战。自1848年6月起[200]，无论哪里筑起的街垒都没有发生过作用。街垒战作为大城市居民抵抗军队的形式，似乎根本达不到目的。这种偏见现在已被驳倒了。我们再次看到了获得胜利的、不可攻破的街垒。咒语已被破除。新的革命时代已经有可能到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正当欧洲各国政府的军队在目前的战争中表现出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又被起义的城市居民击败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年7月29日—8月1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8月17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59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埃斯帕特罗

一切革命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正当人民似乎临近一个伟大的开端、一个新时代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却让自己沉湎于过去的幻想，自动地把自己好容易才争得的权力、一切影响让给过去时代人民运动的真正的或者冒牌的代表。历史上有这样一些人，人民惯于在社会危机时刻把他们背在自己的背上，而以后就很难摆脱掉他们，就像航海家辛伯达[①]很难摆脱掉用两腿夹着他的脖子的凶恶的老头子一样。埃斯帕特罗便是这样一类人。你要是问一个属于所谓进步派的西班牙人，埃斯帕特罗有什么政治作用，那末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 "埃斯帕特罗是伟大的自由派的统一的化身；埃斯帕特罗之所以深得人心，是因为他来自人民；他的声望完全为进步派的事业服务。"

的确，他是一个工匠的儿子，一直爬到了西班牙摄政的职位；他参加军队时是一个普通的兵士，离开军队时是一个元帅。但是，如果说他也是伟大的自由派的统一的象征，那末，看来也不过是把一切极端中和起来的一个庸材。至于谈到进步派的声望，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它由这个派的广大成员转到他一个人身上时，便再

① "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的主人公，见"一千零一夜"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2卷第301页。——编者注

也不存在了。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够揭穿埃斯帕特罗的成功的妙诀。这个事实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种成功具有不清不白和异乎寻常的性质。虽然他的朋友们用含糊的讽喻来敷衍应付，而他的敌人们也只能暗示他的私生活上的某种特点，说他不过是一个幸运的赌徒。可见，不论朋友或敌人，都不能找出这个人本身与他的声誉和名望之间的某种逻辑联系。

埃斯帕特罗在军事上的功绩之成问题，正像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之不成问题一样。在德·弗洛雷斯先生编著的一部篇幅很大的埃斯帕特罗传记[201]中，谈了许多他在查尔卡斯、拉巴斯、阿雷基帕、波托西和科恰班巴等省在莫里耳奥将军（他的使命是使南美各国回到西班牙国王的统治之下）指挥下作战时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和指挥艺术。然而他本人得到的“艾阿库裘将军”的绰号以及他的党羽得到的“艾阿库裘派”的绰号——影射艾阿库裘会战的失败使西班牙彻底丧失了秘鲁和南美洲[202]，足以说明他在南美洲的武功在他的同胞的易于激动的头脑中所留下的总印象。总之，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英雄，他的这个历史性的绰号不是由于胜利，而是由于失败得来的。在同卡洛斯派的7年战争中，他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类似他的对手纳尔瓦艾斯借以迅速获得铁打勇士的声誉的那样的大胆攻击而使他声名卓著。他无疑具有一种最能利用细小的成功的天才，但是，如果说马罗托把王位追求者的最后的军队出卖给了他，那也不过是一次纯粹的偶然事件，而1840年加布雷腊的暴乱只不过是一次为时已晚的使卡洛斯派的僵尸复活的尝试[203]。当代西班牙的历史学家和埃斯帕特罗的崇拜者德·马尔利安尼先生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7年的战争只可以同十世纪时高卢的小领主

之间的封建主义战争相比，那时成功并不是胜利的结果。[204]而且不幸的是，在埃斯帕特罗在西班牙的所有功勋中留下最鲜明的印象的，即使不是真正的失败，至少也是对一个自由的英雄说来是非常奇怪的行动：他以炮击一些城市——巴塞罗纳和塞维尔——而闻名。一位著作家[205]说，如果西班牙人想把他描绘成玛尔斯①，他们就会赋予这个神以“城墙的摧毁者”的形象。

当1840年克里斯亭娜被迫放弃摄政职位而逃出西班牙的时候，埃斯帕特罗不顾进步派非常大的一部分人的愿望，接受了议会制范围内的最高权力。他在自己周围安置了一些类似权奸的人物，并且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军事独裁者，实际上不想超出普通立宪君主的水平。他对温和派[206]的宠爱胜过对旧日进步派的宠爱，后者除少数例外，都被撤职了。他既不能平息他的敌人，又逐渐疏远了他的朋友。他既没有勇气打碎议会制的枷锁，又不能接受它，利用它，把它变成行动的工具。在他独裁的3年中，由于无止境的妥协，革命精神逐步受挫折，而谁也不加制止的进步派内部的分歧却变得如此尖锐，以致温和派只要发动一次coup de main〔突然袭击〕，就可以把全部政权夺回去。这样一来，埃斯帕特罗的威望一落千丈，连他任命的驻巴黎大使也串通克里斯亭娜和纳尔瓦艾斯反对他；他变得如此软弱无力，竟至无法对付路易－菲力浦的这些可怜的阴谋和渺小的诡计。他对自己的处境如此缺乏了解，以致舆论正要找寻口实来毁灭他的时候，他竟然轻率地去反对舆论。

1843年5月，当他已经威信扫地的时候，他仍然让林纳赫、苏巴诺和他的军事权奸中的其他一些人员留在他们的职位上，尽管

① 即古罗马的战神。——译者注

人们强烈要求他把这些人撤职；他解散了掌握着众议院中的大多数的洛佩斯内阁，并且顽固地拒绝对流放的温和派分子颁布大赦，而当时议会、人民和军队本身都一致要求大赦。对大赦的这种要求完全表明了所有的人对他的管理感到厌恶。于是，突然一阵反对“暴君埃斯帕特罗”的政变的风暴震撼了整个半岛；这个运动，就其发展的速度来说，只有目前的运动可以同它相比。温和派和进步派为了摆脱摄政这一共同目的而联合起来了。这个危机使他措手不及，当决定性的时刻来到时，他却毫无准备。

纳尔瓦艾斯同奥当奈尔、孔查和佩苏埃拉一起，带着很少的人在瓦伦西亚登陆。他们一开始就表现出行动迅速、有智有勇、精力充沛和决心很大。而埃斯帕特罗却表现出束手无策、举棋不定、致命迟缓、优柔寡断、懈怠无力。当纳尔瓦艾斯解除了对特鲁韦耳的包围而向阿腊贡进发时，埃斯帕特罗放弃了马德里，在阿耳巴塞特莫名其妙地耽误了好几个星期。当纳尔瓦艾斯在托列杭把塞奥昂奈和苏巴诺所率的一个军争取过来并向马德里挺进时，埃斯帕特罗才最后同范哈兰会合，对塞维尔进行无济于事的和令人愤慨的炮击。然后，他迅速撤离一个个的阵地，每退一步就损失一些部队，一直到最后到达海边为止。当他在加迪斯登船的时候，这个还残存着他的党羽的最后一个城市，也用反对来向它的英雄诀别。在这次灾难期间住在西班牙的一个英国人，对埃斯帕特罗的成功的“活动刻度盘”作了一个清晰的描述：

“这不是一场激战后的倏忽间的大崩陷，而是从马德里到勒阿耳城，从勒阿耳城到阿耳巴塞特，从阿耳巴塞特到哥多瓦，从哥多瓦到塞维尔，从塞维尔到圣玛丽亚港，再从圣玛丽亚港到辽阔的大洋的一步一步的、未经任何斗争的、缓慢的倾倒。他被人们崇拜为神降到热诚拥护，从热诚拥护降到爱慕，从

爱慕降到尊敬,从尊敬降到冷淡,从冷淡转为轻蔑,从轻蔑转为憎恨,而憎恨把他抛入了大海。”

埃斯帕特罗怎么会又变成人们所称的国家救星和“革命之剑”了呢?如果不是10年的反动统治使西班牙在纳尔瓦艾斯的残暴的独裁和取代埃斯帕特罗的女王宠臣们的桎梏下备受痛苦,这件事就会完全不可理解。漫长的残酷的反动时期,具有恢复在革命中遭到失败的声名狼籍的领袖们的声誉的令人惊异的特性。一个民族的想像力愈大——哪儿还有比南欧民族具有更大的想像力的呢,——他们用体现革命的人物来对抗体现专制的人物的愿望就愈强烈。因为他们不能马上凭空塑造出这样一个人物,所以他们就让他们过去运动中已经衰亡的英雄们复活。难道纳尔瓦艾斯本人不是差点儿靠萨尔托里乌斯赢得了声望吗?7月29日凯旋地进入马德里的埃斯帕特罗并不是实在的人;他只是一个幽灵,一个虚名,一种回忆。

应该公道地回忆一下,埃斯帕特罗除自命为一个君主立宪主义者以外,从来没有自命过其他什么东西;如果对这点有过怀疑的话,那末在看到他流亡期间在温莎城堡和英国统治阶级那里所受到的热诚接待,这种怀疑也就应当烟消云散了。当他到达伦敦时,以威灵顿和帕麦斯顿为首的全体贵簇都成群地到他的寓所去。阿伯丁以外交大臣的身分邀请他去谒见女王;市长和市议会议员们在市长官邸举行盛宴欢迎他;当人们知道这位西班牙的辛辛纳图斯从事园艺来消度余暇的时候,没有一个植物学会、园艺学会或农学会不热心请他当名誉会员。他成了这个首都的真正的红人。1847年底,大赦使西班牙的流亡者回到祖国,而埃斯帕特罗被伊萨伯拉女王下旨任为参议员。但是,他只是在维多利亚女王邀请他和他的

夫人赴了宴,同时给了他空前的荣誉,让他在温莎城堡内度了一夜之后,才离开了英国。的确,应该认为,环绕他身上的这种荣光,部分是由于认为埃斯帕特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英国在西班牙的利益的代表者这个看法而来的。有一种看法也是对的,这就是对埃斯帕特罗所显示的尊敬在相当程度上是对路易— 菲力浦的示威。

他一回到西班牙,就被一个又一个的代表团,一个又一个的祝贺弄得应接不暇,而巴塞罗纳市还派出一个特使去取得他对巴塞罗纳 1843 年的不当行为的谅解。但是从 1846 年 1 月到最近事变的这一段灾难时期内,有谁听见过提到他的名字?在备受侮辱的西班牙的这个死寂的时期,他是否曾坚决说出自己的主张呢?谁知道他有过哪怕一次的爱国抵抗行动呢?他非常泰然地隐居在他在洛格罗尼奥的庄园内,栽花种菜,等待时机。直到革命本身找到他的时候,他才投奔了革命。他所作的超过了穆罕默德。他等待山岳向他走来,而山岳也果真走来了。不过,有一件例外的事必须提一下。当二月革命①爆发,欧洲的普遍动荡随之而来时,他怂恿德·普林西佩先生和另几个朋友出版了一本名为“埃斯帕特罗,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207]的小册子,其目的是提醒西班牙,它仍然是这个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的栖身之所。由于法国的革命运动很快低落下来,这位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又被人遗忘了。

埃斯帕特罗生于拉曼彻省的格腊纳土拉,而且像他的赫赫有名的老乡②一样,他也有他的固定观念—— 宪法,和他的托波索之达辛尼亚③—— 伊萨伯拉女王。1848 年 1 月 8 日,当他从英国流亡

① 即 1848 年的二月革命。—— 编者注
② 即拉曼彻的唐·吉诃德。—— 编者注
③ 即唐·吉诃德给他意中人起的名字。—— 编者注

回到马德里的时候，受到了女王的接见，他向女王告别时说：

“当您无论是需要一只手来保护您，或者需要一颗心来爱您的时候，请陛下召唤我。”

现在女王陛下召唤他了，她的游侠骑士也真一叫就到，他出来平息革命的浪潮，以欺骗性的镇静麻痹群众的热情，在宫廷里给克里斯亭娜、圣路易斯和亲信们以避难之地，并大声宣传他对天真的伊萨伯拉所说的话坚信不移。

大家知道，这位非常可敬的女王——据说人们发现她的容貌和留下不好印象的斐迪南七世的容貌一年比一年更加惊人地相似——是在1843年11月15日宣布成年的。同年11月21日，她才满13岁。受洛佩斯之命做了她3个月监护人的奥洛萨加，组成了一个为权奸和在纳尔瓦艾斯初次胜利的影响下刚选出的议会所不喜欢的内阁。他想解散议会，并且争取到了一道由女王签署但没有签具日期的授予他这样做的全权的敕令。11月28日晚间，女王亲手把这个文件交给了奥洛萨加。29日晚间，他又和女王会谈了一次；但他刚一离开她，一位副大臣便来到他的官邸，通知他说他已被撤职，并且索回据说他是强迫女王签署的敕令。奥洛萨加原是一个律师，为人极其狡诈，他是不会这样轻易上当的。他只在第二天，当他把敕令至少给100个议员看过，证明女王签署的字迹是正常的以后，才把这个文件退了回去。12月13日，新任首相冈萨勒斯·布腊沃召集两院的议长、马德里的主要名流、纳尔瓦艾斯、桑塔·克鲁斯侯爵和其他人去谒见女王，使女王陛下得以就11月28日晚间她和奥洛萨加的会见经过作了一次说明。这位天真的小女王把他们带进她接见奥洛萨加的那个御室，并且为了训诫他们，非常生动地但有些过火地表演了一幕小剧。她模拟奥洛萨加怎样闩

上门，怎样扯住她的衣服，怎样逼她坐下，怎样执着她的手，怎样强迫她在敕令上签字，一句话，怎样侵犯了她的帝王的尊严。冈萨勒斯·布腊沃在她表演时记下了她的叙述，在场的人都仔细看了上述的敕令，敕令的签字看起来是由一只颤抖的手签上的，而且有涂改的痕迹。因此，根据女王的庄严的声明，应判奥洛萨加以 laesa majestas〔侮辱皇上〕的重罪，不是处以四马分尸之刑，至少也得终身流放到菲律宾群岛。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奥洛萨加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接着就是 17 天的议会辩论，辩论所引起的轰动，比英国有名的卡罗琳娜王后诉讼案件[208]所引起的轰动还要大。奥洛萨加在议会里的辩护词有这么一段话：

"如果有人对我们说，女王的话应当毫无怀疑地相信，那我就回答说：不！罪状也许有，也许没有。如果有，那末女王的话像其他任何话一样是证词，而我也可以用我的话来加以反对。"

在议会讨论这个问题时，奥洛萨加的话比女王的话更有分量。后来他逃到葡萄牙，以躲开被派去谋杀他的刺客。这就是伊萨伯拉在西班牙政治舞台上的初次的 entrechat〔轻跃舞步〕，是她的诚实的初次证明。也就是同一个女王，现在埃斯帕特罗呼吁人民相信她的话，并且他这位"革命之剑"在经过 11 年的"扬恶学校"①的熏陶之后，表示愿意向她献出"援助的手"和"爱慕的心"[209]。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8 月 4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8 月 19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6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① 即谢里敦的名喜剧的剧名。——编者注

弗·恩格斯
对俄国要塞的攻击[210]

看来,联军(法军和英军)终于准备真正进攻俄国了。帝国的前哨据点(阿兰群岛上的和黑海岸塞瓦斯托波尔的据点)必定先后甚至同时遭到攻击。在西欧甚至传说,其中一个据点已经在短时间的炮击后被占领了。不过这些消息还需要证实,而且很可能是过早的估计。关于预料中的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还没有官方消息,但是伦敦"泰晤士报"肯定地说,这个攻击将要开始,首都的人们也都相信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在瓦尔那上船的只有法军和英军的两、三个师,虽然估计他们将编入克里木远征军,但是他们也完全可能被用来围攻亚洲的俄国要塞阿纳帕。随着最近一班轮船到达,这方面的疑团就可能消失。

从军事观点来看,对博马尔松德的攻击将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这是对蒙塔郎贝尔体系的穹窖式城防工事的第一次考验。根据要图和平面图来判断,这些堡垒虽然比赫尔辛福斯、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堡垒小得多,但是它们抵御陆上攻击的能力并不比抵御军舰轰击的能力差,而且它们都是严格遵照蒙塔郎贝尔的原则构筑的。对付军舰的主要防御工事是一座爆炸弹所不能破坏的长堡,它配备大约一百门火炮,并有防止侧射的临时性土质工事作为掩护;有两座巨大的塔楼(一座配备30门火炮,另一座配备

10 门火炮)来瞰制它,并且从后方掩护它。军舰通常主要是攻击主堡,而陆军是进攻塔楼。根据最近的材料来看,博马尔松德的守军比我们过去推测的要少得多:计有三千人多一点。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还不完全了解,海上和陆上的行动不仅在时间的配合上,而且在互相的支援中能够真正协调到什么程度,因为从海上进攻必须靠 de vive force〔硬攻〕,这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决定胜负,而从陆地上对石质工事的任何攻击都必须预先进行工程作业,构筑至少一道平行壕和几座炮台,因而就需要时间。总之,这类问题只能在现地解决。无论如何,从军事观点来看,夺取博马尔松德甚至比攻占塞瓦斯托波尔有意义得多,因为这可能有助于解决多次讨论过的问题,而攻占塞瓦斯托波尔只不过是久已制定的军事原则被顺利实行而已。

预料中的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主要由陆军进行,而舰队的行动几乎只限于对港湾进行完全的封锁。所以,整个行动就是从陆地和海上两方面封锁这个在向陆的一面设防不够坚固的海港。我们当然无法了解在城市和海湾的南面俄军能构筑什么工事。但是他们已构筑了多面堡和防线,联军只要不愿作出特别重大的牺牲,就必须对这些多面堡和防线进行正规的围攻,这一点恐怕是不能怀疑的。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在大海湾以北正对着市区的高地上,构筑了一座永备的而且从各方面看来都构筑得很好的工事——一座巨大的四角形堡垒,每一面都有宽而深的壕沟,所有的突角上都配置臼炮。这个高地是该城附近唯一从其他高地炮击不到、而本身又瞰制着海湾和对面斜坡的制高点。当然俄军将在这里进行主要的抵抗。但是进攻者如果没有夺下这一工事,即使攻占了南区的全部岸防工事,也未必能守住市区和港口。至少在这里需要进行正规

的围攻作业。大湾的长度(由康士坦丁角到海湾东端)约为8英里;即使认为塞瓦斯托波尔市区和工事所占的面积不大,可以从陆地上对它们进行封锁,联军仍然必须构成一个长达22—24英里的半圆形包围圈。而且,联军在所有各点都应有足够的兵力以抵御守军的出击和可能集中在联军后方的俄军的攻击。虽然我们不了解俄国直接和间接用于防守黑海要塞的兵力有多少,但是上述的一些细节仍然表明,要夺取这样一座要塞,将需要不少的部队。此外,克里木草原的致命的气候也将成为联军危险的敌人。在当前的行动中,岸防炮台对俄军未必有很大好处,这就大大缩小了整个这次行动的军事意义,它将是一次很大规模但决不是空前规模的围攻。直到目前为止,在确定远征军的数量时所提出的最大的数字是10万人,其中包括土耳其部队。如果考虑到上述全部情况,这样一支军队在我们看来是不足以达到预定目的的。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8月7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8月21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6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撤出多瑙河各公国。——西班牙事件。——丹麦新宪法。——宪章派

1854年8月8日星期二于伦敦

7月28日，哥尔查科夫公爵率领自己的主力军穿过了离克鲁格廉尼大约6英里的施拉瓦村，以便在29日继续向福克夏尼推进。索伊蒙诺夫将军指挥的前卫是由第十步兵师的8个营、托姆斯克和科累万的几个猎兵团和大公— 皇太子的一个骠骑兵团组成的。这支前卫于8月1日在乌列什提和乌尔济琴渡过了雅洛米察河，这两个地方都已经架了桥。估计8月中可以到达福克夏尼。

土耳其军队分三路纵队前进。中央一路于7月29日到达克鲁格廉尼；30日，在离布加勒斯特2英里的格利纳附近发现了土军前卫的侦察兵，按照预定计划，8月1日以前，奥美尔— 帕沙的大本营应当设在格利纳。右翼沿阿尔哲什河往沃耳特尼察到布加勒斯特的方向运动。左翼于28日到达莫契纳附近，它应当沿斯拉廷纳到布加勒斯特的道路前进。

“军报”说：“看来俄军的撤退与其说具有政治性质，不如说具有战略性质。这样一来，俄国将军就赢得了时机，能够把自己的军队集中在良好的阵地上，在多布鲁甲吃了亏和在多瑙河左岸吃了土军的苦头以后，他们在这里能

够得到休整。他既能靠近自己的给养基地，又能继续占领去年占领的很大一部分土地。而且，他还占领着甚至对优势兵力说来都具有威胁性的阵地。”

7月26日，布德贝尔格男爵发表了如下的告瓦拉几亚居民书：

“全俄国皇帝，波兰王，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的保护者和一切信奉正教的人的保护者陛下，已经决定暂时把帝国军队从对健康不利的多瑙河地区撤回，使他们驻扎在对健康有利的高地。敌人目光短浅地认为，我们撤退是由于害怕他们，因此企图攻击我们撤退的军队。但是，最高统帅哥尔查科夫公爵刚刚发出反击的命令，他们就可耻地逃跑了，丢下了武器和弹药，这些武器和弹药都被我们英勇的兵士缴获了。随着比较有利的季节的到来，我们将提着武器回到你们这里来，以便永远把你们从土耳其生番手中解放出来。为了使敌人不至认为我们是在他们面前逃跑，我们将采取预防措施，不慌不忙地完成撤退。”

有趣的是，1853年，同样是在7月，俄国人根本不认为这个季节对占领瓦拉几亚是不利的。

德国报纸上发表的一封加拉兹来信说：“保加利亚家庭从多布鲁甲继续不断地向外迁移。大约有1000个家庭和15万头牲畜在烈尼附近渡过了河。”

俄国人号召居民实行的这种“自愿迁移”，似乎是为了使居民不受土耳其人的报复，按性质来看，这种迁移非常像奥地利的“自愿”公债。“纪事晨报”驻维也纳记者报道说，这些家庭

“知道了他们被派往莫尔达维亚修筑堡垒以后，都想回家；但是哥萨克用武力强迫他们到福克夏尼去，现在他们正在那里挖战壕”。

马德里的街垒还没有按照埃斯帕特罗的要求清除掉，反革命就已经开始活动了。反革命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使克里斯亭娜女王、萨尔托里乌斯和他们的同谋不受惩罚。接着成立了由温和派的奥当奈尔担任陆军大臣的内阁，同时全部军队都交给纳尔瓦艾斯的这位老友掌握。在内阁名单上有帕切科、路汉、唐·弗

朗西斯科·桑塔—克鲁斯这样一些名字，他们都是纳尔瓦艾斯的人所共知的拥护者，此外，帕切科还是臭名昭彰的1847年内阁[211]的成员。另一个是萨拉萨尔，他所以被任命仅仅因为他是埃斯帕特罗童年的朋友。为了奖励在街垒和广场上对人民的血腥屠杀，授予拥护埃斯帕特罗的将军们和奥当奈尔的朋友温和派无数的勋章。为了给彻底制服报纸打好基础，恢复了1837年的出版法。据说，埃斯帕特罗不召开制宪议会，只打算根据1837年宪法（据一些人说，甚至是根据纳尔瓦艾斯修改过的宪法）召开议院会议。为了充分保证这些措施和其他应该实行的措施获得成功，在马德里附近集中了大批军队。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反动势力进攻的突然性特别值得注意。

街垒司令官们最初到埃斯帕特罗那里去就内阁选举问题向他提了几点意见。埃斯帕特罗喋喋不休地解释他从各个方面遇到的困难，企图为他提出的任命进行辩护。但是，人民的代表显然很不满意他的解释。与此同时，传来了在瓦伦西亚、卡塔卢尼亚和安达鲁西亚发生了共和派骚动的“令人非常不安的”消息。从埃斯帕特罗的批准各省洪达继续行使职权的命令中可以看出他的惊慌失措。他也不敢解散马德里的洪达，虽然内阁已经组成，并且已经就职。

根据小拿破仑的要求，沙尔腊斯上校被赶出比利时。“比利时独立报”驻巴黎记者报道了炮弹国王①王位的追求者缪拉特亲王（他认为这个王位是缪拉特家族的法定遗产）所写的并由他发表的一篇抨击文。这篇文章被译成了意大利文。

① 即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丹麦内阁仍然坚决拒绝向西方强国提供能使它们的军队在波罗的海过冬的港口和登陆地点。但是，这并不是丹麦政府对那些起来反对丹麦的保护者——俄国皇帝——的西方强国表示轻视的唯一方法。丹麦政府面对着西方强国的海陆军，毫不动摇地实行了它策划已久的完全是为了俄国利益的 coup d'état〔政变〕。7 月 26 日，在哥本哈根公布了一个政府文件，标题是："丹麦君主国一般事务方面的宪法"。奇怪的是，英国报纸几乎完全没有理睬这个措施。因此，我现在把这个丹麦新宪法的最重要条款列举出来：

第一条 丹麦君主国的王位继承制度由 1853 年 7 月 31 日的法律规定。

第五条 凡没有明确指出属于某一部门的事务，均属君主国的一般事务。

第六条 君主国的总支出超过收入时，按下列比例补偿：丹麦担负 60%，什列斯维希担负 17%，霍尔施坦担负 23%。

第七条 君主国的一般事务由议会管理。

第八条 现届议会完全由国王任命的议员组成。将来的议会议员应当部分地由选举产生。

第十条 那时议会将由 50 名议员组成；其中 20 名由国王任命，30 名按下列比例选举：18 名由丹麦各界代表会议选出，5 名由什列斯维希各州选出，6 名由霍尔施坦各州选出，1 名由劳恩堡贵族选出。

第十一条 1849 年 7 月 5 日颁布的丹麦王国的根本法只涉及该王国的内部事务。

第十五条 议会议员的年薪为 500 塔勒。

第十六条 议会每两年至少召开一次，会期由国王的命令规定。

第十七条 议会会议在哥本哈根举行，但是国王可以改变会址。

第十八条 议会的工作由国王任命的主席主持。辩论可以使用德语或丹麦语；决议必须用丹麦文书写。

第十九条 议会会议是秘密的。

第二十一条 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改变或废除全君主国的任何共

同捐税，也不得举借任何国债。

第二十二条 除了联合君主国的财政以外，议会对一切班务只有发言权。

同一天颁布的法令规定在1854年9月1日召开议会，而在另一个法令中公布了国王任命的议员，被任命的都是宫廷的达官显贵和丹麦国旗骑士团的骑士。

通过这种新的coup d'état〔政变〕达到了以下几个主要目的：废除丹麦的根本法和代议机关，建立了一个便于宫廷和政府得到，它们需要的任何数目款项的机构。

厄内斯特·琼斯重新到各工业区去作宣传旅行，以便把它们吸引到宪章运动中来。在他到过的哈里法克所、贝凯普和其他地区，通过了如下的递交议会的请愿书：

“在1854年7月30日（星期日）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贝凯普的居民谨向在议会开会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极可尊敬的下院议员呈递请愿书如下：

你们的请愿者长时期观察了现在女王政府各个大臣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的活动，并且根据毫无偏依的观察深信，在这两方面大臣们都根本不值得国家的信任。

你们的请愿者深信，只要这些人管理国家事务，就既不可能改进内部的管理，也不能够对外显其威力。

所以，你们的请愿者请求你们极可尊敬的议院奏请女王，请女王陛下赐予解除她现在的顾问们的职务，并且邀请那些更符合时代进步精神更符合我们时代要求的人来辅佐她。

你们的请愿者将坚持自己在请愿书中提出的各点。”

星期天，在贝凯普的迪尔普利一摩尔举行了群众大会，鼓动家[①]在会上发表了他生平所发表的一篇最出色的演说，其中有几

① 即厄内斯特·琼斯。——编者注

段值得贵报予以转载：

“行动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们现在进入了宪章运动自衰退以来不会有过的复兴时期。我们争得宪章的时刻终于临近了……

你们进行过反对降低工资的斗争，但是徒劳无益；饥饿迫使你们举行起义。如果饥饿教会你们去战争，那末贫困就给你们以启发，每经过一次失败，你们的觉悟就提高一步，你们的经验就丰富一些。你们曾经采用的首要方法是组织联合会和举行罢工。你们以为这些方法会使你们获得解放，但是你们忘记了，既然劳动资料不属于你们所有，你们就经不起资本家的竞争，你们在忍饥挨饿，他们的钱袋可以万无一失地放着，等着瞧谁坚持得最久。以后你们曾经希望不完全工作日，而且有人对你们说，如果每个工人少工作两小时，就可以为失业者找到两个小时的工作。但是，你们忘记了，当你们争取到把工作时间缩短百分之一，垄断资本家采用机器装备的程度就增加了百分之一百。

以后，你们求助于合作社。你们了解到一个伟大的真理，劳动的解放应当依靠合作社，但是你们忽略了保证这种解放的手段。谁要进行生产，谁就需要市场；如果你们有什么东西要卖出去，你们就需要一个想买这个东西的人，—— 但是你们忘记了，你们没有这么‘一个人’。合作社开始生产了，但是市场在哪里呢?你们究竟在哪里找到市场呢?怎样才能使贫者变成富者，使他们能够成为合作社生产的产品的购买者呢？依靠英国本土上的铜矿，在地面上、在田野滚滚的麦浪中，你可以看到铜矿含的金子。瞧瞧你们脚下吧！在这里，在你们所坐的绿草如茵的斜坡上；在这里，在你们所站的宽广的田野上，—— 在这些地方隐藏着自由，在这些地方隐藏着合作社，在这些地方隐藏着高额工资，在这些地方隐藏着繁荣与和平！我们英国现在有 1500 万英亩公有土地，有 2700 万英亩牧场。根据希腊神话，当海格立斯同大地的儿子巨人安泰斗争时，海格立斯好几次把他摔在地上，安泰每次都倒在母亲怀里，从母亲身上汲取新的力量，因而跳起来比以前更加有劲。海格立斯窥破了这一点，就把他举到空中，结果便战胜了他。

劳动— 巨人也正是这样，按照垄断组织— 海格立斯的意志，他同产生了他的大地分离开来，他被竞争的魔爪紧紧掐住，变得软弱无力，无依无靠，像穆罕默德的坟墓一样吊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只是更接近后者！

究竟怎样才可以接近大地呢？有人对你们说，为了这个目的根本不需要政权。是谁这样说的呢？莫非是争取把工作日缩短 10%的运动的领袖说的，或者是这样一些运动的领袖例如争取 10 小时工作日运动的领袖、争取不完全工作日运动的领袖、争取限制机器工作时间的运动的领袖、争取建立管丧葬的慈善机关的运动的领袖、争取政教分离的运动的领袖、争取实行国民教育的运动的领袖、争取地方自治的运动的领袖，或者是什么其他运动的领袖说的？'运动' 多么纷繁，而我们仍然原地不**动**。不需要政权！可是，为什么这些人又那样喜欢围绕着政治的幻想国跳舞，为什么他们把哀求的代表团派到政客帕麦斯顿那里去并向政治性的议会呈递请愿书呢？为什么要向政治王位卑躬屈膝呢？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效法他们的榜样，也正应当争取这种政权！只有这些人才劝你们为你们的**敌人**争取政权。可是我要对你们说：争取**自己的**政权。我告诉你们一个伟大的真理：

宪章是使你们摆脱一切贫困的手段。

是谁反对你们呢？首先是联合内阁。联合内阁是什么呢？是那些一个也不能独立自主的派别的领袖。这十来个人极其软弱无力，根本不能自立，—— 因此，他们互相依存，他们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真正的人。所谓的联合不过如此而已。还有谁反对你们呢？反对派托利党。它也许会赶走内阁，可是不敢这样做，因为它知道，它自己也将被赶走，以后便会出现这样一个大洪流，在这个洪流的冲击下，连挪亚①本人也不能挽救统治阶级。还有谁呢？土地贵族，他们把四分之三的领地按照大约三分之二的价格抵押出去，—— 这是能够镇压人民的多么强大的力量啊！38000 名破了产的大地主和 30 万在高额地租、大地主的狩猎法和暴政的压迫下呻吟的农场主。还有谁呢？还有由于自己卑鄙地热衷于竞争而濒于破产的厂主，—— 他们很快就不能维持自己的工厂了。这是立意要从你们脚下把自由的柱脚打碎的不折不扣的势力！剩下的是什么人呢？工人和小店主。曾经不止一次地企图用什么妥协的办法把他们联合起来。我本人过去始终反对这种联合，因为在选举权范围内的妥协只能加强金钱利益的代表们和改善阶级立法。但是，现在实行这种联合的时候终于来到了，现在既不需要妥协，也不需要叛卖。小店主很快

① 圣经中的神名，据说神降洪水于大地，要灭绝万物，挪亚带着他的妻子、儿子以及被他救出的活物乘坐方舟飘浮，人类和生物得以流传下来。—— 译者注

就会成为民主派。据说，通往工人头脑的道路必须经过他的胃。就算是这样吧！可是，通过小店主的心的道路却需要经过他的口袋。他每失掉一先令，就获得一种新的思想。破产向小店主揭示出真理……我们敌人的道义力量就这样被消灭，而我们则增加了新的同盟者。我们敌人的肉体力量也在消失。沙皇曾对这一点表示关怀！在爱尔兰还剩下不到1000名英国兵士！在英国本土上已经没有正规军队了，可是还有民军！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民军中开小差现象之多弄得‘号叫’已经无济于事，于是把专门的通告分发到甚至逃兵曾呆过一星期的每一个小教区，每一个小市镇，企图用暴力和恫吓迫使他们归队。可以祝贺政府拥有这样一支新的军队。总而言之，战场是干净的，—— 对人民有利的时机到来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指的是暴力。不是，绝对不是！**我们指的是广泛的、和平的道义运动**。但是，从**我们**指的是道义力量这一点绝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的**敌人也**指的是这种力量。

英国已经开始在考虑和倾听了。在这以前，它听到的是波兰的战鼓声和维也纳的马蹄声。在这以前，它听到的是米兰的叫喊声和巴黎的欢呼声！但是，在目前的暂时的沉寂中，英国开始听到它自己的骄傲的心脏的跳动，—— 并且高呼：‘我也要完成一桩事业，—— 我也应当粉碎敌人和夺取战场。’”[212]

大会主席曾指出有监视人和其他警官到会，希望在这些政府仆从的报告中对会上的讲话不要进行任何歪曲。关于这个警告厄内斯特·琼斯说道：

“至于我个人，我丝毫不在乎他们说些什么，—— 随便他们说去好了。我对待鼓动就像战士对待战斗一样，—— 我在枪林弹雨之中迎接自己的命运，或者倒下、牺牲，或者活着、取胜，因为我是一个民主战士。”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8月8日

载于1854年8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62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撤出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波兰。——西班牙人民的要求

1854年8月11日星期五于伦敦

“通报”昨天刊载的一则消息说，

“俄国驻维也纳大使通知奥地利内阁说，尼古拉皇帝下令全部撤出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尽管有了这一声明，布奥尔伯爵仍于8月8日跟德·布尔克奈男爵和威斯特摩兰勋爵交换了照会，而根据照会可以看出，奥地利同意法国和英国关于必须要求俄国**保证**不再引起冲突而破坏欧洲安宁的意见，并且答应在没有获得这些**保证**、普遍和平没有恢复之前不同彼得堡内阁缔结任何协定”。

这些保证应当是什么样的，可以从今天的“泰晤士报”看出来。第一，撤出各公国；第二，以全欧的保护权代替俄国的保护权；第三，

“修改海峡条约并采取措施使俄国的海上优势缩减到不致威胁土耳其的生存和黑海和多瑙河口的航行自由”。

“通报”的消息基本上由克拉伦登勋爵在昨天上院会议上的声明证实了。从其他方面我们也了解到，俄军的大本营已转移到布泽岛，俄军4个团已渡过普鲁特河，奥地利政府方面也撤销了以若干兵力加强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加里西亚边境上分散成梯队的各个军团的命令。

战史上未必有过比俄军撤出多瑙河各公国更奇特的行动了。问题在于，这种行动只能从外交上，而决不能从战略观点上找到解释。正如“论坛报”已经讲过的，奥地利和俄国拟定了一个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一当沙皇的虚荣心由于夺取锡利斯特里亚而得到满足，奥地利就应当占领多瑙河各公国；在一项特别条款中已预计到俄国失败的可能，根据这项条款，奥地利就在俄国失败时也应当去占领多瑙河各公国。因此，在俄国解除对锡利斯特里亚包围的前一天，土耳其和奥地利签订了一项条约[213]，规定奥地利有权进入瓦拉几亚。条约有三个目的：第一，不让土耳其进入多瑙河各公国；第二，“沿整个奥地利边境建立一道防止革命传染病的防疫线”，最后是保证俄军的安全退却。从克拉伦登勋爵的供认中可以确实地得出结论说，这个条约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强加于土耳其政府的；同时，御前会议颁布了一项决定，按照这个决定，应当让俄国人在撤离他们的部队时不受追击。可见，俄军从多瑙河的仓促撤退如果不是俄奥协定规定好的，那就无从解释了。奥地利人原定 7 月 3 日把军队开进瓦拉几亚。为什么他们又延期了呢？原来他们在争取土耳其政府一次又一次的让步：第一，关于应在瓦拉几亚建立的政体；第二，关于把土耳其人排挤出他们自己的领地。然后奥地利人声明，他们占领瓦拉几亚并不意味着宣战。克拉伦登勋爵说：

“6 月底，当俄军准备撤出瓦拉几亚时，奥地利政府派了司令部的一位军官海斯将军通知联军总司令说，奥地利政府打算代表苏丹占领瓦拉几亚的一部分领土，而且是为了恢复苏丹在该地的权力；但是，奥地利人将不是作为交战的一方在该地出现，**因为**奥地利同俄国不处于战争状态，并且它目前还未收到它向俄国提出的要求的答复。”

奥地利的这种不明智的坦率引起一场混乱，于是需要再度延期。接着是嫉妒奥地利在多瑙河扩张势力范围的普鲁士提出抗议。虽然这两个强国都是俄国的工具，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们经常互相嫉妒，而这一点在1850年“马铃薯战争”[214]时表现得很明显。如果乌尔卡尔特先生仔细读过当年的华沙议定书，他也就决不会产生把普鲁士突然变为反对俄国的欧洲堡垒的妄诞念头。

已经开始撤退的俄军一看到奥地利错过有利的时机，便又折回来重新向多瑙河推进，因为，如果在奥地利采取行动以前就从瓦拉几亚撤退完毕，那末让奥地利随后进入这个公国的任何借口也就不存在了。可是鲁舒克的一位土耳其将军①，据“泰晤士报”说，“想像”俄军正在全部撤退，于是向茹尔日沃进军并彻底地打垮了他们，从而使他们不可能实现任何重新占领多瑙河一线的企图。由于这次失败，俄军不得不认真考虑撤退问题；促使他们采取这一决定的还因为他们懂得：土耳其的所谓盟国不可能再消极下去，英国政府不得不照顾到它的军队和社会舆论，因而必将采取某些反对俄国的行动。撤出多瑙河各公国增强了俄军在贝萨拉比亚和克里木的防御力量。因此，我们从一则电讯中得知，俄军的一些团即将火速从贝萨拉比亚和赫尔松向克里木转移，并由驻莫尔达维亚的一些团来接防。

可以预料到，土军不会坐失良机。8月6日，他们的前卫在伊斯甘德－贝伊的指挥下进入布加勒斯特，土耳其将军在土耳其的敌人1853年进入这个城市的一周年时接见了瓦拉几亚首都的代表团。

---

① 即奥美尔－帕沙。——编者注

这样奥地利人又错过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并且丧失了进入瓦拉几亚的虚假借口。现在，再去占领必然会使他们同土耳其人发生冲突。虽然奥地利报纸痛斥土耳其人进入布加勒斯特，认定这个行动违反了条约，但英国官方报刊却痛斥奥地利人自己由于迟缓和愚蠢而使制订得如此周密的计划化为泡影。例如，星期四的“泰晤士报”就写道：

“奥地利人由于迟缓失去了在多瑙河各公国能够取得的地位的全部利益。奥美尔－帕沙利用了这个情况并且紧跟着撤退的敌人前进。瓦拉几亚的大部分土地现在已被苏丹的军队占领。多瑙河从沃尔肖伐到加拉兹已在他们的手中，同时没有任何根据设想，哪一个强国能要求土耳其司令官退出他按照主人的权利并且依靠他的军队的英勇所占领的地区。”

现在留给奥地利人的，就只是占领莫尔达维亚。

7 月 30 日从君士坦丁堡来的消息谈的几乎全是计划中的对克里木的远征。7 月 27 日，一支由 20 艘舰艇组成的分舰队返回了。它是在布律阿海军上将的指挥下并在布朗和康罗贝尔两位将军的随同下，于 7 月 21 日离开巴耳契克去侦察从阿纳帕到塞瓦斯托波尔一带的海岸的。返回后，康罗贝尔和布朗立即到瓦尔那、向圣阿尔诺和腊格伦勋爵报告他们执行任务的结果。英法军队都分散在瓦尔那和居斯坦杰之间的各个港口，以便于上船。看来，这次上船已在 7 月 29 日或 30 日完成了。土耳其舰队已经驶入黑海，而全部英法海军显然是在 8 月 1 日以前在瓦尔那地区集中了，因为在这个时候以前该地集结了大批军用运输船。关于这些军队的使命，“南方日报”说：

“一些人在谈论阿纳帕和附近的要塞，说要塞中驻有将近 2 万人，而攻占这个要塞立即就可以保障阿布哈兹、切尔克西亚同克里木之间的交通线；这样一来，切尔克斯人就会很容易地参加对克里木的任何进攻。另一些人认为

正打算进攻敖德萨，目前该地的守军约4万人；联军可以在这里修筑工事过冬，而且使贝萨拉比亚和克里木处于打击之下。第三个方案指出尼古拉也夫作为进攻点，该地有俄军的军火库；这个城市位于一个东面是德涅泊河、西面是布格河的三角形地区。”

俄军完全放弃了多布鲁甲，该地现已被36000名土军和法军占领。土军驻扎在巴巴达格，据报道它已接到进攻土耳恰的命令，法军也奉命进攻加拉兹。

据传，俄军在苏利纳河口建设的一个小镇先前就已经遭到部分破坏，在7月16日则被英国蒸汽舰“喷火号”和“维苏威号”完全摧毁，除一个灯塔和一所教堂之外，几乎没有一座建筑物被放过。

在白海，英国人在奥涅加河岸的一个地点登陆并毁掉了一个村庄。

黑海的“弗拉基米尔号”事件[215]引起了“泰晤士报”对邓达斯海军上将的猛烈攻击，“先驱晨报”对此作了如下的回答：

“查理·纳皮尔爵士在波罗的海上可以让斯维阿波尔格的舰队畅行无阻地开到它的停泊地，可以让汉古特修筑坚固的工事，然后使它遭到徒劳无益的轰击，可以容许浮标被去掉因而使船只失事，而对这一切，‘泰晤士报’不曾提出过任何指责。但是，对于邓达斯海军上将的问题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们从8月9日巴黎的来信中知道，东方的军团将增加5万人。如果战争不会带来任何别的结果，那末能使法国摆脱掉十二月政变的军队也好。

你们也许已经注意到，俄皇在他对土耳其的计划破产以后，又来利用波兰王的封号，而这一封号曾被他当废物舍弃，因为他以为自己在匈牙利取得胜利之后，波兰的合并已经是既成事实。我们在维也纳“新闻报”发表的8月1日的华沙来信中读到：

“据说，沙皇行将前往华沙，是表示将在民族权利方面对波兰人作某些让步。预料要召见早在1832年的波兰王国组织法中提到过的那些名士。人们推测，将重新开办学校，将颁布在正式文件中使用波兰文、每年公布收支情况和波兰人有权批准直接税的命令。同时还传说，波兰军队将重新建立起来，但是由俄国军官指挥。第四次新兵招募工作刚结束。居民们还从来没有过这样重的负担。”

我们在8月7日的“杜塞尔多夫日报”上也读到：

“据华沙消息，波兰王国的总督里迪格尔将军曾召集波兰贵族首领，建议向国王呈递一份要求重建独立的波兰王国的请愿书。”

形形色色的党派提过不少解决波兰问题的办法，但是像这位俄国将军所建议和规定的这种解决办法，是从来没有任何人想到过的。

哥本哈根来的消息说，低能的丹麦国王在内务大臣德·梯利希先生的陪同下已乘船前往卡尔斯克伦纳和瑞典国王会晤。梯利希是俄国的最狂热的拥护者之一，可以预料，两国国王会晤的目的是要同俄国恢复以北方武装中立[216]这个名称闻于世的友好同盟。如果丹麦和瑞典打算对俄国保持中立，那末不能从此得出结论说，它们对英国和法国抱有同样的打算，这一点从下面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来。几天以前，丹麦军队的炮兵司令梅萨将军在检阅国民自卫军的炮队时发表了一篇非常激昂的演说。他在演说中暗示说，国民自卫军的炮队同大军的炮兵部队一起响应国王的号召来共同保卫斯堪的那维亚祖国的日子可能已经不远了。

明日将宣布议会暂时休会。

“这一次议会会议解决问题的拖拉，不亚于克里木战局的军事行动的迟缓。”

几天以前，“喧声报”[217]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正在紧张作战

的西班牙人民和在他们上空互相拥抱的两个骑手——埃斯帕特罗和奥当奈尔。"喧声报"把仅仅作为革命的开始的东西错当作革命的结束。奥当奈尔和埃斯帕特罗之间的斗争已经开始了，而这个斗争不仅仅是他们之间的，而且是军事首领和人民之间的斗争。任命斗牛士普切塔为屠宰场的总管、成立街垒战参加者的奖励委员会以及指定两个法国人浦若尔和德尔马为当前革命的历史编纂者，都不能对政府有多大裨益。奥当奈尔希望根据1845年法律选举议会，埃斯帕特罗希望根据1837年宪法[218]选举议会，而人民却希望根据普选权选举议会。人民拒绝在政府政纲发表之前放下武器，因为在曼萨那累斯宣布过的政纲①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了。人民要求取消1851年同罗马教皇签订的条约[219]、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提出财政报告、废除一切铁路建设的合同和其他有关公共工程的欺骗性的合同和成立审判克里斯亭娜的特别法庭。她两次试图逃走均因遭到人民的武装抵抗而失败了。"政论家报"开出了她必须偿还国库的如下账目：从1834年到1840年期间她作为摄政女王非法窃取的2400万，她出国3年从法国回来后窃取的1200万和从古巴国库提取的3500万。这个账目是相当客气的。要知道，当克里斯亭娜1840年离开西班牙的时候，她带走了巨额款项和西班牙王国的几乎所有的珍宝。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8月11日
载于1854年8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66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见本卷第364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东方问题。——西班牙的革命。——马德里报刊

1854年8月15日星期二于伦敦

"科伦日报"报道：

"美国政府经过多年的谈判后宣称不愿修订它同丹麦之间的现存条约，如果该条约的第五款不改为允许一切美国船只自由通过松德海峡的条款的话。同时美国政府拒绝给予任何补偿。丹麦被美国人的行动吓坏了，于是向其他强国求援，据说普鲁士政府表示愿意派遣2万兵士去保卫松德海峡。"

因为松德海峡征收的关税对哪个国家也没有像对普鲁士那样重，所以普鲁士采取的措施，是再符合普鲁士政策的精神不过的了。总而言之，se non è vero，è ben trovato〔即令这不是实情，也算想得好〕。

法兰克福议会经过长期讨论公布了新的出版法和结社法。结社法干干脆脆禁止任何政治性的集会或会议，出版法则规定了巨额的保证金，规定任何出版物的出版均需经政府的许可并且取消了由陪审法庭审理有关破坏出版法的案件。

普鲁士政府中止了对拖延已久的柏林革命者的密谋[220]案件的审理。因为检察官宣布原告方面的主要证人——亨策先生——"值得怀疑"。这位亨策就是那个在科伦案件中，根据他的证词而使我的许多朋友在1852年被判徒刑[221]的人。但是1852年已经过

去了，普鲁士政府可能也不愿意冒险让它所有的警探再遭痛骂，以及让人们在反革命恐怖已经不能使人民畏惧的时候在首都追忆起科伦案件。

8月1日，塞尔维亚政府派了一个信使带着答复土耳其政府的指令的草案前往亚历山大公爵正在进行水疗的布列斯托瓦茨。这项答复经公爵签署后即刻发往君士坦丁堡。答复的内容是推说因为目前存在许多威胁着塞尔维亚的危险，所以不能裁军，但是指出，为了尊重奥地利的愿望和土耳其政府的命令，军事演习已经停止。贝尔格莱德的总督伊塞特－帕沙根据本人的请求被召回国。他的继任者尚未公布。

据报道，有一万名土军占领着布加勒斯特；但同时，我们在今天的“通报”上读到，奥地利等奥美尔－帕沙对卡利克上校的最近通知的答复一到，就要命令奥地利军队进驻多瑙河各公国。当布奥尔伯爵接到哥尔查科夫公爵关于俄军退出多瑙河各公国的通知时，他答复说：“多瑙河各公国将由奥地利军队占领，但这里并不包含对俄国的任何敌意”。

1854年议会的休会又使东方问题回到1853年议会休假期间所处的那个阶段。维也纳会议又将开始工作，以便削弱积极的活动，迷惑社会舆论并让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又有可能在议会复会时说：高贵的贤人是不爱怀疑的。应当指出，这次骗局不是出自奥地利，而是出自英国自己，这点你们可以从“泰晤士报”驻维也纳记者的报道中看出：

> “英国和法国的大臣通知布奥尔伯爵说，他们接到本国政府建议召开维也纳会议的指示。答复据说是：再没有能令帝国宫廷更高兴的事了。”

作为会议中新的谈判的基础的是维也纳照会[222]的一个新方

案，即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对涅谢尔罗迭先生的最近通知的复文；这个通知的要点与根据“泰晤士报”发表的条件而预料到的内容没有多大的不同，对这些条件，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已经作了分析。新方案中没有一字提到向土耳其、甚至是向盟国赔款的事。俄国所窃取的对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的保护权应当变为被欧洲篡夺的东西；对土耳其境内的基督徒的“保护权”也打算同样处理；土耳其的胜利成果只应当是奥地利可以在多瑙河上的自由航行以及对 1841 年的条约[223]的有利于各强国而不利于土耳其的修改。

克拉伦登勋爵星期四的发言（其要点我已经说过了）是对英国政府在东方问题上所奉行的政策的非常重要的供词。克拉伦登直言不讳地说：

“我想提醒你们，在 4 个多月以前，即 3 月 29 日就宣战了，大家——我说大家不是指女王陛下的政府，而是指那些最有才干、最有经验的英国的和法国的军官，——都以为当时俄国想发动侵略战争。谁也不认为，俄国既然在多瑙河以北集结了重兵，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在这里集中了大量的必需物资，却无意南进；相反地，大家都认为，俄国正打算这样做。虽然我们也没有怀疑过土耳其人的闻名的骁勇，但是我们仍然不能相信他们将会抵抗受过良好训练而数量上又占优势并由一些最有经验的将军指挥作战的俄国军队，何况，我们只知其名的唯一的土耳其将军——奥美尔－帕沙，当时还没有遇到一个使他从那时起就非常勇敢地用来奠定他的不朽的光荣和声誉的机会。法国政府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抱有相当明确的看法，因此，约·伯戈因爵士和一个有经验的法国工程部队的军官才被派到君士坦丁堡去，寻求防卫这个城市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方法；他们的使命的意义是如此重大，整个战局计划和这次使命的结果是如此息息相关，以至腊格伦勋爵和圣阿尔诺元帅都耽搁下来，以便能够亲自和被派去执行这个使命的军官们交谈。当时联军已经开赴构筑了庞大工事的加里波利。他们动身到君士坦丁堡去，时刻不忘必须保卫达达尼尔海峡。”

可见，当时盟国的全盘计划不外是让俄国长驱直入占领土耳其的欧洲领地，而让联军占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和达达尼尔海峡。这就是英法军队按兵不动和被歪曲解释的一切调动的原因。土耳其军队的英勇打乱了俄、英、法三国的巧妙计谋当然是“出乎意料的”。

在目前的西班牙革命爆发前几个月，我曾告诉“论坛报”的读者说，俄国的影响正用于挑起半岛上的骚动。俄国做这事并不需要直接的代理人。它有突然对伊萨伯拉女王和西班牙宫廷的可怕的失道寡义表示愤怒的“泰晤士报”——这个炮弹国王、奥地利的“年轻的希望”①、尼古拉和乔治四世的拥护者和朋友——为它效劳。此外，还有一些英国内阁的外交代表，而亲俄派大臣帕麦斯顿给他们画几幅半岛上的科堡王国的图画[224]，就能毫不困难地牵着他们的鼻子走。现在据可靠消息，不是别人，正是不列颠大使把奥当奈尔藏在自己的府邸，并说服现任财政大臣、银行家科耳亚多支付一笔为奥当奈尔和杜耳塞策划政变所需的款项。对于不相信俄国实际上已经插手西班牙事务的人，我以为可以让他回想一下累翁岛上的事件。1820年，在加迪斯集结了大批军队准备开赴南美殖民地去。岛上的军队突然宣布拥护1812年宪法，其他地方的军队也纷纷响应。我们现在从参加维罗那会议的法国代表沙多勃利昂那里知道[225]，俄国曾经怂恿西班牙远征南美洲，而又勾引法国进军西班牙。另一方面，我们从美国总统②的咨文中知道，俄国曾向他保证防止对南美洲的远征[226]。因此，不用太多的判断力就可以发现累翁岛上起义的主谋者。但我也可以举出另外的

① 即弗兰茨－约瑟夫。——编者注
② 即门罗。——编者注

俄国温情脉脉地注目着西班牙半岛上的骚动的例子。德·马尔利安尼先生在他的“现代西班牙政治史”（1840年巴塞罗纳版）一书中，为证明俄国没有理由反对西班牙的立宪运动，他写道：

“在涅瓦河畔可以看到向宪法（1812年）宣过誓并从俄国皇帝的手中接受军旗的西班牙兵士。拿破仑在向俄国的罕有的进军中，曾把拘留在法国的西班牙战俘编成一个特别军团，法军失败后，这个军团投到了俄国人方面。亚历山大盛情地接待了这些西班牙人，让他们驻扎在彼得哥弗，皇后常去看他们。有一天，亚历山大命令他们集合在封冻的涅瓦河上，领着他们宣誓效忠西班牙宪法，同时授给他们皇后亲手缝制的旗帜。从那时起命名为‘亚历山大皇帝’军团的这个军团，在喀琅施塔得登船开往加迪斯去了。这个军团1821年在奥康尼亚举行了争取恢复宪法的起义，证明了他们对涅瓦河上的誓言的忠诚。”[227]

俄国在比利牛斯半岛通过英国进行阴谋活动，同时却在法国面前诽谤英国。譬如，我们在“新普鲁士报”上读到：英国背着法国策动了西班牙革命。

引起西班牙的骚动对俄国有什么利益呢？俄国的目的是在西方进行佯攻，挑起英法之间的分歧，最后引诱法国进行干涉。英国的亲俄派报刊已经报道，法国六月起义者在昂德里修筑了街垒。在维罗那会诺上也有人曾经对查理十世说过类似的话：

“西班牙军队所创造的先例，引起葡萄牙人的效法，也推广到那不勒斯和皮蒙特，并在各地树立了军队干涉改革和以武力强迫国家接受法律的危险榜样。皮蒙特发生起义后，法国（在里昂和其他地方）立即就发生了追求同样目的的运动。第四十五团的25名兵士在罗舍尔参加了贝尔顿的密谋。革命的西班牙使一些怪诞的捣乱分子返回了法国，于是两国的民主派便携手共同反对君主制度。”

我们根本不是要说西班牙革命是出自英国人和俄国人之手。绝不是。俄国只是在知道革命危机已经存在的时候促进混乱。但

是，以后发生的真正的人民运动反对俄国的阴谋总是不亚于反对本国政府的专制行为。1848年在瓦拉几亚曾是这样，现在1854年在西班牙又是这样。

英国的狡诈在英国驻马德里大使豪登勋爵的行动中完全暴露出来了。他在离开英国返任之前召集了持有西班牙有价证券的人，号召他们要求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要他们宣称不如此就完全拒绝贷款给西班牙商人。他就这样给新政府制造了困难，而他到马德里后，为了博得西班牙人民的好感，他向街垒战的死难者捐了款。

“泰晤士报”指责索尔先生说，正是他为了美国现政府的利益策动了马德里的起义。可是，索尔先生没有在“泰晤士报”上写过文章反对伊萨伯拉二世，对兼并古巴有利害关系的党派也没有从革命中捞到什么东西。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倒是德·拉·孔查将军之被任命为古巴岛的军事总督这件事。这位将军曾经是阿尔巴公爵同索尔先生的儿子决斗时的监场人之一。如果以为西班牙自由派多少同意英国自由派科布顿先生的放弃殖民地的看法[228]，那就错了。1812年宪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把选派代表的单一制列入新法典来保持对殖民地的统治[229]。1811年，西班牙人甚至在当时唯一没有被法国占领的省份加利西亚招募几个团组成一支大规模的武装，以便把他们的南美政策同暴力结合起来。保存所有属于西班牙的殖民地几乎是这个宪法的最重要的原则，而今天的革命者却同意这个立场。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社会活动家们的行为都没有像在这次为了“道义”而发动的西班牙革命中表现得这样无耻。组成西班牙现政府的旧党派（埃斯帕特罗派和纳尔瓦艾斯派）的联合，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分赃——职位，任命，薪俸，爵位和勋章

—— 上面。杜耳塞和埃查古埃已经到了马德里，塞拉诺也请求允许他来，以便在掠夺中自己也得到一份。在温和派和进步派之间爆发了一场大争吵：前者的罪状是委任了所有的将军，后者的罪状是委任了所有的政治领袖。为了平息“平民”的激愤，斗牛士普切塔从屠宰场总管提升为警察局长。就连十分温和的“人民呼声报”也不掩盖自己的失望情绪。

“如果将军们和领袖们拒绝升官，树立大公无私和忠于革命所宣布的道义原则的崇高榜样，他们的行为就会更加令人钦佩了。”

分赃时的卑鄙无耻也反映在大使的任命上。且不提奥洛萨加先生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他在 1843 年在这同一个府邸作为埃斯帕特罗的大使时，曾同路易— 菲力浦、克里斯亭娜和纳尔瓦艾斯勾勾搭搭；也不用提亚历山大罗・芒之被任命为驻维也纳大使（他在 1844 年当过纳尔瓦艾斯的财政大臣）以及里奥斯— 伊— 罗萨斯被任命为驻里斯本大使和帕斯托尔・狄亚斯被任命为驻都灵大使（他们两个都是温和派的极其低能的分子），只要举出冈萨勒斯・布腊沃这个西班牙营私舞弊的化身被任命为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的例子就够了。1840 年，布腊沃创办了“闲谈”杂志，这个杂志像一种马德里的“笨拙”[230]。他在这里激烈地攻击了克里斯亭娜。过了 3 年，对官职的追逐使他变成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温和派的信徒。纳尔瓦艾斯在需要一个灵活的工具时，曾利用布腊沃作西班牙首相，后来，一当不用这个人也行的时候，就一脚把他踢开。布腊沃作首相时，曾任命一个叫卡拉斯科的财政大臣，这个人简直抢劫了西班牙的国库。他让他的父亲这位先前在国库中担任过不大的职务、后来因盗窃国库而被驱逐的人当了财政部副秘书长；布腊沃还让他的妹夫普林西佩，一个剧院的常客，当了女

王的侍从。当有人指责他变节和贪污腐化时，他回答说：“始终是一个样子的人不可笑吗？”而这个人竟然被选作“道义革命”的大使。

与当权派的这种玷污西班牙运动的卑鄙龌龊相反，令人高兴地听到，人民终于迫使这些英雄好汉们不得不把克里斯亭娜交付议会审理并同意召开没有参议院的、因而不是根据1837年或1845年的选举法召集的国民制宪议会。政府当时还不敢坚持它所拟定的选举法，而人民则一致要求普选权。在马德里选举国民自卫军时，选出的全是进步派。

各省都混乱不堪；各地都纷纷成立了洪达，并且在进行活动，每个洪达都颁布有利于本地方的法令：这个洪达取消烟草的专卖，另一个洪达废除了盐税。走私者大肆活动，而且活动得比较顺利，他们在西班牙是一支唯一没有被瓦解的力量。在巴塞罗纳，兵士们忽而发生内讧，忽而同工人殴斗。各省的这种混乱状态是极其有利的，因为它使首都无法控制革命的事业。

目前马德里出版的报纸有“西班牙报”、“新闻报”、“民族报”、“时代报”、“人民呼声报”、“西班牙日报”、“政论家报”、“希望”、“伊比利安日报”、“天主教徒”、“国民军报”、“独立报”、“国民自卫军报”、“埃斯帕特罗派”、“同盟报”、“欧罗巴日报”、“旁观者”、“自由党人报”和“革命回声报”。“先驱报”、“人民杂志”和“信使报”已经停刊。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8月15日
载于1854年9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72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马克思

*西班牙的革命。——博马尔松德

1854年8月18日星期五于伦敦

从“国民议会报”、“泰晤士报”和“辩论日报”的社论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纯粹俄国式的党派，或者是俄国—科堡式的党派，或者是立宪的党派都对西班牙革命的进程感到不满。或许，从这里可以作出一个结论：西班牙有某些好机会，虽然外部情况好像与此相反。

8月8日同盟俱乐部[231]代表团进谒埃斯帕特罗，把要求普选权的请愿书交给他。同样内容的请愿书纷至沓来。因此在内阁中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的辩论。但是拥护普选权的人同拥护1845年选举法的人一样遭到了失败。马德里“日报”公布了11月8日召开议会的法令；在法令的前头有一段致女王的exposé〔说明〕。选举将按略加修改的1837年选举法进行。议会应当是唯一的制宪议会，因为参议院的立法职能已经废除了。1845年的选举法中有两点仍然有效，即关于建立选举mesas（主持投票和公布选举结果的机构）的方法和议员人数（每5000人选举一名议员）。这样一来，议会将拥有420—430名议员。根据内务大臣桑塔—克鲁斯的通令，选民登记工作应当在9月6日前完成。在各省的自治机关对选民名单进行审核后，登记工作将在9月12日停止。选举定于10

月3日在各选区的中心举行。从10月16日起开始在各省省会统计选票。凡对选举结果发生争执而需要重新投票时，应于10月30日以前举行。在说明中毫不含糊地说：

"1854年的议会同前任1837年的议会一样，应当拯救君主制度；它应当使王位和国民之间发生新的联系；这些目的既不可能成为讨论的题目，也不可能成为质询的对象。"

换句话说，政府禁止讨论关于王朝的问题；由此"泰晤士报"作出了相反的结论，它认为，问题的提法将是这样：或者要当今的王朝，或者根本不要任何王朝；不用说，后一种前途使"泰晤士报"无限伤心，并打乱了它的一切计划。

1837年的选举法规定只有拥有或承租房产或地产、缴纳mayores cuotas（国家征收的船舶税）和年满25岁的公民才有选举权。此外，享有选举权的还有西班牙历史和自由艺术科学院的成员，神学、法学和医学科系的博士、硕士，神甫会会员，教区主教和他所辖的教士，有两年资历的法官和律师，服满一定期限的现役或预备役的军官，有两年服务期限的内外科医生和药剂师，身为某一科学院成员的建筑师、画家和雕刻家，官办学校的教授和教员。这个法律还规定剥夺不缴纳国家或地方税者、破产者、由于道德方面的缺陷或不够公民资格而被褫夺权利者和所有正受法庭审理的人的选举权。

这样，法令没有规定普选权，反而取消了议会对王朝问题过问的权力。但是甚至就是这样一种议会看来还不见得起被接受。1812年西班牙议会没有讨论君主制度的问题，只是因为这种制度徒有其名，国王好多年来就在国外，而不在西班牙。1837年议会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首先必须废除君主专制，然后才谈得

上对君主立宪制的态度。至于谈到国内总的情况，“泰晤士报”完全有道理埋怨说，西班牙没有法国式的中央集权制，因此只要那里继续保持着“无政府”状态（没有这种局面，任何革命都不可能获得成功），甚至在首都打败了革命也丝毫不能解决各省的问题。

不言而喻，西班牙革命有某些仅仅是它所特有的因素。例如，抢劫和反抗活动相结合——这个特点首先表现在反抗法国侵略的游击战中，后来，在1823年被“保皇派”和1835年以后被卡洛斯派承袭下来。因此关于下卡塔卢尼亚的托尔托萨发生大骚动的消息是毫不足奇的。这个城市的Junta popular〔人民洪达〕在7月31日的呼吁书中说道：

“可憎的杀人匪帮，借口要求取消间接税，占领了城市并蹂躏一切社会法规。它的行动就是掠夺和烧杀。”

不过，洪达迅速恢复了秩序：市民武装起来了，并及时赶来救助力量薄弱的守备部队。受命全权追究和惩办7月30日肇事者的军事委员会举行了会议。自然，这个情况使反动报纸有借口来大唱慈悲的高调。但是这些报纸的理由多么不正当，这从“贝云信使报”的消息中就可以看出：卡洛斯派在卡塔卢尼亚、阿腊贡和瓦伦西亚等省，也就是在卡洛斯派战争期间他们的主要巢穴所在的那些邻近山区举起了旗帜。正是在卡洛斯派当中最先出现了ladro faccioso，即自称是受政府当局迫害的政党的信徒的土匪。从维里阿特时期以来，西班牙游击队总有点土匪习气；但是最普通的土匪自封为游击队，这还是卡洛斯派的新发明。托尔托萨事件的参加者无疑就是这一类人。

列里达、萨拉哥沙和巴塞罗纳的情况是严重的。列里达和萨拉哥沙拒绝同巴塞罗纳联合起来，因为这两个城市被军人统治着。

但是，看来，甚至孔查也不能对付那里的风暴，而他的位置应当由杜耳塞将军接替，因为据估计，这位将军不久前所获得的声誉对于克服困难能够提供更多保证。

秘密团体在马德里恢复了活动；它们像1823年[232]一样领导着民主派。人民由于他们的坚持而提出的首要的要求是，从1843年以来的所有大臣都应提出自己的报告。

政府正在收购在街垒战中被人民夺去的武器。它用这种办法获得了过去保存在起义者手中的2500枝火枪。1843年马德里的jefe politico〔总督〕“艾阿库裘”唐·曼努埃尔·萨加斯蒂现在复职了。他发出了两份文告，一份致居民，一份致国民军。他在文告中宣布将坚决镇压一切骚动。解除萨尔托里乌斯走卒的各种职务的工作进行得很快。这或许是西班牙唯一进行得很快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所有各个党派都表现得同样干净利落。

以前的传闻不确，萨拉曼卡并未被监禁；他在阿兰惠斯被捕，但不久就被释放，他现在马拉加。

人民施用压力控制着政府，这在西班牙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事实，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和公共工程大臣所进行的频繁的人事更动，以及各该部门的管理工作的简化，都证明了这一点。

联合派，即科堡— 布拉冈萨[233]派非常软弱。不然它为什么要对来自葡萄牙的致马德里国民自卫军的唯一贺函这样大叫大嚷呢？只要稍微仔细一看就可以看出，这封贺函（从里斯本“进步报”发出的）同王朝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它只不过是我们在1848年运动中已经熟悉的一种兄弟般的问候。

西班牙革命的主要原因是财政状况，例如萨尔托里乌斯的关于提前6个月征收赋税的法令。当革命爆发的时候，尽管任何一

个部门都没有支款，但所有国家银行都是空虚的；而且，有好几个月专款没有专用。例如，在各个关隘征收的路捐，根本没有用来维修道路。公共工程的专门拨款情况也是这样。在检查公共工程方面的经济情况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工程开支的收据而是宫廷宠臣的收据。大家知道，金融业务早就是马德里最有油水的事业了。

1853年西班牙的预算如下：

王室费和亲王年费 ……………………	47350000 雷阿耳
立法 …………………………………	1331685 〃 〃 〃
国债利息 ……………………………	213271423 〃 〃 〃
内阁首相 ……………………………	1687860 〃 〃 〃
外交部门 ……………………………	3919083 〃 〃 〃
司法部门 ……………………………	39001233 〃 〃 〃
陆军 …………………………………	278646284 〃 〃 〃
海军 …………………………………	85165000 〃 〃 〃
内务部门 ……………………………	43957940 〃 〃 〃
警察 …………………………………	72000000 〃 〃 〃
财政部门 ……………………………	142279000 〃 〃 〃
抚恤金 ………………………………	143400586 〃 〃 〃
教会 …………………………………	119050508 〃 〃 〃
特别开支 ……………………………	18387788 〃 〃 〃
共计……………………………	1209448390 雷阿耳

尽管有这样的预算，西班牙仍然是欧洲征税最少的国家，而且任何地方的经济问题都没有这儿这样单纯。因为西班牙各自治机关按照传统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所以精简官僚机构在这儿困难最小，在关税改革和合理利用尚未出卖的 bienes nacionales〔国有土地〕方面情形也是一样。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问题在西班牙这样一个资源还很少开发、人口也很稀少（总共1500万居民）的国

家中是谈不上的。

你们从英国报纸上可以知道英国军队在博马尔松德的初步战绩。还没有一次机会报道什么真正突出的事件的可怜的报刊,现在对1万法国兵士战胜2000俄军感到欣喜若狂了。我们不来谈这些战绩,最好看一看占领属于斯德哥尔摩 faubourg〔郊区〕,而不是圣彼得堡 faubourg 的岛屿将会产生的后果。法国“世纪报”报道了而且许多报纸也都引用的一条消息说,瑞典将立即加入西方强国对俄国采取积极行动。这条消息的真实性如何可以从下述事实判明:瑞典签订武装中立条约正是当它能够在芬兰的沼泽和森林中顺利作战的时候。现在,当进行这些战斗的有利时机已经过去的时候,它会改变自己的政策吗?英国和法国已经拒绝了国王奥斯卡尔要求提供金钱和领土方面的保证作为他同意的条件。此外,如果瑞典真的打算出兵的话,那末瑞典政府关于流散整个分舰队的命令又怎样解释呢?这次被遣散的有战列舰“查理十二世号”和“奥斯卡尔亲王号”,巡航舰“德吉列号”以及轻巡航舰“格弗勒号”和“托尔号”。

现在,当博马尔松德所处的纬度的海面即将封冻的时候,占领博马尔松德不会有什么意义。在汉堡公认继博马尔松德之后将占领里加。这种看法的根据是“射手号”舰长希斯科特上尉写给英国驻默麦尔领事赫托列特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说,8月10日以前一切外国船只都要离开里加湾。

普鲁士显然正在大力支持同俄国接壤的国境线上的军火走私,同时准备同西方强国断绝关系。科尼斯堡、但泽、科尔贝克和施维讷谬德等港口的司令官已接到加强各该要塞的命令。

挪威和瑞典的最有权威的报纸声明说:

“在对于俄国一定被击溃、波兰一定恢复这一点还没有确定的绝对的把握的时候，加入盟国并冒巨大牺牲就是最狂妄的举动。而在有把握的情况下，甚至将芬兰交给瑞典也只是一种骗局和圈套。”

同时需要记得，所有这些北欧国家政府都同本国人民有冲突。例如，在哥本哈根情况是这样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决定根本不参加议会的选举，而就在这个时候哥本哈根的选民们向上院议员马德维博士递交了一封呼吁书，建议他不要接受出席议会的委托书，因为国王的敕令破坏了丹麦宪法和丹麦人民的权利。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8月18日

载于1854年9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74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博马尔松德的夺取[234]

（第一篇论文）

联军终于采取了坚决的行动，夺取了博马尔松德。8月3日和4日，法军和英国海军陆战队在阿兰群岛登陆；10日包围了要塞；在以后3天中构筑了炮台，架设了火炮；14日开始射击；15日以强攻夺取了两个圆形塔楼，一个是法军攻下的，另一个是英军攻下的；16日经过短促的战斗后，这个大型穹窖堡垒投降了，在这次战斗中，联军几乎没有什么损失。毫无疑问，行动如此迅速则证明联军是相当勇敢的。根据我们原先掌握的全部材料判断，本来认为夺取这个要塞必须通过正规围攻，至少得构筑一道平行壕，还需要进行两星期左右的接近壕作业。甚至早就吹嘘联军步兵只要用刺刀猛攻就足以使石墙粉碎的伦敦“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承认：不围攻毕竟是不行的，而且这种令人疲惫的行动大概要持续两个星期之久。

因此，既然在包围要塞后约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开始掘壕后的第六天就攻击成功，那末自然就得出一个结论：围攻者所遇到的困难比他们料想的小得多。究竟是什么帮助他们完成了任务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未接到有关围攻的详细报告以前，当然只能猜测；不过，有一些情况可能是对他们有利的。很大一部分守军是芬兰人，一部分甚至是阿兰群岛的本地人。不用说，他们对俄国不会

抱有很高的爱国热忱。据逃兵供认,如果有可能,他们甚至决定根本不进行抵抗。看来,岛上的居民在确信联军肯定要攻击博马尔松德以后,便把联军当作使他们摆脱俄国桎梏的救星来欢迎,当然就给联军提供各种情报,并从各方面给予帮助。但是,问题的实质应当是要塞本身在构筑方面存在某种严重的缺点。由于我们不可能得到要塞平面图,所有关于要塞的情况都是根据略图和要图以及一些外行人(无论如何不是工程师)的非常含糊不清的记述材料而来的,加之在略图和记述材料的细节又有许多互相矛盾之处,所以我们不打算分析这个缺点究竟是什么。

然而,按要图来看,两个圆形塔楼在一定程度上可用火力彼此从侧面掩护;但由于在任何圆形工事中火炮必须作环形配置,火力必然非常分散,所以工事越小,因而容纳的火炮越少,那末火力的分散程度就越大,射击效果就越小。因此蒙塔郎贝尔曾细心地警告说:应当避免采用这种塔楼,除非每一塔楼能得到左右相邻塔楼和后方主堡的有力支援而弥补火力分散的缺点。如果五六个这种塔楼能把火力集中于一点,那末原来非常分散而薄弱的火力就变得非常密集而有效了。此外,蒙塔郎贝尔知道得很清楚,在围攻的最后阶段,即进行强攻时,对付攻击者最有效的火力是步兵火力。因此,他不仅规定在塔楼内要有步兵的防御设施,而且通常还构筑特殊的隐蔽路或堑壕把各个塔楼连接起来,这种堑壕不仅保障通行的安全,而且可供步兵射击时使用。我们刚好有阿拉伯堡的例子来证实这种堑壕的用处。阿拉伯堡的整个侧面全靠这种堑壕来防护,从而保障了人数很少的阿尔纳乌特人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俄军的攻击。最后,蒙塔郎贝尔还尽量使塔楼完全避免遭受 coup de main〔突然袭击〕。他在塔楼的周围挖掘了壕沟,构筑了隐蔽路,有时干

脆就把塔楼作为 réduit〔内堡〕，即作为坚固的大型多面堡的最后一道预备的阵地来使用。这是他最成熟的、看来也是最正确的设计。近代一切筑有蒙塔郎贝尔式小型塔楼的工事差不多都采用了这种设计，只是多少作了一些修改。为了使攻击者更难于接近塔楼，他还极其巧妙地构筑了整个塔楼的底层或地窖以供步兵防御之用。

然而，正是在所有这些方面，俄军显然有着严重的缺点。强攻火力的持续时间是 20—30 小时，这样的时间用来打开一个相当大的缺口，哪怕用三十二磅加农炮来轰击也显然是不够的，除非要塞石砌体的质量没有达到一般工事的标准。因此可以认为，塔楼是由兵士利用云梯爬进炮眼，炸开塔门以后攻下的。而做到这一点的先决条件就是掩护塔楼翼侧的火力非常薄弱，看来在后方，主堡附近并没有炮台支援塔楼，所以每个塔楼仅仅得到另一塔楼从侧面的掩护。从要图上看得很清楚，堡垒附近的地形起伏极大，强攻部队可以利用地褶隐蔽地进到十分靠近的地方，因而上述缺点就显得更为严重了。其次，就要图和事实判断，俄军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预防 coup de main。在塔楼的周围，看来根本没有多面堡，而俄军构筑在塔楼前的那些多面堡又几乎没有抵抗就放弃了。据说每一塔楼的四周都掘有壕沟，但是显然太浅，并且不适于步兵的防御。联军只要一攻下塔楼，被塔楼控制的主堡就必然落于联军之手。因而主堡很可能仅在形式上抵抗一下就陷落了。

如果就围攻时间较短这一点来判断这些工事，可以认为，当初的建筑者根本没有考虑过敌人从陆上大举进攻的可能性。他们在建筑这两个塔楼时，大概只注意到抗击敌人海军陆战队的孜击，而海军陆战队，充其量也不过 2000 人，不足以进行强攻或进行什么

有效的正规围攻。因此,防御力最强的是向海的一面,而设有塔楼的向陆的一面的防御力量则只是虚有其表。其实,根据经验来看,甚至 1000 名海军陆战队就可能在好几个月前以强攻夺占塔楼,从而迫使主堡投降了!

至于强攻,无论法军或英军,似乎都进行得很好。英军是有名的强攻能手;强攻是他们惯用的方法,并且运用起来几乎一贯得心应手。法军比较喜欢平地的攻击;而在围攻时,由于他们思虑缜密,宁愿遵循按步就班的、具有法国特点的沃邦围攻法。但是这一次,就连他们也显然被英国一员老将的毅力吸引住了。在博马尔松德的英军中有一位叫琼斯的老上校,他赛过了沃邦,在攻击巴达霍斯、罗德里哥城和圣塞瓦斯田的勇敢顽强的守军时,竟在器材显然不足的情况下巧妙地将预定的围攻期限缩短了几乎三分之一。琼斯上校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同他的同行的见解相反,他不认为围攻是一种考试仪式,要让总工程师通过考试并在整个军队面前证明他对于正规围攻的全部规定以及沃邦的“要塞围攻法”[235]的一切原则记住了多少,理解了多少。他不认为整个军队只是为了一些工程师而集合到现地,在他们表演魔术时来保护他们。琼斯上校首先是军人,其次才是工程师。他非常了解英国兵,知道他们能做些什么。这一次迅速、坚决而又没有大事声张地在规定期限的一半时间内攻下博马尔松德,使人回想起打开西班牙要塞缺口和对它们进行强攻的情况,觉得当时除琼斯老将以外,别人是不能指挥的。法军从来不会想到用这种方法夺取要塞。这种方法同法国人的整个性格相反,它过于直截了当,太缺少温文尔雅的风度了。但是,他们无法非议这个人的威望,因为早在 50 年前他就以他们为对手,试验了非正规的攻取要塞的方法,并证实了这种方法总是能够达到

目的的。不过当战事发展到强攻时，法军在坚决性方面看来并不亚于英军。

有趣的是，以善于强攻而自豪的俄军，从皮列柯普和奥查科夫到华沙和贝斯特里察河，每一次企图以强攻夺取野战工事都遭到了反击，而在锡利斯特里亚的战斗中，甚至用正规围攻也未能夺下野战工事，而且还不得不撤退，尽管要塞中的土耳其守军并没有得到任何支援。另一方面，在这次战争一开始，土军就以强攻夺取了俄军的永备工事——圣尼古拉堡垒，而现在著名的博马尔松德要塞也被攻占了，它这一次发挥的作用只勉强抵得上一道暴露的堑壕。还必须指出，根据一切情况来看，英法舰队在这次胜利中没有发挥任何重大的作用。看来，舰队照例力求离穹窖炮台远些。

但是，联军这次胜利的性质却是这样：他们在即将到来的秋季里大概不会再采取什么行动。无论如何，向塞瓦斯托波尔进行大规模远征的部队还没有乘船出发，并且已经宣布将再推迟几个星期。而那样就会为时过晚，因此，联军威武的兵士们在瓦尔那兵营历尽艰难以后所迫切需要的冬季休整和喘息机会便有了保证。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8月21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9月4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7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博马尔松德的夺取

（第二篇论文）

报刊上报道的关于夺取博马尔松德的详情仍然模糊不清和不够实事求是。这样，我们实际上就无法知道破城炮队的配置地点距堡垒有多远，舰只在海上攻击时停泊在何处。出乎意料之外，甚至在联军攻占堡垒之后，我们也没有得到有关堡垒构造的任何新的材料。对于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都避而不谈，供读者欣赏的与其说是些技术上的细节，不如说是些绘声绘色的描述。甚至公报也是如此草率，以致不可能研究清楚，法军在夺取一个除了指挥官以外大概谁也没有抵抗的伊捷耶（当地写法）堡垒时是否进行了强攻。

我们所获得的有限材料正同我们根据要图所作的判断相同：两座塔楼都建筑在起伏相当大的地形上，因而雏谷、斜坡和岩壁形成了几乎直通到塔楼的壕沟边的天然接近壕。联军可以方便地配置在这些雏谷里，而无须顾虑从头上飞过去的俄军霰弹。这样一来，联军便有了把炮队配置在目标附近的可能，因而从围攻的第一日起就用上了通常在围攻最后阶段才使用的那种炮队，即破城炮队。俄军把工事构筑在这种地形上，而且又没有把工事前至少600—800码以内的地面加以平整，根据这种情况来看，他们并

没有考虑到来自陆地的严重攻击的可能性。看来，破城炮配置在离堡垒不超过500—600码的地方，因为法军是用十六磅加农炮射击的，一般认为这种火炮即使从100—150码的距离上发射也不足以在城墙上打开缺口。然而，在36小时的炮击之后，塔楼已遭到相当的破坏，再经12小时的轰击即可把整个正面破坏。英军轰击诺提奇堡垒用的是60门三十二磅加农炮，每门炮重45英担。

根据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的“海军炮兵”[236]一书所讲的，这种火炮使用规定的7磅装药，在400—500码距离内发射的实心弹对坚实的橡树的贯穿力为2—2．5英尺。法军十六磅加农炮的实心弹使用5磅装药时，在400—500码的距离内对橡木工事的贯穿力为1．5—2英尺。如果英军像所能推测的那样把装药量至少增大到8磅，那末，在火炮增加1倍并且口径增大1倍的情况下，英军在不到12小时的时间内就打开了工事的一面，这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海上攻击，那不过是一种牵制行动。只有佩勒姆舰长一人利用机会进行了一次科学实验。他使用八英寸长管主炮，以破城射击所需的那种顽强精神和均匀速度，尽可能固定不变地向同一点射击。这种八英寸的长管炮是英国海军中最好的火炮。它很重（95英担），因而在用六十八磅的实心弹射击时可以使用十六磅的装药。甚至在500—600码的距离上发射，其破坏作用也比破城炮队迄今通常使用的十八磅或二十四磅炮弹的作用大得多；只要使用得当，这种火力定会产生巨大的效果。佩勒姆舰长的顽强的火力很快就揭露了俄国花岗石要塞的秘密。只用几发炮弹就使围墙的外层坍下了一大片，原先看来像是一整块的花岗石，而实际上只不过是厚度同高度和宽度完全不相称的一块砌面板。再加几发炮弹，连旁边的石板也崩坍下来了，这时围墙轰然一声坍下一

大堆乱砖碎石，暴露出要塞的心脏。于是一切都很清楚："花岗石"只是外表；只要砌在内岸的比较薄的石板一被炮弹击碎，里面就再没有任何坚固的石砌体能阻挡炮弹了。其实围墙不过是一层夹墙，中间填的是碎石、沙子和其他一些既不坚固又无附着力的东西。既然主堡是这样筑成的，那末毫无疑问，塔楼的砌造质量也不会好，因此，塔楼如此迅速地被打开缺口，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可是，就是这些抵御能力如此薄弱的围墙，竟以其雄伟的外表使整个英法舰队几乎惊呆了4个月之久！不过，查理·纳皮尔爵士看到这些工事原来是用什么材料筑成的以后所感到的失望，恐怕还比不上沙皇在得知他那耗费巨资的"花岗石"竟是什么东西以后所感到的失望吧。在陆地攻击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我们已经谈到过要塞周围的起伏地形，它靠近要塞不仅是在火炮射程以内，而且还在步枪射程以内。文森团的猎兵就利用了这种地形，隐蔽在树桩、巨石、岩壁等等后面，爬到很近的地点，然后对穹窖的炮眼猛烈地射击。在400—500码的距离内他们的步枪百发百中；而且每发枪弹只要击中炮眼，就像打中隧洞一样，顺着倾斜的墙壁直到最深处的中央的洞孔；因此不难想像，这对装填要塞炮的炮手们是多大的惊扰。

看来，俄军并没有采取最简单的措施来防备这种步枪的射击。他们也有猎兵。为什么他们不把猎兵配置在塔楼顶的胸墙的后面而对敌人的猎兵进行射击呢？显然，博马尔松德的芬兰猎兵并不乐意为神圣的俄罗斯的荣誉而战。而且，法军除攻城炮以外还使用了几门臼炮和3门榴弹炮。臼炮对爆炸弹无法炸穿的塔楼顶进行曲射，以便使坠力和爆炸力结合起来摧毁它。但是这种射击的效果显然很差。法军的榴弹炮则对炮眼进行平射。在400—500码

这样近的距离上，用长管的二十四磅青铜榴弹炮发射直径六英寸的炮弹，每三发肯定有一发可命中像炮眼这样的目标；而每一发命中目标的炮弹就意味着一个炮手班和一门火炮失去作战能力。可见这种射击该是非常有效的。

总之，我们看到，博马尔松德的花岗石围墙无非是俄国人的骗局，是在薄薄的石砌层里面的一堆乱砖碎石，不可能在稍长的时间内经受住准确而顽强的射击。如果说建筑围墙的人欺骗了尼古拉，那末尼古拉也毕竟成功地利用了这些虚有其表的工事欺骗了联军，迫使联军放弃了整个战局。总的说来，俄军防守得不够好，其原因可能是芬兰部队十分公开表现出来的情绪。联军的攻击的特点是他们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坚决性，这一点大概应归功于琼斯将军。在火炮的转移和架设方面所必须克服的一些困难，虽然被查理·纳皮尔爵士过分夸大了，但无疑也是巨大的。法军在攻击中使用了口径太小的攻城炮和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有很大用处的臼炮，但是他们用火炮和步枪对炮眼进行的平射却值得大加赞扬。英军和往常一样使用了能动到战场的最重的火炮，进行了暴露的、直接而有效的射击，克服了困难，并以其素有的顽强精神在敌人的火力下坚持作战，没有无谓的忙乱，但也没有特别新奇的表现而达到了目的。

博马尔松德被攻下了，但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怎样处理它？根据来自汉堡的最后消息来看，在海军将领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远征军的司令官们和高级军官们已经决定，如果瑞典不愿以向俄国宣战为代价占领博马尔松德，联军就将破坏一切工事而撤离该岛。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末阿兰群岛的远征就决非“通报”所断言的那样，是战略性的步骤，而是纯外交性的措施，目的是把

瑞典拖进来同这样一些强国结成危险的同盟，这些强国的友谊，按布莱特先生说，“在一年内带给土耳其的灾难，是俄国即使在野心最大的时候也未曾梦见过的”。瑞典的宫廷正犹豫不决，瑞典的报界在号召人民谨防那些《Danaos et dona ferentes》〔“即使是带来礼物的希腊人”〕[1]，但是瑞典的农民已经通过了请愿书，内容是议院应当请求国王永不再使阿兰群岛重新落入俄国手中。农民的请愿书未必会引起注意，很可能我们不久就会得到要塞被炸毁的消息。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8月28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9月13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8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编者注

革命的西班牙

卡·马克思

革命的西班牙[237]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8—11月

载于1854年9月9日和25日，10月20、27日和30日，11月24日，12月1日和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一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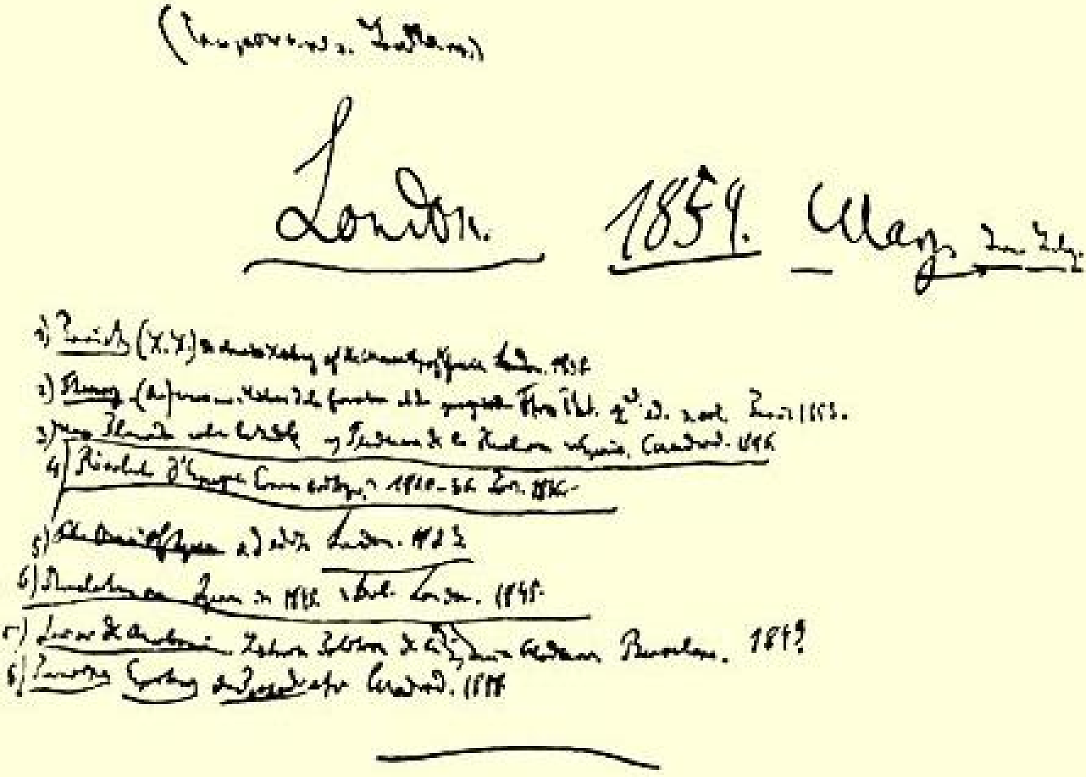
目前西班牙的革命看来具有持久的性质，于是，正像本报驻伦敦记者所报道的，有产阶级和保守阶级的代表人物开始离开国家到法国去避难。这也不奇怪，因为西班牙从来没有采取过 1848 年风行一时的在 3 天之内从头到尾完成一次革命的最新法国方式。西班牙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比较复杂而持久的。三年，看来是它给自己规定的最短期限，虽然西班牙的革命周期有时甚至延长到九年。例如，本世纪第一次西班牙革命从 1808 年延续到 1814 年，第二次革命从 1820 年延续到 1823 年，而第三次革命从 1834 年延续到 1843 年。这次革命将延续多久，将如何结束，就是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也难预测；但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整个欧洲，甚至包括土耳其和正在进行战争的俄国在内，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西班牙这样使善于深思的观察家感到如此浓厚的兴趣。

西班牙的起义正像它们向来反对的宫廷宠臣的权势一样，是由来以久的现象。例如，十五世纪中叶，贵族举行叛乱反对国王璜二世和他的宠臣唐·阿尔瓦罗·德·卢纳。在十五世纪还发生过更严重的变乱，反对国王亨利四世和他的权奸头子维尔埃纳的侯爵唐·璜·帕切科。十七世纪里斯本人民把瓦斯康谢尔奥斯这个西班牙驻葡萄牙总督手下的萨尔托里乌斯碎尸万段了，菲力浦四世在萨拉哥沙的宠臣桑塔— 科洛马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同一世纪末叶，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马德里人民起义反对伯勒普什伯

爵夫人、奥罗佩萨伯爵和梅耳加尔伯爵一伙的王后权奸，因为权奸对运入首都的一切货品都课以重税，然后分吞税款。人民前往王宫，强迫国王走到阳台上公开斥责王后权奸。然后群众又涌向奥罗佩萨伯爵和梅耳加尔伯爵的官邸，把这些官邸抢劫一空，烧个干净，同时要捉拿官邸主人，但是他们逃走了，以终身流亡的代价保住了生命。十五世纪起义的原因是亨利四世的宠臣维尔埃纳侯爵同法国国王路易十一订立了卖国条约，把卡塔卢尼亚割让给法国。3个世纪以后，查理四世的宠臣、他的王后的情人“和平公爵”曼努埃尔·戈多伊同波拿巴勾结签订（1807年10月27日）的关于瓜分葡萄牙和允许法国军队开进西班牙的枫丹白露条约，引起了马德里人民反对戈多伊的起义，接着就是查理四世退位、他的儿子斐迪南七世即位、法国军队入侵西班牙以及爆发独立战争。可见，西班牙独立战争从反对以唐·曼努埃尔·戈多伊为代表的权奸的人民起义开始，是同十五世纪的内战从反对以维尔埃纳侯爵为代表的权奸的起义开始一样的。而1854年的革命同样是从反对以圣路易斯伯爵为代表的权奸的起义开始的。

尽管西班牙不断爆发起义，但直到本世纪没有出现重大的革命，如果不算查理一世或者说查理五世（德国人这样称呼他）统治时期的神圣同盟战争[238]的话。一般说来，后者是在西班牙摄政阿德里安红衣主教（佛来米人）庇护下的一个宫廷集团的行为直接引起的，这个集团进行无耻敲诈，使加斯梯里亚人到了绝望的地步，而且还向出价最高的人卖公职，公开以法庭判决做买卖。反抗佛来米人的权奸，只是运动的表面。这个运动在根本上是要保住中世纪西班牙的自由不受当代专制制度的侵犯。

阿腊贡、加斯梯里亚和格拉纳达的合并在天主教徒斐迪南和



马克思摘有西班牙历史材料的一本笔记本的首页[239]

马克思摘有西班牙历史材料的一本笔记本的首页[239]

伊萨伯拉一世统治之下为西班牙的君主国创造了物质基础，在这以后，查理一世企图把这个还是封建的君主国改变成专制的君主国。他立刻向西班牙自由的两根支柱，即议会和地方自治机关[240]进攻；议会是古哥特人 concilia〔谘议会〕的改变形式，地方自治机关几乎直接由罗马时代传下来，具有罗马自治市所固有的世袭原则和选举原则相结合的特点。关于地方自治，意大利、普罗凡斯、北高卢、大不列颠的城市和一部分德国城市同西班牙当时的城市很相似；但是无论法国的三级会议或者中世纪英国的议会都不能同西班牙的议会相比。在西班牙王国形成中有过特别有利于限制王权的条件。一方面，在同阿拉伯人的长期斗争中，土地是一小块一小块地在不同时期收复并成为独立的王国的。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人民的法律和习俗。土地的逐渐收复主要是由贵族进行的，这就大大加强了贵族的势力，同时削弱了王权。另一方面，国内居民点和城市获得重大意义，因为居民不得不共同住在设防的地方，在那里寻求保护以免遭受摩尔人的不断侵犯；同时西班牙的半岛地形以及同普罗凡斯和意大利的经常来往，促进了沿海地区第一流商埠的形成。早在十四世纪，城市代表就成为议会中最有势力的一部分，议会中也有僧侣和贵族的代表参加。也应该指出，半岛经过了将近八百年的顽强斗争才缓慢地从阿拉伯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就使半岛到完全肃清领土上的敌人的时候具有了与当时的欧洲完全不同的特点；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北部盛行的是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风俗习惯，南部盛行的是阿拉伯人的风俗习惯。

当查理一世从德国（他在德国登极）返回西班牙的时候，议会便在伐利亚多利德召开，以接受他效忠于古法典的宣誓并给他

加冕[241]。查理拒绝前往，却派了自己的代表去，要他们去接受议会效忠于国王的宣誓。议会不准这些代表参加会议，并通知国王说，假如他不出席，不对国家法典宣誓，将永远不被承认他为西班牙的国王。查理对这个要求让步了；他到了议会，用历史家的话来说，他带着很不愉快的脸色宣了誓。这时候议会对国王宣布："陛下，您要知道，国王不过是领薪俸的国民公仆。"这就是查理一世同城市互相敌对的开端。查理阴谋活动的结果是，在加斯梯里亚爆发了许多次起义，成立了阿维拉神圣同盟，联合起来的城市在托尔特西利亚斯召开了议会会议。1520年10月20日，从这里向国王发出了"反对滥用职权的抗议书"，查理对这个抗议的回答是，剥夺所有出席托尔特西利亚斯会议的代表的人身权利。内战已不可避免，起义的市民号召拿起武器；他们的兵士在帕迪利亚的指挥下占领了托列洛巴顿要塞，但是最后在1521年4月23日在维利雅拉尔会战中被优势的兵力击败。首要"谋叛者"的头滚落在断头台上，西班牙古老的自由也从此不复存在了。

当时各种情况都有利于刚诞生的专制政体的巩固。各省之间不够团结，使得它们的分散的努力失去了作用；但是，给了查理最大帮助的是贵族和市民之间的尖锐的阶级对抗，它帮助查理削弱了贵族和市民双方。我们已经谈到，从十四世纪起，城市在议会中的势力就很大了，而从天主教徒斐迪南的时代起，圣友会(Santa Hermandad)[242]就成为城市用来反对那些责备城市破坏了古老的贵族的特权和司法权的加斯梯里亚贵族的有力武器。因此贵族热心地支持查理一世的消灭神圣同盟的意图。查理摧毁了同盟的武装反抗后，就开始缩小城市的自治特权；城市居民减少，很快就失去它们的财富和重要性，不久也失去了它们在议会中的影

响。于是查理掉转武器来对付曾经帮助他压制城市自由而本身还具有不小政治作用的贵族。由于欠发军饷而引起的兵变，使查理不得不于1539年召开议会，为的要议会同意给他一笔钱。议会对于他以前把补助费滥用于违反西班牙利益的目的而感到非常愤慨，因此拒绝发款。查理一怒之下解散了议会；而当贵族依仗特权坚决要求免税时，查理宣布，要求这种权利的人没有理由参加议会，而且真的把这些人开除出议会。这对于议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以后议会会议纯粹是举行宫廷仪式。古代议会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僧侣，早从天主教徒斐迪南时代起就站在宗教裁判所的旗帜之下，并且早就不把自己的利益同封建的西班牙的利益看做一体了。相反地，由于有了宗教裁判所，教会已成为专制政体的最牢固的工具。

如果说在查理一世统治以后，西班牙政治和社会的衰落表现出可耻的长期的腐化所具有的一切征兆（这些征兆使人联想起土耳其帝国的最坏时期），那末在这个皇帝的统治时期，古代自由的遗骸至少已经安葬在华丽的坟墓中了。这是华斯哥·努涅斯·巴尔博亚在达里安海岸、科尔特斯在墨西哥、皮萨罗在秘鲁升起加斯梯里亚国旗的时代，这是西班牙的势力独霸欧洲的时代，是伊比利安人的炽烈想像为埃尔多拉多、骑士功勋和世界君主国的灿烂幻景所迷惑的时代。也就在这个时代，西班牙的自由在刀剑的铿锵声中、在黄金的急流中、在宗教裁判所火刑的凶焰中消失了。

在经过了先是哈布斯堡王朝以后又是波旁王朝的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以后（要压制人民有这两个王朝中的任何一个就足够了），西班牙的地方自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保留着，怎样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呢？在这个比任何其他封建国家都更早地产生了纯粹的君主专制的国家里，中央集权制却一直不能生根，这又怎样解释呢？

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困难。十六世纪正是大的君主国家形成的时代，它们在各个地方都是随着两个相互敌对的封建阶级——贵族和市民的削弱而产生的。但是在欧洲其他大国里，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在那里，君主专制是一个洪炉，在这个洪炉里各种社会成分被搀合在一起，受到开导，这就使得城市认为资产阶级的普遍统治和市民社会的公共政权比自己的中世纪地方自治更好。在西班牙则恰恰相反，贵族政治虽趋于衰落，却保持自己的最恶劣的特权，而城市虽已丧失自己的中世纪的权力，却没有得到现代城市所具有的意义。

自从君主专制建立以来，这些城市就在不断衰落，苟延残喘。这里不打算说明那些破坏西班牙商业、工业、航海业和农业的政治条件或经济条件。对于解决我们目前的任务，指出事实本身就够了。随着城市工商业生活的衰落，国内交换缩小了，各省居民的来往减少了，交通工具被弃置了，大路也是人迹罕到。这样一来，西班牙的地方生活，各省和各个公社的独立性，社会发展的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最初是由西班牙的地形造成的，后来又由于各省独立地从摩尔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组成独立的小国而历史地发展起来），——所有这些现象现在都由于经济上发生的使全国性活动泉源枯竭的变革而最终地固定起来。君主专制不仅在西班牙遇到了本性就同中央集权抵触的物质因素，而且尽力阻碍取决于全国性的分工和国内交换的多样性的共同利益的产生，而这种共同利益正是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和统一的法律的唯一可能的基础。因此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同欧洲的一般君主专制只有纯粹表面上的相似，其实，它应该列入亚洲的政体。西班牙和土耳其一样，仍旧是一堆共有一个挂名君主的治理不善的共和国。在不同

的省份里，专制制度具有不同的性质，统一的法律由总督和省长任意解释；尽管存在专制制度，政府并不禁止各省保存不同的法律和习惯，不同的币制，不同颜色的军旗和各自的税制。东方式的专制制度只有当地方自治和它的直接利益发生冲突时才触动地方自治，但是当地方自治使它不必亲自做某些事情并使它省却实际管理的麻烦的时候，它是乐意让这种制度存在的。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拿破仑像所有他的同时代的人一样，原认为西班牙是一具没有生命的死尸，但是他发现，如果说西班牙国家死亡了，那末西班牙社会却充满生气，它的每一部分都洋溢着反抗力量，这使他非常不快地大吃一惊。根据枫丹白露条约，他争取到让他的军队开进马德里；为了进行谈判，他把王室一家引诱到贝云，强迫查理四世收回退位诏书，接着又强迫查理四世把领地让给他；拿破仑又威胁斐迪南七世，强迫他发表了同样的声明。查理四世和王后以及“和平公爵”被送到贡比臬，斐迪南七世和他的弟兄们被幽禁在瓦兰斯城堡，至于西班牙的王位，拿破仑则授予自己的哥哥约瑟夫。在这以后，拿破仑在贝云召集了西班牙洪达，并把他准备好的一部宪法[243]赐给洪达。他在西班牙的君主国中只看到被他牢牢关在城堡里的可怜的王朝而没有看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波拿巴完全相信，他已经把西班牙攫为己有了。但是在他的 coup de main〔大胆袭击〕以后不几天，他就接到了马德里起义的消息。的确，缪拉特屠杀了近 1000 人，把这一次爆发的怒潮压下去了。但是当这次大屠杀的消息在全国传开的时候，在阿斯土里亚又爆发了起义，并且很快就席卷了全国。我们要指出，这个第一次自发的运动是从人民中间产生的，而“上等”阶级却温顺地屈从于外国的压迫。

西班牙就这样准备好了它的现代革命历程，并进入了标志着本世纪西班牙发展特征的斗争。以上我们简单列举的事实和影响，现在仍旧决定着西班牙的命运并振奋着西班牙人民的精神。我们已经指出，它们不仅对于评价目前的危机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评价西班牙在被拿破仑侵占以来所做的和忍受的一切，评价这将近五十年的悲剧性的事件和可歌可泣的斗争——的确，这是现代史中最激动人心、最有教益的一章——也是必要的[244]。

二

我们已经简单地向读者介绍了西班牙过去的革命史，以便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和评价那些使得这个国家目前为全世界瞩目的事件。更令人感到兴趣的而且对于了解当今时代也许具有同样意义的，是保证把波拿巴主义者驱逐出去并使西班牙王位重归于直到今天仍保持着它的这个王朝的伟大的民族运动。为了正确地评论这一运动和运动中的英勇事迹以及被认为几乎气数已尽的人民所表现的令人难忘的生命力，我们应当回溯到拿破仑进攻西班牙民族的最初时期。产生整个事件的真正原因，显然首先是 1807 年 7 月 7 日签订的而且据说是在库拉金公爵和达来朗又签订了密约以后才臻于完成的提尔西特条约。条约发表于 1812 年 8 月 25 日马德里“日报”上，其中包括下列条款：

“**第一条**　俄国应当占有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并且根据需要扩张它在亚洲的领土。

第二条　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和葡萄牙的布拉冈萨王室退位，两国王位将让给波拿巴家族的亲王。”

这个条约只要是真实的(它的真实性是没有什么人反驳的，甚至从不久前发表的约瑟夫·波拿巴国王回忆录[245]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那它就是 1808 年法国侵入西班牙的真正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当时的暴风骤雨般的事变就是靠秘密的线索同土耳其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

紧接着马德里大屠杀和贝云协定以后，阿斯土里亚、加利西亚、安达鲁西亚和瓦伦西亚同时爆发了起义，而法国军队占领了马德里，在这时候，波拿巴假借口实占领了北部的四个要塞——潘普洛纳、圣塞瓦斯田、菲盖腊斯、巴塞罗纳；一部分西班牙军队早已调往芬宁岛参加进攻瑞典的战役；最后，各当局——军事的、宗教的、司法的和行政的——和贵族都劝论人民顺从外国占领者。但是有个情况抵销了这一切困难处境。当时多亏拿破仑，国家摆脱了国王、王室和王国政府。这样一来，那些在相反情况下会阻碍西班牙人民表现自己天生的毅力的枷锁被打碎了。在自己国王的统治下和在平常的情况下，西班牙人民是怎样无法抵抗法国人，已经由1794年和1795年的不光彩的战争[246]证明了。

拿破仑把西班牙最显要的人物召到贝云，以便亲自把新的国王和宪法交给他们。除了极少数例外，全都来到了。1808年6月7日，国王约瑟夫在贝云接见了西班牙大贵族代表团，斐迪南七世的亲密朋友印范塔多公爵代表大贵族对约瑟夫说了这样的话：

“陛下，西班牙大贵族一向以效忠于自己的国王出名，现在陛下也会同样得到他们的忠心和爱戴。”

加斯梯里亚的王政会议要可怜的约瑟夫相信“他是上帝派来登王位的那一家族的主要后裔”。率领军队代表团的德尔·帕尔凯公爵的颂词是同样卑贱不堪的。第二天，同样是这些人发表了文告，谕令全体人民忠顺于波拿巴王朝。1808年7月7日，91个出身于最大的贵族门第的西班牙人在新宪法上签了字，其中有公爵、伯爵、侯爵和各教团的首领。在讨论这个宪法时，引起他们反对的仅仅是废除他们的古老特权和利益一项。以前在斐迪南七世的内阁中任职和担任宫廷官吏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约瑟夫的第一届

内阁和担任第一批宫廷官吏。上层阶级的一些代表把拿破仑看成上天赐来复兴西班牙的人物，另外一些人则把他当反对革命的唯一支柱；谁也不相信民族抵抗会取得胜利。

因此，从西班牙独立战争一开始，上层贵族和旧官员就失去了对资产阶级和人民的任何影响，因为从斗争一开始，他们就背弃了资产阶级和人民。一方面是A ffrancesados（亲法派），另一方面是民族。在伐利亚多利德、卡塔黑纳、格拉纳达、哈安、桑卢卡尔、拉卡罗利纳、罗德里哥城、加迪斯和瓦伦西亚的最著名的旧官员（总督、将军和其他被认为是法国代理人和民族运动的障碍的著名人物）都成为激愤的人民的牺牲品了。各地原来的政权都被改换了。在1808年3月19日起义几个月以前，马德里就发生过骚动，要把EI Chorizero（香肠贩子——戈多伊的绰号）和他的可恨的走狗赶下台。这个目的现在在全国规模内达到了，这样，国内革命就按照人民群众所希望的那样并在与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完成了。看起来，整个运动与其说是**拥护**革命的，不如说是**反对**革命的。这个运动是民族运动，因为它宣布西班牙脱离法国而独立；同时这个运动又是王朝的，因为它拥护“受爱戴的”斐迪南七世而反对约瑟夫·波拿巴；这个运动是反动的，因为它拥护旧的制度、习惯和法律而反对拿破仑的合理的革新；这个运动是迷信的和充满宗教狂的，因为它拥护“圣教”而反对所谓法国无神论，或者说，反对取消罗马教会的特权。被自己的法国教友的命运吓坏了的僧侣，为了自保便激起人民的这种情绪。

沙赛说：“爱国主义火焰因加上迷信的圣油而燃烧得更旺了。”[247]

所有反法的独立战争都具有复兴性质和反动性质相结合的特

点，但是这种两面性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西班牙表现得那么明显。在人民的想像中，国王是童话中被大盗虐待和幽禁的王子。民族过去的最令人神往、最得人心的时代，是同十字架对新月①的战争的神奇的传说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很多下层人民都习惯于穿贫僧的袈裟，靠教会吃饭。一个西班牙作家唐·霍赛·克利门特·卡尔尼塞罗在1814和1816年发表了以下著作："拿破仑——欧洲真正的唐·吉诃德"、"光荣的西班牙革命的主要事件"、"恢复宗教裁判所是合理的"[248]。看一看这些书的名字就可以抓住西班牙革命的特点（这个特点在各省洪达的宣言中也表现出来了），所有这些书籍都歌颂国王、圣教和祖国，有一些甚至对人民这样说：

"他们对彼岸世界的希望面临破灭，受到不可避免的威胁。"

但是，如果说浸透了宗教和政治偏见的农民、内陆小城市的居民和无数穿袈裟和不穿袈裟的平民，构成了民族派的大多数，那末在这一派中还有一个把人民反对法国侵略的斗争看成西班牙政治和社会复兴的信号的活跃的、有势力的少数。这个少数是由港口、商埠和某些省会的居民组成的，这些地方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现代社会的物质条件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贵族和资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作家、医生、律师甚至僧侣（比利牛斯山脉也没有阻挡住十八世纪哲学对他们的影响）支持这个少数派。1795年发表的根据加斯梯里亚王政会议的命令而草拟的关于改进农业和关于土地法的著名的霍韦利亚诺斯备忘录[249]可以看做这一派人的真正宣言。最后，还有资产阶级青年，例如大学生，他们热烈地

① 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教的象征和旗帜。——译者注

接受了法国革命的理想和原则，有一个时期甚至希望依靠法国的支持来复兴祖国。

在只涉及共同保卫祖国的问题的时候，民族派的两大组成部分还能十分和谐。在他们还没有在议会、在争取新宪法（当时即将制定新宪法）的斗争舞台上相遇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对立也没有表现出来。革命的少数派竭力支持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毫不动摇地求助于旧的人民的信仰所具有的民族偏见。如果说这种策略对于民族反抗的直接目的是适当的，那末到了旧社会的保守派开始利用这种偏见和人民热情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反对革命者的真正的、最终的计划的时候，这种策略终究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少数派的致命伤。

斐迪南在按照拿破仑的要求离开马德里的时候，成立了以唐·安东尼奥亲王为主席的最高政府洪达。但是就在5月这个洪达就不存在了。那时中央政府没有了，起义城市成立了自己的洪达，这些洪达受各省成立的洪达领导。其实这些省洪达就是独立的政府，因为它们每一个都组织了自己的军队。奥维耶多的代表洪达宣布主权完全转入它手中，它对波拿巴宣战，派代表团到英国去签订停战协定。以后塞维尔洪达同样做了这一切。有趣的是，这些狂热的天主教徒在形势的逼迫下同英国结成了同盟，虽然西班牙人一向把英国看成比土耳其苏丹好不了多少的最坏的异端的化身。为了逃脱法国无神论的攻击，他们竟投入大不列颠新教的怀抱。因此也不奇怪，斐迪南七世回到西班牙后，在恢复神圣的宗教裁判所的命令中说：

“那些同样地感染了仇恨神圣的罗马教会的情绪的各个不同教派所属的外国军队留驻在西班牙是西班牙宗教的纯洁性受到玷污”的原因之一。

这么突然出现的各自完全独立的各省洪达，曾承认塞维尔最高洪达有某种权威（诚然，是极微小的、极不肯定的权威），因为自从马德里被外国人占领，塞维尔就被认为是西班牙的首都。这样就建立了一种极端无政府状态的联邦政府，由于对立利益的冲突、地方的互相猜忌和竞争势力的存在，这种政府对于集中军事指挥和统一战斗行动的要求是很不适合的。

这些独立的洪达所发表的告人民书反映了突然从长期沉睡中醒来、像受了电流的作用似地投入狂热的活动的人民的十分强大的英雄力量；但同时这些告人民书仍然不能摆脱曾使西斯蒙第有理由给西班牙文学加上“东方的”这个形容词[250]的那些毛病：过分夸张的词藻，过分的做作和吹嘘以及夸夸其谈。这些告人民书同样明显地表现了西班牙性格所特有的幼稚的虚荣，难怪洪达成员都自封为“殿下”，都穿上华美的制服。

说到这些洪达，还应当指出两个情况：一个情况表明到起义开始时人民的觉悟水平是很低的，另一个情况给革命的发展带来了损失。洪达是由普选产生的；但是“下层阶级的高度热诚表现为顺从”。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选他们的当然上司，即省的显贵人物和小地产贵族，其次是选僧侣，很少的场合选资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人民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是没有力量的，自己的主动性仅仅表现为迫使上层阶级抵抗法国人，而不要求亲自参与领导这个抵抗运动。例如在塞维尔，“人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求教区僧侣和修道院院长开会选举洪达代表”。因此洪达里面全是些凭过去的社会地位选举出来的、完全不像革命领袖的人物。另一方面，人民在委任这些代表时，根本没有想到限制他们的权力和确定任期。而洪达，当然只考虑扩大权力和延长任期。正因为如此，在革命

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每当革命洪流有溢出河岸的危险的时候，这些迸发的人民热情在革命初期的第一批产物都成为阻挡革命洪流的堤坝。

1808年7月20日，也正是约瑟夫·波拿巴进入马德里的这一天，卡斯坦尼约斯迫使杜邦将军和韦德耳将军指挥的14000名法国兵士在拜兰放下武器，又过了几天，约瑟夫不得不从马德里撤退到布尔果斯。此外还发生了两件大大鼓舞西班牙人的事情：一件是帕拉福克斯将军把勒弗夫尔赶出了萨拉哥沙，另一件是德·拉·罗曼纳侯爵率领一支7000人的军队到达拉科鲁尼亚，这支军队不顾法国人的阻挠，从芬宁岛开来援救祖国。

在拜兰会战以后，革命达到了顶点，承认了波拿巴王朝或者聪明地保持沉默的那一部分上层贵族，现在都参加了人民事业，而这对人民事业的好处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三

各省洪达分掌政权使西班牙没有被拿破仑侵犯的第一个浪潮淹没，其所以如此，不仅因为这使国家的抵抗能力加强了好几倍，而且因为这使侵略者不知道应当打击的方向；实际上，法国人在发现到处都是西班牙人的反抗中心的时候，已经完全摸不着头脑了。在拜兰抗降和约瑟夫从马德里撤退以后不久，各地就开始感到必须建立一个中央政府。在取得初步胜利以后，各省洪达之间的争执达到了异常剧烈的程度，例如，卡斯坦尼约斯将军费了很大的力气才阻止了塞维尔向格拉纳达进军。结果法国军队取得了恢复元气和占据坚固阵地的机会，尽管当时法国军队除去贝西埃尔元帅的那个军以外都溃退到了埃布罗河一线，只要奋力追击，可以很容易地击溃它，至少是把它赶出国境。但是，全国对洪达之间的猜忌的抗议以及对指挥官的 laissez faire〔漫不经心、玩忽职责〕的抗议，主要是由梅尔兰将军对比尔巴鄂的起义的残酷镇压[251]引起的。迫切需要使军事行动配合一致；相信拿破仑马上会率领从尼门河、奥得河和波罗的海沿岸募集的常胜军卷土重来；需要有一个中央政权来同大不列颠和其他国家订立同盟条约以及维持同西班牙的美洲属地的联系并从那里征收赋税；在布尔果斯有一个法国中央政权，以及必须以自己的圣坛来对抗外国的圣坛，——就是这些原因迫使塞维尔洪达勉勉强强地放弃了自己的不肯定的、实际上是虚有其名的最高权力，并建议各省洪达各选两名代表，由代表们的会议组成**中央洪达**，同时各省洪达应保持

对有关地区的内部管辖权，

“但是以必须服从中央政府为条件”。

这样在 1808 年 9 月 25 日即恰好是俄国君主和德国各邦君主在爱尔福特向拿破仑屈膝的前夕[252]，由各省洪达 35 名代表（西班牙本土 34 名，卡内里群岛 1 名）组成的中央洪达在阿兰惠斯召开了会议。

军队的命运在革命时期比平时更鲜明地反映国民政府的真正本质。负有把敌人驱逐出西班牙的使命的中央洪达，自己却被法国武装力量从马德里赶到塞维尔，又从塞维尔赶到加迪斯，在那里得到不光彩的下场。中央洪达的政绩就是打了一系列可耻的败仗、西班牙各军团被消灭以及正规的军事行动变成个别的游击活动。西班牙贵族乌尔基霍于 1808 年 4 月 3 日曾这样对加斯梯里亚军区司令官库埃斯塔说：

“我们西班牙是由不同种类的材料建造起来的歌德式建筑；在西班牙有多少省就有多少不同的势力、特权、法律和习惯。西班牙根本没有欧洲称为社会精神的那种东西。这些原因将永远阻碍我国建立起一个相当巩固的、能够把我国一切民族力量联合起来的中央政权。”

这样，如果说西班牙在法国侵略时期的实际情况给建立革命中心造成了最大障碍，那末中央洪达的组成情况本身使得洪达不能克服国家所遭到的可怕危机。洪达要成为一个执行机关，它的人数是太多了，它的人员的组成太偶然了；同时，洪达要想具有国民公会[253]那样的权威，它的人数又太少了。单单中央洪达的权力是从各省洪达授予的这个情况就使得它不能克服各省洪达的野心、恶念和任性的利己主义。省洪达的成员正像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指出的，是根据他们在旧社会的地位，而不是根据他们建立

新社会的能力选举出来的。而省洪达派到中央洪达的也是一些西班牙大贵族、高级僧侣、加斯梯里亚显贵、过去的大臣和高级文武官员，而不是革命选拔出来的人物。由于力图做到合法和保持身分，西班牙革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

中央洪达的两个最卓越的成员是弗洛里达布朗卡和霍韦利亚诺斯，当时的两大派就是分别聚集在他们的旗帜下。他们两人都曾遭到戈多伊的迫害，过去都当过大臣，而现在都成了羸弱不堪的人，在保守的西班牙制度的刻板和拘泥的成规中老迈衰朽了，而西班牙制度的那种拘守礼仪的、繁文缛节的迂缓早在培根时代就很闻名了，培根有一次曾感叹地说过："让死神从西班牙来找我，那它就会来得很晚的。"[254]

弗洛里达布朗卡和霍韦利亚诺斯是对立面，而这种对立是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以前就开始了的；前一个是平民官吏，后一个是贵族慈善家。弗洛里达布朗卡是以庞巴尔、弗里德里希二世和约瑟夫二世为代表的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和执行者；霍韦利亚诺斯是"人民之友"，他希望通过对经济法令的缜密的改变和对崇高学说的文字宣传来使人民得到解放。两人都反对封建传统，因为一个竭力使君主制摆脱封建传统，另一个则竭力使市民社会摆脱封建传统的桎梏。他们每一个在国家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也和他们的观点一样，是不同的。弗洛里达布朗卡曾以查理三世的首相资格执掌国家政权，他的统治随着他所遭到的反抗的增强而越来越专横暴虐。霍韦利亚诺斯在查理四世时曾任过很短时期的大臣，但他不是以大臣资格而是以学者资格，不是用法令而是用书本来取得他在西班牙人民中的影响的。弗洛里达布朗卡在政治风暴把他推上革命政府的首席的时候，已经是 80 高龄的老人，他原封不

动地保存着的唯一东西就是对专制制度的信仰和对人民创造力的怀疑。弗洛里达布朗卡在去马德里的时候，曾给木尔西亚的自治机关留下秘密抗议书，宣称他只是由于害怕人民谋害才向强力让步，他还特地在抗议书上签了字，以便在约瑟夫国王面前替自己接受人民的委任状的行为辩白。他没有满足于恢复自己过去的传统，而修改了一些过去他的政府采取的现在看来过于轻率的措施。例如，当初他曾把耶稣会教徒驱逐出西班牙[255]，现在他刚成为中央洪达的成员，就使他们获准“以私人资格”回来。如果他也认为从他统治以来发生了某些变化，那末这种变化只在于：赶走了弗洛里达布朗卡大伯爵并剥夺了伯爵的全部权力的戈多伊，现在就由这个弗洛里达布朗卡伯爵代替了自己的职位，而轮到自己被赶走了。被中央洪达选出来作主席，被洪达的多数派承认为毫无缺点的领袖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中央洪达中的有影响的少数派的领袖霍韦利亚诺斯也已经衰老了，也已在当年戈多伊使他受到的长期痛苦的监禁中丧失了很大一部分精力。但是，就在他精力最旺盛的年代，他也不是一个进行革命活动的人，确切些说，倒是一个过于讲究手段因而不能把事业进行到底的好心的改良主义者。如果在法国，他会同穆尼哀或者拉利-托朗达尔一致行动，但决不会多前进一步。如果在英国，他会是一个有声望的上院议员。在起义的西班牙，他可以供给热情的青年一些观念，但在实际活动方面，甚至连弗洛里达布朗卡的温顺的顽强精神他都远远谈不上。这位贵人没有完全摆脱贵族的偏见，因而具有强烈的像孟德斯鸠那样崇尚英国的倾向；他似乎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在证明，如果西班牙也可能出现能够提供普遍观念的智者的话，那只会是例外，而且要以损害西班

牙人只有在本地事业中才表现出来的个人毅力为代价。

然而，在中央洪达里还有以萨拉哥沙的代表唐·洛伦索·卡尔沃·德·罗萨斯为首的一些人，他们赞同霍韦利亚诺斯的改良主义观点，同时他们也推动革命活动。但是，由于人数太少，其中又没有知名人士，他们没有力量把洪达这一辆沉重的国家大车从西班牙礼仪的深辙中拖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得十分粗糙、内部暮气沉沉、以一些旧时代的活化身为首领的政权机构，担负着完成革命和战胜拿破仑的使命。如果说它的宣言的语言气势磅礴，同时它的行动又十分无力，那末原因在于西班牙的诗人唐·曼努埃尔·金塔纳，在于中央洪达表现了文学鉴赏力，委托他这位秘书来起草了洪达的宣言。

卡德龙笔下的高傲的英雄把世袭的封号当成真正的伟大，在通报自己时，令人讨厌地列举了自己的一切封号；洪达也是这样，它首先忙于取得与自己高贵地位相称的头衔和荣誉。洪达主席得到了“殿下”的尊称，其他成员得到了“阁下”的尊称，而 in corpore〔包括全部成员〕的整个洪达得到了“陛下”的尊称。洪达成员都穿上了好像将军服一样的化装舞服，佩上画有新、旧大陆的胸章，并给自己规定年俸为 120000 雷阿耳。完全具有西班牙旧传统的起义的西班牙的领袖，认为只要穿上戏装，就可以神气十足地、体面地走上欧洲历史舞台。

叙述洪达内部历史和它的施政细节，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这里只回答两个问题。洪达对西班牙革命发展以及对保卫祖国究竟起了什么影响？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就能够说明十九世纪西班牙各次革命中很多直到目前神秘难懂的问题。

中央洪达的多数成员起初曾把镇压最初的革命爆发当成自己

的首要任务。因此洪达加强了过去对付报刊的严格制度，并委任了一位新的大宗教裁判者，幸好，法国人没有让他去执行自己的职务。虽然当时西班牙的大部分不动产因有“死手”权不能买卖(贵族的财产只能继承，教会的土地不可转让)，洪达还是下令中止已经开始了的出售“死手”财产的现象，甚至扬言要废除买卖教会土地的私人契约。洪达承认国债，但不采取任何财政措施来使预算摆脱由于轮流上台的卖国政府的长期统治所造成的庞大债务，来改革人人皆知的不公平、不合理、负担沉重的财政制度，以及粉碎封建制度枷锁而为民族开辟生产活动的新源泉。

四

早在菲力浦五世时代，弗朗西斯科·贝尼托·索勒达就说过："西班牙的一切不幸都起源于西班牙的 togados（法官）"[256]。而加斯梯里亚王政会议［Consejo Real］是西班牙的有害的司法等级中的最高一级。王政会议是在唐·璜和亨利的动乱时代产生的，菲力浦二世发现它是 Santo offico〔宗教裁判法庭〕的一个应有的补充机构，因而加强了它的作用。这个王政会议利用了这个时期的灾难和后来几个国王的软弱无能，把各种各样的权力都集中到它的手中，并把当时西班牙各个王国的立法者和最高行政机关的职权都并在自己的最高司法职权之内。因此按权力来说，王政会议甚至超过了法国的议会，——除了它从来没站到人民这边以外，在很多方面同法国议会是相似的。王政会议既然是当时旧西班牙最有威力的政权机关，当然也就是新西班牙和不久前产生的有削弱王政会议最高权威的危险的人民政权的死敌。王政会议既然领导法官这一等级并成为法官们滥用职权、享受特权的具体保障，自然也拥有全部由西班牙司法制度产生的无数具有权威的利益。因此它是革命决不能同它妥协的一种力量；革命本身要想不被这个力量消灭，就必须消灭这个力量。正像我们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的，王政会议已经把自己出卖给拿破仑，由于这种叛变行为，它在人民的心目中已经威信扫地。但是中央洪达在开始执政这一天，竟愚蠢地把它成立一事通知王政会议，并要求王政会议宣誓

效忠于自己；同时洪达宣布，在得到王政会议的誓词以后，要把誓词散发给王国的其他所有政权机关。这种引起整个革命派公开谴责的轻率步骤向王政会议表明：中央洪达需要它的支持；于是王政会议振作起精神来，在几天假装犹豫之后，便心怀恶意地表示服从洪达，但在它宣誓效忠的同时就表现出它的反动怀疑，具体说就是建议洪达根据第三法规第二节第十五条[257]把机构成员减少到3—5人，从而自己解散自己，并下令封禁各省洪达。在法军回到马德里，并解散了王政会议以后，中央洪达还不以自己的第一次失策为满足，竟轻率地恢复这个会议，成立了Consejo Reunido〔联合会议〕，也就是把王政会议同古代历届王政会议的残余结合起来。这样一来，洪达自己为反革命建立了一个中央机关，这个机关同洪达本身的影响相抗衡，一直用阴谋诡计来给洪达制造困难和障碍，挑唆洪达进行最反人民的活动，然后又摆出一副激于义愤的姿态，在愤激的群众面前侮辱洪达。必须指出，先是承认然后是恢复王政会议的中央洪达，是没有能力在西班牙的司法体制方面或在完全不适用的民事立法和刑事立法方面进行任何改革的。

尽管参加西班牙起义的主要是民族分子和宗教分子，然而在起义的头两年曾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政治改革的倾向；这一点从当时所有省洪达的宣言中都可以看出来，这些甚至大部分是由特权阶级代表人物草拟的宣言也没有忽略谴责旧制度和许诺进行根本改革。这一点从中央洪达的宣言中也可以看出来。中央洪达在1808年10月26日第一个告人民书中说：

“存在了20年的最庸碌无能的暴政，把国家带到灭亡的边缘；仇恨和争执使国民脱离了政府。不久前还受压迫、受屈辱的人民，意识不到自己力量的强大，而在制度方面和法律方面又都找不到防止政府为非作歹的保障，便

认为外国人的统治还没有这个有害的暴政那样可恨。这种总是反复无常而且几乎总是不公正的任性的统治，拖延得太久了；人民的耐性、人民对秩序的热爱和人民的浑厚的忠义之忱，长期被当局滥用；现在到了让建立在共同幸福基础上的法律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因此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必须进行改革。洪达将要建立各种主管部门委员会，一切有关政府和当局的书面建议应当送交这些委员会。”

洪达1809年10月28日在塞维尔发表的宣言中说：

“低能腐朽的专制制度为法国人的暴政开辟了道路。听任在这个国家里重复以前的种种恶行，就等于把你们送到波拿巴手中一样，是一种滔天罪行。”

中央洪达看来进行了一种最新奇的分工：霍韦利亚诺斯派宣告民族的革命意图并记录成文，而弗洛里达布朗卡派有权直接否定这些意图，并以反革命行动抵制革命空想。不管怎样，对我们重要的是，根据省洪达对中央洪达的承认，可以证明一个经常被否认的事实，即在第一次西班牙起义时期是有革命意图存在的。

至于中央洪达是如何地利用了由于人民的善良意志、形势的逼迫和直接危险的存在而形成的有利于改革的形势，可以根据中央洪达派到各省去的专员对各该省的影响来判断。一位西班牙的作家[258]直率地告诉我们，中央洪达苦于人才不足，因此竭力把优秀的成员留在中央，把那些能力很差的人派到外地去。这些专员被授权主持各省洪达和代表中央洪达全部职能。关于这些专员的活动，我们只举几个例子：罗曼纳将军，因为他永远来回行军，并且总是在他刚好不在的时候才发生战斗，所以西班牙兵士称他为Marques de las Romerias〔朝拜圣地侯爵〕。这个被苏尔特击溃、并被赶出加利西亚的罗曼纳，以中央洪达专员的资格来到了阿斯土里亚。他的第一步就是找借口同奥维耶多省洪达争吵，因为奥维耶多省

洪达采取的坚决的革命措施引起了特权阶级的仇恨。他毫不犹豫地解散了省洪达，以自己的走卒取而代之。奈元帅听到这个一向同心协力抵抗法国人的省份里发生了这些争执，就立刻进军阿斯土里亚，把Marques de las Romerias（朝拜圣地侯爵）赶出去，进入奥维耶多，并把这个城市洗劫了3天。1809年底法国人撤出加利西亚以后，我们的这位侯爵和中央洪达专员便进入拉科鲁尼亚，攫取了整个国家政权，撤销了大部分是在起义进程中出现的区洪达，任命了军事总督来代替他们，并且威胁说要追究这些洪达成员，实际上的确对爱国者进行了追究，同时又对那些投靠敌人的家伙非常宽大，最后，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他是一个恶毒的、无能的反复无常的蠢货。究竟加利西亚省洪达和区洪达的过错在哪里呢？它们曾下令毫无例外地在一切阶级和一切人中进行普遍征兵；它们向资产阶级和地主征税；它们降低国家官员的薪俸；它们命令宗教团体把自己金库中的现款交由洪达支配。总之，它们采取了革命措施。自从这位大名鼎鼎的Marques de las Romerias来到以后，阿斯土里亚和加利西亚这两个以普遍抵抗法国人著称的省份，只要没有受到直接侵略的危险，就不再参加独立战争了。

在瓦伦西亚，当人民和他们选举出来的领袖可以处理自己一切事务的时候，似乎出现了一些新的远景，但是这里的革命精神也被中央政府的势力摧残了。中央洪达不满足于把这个省置于一个叫做唐·霍塞·卡罗的将军领导之下，又派去了“自己的”专员拉巴索拉男爵。这位男爵指控省洪达不服从上级的某些命令，并撤销了省洪达的一个法令（根据这个法令，曾经合理地停止了对空缺的主教、圣职和骑士首领的任命，而把这里省下的收入拨归军医院使用）。因此中央洪达和瓦伦西亚洪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此

瓦伦西亚后来在苏舍元帅的自由主义治理时代就不再有所作为，而在斐迪南七世回来以后，竭力拥戴斐迪南七世为国王，以对抗当时的革命政府。

在加迪斯这个当时西班牙最革命的地方，中央洪达专员愚蠢的爱虚荣的德·维耳埃耳侯爵的到来引起了1809年2月22日和23日的起义，这次起义如果不是及时地转变为独立战争，就会造成极惨痛的后果。

中央洪达任命自己的专员之高明，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派洛桑诺·德·托勒斯先生作为去威灵顿那里的代表，此人一面自甘卑贱地对英国将军阿谀逢迎，一面又秘密地通知洪达说，将军抱怨粮食不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威灵顿发现这个卑鄙家伙的两面手法以后，就羞辱他而把他赶出了自己的军营。

中央洪达所处的条件极有利于执行它在告西班牙人民书中所宣布的任务：

“在这可怕的危机中，你们向独立迈进一步就不能不同时向自由前进一步，这是天意。”[259]

当洪达掌握政权的时候，法国人还没有占领西班牙三分之一的领土。旧的政权或者不存在了，或者投敌了，或者由于敌人的命令解散了。在拯救祖国的名义下，任何把财产和政权从教会和贵族手中转移到资产阶级和农民手中的社会改革，洪达没有不可以实行的。洪达有着同当年法国的Comité du salut public[260]一样的幸运，即国内的震荡恰好同防御外来侵略的必要性结合在一起；不仅如此，中央洪达面前还摆着某些省洪达在形势逼迫下表现出大胆的主动精神的范例。但是中央洪达不仅仅成为西班牙革命的累赘，而且实际地起了支援反革命的作用：它恢复旧的政权，重新铸造已

被打断的锁链，扑灭它所到达的地方的革命火焰，它自己没有作为，又妨碍别人有所作为。中央洪达在塞维尔的时候，甚至英国托利党政府都认为需要在1809年7月20日向洪达发出照会，坚决抗议洪达采取反革命方针，"担心洪达会窒息公众的热情"。有人说过，西班牙忍受革命的一切苦难而得不到革命的力量。假如这个说法还有一部分真理的话，那就是它对中央洪达作了致命的判决。

由于还没有一个欧洲历史学家了解这个问题的决定性意义，我们就更加认为有必要来详细谈谈这个问题。只有在中央洪达的政权下，才有可能把保卫民族的迫切问题和任务的解决同西班牙的社会改造、民族精神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做到这一点，任何政治机构只要一同实际生活发生微小的抵触就必然垮台。议会所处的环境完全相反：被赶到了比利牛斯半岛的尖角上、被法国占领军割断同王国的主要部分的联系有两年之久的议会，是一个想像中的西班牙，而真实的西班牙已被占领或在进行战斗。在议会治理期间，国家分成了两部分。在累翁岛有思想而无行动，在另一部分西班牙则有行动而无思想。反之，在中央洪达时期，需要有最高级政府的特殊软弱、无能和恶意，才能使西班牙战争同西班牙革命脱离。同法国和英国作者所说的相反，议会遭到失败并不是因为它们进行革命，而是因为它的先行者是反动派，放过了革命时机。现代的西班牙作者虽然也责怪英国和法国批评家，但是看来无力驳倒他们；他们直到今天还得忍着痛苦去听神甫德·普腊德的bon mot〔刻薄话〕："西班牙人民很像喜欢挨揍的斯加纳列尔的妻子。"[261]

五

中央洪达不能保卫祖国，因为它不能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它既然意识到本身的软弱、它的政权的不稳固和它的极其不得人心，那末除了采用不体面的诡计和微贱的阴谋以外，还能采取其他什么手段去克服将军们在一切革命时代所共有的勾心斗角、互相妒忌和骄横自负呢？既然洪达对自己的军事指挥官经常怀有恐惧和猜疑的情绪，我们就没有理由不相信威灵顿于1809年9月1日写给他的哥哥威尔斯里侯爵的话：

“就我对中央洪达的行动的观察，我开始担心它在使用自己的力量时，主要不是根据军事防御和战斗行动，而是根据政治阴谋和微小的政治目的。”

在革命时期一切从属关系都松弛了，只有使将军们严格服从国民纪律才能恢复军纪。正如中央洪达和它的不合理的体制从来无法使将军服从自己一样，将军也无法使兵士服从自己，因此直到战争结束，西班牙军队甚至还不能达到一般的纪律水平和服从水平。军队的纪律松懈现象又因经常缺乏粮食、被服和一切军需物资而更加严重了，因为军队的士气，按拿破仑的说法，完全取决于它的物质条件。中央洪达不能按时给军队供应，因为可怜的金塔纳的诗一般的宣言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而除了法令以外再采用强制手段，就意味着采用曾被中央洪达谴责过的各省所采用的最革命的措施。甚至宣布无人特殊和无人例外的普遍征兵制和准许一切西班牙人担任各级军官，也是省洪达的功劳而不是中

央洪达的功劳。如果说西班牙军队的失败是由中央洪达的无能和反革命性造成的，那末这些灾难又转过来使政府更加沮丧，并使政府招致人民的鄙视和怀疑，从而使人民更加依赖骄横而又无能的军事首领。

西班牙的正规军虽然到处失败，还是到处都有。它被溃散了二十多次，却永远准备着迎击敌人，而且在失败以后往往以更大的力量出现。打它是没有用的，因为它很快就跑掉，人员伤亡很少，而丢失战场又不在乎。当队伍溃退到山谷中的时候，他们坚定地相信，他们一定会重新集合起来，在得到新的增援之后，又会在出其不意的时刻出现，他们即使不能抵抗法国军队，至少也能使他们经常保持紧张，使他们耗尽力量。西班牙人比俄国人幸运，他们甚至不必死去以求死而复生。

1809 年 11 月 19 日奥康尼亚附近的溃败是西班牙人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正规战；从这时以后他们就只进行游击战了。放弃正规战的事实本身就证明，全国政府中心在地方中心面前黯然失色了。在正规军的失败成为经常现象的时候，各地都出现了游击队，人民群众也不理会全国范围内的失败，而去赞赏自己的英雄在地方上的胜利。在这一点上，至少中央洪达有一种普遍的错觉，认为“日报”“对游击队的一个小战斗都比奥康尼亚会战报道得更详细。”

游击队抵抗拿破仑就像唐·吉诃德用矛枪抗议采用火药一样，只是成绩不同。

“奥地利军事杂志”（1821 年第 1 期）说：“这些游击队真像是把自己的作战基地带在身边，每一次对他们作战都因作战目标不知去向而结束。”

游击战的历史应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整省整省的

居民拿起武器进行游击战，如加利西亚和阿斯土里亚。在第二个时期，被击溃的西班牙军队的残部、从法军中开小差的西班牙人和走私者等等加入了游击队，他们根据自身的直接利益，不管任何外国势力，甘愿冒险进行战斗。幸运的机会和情况的凑合经常使整个整个的区集合在他们的旗帜下。只要游击队是这样组织起来，他们整个说来并不显得可怕，但是对法国人仍然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为真正地武装人民奠定了基础。每当出现缴获战利品的机会或计划好一次复杂行动的时候，人民群众中最积极和最勇敢的分子便出来参加游击队。游击队根据自己当前的任务，或者神速地扑向俘获对象，或者严阵以待。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整天窥伺着警戒的敌人，想要截获一个通讯兵或者夺取辎重。小米纳就是这样抓到了约瑟夫·波拿巴任命的纳瓦腊总督，而胡尔扬就是这样俘掳了罗德里哥城司令。战斗刚一结束，就各走各的路，武装的人们马上向四方散走，参加战斗的农民镇静地回到自己平常的工作上去，“甚至他们不在都没有被人发觉”。结果所有道路的交通都断绝了。敌人成千上万，但是不可能发现他们。派通讯兵出去没有不落到敌人手中的，运送粮食没有不被截获的，总之，法国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有几百只眼睛盯着。同时又不可能一下子打散这种组织形式。法国人不得不时刻准备着对付这些出没无常的敌人，这些敌人看不见，又到处存在，因为每一个山头都是他们的掩蔽所。

德·普腊德神甫说：“把法国人弄得精疲力尽的不是会战，也不是小战，而是看不见的敌人的不断的小型攻击，这些敌人遭到追击就立刻在人民群众中消失，不久又以新的力量出现。寓言中被蚊子折磨得要死的狮子，就是法国军队的真实写照。”

在第三个时期，游击队仿效了正规军的方式，他们的队伍增加到

3000—6000人，失去了同全区的紧密联系，而落入几个利用游击队来达到个人目的的首领手里。游击队体制上的这些变化使得法国人在战斗中得到很大的好处。人数增长了的队伍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神出鬼没，现在游击队经常遭到意外的袭击，经常被打败，被打散，而且在长时期内无力骚扰法军。

把游击战的三个时期同西班牙的政治史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三个时期是同人民热情在具有反革命情绪的政府的抑制下所经历的不同阶段相适应的。游击战是以全体居民群众的起义开始的，然后由依靠整个区的游击队的力量继续进行，最后则导致非正规部队的形成，这些非正规部队或者沦为强盗匪帮，或者变成正规团队。

同最高政府失掉联系，纪律松懈，经常失败，6年间骨干不断形成、解散而又形成，这一切情况必然使整个西班牙军队具有御用军的特性，并且同样地可以使它变成领导者手中的工具或鞭子。将军们自己由于环境的关系或者参加中央政府，或者公开地、秘密地反对它，而且总是用武力来左右政治。例如，库埃斯塔（似乎随着他在决定祖国命运的各次会战中的溃败越多而越受到中央洪达的信任）就是靠与王政会议共同策划阴谋和拘捕洪达中的累翁代表起家的。中央洪达的成员摩尔拉将军把马德里弃给法军以后，自己就投到波拿巴主义者的阵营中去了。无赖Marques de las Romerias〔朝拜圣地侯爵〕也是中央洪达的成员，他同吹牛家弗朗西斯科·帕拉福克斯、恶棍蒙蒂霍以及兴风作浪的塞维尔洪达共同密谋反对中央洪达。卡斯坦尼约斯、布拉克、拉比斯巴（奥当奈尔家族中的一员）三位将军轮流起着摄政的重要作用，并在议会的治理期间不断玩弄阴谋，最后，瓦伦西亚军区司令官唐·

哈维埃尔·埃利奥干脆把西班牙交给了斐迪南七世去随意支配。毫无疑问，御用军的要素，在将军中比在他们的军队中表现明显得多。

另一方面，在战争期间游击队从基干军的优秀军官中得到了一部分像玻利埃尔、拉西、埃罗勒斯和维耳亚康帕这样的指挥官，正规军也从过去的游击队的领袖中得到了像米纳、恩佩西纳多等等这样的指挥官；因此军队和游击队又是西班牙社会的最革命的部分，因为他们来自一切阶层，包括来自没有受过中央政府的使人软化的影响的、摆脱了旧制度的桎梏的热情的勇往直前的爱国青年；这些青年中的一部分人如里埃哥等已经在法国当过几年俘虏。因此对于西班牙军队对后来运动中的事件所起的影响——无论是在它发起革命的时候或者是在它以自己的御用军特性损害革命的时候——我们都不必感到奇怪。

至于游击队，显然他们经过了多年流血斗争，养成了流浪的习惯，有强烈的仇恨心，好报复，爱劫掠，因而在和平时期他们必然成为最危险的暴徒，随时准备以任何政党或任何原则的名义支持那些能够慷慨酬劳或提供抢劫机会的人。

六

1810年9月24日在累翁岛召开了非常议会；1811年2月20日会议迁往加迪斯举行；1812年3月19日议会颁布了新宪法；1813年9月20日议会会议结束，距会议开幕已经3年了。

这届议会是在历史上很少见的情况下召开的。从来没有一个立法议会的代表是来自世界上这样不同的地区，从来没有一个立法议会妄想控制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如此广大的领土，控制利益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形色色的居民；但是，整个西班牙几乎都被法军占领着，实际上被敌军切断了同全国的联系并被赶到一小块土地上去的议会，当时应该在包围着它、围困着它的军队面前来颁布法律。议会当时应该在累翁岛上的遥远的角落为新西班牙奠定基础，就像他们的祖先过去在卡瓦丹加和索勃拉尔贝高山区所做的那样[262]。1812年的宪法，后来在维罗那会议上被全欧洲戴皇冠的人物痛斥为雅各宾主义的最煽惑人心的发明的这部宪法，正是僧侣的和专制的古老西班牙在似乎完全投入反对革命的神圣战争时期的产物，这个奇怪的现象如何解释呢？这个宪法又突然不见了，它同波旁王朝的一个活的人物一接触就像怪影（西班牙历史学家说像《sueño de sombra》〔“梦幻”〕一样消失了，这个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如果说这个宪法的产生是一个谜，那末它的死亡同样是一个谜。要想揭开这个谜，我们就要简单地考察一下西班牙人曾两次（最初是1820—1823年，以后是1836年）企图实

施的这个1812年宪法。

1812年宪法共有384条，包括以下10章：⑴西班牙国家和西班牙人；⑵西班牙领土、宗教、政府和西班牙公民；⑶议会；⑷国王；⑸民事和刑事的法庭和司法部门；⑹省和公社的内部管理；⑺赋税；⑻国家武装力量；⑼国民教育；⑽宪法的遵行和修改宪法的程序。

宪法虽然根据以下原则：

> “最高权力的体现者实质上是国民，因此制定根本法的特殊权力只属于国民”，

但是宪法又宣布分权制，根据这个分权制，“立法权同时属于议会和国王”，“执行法律权属于国王”，而

> “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方面执行法律权完全属于司法机关，在任何情况下，无论议会或国王都无权行使司法职能，无权干涉待判决的案件，或命令重判已经确定的判决”。

国民代表的选举以人口为基础，每7万居民选1名代表。议会由一院即众议院组成，议员由普选产生。全体西班牙人除了家仆、破产者和罪犯以外，都享有选举权。1830年以后，不会阅读书写的公民不得享受选举权。但是选举的程序是间接的，因为选举分三级：教区、区、省。议员没有一定的财产限制。诚然，根据第九十二条，“当选为议员必须具有从私人不动产中取得的一定的收入”，但是第九十三条把第九十二条的实行日期推迟到议会在将来的会议上宣布这一条开始实行的时候。国王没有解散议会和推迟议会会期的权利；议会每年于3月1日在首都开会，不需要召集，会议至少连续开3个月。

议会每两年选举一次，任何议员不得连续在两届议会中连任，

也就是说只有间隔两年后才能再度当选为议员。议员不得请求并接受国王的奖金、津贴和荣誉称号。国务大臣、枢密官和一切宫廷官员不能当选为议员。担任政府职务的国家官员不能被他执行职务所在的省选为议员。为了抵补议员的开支，各省应当按照本届议会在任期的第二年为下届议员规定的数目支付议员出差费。议会不得在国王在场时进行辩论。如果大臣代表国王要向议会传达某种意见，他们可以在辩论期间在议会认为适当的时候并以议会认为适当的方式到场，还可以参加辩论，但举行表决时不得在场。国王、阿斯土里亚亲王和摄政者都必须在议会面前宣誓遵守宪法，议会决定王位继承制度方面可能产生的一切实际上和法律上的问题，必要时还确定摄政者。一切有关攻守同盟、援外补助金和通商的条约，在批准前都要经议会同意，议会可以准许或禁止外国军队进入王国境内，议会明令设置或撤销宪法所规定的司法机关中的职务，以及设置或撤销国家官职；议会每年根据国王的建议确定平时和战时陆海军的员额；向陆军、海军和国民军的一切部门发布命令；确定国家管理费用，按年确定赋税，必要时可以举借国债，决定一切有关货币和度量衡的问题；规定国民教育的总计划，保障出版的政治自由，采取措施监督大臣切实尽职等等。国王只有中止否决权，他可以在前后两次议会会议期间行使这种否决权，但是如果同一法案被下一年的议会第三次提出并且通过，那末就等于得到了国王的同意，而国王也必须同意。每次会议结束前，议会任命 7 人组成常设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在议会下一次会议召开以前在首都进行工作，有监督是否严格遵守宪法和执行法律的全权；常设委员会应向议会的下一次会议报告一切被发现的违法事件，在紧急时期有权召开议会的非常会议。国

王没有得到议会的同意不得离开国家。国王结婚也要得到议会的许可。王室的每年收入总额由议会规定。

枢密院是国王下面的唯一的私人会议，大臣不得参加，枢密院共有40名成员，其中有4名僧侣代表，4名西班牙大贵族，其他是重要的行政官员，同时，这些人全部都是国王从议会提出的120人名单中挑选出来的；但是任何一个议员都不能担任枢密官，任何一个枢密官都不能接受国王给的职务、荣誉称号或任命。没有最高法院认可的理由不能解除枢密官的职务。议会规定枢密官的薪俸。国王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必须听取枢密官的意见，教会职务和司法职务的人选由枢密官提名。撤销司法部门中一切旧的。consejos〔法院〕，建立新的司法机构，成立最高法院以审理被控的大臣和处理一切有关枢密官、法官等的免职和停职的案件。任何案件没有预先证实已经经过调解都不得审理。废除刑讯、强迫罚款和没收财产。除军事法庭和宗教法庭以外，撤销一切特别法庭，但对军事法庭和宗教法庭的判决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

为了进行城市和公社的内部管理（凡是没有公社的地方，应由至少拥有1000人口的区组成公社），成立由警察局长（corregidor）担任主席并由一名或几名执政官、市政官和参事官组成的地方自治机关，同时这些人员全部由普选产生。任何一个由国王任命的国家官员都不能被选为执政官、市政官或参事官。市政职务是社会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任何人也不能加以摆脱。市政机关在省代表团的监督下执行自己的职务。

各省政务由国王任命的省长（jefe politico）进行。省长同代表团是结合在一起的，他担任代表团的主席，代表团由各区在普选应届议会时选出。省代表团由7名委员组成，有1名议会支薪的

秘书协助他们。代表团每年会期不得超过 90 天。按照代表团的权力和职责的性质来看，它们相当于议会的常设委员会。地方自治机关和省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在就职时都要宣誓忠于宪法。至于纳税，全体西班牙人毫无例外地都要根据自己的财产按比例地纳税，以应国家开支。除港口和边境外，一切税关都撤销。所有西班牙人毫无例外都要服兵役，并且除正规军外，各省还根据人口和条件由各省居民组成国民军。最后，1812 年宪法从生效之日起 8 年内甚至在细节上都不得更改、增添或修正。

议会在编制这一幅西班牙国家的新蓝图时，自然了解到，这部最现代的政治宪法同旧的社会制度是完全不相容的，因此，议会公布了一整套从根本上改造市民社会的法令。例如，议会废除了宗教裁判所，取消了封建主司法权利一切与之有关的独占、禁止和剥夺的封建特权，例如：狩猎权、捕鱼权、森林和磨房的使用权等等，只有当初通过购买而取得的以及可以赎回的权利例外。议会废除了全国的什一税，停止任命一切与执行神职无关的教会职务，采取了步骤来取消寺院和没收寺院土地。

议会曾打算把西班牙的广大荒地、王室领地和公社土地变为私有财产：出卖这些土地的一半以清偿国债，把另一部分分成小块分给参加过独立战争的退伍军人作为爱国酬金，第三部分也是分成小块无偿地分给那些渴望得到土地但又无力购买土地的贫农。议会准许在牧场和其他土地上围篱（以前是禁止这样做的）。它废除了禁止把牧场变成耕地、把耕地变为牧场的不合理的法律，普遍地使农业摆脱了以往专横的不合理的规章。议会废除了一切有关租佃契约的封建法律，也包括这样一条法律：有长子继承权的继承者可以不承认前辈所订立的租佃契约，因为契约在承诺者

死去后就被认为失效了。它取消了所谓voto de Santiago〔圣地亚哥的祷礼〕，一种古老的贡税，就是由某些省的农民贡纳一定数量的上等粮食和上等酒，主要是用来供养大主教和圣地亚哥神甫会。议会颁布了实施高额累进税的法令，如此等等。

保住对已经开始起义的美洲殖民地的统治是议会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议会承认美洲和欧洲的西班牙人在政治上完全平等，宣布没有任何例外的大赦，颁布了反对压迫美洲和亚洲土人的命令，废除了所谓mitas，repartimientos[263]等等，取消了水银垄断权，并且在欧洲第一个废除了奴隶贩卖。

1812年宪法遭到各方面的攻击。有一些人，例如斐迪南七世本人（见他1814年5月4日的敕令），责备宪法是由一批不顾西班牙的历史传统的幻想家移植到西班牙土地上来的1791年的法国宪法[264]的分毫不差的复制品。另一些人，例如德·普腊德神甫在“现代的西班牙革命”[265]一书中，认为议会毫无必要地死抓住从西班牙古法典[266]抄来的、属于国王权力受到大贵族的非常特权限制的那一封建时代的陈旧条文。

实际情况是：1812年宪法是翻版的古法典，但这是按法国革命的精神理解的、适合于现代社会的需要的古法典。例如起义的权利一般认为是1793年雅各宾党的宪法[267]的最大胆的创造之一，其实起义权在索勃拉尔贝的古法典中就出现了，那里起义权叫Privilegio de la Union〔结社权〕。这种权利在加斯梯里亚的古宪法中也有。根据索勃拉尔贝法典，国王没有事先得到议会的同意，不得宣战，不得缔结和约或同盟条约。应当在立法议会休会期间监督严格遵守宪法的7人组成的议会常设委员会，在阿腊贡早就有了，在王国各主要议会联合成一个议会时在加斯梯里亚也建立过。

直到法国人入侵的时候，在纳瓦腊王国还有类似的委员会。至于成立由国王从议会提出的 120 人名单中确定人选并由议会支薪的枢密院，那末这个 1812 年宪法的特殊产物是宪法的制订者在回忆西班牙君主国各个时代的宫廷权奸的致命影响的过程中想到的。枢密院按照设想是宫廷权奸的代替品。此外，过去也存在过类似的机关。例如在斐迪南四世时代，总有加斯梯里亚各城市指派的 12 名代表在国王身边担任枢密官，而在 1419 年，城市代表抱怨说，他们的全权代表不再被准许参加王政会议了。高级官员和宫廷官员不得参加议会以及议员不得接受国王的荣誉称号或者职务，初看起来似乎是从 1791 年宪法抄袭来的，并且似乎是从 1812 年宪法所承认的现代分权制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实际上我们不仅在加斯梯里亚古宪法中见过类似的先例，而且我们知道，起义的人民不止一次地打死过那些接受国王的称号和职务的议员。至于议会在国王年幼时指定摄政的权利，加斯梯里亚的古议会在十四世纪长期有未成年国王在位的时期就经常行使。

诚然，加迪斯议会取消了一向属于国王的召开和解散议会以及推迟议会会期的权力，但是竭力扩大自己特权的国王正是使用了这些手段，结果使议会实际上等于不存在，取消国王的这种权力的必要性就十分明显了。以上举出的事实足以证明，1812 年宪法的最明显的特点——竭力限制王权的倾向（这种倾向完全是正确的，因为戈多伊的可鄙的专制使人记忆犹新，一想到它就令人厌恶），是渊源于西班牙的古法典。加迪斯议会不过把这一监督权从特权等级的手中转到国民代表机关的手中。古法典如何使西班牙国王恐惧，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来：当 1805 年需要新编一部西班牙法律全书时，国王发出一道敕令，命令删除前一版本中所包

含的以及由于君主国软弱而国王不得不同自己的诸侯订立损害国王主权的协议的那一时代所保留的一切封建权利的遗迹。

假如由普选产生议员是新事物，那末不应该忘记：1812年议会和所有的洪达都是由普选产生的；因而限制普选就是侵犯人民已经争得的权利；最后，也不应该忘记，在西班牙几乎所有不动产都受到“死手”权限制的时代，实行财产资格上的限制，实际上就会剥夺大部分居民的选举权。

把人民代表集中在一个单一的议院中，绝对不是像好唠叨的英国托利党人所要证明的那样，是1791年法国宪法的翻版。我们的读者已经知道，从查理一世（德皇查理五世）的时候起，贵族和僧侣就失掉了他们在加斯梯里亚议会中的席位。但是甚至在议会分为代表不同等级的brazas（支派）的时期，议会除了席位不同也是在一个共同会场里开会，而且在一起表决。在直到法国入侵时议会还在起实际作用的少数几个省份中间，诚然纳瓦腊还保持着按等级召开议会的旧习惯，但是在巴斯克各省就是十分民主的会议，连僧侣代表也不准参加。而且，即使僧侣和贵族还保持自己的可憎的特权，他们也早已不是作为古议会的结构的基础的那种独立政治团体了。

加迪斯议会规定把司法权同行政权分开，这早在十八世纪就是西班牙最开明的国家活动家所要求的；由于对王政会议的共同憎恨，人们从革命一开始就了解到，必须把司法机关的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宪法中有关地方自治的一章，正像我们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纯粹是西班牙的产物。议会只是恢复了旧的地方自治的制度，但是消除了它的中世纪的特点。至于说到省代表团（它在

省的内部管理方面具有像地方自治机关在市政管理方面那样的权力)，议会是仿照法国入侵时期在纳瓦腊、比斯开和阿斯士里亚还存在着的类似机关而设立的。议会废除免服兵役权，不过是承认了独立战争时期已经普遍流行的惯例。废除宗教裁判所同样不过是认可了既成事实，因为宗教裁判法庭虽然由中央洪达恢复了，但是它不敢恢复自己的职权，而法庭的成员在识时务地等待更好的时机，薪俸到手也就心满意足了。至于取缔封建性弊端，议会甚至连霍韦利亚诺斯于 1795 年代表马德里经济协会向王政会议提出的著名的报告书中所主张的改革都没有完全做到。

十八世纪末开明专制政府的大臣弗洛里达布朗卡和康波曼内斯早在这方面采取了某些步骤。此外也不应该忘记，与议会同时活动的，还有马德里的法国政府，它在所有被拿破仑军队占领的省份里彻底消灭了一切寺院的和封建的机构，建立了现代管理制度。波拿巴派的报纸把起义完全说成是英国利用僧侣和宗教裁判所的支持而进行的阴谋和收买的结果。同外国政府抗衡对议会的决议起了怎样的良好影响，可以从以下一点看出来：甚至中央洪达在 1809 年 9 月宣布召开议会的法令中也对西班牙人这样说：

“诽谤我们的人硬说我们在维护腐败政府的积弊和根深蒂固的恶习。你们要让他们看到，你们是在为祖国的幸福和独立而斗争，从现在起，你们不愿意再听命于独夫的专横和任性了”等等。

另一方面，在 1812 年宪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同教权派横行时期的黑暗传统实行妥协的明显迹象。只要引证第十二条就够了。根据这一条

“西班牙国家的宗教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天主教的、圣徒的和罗马教的教，即唯一的真正的宗教。西班牙国家以英明的、公正的法律保护它，禁止

信奉其他任何宗教”。

第一七三条要求国王在即位时向议会作如下的宣誓：

“明蒙上帝恩泽并根据西班牙君主国的宪法而为西班牙的国王，我，凭着万能的主和神圣的福音书起誓，我将保卫和维护天主教的、罗马教的和圣徒的教，而绝不容许在西班牙王国有其他任何宗教。”

这样，根据对1812年宪法的比较详细的分析，我们就得出以下结论：1812年宪法绝对不是1791年法国宪法的盲从的摹仿，而是西班牙精神生活的独特的产物，它恢复了古老的民族的制度，进行了十八世纪最著名的作家和国家活动家大声疾呼地要求的改革，并且对人民的偏见作了必要的让步。

七

许多情况促使西班牙最进步的人士在加迪斯会合。当举行选举的时候，运动还没有平静下来，而由于中央洪达不得人心，选民都把视线转向中央洪达的反对者，这些反对者有很大一部分是民族的革命少数派。出席议会第一次会议的几乎都是卡塔卢尼亚和加利西亚这两个最民主的省份的代表，因为累翁、瓦伦西亚、木尔西亚和巴利阿里群岛的代表至少要在3个月以后才能到达。在最反动的内地各省，除了个别例外，不准进行议会选举。在旧西班牙的各个王国、城市和小镇，法国军队不准举行选举，而在新西班牙的海外各省，议员又不能及时来到，因此就从许多为了躲避战争而逃难到加迪斯的人中间，从许多南美商人、西班牙殖民地的土人以及由于好奇和办理私事来到这个城市的人们中间，补选了一些人作为上述地方的代表。这样一来，这些地方的代表就是一些要比在当地举行选举所能选出的代表更倾向革新，更富有十八世纪思想的人。最后，议会在加迪斯召开这一情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这个城市早就以西班牙王国中最激进的城市著称，它与其说像西班牙城市，不如说像美国城市。本地居民挤满了议会大厅的走廊，每当反动派的反对立场表现得太可恶的时候，他们就从外面施加道义上的影响和压力，加以抑制。

如果认为议会的大多数都是拥护改革的人，那毕竟是非常错误的。议会分为三派：奴才派、自由派（这些派别的名称已从西

班牙传到了整个欧洲）和“美洲派”[268]；美洲派依自己的最狭隘的利益为转移，有时同这一派一起投票，有时同那一派一起投票。奴才派人数最多，但是酷爱自由主义少数派的积极、奋发和热情。占奴才派多数的僧侣代表随时准备牺牲国王的特权，一则由于他们没有忘记教会同国家对立，一则也是想猎取声望，从而保住本阶级的特权和权利。在辩论普选权、一院制、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和中止否决权等问题时，教会派每次都是联合自由派中最民主的部分来反对英国宪法的拥护者。教会派的成员之一康涅多神甫，即后来的布尔果斯大主教和无情压迫自由派的人物，对蒙尼奥斯·托雷罗先生（也是神甫，不过是自由派的成员）说了以下的话：

“您容许国王保持极大的权力，但是您身为僧侣，就必须维护教会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国王的利益。”

自由派不得不同教会派妥协，这一点我们在1812年宪法的某些条款中已经看到了。当讨论出版自由的时候，神甫们宣称出版自由是“违反宗教”的。经过热烈辩论并宣布任何人都有权不经特别许可而公开表示自己的信念的原则以后，议会一致通过了加有“政治的”一词的修正案，结果这项自由被削去一半，同时一切有关宗教问题的作品根据特里延特会议[269]的决定仍旧由教会检查。1813年8月18日，在通过了惩办一切谋叛宪法的人的法令后，又通过一项法令，宣布任何旨在迫使西班牙民族放弃罗马天主教的阴谋活动将被看做叛国行为而处死刑。在voto de Santiago〔圣地亚哥的祷礼〕被取消后，又通过了一项宣布圣泰莉莎—德—赫苏为西班牙的庇护女神的决议作为弥补。此外，自由派只是在宪法颁布以后，才注意到提出和通过关于废除宗教裁判所、什一税、寺院等的法令。但是正是从这时起议会内的奴才派和议会外

的僧侣的反对立场，已经变得不可抑制了。

在了解了决定1812年宪法的产生和特点的情况以后，我们现在应该来揭开这个谜：为什么斐迪南七世一回来，宪法就不经反抗而突然销声匿迹了。世界上很少见到这样可耻的景象。1814年4月16日斐迪南来到瓦伦西亚，

“欢腾的人们把他们自己套在他的马车上，用各种言语和动作表示自己情愿戴上旧的枷锁。他们高呼：‘国王的绝对权力万岁！打倒宪法！’”

所有大城市的所谓大广场，在革命时期都改名为宪法广场；同时把这些字刻在石碑上。在瓦伦西亚，这块石碑被换上一块“临时的”木牌，上面写着斐迪南七世王家广场等字样。在塞维尔，群众罢免了全部政权代表，而推选其他人担任旧政权所设的职务以代替他们，并且要求新的当局恢复宗教裁判所。从阿兰惠斯到马德里，斐迪南的车子都是被人民拉着走。当国王下车的时候，群众把他举起来，得意洋洋地让聚集在王宫前面的广大人群看，然后把他抬进王宫。在马德里议会大厦的大门顶上，原来有“自由”两个大铜字；群众急忙向大厦跑去，要挖掉这两个字；他们拉来了梯子，动手把字从壁上挖下来，并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扔到街头。接着群众又把大量的议会记录、自由派的报纸和小册子集中起来，同时他们排成游行队伍，以宗教团体、黑衣僧和白衣僧为前导；所有这些文件都堆在市内一个广场上焚化，作为对政治上异端邪说的火刑，以后大家作祷告唱《Te Deum》〔“赞美我主”〕作为教会取得胜利的感恩表示。但是，应当承认，也许比城市平民（他们一部分是被收买的，而且像那不勒斯的拉察罗尼[270]一样宁愿接受国王和僧侣的堂皇的统治，而不愿接受资产阶级的朴素的制度）的这些无耻示威更重要的事情是，奴才派在第二次普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早在1813年9月

20 日制宪议会就改为普通议会，并于 1814 年 1 月 15 日将会址从加迪斯迁往马德里。

在前几篇文章中我们表明了革命派自己怎样唤起并加强了人民的旧有偏见，企图利用这些偏见作为反对拿破仑的武器。以后我们又看到，中央洪达怎样在唯一能把社会改造和保卫民族的措施结合起来的时期，竭力阻止二者结合，并压制各省的革命愿望。加迪斯议会的情况则相反，它在自己的存在期间有很长一段时期同西班牙失掉了一切联系，在法国军队离开以前，甚至不可能使自己的宪法和带根本性的法令让人民知道。议会的出现可以说是 post factum〔事后〕了。它发现社会处于疲惫、衰竭、虚弱的状态，——这是完全在西班牙领土上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的自然结果。在这个战争中，军队老是在运动，今天的政府很少能维持到明天，而在整个西班牙，从加迪斯到潘普洛纳，从格拉纳达到萨拉芒卡，几乎 6 年没有停止流血。决不能期望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对任何政治宪法的抽象的优点特别敏感。但是当 1812 年宪法第一次在马德里和其他法军撤出的省份公布的时候，人民群众毕竟还是“欢欣鼓舞”地欢迎了它，因为人民群众总是希望只要更换一下政府他们就可以一下子摆脱社会灾难。一旦发现宪法并没有这种神奇的力量，迫切的期望也就变成了失望，而这些热情的南方人从失望到仇恨只不过一步之隔。

此外还有一些局部情况特别使人民对立宪制度失去好感。议会颁布了惩办 affrancesados〔亲法派〕即 josephites〔约瑟夫派〕[①] 的严厉的法令。议会采取这一措施一部分是迫于人民群众和反动

① 即约瑟夫·波拿巴的拥护者。——编者注

派（后者当他们逼出来的法令刚一实行，就立刻转过来反对议会）渴望复仇的压力。当时一万多个家庭因此被放逐。一大批小霸主急忙地进到法军撤出的各省，在那里建立起他们的专横政权，开始用侦查、起诉、逮捕、宗教裁判法庭等手段来对付每一个由于同法国人来往而名誉败坏，接受法国人的职务和向法国人购买国家财产等等的人。摄政者不是想方设法使法国制度易于过渡到民族制度，而是竭力制造困难，挑起在这种政权变化时必然产生的激动情绪。但是为什么摄政者这样做呢？为的是制造口实要求议会停止实行 1812 年宪法，他们说这部宪法起了极其有害的作用。我们要 en passant〔顺便〕指出，所有摄政，这些议会任命的最高行政机关，往往都是议会和议会宪法的最坚决的敌人。产生这个奇怪事实的原因很简单：在任命行政机关的时候，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代表总是同奴才派联合起来，因为他们认为削弱这个机关是美洲殖民地脱离宗主国而赢得独立的必要条件。他们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光有行政机关和主权议会之间的一般的意见分歧是不够的。议会对地租以及对工商业收入实行单一直接税也在人民中引起很大的不满。引起更大不满的是禁止约瑟夫·波拿巴时代铸造的一切西班牙硬币流通和持有者必须兑换国币的不合理法令；同时禁止法国货币流通，并公布了法国货币兑换国币的汇率。由于这一汇率同 1808 年法国人规定的法国货币和西班牙货币的汇率相差太大，许多人蒙受了很大的物质损失。这项不合理的措施也刺激已经高涨的生活必需品价格更加上涨。

对推翻 1812 年宪法和恢复旧制度最关切的阶级——大贵族、僧侣、修道士和法官——不放过机会把当时人民的愤慨情绪（这是因为不满西班牙实行立宪制度所造成的不幸局面）推向顶点。这

就是为什么奴才派在1813年普选中取得胜利的原因。

国王预料只有军队会有某些严重的反抗，但是埃利奥将军和他的军官违背了他们对宪法所作的誓言，在瓦伦西亚宣布斐迪南七世为国王而一字不提宪法。其他军事指挥官很快就效法了埃利奥的榜样。

斐迪南七世在1814年5月4日的敕令中宣布解散马德里议会，并废止1812年宪法，同时他声明自己非常厌恶专制政体，答应按照旧的合法的形式召开议会，规定出版的合理自由，等等。他履行诺言采用的是西班牙人民接待他所应得的唯一方法：他废除了议会的一切法令，恢复了过去的一切制度，恢复了神圣的宗教裁判所，号召被他祖父赶走的耶稣会教徒回来，判处洪达和议会的最著名的成员和他们的拥护者到战船上做苦工、去非洲监狱或者被驱逐出西班牙，而且下令枪决最著名的游击队领袖玻利埃尔和德·拉西。

八

1819年间，在加迪斯近郊集中了一支远征军，它的使命是为西班牙重新征服起义的美洲殖民地。西班牙现任大臣列奥波多·奥当奈尔的叔父恩利克·奥当奈尔——拉比斯巴伯爵被任命为指挥。过去几次对西班牙美洲的远征，由于从1814年以来曾葬送了14000人，并且是以最龌龊、最残忍的方式进行的，曾引起军队的极端反感，而且常常被看做是除去不满部队的巧妙手段。有一些军官如基罗加、洛佩斯·巴尼约斯、圣米格尔（当前西班牙的拉斐德）、奥达利和阿尔科·阿古埃罗等便决定利用兵士的不满情绪，摆脱专制的桎梏并宣布1812年宪法。密谋曾透露给拉比斯巴，他答应领导这个运动。密谋的首领们和他共同约定1819年7月9日举行远征军的总检阅，在这个时候发动一次决定性的突击。拉比斯巴真的出席检阅了，但是他没有履行诺言，反而下令将参加密谋的部队解除武装，逮捕了基罗加和其他首领并派信使给马德里送报告，夸说他防止了一场最惊人的灾难。于是他升了官并获得了勋章，但是后来当宫廷得到事件的更确切的情报时，他被撤了指挥官的职务，并得到命令要他回首都。此人正是那位在1814年国王回到西班牙时派自己的参谋带着两封信去见斐迪南的拉比斯巴。他当时距离国王太远，无法观察到国王的动向以使自己的行动同国王一致，因此，拉比斯巴在一封信中从假定国王会宣誓效忠1812年宪法出发，把这部宪法大事颂扬一番。相反地，在第

二封信中他把立宪制度描绘成一种无政府的混乱不堪的制度，他支持斐迪南废除这个制度的打算，并表示他和他的军队愿意为反对叛乱分子、煽动分子以及王权和宗教的敌人而斗争。军官递上了第二封信，波旁王朝欣然接受了。

尽管在远征军中已经显露出暴动的征兆，以当时的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圣费南多公爵为首的马德里政府，仍然执意保持一种莫名其妙的冷漠态度和无所作为的态度，不采取任何措施来加速远征或者把军队分散到各港口城市去。然而，当时驻扎在拉斯—卡贝萨斯—德—圣璜的第二阿斯土里亚营的指挥官唐·拉斐尔·德·里埃哥同监狱里逃出的基罗加、圣米格尔和累翁岛上的其他军事长官双方约好同时开始革命行动。里埃哥的处境是最困难的。拉斯—卡贝萨斯这个小镇三面紧靠着远征军的大本营：在乌特雷腊有骑兵，在累夫里哈有第二步兵师，而在阿尔科斯有一个侦察营，总司令和司令部也在这里。尽管阿尔科斯的那个营在人数上比阿斯土里亚营多一倍，里埃哥仍然在1820年1月1日出其不意地举行了袭击而逮捕了总司令及其司令部人员。当天，里埃哥就在这个小镇宣布了1812年的宪法，推举了临时镇长，他不满足于完成他所担负的任务，还把侦察兵争取到了自己方面来，而且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在博尔诺斯的阿腊贡营，从博尔诺斯进击赫雷斯，又从这里进击圣玛丽亚港，每到一处都宣布了宪法，直到他打到累翁岛（1月7日）为止，在累翁岛，他把战俘收容在圣彼得堡垒。基罗加和他的拥护者没有按照事先约定用同样出其不意的袭击夺取苏阿索桥和累翁岛，而若无其事地一直等到1月2日里埃哥的使者奥尔特腊给他们送来关于攻克阿尔科斯和俘获司令部人员的正式情报。

由基罗加担任总指挥的革命军的全部兵力不过5000人，它在进攻加迪斯城门受挫后，就被围困在累翁岛上了。

圣米格尔说：“我们的处境是异乎寻常的；革命25天来毫无进展，没有丧失也没有赢得一寸土地，它成了政治上最奇特的现象之一。”[271]

各省似乎都处于昏睡之中。1月就是这样过去了。1月底，里埃哥担心累翁岛上的革命火焰似乎会熄灭，于是不顾基罗加和其他首领的劝告，组织了一支1500人的机动纵队，一直在比它强大十倍的军队的追击下在安达鲁西亚活动；并且在阿耳黑西腊斯、龙达、马拉加、哥多瓦和其他城市宣布了宪法；所到之处，居民都亲切欢迎他，但是任何地方他都没有能够促成重大的起义。可是，追击他的军队化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在毫无结果地来回行军，看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避免同他的小股军队接触。政府军的行动是完全不可理解的。里埃哥从1820年1月27日开始的远征在3月11日结束了，这时他被迫遣散了还跟着他的为数不多的一批人。他的小股部队的瓦解不是因为决战，而是因为疲惫、同敌人的频繁的小冲突、疾病和开小差造成了损兵折将。同时，岛上起义军的情况也极为不妙。他们一直受到海上和陆上的封锁，而在加迪斯城里，每一个有利于他们的运动都被当地守军镇压下去了。3月11日，里埃哥在摩勒纳山解散了他的曾为宪法而斗争的队伍，而3月9日，斐迪南七世在马德里被迫宣誓效忠宪法，这样一来，里埃哥恰好在对自己的事业最后绝望两天之前真正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里埃哥纵队的进军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心，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各省都满怀希望，热切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人们的心被里埃哥的英勇、他的行动的神速和他对敌人的顽强抵抗所

激动，便认为他得到了胜利、援兵和人民大众的参加，实际上这些都不是事实。关于里埃哥进军的传说，传到最远的省份就更夸大了，于是这些距离举事地点最远的省份首先表示支持1812年宪法。西班牙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到就连假消息都足以引起革命的程度了。要知道，1848年的大风暴也完全是假消息引起的。

在加利西亚、瓦伦西亚、萨拉哥沙、巴塞罗纳和潘普洛纳等地相继爆发了起义；恩利克·奥当奈尔，也就是被国王派去镇压里埃哥的拉比斯巴伯爵，不仅表示愿意去武装征讨里埃哥，而且表示要消灭他的小股军队，活捉里埃哥本人。他只请求任命他为拉曼彻驻军指挥官并供给他个人需要的钱。国王亲自交给他一小口袋金币和给拉曼彻驻军的相应的命令。但是，拉比斯巴一到达奥康尼亚就当了军队的指挥官并宣布了1812年宪法。他倒向起义军的消息使马德里的舆论大为振奋，这里一得到这个消息，就立刻爆发了革命。于是，政府开始跟革命方面谈判。在3月6日的敕令中，国王提出召开in Estamentos（按等级）组成的古议会，但是这道敕令任何人——旧君主派也好，革命派也好——都不满意。因为他从法国回国时也许过同样的诺言，但没有兑现。3月7日夜间，马德里举行了革命的示威游行。“日报”在3月8日发表了斐迪南七世答应宣誓效忠1812年宪法的敕令。国王说：

“让我们全体，首先是我，真心诚意地走上宪法的道路。”

3月9日，人民占领了王宫，国王只是在恢复了1814年的马德里地方自治机关并在它面前宣誓效忠宪法之后，才保全了自己。他毫不犹豫地作了假的誓言，因为他身旁永远有一个听受忏悔的神甫，准备彻底宽恕他的一切可能的罪孽。与此同时，成立了谘

询洪达。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释放政治犯并号召政治流亡者回国。首届立宪内阁从监狱里出来（现在监狱都打开了）走向王宫。组成首届内阁的卡斯特罗、埃雷罗斯和奥·阿尔奎列斯等就是 1814 年的蒙难者和 1822 年的代表[272]。由于斐迪南的父亲查理四世退位而产生的高兴是在斐迪南即位时出现的热情的真正源泉，同样的，由于斐迪南七世被黜而引起的高兴是宣布 1812 年宪法时万民欢腾的源泉。至于宪法本身，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当宪法刚拟定好，就已经没有可以宣布它的国土了。对大多数西班牙人民来说，宪法好像古代雅典人所崇拜的未知神一样。

目前，英国作家在直接影射当前的西班牙革命时，一方面断言 1820 年运动仅仅是一种军事阴谋，另一方面又断言它完全是俄国阴谋的产物。这两种说法都是同样荒谬的。关于军事暴动，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它遭到失败，革命却赢得了胜利。另外，应当揭开的谜并不在于 5000 名兵士的密谋，而在于这个密谋得到了拥有 35000 人的军队和拥有 1200 万人口的最忠厚的民族的拥护。革命所以从军队中开始，道理是非常简单的；要知道，在西班牙君主国的一切机构中，只有军队在独立战争中受到了根本的改造和革命的熏陶。至于说俄国的阴谋，不能否认，俄国曾经在西班牙革命中插过手。在所有欧洲国家当中，俄国第一个通过 1812 年 7 月 20 日在韦利基耶鲁基签订的条约[273]承认了 1812 年宪法，它第一个支持了 1820 年革命，第一个把革命出卖给斐迪南七世，第一个在半岛各地点燃反革命的火炬，第一个在欧洲面前郑重地对革命提出抗议，最后还迫使法国发动了对这次革命的武装干涉。当时俄国大使塔提舍夫先生无疑是马德里宫廷中最显赫的人物，是宫廷权奸的秘密首领。他把一个下流的恶棍安东尼奥·乌加尔特

引进了宫廷，并使他成为那些以斐迪南七世的名义在朋党密室中操纵王权的僧侣和侍从的头目。乌加尔特依靠塔提舍夫的帮助被任命为南美远征军总指挥，圣费南多公爵又依靠乌加尔特的帮助被任命为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乌加尔特向俄国购买了一批破旧船只供远征南美之用，为此他获得一枚圣安娜勋章。危机刚开始时，乌加尔特阻挠斐迪南和他的弟弟唐·卡洛斯亲自到军队中去。他是圣费南多公爵采取莫名其妙的冷漠态度的幕后指使者，也是引起一位在巴黎的西班牙自由主义者于 1836 年作出如下评价[274]的那些措施的幕后策划者：

“人们很难摆脱这样的印象：政府本身已经成为推翻现存制度的原因。”

如果再加上美国总统在他的咨文中[275]赞扬俄国向他保证不容许西班牙干涉南美殖民地事务这一件怪事，那末俄国在西班牙革命中起的作用就没有丝毫疑问了。然而，所有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这些事实是否说明 1820 年革命是俄国挑起的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些事实只说明，俄国阻止了西班牙政府去抵抗革命。革命迟早必将推翻斐迪南七世的专制的教权的君主制度，这可以从下面得到证明：(1) 从 1814 年起一个接着一个的密谋；(2) 正统主义者向西班牙进军时期，昂古列姆公爵手下的法国专员德·马丁雅克先生的证词；(3)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证词——斐迪南七世本人的证词。

1814 年，米纳打算在纳瓦腊发动起义，曾经发出了第一个反抗的信号，号召拿起武器，并且打进了潘普洛纳要塞，但是他不相信他自己的追随者，逃到法国去了。1815 年，独立战争时最光荣的游击英雄之一玻利埃尔将军在拉科鲁尼亚宣布了宪法。他被

斩首了。1816 年，理查打算在马德里以暴力逮捕国王。他被绞死了。1817 年，律师纳瓦罗因为宣布 1812 年的宪法而和 4 个同谋者在瓦伦西亚的断头台上牺牲了。同年，无畏的拉西将军在马利奥尔卡岛以同样的罪名被枪决。1818 年，维达尔上校、索拉上尉和其他一些在瓦伦西亚宣布宪法的人受尽拷打并被处死。累翁岛上的密谋只不过是 1808—1814 年多少英雄好汉抛头颅洒热血而进行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的最后一曲罢了。

德·马丁雅克先生在 1832 年，即死前不久发表的“西班牙及其革命”一书中说道：

“自从斐迪南七世恢复专制政权以来已经两年了，而由于人类渣滓所构成的权奸的作怪，剥夺人权的现象还继续存在。整个国家机器完全颠倒过来：到处是漫无秩序，凋敝和混乱—— 损税十分不公平，财政状况非常糟糕，借债不讲信用，国家最急迫的需要无法满足，军队没有给养，法官收入依靠外快，腐败无能的行政当局无力改善什么东西，甚至无力挽救什么东西。因此，人民怨声载道。新的立宪制度受到大城市、工商阶级、自由职业者、军队和无产阶级的热烈欢迎。表示反对它的只有僧侣，而农民对它莫名其妙。”[276]

这就是在破坏这个新制度上出过大力的主要人物之一的死前供状。斐迪南七世在 1817 年 3 月 1 日、4 月 11 日、6 月 1 日和 1819 年 11 月 24 日等敕令中完全证实了马丁雅克先生的话，而且他这样来结束他的哀叹：

“响彻我们耳际的人民的怨声一浪高过一浪。”

这说明，用不着什么塔提舍夫去发动西班牙的革命。

卡·马克思

西班牙的反动[277]

1854年9月1日星期五于伦敦

由于维卡耳瓦罗的军队进驻马德里，政府的反革命活动更加嚣张。被1842年补充法令的一切苛刻的规定装饰起来的1837年出版法的恢复，绞杀了出版者无力支付规定的cautionnement〔保证金〕的那一部分“煽动性”报刊。8月24日，“街垒之声报”以《Ultimas Barricades》〔“最后街垒”〕的标题出版了最后一号，因为该报的两个出版者被捕了。同一天，一家名为“议会报”的新的反动报纸代替了它。

这家报纸的发刊词说：“军事总督唐·圣米格尔阁下对我们的友谊使我们深感荣幸，他惠然表示愿意为本报撰文。他的文章将用他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署名。本报领导人将努力保卫已战胜腐败政权的弊端和暴政的革命，但是他们只在制宪议会的范围内竖立自己的旗帜。只有这里才会进行一场大战。”

这里指的是为伊萨伯拉二世和埃斯帕特罗而打的大战。我们记得，就是这位圣米格尔，曾经在各报刊代表的宴会上说，报刊除了它自身、健全的理性和教育国民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准则，它是刀剑、苦役、流放以及世界上其他任何力量所不能消灭的机构。可是就在他表示愿意为报刊撰文的那一天，他也没有对剥夺

他所如此珍爱的出版自由的法令，说过一句反对的话。

在废除出版自由之后，紧接着也是根据女王的敕令废除了集会自由。马德里的俱乐部被解散了，各省的洪达和公安委员会，除内阁承认为“代表团体”的以外，也一律被解散了。尽管几天前埃斯帕特罗接受过同盟俱乐部的名誉主席的名义，但根据内阁的法令它被封闭了，——这是伦敦“泰晤士报”妄想否认的事实。这个俱乐部曾经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见内务大臣，指责马德里总督萨加斯蒂先生侵犯了出版自由和集会的权利，要求把他撤职。桑塔—克鲁斯先生答复说，他不能指责一个国家官员采取了内阁所认可的措施。结果掀起了一场大风波；但是国民自卫军占据了宪法广场，事情因而也平息下来。一些小报刚被查封，那些至今一直维护萨加斯蒂的大报就开始同他争吵。为了堵住“人民呼声报”的嘴，就任命它的主编科拉第先生为大臣。但是这种做法并不圆满，因为不能把所有的编辑都安插到内阁里去。

然而，反革命派的最大胆的做法是在内阁答应将克里斯亭娜女王交由制宪议会审理之后竟然允许她到里斯本去——这是他们企图在法庭判决之前用没收克里斯亭娜在西班牙的领地的办法来掩盖的一种背叛行为。大家知道，这些领地只是她的财产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样，克里斯亭娜很便宜地逃走了，现在我们得知圣路易斯也安全地到达了贝云。在这件事情上最有趣的是作出上述决定所采取的方法。8月26日，一些爱国者和国民自卫军人员集会讨论如何保障社会的安宁，指责政府摇摆不定和敷衍搪塞，并且决定派代表团找内阁，要求把克里斯亭娜赶出宫去，当时她正在宫中策划反对人民自由的阴谋。非常可疑的是，埃斯帕特罗的两个侍卫长和萨加斯蒂本人也支持这个提议。结果内阁召

开了会议，而会议的结果却是克里斯亭娜悄悄地溜走了。

8月25日，女王由她的所谓丈夫和阿斯土里亚的亲王陪同在普拉多[①]散步时，第一次公开露面。但是看来人们对她是非常冷淡的。

受命起草萨尔托里乌斯内阁倒台时的财政状况报告的委员会，在“日报”上发表了这个报告，而财政大臣科耳亚多先生的说明作了这一报告的前言。根据财政状况的报告，西班牙现在负的债务相当于3300万美元，赤字总额达5000万美元。看来，甚至连政府的特别资金也提前使用了好几年，而且已经用完了。哈瓦那和菲律宾的收入已经提前两年半支用了。从强制公债收得的款项已经无影无踪了。阿耳梅达的水银矿已经提前抵押了多年。应当存放在金库的现金余款也光了。用于军队轮换的经费也没有了。购进烟草应付而未付的款项达7485692雷阿耳。用于公共工程的5505000雷阿耳账款也应当清付。按科耳亚多先生的声明，必须立即偿还的债务为252980253雷阿耳。他所提出的弥补这个亏空的办法是道地的银行家的办法；他提出要恢复平静和秩序，继续征收所有的旧税和举借新债。埃斯帕特罗听从了这个意见，以答应严格奉行温和派的政策为条件，从马德里的主要银行家手里得到了250万美元。从他最近采取的措施来看，他是多么愿意履行这个诺言。

不应当认为这些反动的措施完全没有遭到人民的反抗。当8月28日人们知道克里斯亭娜出走之后，街垒又筑起来了；但是，如果法国“通报”刊载的从员云来的电讯可靠，那末

---

① 马德里的街心花园。——编者注

“军队和国民自卫军一起冲击了街垒，并把运动镇压下去了”。

这就是早产的革命政府注定要走的 cercle vicieux〔恶性循环〕。这些政府承认它们以前的反革命政府所借的债务为国家债务。为了能够偿还这些债务，它们必须继续征收旧税和举借新债。为了能够举借新债，它们必须保证“秩序”，就是说必须亲自采取反革命的措施。这样，新的人民的政府就一变而为大资本家的奴仆和人民的压迫者。1848 年法国临时政府正是这样，它为了偿付它欠资本家的利息，不得不征收恶名昭著的四十五生丁税和没收储蓄银行的存款①。

“西班牙真相”一书的英国作者说：“西班牙革命政府至少还没有堕落到采取像美国所实行的声名狼籍的拒不偿付主义。”[278]

问题在于：如果先前任何一次西班牙革命哪怕有过一次拒绝偿付债务，声名狼籍的圣路易斯政府就会找不到任何一个银行家肯让它预支。我们这位作者也许是认为，借债是反革命的特权，而还债则是革命的特权。

看来，萨拉哥沙、瓦伦西亚和阿耳黑西腊斯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它们那里取消了使它们感到负担的一切捐税。

政府不以任命布腊沃·穆里洛为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而满足，还派冈萨勒斯·布腊沃赴维也纳担任同样的职务。

8 月 27 日，星期日，马德里区召开了竞选大会，以便通过市民投票任命监督首都选举的代表。在马德里有两个选举委员会——自由派联合会和商业联合会。

上述种种反动征象，在熟习西班牙历次革命历史的人看来，并

① 关于这两项措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25、27 页。——译者注

不像肤浅的观察家看来那样可怕，因为西班牙革命总是从召开议会开始，而召开议会往往是解散政府的信号。另外，在马德里只有少数军队，国民自卫军也至多不过 2 万人，其中有武装的不到一半，而大家知道，人民并没有响应交出武器的号召。

尽管女王流泪，奥当奈尔还是解散了她的禁卫军，因为正规军嫉妒这个部队的特权：一个以擅长弹吉他和演奏，seguidillas graci— osas y pycantes〔优美而风趣的赛吉迪利亚舞曲〕见称的戈多伊从这个部队青云直上而成为国王的侄婿，一个仅以个人品质见称的蒙尼奥斯成了太后的丈夫。

在马德里，共和派散发了如下的**伊比利安联邦共和国宪法**。

第一章　伊比利安联邦共和国的组织

第一条　西班牙和它的岛屿同葡萄牙联合组成伊比利安联邦共和国；国旗的颜色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现用国旗结合而成；共和国口号将为自由、平等、博爱；

第二条　最高权力属于全体公民；它是不可转让和剥夺的；任何个人或任何集团均不得擅自加以行使；

第三条　法律是国民意志的表现；法官由人民普选任命；

第四条　凡年满 21 岁的公民均享有选举权；

第五条　政治犯和刑事犯的死刑一律废除；一切案件均应由陪审法庭审理；

第六条　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流亡者被没收的地产，应予归还；

第七条　按收入比例征税；实行单一税，即普遍直接税；废除一切间接税、入市税和消费税；同样废除政府对盐和烟草的专卖，废除印花税、营业执照捐和兵役捐；

第八条　保障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住宅不受侵犯，保障受教、经商和信仰的自由；**每一宗教的教徒自己支付本教教士的薪俸**；

第十三条　共和国的行政分为联邦、省、市三级。

第二章　联邦行政

第十四条　联邦行政由执行委员会执行，执行委员会由中央联邦会议任免；

第十五条　联邦行政的范围：国际关系和商务关系，保证度量衡和币制的统一，邮政，武装力量；

第十六条　中央联邦会议由各省选出9名代表组成，代表由普选产生，并受选民的指示的约束；

第十七条　中央联邦会议是常设机构；

第二十条　每当颁布一项法律时，认为此项法律必要的行政机关须将草案送交联邦审查：由中央联邦会议审查者须在6个月以前送交，由省立法机关审查者须在3个月以前送交；

第二十一条　人民代表，如不遵守他所接受的指示，即交付审判。

第三章是关于省和市的行政的，其中规定了同样的原则。这一章的末一条规定：

“**不得再有殖民地**，将殖民地改变为省，并依省的同一原则治理。**奴隶制度应予废除**。”

第四章　军队

第三十四条　武装全体人民，组成国民自卫军，其中一部分为别动队，一部分为地方国民军；

第三十五条　别动队由21岁至35岁的独身男子组成；其军官由军事学校学员中选拔；

第三十六条　地方国民军由35岁至56岁的全体公民组成；军官由选举任命；他们的任务是地方自卫；

第三十八条　炮兵部队和工程部队以志愿兵的方式征募，它们是常备部队，驻守沿海和边境的要塞；内地不得设置要塞；

第三十九条是有关海军的，包括类似的规定。

第四十条 撤销各省的司令部和军区；

第四十二条 伊比利安共和国摈弃一切征服性战争，并将争端交给同争执问题无利害关系的各国政府裁决；

第四十三条 不得设置常备军。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9月1日
载于1854年9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85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马志尼被捕的传说。——奥地利的强制公债。——西班牙。——瓦拉几亚的状况

1854年9月12日星期二于伦敦

报纸纷纷报道马志尼在巴塞尔被捕的各种传说。我从一位友人那里得到如下一个消息：马志尼的确在苏黎世被两名宪兵逮捕了，但是仅过几小时，他又逃掉了。帮助他逃跑的也是一个意大利人，他在同一个时间在另一个地方冒充马志尼让人抓起来了。当局被这个巧计弄得糊里糊涂，就连德律埃先生本人也从伯尔尼打电报到日内瓦，命令停止继续搜捕，因为马志尼已经被监押了。有人揣测代替马志尼被捕的人可能是萨菲，但有人认为是一位名叫图尔的匈牙利军官。

8月31日的“米兰报”满意地指出，帕维亚市政委员会在8月28日的会议上决定认购20万弗罗伦的国民公债。跟这个消息相反，一家非官方报纸发表了该委员会如下的决议本文：

“帕维亚市政委员会已经认购为帕维亚市**规定的必须认购的**数额，但它不作为市政委员会的代表，也不单纯作为一个认购者，而只是作为从属于行政权（它根据1830年通令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行政权）的一个管理机构，并且为了执行总督8月7日给它的命令才认购的。”

在特雷维佐，自愿公债也完全是在直接胁迫下认购的。从的里雅斯特委员会的通告中可以看出，甚至在这个对奥地利充满忠臣感情的城市里，对公债的认购既不是自愿的，也不是十分普遍的，这种情形奥地利报纸作了如下的描述：

"我们市政委员会又认购了100万国民公债。市政委员会特此宣布：本数额将由至今毫未认购或认购额不符本人财产状况的人分摊。同时，规定9月6日为自愿认购的最后限期。委员会希全体市民从速享受公债提供的利益，况且委员会在上述期限过后还将被迫采取强制手段。"

反动报刊对西班牙政府最近的措施仍然不满；它们抱怨又在跟革命妥协。例如，"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写道：

"埃斯帕特罗还在8月7日就宣称：'按照马德里人民的愿望，里安萨雷斯公爵夫人不得离开首都，不管是白天或者夜间，或者采取任何一种秘密方式。'并且只是在8月28日，克里斯亭娜女王在被捕21天之后方获准在大白天，甚至在较为盛大的仪式中离开了。然而，政府表现了如此的软弱，竟然同时下令没收她的财产。"

"辩论日报"现在希望撤销这个命令。但是，该报的这次希望恐怕比它那次对波拿巴不要没收奥尔良王族的财产[279]的微小希望更难实现。奥维耶多的总督已经将克里斯亭娜在阿斯土里亚省的煤矿收归国家暂时管制。西罗、朗格雷奥和比埃罗—科里尔等地的矿场经理已经接到要他们呈递报告和在行政方面隶属于政府的命令。

至于说到"大白天"，——按"辩论日报"的说法，克里斯亭娜是在这样的时候离开的——那就说明这家报纸的消息非常不灵通。克里斯亭娜女王离开她的住处后，在死一般寂静中走过了走廊，因为曾经采取了一切措施不让任何人碰见她。驻扎在王宫院内的国民自卫军也没有怀疑她会离开。整个计划制定得如此机密，

就连奉命护送女王的卡里哥也是在离开的时刻才接到命令。已经离开马德里 12 英里，才告诉护送队它的使命的性质，这时卡里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阻止住他的部下没有辱骂女王和立即返回马德里。国民自卫军的指挥官只是在蒙尼奥斯夫人离开两小时后才获悉所发生的事情。“西班牙报”断言克里斯亭娜在 9 月 3 日上午到达了葡萄牙边境。这家报纸说，她一路上情绪很好，但她的公爵有点 triste〔忧郁〕。克里斯亭娜和这位蒙尼奥斯的关系只有想起唐·吉诃德对桑科·判扎的答话才能理解。桑科·判扎问唐·吉诃德，为什么他，唐·吉诃德，既然能够使公主为之倾倒，却要去爱达辛尼亚这样一个低贱的村妇。

尊敬的骑士回答说，有人问一位被一群高贵的、阔绰而又聪明的崇拜者包围的太太，为什么她挑了一个普通庄稼汉作她的情夫。这位太太回答说，要知道，我看上他，是因为他懂的哲学比亚里士多德懂的还多。[①]

根据从“科伦日报”和“比利时独立报”上摘来的材料一般地可以看出反动报刊对西班牙形势的看法。前一家报纸写道：

“根据一位消息灵通而又可靠的记者，而且是奥当奈尔和温和派的拥护者的说法，形势是令人焦虑的，因为各派之间并未停止深刻的冲突。工人阶级在鼓动者的影响下处于不断激动的状态。”

“独立报”写道：

“西班牙君主制的未来正受到严重威胁。所有西班牙的真正爱国者都一致认为必须结束革命的狂热。诽谤者和街垒战士对埃斯帕特罗和他的政府的激愤，并不亚于对圣路易斯和银行家萨拉曼卡的激愤。但是，老实说，不能把这类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归罪于这个侠义的民族。不能把马德里的人民同喊叫‘处死克里斯亭娜！’的无知之徒等量齐观，不能让他们对居民中间流传

① 见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第一部第二十五章。——编者注

的所谓‘正路易斯、克里斯亭娜及其同谋者盗窃行为’的卑鄙的流言蜚语负责。1800个马德里街垒和巴塞罗纳的极端共产主义的示威游行暴露了外国民主主义在西班牙农神节里的作用。总之，不用怀疑，许多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流亡者参加了目前还激动着半岛的令人遗憾的事件。不用怀疑，社会的烈火眼看就要在西班牙燃烧起来；它的直接后果将是丧失安的列斯的明珠，宝岛古巴，因为西班牙将无力同美国人的阴谋或者任何一个索尔和桑德斯的爱国精神进行斗争。是西班牙恍然大悟的时候了，是文明欧洲的一切正派人们共同努力敲起警钟的时候了。”

当马德里政府8月28日违背了8月7日许下的诺言时，当它废除集会自由并恢复要每个出版者交纳4万雷阿耳保证金和支付300雷阿耳直接税的1837年出版法时，当然完全用不着外国民主主义出面来激起马德里居民的愤怒。如果说各省还在继续发生不确定的不坚决的骚动，那末，这除了说明还缺少一个革命运动的中心，还能说明什么呢？自从所谓的革命政府落入埃斯帕特罗的手中之后，没有出现过一个有利于各省的法令。各省都会看到，这个政府已被圣路易斯时代的那种阿谀、倾轧和争名夺利的气氛包围。围着政府打转的仍然是一帮走狗——从菲力浦时代[280]起就一直折磨着西班牙的祸患。

我们不妨看一看最近一号9月6日的马德里“日报”。该报刊载了奥当奈尔的报告，报告中说，由于军衔和爵位多如牛毛，每三个将军中只能有一个担任实际职务。将军的这种生产过剩——真正的灾难——从1823年起就是对西班牙的一种惩罚。本来期望会颁布一项法令消除这种灾祸。但结果什么也没有。在这个报告后颁布的法令是成立一个咨询性的军事洪达，由政府任命一些目前不在军队中担任任何职务的将军们组成。这些先生们除了平常的薪俸之外，还应领到：中将是5000雷阿耳，元帅是6000雷阿

耳。曼努埃尔·德·拉·孔查将军被任命为这个领干薪的军事洪达的主席。同一号“日报”报道了又一次大发奖赏、退休金等等，似乎第一次的慷慨施舍还没有完成使命。圣米格尔和杜耳塞获得了查理三世大十字勋章；萨拉哥沙洪达拟定要奖的一切奖赏和奖章都得到确认和补充。但是，这一号“日报”的最出色的部分是宣布9月11日恢复对国债的偿还。如果西班牙人民对自己革命政府的这些成就还不感到心满意足，那就未免狂妄！

不久前从瓦拉几亚回来的旅行者报道了这个公国的极为艰难的状况。大家知道，多瑙河各公国为了偿付俄国1848年至1849年的占领费，已经负债1400万法郎。在最近一次占领期间，这笔款项由俄国将军们征收去了。俄国人是在把所有金库（教区的、修道院的和市政委员会的金库）抢掠一空之后才撤退的。他们用这些金库的现金偿付他们按合同从瓦拉几亚的土地占有者和农民那里得到的产品。但是对于一个农业国中关系十分重大的交通工具，对于木柴、煤炭和干草等等却根本不付钱，而是干脆征用。结果，多瑙河各公国的国库非常空虚，以致某些教区濒于破产。而且，许多被改作军医院的房屋和由于贵族害怕土耳其人抢劫而交由俄国人保存的大量财产还未算在内。

8月29日雅典来信说：

> “国王继续拒绝付给土耳其任何赔款。对西方国家军队的仇恨日益增长，有些法国兵士已被人民打死。”

不妨向读者讲一讲关于希腊村社怎样由于英国的影响而解体、人们怎样把卡波第斯特里亚强加于它们以及全体希腊人民怎样被帕麦斯顿勋爵的鬼蜮伎俩弄得斗志沮丧的一段离奇古怪的历史。不列颠政府的真实意图甚至在目前它对希腊进行武装干涉的

时候，在英国对卡利尔吉斯将军的支持中充分暴露出来了。卡利尔吉斯将军同卡波第斯特里亚一样，在俄国出生、长大并且长期居住。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和不列颠政府终于盼到了他们蓄谋已久的事件——在土耳其境内，如果不是在其欧洲部分至少也在安那托里亚煽起暴动。我们已经从来自罗兹岛的消息获悉，在该岛对岸爆发了善战的土耳其山地部族崔别克人的暴动。“君士坦丁堡日报”8月20日报道说，这个地区的混乱状况日益发展。因为没有正规军队，所以叛乱者不断从山上下来进行袭击，闯入村庄，征收什一税，抢劫居民和商队，奸污妇女并且打死一切反抗他们的人。他们在马斯特沙克省胡作非为得最厉害。省长被迫从艾顿逃到泰尔。德尼兹利已落入他们手中，而出发去向总督报告情况的伊斯兰教高僧萨希布－埃芬蒂被抓了，和他的同行者一起被砍了头。参加暴动的有成千上万的人。有人认为这种紊乱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把责难土耳其政府压迫土耳其人并屈从俄国的巴希布祖克从卡尔斯和巴雅泽特调回。

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欧洲，就可以看到在西班牙、意大利、丹麦、多瑙河各公国、希腊和土耳其亚洲部分的革命的征兆；甚至在瓦尔那的法军部队里，也响起了《A bas les singes!》〔“猢狲们滚蛋!”〕的号召。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9月12日
载于1854年9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9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联军舰队的活动。——多瑙河各公国的局势。——西班牙。——英国的对外贸易

1854年9月15日星期五于伦敦

昨天的“通报”登载了以下一则电讯：

“**特拉皮亚**9月7日讯。法军和土军已于9月5日由瓦尔那出发。英国舰队将在蛇岛附近同他们会合。天气好极了。”

这第一批远征军所以迟迟不能出发，是因为博斯普鲁斯海峡出现强烈的风暴，这次风暴一直刮到8月27日。8月27日当东北风转向的时候，运输船才离开君士坦丁堡进入黑海。蛇岛（伊拉德— 阿德西）是一个峭壁重叠的小岛，它离贝萨拉比亚海岸不远，几乎正对着多瑙河口；方圆不过3英里。9月5日才出发的军队大概在9月9日以后才登陆。

在“通报”上一篇分析这次远征的前景的文章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通报”写道：“如果，**如果**克里木俄军的数量比我们根据迄今得到的消息所能估计的要**大得多**；如果塞瓦斯托波尔的现有兵力能够进行**持久防御**；如果遇到秋季所产生的困难；最后，如果能够从俄国抽调大量援军来支援克里木，那末，这一次我们就只好重新上船，等到春天再来进攻塞瓦斯托波尔了。”

简单说来，如果这支“拥有大量的毁灭手段的强大舰队”在途中碰到稍微严重的障碍，它就得立即返回博斯普鲁斯海峡。如果碰不到这些障碍，那末这无论如何不是联军的过错，因为关于这次早已准备妥当却一直拖到有利季节的最后几天才举行的远征，早在好几个月前沙皇就知道了。至于水兵们是否信任自己的指挥官，这一点可以从“奥格斯堡报”上刊登的君士坦丁堡来信的下面这段话看出来：

“在舰队中，人们通常都把圣阿尔诺称为弗洛里瓦尔——这是他在巴黎安比居剧院初次登台扮演一个**滑稽演员**时所用的假名。”

根据汉堡和哥本哈根的最后消息，有一部分法国军舰和运兵船已经过贝耳特驶回法国。波拿巴派的“立宪主义者报”发表了有关博马尔松德战斗的揭露材料：

“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不希望**取消对效忠于他的舰队的**奖励**，这种奖励是舰队在波罗的海经过这样长久而艰辛的航行之后所应得的。”

因而，博马尔松德遭到炮击仅仅是为了供水兵们的娱乐和对军官们的烦躁不安和渴望消遣的心情的让步。“通报”和“立宪主义者报”上的这两点简短的暗示，比英国官方报纸的所有那些夸夸其谈的社论更能揭示战争的性质。

根据沙皇的命令，所有参加修建博马尔松德堡垒的工程师都被逮捕了。他们将交付法庭审判。他们被控的罪名之一是，工事本应全部用花岗石修建，然而，在堡垒塌陷以后发现，围墙中间填的完全是沙子和碎石。芬兰湾沿岸所有要塞的司令官都接到圣彼得堡的命令，要求最仔细地检查这些要塞的构筑方法，并立即将检查结果上报。现在已经查明，汉古特海角的古斯塔夫斯维恩

堡垒是进行侦察的巴拉盖·狄利埃和琼斯将军正在了望它的时候，由俄军自己炸毁的。俄军担心敌人会攻击亚波，于是他们炸毁古斯塔夫斯维恩堡垒以便利用堡垒的守军来加强亚波的城防。

在从波罗的海转到其他课题之前，我想在这里引述"晚报"上的下面一条消息：

"一位哥本哈根的记者断定说，丹麦政府于8月16日准许特·普·沙弗涅尔先生安设从北美经格陵兰、冰岛、法罗群岛和挪威通向哥本哈根的电报线路。8月26日从斯德哥尔摩到马尔摩的线路已经开辟，全长68670码。"

伦敦的一部分报纸今天登载了一则关于沙米尔在离梯弗里斯不远的某地获胜的电讯。法国和德国的报纸没有提到这个事实。9月4日土军在曼成渡过多瑙河，并占领了位于这个要塞和布来洛夫之间的一个岛屿。多瑙河上土耳其区舰队的很大一部分舰船也在曼成抛锚。土军应在9月5日占领布来洛夫。8月30日敖德萨张贴的克鲁津什特恩将军的告示很值得注意；告示中预告居民说，如果军队认为必须烧毁城市以保卫国家，届时全市居民不得阻挠，违者严惩不贷。此外，贝萨拉比亚所有各县的俄国当局都发布命令说，一旦敌人逼近，应将城市和乡村烧毁。这道命令尤其可笑的是，俄国人知道得很清楚，贝萨拉比亚的罗马尼亚人对俄国人撤退不会比对罗马尼亚人从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撤退更感到惋惜。

我已经写过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民团被编入俄军服役时的情况。今天英国报纸报道了8月28日在布德贝尔格先生和罗马尼亚民团的军官之间所发生的事件的详细经过；菲力佩斯科上尉在谈话结束时当面向俄国将军声明说，瓦拉几亚人认为苏丹是自己的唯一的宗主国君主。当然，他被逮捕了，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

两个敢于用同样方式进行反抗的军官。下面是今天巴黎“新闻报”发表的关于8月29日(这一天俄国对多瑙河各公国的远征终于如此光荣地完成了)事件的报道:

“菲力佩斯科上尉和其他两名敢于违抗布德贝尔格将军命令的军官的被捕,引起了莫尔达维亚民团的强烈愤慨,使他们更加不愿在俄军中服役。8月29日在快到规定检阅的时间,统领马夫罗科尔达托来到政府宫对面的骑兵兵营。当他发现兵营里一个人也没有,他感到多么惊奇和恐惧。兵士们不但没有给马备鞍去接受检阅,反而把武器和军需品扔在原地,全都从马厩中逃跑了。这位碰壁的统领急忙赶到炮兵兵营,在那里等待他的是新的意外。火炮在操场上原地不动地架着,但是人不见了。马夫罗科尔达托已经绝望地看到自己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了。然而他集合起了三十来个炮兵,他一面气愤和吓得发抖,一面命令他们套马把火炮运到原定检阅的广场。但他们喊叫道:‘让他们用武力把我们拖到那里去吧,我们不服从俄国人的命令。’他们一面这样喊叫,一面把兵营的大门锁起来了。过时广场上响起了一阵阵的鼓声。这是奥斯坦—萨肯的全师人马,包括有12个步兵营,1个龙骑兵团和3个炮兵营。在各条街道都布置岗哨后,全师在广场上整好队,然后把政府宫和莫尔达维亚骑兵兵营完全包围起来。60名被追回来的莫尔达维亚骑兵列队站在兵营前面。他们的对面站着12000名俄国兵士,有步兵、骑兵和炮兵。奥斯坦—萨肯在布德贝尔格将军和一大队卫队的陪同下出现了。俄军散开成纵队,上好刺刀,高呼‘乌拉’而在自己的将领面前隆重地列队行进。然后他们在离莫尔达维亚骑兵150码远的地方排成一个方队。发出了装子弹的口令。俄国兵士画了画十字执行了。然后又命令他们瞄准60名莫尔达维亚兵士。在他们都瞄准好之后,奥斯坦—萨肯带着卫队走近一群莫尔达维亚民兵,号召他们跟着他的队伍前进,并威胁说,如果他们拒绝,就把他们通通枪毙。对他的号召的回答是长时间的沉默。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都异常激动。于是一名莫尔达维亚人从队伍中跑出来,用沉着的声调向俄国将军说话。他说:‘我们是莫尔达维亚兵士,我们的职责就是保卫我们的祖国,而不是为外国人作战。你们想把我们怎样就怎样吧。我们决不跟你们走。’‘可以打死我们,但是我们决不跟你们走’,——60名兵士异口同声地重复着。奥斯坦—萨肯听到这个大胆的回答后命令他们下马并放下武器,好像要立刻下令处死。他们

宁愿死去，就听从了。刹那间成千兵士把他们包围起来，向他们扑去并把他们俘掳了。在完成这件战斗的功绩以后，他们便到莫尔达维亚炮兵兵营，那里还有30个人躲在锁着的大门后面。兵士们捣毁了大门，冲进营里；于是展开了一场搏斗，占压倒优势的敌人把炮兵也俘掳了。炮兵被匆忙地押走，并不断遭到凌辱和死亡的威胁。但是他们处之泰然。只有其中一个22岁的年轻骑兵少尉，两眼冒着怒火走近弗兰格尔将军，把胸膛一挺，喊道：'这儿是我的胸膛，如果你敢，就用子弹射穿它吧。'将军不敢。骑兵少尉和他的战友们被解除了武装，并在两排刺刀的押送下解往雅西门外的奥斯坦—萨肯兵营。后来如何对付他们，谁也不知道。至于头一天晚上被捕的3名军官的下落，很多人都担心他们将被枪毙。同一天晚上俄军包围了一个莫尔达维亚步兵团驻扎的营地，但是那里只遇上150个兵士，其余都躲起来了。雅西居民大声痛骂自己的保护者。配备有3个炮兵连的12000名俄军，俘掳了60名骑兵、30名炮兵和150名步兵并把他们解除了武装——这就是俄军远征多瑙河各公国唯一值得纪念的胜利。"

我在过去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奥美尔—帕沙关于禁止散发海斯将军的奥地利宣言的命令。现在才弄清禁止散发的原因：在这个宣言中曾建议瓦拉几亚当局凡事都同奥军统帅部磋商。奥美尔—帕沙让海斯将军知道，他不应当干涉属于他（奥美尔—帕沙）权限内的瓦拉几亚的民政管理问题。因为海斯将军发表宣言的目的不过是试探一下他的权力可以伸展多远，所以他对引起异议的地方就表示道歉，并且为了向奥美尔—帕沙证明原来是发生了错误，就给奥美尔—帕沙看了宣言的德文原文，在德文原文中建议瓦拉几亚当局只就同奥军有关的问题同他的侍卫长商量。奥美尔—帕沙也制止了奥地利将军波波维奇的行动。波波维奇于9月3日率领奥军先头部队进入布加勒斯特并立即在那里仿照海瑙行事。瓦拉几亚的居民究竟有几分欢迎奥军占领，这可以从今天的“每日新闻”摘来的一段消息中看出：

“奥军沿途经过的许多村庄，居民都携带自己的全部财物离开了，因为他们担心，他们将不得不提供粮食或运输工具来交换实际价值只等于票面价值一半的纸币。结果奥军的粮食只好从20甚至30英里外的布加勒斯特运来。”

毫无疑问，正是在多瑙河各公国所干的蠢事——**英国外交的成果**——给清醒的“经济学家”提示了一篇文章，该文作者根据美国外交在欧洲所犯的某些无足轻重的错误，对英美两国外交的不同作了如下比较：

“我们并不怀疑，美国也同我国一样不乏善于表现崇高感情、严守行为规则和深知对他人义务的人。但是我们之间的差别，我们的美国弟兄的不幸就在于，在大西洋彼岸，这样的人材不能选举政府，对整个民族不能发生影响，**不能决定报刊的语言**。在我们这里政权掌握在有教养的**上层阶级**手中。在美国是群众在统治；那里平民篡夺了代表民族说话的权利；平民在左右言论和行动，平民选举政府，并且这个政府必须为他们效劳；他们支持报刊，而报刊也要迎合他们；简单地说，凡是所做所写的都要符合平民的爱好和愿望。”

英国证券交易商的走狗就是这样写的，好像英国外交不是十足愚蠢的，好像那些靠“经济学家”编辑威尔逊先生和他的上司格莱斯顿先生的帮助而得到任命的“绅士们”，在议会上并没有被揭发从事诈骗、赌博作弊和盗窃的勾当。

从西班牙来的只有非常少的一些消息。9月8日马德里谘询洪达终于解散了。塞维尔洪达在解散以前对中央政府的反动政策表示坚决抗议。卡塔卢尼亚的民主派发表了一个反对普里姆将军的宣言，后者由于不愿在瓜分猎物中失掉自己的一份，就从土耳其发表声明拥护现政府。普里姆在1843年围攻菲盖腊斯城堡曾招来卡塔卢尼亚人的仇恨。在围攻中由于阿美特勒指挥的一小队守军英勇保卫要塞，围攻部队非常恼火，因而对守军采取了令人发

指的暴行。谈到普里姆，当时人们说他是一个“被偶然成就和他所获得的伯爵称号和中将官衔冲昏头脑的可笑的爱虚荣的人物”。

“时代报”报道说，9月7日在阿兰惠斯国民自卫军同不知是卡洛斯派还是共和派的队伍发生了武装冲突。尽管乍一看反动派的胜利是多么迅速、多么确定，但反革命派报刊仍然流露出忧心忡忡：西班牙的情况可能还没有顺利解决。

在刚刚发表的关于贸易和航运的报告中值得注意的有下述材料[281]：

1831、1842年和1853年英国和爱尔兰产品和工厂制品出口申报价值一览

（单位：英镑）

	1831	1842	1853
俄国，北部和黑海沿岸港口……	1195565	1885953	1228400
瑞典和挪威……	115707	334017	556183
丹麦……	92294	194304	569733
普鲁士……	192816	376651	579588
汉诺威和汉撒同盟……	3642952	6202700	7565493
荷兰		3573362	4482955
和……	2082536		
比利时		1099490	1371817
法国……	602688	3193939	2636330
葡萄牙……	975991	947855	1210411
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岛……	80698	64909	124971
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	597848	322614	1360719
卡内里群岛……	33282	54554	107638

续

	1831	1842	1853
意大利：			
撒丁			1112447
托斯卡纳公国			639794
教皇国	2490376	2494197	207491
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			639544
奥地利属地			637353
希腊			135315
土耳其	899100	1489826	2029305
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			179510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	375551	306580
埃及	122832	221003	787111
摩洛哥	426	41952	75257
法属塞内加尔冈比亚	——	——	1725
非洲西岸	234768	459685	617764
爪哇和苏门答腊	285296	306132	558212
菲律宾群岛	39513	47019	386552
中国	519443	969381	1373689
古巴	663531	711938	1124864
海地	376103	141896	133804
美国和加利福尼亚	9053583	3585381	23658427
墨西哥	728858	374969	791740
新格拉纳达	248250	231711	450804
委内瑞拉			248190
巴西	1238371	1756805	3186407
乌拉圭	339870	969791	529883
布宜诺斯艾利斯			551035
智利	654617	950468	1264942
秘鲁	409003	684013	1246730

续

	1831	1842	1853
其他国家	215	7223	912662
出口总值	26909432	34119587	65551579
输往英国属地			
诺曼底群岛	324634	364350	470107
直布罗陀	367285	937719	670840
马尔他	134519	289304	297906
伊奥尼亚群岛	50883	83600	116567
南非	257245	369076	1212630
毛里求斯岛	148475	244922	385879
东印度	3857969	5169888	8185695
刚果	——	——	357908
澳大利亚	403223	998952	14513700
北美殖民地	2089327	2333525	4898544
西印度	2583949	2591425	1906639
其他属地	39431	18675	347787
输往英国属地总值	10254940	13261436	33382202
输往英国属地和外国总值	37164372	47381023	98933781

“经济学家”挑选1842年来强调这一年开始实行的贸易自由[282]的优点，但是，它以素有的天真忘记了，1842年是贸易萧条的一年，而1853年才是最繁荣的一年。如果英国出口的增长归功于贸易自由的魔法，那末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应当是英国向执行严格保护关税制度的国家，例如俄国和法国的出口数字的比较，尤其是俄国向英国的出口比其他国家都增加得多，受英国自由贸易的影响也比其他国家的大。然而事实上，向这两个国家的出口都缩减了。

向俄国出口1853年是1106776英镑
1831年是1195565英镑
向法国出口1852年是2636330英镑
1842年是3193933英镑

英国在1854年8月5日前7个月的出口总值比1853年同期增加了，因为五金的价格上涨了；但是英国的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出口却大大缩减了，这可以从下表看出来：

	1853 （单位：英镑）	1854 （单位：英镑）
亚麻织品	2650150	2456953
亚麻纱	646578	581752
丝织品	965345	834275
卷丝	132689	120890
毛织品	3741261	3731453
棉织品	15515224	14762981
棉纱	3897080	3838393

有关棉织品的数字更有说服力，因为棉织品的出口数量增加了，然而货款收入减少了。1854年出口了981994130码棉织品，还不算花边和绸布，而1853年总共出口了969293663码。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9月15日
载于1854年10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98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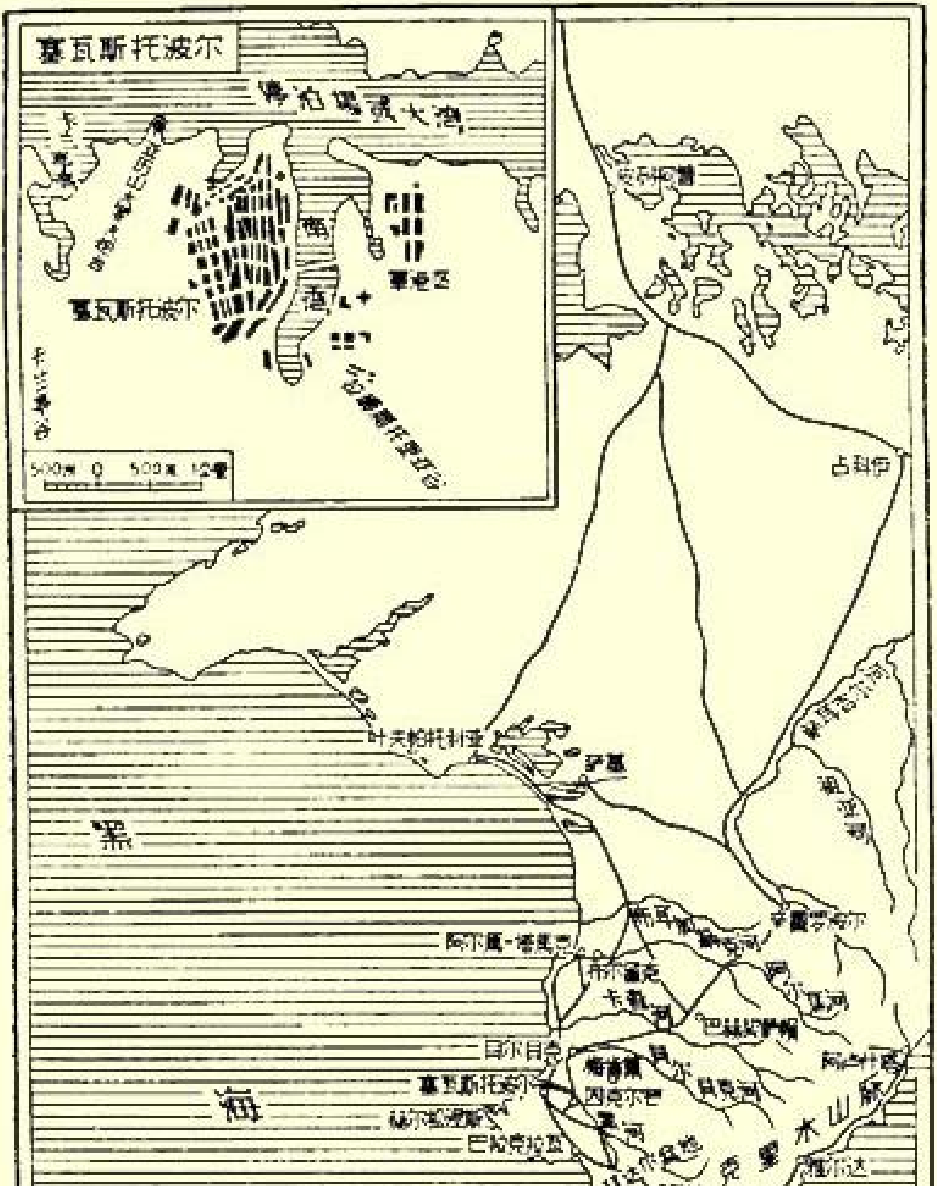
看来，法军和英军终于有了给俄国的实力和威望以严重打击的机会，因而我们怀着新的兴趣来注视联军向塞瓦斯托波尔推进（今天本报刊载了有关的最近消息）。当然，法国和英国报纸正大肆吹嘘这次行动，如果相信这些报纸的话，那末这次行动就是军事学术史上空前的壮举了；但是这是欺骗不了那些了解事实、记得这次远征开始时莫名其妙的拖延和毫无意义的遁辞以及远征前和远征中所发生的一切情况的人们的。即使这次行动的结局是光荣的，它的开端也是非常可耻的。

让我们看看联军在土耳其活动的经过吧。起初，这些十分英勇但又极其谨慎的勇士们打算在达达尼尔海峡西面的埃内兹登陆，而且要在查明毫无危险以后才接近半岛。可是，在他们建立这个英勇功绩之前，他们竟鼓起出乎意外的勇气，冒险在色雷斯的赫尔松涅斯附近的加利波利登陆了。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在最短期间内筑好横断半岛的防御工事，从而给自己建立起最必需的东西——作战基地。在这期间，土军却在多瑙河上一直同那个一在瓦拉几亚出现就成为联军玩弄巧妙手段的借口的可怕的敌人对峙着，并且应该说，相当成功地抵御了敌人。随着船只和部队的陆续到达，发现达达尼尔海峡和半岛不能全部容纳下他们。这样一来，在伦敦和

巴黎所拟定的高明计划就出现了新的缺陷。一部分军队这时不得不冒险在最受威胁的地点——君士坦丁堡登陆!为了改善处境,他们立刻着手构筑这个城市的防御工事。幸好,他们在这方面花费了不少时间,因而也就达到了主要目的:不是争取时间,而是消磨时间。后来又发现,不冒很大的危险就可以把一个师派到瓦尔那去驻防,因为在1828年光荣地保卫过瓦尔那的土军从那时起想必已相当成功地掌握了欧洲军队的训练内容,以致不能再信赖他们保卫这样一个地点了。于是派了一个师到瓦尔那去,接着又派去了一两个师。最后,当再没有借口可以把军队留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时候,联军的全部大军才从容不迫地集中到瓦尔那。这正是发生在奥地利军队像酝酿着暴风雨的乌云一般突然在俄军的异侧和后方出现的时候,因此也正是联军的作战基地由于政治阴谋突然由君士坦丁堡转移到特兰西瓦尼亚和加里西亚的时候。如果不是这样,可以断言,在保加利亚决不会看到联军。这可以由联军在锡利斯特里亚被围期间的行动来证明。谁都知道,那里是整个战局的转折点。当双方都已经把全部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的时候,一方稍占优势就可以十拿九稳地取得胜利。而在这个有决定意义的围攻时刻,2万英国兵和3万法国兵——“两军的精华”——却停留在距这个要塞仅数日行程的地方,安详地衔着烟斗,准备同霍乱作斗争。如果不是这种疾病在俄军中造成了可怕的死亡,如果不是一小群掘壕顽抗、在四面受到炮击的壕沟中死守并表现了惊人的勇敢的阿尔纳乌特人,锡利斯特里亚也许已经落在敌人手里了。一支军队,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援救自己的盟友,却这样胆怯地见危不救,这在战史上是无前例的。对克里木的任何远征、任何胜利都不能够洗去法英两军统帅身上的这个污点。试问,如果

1854年 克 里 木 战 区

1854年克里木战区



塞瓦斯托波尔
塞瓦斯托波尔
500米 0 500米 1公里
占科伊
叶夫帕托利亚
黑
海
巴拉克拉瓦
克里木山脉
阿卢什塔
20 0 20 40公里

老布吕歇尔在到达滑铁卢的两天前于利尼遭受失败以后，表现得不比腊格伦和圣阿尔诺认真负责的话，那末在滑铁卢的英军会得到什么结果呢？[283]

在阿拉伯堡战壕中作战的一小群阿尔纳乌特人，在灵活、机智和勇敢上完全可以同俄国人媲美。俄军不是被前来解救要塞的什么军队击退到多瑙河以北的。他们本身的愚蠢、保卫者的英勇、热病、奥军在德涅斯特尔河和联军在迭夫年斯卡河的消极的压力（因为谁能预料他们会这样行动呢？）——这才最后迫使俄军撤除围攻，中止整个战局，放弃多瑙河各公国和多布鲁甲。联军的将军们在得到这样巨大的胜利以后，当然想利用这种胜利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不过必须符合他们迄今运用得很成功的战略方针的要求。因此，卡迪根勋爵便率领不列颠骑兵向多瑙河一带作侦察性的进军。在这次进军中，他的骑兵没有见到俄军，却损失了许多马匹，而且除了疾病和嘲笑以外一无所获。那位主要是由于1851年12月2日背叛国民议会而出名的埃斯潘纳斯将军[284]，则率领自己的一个师去多布鲁甲，而他的全部成绩，就是几个精锐步兵团有一半死于霍乱并把病菌带到联军兵营里来。从此以后，霍乱就在瓦尔那联军兵营里广泛地流行起来，这是联军巧妙的战略手法应得的惩罚。成千的兵士还没有见到敌人便死去了；他们像苍蝇一样倒毙在他们曾经安闲平静地度过比较舒适的生活的兵营里。这一切的后果就是士气低落、对指挥官不信任和组织涣散，——这种情况在英军中不像在法军中那样严重，因为英军受害较轻，抵抗力较强，而法国的民族性格使法军比较容易接受这种影响，在他们的长官使他们无所作为的时候更是如此。不过，目前在法军内部发生的骚动中暴露出来的那些情况，是1849年以来

军队处于不正常情况下的自然结果。资产阶级教导那些曾把它从革命的惊涛骇浪中拯救出来的法国兵，要把自己看做整个民族和社会的救星。路易·波拿巴把他们看做恢复帝国的力量，娇纵他们。兵士一贯受到纵容，学会了发号施令，而忘记了应当服从。他们被灌输了一种意识，好像自己比普通人高一等，于是他们很快就自负起来，认为自己至少在哪一方面都不比自己的长官差。人们曾经不惜一切努力要把他们变为御用军队，但历史总是教导人们，御用军队就是蜕化了的军队。他们始则对普通人发号施令，然后就企图使自己的将军服从他们的意志，而最后是得到沉重的教训。

现在让我们看看瓦尔那的情况。整营整营的兵士躺卧在灼热的沙滩上，辗转于霍乱的痛苦之中，于是老兵开始拿现在指挥他们的这些冒险家同当年如此成功地率领他们进行非洲远征的老长官相比较，尽管今日没落帝国[285]的英雄们现在非常看不起这些远征。非洲比保加利亚更热，撒哈拉沙漠甚至比多布鲁甲令人讨厌得多。但是在征服非洲的整个时期，从来没有达到在迭夫年斯卡河上安适驻军时或者在居斯坦杰周围进行轻松的侦察性进军时那样高的死亡率。卡芬雅克、贝多、尚加尔涅、拉摩里西尔曾经在危险得多的情况下指挥过他们，但遭受的损失却小得多；诚然，这是在埃斯潘纳斯和勒卢阿·圣阿尔诺还默默无闻（他们后来所以能闻名，也只是由于政治上的卑劣无耻）时发生的事情。因此，非洲部队的主要代表者朱阿夫兵，这些打得最好而火药味又闻得最多的人们，就群情激愤，一致高呼：《A bas les singes! Il nous faut Lamoricière!》（“猢狲们滚蛋！我们要拉摩里西尔！”）。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这位装腔作势模仿伟大的过去的主角，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许已经感到朱阿夫兵的喊声是自己“灭亡的开始”。这个喊声

在瓦尔那产生了魔力。可以说，它便是克里木远征的主要原因。

经过了这次夏季战局，或者更正确地说，经过了由加利波利到斯库塔里、由斯库塔里到瓦尔那、由瓦尔那到迭夫尼亚和阿拉丁以及由这里返回瓦尔那的游览以后，不可能希望我们会真正相信联军统帅部用来解释为什么拖延了这么久的远征最后又这么仓卒地开始的那一套托词。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些托词的价值如何。据说，拖延时间是因为法国的攻城炮兵没有来到。但是，当霍乱引起骚动，勒卢阿·圣阿尔诺看到他必须立刻毫不迟延地摊出王牌来的时候，他便要求君士坦丁堡调拨土耳其的攻城炮兵和弹药，而且这一切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都准备妥当，并装上了船；如果这时法军的攻城炮兵纵列还没有到达，那也会不等它就启航。但是，要知道土耳其的攻城炮兵整装待发已经不止一个月了，这就证明，过去的一切拖延都是不必要的。

由此可见，这次600艘轮船、6万名兵士、3个攻城炮兵纵列以及天知道有多少门野炮的大吹大擂的克里木远征，根本不是什么深思熟虑和事先经过科学研究的高明行动的结果，只不过是为了使勒卢阿·圣阿尔诺逃避自己兵士的制裁而仓卒决定的coup de tête〔轻率行为〕。善良轻弱的老腊格伦勋爵不能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再有任何拖延都会使他的军队也陷入法军目前那种纪律松弛和悲观失望的状态。

一位德国著作家[①]说过的**历史的讽刺**不仅过去出现过，而且在现代事件中也出现了，现在可怜的腊格伦勋爵成了它的牺牲品。至于勒卢阿·圣阿尔诺，从来就没有人把他看成一位总司令。他早

① 即黑格尔。——编者注

已就是众所周知的半上流社会的代表人物，贼巢的常客，是那个受“债务而不是义务”逼迫而进行布伦远征[286]的人的真正同谋者。尽管有检查机关的禁令，巴黎好议论是非的人们对他的品格和历史还是了解得很透彻。人们非常熟悉这位曾两度被贬职的中尉，这位在非洲当财务官时曾盗窃团部金库的上尉。无论他在克里木有什么建树，他的最光荣的功勋永远还是窃取女房东的毯子向伦敦当铺顺利地远征以及接着向巴黎巧妙地退却。但是威灵顿公爵的将军衔侍卫长，这位长期致力于理论著作和深入钻研参谋勤务的可怜的腊格伦，无疑是真正相信了圣阿尔诺替自己行为所作的辩解。于是责任全都落到他的身上：一个责任是，根据非常科学的原则所计划的整个战局进行得如此巧妙，以致一万人（几乎占总数的七分之一）还没有见到敌人就送了命；另一个责任是，所有这些经过周密考虑的行动的结果，仅仅是在不利的季节即将来临之前向克里木进行仓促的远征。确实，再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个“历史的讽刺”更辛辣的了。

远征毕竟是可能成功的。联军几乎是应该得到这种报酬的，因为再没有什么可以比联军迄今所采取的作战方法更令人轻视了。为了对付在这一次战局（这次战局的目的不是消灭敌人，而是保存进攻的军队）中吃败仗的敌人，竟然那么大叫大嚷，作了那么多准备步骤，进行了那样无穷尽的研讨策划！这也许就是联军对自己作出的最无情的判决。但他们现在还没有到达塞瓦斯托波尔。他们已在叶夫帕托利亚和旧堡登陆。从叶夫帕托利亚到塞瓦斯托波尔，他们还要走 50 英里，从旧堡到塞瓦斯托波尔还要走 20 英里。他们的重炮应在上述的后一个地点的附近卸载，以免陆上转运困难；因此卸载工作还远没有结束。虽然还没有得到关于俄军兵力的确切

情报，但是俄军的兵力相当大，足以在塞瓦斯托波尔四郊的许多地点造成对联军兵力的优势，这一点是可以不必怀疑的。丘陵地和伸入陆地几达十英里的港湾使联军刚一企图包围要塞便不得不把战线拉得很长。一个坚决的指挥官要突破这样的战线是不难的。我们当然不知道，要塞的陆上防御工事如何；但是根据我们对老缅施科夫的了解，可以设想他没有白白浪费时间。

从英国报纸的报道和联军所选的作战方向来看，我们可以预料，首先攻击的目标将是北面山冈上瞰制着城市的堡垒，俄国人把它叫做北部要塞，也就是北堡。

这个堡垒只要构筑得稍许坚固一些，那它就可以进行长期抵抗。这是一个大型四角堡，是根据蒙塔郎贝尔的多边形筑城体系即侧防暗堡体系筑成的；它的两侧由低的穹窖工事防卫，这些穹窖位于四角形每一边的中央附近，筑在壕沟深处，可以向左和向右对壕沟射击。这类工事的优点，是在敌人把堑壕挖到壕沟边以前，不会受到敌人炮火的直接轰击。由于这种工事紧靠主塞，可以作为用于进攻的强有力的出击据点和基地，而这种工事的存在本身，就迫使联军把主要行动局限于港湾的北岸。

博马尔松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俄国要塞真正经受考验之前，对它们是无法作任何肯定的评述的。因此目前还完全不能推测克里木远征的胜利把握究竟多大。但是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如果战事形成持久局面，如果冬季的到来又引起疾病流行，如果联军也像俄军过去在锡利斯特里亚那样，把兵力消耗在轻率的、未加准备的攻击上，那末法军，很可能还有土军，都将瓦解，就像法军在瓦尔那曾经经历的和土军在亚洲屡次经历的那样。英军可能维持得久些，但是，就是训练最好的军队也不能坚持的时刻正在到来。这是联军

的真正危险，并且如果由于俄军的抵抗，情况的确发展到这一地步，那末在胜利的敌人面前撤退上船，将是十分危险的事。远征很可能是成功的，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第二次伐耳赫伦[287]。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9月18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10月14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09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克里木的消息

今天本报充满了惊人的消息：克里木血战，攻占塞瓦斯托波尔，它最重要的堡垒被破坏，俄国舰队大部分被歼灭，缅施科夫公爵完全投降，他那支被击溃并几乎全部被歼灭的军队的残部也已被俘。如果这些消息属实，那末几乎 40 年以来世界上还没有过如此惊人的血战，也没有过引起这样严重后果的军事事件。至于这些消息的确实程度如何，让我们仔细地把从官方的和确实可靠的消息中得知的与非官方的和值得怀疑的消息中得知的加以甄别，尽量地弄清这一问题。

因此我们就必须把这些消息分为两部分：有关 9 月 20 日阿尔马河会战的消息和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根据腊格伦勋爵和圣阿尔诺元帅的报告，9 月 20 日联军攻击了阿尔马河南岸高地上的俄军营垒，并迫使俄军退却。英军缴获两门火炮，而法军在报告中丝毫没有提到战利品。法军损失约 1400 人，英军损失的人数相同。俄军总数为 45000—50000 人，损失 4000—6000 人。这些报告显然是在刚获得的胜利的直接影响之下写成的。关于俄军有 50000 人参加阿尔马河会战的报道，同较早的关于俄军在克里木最多不过 45000 人的消息大有出入。如果考虑到在野战工事被攻占时火炮几乎不可能撤走的这一情况，那末在这样一座装备“大量

重炮”的营垒中缴获的两门火炮，看来是非常微不足道的战利品。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圣阿尔诺元帅没有提到法军缴获火炮的这个事实。

就算缅施科夫在阿尔马河的营垒内集中了 45000—50000 人，这又证明什么呢？或者是他拥有比原来预计的多得多的军队，因而能够把这样大的兵力用在平地上；或者是塞瓦斯托波尔的向陆一面的工事非常薄弱，以致他除了在平地上击败联军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保卫要塞；最后，或者是他犯了极大的错误，竟在平地上作战，以致部队受到惨重失败而士气涣散。

根据较早的报道，阿尔马河营垒内的俄军不超过 10000 人。他们可能得到增援，但要使他们的数量达到 25000—30000 人，俄军必须作出很大的努力。既然在阿尔马河附近，即距登陆地点 15 英里处有 50000 俄军，那末，他们在联军登陆时却不攻击，这又怎么解释呢？

在联军登陆的旧堡和塞瓦斯托波尔之间有三条小河，这三条小河连同它们的河谷构成了军事上重要的阵地。距塞瓦斯托波尔最近的是黑河，它流入塞瓦斯托波尔湾的东部。北堡防护着海湾的北岸，而这条小河，更确切地说，这条小河的很深的河床在城东形成一道天然的壕沟。显然，这里是最后一道重要的防御阵地。第二条小河——卡查河，在北堡以北数英里处由东向西流；最后，从这里再往北约 12 英里是阿尔马河。不论这三道防线在战术上能提供什么优越条件（这不在当地是无法判断的），很难想像俄军会从中选定第一道，亦即最远的那道防线作为可能决定塞瓦斯托波尔命运的决战场所。但是联军没有骑兵主力部队，这也可能促使俄军向阿尔马河营垒派出一支大部队，因为他们在骑兵方面拥有暂时的

优势,可以不必担心敌人骑兵对翼侧的攻击。此外,关于塞瓦斯托波尔被围后无法使用骑兵的想法也可能促使他们这样做。

在进一步分析时,俄军在阿尔马河的失败就更没有什么战术意义了。俄军不喜欢背面敞开的工事。他们在有时间的情况下比较喜欢在打算进行顽强抵抗的地点构筑闭合的方形堡。只要攻击已经开始,要从这种方形堡内撤出火炮是不可能的。甚至在那些背面敞开的、术语称为眼镜堡的工事里,也几乎不可能在强攻的敌人面前撤走火炮。因为如果正当敌人攻击时撤走火炮,那末防御就失去武器,如果敌人已经冲过壕沟,那就没有人能在敌人近距离的火力下把火炮拖过土垛和炮座并且套马运走。

“只要工事不能继续坚守,配置在工事中的火炮就算损失了。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迫使敌人为它们付出最高的代价。”

杜福尔将军在他的野战筑城教科书中就是这样说的。俄军只损失两门火炮这一事实说明,他们并没有坚守营垒到最后一人,而且说明最多不过一、两座工事真正是联军用白刃冲击攻占的。其余的工事未必用刺刀防守过,而且看来都是在敌人强攻纵队到达壕沟以前就放弃的。俄军显然是在骑兵掩护下秩序井然地退却的,他们利用了联军的骑兵部队不能迅速渡过阿尔马河、越过各雏谷的这一有利条件。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保存了全部骑兵这一事实充分证明,在敌人以猛烈的攻击在他们的队伍中造成混乱以前,他们就已经停止作战了。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在阿尔马河南岸高地上所获得的胜利的全部情况,这是10月1日英国在礼炮齐鸣和钟声震响中郑重宣告的胜利,是9月30日星期六晚10时市长在铜号声中在交易所宣布的胜利,也是在各剧院所庆祝的、被伦敦“泰晤士报”说成是

由于坎特布里大主教祈祷而得来的胜利，不过这次祈祷是在会战后才举行的。记者们报道说，圣阿尔诺曾经爬不上马。历史学家说，拿破仑在滑铁卢会战中的情况也是这样。可能，阿尔马河的胜利正是导致滑铁卢会战失败的那些情况造成的。

现在谈谈第二部分有关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的更加惊人的消息。伦敦收到的关于这一事件的第一个消息是9月28日从布加勒斯特用电报发来的。这个电讯说，联军从海陆两方面进行联合攻击后，攻占了塞瓦斯托波尔。这个消息好像是由塞瓦斯托波尔开往君士坦丁堡的一艘法国轮船带出的，这艘轮船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它在海上遇到的开往瓦尔那的另一艘法国轮船。如果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要塞是在9月25日攻占的，这一消息在26日夜间可以带到瓦尔那，28日中午可以送到布加勒斯特，因为瓦尔那和布加勒斯特相距大约100英里，信使24小时就能赶到。波拿巴就是根据这一消息编写告布伦兵营书的（告兵营书我们另外发表）。但实际上，9月30日以前没有一个信使到达过布加勒斯特。关于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第二个消息，虽然从地理上来看有点合理，但它只是在波拿巴宣读告布伦兵营书的那一天才从布加勒斯特发出。奥地利政府在10月1日晚6时收到并由奥地利驻伦敦大使在10月3日转变“泰晤士报”的这份电讯，在同一天登在“通报”上，并附有说明：

“这个消息是由德·布奥尔先生转告法国政府的，他并委托许布纳尔先生以奥地利皇帝的名义向法国皇帝祝贺法军在克里木的辉煌胜利。”

应当指出，这个重要的消息完全是根据从君士坦丁堡派往奥美尔－帕沙处的信使的口述，这个信使在布加勒斯特没有见到奥美尔－帕沙，就前往当时奥美尔－帕沙司令部所在地的锡利斯特

里亚。据这个信使说，塞瓦斯托波尔已被占领，俄军 18000 人被击毙，22000 人被俘，康士坦丁炮台被毁，其余炮台都被占领，800 门火炮被缴获，6 艘俄国军舰被击沉，而缅施科夫公爵率领保全下来的军舰退向海湾深处，并声称他宁可炸毁它们，也决不投降。联军似乎给他 6 小时的考虑时间。君士坦丁堡将张灯结彩庆祝 10 天。

根据我们对阿兰群岛上的俄军筑城工事，以及在联军取得阿尔马河胜利后所了解的情况来判断，塞瓦斯托波尔在短短的一昼夜内就投降也不是不可信的。但是，难道能够想像，这是一支在打了败仗后仍能幸运地把几乎全部火炮保存下来，并且由这个战局中最勇敢的俄国指挥官中的一个率领的 5 万人的军队吗？难道可以想像，这样的军队在城市受到第一次攻击后就会放下武器吗？不过，这次战争也确实有这样一些令人难信的和不寻常的特点，因而我们应当准备好“应付一个接一个的意外情况”，就像拿破仑本人在 1807 年接到塞巴斯提昂尼从君士坦丁堡写来的报告时一样。联军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做了能做的一切来为自己准备一次空前的失败。为什么命运不可以赐给他们一次无可比拟的辉煌胜利呢？历史总是捉弄人的。它可能想给世界留下一个奇闻，即那个刚刚在一年前离开“快死的人”的首都时还骄傲地自信可以吞下整个帝国的年老的俄国罗多芒特[288]，现在却被监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个简陋的小塔楼里。对于这次战争的主谋者和发起人，这个骄傲自负的缅施科夫来说，作为俘虏被送回到君士坦丁堡，这又是多么无情的惩罚！

如果土耳其信使的话是真的，克里木战局的经过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9 月 14 日和 16 日联军没有遇到抵抗就在旧堡附

近登陆；19日开始进军；20日在阿尔马河会战胜利，并于25日占领了塞瓦斯托波尔。

从利物浦开出的班轮“阿非利加号”没有绕道哈里法克斯而直接驶往纽约。它在星期五以前未必能够到达，因此在这以前，我们没有希望得到任何有关这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的确实消息。也许，暂时相信土耳其信使所说的全部情况是最适当的，不过我们希望，这样做的人们不要陷入我们的朋友路易·波拿巴因此在布伦陷入的那种有失体面的处境。读者们可以在本报另一栏里[289]看到，这位皇帝在最近举行的一次阅兵时，非常富于戏剧性地用明确而肯定的语言宣布了这一事件：Sébastopol est prise〔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占了〕。当时他可能把自己当作真拿破仑在向自己的部队宣布一次巨大的胜利。但是使这位侄儿遗憾的是，他的伯父从来不需要宣布自己的胜利，因为他亲自率领部队作战，而且他的兵士们亲眼看到敌人怎样逃跑，因而并不需要任何证实。更加遗憾的是，路易·波拿巴不肯不公布的这个消息，当晚就被布伦兵营的司令官作了另一种估价，后者在墙上张贴通告说，收到了关于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占的报告，但是否确实，不能保证。这样一来，法国皇帝陛下的布伦司令官竟纠正了皇帝本人的话！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我们最近收到的10月3日法国政府的官方报纸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报道并没有证实。可是，这可能是真实的，因而我们以极大的兴趣等待着确实的消息。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10月2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10月17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1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

英国人说："捉住鞑靼人！"原来不仅英国人，而且法国人和奥地利人都反被鞑靼人轻而易举地捉住了[①]。如果我们现在对"论坛报"和它那些注视目前克里木战局进程的读者们没有跟别人一道被捉住这一点表示有些满意的话，我们是会得到原谅的。

起初，当塞瓦斯托波尔被占领的似是而非的消息传来时，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个消息的各个来源，并以军事科学的资料为根据，企图证明[②]，继阿尔马河胜利（不管这个胜利具有多么大的决定意义）之后，这个作为整个战局主要目标的设防城市未必会那样快投降。我们觉得，我们当时判定了这一事实：联军根本没有取得什么决定性的胜利，因为俄军带着自己所有的火炮秩序井然地撤退了。而且最后我们还特别强调指出，这个消息的全部细节并不是出自关于阿尔马河会战的官方报告，只不过是根据一个给奥美尔－帕沙送秘密报告的信使的口述而已。因此，"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惊人消息对我们来说一点也不突然，它无非是一则由一个爱开玩笑的信使送到布加勒斯特的被假想所歪曲的关于阿尔马河

---

① 双关语：《Catch a Tartar》——"捉人反被捉"；《tartar》——"鞑靼人"，土耳其人对军人或外交信使的称呼。——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545—550 页。——编者注

胜利的消息，喜欢戏剧性效果的路易— 拿破仑便在布伦宣布了它，而英国的小店主—— 这些人类杰出的标本—— 便盲目地信以为真。英国报刊一向表明自己不愧为这个阶级的喉舌，因此可以想像得到，在英国只要一提起塞瓦斯托波尔这个名字，就会使得大家欣喜若狂。我们的读者也许记得，在最近一次议会会议结束时，约翰・罗素勋爵曾声明，摧毁塞瓦斯托波尔原属英国政府的计划；虽然这个声明在同一次会议上就被收回了，但是它在 5 个钟头里，用迪斯累里先生关于这件事情的说法，曾使极可尊敬的议员们兴奋不已。伦敦“泰晤士报”至少发表了九篇社论，在这些社论里，不管是出于 bona fide〔诚心〕mala fide〔假意〕，都洋溢着那股喜悦的气息；看来，这种作法的唯一目的就是怂恿查理・纳皮尔爵士对喀琅施塔得或斯维阿波尔格采取卤莽行动。这家报纸似乎在荣誉和成绩的鼓舞之下，已经开始向波罗的海的普鲁士沿岸，以及向那不勒斯的炮弹国王和利伏诺的托斯卡纳大公进行连续轰击，—— 自然，用的是假想的炮弹。这家报纸真的在准备同全世界开战，当然也要同“其余的人类”开战。

关于塞瓦斯托波尔岸防工事的真实情况知道得太少，所以无法预测，这座要塞究竟还能坚持多久。阿尔马河的胜利使人有正当的理由认为，塞瓦斯托波尔将被攻占；因为这次胜利必然会提高联军的士气，同时也是他们预防疾病的良药，因为有消息说，联军已经碰上了在克里木最危险的敌人—— 疾病。但是，如果把联军能够攻入塞瓦斯托波尔想像得如同进咖啡馆那么容易，就未免太可笑了。

在散布攻占这座要塞、毙伤 30000 人、俘掳 22000 人的消息这一史无前例的大骗局之后，人们原来指望真正官方文件出现时

至少将会提供一些清楚的和完备的情报。然而10月5日伦敦“官报”的号外上刊登的、今天本报好几栏转载的报告，归根到底仍然是言辞含糊。其实，报告中有很多值得怀疑的东西，应当说这是因为这个报告是由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帕麦斯顿外交学校的毕业生）发出的。首先，报告注明是在9月30日下午3时30分从布加勒斯特发往英国，可是雷德克利夫勋爵从君士坦丁堡发出这个的日期却是9月30日晚上9时30分；这样一来在从君士坦丁堡发出报告以前6个小时布加勒斯特便收到了报告。其次，消息中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9月20日至28日之间在克里木发生的事情，只是说：

“9月28日早晨联军各部在巴拉克拉瓦建立了作战基地并准备立即向塞瓦斯托波尔进军。‘亚加米农号’（海军上将莱昂斯在此舰上）和其他军舰停泊在巴拉克拉瓦海湾。在这个地方卸下攻城炮非常方便。”

英国报纸认为这个消息是可靠的，便自然地作出这样的结论：联军通过贝尔贝克和北区后攻克了塞瓦斯托波尔湾后面的一些高地，沿直线进入巴拉克拉瓦海湾。这里应该指出，军队在占领了瞰制塞瓦斯托波尔的高地以后安稳地顺另一面斜坡下去，向距离11英里的另一港口挺进，以实现“在那里建立作战基地”的唯一目的，从军事观点来看这种做法是不能容许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则是完全可以容许的：海军上将莱昂斯以一部分军舰包围赫尔松涅斯角，以保证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有一个港湾来停泊舰艇，同时便于卸下我们一直认为仍未卸掉的攻城炮。不言而喻，卸火炮时必须要有一支部队进行掩护，而这支部队不是由主力在旧堡附近登陆后抽出，就是由那些从君士坦丁堡和瓦尔那渡海过来的预备队抽调一部分组成。

报告接着说：

“缅施科夫公爵亲率 22000 人作战部队并等待援军的到来。”

英国报纸由此得出结论：从 9 月 20 日到 28 日俄军在战斗中损失了 25000—30000 人。这是由于报纸和腊格伦勋爵都同样认为俄军有 45000—50000 人参加了阿尔马河会战。我们以前就已说过[①]，我们 prima facie〔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些数字，并且一直认为缅施科夫公爵指挥的野战军兵士不超过 25000 人；现在查明，我们的看法是和俄国人自己公布的数字相符合的。

报告中还说，“阿纳帕要塞已被俄军焚毁，其守军已开往战区”。我们不认为这个消息是正确的。假如缅施科夫公爵想要援军及时赶到的话，那末最恰当的做法是从皮列柯普调遣，而不是从距离克里木将近 200 英里的阿纳帕调遣；假如他不能指望从皮列柯普得到援军，而隔海抽调阿纳帕的守军，那就是很大的冒失行为，因为这样一来为了增援塞瓦斯托波尔，把俄军在高加索的最后一个堡垒也牺牲了。总之，我们认为，不管这个官方报告中的全部“情报”怎样，我们仍然要把阿尔马河会战看做是一个确实可靠的重要事件。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事件的详细记载，而纽卡斯尔公爵已经预先通知英国公众，在 10 月 9 日星期一以前不要等候这种记载。我们除腊格伦勋爵的官方电报报告以外所知道的情况可归结如下：伦敦当铺的英雄圣阿尔诺元帅在作战那天“不舒服”（其他英雄是否也有类似情形？），——主要指挥权落在腊格伦勋爵手中，——英军损失了不是 1400 人，而是 2000 人，其中有 96 名军官，目前已有 6 船伤

---

① 见本卷第 545—546 页。——编者注

兵运到君士坦丁堡。

奥美尔—帕沙的军队从布加勒斯特和瓦拉几亚经过鲁舒克、锡利斯特里亚和沃尔特尼察向黑海沿岸地区移动，显而易见，这证实了克里木的联军统帅部要求增援的传说。但是土军这次撤离瓦拉几亚，也可以说是因为奥地利想让他们远离通往贝萨拉比亚的各条大道，只给他们留下经过多布鲁甲的那条不能通行的道路。

虽然英国公众确实表现了空前的轻信态度，但是应该指出，这种普遍的热情很少触及伦敦的交易所，股票上涨没有一次超过0.625%。当时巴黎的国家证券一下子上升了1.5%，即使是这样的上升，同滑铁卢失败后出现的10%的上升比较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由此可见，如果这场骗局是有人为了进行投机而制造的，——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那末这场骗局丝毫没有满足它的制造者们所抱的美好希望。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年10月5—6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10月21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1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概评

1854年10月6日星期五于伦敦

英国人在本周内所经受的激动和紧张是难以形容的。星期六，市长在铜号声中在交易所宣读了关于阿尔马河会战胜利的报告，而在全国则流传着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假消息。全世界都受了骗。拿破仑在布伦向自己的军队宣布了这个值得庆幸的事件，英国和法国的报纸也为这件事发表了社论，奥地利皇帝向法国皇帝和英国女王祝贺胜利，但是他谨慎地避而不谈塞瓦斯托波尔；节日的灯火通明，礼炮轰响。不久我们就知道了是什么消息引起这样的兴奋和欢跃；其实消息的来源是很值得怀疑的。有一个“鞑靼人”（土耳其人对信使的称呼）来到了布加勒斯特，他从君士坦丁堡给奥美尔—帕沙送来一份报告，这位将军不在，公文原封未拆地转给他了，因此，我们无从知道它的内容。但是据信使说，在他离开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城里正装置彩灯并有命令连续悬挂10天。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塞瓦斯托波尔已被攻占，还讲了一些只有土耳其或伦敦的信使在小酒馆里才会讲出的详细情节。他说击毙了18000名俄军，缴获了200门炮，——虽然在要塞内共有500多门炮；不用说，还有22000名俄军被俘掳了——因为大家知道，守备部队总共有4万人左右。起初舰队被包围，然后一部分被击沉，而缅施科夫公爵打算把自己同其他一部分军舰一起炸毁，如

此等等。

可是，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雷德克利夫勋爵并没有把这样重要的事件通知驻布加勒斯特的领事，而法国政府也没收到任何报告。然而消息实在是太好了，不能不相信它，因此人们也就相信它了。虽然，第二天从圣彼得堡发来一则消息，提到了缅施科夫公爵 9 月 26 日的报告内容，即在阿尔马河会战后他往辛费罗波尔方向撤退，但是各报不但没有立即放弃关于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令人惬意的误解，反而断定这是打印上的错误，说什么实际上报告注明的日期是 9 月 20 日。今天英国舆论清醒过来了：关于没有围攻就占领了大要塞的似是而非的消息原来是一场无情的骗局，它使得报纸以后要谨慎从事。

在西班牙，不仅在马拉加（我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共和派在这里的力量是很强大的）甚至在埃斯帕特罗住过很多年的洛格罗尼奥也发生了骚乱；一则电讯报道说，在哈安破获了一桩共和派的密谋，因而唐·恩利科王子（女王低能的丈夫的兄弟）被派往巴利阿里群岛去了。但是，关于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所引起的激动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致谁也不去注意西班牙的事件。

在丹麦，10 月 2 日议会开幕。国王发表了向会议挑衅的御前演说。这个演说引起了表示维护宪法的口哨声和呼喊声。“法兰克福报”再次报道说，盟国决定修改 1852 年 5 月 8 日签订的声名狼籍的条约[290]，根据条约，丹麦王位的继承权始终属于俄国皇帝。乌尔卡尔特不断引诱公众注意这个破坏欧洲外交威信的文件，看来，他的努力现在终于成功了。假使这则消息一般是可信的话，西方强国这一计谋便包含着这样一个目的：通过重新谈判使普鲁士加入盟国，因为当时普鲁士没有同意上述条约。值得注意的是，帕

麦斯顿过去把这个条约（像1840年的条约一样）看做是对付俄国的一种手段，而目前修改条约又应该理解为对俄国的一种敌对行为。

有消息说，奥地利给圣彼得堡送去了一份照会，再次提出四个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并指出沙皇拒绝接受这些条件将被弗兰茨－约瑟夫看做是casus belli〔战争的理由〕。这是在克里木获得的胜利的结果之一。

下面的评语是针对“经济学家”不久前所载的一篇文章发表的，我们把它从斯密斯先生和查理先生的商业通告中摘引出来：

“从对俄贸易的观点来看，战争开始后所作的种种声明或暗示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学家’上星期六所提出的论点。**必须注意到：这家周刊是属于财政部秘书长之一**（威尔逊先生）**所有，因此我们想提起大家注意的那些意见，应当看做是半官方性的**。‘经济学家’首先阐述了彼得堡交易所里的情况，并指出由于我们和普鲁士进行贸易的结果，普鲁士必然会把不列颠的黄金提供给俄国作军费；它说，我国政府预料到了这一切，但认为事情的这种状况毕竟是两害之中的轻者；接着它报道说，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后‘我们将独占黑海及其沿岸，并成为多瑙河的主人。但在这个时候俄国也许会占据我们武力所不及的能够赖以考验英国的耐性的阵地，因为只要通过贸易就使这个阵地易于攻破。可能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民族利益是否会要求我们现在实行不同于我们过去所实行的另一种政策?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封锁港口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我们的货物需要由邻国中介才能运抵市场，普鲁士可以靠当经纪人而发财，结果我们对俄国海岸的封锁会被轻而易举地打破等等。因此，如果根据最高政策考虑’——‘经济学家，带极郑重的警告的口吻总结说，——‘必须重新研究有关加强封锁和限制陆上与海上贸易的问题等等……那末谁愿意从事这样的冒险事业（如供给俄国资本以便在冬季购买应在来年送到那里的货物），愿意考虑到：在俄国战局的第二年可能要采取和在第一年被认为最明智和最合适的政策截然不同的政策，倒也不坏。

未必需要着重指出由此得出的结论（我们郑重地建议朋友们仔细研究一下全文的内容）：盟国决定在明年封锁陆上贸易作为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唯一

途径，而为了阻止资本家从事即将被禁止的贸易，政府极其关切地允许财政部的一位秘书长非常及时地使我国商人了解政府的意图，以免这件事给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星期六脂油的价格比星期五稍微低些。很可能，要不是我们所谈到的‘经济学家’上的这篇文章，今天的价格会受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影响而跌落。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个重要要塞的陷落会使俄国皇帝同意缔结协定，而我们的意见正好相反：这个灾难只能激怒沙皇，迫使他在别的方面寻求报复。十分明显，在他还没有被迫放弃自己的大城市的时候，他可以认为自己不完全是战败者，因此在他未陷入绝境以前，他宁愿孤注一掷也不会让步。所以我们认为，只要不是真正地把‘经济学家’认为盟国打算施行的那个方针付诸实现的话，这个战争可能要延续好几年。”

10月5日的“通报”报道，根据波拿巴的命令，最近三年来被囚在贝耳岛的巴尔贝斯被无条件释放了，因为他写了一封信，表示强烈地希望十二月政变的文明战胜俄国的文明[291]；顺便指出，前一文明不久前在雅典表现为1848年6月的日子的重演，当时法兰西暴兵在那里把一位“思想危险的”报纸出版者逮捕起来，并焚毁了他的书籍和文件，最后把他投入了监狱。巴尔贝斯今后不再是法国的一个革命领袖了。他声明同情法国军队，不管他们是为了什么事业和在谁的指挥下作战，这样一来，他就坚决地使自己向俄国人看齐，同他们一样对本国参战的目的采取不审慎的态度。长时期以来巴尔贝斯和布朗基一直在相互争夺对革命法国的真正的领导权。巴尔贝斯不断地污蔑布朗基，指责他勾结政府，借以破坏他的声誉。关于他们两人中谁是和谁不是革命者的问题，巴尔贝斯的信和波拿巴的命令就可以提供答案[29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年10月5—6日
载于1854年10月21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421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阿尔马河会战

关于阿尔马河会战的官方消息终于收到了，在今天本报上我们刊载了司令官们的报告和目睹这次会战的英国记者和一些海军军官的详细报道。所有这些材料基本上证实了我们根据有关这次会战的最初的一些电讯所得出的结论。看来，事实是这样的：

在距海岸约3英里的地方，阿尔马河弯成半月形，两角指向北方。河的南岸，大部分是高约300英尺的悬崖，在这里像一个半圆形的剧场，稍稍向河面方向倾斜。俄军选择了这个左右都有台地边缘的断崖掩护的斜坡作为阵地。必要时，俄军的优势骑兵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掩护部队沿平坦的台地退却，同时这上面几乎到处都可以撤走炮兵。从台地到河流的半路上，斜坡构成了梯形的阶地，俄军在这里配置了步兵主力，左面有险峻不可攀越的悬崖作掩护，右面也有同样险峻的悬崖，还有阶地上的多面堡、制高点上进行纵射的重炮队作掩护。海军上将安梅林断定这个炮队是由12门三十二磅炮组成的，但是这样重的火炮在退却时如何运走（无疑是运走了），却是这位军官所未能解释的一个谜。

俄军阵地前面的葡萄园和岩崖构成的起伏地形，对防御是有利的，加上abattis〔鹿砦〕和其他人工障碍物，防御的任务更易完成；不过由于这个地区树木不多，这些障碍物未必特别可怕。在

俄军背后的高台地上和两翼配置了他们的预备队和骑兵。在正面，先驱兵配置在阿尔马河的对岸，占据着阿尔马村和布尔留克村。

联军在9月20日向这个坚固的阵地前进，法军在右，英军在左。清晨，法军博斯凯将军的一个师（第二师），连同土军8个营被派沿海岸前进，任务是在舰炮掩护下从那里攀登悬崖，从而迂回俄军的左翼。英军本应对敌人右翼采取同样的行动，但舰船无法进行掩护，而且在台地上他们对面是敌人的骑兵主力，因而，这部分攻击计划没有实现。但是博斯凯指挥的法军却成功地攀登了台地的峭壁，而且当这个高地上的俄军遭到舰船上的重炮轰击时，拿破仑亲王指挥的法军第三师向俄军左翼运动。不久，俄军的中央和右翼都遭到了英军的攻击。同拿破仑亲王的师并肩前进的是德·雷希·伊文思爵士（曾在西班牙卡洛斯派战争时期指挥过英籍军团[293]）指挥的英军第二师，支援他的是英格兰将军（第三师）。联军的极左翼是乔·布朗爵士指挥的英国轻步兵师，支援该师的是剑桥公爵指挥的近卫师。预备队（乔·卡瑟克特爵士的第四师和卢肯伯爵的骑兵师）在左翼的后卫内机动使用，以便粉碎敌人迂回翼侧的一切企图。

看来，这次会战的特点是：会战的开始时期，即全线进行互射并在射击的掩护下进行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机动的时期，非常短促。事实上，俄军阵地已经判断得很清楚，并且俄军强大的炮兵又如此配置，以致稍长时间的互射对联军来说不仅无益而且简直有害。既然英军走在法军后面，看来法军一度不得不处在这种扰乱性射击下；但是，后来法军纵队和英军散兵线开始缓慢而稳步地通过了他们面前难以通行的地段，把俄军从阿尔马村和布尔留克村驱逐出去（退却部队把布尔留克村烧光，使联军不能利用

它作为掩蔽地点），渡过了河，并且毫不迟延地冲向高地。在葡萄园内以及在断崖和鹿砦之间的许多地方发生的战斗很像1848年在维罗那和卡斯提奥涅之间发生的战斗[294]。正规地前进是不可能的，密集而不成队形的、行动大都互不联系的大批散兵给自己打开了通向俄军防守的第一个阶地的道路。这时，博斯凯将军使他的一个旅在台地上站住了脚，从这里威胁了俄军的左翼；为了援助他，派出了第四师（福雷师）的一个旅，同时以福雷师的另一个旅增援拿破仑的师。这样，法军占领了严重威胁俄军左翼的阵地。在俄军的右翼，乔治·布朗爵士夺取了俄军的多面堡——这是阶地上俄军这一部分阵地的锁钥。虽然俄军预备队从高地上发动攻击，一度逐走了英军，但由于苏格兰兵士（剑桥公爵的师）进行了攻击，最终还是守住了这个工事。因此，俄军的左翼被迂回，右翼被突破。中央遭到全正面的攻击后，只好沿坡而上向台地方向退却；俄军在到达台地以后，由于拥有骑兵和骑炮兵，又处于特别适于这两个兵种行动的地形，也就不怕任何严重的攻击了。但是俄军的左翼在遭到博斯凯迂回的时候大概发生过某些混乱。法国对这个问题的报道是一致的，同时，缅施科夫的马车在那里落入法军之手这个事实也完全证实了他们的报道。另一方面，俄军能够运走了他们的全部火炮，甚至包括右翼炮队的重攻城炮（法军连一门火炮都没有缴获，英军只缴获3门，并且可能是已被击毁的），这个情况说明退却总的说来是井然有序的，同时证明缅施科夫在优势刚刚转到对方就立即停止战斗的决定是英明的。

看来，联军作战是很勇敢的。历史上很少有几次会战像这次那样，军队几乎是不间断地、缓慢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而且完全没有通常那些使大多数大会战具有戏剧味的意外情况和偶

然事件。单单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不管怎样，联军在兵力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同时也证明联军的将军们在报告中极端夸大了俄军的人数。我们现在回转来谈谈这个问题。

联军的指挥艺术是不坏的，但是他们与其说依靠了将军们的才智，不如说依靠了军队的勇敢和舰队的支援。这可以说是一次简单的、寻常的、具有纯粹战术性质而特别缺少任何战略特点的会战。博斯凯的翼侧机动是一个很自然的主意，而且由那些在阿特拉斯峡谷里学会这种机动方法的非洲军团的兵士很好地完成了。英军突破了俄军的右翼，战斗得率直而顽强，看来各团和各旅的良好机动也促进了这一任务的完成。不过，英军成前后两道散兵线进攻的单一形式所以被破坏，只是由于天然障碍，而不是由于目的要欺骗敌人或者使敌人措手不及的复杂机动。

缅施科夫公爵很好地选择了自己的阵地。但是，看来他没有像他能够做到的那样去利用自己的骑兵。为什么在左翼不配置骑兵，趁孤立的博斯凯旅刚开始整队时就把它从悬崖上赶下去呢?停止会战、部队撤出火力圈、撤走炮兵和整个退却，看来都进行得非常巧妙，这些行动给他的指挥才能所带来的荣誉比胜利给联军将军们的指挥才能所带来的荣誉还要大。

至于参加会战的兵力，联军方面除炮兵外在战场上有 3 个法国师和 4 个英国师，同时 1 个法国师和 1 个英国师以及全部骑兵留作预备队，派去增援博斯凯但在战斗结束后才到达的 8 个土耳其营没有计算在内。因为法军把较强的部队留在瓦尔那，而且在那里遭受的损失比英军大，所以可以认为在会战当日英法各师的兵力几乎相等——每个法国师约 6000 人，而每个英国师约 5500 人。这样，实际上作战的步兵将近 4 万人，并有预备队约 16000 人，

其中包括土军；看来，这同关于远征军兵力的报道是相符的（除去病员和外出的部队）。按圣阿尔诺元帅的说法，俄军的兵力为两个基干师（第十六和第十七师）和两个预备旅（由召回的归休兵组成，即第十四和第十五旅），此外还有猎兵第六营。如果各旅所属的营数齐全，总共应有49个营。每营以700人计算（在这次战争中每营一般不多于此数，虽然在匈牙利战争中每营多50人），总共有34300人。这个数字和我们的资料提供的驻在塞瓦斯托波尔及其四郊的正规陆军的总数相近，并且很可能至少有五、六个营留作这个要塞的守军，因此俄军参加会战的兵力可能是3万名步兵，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大致可靠的。据说，俄军有骑兵6000名，当然其中有许多不过是些哥萨克。联军兵力的这一明显优势，使胜利失去过分的荣誉，而读者从我们引自英国报纸的材料中看到，人们正企图把这种过分荣誉看做是这次胜利造成的。看来，双方都表现了同样的勇敢；当然，无论联军的将军们怎样夸耀自己的胜利，但他们也决不会设想他们在胜利后能够既不遇到障碍，也不遇到抵抗而旌旗招展、军乐喧天地直接开进塞瓦斯托波尔。

会战的结果虽然在精神上对联军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未必能够使俄军产生严重的沮丧情绪。这次退却同吕特岑或包岑会战后的情况相似；如果缅施科夫能够像布吕歇尔在卡茨巴赫河会战[295]前所作的那样，巧妙地从巴赫契萨赖的侧防阵地拖住联军，那末联军还会相信，这种毫无结果的胜利不会给胜利者带来多大的好处。缅施科夫仍然会以雄厚的兵力威胁他们的后方，而在他们没有再一次把他打败和最后把他赶走以前，他仍然是可怕的敌人。现在几乎一切都决定于双方援军能不能到来，一方面联军从预备队中抽调，另一方面俄军从皮列柯普、刻赤和阿纳帕的部队中抽调。

谁能够首先取得数量上的优势，谁就能够给对方严重的打击。但是缅施科夫有一个优越的条件：他可以在任何时间放弃进攻而退却，而联军却被束缚在他们的仓库、兵营和辎重所在的地方。

目前，塞瓦斯托波尔虽然一面被围，但看来并没有危险，因为联军的兵力优势还不足以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但是，如果联军能在缅施科夫的补充部队开到以前，先得到一支两万人的援军，——根据昨天晚上我们从哈里法克斯的电讯中得到的“尼亚加拉号”轮船带到的消息来看，这差不多是可靠的[①]，——那末许多问题都可能在数日内得到解决。不能希望像塞瓦斯托波尔这样的要塞，在遭到严重的、坚决的攻击时能面对暴露的堑壕坚持两星期之久。全部预备队都已由瓦尔那乘船出发，并且应在10月4日或5日到达，但是由哈里法克斯发出的电讯没有提到到达的日期，因此，不管怎样，塞瓦斯托波尔未必会在10月16日或18日以前陷落。也许积极进行平地战，使它多坚持一些时候；但是，如果缅施科夫及其在联军后方的机动部队不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如果联军不因时疫而受到损失，那末塞瓦斯托波尔必将陷落。根据俄军的准备情况和士气来看，可以相信，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只有在拚命的抵抗和惊心动魄的血战之后才会失守。当然，强攻和夺取塞瓦斯托波尔的残酷情况从某些方面说将会胜过阿尔马河惨象。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10月9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10月26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19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① 哈里法克斯在加拿大；这句插入语是报纸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弗·恩格斯

俄国的兵力

我们完全可以暂时让约翰牛和雅克佬[296]为阿尔马河会战的“光荣胜利”而狂欢，为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而预祝。多瑙河和克里木的军事行动，不管对盟国和欧洲资产阶级自由派阵营有多大关系，对俄国是没有很大意义的。这个国家的重心决不会受到这些军事行动结局的影响，然而对于联军，在克里木失败和被迫退却可能意味着陆战长期中断和士气受挫，他们只有经过极大的努力才能重振士气。

最近，我们收到了有关俄军兵力区分和最近调动的可靠消息，把这些消息汇集在一起，看一下已经作战的俄军兵力同俄军总数相比占多小的一部分，其余的兵力又可能采取什么行动，这也许是有意义的。

大家知道，俄军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一、主力军队

近卫军和掷弹兵组成的精锐部队2个军，有76个步兵营、92个骑兵连、228门火炮。

6个基干军，有300个步兵营、192个骑兵连、672门火炮。

3个骑兵军，有176个骑兵连和96门火炮。

共计376个步兵营，460个骑兵连，996门火炮。

二、地区军队

芬兰军，有 12 个步兵营。

奥连堡军，有 10 个步兵营。

西伯利亚军，有 15 个步兵营。

高加索军，有 55 个步兵营、10 个骑兵连、180 门火炮。

高加索军的预备部队，有 36 个步兵营、2 个骑兵连。

高加索基干军，有 47 个步兵营。

共计 175 个步兵营，12 个骑兵连，180 门火炮。

三、哥萨克和其他非正规部队

约 700 个骑兵连，32 个步兵营和 224 门火炮。

四、预备部队

1. 内勤部队约 50 个营（不包括残废兵）和 77 个惩戒队。

2. 主力军队的预备部队：近卫军和掷弹兵 24 个团的第四、第五和第六营（每团 3 个营），基干军 72 个团第五和第六营（每团 2 个营）；共计 216 个营。

所有这些预备部队已经征召服兵役并已全部编成，因而已经开始用最近一次征召的 30 万人给各团**编组第七和第八营**；因此，上述 216 个营可以列入总数，这样就有 726 个步兵营、472 个正规骑兵连、700 个非正规骑兵连和大大超过 1000 门的火炮。关于骑兵和炮兵预备部队的编组情况，在俄国国外知道得很少，所以没有包括在这个总数里。

幸好，这个数目实际上并没有表面上那么骇人。要确定俄国真正能用于欧洲战争的军队人数，就必须从总数中除去西伯利亚军、内勤部队和至少一半的哥萨克；那末，剩下的约有 650 个步

兵营、472个正规骑兵连和350个非正规骑兵连以及约1200门火炮。这些部队至少有52万名步兵、62000名骑兵和3万名哥萨克，也就是60万人多一点，他们分布在从里海沿黑海和波罗的海到白海的整个边界上。

从对土耳其的战争开始以来，在帝国南部边界陆续参加作战以对抗联军的有下列部队：

1.第三、第四和第五基干军及其部分预备部队，但大部分预备部队还在途中。

2．3个高加索军的全部。

3．第一基干军的2个师（该军兵力的三分之二），预备部队不在内。

4．在克里木的第三骑兵（龙骑兵）军的一部。

战局**开始前**，这些部队共计为24万人，但是现在至少已减到184000人；其中84000人可以算它是贝萨拉比亚军团，54000人在克里木或正向那里调动，46000人在高加索。

到8月底，在波罗的海地区有：

在芬兰的第六军的预备部队 ……………	16800人
芬兰军 ……………………………………	12000人
近卫军及其预备部队 ……………………	66800人
在列维里的掷弹兵军的一部分 …………	10000人
共　计………………………	105600人

在波兰或向那里调动的有：

掷弹兵军的其余部分及其预备部队 ……	55000人
第一军和第二军及其预备部队 …………	120000人
哥萨克和各军的骑兵 ……………………	30000人
各种预备部队 ……………………………	25000人
共　计………………………	230000人

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约为575000人，这个数目加上奥连堡军（在阿斯特拉罕）、1个预备队骑兵军以及驻在白海地区和其他地方的部队，就得出上面所说的总数。驻波兰的部队中，约3万人在行军途中，约2万人担任华沙的守备部队，约10万人占领了旧波兰王国境内的维斯拉河右岸，并且约有8万人作为预备队驻在沃伦和波多利亚的布格河和德涅斯特尔河沿岸地区。因此，俄军的主力，包括穿戴讲究的近卫团和掷弹兵团在内，都集中在彼得堡—霍亭一线，即沿帝国西部边界一线。但是这同时也表明，部队并不是驻扎在最重要的阵地上。由一个近卫师替换下来的掷弹兵部队离开了列维里，并同其余两个近卫师一起开往波兰；这两个近卫师所属的每个团有4个营，只有第五和第六营留在彼得堡。所以，西部的军队已经超过27万人，并且开来同他们会合的还有3个预备队骑兵军，**他们还根本没有参加过作战**；这使西方军团增加到30万人。

现在，军队的配置已经改变。占领波兰王国东南部的10万人渡过维斯拉河沿奥地利边界占领了阵地。驻沃伦的8万人派往波兰，使军队沿这个界境构成绵亘的一线。近卫军、掷弹兵（随着部队到达的情况，可能还有各骑兵军）则在后方占领中央阵地。在冬季，由于波罗的海结冰，可以从那里再临时抽出一些部队。到5月，用来编成各团第七和第八营（即新编营，共计192个营，13—14万人）的新兵，就会受到足够的训练来接替他们的位置。

因此，很明显，尼古拉很少为帝国南部发生的事担心，因为他已在波兰最好的战略阵地上集中了30万人。这也确实是最好的阵地。它像楔子一样插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中间，从翼侧包围着它们，而它本身又有军事学术同自然相结合所能提供的最坚强的

防御手段作为掩护。拿破仑深知被维斯拉河及其支流环抱的这个地区的军事价值。他在1807年战局中曾把这个地区当作自己的作战基地，直到夺得了但泽为止。但是他一直没有注意在这里设防，结果在1812年退却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而俄国人，特别在1831年以后，却做了他们前人所忽视的事情。莫德林（即诺沃—格奥尔基也夫斯克）、华沙、伊万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构成一个完整的要塞体系，它在战略的配合方面是举世无双的。溃败的部队只要获得给养，便可利用这一体系抵抗比自己强大一倍的敌人，而要切断整个这一地区的补给线，那还是从来没有人试图解决的问题。熟悉这个地区的一位德意志军事著作家说过：整个这一复杂的要塞体系，证明俄国人的企图与其说是防御的，不如说是进攻的。建立这一体系的目的不是为了所在地区的防御，而主要是为了利用它作为向西方进攻的基地。

仍然有人相信，如果塞瓦斯托波尔失守，尼古拉将请求议和！但是俄国连三分之一的王牌都还没有用上，暂时失去塞瓦斯托波尔和舰队，对这个巨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塞瓦斯托波尔也好，舰队也好，对他都不过是小玩意。俄国完全明白，对它有决定意义的战区不是敌军能登陆的沿海地区，而是大陆内地，因为在这里可以调动大军集中作战，而不致在徒劳无益的海岸防御中分散兵力去对付随时都能逃逸的敌人。俄国可以丧失克里木、高加索、芬兰、圣彼得堡和别的边区，但是只要不触及它那个以莫斯科为心脏而以设防的波兰为右臂的躯干，它是丝毫用不着让步的。

可以说，1854年的主要军事行动不过是载入1855年编年史的民族大战的小小序幕而已。只有当俄国主要的西方军团和奥地利军队彼此对抗或者互相携手出现在舞台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

同拿破仑的历次大战相似的真正的大规模战争。并且还有可能，这些战争只是其他更激烈的、更有决定意义的战争的序幕，即欧洲人民群众反对那些目前胜利的和自以为巩固的欧洲专制暴君们的战争的序幕。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10 月 16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10 月 31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223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

在阿尔马河会战以后，联军在克里木的主要成就就是腊格伦勋爵由阿尔马河向巴拉克拉瓦的著名的侧敌行军；由于这一行军，战局的明显任务——攻占塞瓦斯托波尔——就缩小为对俄国要塞的一部分（而且是最薄弱的一部分）进行 coup de main〔突然袭击〕：固然，这次行动预定要消灭俄国舰队、破坏造船厂和军火库，但是规定联军在完成这个任务后必须立刻撤退。整个行动表明，情况就是这样。这就是放弃对要塞的北部正面，即瞰制整个要塞和唯一能使攻击具有决定意义的北部正面的攻击；因而，这就是远征军公开承认没有能力完成自己计划中规定的任务：完全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然而，像我们以前所报道的，人们正是用了无数充满夸张词句和含糊空话的篇幅，把这次行军吹嘘成指挥艺术的杰出表现。就连在当地派有记者的伦敦各大报纸，也只是在一个月以后，而且看来是得到政府的暗示以后，才透露了真情。例如，伦敦“泰晤士报”只是在 10 月 28 日才公布了真实情况，它谨慎地暗示：到目前为止，整个战局的任务看来只解决了一小部分，而海湾北面的堡垒，如不自愿投降，就未必能够攻下。当然，“泰晤士报”希望这些堡垒会彬彬有礼地投降，因为一旦要塞的主要部分被攻占，一切附属工事就一定要投降。事实上，不是北堡依靠塞瓦斯托波尔，相反地，是塞瓦斯托波尔依靠北堡，而且我们很

担心，单凭我们同行的想像，是不足以攻取这样坚固的要塞的。

不管怎样，自从上面谈到的这次“光荣的行军”以来，联军没有作出一点多少值得夸耀的事情，因此我们不能够责难我们的英国同行对这次行军如此大吹大擂。至于这次围攻的经过，目前还属于大概连他们自己也宁愿尽量少谈的话题。但是，既然我们首先应当态度公正，也就不必那样客气。事实是，在这场本来已经够奇怪的战争中，这次围攻是最奇怪的事情之一。看来，这次战争中的特点，就是深信野战工事是不可攻占的。首先从沃耳特尼察说起，俄军在那里用旧式的炮击法进行了几小时的轰击，然后才试图以强攻夺取工事，但是没有成功。在卡拉法特，俄军甚至不敢攻击，在锡利斯特里亚，简单的土质工事撑住了进攻者的主要突击，并且当这种工事几乎已被夷为平地时，它仍然在抵御敌人猛烈的攻击。还有，我在在塞瓦斯托波尔，简单的野战工事线竟荣幸地看到自己面前架设着大量的破城炮队和比攻打最完善的要塞所用的还要多得多的重火炮。这次围攻非常突出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在长久的和平时期**兵器**由于工业的发展改进了多少，作战**方法**就落后了多少。假如拿破仑看见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架起八英寸和十英寸口径火炮的炮队，他定会哈哈大笑。但是，这还远不是事情的全部。

联军约在10月1日占领了阵地，但是在10月8日或9日才开始挖掘堑壕，而且到10月17日还一病未发。这次拖延的原因是火炮未能更早地运到当地。它们总共只需要通过四、五英里的路程，而且地面坚硬，只有一些起伏不大的斜坡，有一段还是已经铺好的不坏的道路。但是没有驮载的牲口。在牲畜比任何地方都多的克里木，竟然没有驮载的牲口！在拜达尔谷地，从黑山顶可以看见许多犍牛，其数量之多足以把整个联军舰队拖过高山而有余。但

是拜达尔谷地是哥萨克自由通行的地方，联军骑兵去袭击时可能遇到这些可怕的敌人。此外，联军应当与当地居民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不去侵犯他们的财产。英国报纸企图以这些遁辞来避免承认事实的真相：腊格伦和康罗贝尔虽然从南面封锁了塞瓦斯托波尔，但本身又被缅施科夫的警戒部队封锁在黑河旁边。情况正是如此，这一点只要用下述事实就可以证明了：根据所有的报道，包括最近的报道，联军被迫食用咸肉，因为他们不可能得到鲜肉了。

10月3日，俄军5个营在因克尔芒附近渡过黑河，而且他们被允许自南面进入要塞，“因为这对联军只会有利”。多么别开生面的战法！我们所说敌人已经被击溃、被瓦解、被歼灭，但他们却在联军眼皮下面把3000人派进塞瓦斯托波尔。敌人是否有某种理由这样作呢？如果敌人有理由把这些部队派进要塞，那末腊格伦也有他自己的理由客客气气地让他们进去。他认为城市会过于拥挤；有什么根据，现在还不清楚。不管怎样，俄军除了防线以内有4平方英里的地区外，还有整个北岸和在它后面的全部地区，在10分钟内便可以把一切多余的部队调往那里。把仅有一面被封锁的城市说成已经过于拥挤，这无论如何是荒谬透顶的。

在最初得知登陆的消息时，我们曾预言过，如果战争拖延下去，时疫将是联军最凶恶的敌人。现在时疫正在猖獗，至少就英军而言，由于工作做得很糟，情况更加严重。的确，由于这一原因，病员很少得到照顾，以致腊格伦勋爵不得不对医务人员严厉申斥。但是情况还不仅如此。医官在君士坦丁堡，药品的储备在瓦尔那，而病员在巴拉克拉瓦。对于路易·波拿巴不久前在布伦所讲的新军事论点，即一支军队要占领良好的阵地，必须配置成三角之势，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实例吗？随着季节转冷，疾病加剧了，团队人数逐

渐减少,——英军一个团出征时是1000人,现在有战斗力的兵士不会超过600人,——而军事行动仍然那样迟缓地进行。最高统帅部的陈规旧套——40年和平环境中训练的成果,是不可能被这些小事动摇的。让军队毁灭吧,只要能根据女王陛下的条例夺下塞瓦斯托波尔就行了!

在通常的围攻中,围攻者总是竭力使先头炮队尽量接近敌人的工事,600—700码就算是很远的距离了。然而根据腊格伦的说法,在像这一次这样的大规模围攻中,并且围攻的又多半是简单的野战工事,就应当用相反的方法。敌人让我们接近到700码,但是我们决不应当做敌人所希望的事情,这便是腊格伦的说法。于是他把自己的炮队配置在2500—3000码的距离上;如果战报在这一方面留有哪怕最细微的可疑之处,我们就会认为这一事实是不可能的。以后,他接近到1500—1200码,并且对于为什么不开火这个问题,他终于说:破城炮队要想进行有效的射击,应配置在距准备打开缺口的工事300或400码的距离上!在远距离的炮队内一定有朗卡斯特炮[297]和十英寸的远射程炮,因为英国炮兵显然有这样的见解,即这些火炮像望远镜一样,只适用于远距离。的确,完全适用于海军炮兵的这种远距离射击,在应用于陆军炮兵时造成的混乱超过了它带来的好处;这些可笑的炮队便是例子。

引起这种种天才的巧妙战法的塞瓦斯托波尔的向陆一面的工事,是由下列几部分组成的:在西面(法军在这一面攻击)有卡兰亭炮台凸出的一个或两个正面。它的后面是带射孔的垒墙,这道垒墙一直延伸到卡兰亭湾的尽头,它的终点是筑在山冈上的圆形塔楼,这个塔楼是周围土质工事的内支撑点。从这里到港湾的尽头筑有约3英尺厚的垒墙,它从西南面环绕着塞瓦斯托波尔。这段垒墙尽

管很容易整修好，但据说完全不适宜于防御，因此在它前面另有不大的土质工事作掩护。由港湾的尽头向东到军港(英军攻击的正面)，如果不算和上述塔楼相类似的周围有眼镜堡作掩护的两个塔楼，总的说没有什么正规的防御工事。此外，这里还有一些不正规的土质工事，如果相信比达耳夫上尉发表的在当地绘制的草图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那末这一切只构成了一个极寻常的营垒。不管怎样，这些草图中只标出了一道由一些背面敞开的工事构成的防线；这里没有俄军非常喜欢的闭合式多面堡。但是很难相信，全部情形就是这样。如果的确只需要夺取这一道防线的话，英军也许早就用白刃战把它攻下了。必须考虑到，后面还有第二道多面堡防线。

俄军在全部工事里都配有海军重炮，这是他们能够为这些火炮找到的最好的使用场所。但是他们的射击技术极差。他们日夜不停地用这些火炮射击敌人，而一百发炮弹只有一发命中目标。可能正是这种拙劣的射击促使腊格伦勋爵把暂壕挖在3000码远的安全距离上。据报道，经过联军舰队和陆军3天的炮击后，英军在自己的攻击正面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而法军在攻击正面上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一当他们打开缺口，就应开始强攻。如果我们不是从可靠方面得知联军在多远的距离上配置他们的炮队，那末用200门如此大口径的火炮需要三、四天才能粉碎这些防御工事的抵抗，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这就是我们对迄今获得的结果所能报道的一切，不管这些行动的结局如何，可以肯定地说，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在战史上将是独一无二的。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10月30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11月15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3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克里木战局[298]

今天本报刊载了“波罗的海号”轮船昨天带来的克里木战区的消息，它们充满一种新的情绪，这无疑将使本报读者感到震惊。在这以前，英国报刊的评论和英法记者对战争进程和前景的论述，一贯带有傲慢和过分自信的特色，而现在却流露出惶惶不安的感情，甚至有些惊慌失措。现在大家都承认联军过去宣扬的那种对敌优势已不存在。塞瓦斯托波尔比预料的要坚固，缅施科夫作为一位将军比预料的更有才干，而他的军队也比预料的要多得多。法军和英军现在不是一定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是有可能遭到可耻的失败。本报驻利物浦记者——一位有爱国热情和抱有本国人的偏见的英国人——所描写的是这种情绪，英法两国政府十分坚决的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也是这种情绪。它们拚命地努力，以求加速向塞瓦斯托波尔增援。联合王国已经派出了最后的一兵一卒；许多轮船用于运输。5万名法军开赴前线，并希望都能及时赶到战区，参加最后的决战。

本报在星期六曾刊登大量文件，主要是有关围攻的起初各阶段以及舰队之间的局部成功的、但总的说则是不顺利的合作等问题；今天我们补充发表关于利普兰迪对巴拉克拉瓦的联军猛烈攻击的公报和战斗行动进一步发展的综合报道，应当承认，这些战斗

行动对联军都是很不利的。仔细研究这些文件就可以看出，联军处境虽然困难，甚至令人担忧，正像我们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的那样，但是未必像本报驻利物浦记者所感到的那样严重。我们并不认为有比被迫撤退和登轮回国更糟的情况在威胁他们。从另一方面看，他们仍然没有失去以死拼的强攻夺取塞瓦斯托波尔的可能性。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认为应当在英法本土的援军到达克里木以前就解决问题，战局显然到了转折点；由于已经进行的机动以及造成的错误和疏忽，战局的性质已经明确，它的结局也已经预先注定。我们已经有了关于主要事件的不容争辩的可靠情报，现在可以对战局的整个进程作一简要的叙述。

现已查明：当联军在旧堡附近登陆时，缅施科夫指挥的部队共有 42 个步兵营和 2 个骑兵团（还有一定数量的哥萨克没有计算在内）；塞瓦斯托波尔的守军则是由海军陆战队和水兵组成的。这 42 个兵营属于第十二、第十六及第十七步兵师。假定每营满额时是 700 人，那就共有步兵 29400 人，连同 2000 骠骑兵以及哥萨克、炮兵、工兵和地道爆破兵，这支部队共有 32000 人。缅施科夫以这样的兵力是不能阻挠联军登陆的，因为如果阻挠登陆就会使自己预备兵力不足的部队处于联军舰队炮火之下。只有可以牺牲一部分兵力的大军，才能派出一些部队进行小规模的军事行动：袭击和夜袭敌人正在登陆的部队；但是俄军在这时却需要每一个兵士去进行当前的决战。此外，俄军的步兵又最不适于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他们成纵队以密集队形作战时才能发挥威力。至于哥萨克，则适宜于那种通常以俘获某些战利品为目的的更小规模的战斗。同时，看来克里木战局表明：最近 30 年来使哥萨克逐渐转变为正规部队的做法挫伤了他们个人的进取精神，并且把他们弄得已经既不适于

非正规勤务，又不适于正规勤务。看来，他们现在既没有在前哨内或独立部队内执行勤务的能力，也没有在队列内向敌人攻击的能力。因此，俄军动用每一刀每一枪来进行阿尔马河会战是正确的。

在这个河岸上，32000 俄军遭到了 55000 联军的攻击。兵力对比几乎是一比二。当联军已有将近 3 万人投入战斗时，缅施科夫便下令退却。当时参加战斗的俄军不到 2 万人，如果企图继续扼守阵地，俄军势必要将全部预备队投入战斗，结果就不是退却，而是被粉碎。当联军由于巨大的兵力优势已胜利在握时，缅施科夫就停止了会战，用预备队掩护退却，并克服了博斯凯的迂回运动在他的左翼所引起的一度混乱，“秩序井然地”撤离了战场，既未受到追击，也未受到惊扰。联军辩解说他们没有骑兵可以用来追击，但是，俄军总共也只有两个骠骑兵团，——无论如何比联军的骑兵要少，——所以应当承认这种辩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像措尔恩多夫、埃劳、傅罗迪诺等会战[299]一样，俄军步兵虽然已被击败，但仍然证明卡瑟克特将军对他们的评价是正确的，这位曾指挥一个师同俄军作战的将军公开说：俄军“是不会惊慌失措的”。

但是，如果说俄国步兵保持了沉着和镇定，缅施科夫自己却完全惊慌失措了。联军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加上攻击时出乎意料的坚决勇猛精神，一度打乱了缅施科夫的计划，使他打消了向克里木内地退却的念头，而向塞瓦斯托波尔以南运动，准备扼守黑河地区。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大错误。如果他从阿尔马高地观察联军的全部阵地，就完全可以准确地估计出敌人的兵力，最多也不会有 5000 人的误差。他应当知道：虽然联军在数量上占有相对的优势，但是还不足以既留下军队监视塞瓦斯托波尔，又同时向克里木内

地追击。他应当知道：如果在沿海一带联军同他的兵力对比是二比一，那末在辛费罗波尔附近，他便能以两倍于敌的兵力对抗敌人。尽管如此，正如他自己承认的，他却退向塞瓦斯托波尔以南。不过在他没有遇到联军半点阻碍而完成了这次退却，并使部队在黑河南岸的山冈上休息了一两天以后，他决定纠正自己的错误，其办法就是由黑河向巴赫契萨赖进行冒险的侧敌行军。这种做法违背了战略上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有希望获得很大的成果。既然已经在战略上犯了错误，那就很难避免错误的后果。这时，问题只在于是对这种后果忍受到底有利呢，还是再来第二次然而已经是有意识地进行的不正确的运动来避开这种后果有利？我们认为，在这种场合，缅施科夫在敌人活动范围内大胆地进行侧敌行军，从而终止在塞瓦斯托波尔周围不合理的“集中”配置，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由于平庸的战略家和墨守陈规的将军们的努力，两个敌对军队的运动都采取了在实战中从未见过的形式。侧敌行军瘾像霍乱流行似的，蔓延了对垒的双方。在缅施科夫决定从塞瓦斯托波尔向巴赫契萨赖侧敌行军的同时，圣阿尔诺和腊格伦也想从卡特希向巴拉克拉瓦运动。俄军后卫和英军前卫在梅肯集农庄（它是用后来成为俄国海军上将的一个苏格兰人的名字命名的）附近遭遇，很自然的，前卫击溃了后卫。因为我们已经在“论坛报”对联军的侧敌行军从战略观点进行了评述，所以现在没有必要再来重复。

10月2日或3日，塞瓦斯托波尔被围，联军占领了缅施科夫刚刚放弃的那些阵地。从此，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便开始了，战局也随之进入新阶段。在这以前，联军占有无可争辩的优势，可以为所欲为。他们的舰队掌握着制海权，保障了登陆。登

陆以后，他们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无疑有较高的战斗素质，这就保证了在阿尔马河取得胜利。但是，现在已开始形成军队脱离自己的基地在敌国作战时迟早不可避免的那种均势。诚然，缅施科夫的军队仍然没有露面，但是它的存在使联军不得不把预备队正面向东配置在黑河。因此，围攻部队本身便大为削弱，在数量上只比塞瓦斯托波尔的守军稍占优势。

缺少毅力、没有系统（特别是英国陆海军各主管部门的协作方面）、地形困难，而主要的是英国各军事部门——不论是后勤部门还是作战部门——那种无法克服的墨守陈规的习气，使真正的围攻战推迟到10月9日才开始。在这一天，终于在距俄军工事1500—2500码的远距离上挖掘了堑壕。这个在围攻史上从来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到过的事实证明，俄军仍然能够固守要塞四周至少一英里以内的地区，而且的确扼守到10月17日。17日早晨，围攻作业已推进到使联军可以开炮的距离。本来炮击很可能还要再拖延几天，因为联军在这一天根本没有做好开炮的准备，但是来自英国和法国的消息推动了他们，这些消息说：由于将在10月25日攻下塞瓦斯托波尔，现在举国欢腾。这当然激起了军队的斗志，并且为了安定军心，便不得不开炮。结果是联军以126门火炮对抗200—250门火炮。但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屡次用来稳定舆论的沃邦的著名原理却说：

“围攻是一种可以像数学那样精确地计算出结果的军事行动，如不受外来因素的妨碍，它只是时间问题。”

这个著名原理是以这位工程师的另一原理为基础的，那就是：

“在围攻时，攻击的火力是可以取得对防御火力的优势的。”

然而在这里，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情况恰恰相反：在开始射击时攻击的火力绝对弱于防御的火力。后果立刻显示出来：俄军在几个小时内就迫使法军炮队沉寂了，并且整日同英军炮队进行了几乎是势均力敌的战斗。为了转移俄军的注意力，联军进行了海上攻击，但是进行得并不比陆上好，也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法国军舰攻击卡兰亭炮台和亚历山大罗夫炮台，以支援对这些炮台的陆上攻击；如果没有这种支援，法军无疑会遇到还要激烈得多的回击。英国军舰攻击了海港的北部，其中包括康士坦丁炮台、电报局炮台和在康士坦丁炮台东北临时构筑的炮台。邓达斯海军上将，这个谨慎的人，命令自己的舰队在距炮台 1200 码处抛锚，——他显然是赞成远距离射击的。但是，在军舰同岸防炮台的战斗中，军舰如不能进到距炮台 200 码或者更近的距离，以便准确地击中目标并获得最大的效果，就一定要打败仗，这是早就明确了的问题。总之，邓达斯把自己的舰队置于毁灭性的炮火之下，如果不是艾德蒙·莱昂斯爵士赶来援救，他一定会遭到相当大的损失；看来当时莱昂斯几乎是违背了命令而率领 3 艘战列舰尽可能地接近康士坦丁炮台，使炮台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同时他自己也受到了损失。由于英法海军将领们的报告直到现在只字不提炮台的实际破坏情况，我们不得不认为，在这里，也和在博马尔松德一样，蒙塔郎贝尔式岸防工事——堡垒与穹窖炮台——能够经受住数量多一倍的舰炮的轰击。这一点尤其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炮台暴露的石砌体就同现在已为大家确知而且部分地已在博马尔松德表明的那样，经不住架设在岸上的海军重炮 24 小时的破坏射击。

在这件事情以后，法军几乎完全停止了射击好几天。英军因为炮队配置得距俄军防线较远，同时比起他的盟友来拥有口径较

大的火炮，所以能够继续射击，并且迫使俄军一个石质多面堡的上层火炮停止射击。海上攻击没有继续进行，这是对穹窖炮台表示敬畏的最好证据。俄军在阿尔马河会战中的防御使胜利者大为清醒。在每门被击毁的火炮的位置上换上了新的火炮。白天被敌人破坏的每个射孔，在夜间又修好了。在土工作业方面，当联军没有采取措施以获得优势以前，双方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腊格伦勋爵发出的“顾惜城市”的可笑的命令取消了，于是炮击开始了，对集结的部队的集中轰击和它所起的疲惫作用，看来使守军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此外，在炮队前面还派出了猎兵，利用各种掩蔽物瞄准射击俄军的炮手。同在博马尔松德一样，米涅式步枪起了很大的作用，重炮和米涅式步枪在几天内杀伤了大部分俄军炮手。水兵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而他们是守军中使用重炮最熟练的人。于是，不得不采用被围守军的常用手段，即步兵在幸存的炮手指导下使用火炮。但是很容易设想，他们的射击几乎毫不起作用，因此围攻者就有可能使堑壕越来越接近要塞。据报道，他们在距外围工事 300 码的地方挖掘了第三道平行壕，我们还不知道，在这道平行壕里配置了什么样的炮队；现在只能指出：在正规围攻中，**第三道**平行壕总是挖掘在被攻击的工事的斜堤脚附近，也就是距壕沟 50 或 60 码左右的地方。如果这个距离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被加大了，那末我们只能认为这证实了某些英国报纸的看法，即防线的没有规则不但使英国工程师们无法发挥创造才能，而且把这些绅士们弄糊涂了，因为这些绅士们虽然能够按照所有的现成规则摧毁正规棱堡的正面，但是一旦敌人不按照在这个问题上公认的权威所制定的规则行事时，他们便束手无策了。

既然决定从南面攻击，就必须使平行壕和其中的炮队指向一

个或者至多两个明确规定的正面。应当集中力量攻击两个（最多三个）相邻的外堡。这几个堡垒一经破坏，其余的外围工事就会失去作用。如果联军采用这种方法,集中全部炮兵轰击一点,那就会立刻很容易地取得巨大的火力优势,并且大大缩短围攻的时间。根据平面图和地图来判断:从卡兰亭炮台起到内湾末端止的正面,也就是法军现在攻击的正面,可能是最适于进攻的正面,因为破坏这一正面以后城市本身就完全暴露出来了。联军拥有130门火炮本来可以保证在这个有限地段上很快造成火力优势。但是,联军没有这样做,他们希望英军和法军都能独立行动,结果形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围攻法,就是使长达3英里多的垒墙都同时受到炮击。这种攻击方法是从来没有看见过也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它使防御者有可能在寻常的棱堡工事和眼镜堡内让全部250门火炮同时参加战斗。要知道,一个棱堡正面未必能够容纳20门以上的火炮,而在一般的围攻中能够参加防御的正面不会超过3—4个。可能,联军的工程师们以后能够为自己这种奇怪的战法找出很有力的论据,但是,现在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不能找出防御方面最弱的地点,为了不使这些地点漏掉,只好对全线进行射击。

在这期间，双方都开来了援军。利普兰迪对联军前哨进行的而且局部成功的猛烈攻击表明：俄军还拥有比缅施科夫带到巴赫契萨赖去的更雄厚的兵力。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雄厚到足以进行一次胜利的会战。考虑到围攻者所取得的胜利，考虑到随着围攻者向城墙接近,防御者的损失将按几何级数日渐增大,考虑到防御者仍然坚守着外围工事，而要塞围墙的防御显然已经削弱,我们可以期待在11月9日到15日之间出现决定性的结果:不是城市的南区陷落,就是联军遭受决定性的失败而被迫放弃围攻。

但是必须指出，这样的预言总是随情况而定的，而这些情况在离开战场这样远的地方是无法完全估计到的。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11月9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11月27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4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巴拉克拉瓦会战[300]

从欧洲来的“阿非利加号”轮船便给我们带来了3天的消息，但其中除谈到许多伤病员被活活烧死在一个医院里的惨事和其他闻所未闻的灾难以外，没有任何重要的战区新闻。关于11月5日那次激烈而没有明确结果的会战，“波罗的海号”轮船曾带来过简短的消息，现在我们又得到了腊格伦勋爵的简短的报告，但还没有得到参与会战和目击实况的记者的详细的和生动的报道。由于战争中的困难增多，而且还在继续增多，在英国和法国不安的情绪很严重——比表面上所能看到的严重得多。塞瓦斯托波尔在互相比赛勇敢和牺牲精神的联军的猛攻之下的顽强防御、不愿投降，被认为是很大的凶兆。今天本报所载的摘自伦敦“泰晤士报”的消息，证明情绪已在变化，疑虑开始滋长，这种疑虑甚至可以看做是绝望的最初征兆。因为缺乏有关11月5日会战的详细材料，我们对这次会战还无法评论，所以今天只能谈谈这次会战以前有关围攻的一些事件。

10月25日，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的缓慢单调局面第一次被戏剧性的事件打破。在这一天，俄军攻击了掩护围攻部队的联军阵地；并且由于这一次双方比较势均力敌，结果和阿尔马河会战完全不同：这次参加战斗的几乎全是骑兵，而在阿尔马河会战中骑兵事实上根本没有参加。俄军这次是进攻者而不是防御者，联

军则拥有阵地坚固这一个优越条件。诚然这次会战也几乎和阿尔马河会战一样，双方不分胜负，但优势属于俄军。

在塞瓦斯托波尔湾以南的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半岛和克里木草原之间，有一片丘陵地从流入塞瓦斯托波尔湾的黑河口向西南伸展。这片丘陵地的西北面缓缓朝塞瓦斯托波尔倾斜而下，朝巴拉克拉瓦的东南面则大部是峭壁悬崖。对于占领赫尔松涅斯的联军来说，这个丘陵地是天然的防御阵地，可以用来对付任何企图解围的俄军。但是不幸得很，英军的“作战基地”，舰队用的主要港口和补给品的集中地都在巴拉克拉瓦，而巴拉克拉瓦则位于这个丘陵地东南约 3 英里处。因此必须把巴拉克拉瓦包括在防御体系内。巴拉克拉瓦周围是一连串极为参差不齐的高地，这些高地从上述丘陵地的南端沿着海岸向正东和正西伸展，并且几乎同所有的克里木丘陵一样，向西北的一面逐渐倾斜，而向东南的一面则是陡峭的悬崖。在这两群高地形成的夹角里是一片略带起伏的平原，平原向东逐渐隆起，以陡坡终于黑河河谷。

这片平原的最显著的特点是丘陵和小高地相交错，它们向西北和东南伸展，把我们称为格拉克列亚的山峦同南海岸的山地连接起来。在巴拉克拉瓦以东和东北约 3 英里处的那块高地上，联军构筑了由 4 个多面堡组成的第一道防线，这些多面堡掩护着通往巴赫契萨赖和黑河上游的道路，它们是由土军防守的。第二道防线是正对着巴拉克拉瓦构筑的，一直伸展到由沿海丘陵和格拉克列亚山峦构成的夹角的顶点，而格拉克列亚山脉由驻扎在附近的法国博斯凯将军的师防守。由此可见，如果说英军步兵、海军陆战队和水兵所防守的第二道防线转为从翼侧掩护这一线的法军多面堡防线，那末突出在前面约 2 英里处由土军防守的第一道防

线则不仅得不到任何支援，而且令人奇怪的是，这道防线的位置还不同可能出现敌人的道路相垂直，而是几乎在这条道路的延长线上，这样俄军就可能逐一夺取这4个多面堡，夺一个就占住一个，不会遭到尚未夺取的多面堡的特别猛烈的抵抗。

联军在巴拉克拉瓦这一面的阵地由土军驻守，他们在多面堡即第一道防线内进行防御；和巴拉克拉瓦相邻的高地由英国海军陆战队占领；在巴拉克拉瓦以北的谷地内驻有第九十三苏格兰步兵团和几支由痊愈的伤病人员组成的部队。再往北是英国骑兵的营地，而在格拉克列亚高地上则驻有博斯凯将军的步兵师的前卫。

10月25日晨6时，利普兰迪将军率领俄军对上述阵地进行攻击。他指挥的混成师内有6个步兵团（德涅泊团、阿速夫团、乌克兰团、敖德萨团、弗拉基米尔团、苏兹达尔团、第六猎兵营和1个黑海哥萨克营，共26个步兵营）、3个骑兵团（第十一和第十二骠骑兵团和枪骑兵混成团，共24—26个骑兵连）、约2个哥萨克团和70门火炮，其中包括30门十二磅火炮。

利普兰迪将军派格里贝将军率领德涅泊团3个营通过左方的峡谷去占领科马雷村，在这个村的前面便是第一个也是最坚固的一个多面堡。格里贝将军占领了这个村，看来他的3个营极为平静地在那里度过了一天，至少在以后关于会战的报道中一次也没有提到他们。

起先顺着黑河沿乡村道路前进的主力纵队到达了由巴赫契萨赖通往巴拉克拉瓦的大道，在这里遇到了土军占领的多面堡。因为第一个多面堡非常坚固，所以利普兰迪将军首先进行炮击，然后派出强攻部队。散兵线掩护着成连纵队进攻的阿速夫团第一、第二和第三营，这3个营还得到了在两翼成密集纵队进攻的阿速夫

团第四营和德涅泊团1个营的支援。在猛烈的抵抗之后，多面堡被攻克了；土军死伤170人，这个事实，同英国报纸上恶意的论断相反，证明土军对这个多面堡的守卫是英勇的。而仓促构筑的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个多面堡则几乎未经战斗就被俄军占领，到早晨7点钟，联军的第一道防线便完全落到了俄军手中。

土军放弃这些多面堡可能带来好处，因为这就能消除自沃耳特尼察和锡利斯特里亚会战以来就深信土军英勇非凡的荒谬观念；不过英国将军和英国报纸在这一次的做法还是不体面的，他们突然对土军大发雷霆。其实应受叱责的与其说是土军，倒不如说是那些竟这样不合理地构筑防线又不注意及时完工的工程师们，和那些使第一道防线处于毁灭性的打击之下而不予以任何援助的指挥官们。

像苏格兰人那样坚定沉着但是动作缓慢的第九十三苏格兰步兵团的兵士，是逐渐投入战斗的，而且在多面堡已被攻占之后才通过丘陵前来援助。被俄军骑兵追歼的土军终于能够在苏格兰人的两翼重新整好队形，后者力求避开俄军火力，卧倒在尚为联军占领全部阵地之前的一个不大的地褶的棱线后面；土军只是在左翼得到一个骑兵师的支援。这时，俄军在筑有多面堡的高地上展开成战斗队形；左翼是阿速夫步兵团，它的右面是乌克兰步兵团，再右是敖德萨步兵团。这3个团占满了多面堡中间的空地，占领了联军过去的第一道防线。在敖德萨团右面，略带起伏的平原有利于骑兵行动。俄军把两个骠骑兵团派到了这里，他们正面对着调到这里来的英国骑兵，双方相距约2英里。苏兹达尔团、弗拉基米尔团、部分炮兵和刚刚到来的枪骑兵留作预备队。

当得到一营痊愈的伤病人员和土军的加强的第九十三苏格兰

团开始抵抗俄军的时候，俄军的骠骑兵就向它攻击。但是在骠骑兵还没有来得及前进时，英军的重骑兵旅就向他们猛扑过来。七八百英国龙骑兵奔向俄军，击溃了他们；如果考虑到俄军数量上的优势，这一次攻击就是我们所知的最出色和最成功的攻击之一。数量比英军多一倍的俄军骠骑兵瞬间便被冲散了。被派来攻击第九十三苏格兰团的几个俄军骑兵连，遭到了沉着的苏格兰兵士在50步距离上的齐射而四散逃窜。

如果说土军败逃了，那末英军则暂时得到了荣誉。苏格兰兵士甚至还没有列成方队便迎击骑兵的勇敢精神，以及英军重骑兵勇猛的攻击，——这的确是可以自豪的事情，何况还是在援军到达以前作的。但是这以后，第一师（由剑桥公爵指挥）和第四师（由卡瑟克特指挥）以及法国的博斯凯师和非洲猎骑兵旅开到了。部队列成战斗队形，只有这时才说得上是两军相遇。当博斯凯师在格拉克列亚高地摆好阵势以后，利普兰迪把弗拉基米尔团和苏兹达尔团派到极右翼的丘陵上，配置在骑兵后面。

两军相距在射程以外，因此射击差不多停止了，但突然某种还没有弄清楚的误会使英国轻骑兵投入了没有意义的最后遭到了失败的攻击。当时卡迪根伯爵曾接到进攻的命令，几秒钟后他便率领轻骑兵旅沿阵地对面的谷地而上，这个谷地两侧都有丘陵作掩护，而丘陵上配置了已经对下面的地区集中火力的炮队。全旅共有700名骑兵；当他们接近丘陵斜坡而进入射击距离时，就遭到那里的火炮和步枪的射击。于是，骑兵旅就向谷地上端的炮队冲锋，冒着20码距离内的火力，砍倒了炮手，击溃了再次冲锋但来势不猛的俄军骠骑兵；当他们开始折回时，俄军枪骑兵却突然从翼侧向他们冲锋。这些枪骑兵刚刚靠近，就立即攻击已经疲乏

的英军骑兵。英军虽然曾获得局部胜利，这一次却不得不退却，并完全被俄军击溃，当然，这是俄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和英军疏忽大意因而毫无目的地直接进入大量炮兵的交叉火力之下的结果。700 名英军骑兵中，生还而保持战斗力的恐怕不到 200 人。在没有得到生力军补充以前，这个轻骑兵旅可以认为已被歼灭了。

如果没有从两翼支援轻骑兵的两次战术机动，英军的失败可能还要惨重，也许无一人生还。在右翼，卢肯勋爵曾命令龙骑兵旅从右面对俄军炮队进行佯攻。该旅向前驰骋了几分钟，在俄军火力下大约伤亡了十多人后就迅速折回。但在左翼，属于世界上优秀骑兵之列的两个法国非洲猎骑兵团看到他们的盟军受挫，就赶去援助。他们向高踞在弗拉基米尔步兵团对面的丘陵上从翼侧射击英国轻骑兵的俄军炮队冲锋，瞬间就突入炮兵阵地，砍死了炮手，然后在完成任务以后就撤退了；即使弗拉基米尔团的步兵不立即向他们冲来，他们也是会撤走的。

这一次，大家又看到了在这次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并且是我们不只一次地指出过的英军作战方法。英军起初犯了错误，以后又没有决心采取违反战术规则的、但只有这样才能消除错误后果的那种行动。但是，法军猎兵却立即感到需要如何行动。在**他们**守卫的那个翼侧上俄军骑兵没有冲锋，因为法国猎兵已抢先进行了勇猛的攻击。斯卡利特龙骑兵旅的谨慎的骑兵则只进行了佯攻，这当然不足以阻止俄军枪骑兵对骠骑兵翼侧的攻击。如果他们也像法军一样进行冲锋，俄军枪骑兵很快就会退回去的。但是当英军轻骑兵奉命勇敢作战的时候，重骑兵却奉命谨慎行事，结果轻骑兵旅便复灭了。

战斗到此告终。俄军破坏了距联军最近的两个多面堡，并固

守住其余的两个。他们保住了夺得的地区，而腊格伦勋爵则不敢向俄军进攻，命令加强第二道多面堡防线，并只限于防守这些多面堡。第一线就这样失守了。

在这次会战中，第九十三苏格兰团的行动值得大加赞扬。正像他们所做的那样，在展开成横队的情况下迎击骑兵，只把右翼的一个连向后调动构成 en potence〔拐子形〕，不到决定时刻不射击，然后又如此沉着地进行射击，——这只有极少数的、具有步兵所需的最优良素质的部队才能做到。奥军和英军大概是唯一能够经受这种考验的军队；也许还有一些经过多年服役受到必要锻炼的俄国部队可以算在里面，虽然我们不记得，他们曾在什么时候遇到这种考验，并光荣地经受住了这种考验。

上述会战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英法骑兵对俄国骑兵的优势。联军 3 个旅在人数上和俄军 3 个团几乎相等；如果他们不是陆续地而是同时投入冲锋，并能得到调到前面的炮兵和全部进行攻击的步兵的支援，那末利普兰迪和他的部队就有从陡坡上被赶下黑河的危险，会遭到布吕歇尔在卡茨巴赫河给法军安排的那种命运。

两军人数大致如下：俄军有 25 个步兵营，最多只有 14000 人，其中大部分参加过阿尔马河会战；骑兵 24 个连，大概不超过 2400 人，大部分由莫斯科和卡卢加调来；此外，尚有大约 1000 名哥萨克和 70 门火炮。

联军步兵由英军第一、第四师的主力和法军博斯凯师的主力组成；此外，还有一些土军。土军的数量只能根据关于已登陆的土军步兵营的材料粗略地估计，一开始有 10 个土军步兵营参加克里木远征，根据 10 月 18 日腊格伦勋爵的报告，以后又有 6 个营在巴拉克拉瓦登陆。因为这些兵力没有编入围攻的部队而且又未

远离巴拉克拉瓦，所以他们应当是全部参加了上述会战，尽管在退出多面堡以后在报告中就没有再提到他们，并被认为不值一提。总之，如果我们认为英军是 6500 人，法军是 3500 人，土军至少是 6000 人，那大概不会有很大出入。这里还要加上巴拉克拉瓦的多面堡内约 1000 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和水兵。由此可见，全部步兵为 17000 人；如果不算土军，则为 11000 人。至于骑兵，两个英国骑兵旅约为 1400 人（在英国战报中仅公布了兵士的数目），非洲猎兵不少于 800 人，共约 2000 人。炮兵数量不详，无论如何比俄军要少，但是质量上远远超过他们。

整个说来，我们认为，这次联军无论如何不弱于俄军，他们占有便于撤退的有利阵地，并且本来可以用骑兵和步兵同时进行勇猛的攻击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是阿尔马河会战那样没有结果的胜利，而是可以使他们避免 11 月 5 日那次血战的胜利。而现在，联军甚至没有弥补他们所受到的全部损失；由于过分的勇敢和过分的谨慎的奇怪的结合，由于不适当的勇猛和不适当的怯懦的奇怪的结合，由于忽视军事学术原则的冲动和放过有利战机的学究式的谨小慎微的奇怪的结合，由于联军一切行动所特有的那种所行非所需和所行非其时的奇怪做法，他们在巴拉克拉瓦会战中完全被打败了。

根据 11 月 5 日会战的材料，我们暂时只能作出这样的结论：这次会战是我们认为应在 11 月 5 日至 10 日之间到来的那种危机的开始。正像我们早已说过的，——伦敦“泰晤士报”现在也这样说了，——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给养和援军的输送。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11 月 16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11 月 30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24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因克尔芒会战[301]

这一场血战发生在11月5日，但是伦敦在11月23日才收到联军统帅和主要报纸记者的报告。关于会战的非常简短的报道是最近两艘轮船带到美国的，但这些报道都不够详细，不能使我们对战斗的性质作出较为满意的判断。但是今天由“太平洋号”轮船带来的邮件，使我们有可能刊载有关整个会战的最详细的报道，其中包括腊格伦、康罗贝尔和缅施科夫的报告，以及伦敦“泰晤士报”和“先驱晨报”特派记者的出色的、清晰的通讯（这两家报纸在战地都有很能干的撰稿人）。由于有了这一切和其他一些文件，我们便可以分析会战的进程，使读者能够对这次会战有一个公正的有根据的看法。

像普鲁士军队在耶拿一样，在因克尔芒对面的英军，配置在只有沿着几条隘路才能从正面接近的高地上。英军像普军一样，没有注意占领自己极左翼的高地，而缅施科夫像拿破仑在耶拿会战时一样，向这个高地派出了他的一部分军队，于拂晓前占领了面对着敌人翼侧的阵地。显然，俄军企图利用这种情况以其主力向英军翼侧猛攻，在占领的高地上展开，并在英军进行十分危险的、但为变换正面所必不可免的机动时，随着英军各师的接近，逐个地将它们消灭，或者用术语来说，逐个对它们进行“卷击”。拿破

仑当时就是利用这种机动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战败了虽然行动笨拙迟缓而且指挥恶劣、但在当时仍然是大陆旧军队中最好的一支军队。掌握了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战争过程中出现的以及拿破仑本人运用的新作战方法的军队在行动上的迅速，促成了这一大胆攻击的胜利。而这一次，在因克尔芒，缅施科夫却企图以行动笨拙，迟缓的军队按同样的方法袭击行动积极、运动迅速的英法军队，因此得到了同耶拿会战相反的结果。

英军在占领阵地时所表现的疏忽对于他们的指挥官来说是非常可耻的。既不占领黑河南岸的山冈，又不在这个重要的阵地上构筑野战工事（英军指挥官完全了解，俄军正集中几千人准备向这个阵地进攻），这是毫无道理的。我们已经指出，俄军毫不迟疑地利用了这种疏忽，在山脊的北端占领了山冈，并用重型野炮轰击英军的阵地。英国报纸断言，俄军在战场上有二十四磅和三十二磅炮，但是这只能证明这些报纸在炮兵问题上十足无知。英军将自己的火炮从巴拉克拉瓦运到堑壕里的经验应使它们明白：二十四磅和三十二磅加农炮不能用于野战，何况还是为了突然的夜间袭击。事实上，它们所说的二十四磅和三十二磅炮是榴弹炮，它们的口径与二十四磅和三十二磅加农炮相似，但实际上是轻型野炮，并不比英军的野战榴弹炮重。用小装药发射空心弹，并且主要靠增大射角来增加射程的榴弹炮，其口径能够大于发射实心弹的加农炮。二十四磅的榴弹炮在重量和射击效果上相当于六磅的加农炮，而所谓三十二磅榴弹炮（口径约六英寸）则相当于十二磅加农炮；这两种榴弹炮在俄军中是属于这两种口径的加农炮连的。这就表明：无知和民族虚荣心在编造英雄事迹和民族战功方面是同样起作用的。

到这时为止，一切都还是有利于俄军的。他们的指挥才能远远胜过腊格伦勋爵。他们的计划是出色的，并且执行得也很好。他们占领了一个重要的据点并迂回了敌人的翼侧。准备向英军拉得很长的和薄弱的防线的最弱处进攻的俄军，在数量上拥有巨大的优势，看来这可以使他们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俄军还不完全清楚，他们在同什么样的兵士作战。英军受到突然袭击后，镇静地变更了正面，由面向东转而面向北，并且以猛烈的火力迎击攻击的纵队。于是开始了阿耳布埃拉会战[302]以来欧洲所从未有过的会战，在前一会战中英军坚毅果敢，以损失四分之三兵力的代价在指挥官的刚愎自用几乎使英军遭到失败的情况下赢得了胜利。的确，在因克尔芒进行的白刃战，比过去两支最勇敢的军队彼此厮杀了6年的整个比利牛斯半岛战争期间进行的白刃战还要多。从6点半到9点半，英军约八千人抵抗住俄军的猛攻，而根据俄军自己报道，他们至少有3万人参加这次猛攻。英军在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俄军的常以生力军进行的攻击的时候所表现的那种坚毅精神，是值得大加赞扬的；除拉德茨基的军队中最优秀的几营以外，在欧洲恐怕没有其他任何军队能够作到这一点。应当指出：有利的阵地更鼓舞了这种勇敢，因为阵地朝东的正面上是无法攀登的高地。而北面，在俄军占领的山冈同这些高地之间也隔有几条峡谷，这些峡谷形成通往英军阵地的许多隘路。因此，任何一支进攻的俄军纵队都必须通过受到英军炮兵猛烈射击的地区，必须以密集的队形前进，并且只有到达山顶时才能展开。原来已被炮兵火力削弱、而在向敌接近时又被步兵火力削弱的俄军纵队，爬上了山顶，但是在他们还没有能够展开以前，射击和白刃冲击就又把他们赶下去了。在这次战斗中发现：在近距离上米涅式步枪

的子弹比一般步枪子弹有巨大的优越性；一般的步枪子弹的侵彻力只能勉强射死一个人，而米涅式步枪的一发子弹却常常射死四、五个人，使俄军的大纵深的纵队遭受极大的损失。

当英军各师开到的时候，会战就全面展开，正面也更宽了。未能迅速前进的俄军以其左翼攻击英军阵地的最初的正面，而右翼试图冲到塞瓦斯托波尔。他们有一部分占领了英军的高地，但是他们不能形成正规的战线。他们企图包围并各个歼灭英军的小部队。战斗很激烈，虽然英军艰苦奋战，但如果不是法军的博斯凯师赶到，他们就会在这场众寡悬殊的战斗中被歼灭了。法军的朱阿夫兵和外籍军团攻击了并粉碎了俄军的左翼，而非洲猎兵则趁机猛冲，于是俄军步兵被迫退却了。就这样，14000 人的联军，虽然丧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却战胜了 3 万人的俄军；不过大家公认，俄军每一个兵士都打得很好，并且我们看到，就进攻计划来讲，他们的指挥能力比联军高明得多。

那末他们为什么失败了呢？应当指出，参加会战的俄军大部分是由曾经在围攻锡利斯特里亚时被击溃而士气低落的残部编成的，而且丹年别尔格军，继过去的奥斯坦—萨肯军以后，当然是目前俄军中最糟的一个军。但并不是这种情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次会战失败，不仅仅是由于英军的勇敢，而主要的是由于俄军进行这次会战的方法。这是欧洲的作战方法对俄国的作战方法的胜利。这就是这次会战的特点。

俄军指挥官是从制订一个很好的、采用拿破仑最有名的会战的经验（要知道，任何一个俄国将军，甚至连苏沃洛夫在内，都没有独创的思想，而苏沃洛夫的唯一的独创精神就是直接的进攻）的进攻计划开始的。然后，他就以最稳靠的方法着手实现这

个计划。他在敌人翼侧占领了阵地。战略机动完成后，开始战术动作。这时，科学的、在研究过去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制订的作战方法，根据西方文明制订的作战方法，一下子都被抛弃了，于是就公然蛮干起来。这一支拥有许多服役25年的老兵的出色军队，这个阅兵操练方面的模范，竟然如此笨拙、如此不善于散开队形和以小部队进行战斗，以致它的军官只能使这个笨拙的人群向敌人猛冲。一切战术机动的思想都放弃了：前进，前进，前进，——这就是所能作的一切。这一个稠密的人群，由于非常密集，当然就成了炮兵求之不得的最理想的射击目标；与此同时，成稀疏的横队卧倒在山顶后面的英军，却遭不到敌人的射击，他们用球形炮弹向俄军大纵深的纵队猛烈射击，每次齐射都打死三、四十人，而米涅式步枪的子弹则像雨点一样飞向敌人，几乎没有一发子弹不射中这样大的靶子。这个笨拙人群的简单的猛攻本来足以突破联军的队列。但是在这里俄军遇见了惯于对付这种作战方法的敌人。英军在印度战争时期学会了如何抵挡密集的人群、甚至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密集人群的猛攻。虽然俄军比锡克教徒或俾路支人高明得多，但是既然俄军采用锡克教徒的战术，那末惯于战胜拥有6倍或8倍优势的锡克教徒或俾路支人的军队，当然就能抵挡住3倍优势的俄军的攻击。当俄军纵队爬上山顶时，他们的队形已经被炮火破坏，所以英军在50码距离上的又一次齐射和白刃冲击就把他们打乱了。以后，当俄军人数增多时，英军就像拿破仑的方队在金字塔附近屹立在马木留克兵中间一样，屹立在包围他们的俄军人群中间。英军由于充满了只有高度文明的国家的兵士才能具有的自信心而表现得毫不动摇，又加上占有装备和火力的优势，这就决定了会战的结局。俄国兵的射击技术比任何国家的兵士都坏，他们已经

在这里表明了这一点，否则他们准能把这里的英国兵全部击毙。

因克尔芒会战的特点和它的意义就是这样。它表明，俄军步兵的荣誉正在消失。它表明，不管俄国怎样进步，西方无论如何仍以比它快一倍的速度前进，而且它不可能战胜西方军队，不仅在兵力相等时如此，甚至在占有像因克尔芒会战中这样的优势时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联军的运输船只在黑海遭到惨痛的损失，那末在英国和法国的将领不犯很严重的错误的条件下，这次会战便足以使联军在克里木取得彻底胜利。我们还没有关于这次运输船只惨遭不幸的详细材料，而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仅仅是根据本报驻利物浦代理人恰好在“太平洋号”轮船启航前接到的伦敦电讯。我们还不知道，最后一批船只是载运部队还是只载运粮食和军火，但是既然电讯没有提起，也就可以推想它们没有载运部队。但是，如果在这次风暴中派往克里木的大量部队复没，那末，自然势力给予联军的打击的确要比敌人给予他们的打击沉重得多，而塞瓦斯托波尔城下的联军在能够给他们派遣新的援军以前，就可能由于疾病和敌人不断的袭击而复灭。

德意志的两强国所采取的立场，对于联军是另外一个同样严重的威胁。现在奥地利似乎第一次真正有意同西方强国决裂而同沙皇联合，而整个德意志将跟着它走。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无须怀疑的，这就是战争具有巨大的惊人的规模并席卷整个欧洲的时刻现在已经临近了。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11月27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12月14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6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克 里 木 战 局

自从激烈的因克尔芒血战以来，在克里木战场上，没有发生过一次从军事观点看来多少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不过，冬季已经到来，而塞瓦斯托波尔尚未攻占，这个事实改变了战争的整个特点；现在，将整个战争过程上溯到远征军登陆时起加以综合分析，来判断这次战争将在何种情况下进入当前的新阶段以及它的前景如何，这将是适时的。不过，首先必须对我们以前所作的关于最近一次难忘的会战的评论稍加补充。在这个事件的官方消息（已全部刊登于本报）中，充满着不寻常的矛盾，并且缺乏深刻的分析。腊格伦勋爵的报告显然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写成的。他在报告里混淆了自己部队面向黑河的正面和面向塞瓦斯托波尔的正面，把自己阵地的同一翼侧，时而称为右翼，时而称为左翼，因此根据这个文件根本无法弄清事实的真相。康罗贝尔的报告含糊不清，又简单，因此什么问题都看不出来。至于"俄国残废者"[303]刊登的所谓缅施科夫的报告，只要将它同缅施科夫公爵以前的报告加以比较，任何人都立即可以看出这个报告是出自另一个人的手笔。显然，尼古拉认为过去给报界的自由已经足够了，而且发现像正人君子那样讲实话丝毫不能防止军队的失败，所以他认为还是恢复说谎的老办法为妙。根据皇帝的意志，普通的事件也被任意歪曲。他的野战军队向围攻者发动的失败的进攻变成了被围者的胜利的

出击。原因很明显:任何出击的部队完成任务后必然要返回自己的工事;因此,退却就可以理解,并且是自然的事,但是如果正确地叙述事实的真相,那末,失败的耻辱就会无法掩盖了。

应当说,尼古拉有一切理由掩盖这次会战的真相不使人民知道。自纳尔瓦会战以来,俄军还从来没有遭到这样严重的失败。如果考虑到纳尔瓦会战时的俄军和因克尔芒会战时的俄军之间,即1700年的没有受过训练的一群乌合之众和1854年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军队之间有很大的区别,那就应当承认,相比之下纳尔瓦会战还算是俄军战史上光辉的一页。纳尔瓦会战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民族所遭到的第一次严重的失败,这个民族的果敢精神使它甚至在失败中学习如何取得胜利。而因克尔芒会战是彼得大帝时期以来俄国在温室发展中正在衰退的某种征兆。在一个不开化的国家里为了维持堂皇的文明外貌所作的人为的进展和不断的努力,看来已经使俄国筋疲力尽,使它染上了类似肺病的病症。在近百年来的所有会战中——从奥斯特尔利茨和埃劳[304]到锡利斯特里亚,俄军一直显示出他们是优秀的兵士。他们无论何时何地遭到的失败,都是完全可以解释的;这些失败可能玷污统帅们的声望,但决不能玷污军队的荣誉。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如果说巴拉克拉瓦会战显示了联军骑兵的优越性,如果说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战总的说来显示出联军炮兵的巨大优越性,那末俄国的步兵则一直到最近还保持着自己的荣誉。但是,**因克尔芒会战使这个问题也清楚了**。非常令人奇怪,在每个俄国兵奋战得可能比任何时候都勇敢的这次会战中,俄国步兵却丧失了自己的声誉。无论是俄军方面还是联军方面,极端平庸是这次战争中一切行动的基本特点,而这一特点从没有像这一次表现得这样明显。每次行动和每个步骤都导致

与预期完全相反的结果。打算进行的是 coup de main〔突然袭击〕，但变成了整个战局，甚至还是冬季战局。进行了会战，但胜利的果实像暴花一现，不到一个星期就从胜利者手中溜掉了。要进行的是使用重攻城炮夺取未设防的城市的战斗，但在攻城炮运到以前，未设防的城市却变成第一流的营垒。发动了围攻，但在快要胜利的时机，又不得不放弃围攻，因为开来了一支野战军，一支以吃胜仗代替打胜仗的军队。为了与这支野战军作战而占领的筑垒阵地，由于面积狭小，反而成为野战军变围攻者为被围者的手段！这一系列的努力、战斗、土工作业、计划和改变计划竟花费了 10 个星期；冬季来临了，而双方的军队，特别是联军，却完全没有做好过冬的准备。所有这一切的唯一的结果，便是双方都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而战争的结局仍然是遥遥无期和胜负未定。

联军从第一次登陆到 11 月 5 日为止，投向克里木的兵力不超过 25000 英军、35000 法军和 10000—15000 土军，即总数 70000—75000 人。当远征开始时，就不能期望从英国和法国再调出更多的补充兵力；几个步兵营和骑兵连正在途中，但已包括在上述数字里。即使在短时间内还可能调来一些部队，那也只能是土军；而土军尽管经过了切塔特和锡利斯特里亚会战，无论是联军的军官还是兵士，仍然对他们毫不信任。因此，远征军中真正可靠的只有 6 万法军和英军，实际上，只有他们才应当算在数内。但是对整个战局来说，这支军队为数太少了，而对 coup de main 来说，又过多了。当时，不可能很快地把他们装上舰船，而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又足以使俄军预有戒备。如果说奥军的存在使多瑙河各公国和保加利亚不致遭到俄国的侵犯，那末奥军的存在同样使贝萨拉比亚和敖德萨不致受到任何严重的威胁；因为奥军的阵地就

在这两个作战方向的翼侧和后方，所以任何军队要想向前推进，都不可能不处于奥军的打击之下。这样一来，俄军似乎相信，所有这一切准备都是为了进攻塞瓦斯托波尔；除了它以外，只有赫尔松和尼古拉也夫这两个俄国海军造船基地还受到多少有些严重的威胁。所以很清楚，俄军在克里木的准备必然是步步紧跟着联军的准备而进行的。在这次预定的 coup de main〔突然袭击〕终于变成目前的极端错误的（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明显）战局以前，事实正是如此。

尽管俄军在阿尔马河地区受到优势极大的兵力的攻击，联军仍然不得不让它秩序井然地撤离战场，这时联军才初次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最初的计划被打破了，突然的袭击失败了，必须作好应付另一类意外事件的准备。这时，联军开始犹豫不决；时间白白地浪费了；最后才决定向巴拉克拉瓦进军，于是以占领坚固防御阵地为有利的想法战胜了认为可能迅速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北区的想法（北区瞰制着整个城市，因而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点）。同时，缅施科夫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仓促地向塞瓦斯托波尔行军，又同样仓促地折向巴赫契萨赖。随后是联军的围攻。过了 19 天，第一道平行壕的炮队才开始射击，而从此以后，双方始终是大致上势均力敌的。围攻进行得十分缓慢，而且丝毫不认真。堑壕内繁重的作业和使人疲劳的战斗警戒勤务，严重地折磨着那些被异乡的气候和致命的疾病削弱了的人们，因此，联军的队伍在非常迅速地缩小。他们的将军们本来只估计到至多不过会遭到战争中不可避免的那种通常的损失，现在已经由于损失惨重而意志沮丧了。卫生和军需勤务，特别是英军的卫生和军需勤务混乱不堪。联军从自己的阵地上即可看到富饶的拜达尔谷地，那里有他们所急需的丰富的物资，但是，他们不敢冲进该地。他们不可能迅速获得增援，而俄军却从

各方面开来。就在这时发生了10月25日的会战。俄军占了上风，联军三分之一的骑兵被歼。接着是11月5日的会战，结果俄军被击退，但联军也遭到了他们不能再次经受的那样的损失。在这以后，无论是俄国的野战部队还是盟国的围攻部队都行动消极。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如果说还在进行，那也不过是pro forma〔形式〕而已。没有人会相信，联军自11月5日以来那种软弱无力而又毫无计划的射击能使城防工事受到什么破坏，或者甚至能阻碍俄军修复被毁的工事。如果恢复围攻，那末就得从头做起，所不同的只是联军的炮队可能比第一次围攻开始时向俄军工事多推进几百码而已，但是，这也只有同来自因克尔芒方向的俄军不断的攻击相配合的要塞火力不比联军火力强、并且没有摧毁突出在前面的炮队的时候才有可能。

现在，在12月初，联军已面临严寒的冬季。他们缺少为度过这寒冷多雨的季节所必需的衣服和设备；尽管已得到援军，而且援军还在继续开来，但是他们的兵力仍然很弱；他们在人员方面已经受到巨大的损失；他们已被卷入对所要达到的目的和采用的方法事先既未料到而又毫无准备的斗争中；他们除了感到自己的兵士在个人方面和战术方面都优于敌人以外，什么也没有得到，简直是毫无所得。目前，他们大概已经得到2万人的援军，主要是法军，而且还在等待新的补充；但是，回想一下第一次向土耳其运输联军时曾有过多少困难和拖延了多长时间，同时也回想一下，运输第一批部队的船只几乎全部被留下，而目前向东方运输部队又必须另找船只，那末就可以得出结论；在上述2万人到达以后，克里木的联军在一段时期内不会再得到大量的补充。因此，联军目前的兵力约为55000—60000人，其中有三分之一就在不久以前还过着舒适的守

备部队的生活，他们还必须经受严重的考验，然后才会习惯于克里木的冬季艰苦的野营生活。事实上，自英法的运输船只在11月14日惊人的风暴中遇险后，这些补充兵力与其说是对联军的加强，还不如说是一种负担。但是，决不能肯定说，这次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最周密的计划之下也是不能预见和无法防止的。11月14日的风暴，完全是这个季节中极为自然的现象，而联军舰队所遇到的灾难可以说也是这样。经过3个月令人苦闷和无法理解的拖延以后，克里木远征军开航的时间本身就预示着暴风雨和灾难，预示着船只、乘员、兵士和物品的复没。不仅如此，人们还曾不只一次地警告过这次不寻常的军事行动的策划者，指出这种季节在黑海航行必然会遇到不幸。因此，他们应对所有这一切负责，甚至对11月14日的遇险负责，这次遇险使联军恐怖地记起拿破仑的军队向莫斯科进军时所遭到的命运。据伦敦“泰晤士报”推测，11月14日在克里木的各个地点联军损失近千人，其中“落入哥萨克手中的人数尚未计算在内”。该报还报道说：

“排水量为2700吨的最好的螺旋推进式新轮船‘亲王号’最近开往巴拉克拉瓦，船上载有第四十六团、为围攻部队准备的全部冬服（其中包括4万件军大衣、法兰绒军服、内衣、裤子和手套）、牛肉、猪肉和其他食品、斯库塔里用的医疗器材以及继续围攻用的大量炮弹。所有这一切全部沉没。载有900吨火药的‘坚毅号’也已沉没。看来，继续围攻和保障部队度过严冬所需的一切在一瞬间都遭到毁灭。即使我们仅以坚守塞瓦斯托波尔前面高地上的阵地为满足，那也无法应付最凶恶的敌人——即将到来的严冬，这是十分明显的。”

虽然克里木几乎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孤立部分，虽然派去抵抗联军的军队在联军只有35000人时没有能够把他们击退，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肯定地说，这6万联军足够抵挡住将来俄国可能用来与他们作战的全部兵力。俄国在克里木有6个步兵师和1个

预备师，即大约100个营的兵力(海军陆战队和水兵除外，双方的这两种兵力我们都没有计算在内)。这100个营中有一半在多瑙河地区经过了18个月的艰苦奋战，因此其总数未必超过5—6万人。俄国的全部野战部队，包括骑兵、野战炮兵和哥萨克在内，比联军大约只多10000—15000人。但是如果利迭尔斯的一个军，即49个营计20000—25000人(因为他们也留有三分之一的兵力在多瑙河)开往皮列柯普的消息属实，如果在该方向上还在集结一些新编成的预备部队，那末俄军很快就会得到进行坚决的突击的有利时机；而且，在指挥能力大致相同的条件下对抗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时，精神、体力和战术的优势只能保持很短的时间，所以，战争的结局如何，还非常值得怀疑。另一方面，如果异常寒冷的冬季将使一切军事行动停止的话，那末，联军对它显然也将不能忍受。

对克里木形势的这个综合分析只是证明我们在听到奥地利已与西方强国联合的消息时的怀疑和不相信是有根据的。很明显，我们所详细说明的情况，并不能使维也纳内阁摆脱它通常所持的犹豫不决的态度。另一方面，英国内阁的地位不巩固，加之在东方的巨大失败又必须以某些像样的表面成绩来掩饰，这些便是为什么把一个微不足道的协定吹嘘为一个了不起的攻守同盟[305]的十分充足的理由。可能，在这方面我们错了，但是我们的读者知道我们所以坚持这种看法的原因，而且时间也将表明，这种大肆吹嘘的奥地利与盟国的联合究竟是事实，还是专门为了在最近这次议会会议上使用的一种手段。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12月4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12月27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7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战 况 的 进 展

奥斯特尔利茨的太阳已经西沉了。在纪念十二月二日那天[306]，塞瓦斯托波尔本应有一场大会战；这事是秘密透露出来的，巴黎也等候过这事的消息。但是，根据康罗贝尔将军 12 月 3 日的报告：

“雨水成河，交通已经中断，堑壕积满了水，围攻作业和一切其他作业均已停止。”

迄今是俄军在采取攻势，而联军采取守势，其中，前者在黑河占有数量上的优势，而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则恰恰相反。换句话说，俄军在黑河有足够的力量掌握主动权，而联军则不然，虽然它们能够守住自己的阵地；然而，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有足够力量进行围攻的联军却面对一支在数量上和自己相等的守备部队，因此围攻部队虽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但是没有什么显著进展。看来，力量的对比会很快发生变化；显然，联军很快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把俄军从黑河赶走。在这种情况下，丧失了自己在因克尔芒上游阵地的俄军只有两个办法可行。他们或者采取迂回，到北堡附近的有战壕防护的营地驻扎下来，或者将主力退入本国腹地，在那里联军不可能长驱直入地追击他们。联军在 2 月以前未必能集结必要的兵力包围北方营地或者追击向巴赫契萨赖以北退却的俄

军。联军未必有力量对在辛费罗波尔一带进入战壕的军队发动第二次会战。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联军都不能不退回黑河，而且只要塞瓦斯托波尔不因南区的强攻而陷落，这样的拉锯战大概要继续整整一冬。但是，因为“大西洋号”轮船给我们带来的有关围攻的消息十分贫乏，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是不大可能的。实际上，从巴黎“通报”发表的和伦敦各报转载的12月7日的消息中，我们只知道联军突然占了上风并在洪水以后仅仅两天就“几乎完成了对城市的包围”。这个令人怀疑的消息显然是捏造的，为的是转变有关12月2日的未能兑现的预言所造成的印象。

不久前，我们发表过关于俄军的总数和俄军配置的消息[①]。当时我们指出，在这将近75万人的兵力中，目前未必有三分之一在作战，其余三分之二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威胁奥地利。从那时起，尽管向克里木派了增援部队，但形势并未发生大的变化；调去援救塞瓦斯托波尔的第四军，即丹年别尔格军，是从多瑙河军团中抽调的，在这之前，它在这里得到过补充。我们可以称之为军团的集结在奥地利边境附近的将近30万人的俄军西线主力部队在位置上发生的唯一重大变化就是：它的左翼向贝萨拉比亚和德涅斯特尔河中游延伸了一些；在这样的位置上，如果必要的话，它可以在多瑙河军团余部从贝萨拉比亚撤退的时候给予接应。此外，西线的主力部队或许派了两个师到克里木以及少数增援部队加强多瑙河军团，但是，总的说来，它的兵力依然如故；看来，从列维里抽调的第三近卫师和某些预备部队的开到，已经补上了这个缺额。

---

① 见本卷第566—571页。——编者注

然而，多瑙河军团可以说是完全瓦解了，并且降低为一支纯粹示威性的军队，它配置在贝萨拉比亚，是为了尽可能久地保持俄国占领的外观。由于利普兰迪以及随后的丹年别尔格被调走，这个军团失去了整个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一师和第十二师）；如果从余下的5个师（第七师、第八师、第九师、第十四师和第十五师）中除去驻守沿岸地区和守卫从本德雷和伊兹马伊尔到赫尔松和尼古拉也夫一带的要塞所必需的兵力，再算上两次多瑙河战局中所遭受的重大伤亡，可以推测，这5个师所能提供的作战兵力不超过15000人。他们配置在沿岸附近，而在沿岸的任何地方俄国防御力量（在大陆内部十分强有力）都显得非常薄弱。必须保卫为数众多的要塞和仓库不受敌军舰队的袭击，这也就是从这5个师的3万或35000人中未必能用一半来作战的原因。

多瑙河军团的解散，就像俄军所采取的多数重大的战略措施一样（因为通常只是在实行这些措施时才开始发生错误），是非常成功的一步。自从英军和法军深深陷进克里木起，多瑙河上就没有任何力量与俄军对峙了。奥美尔－帕沙的军队，由于两次战局的伤亡，现有兵力已不到4万人，又没有得到过一次补充，它已经被西欧的外交活动瓦解到这种地步，以至未必足以用来包围伊兹马伊尔；它更不能调出一个军去充分掩护这次围攻或在野战中击退俄军。此外，对贝萨拉比亚的进攻，几个月前曾是非常有效的牵制行动，现时在军事上将毫无意义，因此，奥美尔－帕沙的军队现在被调到克里木。这样一来，唯一能够在西南威胁俄军的力量，是为数将近27万人的奥地利军队；它占领着加里西亚、特兰西瓦尼亚和莫尔达维亚。对这支军队必须特别留意，因为如果它起而反对俄国，那末俄国就不得不放弃贝萨拉比亚，甚至是布

格河以西的整个地区，并且从波兰要塞区的进攻基地或者从基辅和德涅泊河地区的防御基地出发作战。在这两种情况下，在多瑙河的军队都有可能被截断并不得不在南部草原上为自己寻找基地，而这在能够饲养大批牛羊但不能供养很多人的地方是难以做到的。另一方面，如果奥地利站到俄国方面或者将它的中立的刺刀指向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那时，或者波兰的军队预先把一个强有力的军调到多瑙河，然后作为奥地利人的预备部队开进德国，或者奥地利的大批兵力开向多瑙河并大胆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无论是哪种情况，在多瑙河上保持一支比单纯的示威性军队更加强大的独立的军队都是多余的。

至于奥地利是否参战，那末我们当然只能说不一定。大肆宣扬的同盟条约（据说奥地利是在 12 月 2 日和英法两国缔结的）不过是为英国议会设下的圈套，这是当这个条约一公布我们就向读者们指出的。

女王在御前演说中谈到这个条约时指出：

“我满意地告诉诸位，我和法国皇帝一起同奥地利皇帝签订了一项条约。我预期它会给共同事业带来莫大的益处。”

但是，阿伯丁迫于得比勋爵的再三质问，只好说：

“我们只想指出，议院满意地获悉女王陛下签订条约一事。她〈显然，应当是指老阿伯丁〉期望条约会带来重大的好处。”

阿伯丁的答复并没有能给人更大的满足。在下院，迪斯累里先生迫使约翰·罗素勋爵向前跨了一步，坦率地承认：被说得天花乱坠的同盟条约既不是条约，也不是同盟。他公开承认，这个条约没有让奥地利承担任何义务，却要西方强国与奥地利结成攻守同盟，**如果**后者想对俄宣战的话；此外，还要西方强国承担必

须在年底前根据著名的四项条款向俄国提出媾和条件的义务。这样一来，奥地利最后可以“毫不背信弃义地”摆脱同盟，只要“在最后时刻”宣布它不同意西方强国对四项条款所作的解释。约翰·罗素勋爵对12月2日的著名条约作了这番解释之后，伦敦和巴黎的股票即刻跌价了。

一年以前，联合内阁硬说它容忍西诺普大屠杀是为了取得同德意志各邦的联盟。现在，同它们之中的一个邦签订一个假条约，作为对不列颠军队的复没，而不是对土耳其舰队的复没的赔偿。最近几天的德国报纸甚至向我们证明，不列颠议会的开会是维也纳会议的幽灵再现的信号，维也纳会议准备再次开动它的笨重的机器。

然而，按约翰·罗素勋爵的说法，既然奥地利宣布它可能参加对俄国的战争，既然俄军陈兵奥地利边境附近的事实也指出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也就可以暂且认为，奥地利和德意志其他各邦，甚至包括普鲁士，有意参加到西方强国这边来。俄国对这种可能性有多少准备呢？

如果1812年进攻俄国的大陆军队比俄国在4月或5月在它的国境上可能看到的军队要软弱得多；如果那时英国是它的盟国，而不是它的敌国，那末俄国现在可以安慰自己的是这种想法：深入它的国土的军队越多，他们迅速复没的可能性就越大；另一方面，它现有的作战部队为当时的3倍。

我们完全不是想用这点来说明“神圣的俄罗斯”是不可摧毁的。相反，我们认为，就军事力量来说，光一个奥地利就完全可以和俄国较量，而奥地利和普鲁士一起，如果光从军事胜利的可能性来看，完全能够迫使俄国接受不光彩的和约。像德意志这样

面积不大、但人口稠密到有4000万人的国家是能够赛过幅员辽阔但人口分散、只有6000万臣民的俄国的。拿破仑当年十分明确地规定了从西面进攻俄国的战略计划，如果他不是迫于各种非战略性的情况而放弃了这个计划，俄国的统治和它的完整便会在1812年受到严重的威胁。这个计划就是：向德维纳河和德涅泊河挺进，在该地构筑一道防线（包括修筑工事、仓库和交通线），夺取德维纳河上的俄国要塞，而把进军莫斯科推迟到1813年春天。由于政治上的考虑，他在年底就被迫放弃了这个计划，这是因为军官们不满冬季驻扎在立陶宛，同时也是因为他盲目地相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于是他向莫斯科进军了，而结果是人所周知的。法国军需部的组织不善和兵士缺乏寒衣分外加重了这次惨败。如果当时对这些事情予以更多的注意，拿破仑在败退时仍然会在维尔诺集结起一支在数量上比俄国能用来追击他的军队多一倍的军队。他的错误是明显的；这些错误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他到达了莫斯科的事实以及查理十二世向波尔塔瓦的进军都证明，这个国家是能够攻入的，虽然攻入这个国家是困难的。至于说到在俄国维持一支常胜军的问题，那全要由作战线的长短，基地的远近和安危而定。从莱茵河到埃劳和弗里德兰德的拿破仑的作战线，如果从漫长的作战线给军队的积极活动带来的损失的观点来看，则相当于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我们假定在第一年内就占领了波兰的各个要塞）到莫斯科的作战线。而在这一假定中还没有算进直接作战基地将推进到维切布斯克、莫吉廖夫和斯摩棱斯克的情况；没有这些准备工作，向莫斯科进军当然是冒险的。

俄国无疑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中心省份——俄罗斯民族的心脏和支柱——的人口和欧洲中部的人

口相等。在波兰，也就是在组成俄属波兰王国的 5 个省内，人口的平均密度也是同样的。俄国人口最稠密的部分——莫斯科省、土拉省、梁赞省、下新城省、卡卢加省、雅罗斯拉夫里省、斯摩棱斯克省和其他省——构成大俄罗斯的心脏并组成一个紧密的整体；继续向南，是人口同样稠密的小俄罗斯的一些省份——基辅省、波尔塔瓦省、切尔尼果夫省、沃龙涅什省和其他省。这样的省共有 29 个；这些省份的人口密度比德国小一半。人口稀少的只是东部和北部的一些省份和南部草原，在西部，即在旧属波兰的一些省份——明斯克省、莫吉廖夫省和格罗德诺省——的部分地区，由于布格河（波兰的）和德涅斯特尔河之间的广阔的沼地，人口也很稀少。但是进攻军队在后方有波兰、沃伦和波多利亚的盛产粮食的平原，在前面和战场上有俄罗斯中部的田野，只要把供应工作安排得稍微好一点并从俄国人那里学会怎样使用当地的运输工具，给养是丝毫不用担心的。至于 1812 年所发生的退却军队实行坚壁清野的问题，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沿作战方向一带及其紧邻地区；如果拿破仑当时不企图在极短时期内结束战局，不是仓忙地从斯摩棱斯克发动进攻，他就会在他的四周找到丰足的粮食。但是，因为他操之过急，所以未能在距离进军线路不远的地方取得足够的粮食，而当时他的粮秣队看来的确害怕深入到村落稀少的针叶树的大森林里去。他的军队只要派出强大的骑兵部队去筹集粮食并利用当地为数众多的各种兽力车，就可以保证自己有各种必要的粮食；这样，莫斯科也未必再次焚毁。但就在后一种情况下，也不妨碍向斯摩棱斯克撤退，而在那里军队会找到一个有着一切必要供养的准备良好的作战基地。

但是这里必须研究的不仅是军事问题。类似的战争必定由政

治活动来收尾。德国向俄国宣战可能是俄国重建波兰的信号。尼古拉当然不会放弃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各省；但是，波兰王国、加里西亚、波兹南，也许还有西普鲁士和东普鲁士可以组成一个幅员相当大的王国。但是谁敢说这样重建起来的波兰会有多长的寿命呢？有一点毋庸怀疑：所有自命为自由主义的和进步的活动家的人近40年来所夸耀的那种对波兰的表面的热情是会完结的。继之而来的必定是俄国对匈牙利的呼吁；即使马扎尔人会动摇，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匈牙利的三分之二的居民是斯拉夫人，他们把马扎尔人视为当政的和独揽大权的贵族。另一方面，奥地利在这种情况下会毫不动摇地恢复匈牙利的旧宪法，以便把匈牙利从革命欧洲的地图上勾销。

这一切充分说明，奥地利加入西方同盟和发生全欧反对俄国的战争的可能性会打开多么广阔的具有军事和政治意义的前景。如果作相反的设想，那末明年春天也许会看到整队向西方强国进军的一支150万的大军，以及用行军队形向法国边境挺进的奥普军队。而那时，战争必将不再是它的现在的领导者所能掌握的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年12月14—15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1月1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7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奥地利的兵力

有趣的是，最近6个月专门研究奥地利的态度的英国报刊，竟然从未给我们报道什么确实的材料来说明奥地利在认为需要确定它的政治路线时能够投入交战一方起决定作用的实际兵力。伦敦各家日报在同奥地利结盟还是同它公开决裂的问题上的意见是有分歧的。但是这些报纸虽然代表着自诩为世界上最讲求实际的民族的舆论，却从来不屑于研究细节和统计数字，而这些细节和统计数字不仅在贸易和政治经济方面，而且在国家政策方面都是采取一切明智决定的基础。事实上可以认为，领导英国报刊的人，就像那些认为买到军阶就已尽了军人天职的英国军官一样，都是些不称职的人。有一家报纸肯定说，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如何都必须同奥地利保持同盟，因为奥地利拥有巨大的军事威力。另一家报纸宣称，同奥地利结盟毫无益处，因为它的全部兵力都要用去镇压匈牙利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但是无论哪一家报纸都不愿费力去了解奥地利的实际兵力究竟如何。

原来指挥管理机构十分庞大和极其落后的奥地利军队，于1849年彻底改组了。它在匈牙利的失败或在意大利的胜利对于这次改组起了同样的促进作用。军队的指挥管理摆脱了旧的传统的限制。刚刚在首都镇压了革命和在地方上结束了内战的军队，完

全转入了战时状态。部队成功地区分为固定的旅、师、军，就像过去的拿破仑军队和目前俄国的基干军队的做法一样。在意大利战争和匈牙利战争时期，77个步兵团（猎兵部队除外）和40个骑兵团的配置得非常分散，以致同一个团的一部分营，（甚至同一个营的一部分连）在意大利，而另一部分却在匈牙利。现在已将它们合编为固定的部队，以免再出现类似的混乱情况，并保障对部队进行正常的指挥。根据这一新的计划，由12个军和2个骑兵军组成的奥地利军队共编为4个军团。每一个军团不仅包括所有3个兵种，而且还有完全独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和足以保障战备所需的武器装备。第一军团由第一、二、九军编成，通常配置在奥地利帝国的德意志各省；第二军团由第五、六、七、八军和骑兵第二军编成，第三军团由第十、十一、十二军和骑兵第一军编成，它们通常驻防匈牙利和斯拉夫各省；第四军团仅由第四军一个军编成，驻意大利。

每个军有2—3个步兵师、1—2个骑兵旅、4个预备队炮兵连和必要的架桥队、军需和医务人员。骑兵军有2个师，相当于4个骑兵旅或8个骑兵团，并附有适当数量的轻炮兵连。步兵师有2个旅和2—4个骑兵连，每旅有5个营和1个步炮连。

因此，根据我们上面所述，奥地利全部兵力是77个步兵团（猎兵部队除外）、40个骑兵团和14个野炮团（要塞炮兵除外）以及工兵等。步兵共有62个基干团和14个边屯团、1个猎兵团和25个猎兵营。每个基干团包括5个野战营和1个后备营，即28个野战连和4个后备连。每个野战连220人，每个后备连130人。这样，每个基干团的5个野战营总共应为5964人，而62个团，包括后备部队在内，共计369800人。边屯步兵共14个团，每团2个

野战营和 1 个后备营，即 12 个野战连和 4 个后备连。野战连有 242 人，其中有 22 名猎兵。因此，一个边屯步兵团有 3850 人，全部 14 个团共计 55200 人。猎兵编成 1 个七营制团（共 32 个连，其中包括后备连）和 25 个营（共 125 个连，其中包括后备连），每连 202 人，共为 32500 人。因此步兵总数为 47 万人。

奥地利的骑兵由 16 个重骑兵团（8 个胸甲骑兵团和 8 个龙骑兵团）和 24 个轻骑兵团（12 个骠骑兵团和 12 个枪骑兵团）组成。在骑兵的编组方面很成功地利用了奥地利帝国内各民族的特点。胸甲骑兵和龙骑兵几乎完全是德意志人和捷克人。骠骑兵都是匈牙利人，枪骑兵都是波兰人。在步兵中这样区分则并不是特别有利的。通常是以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编成精锐的掷弹兵营，以提罗耳地区的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和施梯里亚地区的人编成猎兵营；边屯步兵绝大部分由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组成，他们也同样非常适于当轻步兵。

重骑兵每团有 6 个野战连和 1 个后备连，每连 194 人。轻骑兵每团有 8 个野战连和 1 个后备连，每连 227 人。全部骑兵如不算后备连，共计 62500 人，如把它们计算在内，则为 67000 人。

炮兵由 12 个野炮团、1 个岸防炮团和 1 个火箭团组成。奥军没有骑炮兵。在他们称为骑炮兵的部队中，炮手是乘马车转移的。每个野炮团有 4 个骑炮连（六磅炮）和 7 个步炮连（4 个六磅炮连和 3 个十二磅炮连），后备连没有计算在内。每连 8 门火炮。岸防炮团不编成固定的炮兵连，只区分为普通的营和连，用来在海岸要塞担任警备勤务。火箭团有 18 个连，每连有 8 个火箭发射管。这样，奥地利的炮兵总共有 1056 门火炮和 144 个火箭发射管。除此以外，要塞炮兵的 8 个营约有 10400 人，技术部队有 4500 人。

工兵约有 16700 人。

除上述野战部队、后备部队和守备部队外，奥地利还有一种为执行专门勤务而编成的独立部队。虽然它们不当作野战部队使用，但有了它们，就不需要抽调野战部队来担任辅助勤务，而以前就是由于这样抽调兵士，常使步兵营减员为步兵连，骑兵团减员为骑兵连。3 个卫生营、辎重部队和各个军内作为传令兵使用的骑兵队就是这种部队。不久以前，英国军队在编成司令部直属骑兵队时，也采取了这种办法。奥地利军队的野战部队共约 476000 人，拥有 1140 门火炮。再加上后备连、技术部队、司令部、守备部队和警察部队（宪兵队）等，奥地利军队的总数约为 62 万人。

奥地利的兵士服役期限为 8 年，然后还要服两年预备役。采取这种制度，可以经常保持预备兵员，一旦发生战争，几乎有 12 万人可以征召入伍。每个边屯区居民[307]从 20 岁到 50 岁都要服兵役。因此，基干部队为 55000 人的边屯步兵，可以扩充到 15—20 万人。1849 年，至少有 15 万边屯区居民在军队中服役。因而当时边屯区所剩的人数很少，一切农活都得由妇女去做。

根据上述材料（我们担保这些材料都是正确的）可以说，奥地利的军事组织使它有可能在战争开始时就拥有 60 万军队，而且可把多达 30 万的兵力集中在任何一点，同时无须紧急征召，也不会对国家生产力有什么特别损害，便可再提供约 20 万老兵的预备兵员。

就俄国军队的组织来说，原来考虑可以征召多得多的兵力。不过俄国的人口是 6000 万，奥地利的人口是 4000 万，而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奥地利只要征召预备兵员就可以把军队扩充到 80 万人以上，但是俄国要达到这一数字，则不仅动用了全部预备兵员，而

且又进行了一次征兵，征召的人数相当于正常情况下 4 年征兵的总和。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12 月 21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1 月 8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28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克里木战局的回顾[308]

一

伦敦12月29日。

“布奥尔伯爵、布尔克奈先生和哥尔查科夫公爵在英国驻维也纳大使威斯特摩兰伯爵府邸的会晤，唯一目的是向俄皇提供**所希望的**关于12月2日签订的三国同盟的意义和三大国准备在四项条款的基础上举行谈判的先决条件的情报。哥尔查科夫公爵立即向彼得堡报告了他搜集的消息。沙皇接受先决条件或拒绝先决条件不日当见分晓。新的一年的开始将标志着事态发展中的决定性的转变。”

这是帕麦斯顿勋爵的私人moniteur〔通报〕“晨邮报”报道的。而托利党机关报“新闻报”写道：

“维也纳会谈的使命是让奥地利有新的借口拖延对西方强国作出关于12月2日条约所规定的期限问题的最后答复。”

然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当政治家在日报和周报的社论中就新的维也纳会议[309]显示自己治理国政的聪明才智的时候，实业家却在同一报纸的交易所的文章中干脆把这个会议叫做“无耻的把戏”。例如，金融评论员，即money article〔金融市场记事〕的作者，在今天的“晨邮报”上就是这样说。事实上伦敦交易所对维也纳的

事件是这样漠不关心，以致它的消息无论是对 stock exchange〔交易所〕的“狗熊”或“叭喇狗”，无论是对悲观主义者或乐观主义者都不能给予甚至进行微不足道的交易的动因。近 3 天来国家证券的行情出现微小的波动，与此有关的不是维也纳的外交活动，而是巴黎的预算。据推测，英国资本家一定参与 5 亿法郎的新巴黎公债，因而引起金融市场的紧缩，而金融市场的情况由于北美的危机（**其规模比 1837 年的危机大得多**）、最近关于东印度情况的不妙的报告、粮价上涨以及伦敦和利物浦两地的若干起出乎意料的大破产，本来就已经令人不安。如果不是俄国皇帝，那就是英国内阁无论如何正被和平幻想俘掳。过去的 100 年中，英国人民曾被本国的寡头政体拖入同法国进行大战。目前同俄国的作战是人民迫使英国寡头政体发动的。目前寡头政体所采取的一切外交、军事和财政的措施都反映出它不愿意进行这场迫使它进行的战争。甚至内阁最近的一项措施——成立外籍军团法案[310]——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打消**”英国人对这次战争的“**兴趣**”。根本不能说这个国家兵源已经枯竭，因为它每年都有 10 万以上的健康的男人迁居外国，并且这种迁居对工资水平只发生短暂的影响。也根本谈不上突然需要紧急增派辅助部队的问题，因为内阁的措施既不是为突然的援助也不为紧急的援助而采取的。议院 5 月通过的民军法案[311]使内阁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就可以征集 8 万名民军，而且经验说明，在春季编组的各个团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志愿兵转入了现役；不过，到 12 月初政府只编成了 18 个民军团（约 13500 人）。大家知道，英国人向来——不论在查理一世时代，在威廉三世统治时代，乔治前几世当政时期或反雅各宾大战时期——反对把外国雇佣兵运入大不列颠。但是，在英国国外使用外国兵竟然

引起了这样大的愤懑，这在英国历史上是一种罕见的新现象。正是这个事实证明了目前这场战争具有不同于英国当代曾经进行的一切战争的**完全独特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当政的贵族故意求助于过去时代的幽灵，求助于旧的招募者在**最廉价的**市场上招买兵士的作法。虽然它根本不相信——正如悉尼·赫伯特在下院**所承认的**——它所提出的措施会**成功**，它还是这样做。可见，它这样做，不是为了进行战争，而是为了准备媾和。为了建立合乎要求的**英国**军队，政府目前本应当提高兵士的薪饷、废除体罚、保证从普通兵士起晋级，简言之，应当使军队民主化，把军队由政府所有变为民族所有。

今天的"泰晤士报"写道："不论战时或平时，军队至今都不过是政府用来提升贵族和支持历届内阁的一个机构。"

我们现在要来谈一谈主要的一点。对英国贵族来说，**同俄国作战**意味着**丧失它对政府的垄断权**。英国贵族虽然从1830年以来，被迫奉行了仅仅有利于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国内政策，但是，由于它保持着对**外交**政策和军队的垄断权，仍然占据着政府的一切要职。然而，它只有在人民战争——**只有反俄战争**才可能是这样的战争——把外交政策变为人民的事业以前，才能保持这种垄断权。因此英国从1830年到1854年的全部外交活动归结起来不外是一个原则：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同俄国发生战争。英国近24年来在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丹麦以及地球的各个角落不断向俄国让步就是这个道理。今天的事实证明，英国贵族的打算是正确的。同俄国的战争刚一开始，"泰晤士报"自己就指出：

"贵族没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战争。寡头政体的国家机器同我国社会结构具有尖锐的矛盾。"

二

伦敦 1月1日。

“我国所有的军事指挥管理部门都在目前战争的重担下垮台了。”

这是今天的“泰晤士报”写的。实际上，如果看一看英国军事指挥管理的组织或其他任何管理机构的组织，就会觉得人们显然要在这里表明所谓宪法的均势原则。各式各样的机构彼此牵制，以致互相使对方完全瘫痪，从而使整个机构无所作为。因此，在当前的战争中才会出现伤员在巴拉克拉瓦，军医在君士坦丁堡，而药品在斯库塔里的事情。这就是克里木军队起来暴动，反对给他们带来牺牲的制度的原因；既然各级军人，从上校到普通兵士，都在破坏纪律，每周给伦敦报纸投寄上千封信，并大声疾呼地向社会舆论控诉他们的长官的行为，我们难道不能把它叫做暴动吗？因此把制度本身所造成的情况要腊格伦勋爵负责是不公正的。他负有责任，但只是军事指挥方面的责任。

回顾一下克里木战局，我们就会明白，腊格伦勋爵在阿尔马河会战中犯了第一个错误，因为他不是下令迂回俄军的右翼，而是下令迂回靠海的左翼。迂回右翼就会把一部分俄军逼向海里，把另一部分俄军逼向北要塞，而俄军现在实际上是被击退到辛费罗波尔，也就是退到对他们最有利的退却线上。如果联军在阿尔马河会战中曾经没有必要地和盲目地企图抓住敌人要害的话，那末恰恰在情况有利于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却不够坚决了。轰动一时的“向巴拉克拉瓦的侧敌行军”就是放弃对要塞北区进攻。但是

北区是居于瞰制地位的一面，因而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据点；北要塞是打开塞瓦斯托波尔的钥匙。所以，联军为了取得巩固的防御地位竟放弃了一次更大胆的、因而实际上胜利在握的进攻。

当奥美尔－帕沙在卡拉法特固守下来而没有从沃耳特尼察向布加勒斯特进军并突破敌人的拉得很长的战线的时候，他也犯同样的错误。随后开始围攻塞瓦斯托波尔。这次围攻无论如何证明了长期的和平使得军事学术的倒退同作战方法的改进（由于工业的发展）形成正比。在以往的任何一次战争中，普通的土堡都没有起过这样大的作用。起初俄军在沃耳特尼察沿用旧的一套办法——炮击这些土堡达数小时，然后发起强攻。但没有成功。卡拉法特附近的土堡使俄军无能为力，他们不敢对它们发起攻击。锡利斯特里亚的半被毁坏的土堡使俄军的全部努力化为乌有，最后，塞瓦斯托波尔的土堡线承受了比以往进攻最完备的要塞所使用过的更多的攻城炮队和更重的火炮的轰击。但是，在攻城炮还没有设置之前，不设防的城市早已成为第一流的营垒了。大家知道，10月25日，在巴拉克拉瓦会战中，英国骑兵由于违反了一切军事学术原则，遭到了完全无谓的牺牲。最后，我们谈一谈克里木战局中最大的事件，即因克尔芒会战。像普鲁士人在耶拿会战一样，在因克尔芒附近的不列颠军队占领了一系列只有沿着几条隘路才能从正面到达的高地。英军像普军一样，没有注意占领自己极左翼的高地，而缅施科夫像拿破仑在耶拿会战[312]时一样，向这个高地投入了他的一部分军队，从而在拂晓前在敌人的翼侧设防固守下来。一般不主张独创的俄国人，抄袭了拿破仑的这个作战计划，但是，当战略机动刚刚完成和战术动作应当开始的时候，西欧文明的假面具就掉下来了，并且露出了鞑靼人的本色。这支拥有许多服役

25 年的老兵的出色的俄国军队，——这个阅兵操练方面的模范——竟然如此软弱无力、如此笨拙、如此不善于用散开队形和以小部队进行战斗，以致他们的军官除了用这个笨拙的人群向敌人猛冲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办法。这个笨拙人群的简单的猛攻本来足以突破英军密集的队列；然而，一方面，这些人体密集的纵队为英国枪炮火力的毁灭性的威力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当俄军依靠数量上的优势转入白刃冲击时，英军以拿破仑的方队在金字塔会战中迎击马木留克兵时的同样的优越性迎击了他们。14000 名联军仅伤亡三分之一，就击溃了 3 万俄军，尽管人们公认俄军在战斗中表现了个人的勇敢和俄军的进攻计划比联军的计划高明。自纳尔瓦会战以来，俄军还从来没有遭到这样的失败。如果考虑到纳尔瓦会战时的俄军和因克尔芒会战时的俄军之间，即 1700 年的没有受过训练的一群乌合之众和 1854 年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军队之间有很大的区别，那末纳尔瓦会战比因克尔芒会战就显得更加出色。纳尔瓦会战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民族的第一次严重的失败，这个民族善于甚至把失败变成胜利的武器。因克尔芒会战是从彼得大帝时期以来俄国在温室发展中正在衰退的确实的征兆。在半野蛮的国家里，为了在国家半野蛮的水平上保持堂皇的文明外观所作的人为的加速进展和巨大努力，看来已经使这个民族精疲力尽并使它害上了类似肺病的病症。因克尔芒会战之对俄国步兵正如罗克鲁阿会战[313]之对西班牙步兵一样。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12 月
29 日和 1855 年 1 月 1 日
载于 1855 年 1 月 2 日和 4 日
“新奥得报”第 1 号和第 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
报刊和军事制度

伦敦1月3日。

“泰晤士报”记者从塞瓦斯托波尔营地报道：“据说，俄皇自愿用**唯一的一艘**军舰把我军5月初以前残留的东西全部送还英国。”

接着是对笼罩英国兵营的一片死亡、穷困、混乱和瓦解景象的鲜明的描写。军队的状况现在几乎成了伦敦各报社论的唯一课题。

“泰晤士报”写道：“不列颠军队从军事意义上说已经不成其为军队。这是一群勇敢的人，同时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群，甚至更坏，因为指挥它的是一些不配指挥它的人，并且因此它失去了它所固有的战斗力…… 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军统帅部纯粹是虚有其名；不但如此，优秀的军官们肯定地说，即使是下级军官来指挥军队，其所获得的成绩也不会比那些被认为是军队司令官的人逊色。我们认识到，要把那些年高德劭、忠诚正直的人一脚踢开并不那么容易。”

但是，à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打仗就应当像个打仗的样子〕。

“如果有过某个内阁曾经有可能采取这类强制办法的话，那就是现届内阁。”

为什么？

“因为它是这样顽强地反对宣战”。因此“大权在它手里，它就不应当因人事问题而束缚自己”。

狮子，你吼叫的好！因为现届内阁对俄国进行的战争并非出于自愿，所以作战当中的错误不应当归之于内阁，而只能由总司令负责，并且公众应当明白，不是内阁妨碍了腊格伦勋爵，而是腊格伦勋爵妨碍了内阁。

虽然“泰晤士报”为了给内阁解围用这样方式攻击腊格伦勋爵，皮尔派机关报“纪事晨报”却攻击“泰晤士报”，表面上是为了袒护腊格伦勋爵，而实际上是感谢“泰晤士报”承认内阁没有过失，然后利用这种承认，同时串演一通两家政府报纸间的论战把戏，以达到声东击西的目的。

规矩的“纪事报”写道：“我们痛心地指出，近日笼罩舆论界的灰心情绪要完全归罪于‘泰晤士报’的影响。用阴暗的色彩描写每一事件，夸大灾难，败坏我国将军们的应得的声誉，把英国人不背后议论人的这种家喻户晓的宽宏大量置之脑后，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耸人听闻，为了哗众取宠！其实，全部仇恨，全部恶毒的攻击主要都是对准腊格伦元帅…… 克里木军队从12月初以来所处的悲惨状况(虽然最近的消息还比较令人安心一些)，首先应当归咎于11月14日的可怕的狂风暴雨。”

内阁如此之宽宏大量，竟然不要腊格伦勋爵负11月14日的狂风暴雨的责任。这样一来，除了“泰晤士报”的追求哗众取宠之外，再没有留下别的了。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代表内阁**内部**一定的**特殊**利益的那部分伦敦报刊——从某一时候起就暗中是**帕麦斯顿**的喉舌的“每日新闻”和多年来一直是他的正式顺舌的“晨邮报”。

“每日新闻”说：“我国的行政主管部门几乎没有改变，好像它们属于米太人和波斯人时代一样。任何意外的危机都使它们措手不及。即使面临人类

生命和财产的最可怕的浩劫，它们也很少被改造得将来能应付类似的大灾难…… 军事部门也是这样。不久前任命首席陆军大臣时，人们曾经抱过多大的期望！但是情况并未因此而有丝毫改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责怪纽卡斯尔公爵呢，还是我们宁可着手改革这个处于瘫痪状态的制度本身（这个制度把国家职权完全交到具有令人难忍的势力的贵族手里）？无论纽卡斯尔公爵有怎样的功勋，他毕竟不是那个能粉碎这个制度的**官方的海格立斯**①。但是，英国人民会坚决作到这位公爵所作不到的事情。”

“每日新闻”在充当内阁的喉舌方面还是个新手。况且，它不能不顾及到它的资产阶级读者。不过一眼就可看出，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说需要一个“官方的海格立斯”。但是谁是这个官方的海格立斯呢？又怎样找到他呢？“晨邮报”回答了这个问题。它说：

“从攻击腊格伦勋爵开始就是开始得不对头。‘泰晤士报’的攻击**伤害不了**腊格伦勋爵…… 还是无须去怀疑政府在国内工作的缺点…… 就拿军事部门来说。它今后是否还应当用9个月来用过的精神和样式办事呢？…… 必须记住，在国外的军队完全依赖于英国国内的行政机关……因此，特别重要的是要使军事机关的首脑成为绝对的主人并能像主人那样行事…… 据说，**旧的制度**妨碍了这点。但是，一个真正的主人，早就会负起责任把这个制度打碎了…… 实际上，秘密在于：现届政府的首脑像一个铅锤一样压抑着各个部门的一切努力。**阿伯丁**的脉搏的微弱跳动传到各个管理机构，并对整个制度发生影响…… 改变整个制度并把一个真正的结实的头安在它的肩上吧。”

换句话说，让帕麦斯顿当首相吧。他就是“每日新闻”所幻想的那个**官方的海格立斯**，——就是那个帕麦斯顿，他在1830年由墨尔本勋爵根据俄国利文公爵夫人的提议任命为外交大臣；就

①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宙斯与凡女所生，力气非凡，屡建功勋。——译者注

是那个帕麦斯顿，他在阿富汗战争[314]中如此令人不解地使英军遭受牺牲，以致罗伯特·皮尔爵士在议会会议上公开用“揭底”来威胁他，如果他再继续用他的吹牛触怒他的话；就是那个帕麦斯顿，他把1839年由法国提出的并似乎已经安排好了的**反俄**的进攻同盟引导得如此巧妙，使它在1840年的一个早晨就变成了**反法**的英俄同盟[315]。虽然帕麦斯顿也是现政府的一个**最有势力**的成员并且在议会人士面前作为而且也**必然**作为政府的热心卫护者出现，但是，他在报刊上却不断使用外交艺术的一切手段来表明他同阿伯丁的严重的不和，从而在联合内阁一旦垮台时保全自己的威信。同时，人们阻止反对派采取断然措施并且继续使它在内阁的纠纷上处于毫无结果的紧张状态中。例如，托利党的机关报“先驱晨报”今天是第一百次陷入圈套，因为它宣布联合内阁的倒台是注定了，并且不遗余力地散布帕麦斯顿和罗素对阿伯丁、纽卡斯尔和格莱斯顿的出自爱国热忱的愤懑。Ad vocem〔关于〕**格莱斯顿**，还应当指出，正如从今天“纪事报”一篇论述法国公债的社论所得出的结论，格莱斯顿不打算采用公债，而决定用直接征税的方法，也就是采用一种最不受欢迎的、负担沉重的和非经济的税收形式来进行战争。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1月3日
载于1855年1月6日“新奥得报”第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弗·恩格斯
英军在克里木的灾难

自从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激烈的社论以后，看来英国公众对英军在克里木的处境都怀着非常激动和不安的心情。的确，英军由于一切军事指挥管理部门前所未闻的拙劣领导，英军正在迅速地趋于彻底瓦解，对于这一事实再也不能否认和掩饰了。无论对印度的酷暑或者对俾路支人和阿富汗人的凶猛攻击都毫不畏惧的那些老兵，现在备尝冬季作战的艰辛，受着潮湿和寒冷的折磨，为不间断的繁重的野战勤务所苦，没有被服和粮食，没有帐篷和掩蔽所，因而每天成百地死亡，而增援部队在开到后，又相继毁于致命的疾病。这种状况究竟是谁的罪过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英国广泛流传的答案是：这一切都是腊格伦勋爵的罪过。但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并不赞扬这位极可尊敬的勋爵的作战方法，而且我们公开地批评过他的严重失策，但是为了弄清事实的真相，应当说，造成兵士在克里木死亡的可怕灾难的原因，不是他的错误，而是英国军队整个指挥管理系统的弊病。

英军设有总司令，这对于几乎所有的其他文明国家的军队来说都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物。要是认为这位总司令真能指挥些什么，那就错了。步兵和骑兵在某种程度上隶属于他，可是炮兵、工兵和地道爆破兵却完全不受他管辖。他在某种程度上掌管军裤、上

衣和袜子，可是军大衣却又不归他管。他能使每名步兵背两个子弹盒，可是不能发给他们步枪。他可以把所有的部属送交军事法庭并施以无情的鞭笞，但是不能指挥他们移动一步。军队的调动不属于他的职权范围，粮食的供应也同他完全无关。

此外，还设有“军械总工长”。这一职务是旧时代的可怜残余，那时认为科学同兵士无关，并且在各专业兵种——炮兵和工兵——中服务的不是兵士，而是既非学者又非工匠的这些难以确定名称的人，由他们组成特别的行会或团体，归“军械总工长”管辖。这位军械总长除了管辖炮兵和工兵外，也掌管军大衣和枪械。这样一来，一切军事行动，不论性质如何，就都与他有关。

其次是军务大臣。假如上面两位人物的作用等于零，那末他的作用便小于零。军务大臣不能给任何一个部队下达命令，但是他可以阻碍每个部队的任何行动。因为他管辖军事财政部门，又因为一切军事行动都需要钱，所以如果他拒绝付钱，就等于完全否定一切军事行动。但是即使他同意出钱，他的作用仍然等于零，因为军队的给养不由他负责，这已经是他职权以外的事了。此外还补充一点，就是实际上负责军队给养并在必要时提供运输工具保障军队调动的军需部是隶属财政部的。因此，首相兼财政首席大臣可以直接影响任何一次军事行动，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加速或延缓其进程，或根本停止这一行动。大家知道，军需部几乎是比兵士更为重要的军队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大不列颠的集体的智慧认为，使军需部脱离军队完全独立并把它置于完全不相干的部门的监督之下是合适的。最后，从前由殖民大臣负责的军队的调动，现在则由不久前新设的陆军大臣负责。后者掌管从英国到中国以及印度到加拿大的军队部署。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本

身的权力同上述4个军事长官一样，并不起什么作用；军队即使采取某种微不足道的行动，也必须取得5个人的全体同意。

英国就是在这种惊人的制度的庇护下开始当前这场战争的。在本国40年和平时期内给养充足、供应良好的不列颠军队精神饱满地开始了远征，并且深信不论敌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英国都不会使自己勇敢的兵士缺乏任何东西。但是当他们在第一个停泊地加利波利刚一登陆，同法军一比较，就暴露了自己整个准备工作的水平低得可笑，全体负责官员无能得可怜。虽然那里一切必需品都比较容易得到，一切必要的指示也都预先下达了，而且登陆的部队数量并不多，但是一切都弄得很糟。每个人都忙于自己份内的事，谁也不想把在英国和平时期内没有履行过的职责承担起来。这样一来，没有一个人去完成那些直接由于战争而产生的任务。因此，轮船运来的储备品就在最初卸载的海岸上腐烂了，而军队却因住房不够不得不开到斯库塔里去。出现了无可争辩的混乱的迹象，但是既然战争刚刚开始，还可以期待在取得经验之后情况将会好转。

军队开到了瓦尔那。同英国的距离增大了，军队的数量增加了，指挥管理方面的混乱也更严重了。分别由专门的大臣掌管的5个军事指挥管理部门各自为政，在这里第一次引起了公开而明显的纠纷。野战部队感到一切都非常缺少，而瓦尔那的守备部队却应有尽有。军需部极其迟缓地征集了当地的运输工具，但是因为总司令没有为辎重队派遣护送队，所以保加利亚的车夫几乎是刚刚召集起来便又四处逃散了。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座中心仓库——有点像主要作战基地，——但是它并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却成了无穷的困难、拖延、争权以及军队、军械部门、财政部、军

需部和陆军部之间的纠纷的新源泉。一旦需要作某件事情时，每个人都力图把工作推给别人。摆脱一切责任，这就是每个人所竭力追求的。结果是一团糟，没有采取任何适当的措施。厌恶这些工作方法并且意识到军队因闲散无事而日趋瓦解，这大概对腊格伦勋爵决定冒险进行克里木远征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次远征是约翰牛整个军事制度的杰作。这个制度正是在克里木非常出色地显露了自己。当军队实际上还处于平时状态，就像在加利波利、斯库塔里和瓦尔那时那样，他们的无秩序、混乱、惊惶失措未必能够充分表露出来。但是现在，在敌人面前，在真正的战斗中，情况就不同了。俄军的抵抗使英国官员有充分的机会来表现自己的全部才干。应当承认，从来还没有一种目的在于瓦解某一军队的努力会像这些老爷们的努力这样卓有成效。从去年 2 月起派往东方去的 6 万多军队中，目前有战斗力的不超过 17000 人；其中每天死亡 60—80 人，因病离队的 200—250 人，并且很少有归队的。在 43000 名死者和病员中间，直接遭受敌人杀伤的还不到 7000 人！

最初传到英国的消息说，军队在克里木缺衣、缺食、缺住处，总之缺乏一切，说没有药品、没有外科医疗器材，说伤病员不论任何天气都是躺在潮湿寒冷的地上或者被送到停在外停泊场的拥挤的船上，没有任何照顾，也没有最简单的医疗设备；成百的人由于缺乏必需的物品而死亡。当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政府不关心作战军队的必要保障。但是很快就弄清了：如果起初事情的确有些这样，那末现在情况已不同了。运去了一切必需品，甚至还有剩余，但是不幸的是，什么也没有送到需要的地方去。药品在瓦尔那，而伤病员却在克里木或斯库塔里；被服和给

养已运到克里木海岸，但是没有人去卸；偶然被卸下来的一些东西也在海岸上烂掉了。同舰队协作的必要性成了原来就存在矛盾的各部门领导机构之间产生纠纷的新借口，这些部门必然是以争吵来保障英军的胜利的。到处都可以看到被那些仅在平时适用的条例掩盖起来的碌碌无能的现象。在欧洲一个最富庶的地区，在其掩蔽的海岸附近，停泊着成百只满载粮食的运输船，而英国兵却只能得到半份口粮；他们由于只能吃到咸肉而患坏血病，而附近却有无数的牲畜群；船上有大量的煤和木柴，而岸上燃料非常少，以致兵士不得不吃生的口粮，并且无法烘干被雨淋湿的衣服。想一想看，发的咖啡不仅没有磨成粉，而且没有炒过！粮食、饮料、衣服、帐篷、弹药等储备品成吨、成百吨地放在那些船上，船桅都几乎碰到设有营地的陡岸了，然而英军却像唐达鲁士[①]一样，什么也不能得到。大家都感到怨恨，坐卧不宁，诅咒和责备每一个渎职的人，但是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用俗话说就是“莫名其妙”。因为根据为每个人专门制订的并经过相应机关批准的全部工作守则来看，正好是现在需要做的，却没有包括在**他的**职权范围内，而**他**由于没有这种权力，就不能整顿秩序。

除了所有这些以外，阴雨连绵，天气越来越寒冷，暴雨把整个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变为一片泽国，泥水至少深达膝盖；兵士们四个夜晚至少有两个夜晚在战壕里度过，其余两个夜晚就干脆睡在沼泽地上，浑身湿透，沾满污泥，甚至连一块垫板都没有，只勉强得到帐篷的遮盖，加之整天惊恐

① 古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的国王，因得罪了神，被罚在冥府永受饥渴的苦难。他立在齐颈的水中，头上悬有熟透的果子，但是他一要喝水，水即退去，一要吃果子，果子即上升离去。——译者注

不安，根本得不到正常的休息和睡眠；长期的潮湿和寒冷引起了痉挛、腹泻和其他疾病；为数本来就不多的医务人员分散于整个营地；医疗站的帐篷内住满了3000名病员，他们都躺在湿地上，几乎同在露天一样。请想想这一切，你就不难得出结论：英军在克里木正处于完全瓦解的状态，按照伦敦"泰晤士报"的说法，就是变成了"一群勇敢的人"；兵士们都宁愿被俄军的子弹打死来摆脱这一切不幸。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好吧，假如你不想等到议会的半打法令由皇家法官郑重其事地制定出来并且经过讨论、修改、表决而列入法典，然后再将指挥管理军队的一切事务集中到一个名副其实的陆军大臣手里，再等这位新陆军大臣——假如他称职的话——重新组织自己的机构并发布新的指令；换句话说，假如你不想等到英军在克里木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话，那末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授予远征军总司令以独断独行的全权，一切由他个人负责，由他统管同他争权和作对的各军事指挥管理部门的工作，而这种全权是任何别国的总司令所享有的，没有它，总司令将必然一事无成。如能做到这一点，一切便会得到迅速纠正。但是，哪里会有这样一位英国将军愿意以古罗马人的精神办事，并且当受到责难时能用罗马人的话为自己辩护说"是的，我承认我的过错就是拯救了祖国"呢？

最后，我们应当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是谁发明并保持了这一种惊人的指挥管理制度呢？不是别人，正是已故的威灵顿公爵[①]。他维

① 本文经卡·马克思修改并发表于1855年1月8日和9日的"新奥得报"，其中有以下一段是英文原文所没有的："显然，这一制度**产生**于防范常备军的立宪措施。它以缩小军队的机动能力到最低限度的**分权**来代替可使军队具有最大灵活性的**分工**。但是，保持这一制度决不是由于议会或宪法的关系，而是另有

护了这一制度的每个细节，好像他个人所关心的是尽量给自己的继承人多制造些困难，因为他的继承人可能是他的军事荣誉的未来竞争者。威灵顿以其健全的思想而著称，但是没有什么军事才能；当他不仅是伟大天才拿破仑的同时代人，而且是战场上的对手的时候，他极其痛心地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因此，威灵顿非常嫉妒别人的成就。大家都非常知道，他在贬低自己的助手和盟友的功绩方面做得很卑鄙；甚至对连在滑铁卢救过他的布吕歇尔，他都没有饶过。威灵顿深知，西班牙战争期间，假如不是他哥哥当大臣的话，他便不能胜利地结束那场战争。难道威灵顿不是担心后人的战功将淹没他的荣誉，并且不正是因此他才丝毫未动地保留了这架最适于束缚将军们的手足和毁灭军队的军事机器吗？

弗·恩格斯写于1855年1月4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1月22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9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原因，即在改革指挥管理制度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的同时，寡头政体的势力至少在这一领域中也会被消灭。在议会的上次会议上，大臣们除了同意把陆军部同殖民部分开外，拒绝进行任何革新。威灵顿从1815年起到死为止，一直顽固地维护这一制度，虽然他深知，假如恰巧他哥哥威尔斯里侯爵不在内阁任职，那末他在**这种**制度下是绝不能把比利牛斯半岛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1832年和1836年，威灵顿在议会为改革旧制度而成立的委员会面前，全力维护旧的制度。他不正是担心这种改革会给自己的继承人取得荣誉开方便之门吗？”——编者注

卡·马克思

工 商 业 危 机

一

伦敦1月8日。伦敦的俱乐部和报纸正在郑重其事地大谈其“内阁危机”，却找不出时间来指出一件无比重要的事实，这就是：**一次巨大的工商业危机又来到了**英国，而且这次危机的破坏性就其规模来说，比1847年和1836年的危机还要大。如果说最近3个月来偶尔发生的破产（其数目和影响最近又增加了）还没有使人们承认这个事实，那末，现在在关于贸易的年度报告和Board of Trade〔贸易部〕编制的关于11个月进出口的统计公报发表以后，终于无法否认危机的存在了。这些公报表明，出口比1853年同期的11个月减少了1710677英镑，如果仅仅拿这两年的最后一个月——从11月5日到12月5日——来比较，则减少了1856988英镑。我们现在从商品输出表中抄出下列表明某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产品输出减少的详细数字。

	1853年（单位：英镑）	1854年（单位：英镑）
棉织品	23757155	22877050
棉纱	6322639	6055640
亚麻织品	4379732	3735221

亚麻纱……………………………	1069812	852763
毛织品……………………………	9470413	8566723
丝织品……………………………	1492785	1144506
机器输出…………………………	1368027	1271503

当然，**关于贸易的报告**企图把1854年的危机的责任推到战争身上，就同他们把早在1847年就已开始的危机推到1848年的革命身上一样。但是这一次连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它根据自己的原则总是用与工商业无关的偶然情况来解释危机的，——也不得不承认，1854年的破产和贸易的减少是1853年的“痉挛性的繁荣”的合乎自然的反作用的开始。换句话说，就是经济周期已经达到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投机为危机代替的阶段。**北美合众国**就是最好的证明，东方战争涉及美国的只是在这一方面，即东方战争造成了美国的造船业和船只贸易的空前发展，保证美国的某几种原料有了销路，而过去这些原料主要是或者完全是由俄国提供的。美国的危机已经延续了4个多月，现在还在继续发展，虽然在4208家银行当中有109家，即约占总数2.5%已经破产，而且在东部各工业州里，一种使工资大大降低的工业停滞已经到来，以致上月有4000多欧洲移民又“**迁回**”祖国。美国1837年的危机是**跟着**英国1836年的危机而来的。而这次事件的进程正好相反。美国首先开始破产倒闭。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充斥了英国的商品。下列数字表明了这个事实对于英国的贸易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在1853年，大不列颠大约输出了1亿英镑的商品，其中2500万输出到美国，1500万输出到澳大利亚。除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以外，最重要的销售市场就要算东印度了。但是早在1852年东印度市场上就已经商品过剩，只有采取一种全新的办法，即

经过旁遮普和信德省转到布哈拉、阿富汗和俾路支，再从这里一面进入中亚细亚，一面进入波斯来扩大贸易，才勉强使出口额保持住旧有的水平——800万英镑。而现在，那里所有的销路都堵死了，以致最近只好把商品从印度斯坦转运到澳大利亚去，这样一来就成了“把猫头鹰运到雅典去了”[316]。在一个时期内，人们由于东方战争而“非常谨慎地”把商品运去的唯一市场是**列万特**市场。但是在西蒂区，下面这一点对谁也不是秘密了：自从美国的危机和澳大利亚的停滞迫使商人竭力探寻哪里还有商品没有过剩的市场的时候起，君士坦丁堡就成了堆存各种需要推销的商品的地方，而现在这条路应当算是已经“堵住了”。至于利用最近西班牙的骚动搞走私，把西班牙所能吞下的英国商品运到那里的这条道路，同样走不通了。现在又企图在南美各国采取这种办法，虽然这些国家购买力很小是不用证明的。

因为英国的危机对整个世界的社会情况和政治局势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必须比较详细地谈一谈英国1854年以前的贸易史。

二

伦敦 1月9日。关于1849年到1853年这段时期英国工商业的增长情况，可以从下列数字来判断。不列颠港口进出的租用船只总吨位，1846年为9499000吨；1850年增加到12020000吨，1853年已经不下15381000吨，即比1843年增加了1倍。不列颠工业品和原料输出的价值，1846年为57786000英镑，1850年已经达到了71367000英镑，1853年则超过了98000000英镑，即超

过了 1842 年输出的总值 1 倍多。在这个输出额的增加上北美合众国和澳大利亚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1842 年，不列颠对澳大利亚的输出额还不到 100 万英镑；1850 年几乎达到了 300 万英镑，而在 1853 年居然达到了 14513000 英镑。1842 年对美国的输出额为 3582000 英镑，1850 年几乎达到了 1500 万英镑，而到 1853 年已不下 23658000 英镑。

从这些数字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1854 年也同 1825、1836、1847 年一样，是现代贸易史上转变的一年；第二，美国的危机只是英国产生危机的因素之一；第三，1854 年的战争——“祖国报”（Journal de l’Empire〔帝国的机关报〕）称这个战争为 une guerre pacifique〔和平战争〕是十分正确的——决没有对这次社会性的灾难起什么影响，如果说起了影响的话，那也只是起了一点阻碍的作用。个别的工业部门，如制革业、制铁业、毛织业以及造船业，都由于战争所引起的需求而得到了直接的支持。在 40 年的和平时期之后的宣战所引起的恐惧心理，在短时期内限制了投机规模。欧洲各国为了战争而签订的贷款使利率变得如此之高，以致阻碍了工业活动的过分发展，从而延缓了危机的到来。但是，和平协会[317]问道，难道战争没有使粮价上涨吗？难道粮价的上涨不等于 domestic trade〔国内贸易〕的缩减，也就是英国国内工业品消费的缩减吗？难道**国内**市场的缩小不是危机产生的主要因素吗？首先应当回忆一下，1853 年，即英国最繁荣的一年，是粮价**高昂的**年头，1854 年的粮价平均比 1853 年**低**；因此，无论是 1853 年的繁荣，或者是 1854 年危机的征兆，都不能用粮价的高低来解释。这里我们把粮价对工业的影响问题撇开不谈；但是战争对粮价的影响是什么呢？换句话说：粮价的上涨是不是因为从俄

国运入的粮食减少了呢?在大不列颠输入的谷物和面粉的总额中,俄国约占14%;由于全部进口只能满足国民消费的20%左右,所以从俄国进口的粮食约占这个消费额的2.5%。

1854年11月初公布了一个**最近的官方**报告,其中列举了大不列颠从世界各洲和各国输入的谷物和面粉的比较数字,并且列出了1853年头9个月同1854年头9个月的比较表。根据这个报告,1853年小麦的输入总额为3770921夸特,其中从俄国输入的为773507夸特,从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输入的为209000夸特。面粉的输入总额为3800764英担,其中从俄国输入64英担,而从多瑙河各公国输入的1英担也没有。在1854年这个战争年份,大不列颠从俄国输入的小麦是505000夸特,从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输入的小麦是118000夸特。谁也不敢断言,输入额减少**这样一个数目**(况且从其他国家输入的面粉增加额已抵补了这个数目)就会使丰收的1854年的粮价几乎上涨到**歉收的**1852年和1853年的水平。相反,即使**完全**停止从俄国输入粮食,也不会产生这样的影响。从**多瑙河各公国**输入的减少仍然是个谜,虽然从经济上来看,这个事实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不过这个谜是很容易猜破的。如果说联军对**俄国**的黑海港口的封锁仅仅是**名义上**的封锁,那末恰好相反,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多瑙河口的封锁是**实际上**的封锁;它们不是封锁俄国,而是封锁了土耳其和多瑙河各公国。谁不知道俄国在1812年、1828年[318]、1848年(当时是以镇压雅西和布加勒斯特的**叛乱者**为借口的)和1854年对新月的十字军征讨,部分地是由俄国南部各省同多瑙河各公国和在多瑙河一带从事贸易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贸易竞争引起的。**英国**内阁想这样来惩罚俄国:让敖德萨和塔干罗格自由地贸易,而

压制在多瑙河一带的**俄国竞争者**，封锁他们，并使英国自己得不到输入；这是多么**英明**！

三

伦敦1月16日。关于目前的工商业危机，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指出：

“不管其他商品的输出减少到什么程度，机器输出却没有受到影响。出口机器的价值不但没有减少，1854年反而比1853年有所增加。因此，别的国家现在都使用我国出产的机器。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比它们优越的地方。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和美国现在都是大工业国，其中有些国家甚至超过了我们。我们面临着一场竞赛，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那末我们就不能够胜利。现在大家从经验中都认识到，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那些限制，反而给大地主带来了损失；为了厂主的利益而实行的那些限制，反而限制了厂主；工厂工人们也逐渐发觉，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由法律规定的那些限制只能使他们受到损害。因此，应当希望他们在上述的那些国家利用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把英国从它们国内市场和其他国家的市场上排挤出去，从而使我国的工厂工人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之前，就能发觉这一点。”

威尔逊先生是“经济学家”杂志的发行人和那个口是心非的、殷勤献媚的格莱斯顿的财政部的代言人，他是一个自由的使徒，同时又是一个钻营者；此人在其杂志的一个地方根本否认国家的必要性，而在另一个地方则证明说，具体说来，决不能没有联合内阁。于是，威尔逊先生就从故意歪曲事实起，开始了自己的说教。在1854年的输出表中，有两栏是关于机器输出的。关于铁路机车的第一栏表明，1853年机车的输出总值为443254英镑，而在1854年为525702英镑，确实增加了82448英镑。正相反，包括工厂使

用的机器和其他各种机器的第二栏（机车除外）表明：1853年的输出总额为1368027英镑，1854年为1271503英镑，即减少了96524英镑。因此，把这两笔数字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输出额减少了14076英镑。这个详细数目使曼彻斯特学派[319]先生们露出了破绽。他们认为现在正是应该取消现行的那些对工厂工人有利的“限制”，即废除法律规定的妇女、18岁以下的少年和12岁以下的儿童的工作时间的限制的适当时机。为了达到如此崇高的目的，捏造一些数字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根据教友派信徒布莱特的私人刊物“曼彻斯特观察家”[320]的材料以及来自工厂区的各种商业概况的材料来看，通常是我国的剩余产品的销路的国外市场，现在正在我国过度生产和过度投机的沉重压力下呻吟。

如果说尽管出人意外地出现了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这两个新的黄金市场，尽管电报已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证券交易所，尽管铁路和轮船使得交通因而也使得交换扩大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而世界市场上仍然是商品过剩，那末请问：要是允许厂主实行十八小时的工作日来代替十一小时的工作日，危机是否要等很久才会到来呢？这是很容易计算的，用不着费什么脑筋。但是这不仅会相应地加速危机的到来，而且整整一代工人的体力、智力和生命力就将失去一半。对于我们这种说法，曼彻斯特学派可能拿这样的话来回答：

如果痛苦是欢乐的源泉，
谁还会为痛苦而忧伤？①

然而正是这个学派使整个英国充满了感伤的怨言，埋怨对俄战争

① 歌德“致祖莱卡”。——编者注

同任何战争一样要牺牲人！过几天我们将会在里子听到科布顿先生抗议基督徒相互残杀。过几个星期我们又会听到他在议会中抗议那些不使工厂儿童的生命过快燃尽的“限制”。他是否认为在所有的英雄的功绩中，只有伊罗德[①]的功绩是唯一无罪的呢？

我们同意曼彻斯特学派的看法：法律上对工作时间的限制绝不能证明社会发展的水平很高。但是，我们认为祸根不在于法律，而在于使得法律成为必要的那些条件。

四

伦敦1月22日。由于工商业危机的到来，我们不妨回忆一下，1825年财政大臣罗宾逊在宣布议会开幕的时候，曾发表了一次兴高采烈的演说，指出工商业有了空前的繁荣。可是过了几个星期，英格兰银行就有不得不停止现金支付的危险。从那时起，由于科贝特的倡导，罗宾逊得到了一个“繁荣的罗宾逊”的绰号。在英国，历史先例是受到尊重的，所以繁荣的罗宾逊不可能没有追随者。在议会的最近一次非常会议开幕的时候，国王发表御前演说祝贺国家在农业、工业和商业方面有了特别的繁荣。其实，现在连过去在某种程度上能迷惑住罗宾逊的那些**外部迹象**都没有了。大臣们的祝贺显然是英国通常用来宣布世界市场发生震荡的传统方式。比大臣们的发言更使人惊奇的是目前报刊的沉默。报刊是不是认为它能够像巴黎的文人集团用沉默的阴谋“扼杀”不合乎他们心意的书籍那样把商业危机“压下”呢？但是，行市表说明

① 即公元前40—4年的犹太国王，常用来比喻暴君。——译者注

了危机，“官报”上发表的破产名单说明了危机，“业务通讯员”的来信说明了危机。很快报纸也会谈起危机来的。在最近一周内，西蒂区有很多贸易公司已经停止支付了；其中最大的几家是：同西班牙和西印度做生意的洛涅尔甘公司；同曼彻斯特及其附近的工厂区有商业来往的罗杰斯—劳里公司；同美洲做生意的科特林格顿公司以及作为最老最殷实可靠的公司之一的奥伯提乌斯兄弟公司。这些商行的债务平均为10—15万英镑。在本周内西蒂区至少又有7家大商行要宣告停止支付。

在1月20日北明翰寄来的一封有关实业方面的信件里，我们看到对斯泰福郡南部的工业状况详述如下：

“除了根据政府的订货生产军用物资的制铁企业以外，只有少数几个企业还有订货，而且价格极低。现在8英镑10先令就可以买1吨扁铁，而在仲夏，每吨的价格是12英镑；但是即使价格这样低，也很难找到买主，因此，生产只得缩减。在北美合众国各个大的经济部门中，遭受商业危机之害最大的要算制铁业。在美国，投资额巨大的各大铁工厂几乎家家都把自己的工人抛向街头，而且没有很快再把他们招回来的希望。因此应当认为，在美国铁的消费几乎完全停止了，不能再指望从那里得到新的定货。——上星期六锡工厂〈在北明翰〉有很多工人被解雇，今天晚上〈1月20日〉又要有更多的工人被解雇。炼铜厂和铸铜厂工人们的处境也不比他们好一些，因为这里大多数的大企业都是开工不足。——现有的时新货品的定货非常之少，到各地去寻找这方面的春季定货的推销员寄来了非常不妙的消息。——金融市场的情况继续给各商业部门以有害的影响。银行抬高利率产生了极有害的影响，而现在兴隆的只有贷款这一种业务。在各小贷款处的门前人潮滚滚，期票贴现获利极大。”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1月8—22日
载于1855年1月11、12、20日和25日
“新奥得报”第17、19、33号和第4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

*四项条款

一

伦敦1月9日。维也纳发出的关于俄国接受四项条款[321]的电讯，一方面使此间交易所的统一公债券上涨——曾经比星期六的利率提高2.5%，另方面在脂油、植物油和粮食供应者中间造成真正的惊慌，因为对他们来说迅速缔结和约就意味着破产和失掉大批款项。今天西蒂区实业界的紧张气氛又缓和下来了，而且相当一致地把四项条款的谈判看做是维也纳照会[322]的谈判的再版。在完全忠于内阁的“纪事晨报”看来，现在谈论俄国真正同意作出要它作的那些保证，未免**为时过早**。俄国只不过表示愿意在三个强国所解释的那样一个基础上进行谈判。“泰晤士报”认为可以庆祝西方外交的胜利了，因而宣称：

“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推测：目前的战争势必由于那些根本不能使我国得到好处的征服或革命而引起所谓欧洲地图的修订。”

“晨邮报”说：“盟国已经作了足够的努力以便在它们的条件被接受的时候，光荣地离开战场。”

在“每日新闻”看来，俄国恢复谈判的目的是要使普鲁士更加相信俄国是温和的，是要煽起德意志各邦之间的仇恨、破坏西方强国同奥地利之间的关系。该报认为四项条款中只有补充条款才有

意义，根据该项条款，1841 年 7 月 13 日的达达尼尔海峡条约[323]应当“在限制俄国的黑海海军方面”加以修改；西蒂区已经传说政府打算拒绝这项补充条款。最后“晨报”断言，俄国使自己的最后步调同奥地利一致，为的是让它有可能摆脱对西方强国承担的义务。从新近收到的电讯可以看出，谈判不应意味着军事行动的中止。

二

伦敦 1 月 12 日。关于俄国无条件接受“四项条款”——即“三个”强国所解释的“四项”条款——的传说，现在看来纯粹是“晨邮报”和“泰晤士报”所设的 hoax〔骗局〕。我们所以特别听信这个谣言，是因为我们从波茨措-迪-博尔哥的一份最初是秘密的、但是由于华沙起义而成为众所周知的紧急报告[324]中得知这位外交能手规定了如下一项原则：

> “俄国应当做到：在任何冲突中欧洲各强国**强迫它接受的是它自己的条件**。”

因此在上述“四项”条款中我们能看到的不过是“四条”俄国的**原则**。然而即使俄国没有接受它们，我们也可以在外交能手波茨措-迪-博尔哥那里找到解释。他解释说，俄国只能从得胜的营地上对西方做出这种虚假的让步。这是保持它的威力所在的威望所必需的。然而俄国至今虽然也扩大了“营地”，但是还没有取得“胜利”。如果锡利斯特里亚陷落，“四项条款”早就会被提出来了。正如“泰晤士报”和“晨邮报”肯定说的，这“四项条款”按照“三个强国”的意图是作为谈判的基础的最低条件，可以以它为起点。现在弄清了，哥尔查科夫公爵是把它们了解为某种可以商议的最高条

件，要降低它，还必须经过一番认真的讨价还价，或者根本认为它们不过是用来作为第二次“维也纳会议”的借口。今天“晨邮报”在一篇以外交预言的夸张调子写成的 leader〔社论〕中向我们保证，在维也纳目前召开的外交会议不过是在 2 月 1 日才召开的真正的会议的准备，当然，真正的会议必定在某种程度上使整个世界震惊。

昨天在劳埃德氏大厦贴出了一张海军部的通告：

“我在 11 月 8 日〈1854 年〉的信中的最后一段曾通知说，黑海的法英海军将领奉本国政府之命把对多瑙河口的封锁扩大到对黑海和阿速夫海的所有尚在敌人手中的海港的封锁；据此，海军部部务委员责成我通知你们，使商界知道英法政府已决定自 2 月 1 日〈1855〉起开始上述封锁，而有关每个海港的封锁情况，一俟此种封锁实施，当在‘伦敦官报’上另作通知。——署名：W.A.B.**汉密尔顿**。”

可见，这里公开承认了联军舰队迄今在多瑙河口只封锁了自己的盟国，而绝不是黑海和阿速夫海的俄国海港。而内阁却一再——在 4 月、8 月和 10 月——在议会中宣布它已“严令”封锁俄国的海岸和海港。早在 12 月 21 日格兰维耳勋爵就在上院代表内阁宣布说：

“敖德萨已由 5 艘军舰封锁，军舰不断在这个海港的入口处巡航，政府是定期收到这方面的报告的。”

英国一个有名的评论作者在写给一家日报的信中对联军在实施封锁方面所采取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没有**采取的措施作了这样的总结：

“⑴英国政府从英国供给英国的敌人以继续对英国作战的费用。⑵封锁多瑙河为的是破坏多瑙河各公国的经济并使我们自己不能输入粮食。⑶敖德萨、塔干罗格、刻赤和其他地点仍然没有受到侵犯，因而得以向克里木的俄军输送增援部队、弹药和给养。⑷虚假的封锁使我国商人破产，同时却让希腊、俄国和奥地利的商人大发其财。”

“泰晤士报”也利用汉密尔顿先生的通告对内阁的“封锁外交”进行激烈的攻击。印刷所广场[325]的雷公的特点是他的雷总是 post factum〔事后〕才响。从 1854 年 3 月 26 日到今天，“泰晤士报”一直为“封锁外交”辩护。现在当它掀起的喧声已经不可能阻碍内阁的措施，同时又给自己带来声望的时候，它突然变得有先见之明了。

海军大臣，或者像这里所称的海军首席大臣**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因为暗检室的轰动一时的事业——它使邦迪埃拉兄弟被送上断头台——而闻名大陆[326]。大概很少人知道这样一件事实：正是这个格莱安爵士，在 1844 年沙皇尼古拉登上英国海岸时，不敢握沙皇向他伸出的手，而仅是鼓起勇气吻了吻它。（见“公文集”1844 年版第 2 部）

三

伦敦 1 月 15 日。关于“四项条款”的意义问题：

“2 月 1 日以前〈“泰晤士报”驻维也纳记者说在 2 月 5 日或 6 日以前〉在外交方面不会发生什么新鲜事。这样一来，沙皇有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自己的军队。如果对四项条款的每一条款都进行细节上的争论（关于这点，大概俄国大使已经收到有关的指示），那末俄国由于接受四项条款而赢得的一个月时间也可能延长到两个月；同时完全可能非常坚决地企图以法国和英国所不能接受的条件来满足奥国的要求。拆散三国同盟看来就是所追求的目的。”

这就是“晨邮报”的评论。

但是，比不列颠报刊对俄国的秘密意图所做的这些猜测更重要的是，英国报纸（当然，内阁的机关报除外）公开承认，作为谈判基础的四项条款不值得讨论。

“星期日时报”[327]写道：“当战争开始时，人们企图使全世界相信进行战争是为了摧毁俄罗斯帝国，或者至少是为了获得欧洲和平的物质保障。如果必须以所谓的**四项条款**为基础缔结和约，也就意味着过去没有做过什么而且将来也不会做什么来达到上述任何一个目的。如果这里也有胜利可言，那也仅仅是俄国所取得的胜利。”

“先驱”[328]写道：“庸才内阁越不出这四项条款的框子；它应当作为四项条款的内阁载入史册。结束这出无目的的战争的无聊喜剧吧——简直够了！只有因为害怕人民在战争的喧嚣中取得过大的影响，也可能是为了阻碍英国人争回克伦威尔为他们争得的那些权利，才会在四项条款的基础上缔结和约。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同俄国策划的旧阴谋又重新缝补起来，为什么要让俄国在和谈的借口下恢复它对欧洲的野心。”

“观察家”[329]——它在资产阶级周刊中无可争辩地占着首要地位——刊载了一篇论和谈“基础”的详尽的文章；这篇文章的要点可归结如下：

例如，文章写道：“如果必须认为那些甚至是按照对四项条款的最细致最苛求的解释而能作出的让步，可以抵偿英国在这次战争中所耗的巨额开支和它所流的全部鲜血，那末俄国沙皇在发动战争时就不失为一个杰出的国家活动家。俄国甚至不必赔偿它违反维也纳条约而每年从我国榨取去的巨额款项…… 从不久前公布的一封官方函件中看出，俄国曾经千方百计地封锁起来不许英国贸易的多瑙河口，仍然在俄国手里。关于多瑙河航行自由的条款实际上是导致早已存在的 status quo〔状态〕，因为俄国从来没有否认维也纳条约有关内河航行的条件对多瑙河也是有效的。凯纳吉条约和阿德里安堡条约的废止没有使形势发生变化，因为公认这些条约绝**不能**成为俄国向土耳其提出要求的根据。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注意到俄国应当是负责共同保护多瑙河各公国和苏丹的基督教臣民的五强国之一，那末我们认为，期望从这个变化中得到好处纯粹是幻想，因为这个变化会使俄国**瓜分土耳其**的阴谋**合法**化，而这种情况无疑只会带来极大的害处。当然有人会提醒我们说，四项条款也包括关于修改 1841 年条约的原则，也就是关于修改条约以利于欧洲强国的均势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的措词相当含糊和费解，此外，在不久前发生过

的那一切事件之后，我们决不相信预想中的变化对你们的盟国〈土耳其〉的独立的威胁会比对我们的敌人的霸权的威胁小一些……　如果约翰·罗素勋爵在回答科布顿的发言时没有庄严地在议会中宣布政府决不剥夺俄国的任何领土，那我们就会像否认绝不可信的事物一样来否认目前大概正在维也纳讨论的那个‘基础’的一切可能了。”

其实，最后一条是最重要的，因为，甚至多瑙河的航行自由也只有剥夺了俄国在多瑙河口的“领土”的情况下才有保障。这些“领土”部分是由于阿德里安堡条约和破坏1827年的伦敦条约获得的，部分是由于1836年的二月敕令和破坏阿德里安堡条约获得的[330]。“观察家”所避而不谈的一条是同1841年达达尼尔海峡条约有关的。这个条约跟1840年帕麦斯顿勋爵所签订的条约的区别，仅在于在这个条约中**法国**也是缔约的一方。两个条约的内容则是相同的。还在几个月以前，帕麦斯顿勋爵就宣布1840年的条约，当然还有1841年达达尼尔海峡条约是英国对俄国的胜利，而他自己则是这个条约的**制订者**。标志着英国对俄国的胜利的条约**被废止**，怎么又突然变为同一个英国带给俄国的失败呢？既然那时英国被自己的大臣们迷惑，在它**拥护**俄国的时候还认为它是在**反对**俄国，那末为什么不认为现在正是同样的情况呢？在议会的最近一次非常会议上，迪斯累里大叫：“用不着四项条款！”从上面引证的报刊的言论中可以看出，迪斯累里的叫喊在自由派报刊上也得到了响应。人们对俄国接受四项条款（带保留条件或不带保留条件）而产生的惊异正开始让位给对英国提出四项条款而产生的惊异。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1月9—15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5年1月13、15日和18日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新奥得报”第20、23号和第29号

卡·马克思

英国工商业的危机

在我们的报上早已指出过英国工商业的危机的最初的一些预兆，现在危机已经成了事实，这方面的最可靠的材料——不列颠贸易局和王国的最大的贸易公司的每年概况——公开地说明了这一点；许多企业破产倒闭、工厂改行不完全工作周以及表明输出减少的表报也都证明了这一点。根据最近官方的“关于贸易和航运的报告”，在12月5日截止的一个月内各项输出物资的申报价值是：

1852年 （单位：英镑）	1853年 （单位：英镑）	1854年 （单位：英镑）
6033030	7628760	5771772

1854年比1852年减少了261258英镑，比1853年减少了1856988英镑。

毫不奇怪，英国自由贸易的正式理论家竭力想证明，似乎现在的危机不是英国现存制度的正常作用的产物，它同那些大约从十八世纪末叶起经过一定的时期就出现一次的危机毫无共同之处，而相反地是偶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根据自由贸易学派的信条，既然谷物法废除了，英国的立法机构也承认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工商业危机了。然而现在摆在自由贸易派面前的，不但有丰收情况下的粮价高涨，而且有工商业的危机。而

且这还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候：除了原有的世界市场以外，又增加了像河流一样地倾泻出黄金的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通和交换扩大了一百倍。如果说自由贸易派的灵丹妙药应当经受一次考验，那末，恐怕再找不到比工商业史上从 1849 年到 1854 年这段时期的条件更为有利的考验条件了。

自由贸易派的诺言并没有兑现，自然，现在他们企图用战争来作替罪羊，就同他们在 1848 年用革命来作替罪羊完全一样。然而他们无法否认：第一，东方的冲突抑制了企业家的难以约束的钻营精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危机的到来，一部分游资则激剧集中到最近大多数欧洲强国所签订的贷款上面去了；第二，某些工业部门，如制铁业、制革业和毛织业，由于战争引起的对它们产品的异常的需求而得到了某些支持；第三，造船、颜料等工业部门——过高估计宣战的后果，造成了大西洋两岸在这些部门中的非常厉害的投机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已经表现出来的工商业活动过分发达的总趋势的一种出路。然而自由贸易派的主要理由是：战争引起了各种粮食价格的提高，正是这些高昂的价格造成了危机。

然而应当回想一下，1853 年粮价平均比 1854 年高。如果这种高昂的价格不能说明 1853 年的空前繁荣，那它们同样不能说明 1854 年的危机。1836 年发生了工商业危机，虽然这一年的粮价是低的；1824 年同 1853 年一样，都是非常繁荣的年头，然而各种粮食的价格是高的。问题在于虽然高昂的粮价使国内市场缩小了，可能使工商业的繁荣受到损失，但是如果所有的国外市场的货物没有堆积如山，在大不列颠这样一个国家里，国内市场的行情决不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粮价的高昂能够

加深和延长危机，但是不能引起危机。而且，不应当忘记，根据曼彻斯特学派的正统学说，粮价的高昂如果是自然进程造成的而不是保护关税制的措施、禁制法律和调节制[①]造成的，那末它就会完全失去自己的破坏力量，甚至可能产生良好的影响，给农场主带来好处。由于无法否认1852年和1853年的歉收是自然现象，自由贸易派也就转到1854年，并断言东方的战争起了向保护关税制同样的作用，造成了粮价的高涨，虽然这一年是丰收。因此，我们撇开粮价对工业的一般影响问题，而来研究现在的战争对粮价的，影响问题。

从俄国输入的小麦和面粉约占联合王国整个粮食输入的14%；由于全部进口只能满足国民消费的20%左右，所以俄国供给英国的只占这个消费额的2.5%多一点。根据官方的最近一个仅仅关于1853年头9个月的报告，大不列颠的小麦输入总额为3770921夸特，其中从俄国输入的为773507夸特，从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输入的为209000夸特。面粉的输入总额为3800764英担，其中从俄国输入64英担，而从多瑙河各公国输入的1英担也没有。战争开始前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1854年同期，直接从俄国各港口输入的小麦为505000夸特，而1853年为，773507夸特，从多瑙河各公国输入的为118000夸特，而1853年为209000夸特，也就是说减少了359507夸特。如果注意到1854年是丰收，而1853年是歉收，就不会有谁硬说这种减少会对粮价起比较显著的影响了。相反地，从官方的关于英国市

① 调节制是英国在实行谷物法时期的一种规定谷物税的制度。按照这种制度，谷物税在国内谷物价格上涨时则降低，而在谷物价格下跌时则提高。——译者注

场上本国出产的小麦出售情况的每周报告(这些报告只包括全国全部交易的一小部分)可以看出,在 1854 年 10 月和 11 月,售出了 1109148 夸特,而 1853 年同期售出了 758061 夸特,这就绰绰有余地补偿那似乎是对俄战争引起的输入的减少了。还可以指出,如果不是亏得英国内阁的好主意而使储存的大量土耳其小麦烂在多瑙河各公国的谷仓里(因为联军由于愚蠢或者背叛封锁了多瑙河口上的苏利纳河支流,使英国得不到供应。),那末,对俄战争甚至还不会使小麦输入额有像已经发生的这种少量的减少。在运到伦敦港口的面粉总数中,几乎有三分之二来自美国,因此应当承认,对粮食商品的贸易来说,1854 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从美国输入的缩减,要比对俄战争更严重得多。

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英国粮食丰收而粮价仍然高昂,我们会想起 1853 年"论坛报"曾屡次指出的[331],自由贸易派的错误看法造成了不列颠粮食交易的极其严重的脱销和错误,使得粮价在夏季下降到正常的水平以下,然而只有提高粮价才能保证有必要的储备和足够的订货以满足将来的粮食供应。这样一来,在 1854 年的 7、8、9、10 四个月里输入的只有 75 万夸特,而 1853 年同期却有 2132000 夸特。再加上由于废除了谷物法,英国有大量的耕地变成了牧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大丰收也可能不够吃。

赫尔贸易局的概评中说:"这样一来,联合王国在 1855 年开始的时候,储存的进口的小麦非常少,而价格几乎同 1854 年初一样高,因此直到春天,联合王国几乎要完全依靠本国农场主供应。"

1854 年英国工商业的危机未必会在今年春天以前达到高潮。这次危机的原因可以由下面不多的数字来说明:不列颠输出的原料和成品的价值,在 1846 年为 57786000 英镑,在 1853 年竟达到

9800 万英镑的庞大数字。在这 9800 万英镑当中,澳大利亚(它在 1842 年购进的货物不到 100 万英镑,而在 1850 年大约为 300 万英镑)在 1853 年几乎吞下了 1500 万英镑的货物;美国(它在 1842 年仅仅消费了 3582000 英镑的英国货,在 1850 年消费了将近 1500 万英镑的英国货)在 1853 年购买的英国货达到 2400 万英镑的庞大数字。不用说,美国的危机和可能有的澳大利亚市场的商品过剩的事实必然会反过来影响英国的贸易。美国 1837 年的危机是跟着英国 1836 年危机而来的,而现在是英国的危机跟着美国的危机而来;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危机都是同一个原因——英国现存的工业制度的作用,这种制度必然会造成大不列颠本国的过度生产和所有其他国家的过度投机——的必然产物。澳大利亚和北美的市场绝不会例外;它们都同样地依赖于英国,它们不过是整个世界市场的总情况的最鲜明的标志而已。

曼彻斯特的一个关于棉纺织业的报告写道:"我们面临着国外市场商品过剩和利润微薄——只有少数例外——的事实"。另一个关于丝纺织业的报告中写道:"通常吸收我们工业的剩余产品的大多数国外市场正经受着商品积压的沉重后果。"关于布莱得弗德毛纺织业的报告写道:"生产已经扩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商品在国外市场是找得到销路的。签订了许多冒险的交易协定而轻率地把货物运到国外,自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产生了极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

这是从我们所收到的几份由"太平洋号"轮船带来的关于大贸易公司概述中摘录下来的,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以摘录许许多多。

西班牙的革命和随后在这个地区的走私的加强,给不列颠的农产品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市场。由于东方战争引起的种种顾虑,近东市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曾是唯一的没有商品过剩的市场,但是,正如我们曾经知道的,郎卡郡在三个来月以前就着手

在这个地区捞回过去的损失，而在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消息：君士坦丁堡也被大量的棉织品、丝织品、小五金、刀类和其他的英国商品压得喘不过气来。政治事件对商业危机的发展大概起过显著影响的唯一国家就是中国。

曼彻斯特的一家公司写道："期待我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能逐渐发展的希望，现在几乎完全破灭了，目前在这个国家发展开来的暴动初看来似乎是有利于对外联系的，而现在人们认为这次暴动是这个国家经济崩溃和商业完全凋敝的开端。我们对于同中国的出口贸易的发展曾寄予很大的希望，而现在这种出口贸易几乎完全停止了。"

我们的读者大概还记得，当中国革命[332]刚具有相当大的规模的时候，我们就曾预言过今天英国出口公司所抱怨的那些破坏性的后果。

我们否认战争同工商业危机有任何联系，这次危机的征兆，当谁也没有想到战争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但是我们当然懂得，战争会大大加深大不列颠将要经过的艰苦考验。战争的延续意味着捐税的增加，而增加捐税决不是防止收入减少的手段。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1月11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5年1月26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9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啤酒店主和礼拜日例假。——克兰里卡德

伦敦1月19日。目前“晨报”上正非常热烈地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指责联合内阁“迟钝”是不是公正?乌尔卡尔特从确信内阁和俄国之间订有密约出发,成功地维护着内阁而没有使它被指责为庸碌无能。

“晨报”是伦敦报界的一个特殊现象。这家报纸是那个为了慈善目的,即为了扶助孤儿、老弱和破产者而成立的“专利的小酒店主互助会”的财产,同时无疑又是伦敦除“泰晤士报”外发行最广的日报。这决不是那个姓**格兰特**的、曾作过速记员的人所领导的编辑部的功劳。这位格兰特娶了“互助会”的一位要人的女儿,也就是娶了荷马的或者如联合起来的小酒店主所称呼的伟大的荷马的女儿。伟大的荷马让自己的渺小的女婿作了“晨报”的主编。因为“晨报”靠着这个互助会进入了所有的小酒店,甚至很大一部分 parlours〔客厅〕,所以报纸蒸蒸日上的物质基础也就奠定了。然而,这家报纸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影响应归功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实际上报纸并没有经过什么编辑,它倒像是个辩论俱乐部,每个读者都可以在上面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伦敦“可敬的”报纸的代表们不许“晨报”的编辑参加自己的行列,认为他们不够资格,所以“晨报”编

辑部为了报复，除了给自己的读者外，有时也给那些不投靠任何党派的较著名的作家腾出一些篇幅。

从“晨报”自然就要谈到**啤酒**和最近的威尔逊—派顿**啤酒法令**上去。不久前由**教士**发动的这个**政变**引起了不少笑话，并且表明莎士比亚塑造的典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出了灿烂的花朵。然而这件事情的严重方面是因教会横蛮地企图干预并且控制世俗生活而引起人民群众的**疑虑**。群众对教会已经如此冷淡，以致认为教会的这类企图只不过是 practical jokes〔恶作剧〕，而当它们令人厌腻的时候，就应当加以结束。教会派并不了解自己的处境，昨天竟横蛮地在诺定昂召开群众大会，会上建议向议会请愿，要小酒店每逢礼拜日不仅在威尔逊—派顿法令不久前规定的那几小时，而且在全天停止营业。广大的工人听众经过热烈的讨论之后，以绝大多数的票通过了一个由名叫哈顿的工厂工人提出的如下的修正案：

“请求议会每逢礼拜日关闭所有教堂和小礼拜堂。”

据说，林德赫斯特勋爵打算在议会复会后就在上院发表演说，逐条叙述对政府提出的一切非难。大家知道，在 1853 年至 1854 年的会议期间，克兰里卡德侯爵曾扮演过贵族当中反俄的反对派的首领的角色。但是，他和他的儿子登克林勋爵——在后者从俘虏营中释放出来的时候——写给沙皇尼古拉的信当然不允许再玩这样的把戏。著名的幽默作家道格拉斯·杰罗尔德在“劳埃德氏报”上评论登克林的信说：

“登克林勋爵宣称尼古拉是一个真正的伟人所根据的惊人的理由就是尼古拉释放了他登克林勋爵！女巨人在谈到 Tom Thumb①时说，我之所以把他

① 大拇指小人，童话里的人物。——译者注

称作伟人，是因为他甚至制服了我，而这里是侏儒把沙皇宣称为伟人。”

谁熟悉1841年由于土耳其—埃及事件[333]而发表的蓝皮书，并且从中知道克兰里卡德侯爵任驻彼得堡大使时在彼得堡宫廷中所占的地位，谁也就明白克兰里卡德侯爵在上院所讲的那些激昂慷慨的反俄废话，完全属于每个道地的辉格党人在上帝不给他一个政府职务的时候所醉心的那一类反对派活动。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1月19日
载于1855年1月22日“新奥得报”
第3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评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

伦敦 1月19日。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再版了他的名著"海军炮兵"[334]，增补了对这次战争的某些事件的评论。例如，他根据最新的材料和只有他才能弄到的官方资料证明：如果穹窖炮台构筑得好，防守得法，单靠舰队来对付它是不够的；用爆炸弹轰击坚固的石砌体是无效的；要想在博马松尔德和塞瓦斯托波尔所构筑的那种棱堡和穹窖炮台上打开缺口，就只能使用重炮，至少是三十二磅的攻城炮，并且按照老方法进行轰击，而军舰由于瞄准困难，不冒必然被击沉的危险，便不可能打开缺口。至于谈到克里木战局，尽管道格拉斯偏袒克里木远征军的司令官，并且由于所处的官方地位不能畅所欲言，但他得出的结论还是认为克里木远征终究是一个错误。然而，雷公"泰晤士报"难道不是发表过轰动一时的消息，说什么在40小时炮击后将以**强攻夺取**塞瓦斯托波尔吗？

"消息是从可靠方面得来的，只是为了使这个情报不被俄国人得到，本报对于将在最近数日内发生的事件没有加以详尽报道（见12月26—31日"泰晤士报"）。毫无疑问，塞瓦斯托波尔日内即可攻占。"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大家知道，"泰晤士报"曾经激烈地反对关于外籍军团的法案，因为它只是在和一般老百姓同一个时候才得知这项措施的。于是它开始埋怨起来，既发牢骚，又找内阁的麻

烦。而内阁表现得十分怯懦，为了堵住这家报纸的嘴，便扔给它一块吃的——一则强攻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并且把将军们所提出的只适用于一定条件和情况的意图变成了最后的作战计划。至于法国报纸——同样是一些半官方的机关报——也刊载了类似的新闻，这并没有使人们感到惊奇，因为当时正是发行5亿法郎公债[335]的前夜。而“泰晤士报”上了当也是可以理解的。它对于比其他报纸早一天获得的任何消息都是深信不疑的。

克里木的情况并没有很大的好转。法军病死的人数较少，骑兵有足够的马匹，步兵足额，战斗力强；而英军仍同过去一样，每天都有150人住医院，40—50人死亡；英军的炮兵没有马匹，因此骑兵不得不用自己的马匹从巴拉克拉瓦运送重炮，这样，马匹便变成全不能用的了。天气每隔两三日就要变化，雨后天气转寒，而且泥泞程度丝毫未减。几乎全部运输工具都在运送给养，——这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所以不论是火炮还是弹药都不能运到发射阵地。同时，堑壕已挖掘到敌人的工事附近；第三道平行壕已掘成，虽然无法配置火器，却必须防守以阻止敌人出击。堑壕距离最近的攻击目标有多远，无法说出，因为这方面的消息有矛盾，当然也不是官方消息。有些消息说，它们的距离是140码或150码，但根据法国的消息说，距离最近的攻击点还有240码。而法国的炮队，尽管阵地现在就已经全部构筑完毕，并已做好战斗准备，却不得不闲着没事做，因为，11月份毫无效果的乱射，使炮弹消耗殆尽，再这样乱射就未免太荒诞了。这样，俄军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有足够的时间，不仅用来修复在以往敌人攻击时被破坏的全部工事，而且用来构筑新的工事。俄军工作得非常努力，因而目前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固。现在，当各道防线已逐一由俄军占

领，并且这个城市最后一道围廓内的全部大型石质建筑已改建成多面堡的时候，进行坚决的**强攻**已完全不可能了。如果仍然要恢复围攻战，那末一切都必须从头做起，不同的只是现在炮队离城近多了，因而射击效果可能较好。然而花了多少代价才换得这种优势啊！由于必须防守如此长的堑壕而造成过度疲劳，这正是英军中出现大量病员的原因，因为兵士睡眠时间太少了。况且俄军经常出击，尽管不是每次都成功，然而足以使本来就已疲惫不堪的敌人更加疲劳。

同时，土耳其军队正陆续开到叶夫帕托利亚，将从该地进攻辛菲罗波尔，同时监视塞瓦斯托波尔的北区。这一行动又是一次战略上的错误，结果使土耳其军队和英法军队完全隔开，形成两支完全孤立的军队，给俄军造成各个击破的机会。然而这次错误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把这样多的军队继续集中在不大的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半岛，那末错误也许更大。

这便是著名的“巴拉克拉瓦侧敌行军”的后果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5年1月19日
载于1855年1月23日
“新奥得报”第3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① 1855年2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英文原文中，对这个问题叙述得比较详细：“因此我们看到，接二连三的错误便是著名的巴拉克拉瓦侧敌行军的后果。土军很可能遭受严重的失败；要知道它已经不是在卡拉法特和锡利斯特里亚作战时的土军了。纪律松弛、玩忽职守、各种装备缺乏，使土军的士气完全瓦解，而土耳其又没有另一支能代替它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和谈将因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而中断的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自从联军登陆以来，这种事件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渺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全部战史中，再没有比克里木战局更糟的了。”——编者注

卡·马克思

维也纳谈判的真正目的。——反普鲁士的辩论。——雪球暴动

伦敦 1月23日。西方强国宣称:它们的军事行动将不因维也纳谈判而片刻停止。俄国究竟能从这种虚假的谈判中获得什么**纯军事利益**呢?对于"太阳报"[336]提出的这个问题,可以给以完全确定的回答。最初克里木的守军是由(俄国的)第六军以及第五军的一部组成的。第四军在巴拉克拉瓦会战的前几天开到该地;现在第三军也在这个半岛上;12月18日第八师开到了巴赫契萨赖;第七师、第八师连同第一龙骑兵师和将近240门火炮和4个哥萨克团配置在皮列柯普。第三军的一个轻骑兵师已开往叶夫帕托利亚,该地已在它监视下。这样一来,大约有一半俄国**作战**军队(不算预备队)被配置在克里木或者敖德萨、赫尔松和尼古拉也夫的驻防区内,而第二军(由帕纽亭指挥)的一部分也要开来增援它。当然无法确定这12个步兵师和6个骑兵师由于战局失利和长途行军而遭到损失后的实际人数,因为不知道这些损失是否已由新的增援部队补足。不管怎样,它们总不会下于10万名适合军事勤务的人员,还不算可能还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陆战队的兵士和水兵。在克里木集结了至少占俄国全部武装部队四分之一的这样大量的军

队，表明当沙皇尼古拉的沃伦—波多尔斯克军队在最近几次战役中遭到的一切损失还没有获得补充的时候，争取奥地利参加新的谈判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

现在，在议会召开例会的前夕正在利用最近公布的普鲁士、奥国和法国的报告，就像在议会召开非常会议的前夕曾经利用过12月2日的条约一样[337]。内阁的机关刊物得到了一个方便的机会，用对普鲁士外交的攻击来反击对英国作战方法的攻击。两家最热心的政府报纸，“地球报”和“纪事晨报”，在反普鲁士的辩论中调子特别高。

上礼拜日这里发生的“雪球暴动”是又一个实例，说明英国人民对教会派的纠缠不已的要求和他们暗中使议会通过关于更严格地遵守礼拜日例假制的法案的抗议采取了多么奋激、尖锐、嘲笑的形式。在上礼拜日早祷的时候，圣马丁教堂附近的特拉法加广场上聚集了近五百人；人群向公共马车、出租的四轮马车、行人投掷雪球取乐。由于教堂门口的喧闹声，祈祷不得不停止。当警察来到的时候，警察便成了攻击的主要对象，几分钟以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的头已经不能左右转动，因为他们的肩上、帽上等等地方都堆满了雪。一些企图走出教堂回到营房去的兵士也被迫立即退回去，他们的英国式的恬静性格受到了严重的考验。在交战的地点不得不又增派了100名警察。最后警察动用了棒子，于是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搏斗。4个首领被抓起来了，并且被押送到警察派出所，尽管在契安多斯街和罗素街人们曾多次试图把他们从警察的手中抢救出来。昨天这些人在弯街的治安法庭受到审讯。圣马丁教堂的教会理事会的代表也出庭作证控告他们。每个主犯被判罚款40先令或两周的监禁，“雪球暴动”的史篇也就此结束。不管怎样，这次暴动

驳倒了利奈公爵的论断。这位公爵在尼德兰暴动时不愿协助约瑟夫二世的借口就是：现在是冬天，而雪和暴动是互相排斥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1月23日
载于1855年1月26日“新奥得报”
第4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

“革命的西班牙”一组论文中

未发表过的片断

卡·马克思

*“革命的西班牙”一组论文中未发表过的片断[338]

……把巴列斯帖罗斯军队［召回］到革命的旗帜［下面来］，这支军队在其长官投降之后，仍然集中在马拉加以北 10 里约[①]的普里埃果。

他[②]在第二次加迪斯远征[339]时，被莫利托尔将军部队的一个兵士俘掳，并被交给圣徒匪帮押解到马德里，在 11 月 7 日斐迪南返回首都前 4 天被处决。

《Non por suo culpa caja Riego,
Por traicion
D' un vil Borbon》

（“里埃哥之死，不是由于自己的疏怠，而是由于无耻的波旁分子的出卖。”）

当斐迪南到了马德里，“信军”[340]匪帮的军官曾去进谒致意；他们走后，斐迪南向他的内侍臣感叹说：“这还是那些狗，只是脖套不同罢了。”

修道士的人数在 1822 年达 16310 人，而在 1830 年已增到

① 法国旧长度单位 1 里约等于 4.5 公里。——译者注

② 即里埃哥。——编者注

61727人;这就是说8年中增加了45417①。从马德里“日报”上,我们看到,从1824年8月24日到9月24日的一个月间,就有1200人被枪杀、绞死、肢解,而且对付康姆尼罗斯[341]、共济会会员等的野蛮法令当时还未公布。塞维尔的一所大学被封闭许多年,起而代之的是一所训练斗牛的国立学校。

弗里德里希大帝对陆军大臣谈话时问道,在他看来,欧洲哪一个国家是最难摧毁的?当大帝看到这位大臣有些惶惑时,就替他回答说:

> “那就是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政府多年以来就千方百计地想摧毁它,但总是枉然。”

弗里德里希大帝似乎预见到了斐迪南七世王朝。

1820—1823年革命的失败是容易解释的。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更确切地说,是城市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愚昧无知、因循守旧、崇尚豪华的礼拜仪式的农村居民,大概不了解各派别之间的斗争的意义,所以只是这一斗争的消极的旁观者。有少数省份,农村居民破例积极参加了斗争,但是他们往往站在反革命一方。在西班牙,在这个“古旧风俗的仓库,在这个保存着别处早已成为破烂古董的一切东西的储藏所”里,在这个在独立战争时期还有农民带着从阿尔汉布拉宫的军火库中取来的马刺、使用远在十五世纪战争时使用过的精美的古式的钺和矛的国家里,这种事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外,西班牙的特点就是,每一个农民只要自己那可怜的茅舍门口上头有一块石刻的贵族徽记,就自命是贵族,因此一般的农村居民虽然遭受掠夺、一贫如洗,却从没有感到那种使封建欧洲其他各国农民感到痛恨的强烈的屈辱之情。在革命中起过最出色

① 在手稿中,后面涂去了“职业乞丐”的字样。——编者注

的作用的两个人——莫里耳奥和圣米格尔都承认革命派没有能够把农民的利益和城市的运动联系起来。对革命确有好感的莫里耳奥从加利西亚写信给昂古列姆公爵说：

“如果议会通过封建主权利法，从而剥夺大贵族的领地以利平民，殿下就会同为数众多的具有爱国情绪的声势浩大的军队发生冲突，这些军队将是自发地组织起来的，像法国在同样情况下发生过的那样。”

另一方面，圣米格尔（见他的“西班牙内战”1836年马德里版[342]）说：

“自由派的最大的错误，是他们没有估计到大多数人民对新法律所抱的冷漠甚至是敌对的态度。议会所颁布的许多旨在改善人民物质状况的法令，不能像客观形势所要求的那样迅速奏效。无论减少一半教会的什一税，或者变卖寺院的田产，都无助于改善下层农民的物质状况。相反，后一个措施由于把土地从能宽容体察的僧侣手里转到精打细算的资本家手中，引起了地租的提高，倒使老佃农的状况恶化。因此，这个已经因教会财产的转让而感到受辱的人数众多的阶级的迷信偏见，在遭受侵犯的物质利益的影响下就更加深了。”

革命的市民们既然这样脱离了基本的人民群众，所以在反对大贵族、农村宗教势力、僧侣和代表所有这些社会腐朽分子的国王的斗争中，便不得不依靠军队和他们的领导人。单是军队在革命阵营中这样篡夺来的地位**本身**，加上这个军队脱离群众，就已经把他们变成一种对利用他们的人有危险而对他们所应打击的敌人无害的工具。最后，上层资产阶级，即所谓的温和派，不久便对革命冷淡了，后来也就背叛了革命，他们幻想可以经由法国的干涉而取得政权，从而不费什么努力坐享新社会的成果，不让平民染指。

1820—1823年革命的积极成果，不应仅仅归结为一个帮助相当广泛阶层的人民扩大了眼界并使他们具有新的特性的伟大的酝酿过程。第二次复辟[343]也是革命的产物，社会的腐朽分子在这次复

辟中采取了同西班牙的民族生存已经不相容的形式。复辟的主要事业是把敌对局面推进到如此尖锐的地步，以致任何妥协已经毫无可能，一场歼灭战争势在必行。用利物浦勋爵本人的话来说，从来没有一次重大的政治变革比 1820—1823 年西班牙革命更温和，更少流血。因此，当我们看到 1833—1843 年的内[344]用火和剑消灭了西班牙社会中的腐朽分子①，从而背上了凶狠残暴的恶名时，我们不应当把这个时代的残酷凶暴归咎于西班牙民族的某种特性，而应当归咎于曾在法国造成恐怖统治的同一环境力量。当法国人集中了，从而缩短了恐怖统治的日期的时候，而忠于自己传统的西班牙人却分散了，因而延长了恐怖统治的日期。由于西班牙的传统，革命派就是把王位推翻了，也未必能取得胜利。在西班牙，革命要想获胜，就应当以王位追求者的身分出现。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要采取两个敌对王朝利益的斗争形式。十九世纪的西班牙当它能够使革命具有十四世纪内战的形式时，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革命。当斐迪南七世把他的弟弟唐·卡洛斯，这个神圣宗教裁判所的唐·吉诃德，遗赠给了反革命的时候，也就是他把一面君主制的旗帜——伊萨伯拉的名字——给了革命。斐迪南七世的本性是至死不改的。既然他一生中都用虚伪的诺言欺骗自由派，他能在临死的床上放弃欺骗奴才派的快乐[345]？在宗教方面他永远是一个怀疑论者！他怎么也不能相信，天下竟有人——哪怕是圣灵——会愚蠢到说出真话来。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11 月 21 日
俄译文第一次载于 1957 年第 3 期
“近代史和现代史”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手稿

① 在原稿中后面涂去“封建主和君主的政权”字样。——编者注

弗·恩格斯
喀琅施塔得要塞[346]

从查理·纳皮尔爵士得到海军首席大臣的"宣战的绝对许可"然后开往波罗的海的时候起，英国社会上比较乐观的人士就不断盼望很快传来炮击喀琅施塔得、占领通向圣彼得堡的要冲、也许（谁知道？）甚至是俄国海军部大楼的金光闪闪的尖顶上升起不列颠国旗的消息。

这些希望是根据一种非常正确的想法；这种想法就是：喀琅施塔得，对于从波罗的海一带海上向俄国发动的任何进攻来说，都是取得胜利的锁钥。攻下喀琅施塔得，圣彼得堡就在你的脚边，俄国舰队也就不再存在，而俄国就会降到彼得大帝以前那样的地位。尽管英国在波罗的海**拥有**树立这种功勋所必需的力量，如果它在小事上消耗的力量多过进攻只有次要意义的据点所绝对必需的力量，那末它就会犯最大的错误，错误的致命的后果可能表现在最近的两三次战局上。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喀琅施塔得的决定作用，那末俄国人同样明白这种作用，他们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个通向俄国的咽喉已被竖着上千门火炮的层层纲甲护卫着。

大家知道，喀琅施塔得位于一个长约五英里的小岛的东南角上；这个岛掩护着芬兰湾的狭窄部分的入口，离涅瓦河口约十六英里。岛两侧大海几乎到处都很浅，只有两条航道可供海船航行。一

条在岛以北，离它的北岸约两三英里，有 4 海沙绳[①]多深；航道在离岛的东端 4 英里处折向该岛，离东端只 1400 码，但这里的深度减少了 1 海沙绳。可见，在这条航道上航行的任何军舰的火炮都打不到岛的东北岸；只有岛的西端和东端例外。所以只有岛的这两端构筑了工事，西端是叶卡特林娜堡垒、亚历山大堡垒和米哈伊尔堡垒，东端则是喀琅施塔得要塞的垒墙和垒墙前面约一千码的沙滩上构筑的两个炮台；然而其中较大的一个炮台据说已成废墟。在岛北岸的高度上，在它的东部和西部防御工事之间，离岸足有 1 英里的沙滩上还构筑了一个炮台，然而，这个炮台始终处于 4 沙绳深的航道上的军舰的射程以外。

因此，北面这条航道由于离防御工事遥远，由于它造成航行上很大的困难，并且由于它的东南部分的深度大大变浅，应当认为不适于用来对喀琅施塔得进行任何严重的攻击的。在力量作某种分散而不致引起致命后果的条件下，可以派遣几艘较轻型的舰船利用这条航道对岛进行迂回；它们在压制了不太带威胁性的东面的炮台之后，就可能取得炮击喀琅施塔得城的有利阵地。在这个城内不仅有波罗的海俄国海军的主要的帆缆仓库和造船厂，而且有许多私人的建筑木材，因此城内充满了易燃物，只要有几发炮弹命中就可能引起熊熊大火，在一夜之间把多年中不断充实的海军仓库化为灰烬。有没有实际可能用足够数目的轻型舰船占领这样的阵地呢？只有结合重新测量水的深度来对情况作仔细的实地研究才能断定这个问题。值不值得采取这样的步骤？这一点将取决于力量的对比。我们在这里只应当作一些在远距离外根据我们掌握的

① 1 海沙绳等于 1.83 米。——编者注

最可靠情报的对照研究所能作出的结论。

这样一来，只有通向大停泊场和小停泊场（或叫做隘路）的南面航道才是主要的攻击方向。这条4沙绳深的航道在岛的西北端有几英里宽，在离内港2英里地方突然缩小到1英里宽，然后就成为一个锐角，角顶对着军港。在这地方，从奥兰尼印鲍姆沙滩直通到岛边的一个狭窄的浅滩横过航道，使航道的最大深度减到3.5海沙绳。虽然只要挖泥船稍微动一动就足以除去这个浅滩，但是俄国人竭力保存着自己军港的这个天然工事。因此，这条4沙绳深的航道（它的中部到处都不下4.5海沙绳，能保证最大的军舰通过）是到喀琅施塔得的主要接近路，而决战应在锐角的顶部展开，那里有一段1.5英里长的水路宽度不到四百码。

掩护这条航道的筑城工事是五花八门的，从彼得大帝时代的太古建筑到最新式的、有上下两三层火炮的威力巨大的工事。值得注意的是，最重要的地点是由过时的而且极不完善的筑城工事来掩护的：**这正是喀琅施塔得的弱点**。这些古老的工事是一些不大的棱堡工事；火炮配置在敞开的胸墙后面，而穹窖的火炮却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棱堡非常狭小，因此配置在上面的火炮的数量同它们的正面的宽度比起来显得太少。此外必须指出，这些火炮的半数基本上是对着浅水处的，从这些地方来的最多不过是炮艇的攻击。但是对于这样的工事来说，即使炮艇也是危险的。

与此不同，现代化工事是按照**蒙塔郎贝尔**初次宣布的原理修建的，这些原理基本上已取得普遍的承认，并且被特别广泛地运用在岸防工事的修筑上。除喀琅施塔得以外，瑟堡和塞瓦斯托波尔也是广泛采用这些原理来修筑上述工事的实例。这些工事的特点是有上下两三层火炮，下层火炮配置在穹窖里，也就是说配置在不大

的拱形室里,这里是火炮和炮手防御敌人炮火的最可靠的掩蔽部。只有上层火炮配置在没有掩盖的胸墙后面,但是由于它们的位置高于最大的三层甲板舰的上层甲板,所以能很好地防御炮弹。第一次攻击就会证明这些堡垒是否修筑得足够坚固,经得住自己火炮发射时的震动和敌人炮火的破坏力;如果是这样,它们就会是砸不破的硬胡桃了。

可以认为,在喀琅施塔得的航道区有三道筑垒线。

第一道线,即外线,呈半圆形,掩护着大停泊场的入口,也就是说掩护着4沙绳深的航道上的宽度为1英里至半英里宽的那一段的入口。这个阵地的右翼,即北翼是由下列工事构成的:**彼得堡垒**,这是位于岛上的离深水航道约一千四百码的一个不大重要的眼镜堡;**臼炮台**,也是在岛上,在往东半英里的地方,这个炮台可以看做几乎是无用的;**康士坦丁堡垒**,这是一个有威力的、背面闭合的眼镜堡,修筑在沙滩上,离航道的边沿1000码,在臼炮台的正前方。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堡垒,有两层火炮共50门。它的作用是掩护外接近地;它能扰乱正在变换成战斗队形的舰队;但是,只要驶过这个堡垒,它的半数火炮就会失去效用。

在第一道筑垒线的中央有**亚历山大堡垒**(不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在岛北端的那个堡垒),这是一个半圆形的建筑,它奠基在3海沙绳深的海中,离航道宽度变狭成半英里的地方400码。这样一来,这个堡垒能横射整个航道,尽管在平面图和地图上它显得很小,但是恰恰有三层火炮,共72门。如果这个塔形堡垒修筑得足够坚固,如果它的穹窖的通风设备良好而不致阻碍硝烟的排出,那就最少需要有两艘三层甲板舰才能对付它。

这座堡垒后面有一座古老的**卫城**——眼镜堡,它之无关重要,

从有了新堡垒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新堡垒遮断了眼镜堡的火炮的半个射击扇面。

最后，左翼，即南翼是**由里斯班克堡垒和炮台**构成的，它们修筑在大停泊场口以南。这座堡垒是上世纪修筑的，后又经过现代化的改建，因此现在它的部分火炮配置成两层，炮的总数增加到50门。但是，尽管如此，它占的面积比现代化的堡垒占的面积大得多，而它的对着停泊场方向的正面宽约有三百码，并且受到纵射火力的扫射，其中包括来自航道区的部分火力和来自吃水浅的舰只在靠西半英里的3至3.5海沙绳深的海上所可能占领的阵地上发射的全部火力。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在它的背后600码的地方修筑了**里斯班克炮台**，但是它的位置并不很适于达到这个目的。里斯班克堡垒正好在**亚历山大堡垒**南面1英里的地方，这两座堡垒的交叉火力控制着大停泊场的入口。

要攻克第一道筑垒线本身并不是那么困难的，如果它背后的第二线不用炮火支援它的话。第二道筑垒线掩护着整个大停泊场，也掩护着小停泊场的入口。它是由两座侧射防御工事构成的：**彼得一世堡垒**（旧式的、修筑得不好、像一种冠堡的堡垒，位于亚历山大堡垒以东半英里，在250码的正面上总共只有24门火炮）、**喀琅施罗特堡垒**（旧式的棱堡工事，有5个正面，其中两面对着浅海，因此是没有用的；尽管最长的对角线有400码，但火炮最多不过36门），最后，还有在中央的**商港**的西防护墙。这道防护墙由喀琅施塔得岛伸展出来直达航道，与航道形成一个直角，航道在这里只有300码宽。在这道防护墙上配置了，70门加农炮和12门臼炮，然而，看来有一部分已经拆除，因此它很少能阻碍舰船行动。这道防护墙上的火炮同彼得一世堡垒的主要正面和喀琅施塔得的两个正

面结合形成的交叉火力非常有效地掩护着大停泊场的内部;由于第一道线的火力和航道的狭窄,除了螺旋推进式蒸汽舰,任何舰船要占领良好的阵地并保持充分的力量看来是极端困难的。

直接掩护小停泊场或者说内停泊场的第三道线,在航道南面是由喀琅施罗特的第三个(东北的)正面,在航道东北面是由商港、中港和军港的垒墙构成的。军港同中港的东端形成钝角,它可以用纵射火力控制整个小停泊场,而商港和中港的南墙则用正面火力掩护它。在两墙的翼侧有几座棱堡、垒门和其他凸起部。由于航道在这里的宽度都不超过250码,战斗会是非常激烈的,但是毫无疑问,不等到舰船深入这样远,喀琅施塔得就会不得不投降了。

缅施科夫堡垒是第三道线的中央工事和唯一可能在某个时候取得实利的工事。它是商港南墙上西起的第一个棱堡。这个棱堡已经改建为一个规模巨大的塔楼,塔楼上的44门火炮分成为上下4层,这些火炮的半数以纵射火力控制小停泊场和大停泊场的大部分,但是另一半从它们的炮眼的方向来看,几乎毫无用处。4层火炮对这个建筑物的不很坚固的基础来说是否过于沉重的问题,那是很明显的。

还必须指出,喀琅施塔得的向陆一面是由几个正规的棱堡的正面掩护的,要攻克这些棱堡,就需要组织一次认真的围攻;如果仅仅以舰队为作战基地,在小岛的沼泽地上作这种围攻是有很大困难的。只能从海上占领喀琅施塔得。

不言而喻,我们只能根据最近的地形测量和军事报告的材料说明这些永备工事。近几年内也许有了某些变动,但是这些变动未必很大。

现在把上面所说的总结一下。对喀琅施塔得的任何攻击的成

败都必须在大停泊场上决定，而在这个地段能顺利反击舰队进攻的工事只是亚历山大堡垒、彼得一世堡垒、里斯班克堡垒、喀琅施罗特堡垒的两个正面、军港的西墙和缅施科夫堡垒。它们总共可以用 350 门火炮同时向进攻的敌人开火，大多数火炮都有围墙和拱顶作很好的掩护，并且通过狭窄的炮眼进行射击。其他的炮台，或者是对着攻击区的其他地段，或者是没有特大作用，或者是需要射击的目标将在它们的射程以外。问题是这样摆着的：

如果舰船本身要遭到来自军港的围墙上、缅施科夫堡垒和喀琅施罗特堡垒的侧射，那末能不能通过这条狭窄的、很复杂的航道调遣足够数量的舰只来顶住防御工事的北正面和南正面的炮火并压制住它们呢？也许海军专家将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他们不甘心等待由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根据我们在海军战术方面的有限的知识，我们说这里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即螺旋推进式战列舰的优点能产生帆力舰和明轮式蒸汽舰所不可能达到的效果。

再说一遍：喀琅施塔得的最薄弱的地方是那些旧式的堡垒。它们所处的地势最有利，并且占着大部分的空间，远不能保证火力的必要效果。如果说里斯班克堡垒经过了现代化的改建，那末彼得一世堡垒和喀琅施罗特堡垒的水平仍然极低。也许，相当容易地压制它们的火力，甚至占领它们，从而利用它们来轰击城市。但是舰船只要突入亚历山大堡垒和里斯班克堡垒一线，就可以炮击这个城市并造成巨大的损失，如果它们的注意力不过多地被各堡垒转移的话。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3 月底　　原文是英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俄文译自手稿

附　　录

附　　录

英国资产阶级

英国资产阶级[347]

由于英国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的增长，自然就会设想，他们以往对贵族阶级的态度也会逐渐改变，两个阶级之间的现存关系事实上会变得不能容忍。这种设想已为近5年的某些值得注意的事实所证实。5年以前，一个豪富的银行家琼斯·劳埃德升为贵族，获得奥维尔斯顿勋爵封号。他用他那巨额财富的一部分在北安普顿郡购置了大片领地。遵奉自己的老一套作法的贵族阶级决定让他加入到他们中间来；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百万富翁，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土地占有者。然而，他们向琼斯·劳埃德提出了哪些条件呢?他必须同银行业务和商业断绝一切联系。琼斯·劳埃德接受了这些条件。由此可见，贵族阶级对于成为贵族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的传统看法丝毫没有改变。但是，是不是所有**上层资产阶级**的代表都像琼斯·劳埃德那样好说话呢？大概不是所有的代表。不但如此，我们知道这样一件事情：一位重要官员在一生中拒绝接受贵族称号，而且不许他的儿子们在他死后接受这种称号。我们所说的就是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的令人难忘的榜样。他这个郎卡郡工业家和厂主的后裔，晚年一心想当大资产阶级的首领；虽然他早就可以成为贵族，但是他宁愿留在下院作第一名议员，却不愿意在上院占一个席位而脱离社会活动。他的一生令人信服地证明，政权的重心就在资产阶级的阶级内部。罗

伯特·皮尔在遗嘱中告诫他的儿子们，即使将来因他们的父亲的社会功绩而提出授予他们贵族封号，也不能接受它；他的遗嘱中的这一点，如果从人们记忆犹新的1848年事件的角度来看，真不愧为革命精神的榜样和先例！他临死时狠狠地报复了世袭贵族因他出身平民而赏给他的嘲笑，从他幼年来到哈罗时起，这些嘲笑便深深地伤害了他的敏感的心。约翰·罗素勋爵也仿效了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榜样。他虽然是培德福德公爵们的子弟，早就可以成为贵族，但他也没有这样做。许多年以后，他的这个决心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枢密院院长的职务几乎总是由贵族担任的，在最近一次内阁改组时，罗素担任了这个职务，所有的人都深信，他将接受贵族封号。但是没有！他宁肯继续当下院议员，拒绝了新的职位，他把他的心愿告诉了伦敦市的选民，结果再次被一致选入下院。威廉·摩耳斯沃思爵士似乎将被列为上院议员的诺言传开来的时候，他认为这是对他这个政治家的污辱并坚决地驳斥了诺言，宣布他根本不打算接受贵族封号。

这些全谈的是贵族封号。但是也许会觉得，骑士的称号——因为这个称号不致牵扯到政权上去——是用来满足资产阶级的暴发户的。戴文郡公爵的主管园丁约瑟夫·帕克斯顿爵士以及约翰·福克斯爵士的承包商升上这个等级的事实，就可以这样来解释。可是，骑士的称号是否在一切情况下都能满足资产阶级的自尊感呢？看来，不尽然。工程师斯蒂芬逊轻蔑地拒绝了这种徒有虚名的称号，而且不久以前铁路承包商达尔根也仿效了他的榜样，因为他无疑认为，接受这个称号会使他陷入令人可疑的处境。女王徒劳地到他的富丽堂皇的私邸去拜访他，而以前只有上层贵族阶级的代表才能取得这样的荣誉。这个谦逊的市民拒绝向女王陛下

低头，于是维多利亚女王抓住这位固执己见的公民的胳膊，居然说，目前封建制度需要当代工业首领的支持。

如果资产阶级从贵族阶级手里夺得一点权力，人们自然就会问，它怎样运用它新取得的影响呢？这个问题不应当从阶级观点，而应当从广泛的人文主义立场来加以考察。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是，这个变化将对英国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命运和社会条件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

某些属于所谓自由派的政治家大谈其“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盟”，但是这种思想是荒谬的，不切实际的。雇主和工人，主人和奴仆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至于说到家仆，达尔福特的最近的箴言就讲得很透澈：

他说：“想到那些照管我们的舒适和需要的男男女女，我们住宅的常住户，——我们对他们的**情感和性格**就像对**另一行星上的居民**一样了解得很少——竟同我们住在一起，就不免令人伤心。”

为了不把“两个行星的居民”混同起来，资产阶级太太们忘记了她们自己不久前也属于下层等级，竟迫使自己的女仆戴上标志她们的下等身分的“包发帽”，并且很少允许女仆穿得漂亮些，因为她们担心不这样就会失去她们作为**土地**或是**金钱**的所有者的特征。

至于各种短工，他们和雇主的关系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企业主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作了怎样的抵抗。因不久前废除“谷物法”而遭到损失的心怀不满的托利党人，帮助工人阶级赢得了这个法案；但是法案通过以后，人们便无耻地施用各种巧计、下流手段和暗中叛卖来规避它，区视察员的报告就证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代表在议会里用关于共产主义的号叫，来迎击想为劳动者

取得比较人道的生存条件的一切进一步的尝试。科布顿先生很多次就是这样做的。在企业里，多年以来，雇主们的目的就是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人所能忍受的一切极限，并通过无耻地采取合同制和挑拨一部分工人反对另一部分工人的办法，把熟练工人的工资压低到杂工的工资水平。这种制度终于逼得联合机械工人协会起来暴动。在这些日子里已经成为企业主们的家常便饭的粗鲁言词，证明企业主们是没有什么人情的。企业主们的十足无知还表现在：企业主联合会雇了一个三流文人悉尼·斯密斯，要他在报刊上替企业主说话，并发起一次反对暴动工人的文字战争。这个雇佣文人的风格和他必须完成的任务完全相称；战斗一结束，因为企业主不再需要文学作品，也不再需要报刊了，就把他们的走狗一脚踢开。如果说资产阶级的目的不在学习古典学科，那并不就是说，它在研究现代科学和现代文学。总账、账房和买卖——它认为这个教育已经够了。尽管在资产阶级小姐们的教育上花费了不少钱，但是她们得到的只是“世俗教育”的片鳞只爪，根本谈不上真正的智育或以科学丰富头脑。

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狄更斯、沙克莱、白朗特女士和加斯克耳夫人把他们描绘成怎样的人呢？把他们描绘成一些骄傲自负、口是心非、横行霸道和粗鲁无知的人；而文明世界用一针见血的讽刺诗印证了这一判决。这首诗就是，“上司跟前，奴性活现；对待下属，暴君一般。”

他们活动范围的狭窄性和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制度——他们构成这个社会制度的一小部分——造成的。俄国贵族一方面深感上面的沙皇的压迫，而另一方面又害怕下面的被奴役的群众，同样，英国资产阶级也是被箝夹在贵族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从1815年媾和以来，每当资产阶级想要反对贵族阶级的时候，它总是使工人阶级相信，工人阶级的穷困是贵族阶级的某种特权或垄断造成的。资产阶级就这样鼓动工人阶级帮助它在1832年赢得了改革法案，可是它在**为自己**争得了这个法案之后，却从此不许工人阶级为自己争得类似的法案；不仅如此，1848年资产阶级还用特别警察的木棍武装起来反对工人阶级。后来，废除谷物法被宣布为工人阶级当前摆脱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从贵族阶级手里赢得了这一点，但“大好时光”还没有来到，就在去年，贵族阶级好似为了消除将来重复类似政策的最后可能性，不得不同意对继承的不动产实施征税，而贵族阶级在1793年把继承的不动产变为继承的动产之后，就自私地自行摆脱了这种税收。想让工人阶级相信贵族建立的立法制度是它困苦境况的原因，这种欺骗的最后可能性，也跟贵族阶级的这个最后的微不足道的特权一起消失了。现在工人阶级睁大了眼睛，它开始说：“我们的圣彼得堡是在普雷斯顿！”的确，近8个月来，这个城市是一些奇异事件的见证人：14000名男女常备军在联合王国各地的工联主义者和工厂工人的物质支援下，开始了向资本家争取权力的伟大的社会斗争，而普雷斯顿的资本家也得到郎卡郡资本家的帮助。

不管这个社会斗争将来会采取哪种新形式，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它的开端。看来，它注定会变成为全国规模的斗争，并且要经过历史上还不曾有过的一些阶级。应当指出，尽管工人阶级还

可能遭到一些暂时的挫败，但是保证它取得最后胜利的伟大的社会的和经济的规律已经在发生作用了。工业的发展过去迫使资产阶级起来反对贵族阶级，而现在——移民现在和将来都在部分地促进这一点——它又在推动工人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正像资产阶级正在打击贵族阶级一样，资产阶级也将受到工人阶级的打击。对这一事实的本能的理解已经约束了资产阶级反对贵族阶级的行动。工人阶级不久前在政治上的露面使资产阶级学会了仇恨公开的政治运动，并且害怕这种运动。用这个阶级的行话来说，“正派人是不参加公开的政治运动的，先生”。上层资产阶级像猢狲一样模仿着贵族阶级的生活方式并竭力去巴结它。因此，在英国，封建主义不会灭亡，而将在已经开始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庇护下保存下来。最后战胜封建主义的光荣将属于工人阶级。只要时机一成熟，公开登上政治斗争舞台的将是三个强大的敌对阶级：第一个代表地产，第二个代表金钱，第三个代表劳动。第二个阶级正在战胜第一个阶级，同样，第二个阶级将来也不能不在政治和社会斗争舞台上让位于它的后继人。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8 月 1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 第 414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 “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　　释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1　弗·恩格斯的“欧洲战争”一文是因1854年1月3日夜英法舰队进入黑海而写的。在这一事件之前，土耳其在俄军占领多瑙河各公国（1853年6月）之后，于1858年10月向俄国宣战。俄军和土军之间的第一次大会战于1853年11月4日（10月23日）发生在沃耳特尼察附近（见注31）；不久，俄国军舰于1853年11月30日（18日）在西诺普附近的海战中歼灭了土耳其分舰队。英法舰队在黑海出现，实际上意味着英法对俄国军事行动的开始。

“欧洲战争”一文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给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许多军事评论中的一篇。这家报纸于1841年至1924年出版，由著名的美国记者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成为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该报采取进步的立场，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著作家和记者，从四十年代末起，曾经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历时10年多；寄给这家报纸的大量文章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包括了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最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家销路很广的美国报纸，通过具体材料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和它所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常常任意对待马克思寄去的文章，有时把某些文章不加作者的署名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发表，有时篡改原文。因

此，该报刊载的最有意义的、最重要的文章都没有马克思的署名。马克思对编辑部的这种作法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抗议。1854 年 3 月底，马克思坚决地向编辑部提出，或者只把军事评论作为社论发表，或者把他寄去的全部材料都不加署名发表。于是，“论坛报”编辑部便开始经常用多半是由恩格斯撰写的军事评论作为社论。在 1854 年秋天，几乎所有马克思寄去的文章都不加署名发表，其中有许多文章作为社论发表。

从 1857 年秋天起，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该报的经济状况也因此受到影响，编辑部要求马克思减少通讯稿的数量。在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给该报写稿；“纽约每日论坛报”同马克思的决裂，主要是由于编辑部中主张与实行奴隶占有制的各州妥协的人增多以及该报离开了进步的立场而引起的。——第 3 页。

2　马克思指的是 1796—1799 年拿破仑·波拿巴征讨意大利时期法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当时，法国政府利用意大利人民为反对奥地利的压迫所进行的共和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意大利建立了许多实际上藩属法国的国家；意大利的某些地区则直接并入了法国。——第 4 页。

3　指 1849 年 7 月根据路易·波拿巴政府的决定，法国对罗马共和国进行了武装干涉，结果罗马共和国被消灭，教皇恢复了世俗的权力。

路易·波拿巴有意扶持拿破仑的元帅约阿希姆·缪拉特（1808—1815 年时期那不勒斯国王）的儿子拿破仑·律西安·沙尔·缪拉特为那不勒斯国王。——第 4 页。

4　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争夺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权战争时期（1778—1779 年），普鲁士指望沙皇政府的援助，避免决战。这就加强了俄国的地位，俄国在签订和约时充当了调停人，获得了干涉德意志联邦内部事务的权利。在这以后（1780 年）俄国和奥地利之间缔结的防御同盟，使普鲁士的全部计划遭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

1800 年奥法战争时，普鲁士企图以调停人自居，但结果它自己被孤立了。

1805年第三次反拿破仑法国的同盟（奥地利、英国和俄国）战争时，普鲁士坐观事态的发展，采取中立态度。拿破仑军队在粉碎了同盟以后，于1806年也击溃了普鲁士。——第5页。

5　滤出蠓虫吞下骆驼是引自圣经的一句英国谚语，意思是说，注意小事而忽略了主要的事情。——第5页。

6　佩克桑重炮是法国佩克桑将军在1822年发明的一种海军用的加农炮；这种炮发射的是爆炸弹。——第6页。

7　1806年10月14日，普鲁士军队在耶拿会战中被歼灭，这使得普鲁士向拿破仑法国投降，并且证明霍亨索伦封建王朝的社会政治制度已经腐朽透顶。——第7页。

8　1848—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失败后，科苏特及其拥护者将斯蒂凡国王的王室宝物藏在沃尔肖伐地区，其中包括斯蒂凡国王那顶历代奥地利皇帝即位匈牙利国王时加冕用的王冠。1853年9月8日奥地利政府发现了秘藏宝物的地方，于是到处纷纷谣传某某人泄露了宝物的隐藏地点。1853年10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根据该报驻伦敦记者阿·普尔斯基的意见，错误地把这件事归罪于匈牙利革命家贝·瑟美列。

本文第一段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第9页。

9　群贤内阁是对阿伯丁联合内阁（1852—1855）的讽刺性称呼。参加这个内阁的有辉格党和皮尔派的代表。这个内阁之所以能够在执政党和托利党反对派在下院中席位彼此相等的条件下存在，是因为得到了所谓爱尔兰旅，即在英国议会中拥有六十多人的爱尔兰议员团的支持。阿伯丁组阁时，给予3个爱尔兰议员以大臣职位，因而引起了爱尔兰旅的分裂（见注116）。——第10页。

10　1854年1月6—9日，因粮价暴涨，戴文郡的一些城市发生了抢粮风潮，以后几乎扩大到全郡。参加骚动的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捣毁了粮店。风潮遭到武装镇压。——第10页。

11　“祖国报”（《La Patri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年创刊；1850年该

报反映联合保皇派，即所谓秩序党的利益，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报纸。——第10页。

12 指英、法、奥、普四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3年12月12日签署的并于1853年12月15日递交土耳其的照会。四强国向土耳其政府表示愿意进行调停以恢复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和平，并提出如下几项最重要的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俄军撤出多瑙河各公国，恢复俄土之间先前一些条约的效力，以敕令保障基督徒在土耳其的特殊权利。——第10页。

13 指1841年7月13日土耳其同俄、英、法、奥、普五国签订的关于黑海海峡的伦敦公约。公约规定，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在和平时期禁止所有强国的军舰通行。公约废除了1833年签订的对俄国有利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第11页。

14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保守派最大的日报，1785年在伦敦创刊。——第11页。

15 “旗帜报”（《The Standard》）是英国保守派日报，1827年在伦敦创刊。——第12页。

16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是英国资产阶级日报，1770—1862年在伦敦出版；是辉格党的机关报，五十年代初是皮尔派的机关报，后来成为保守党的机关报。——第12页。

17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是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1930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12页。

18 “新闻报”（《The Press》）是英国周报，托利党机关报；1853—1866年在伦敦出版。——第12页。

19 指1833年7月8日（6月26日）在安吉阿尔－斯凯莱西签订的俄土友好共同防御条约的秘密条款；根据这个条款，土耳其事实上承担了按照俄国的要求禁止外国军舰进入黑海的义务。——第12页。

20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是极端反动的德国日报，从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权奸和普鲁士容克的喉舌。

这个报纸又名为“十字报”（《Kreuz- Zeitung》），因为在报头上面印有十字。——第12页。

21 英国政论家，前外交官戴维·乌尔卡尔特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起通过他的杂志“公文集”（《Portfolio》）（见注40）和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表了有关欧洲强国秘密外交的文件，其中有许多揭露多年来一直是英国对外政策的实际领导人的帕麦斯顿的外交活动的文件。

马克思在揭露统治阶级的秘密外交方面进行了不倦的斗争，1853年他在他的一组揭发性文章“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87—461页）中除了其他史料外，还引用了乌尔卡尔特发表的文件。而马克思关于帕麦斯顿的某些文章也被乌尔卡尔特印成单行本。同时，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乌尔卡尔特，并且坚决驳斥了把他说成是“乌尔卡尔特分子”的资产阶级报刊的诬蔑性言论。马克思经常强调指出他的立场和乌尔卡尔特的立场的原则性的区别。乌尔卡尔特要求保存并巩固封建的土耳其帝国，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竭力主张通过革命的道路来解决所谓东方问题，并且认为必须使处于土耳其压迫下的各斯拉夫民族和其他民族获得民族独立。在本卷刊载的许多文章（第283页及其他几页）中，马克思指出乌尔卡尔特本人是最害怕革命的反革命者，是同无产阶级政党——唯一能够消除英国寡头政权的腐朽透顶的议会基础的政党——背道而驰的人。——第13页。

22 指帕麦斯顿短期辞退内务大臣职务（1853年12月16—24日）。帕麦斯顿采取这种蛊惑性作法是企图以内阁首脑身分重新掌权（见马克思“帕麦斯顿辞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609—612页）。——第19页。

23 “东方战争”一文是卡·马克思专门为“南非人报”写的。该报在卡普施塔德（开普敦）用英文和荷兰文两种文字出版。马克思于1853年12月通过他的妹夫约·卡·尤塔被邀为该报撰稿。马克思寄去的三篇文章，只刊载了一篇。——第20页。

24 关于土军击沉俄国战列舰“罗斯提斯拉夫号”的消息刊载于1854年1月9日的“泰晤士报”。据俄国的官方文件（“巴·斯·纳希莫夫给亚·谢

·缅施科夫的关于西诺普海战的报告”和“巴·斯·纳希莫夫分舰队在西诺普海战中的舰船损伤报告表”),“罗斯提斯拉夫号”在西诺普会战后安全回到塞瓦斯托波尔停泊场进行修理。——第23页。

25 指1850年路易-菲力浦死后法国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正统派和幼系的拥护者奥尔良派进行联合的一次尝试。1853年底,法国王位追求者正统主义者尚博尔伯爵和奥尔良派的代表奈穆尔公爵举行会晤,在这以后不久,1854年初尚博尔拜访了路易-菲力浦的遗妻。——第27页。

26 《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是在十九世纪用来表示1830年七月革命后法英之间亲近的说法。尽管说“诚意协商”,但无论在三十年代或是以后时期,英法两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其中包括在东方问题上的矛盾不止一次地尖锐化。——第27页。

27 指1853年12月5日英、法、普三国代表和奥地利外交大臣布奥尔在维也纳会议上签订的议定书。在这个议定书和以后的几次照会中,四强国一再表示要调停俄土之间的冲突。

马克思提到的法英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3年12月12日给土耳其外交大臣列施德-帕沙的这封信指出,法英舰队出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证明法英政府对土耳其的友好愿望,一旦沙皇政府试图派兵在土耳其领土登陆,这两个强国的舰队将起而保卫奥斯曼帝国。——第27页。

28 根据库楚克-凯纳吉条约(1774年),俄国获得了南布格河和德涅泊河之间的黑海北部沿岸地区(包括金布恩要塞在内)以及阿速夫、刻赤、叶尼卡列等城市,并赢得了对克里木独立的承认。俄国商船得到了自由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根据这个条约,苏丹必须给予正教教会一系列特权,特别是在第十四项条款中,规定在君士坦丁堡修建正教教堂。

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年),多瑙河口和附近岛屿以及黑海东岸自库班河口以南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划归俄国。根据这个条约,土耳其必须承认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自治,给予它们自选国君的权利。这种

自治由俄国负责保证，这等于确立了沙皇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土耳其政府还必须承认希腊为独立的国家，并颁布敕令使塞尔维亚的自治合法化。

根据**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1833年），俄国和土耳其一旦和任何国家发生战争，双方有互相援助的义务。关于这个条约的秘密条款，见注19。——第28页。

29 “奥格斯堡报”（《Augsburger Zeitung》）是人们对德国反动日报“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的称呼；1798年创刊；从1810年到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第33页。

30 **后备军**是普鲁士军队的一部分，包括在常备军和预备队中服役期满的那些年龄较大而又有服役义务的人。按照普鲁士法律，只有战时才能征集后备军。——第37页。

31 1853年11月1日（10月20日），土军从土尔图凯（多瑙河右岸）渡河到一个岛上，从那里威胁俄军占领的沃耳特尼察检疫所。然后，土军又趁指挥驻守多瑙河的俄军的一个军的丹年别尔格将军按兵不动的机会，从该岛渡河到多瑙河左岸，占领了沃耳特尼察检疫所并建立了有岛上和河右岸的炮火掩护的坚固的桥头堡。11月4日（10月23日），俄军企图把土军赶出他们所占领的阵地，结果失败了。——第40页。

32 指1853年12月15日四强国给土耳其的照会（见注12）。土耳其在1853年12月31日的复照中提出它同意在英、奥、法、普四国的调停下举行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1）维护和保障土耳其领土的完整；（2）俄军撤出多瑙河各公国；（3）恢复和遵守1841年的条约；（4）尊重苏丹的主权。1854年1月13日召开的新的维也纳大使会议同意了这些条件，然后将这些条件通知了沙皇政府。——第42页。

33 指缅施科夫在以特使的身分在君士坦丁堡期间（1853年2月28日—5月21日）代表沙皇政府向土耳其提出的要求。沙皇要求承认他对土耳其的所有正教臣民的保护权，并且力图使这一点用适当的外交条约肯定下来。——第43页。

34 “旁观者”（《The Spectator》）是英国自由派的周刊，从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第45页。

35 马克思引用1854年1月21日宪章派的周报“人民报”的材料来评述反女王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运动。

“人民报”是革命宪章派的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1852年5月在伦敦创办的。从1852年10月到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且帮助进行编辑工作。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为“人民报”写的文章外，该报还从“纽约每日论坛报”转载他们的最重要的文章。在这期间“人民报”始终不渝地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由于琼斯同资产阶级激进派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为“人民报”撰稿，并且一度同琼斯断绝了联系。1858年6月该报转入资产阶级商人手中。——第45页。

36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是英国日报，1794年在伦敦创刊；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激进资产阶级的喉舌。——第46页。

37 指瑞典和丹麦关于波罗的海发生军事行动时保持中立的声明（1853年12月）。——第49页。

38 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1838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这个集团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50页。

39 指沙皇政府1836年3月2日（2月19日）颁布的命令。这个命令规定在多瑙河的支流苏利纳河上设立俄国检疫所，检疫所实际上起着控制这一段河流船只来往的关卡的作用。——第50页。

40 “公文集”（《Portfolio》）是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的汇编的简称。“公文集，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丛刊在1835—1837年出版。新的丛刊以“公文集。外

交评论”（《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的名称在 1843 年至 1845 年期间出版。—— 第 50 页。

41　亚·索麦维尔“科布顿政策—— 英国内部敌人。和平协会和它的好战性。科布顿先生和他的隐衷。以及历史事件的故事”1854 年伦敦版第 36 页（A. Somerville.《Cobdenic Policy the Internal Enemy of England. The Peace society, its combativeness. Mr. Cob- den, His secretiveness. Also, a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In- cidents》. London, 1854, P. 36）。—— 第 51 页。

42　指科布顿的一本匿名的抨击性小册子“俄国。曼彻斯特一厂主，‘英国、爱尔兰和美国’一书的作者著”1836 年爱丁堡版（《Russia. By a Manchester manufacturer; author of《England, Ireland, and America》》, Edinburgh, 1836）。—— 第 51 页。

43　反谷物法同盟是由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 1838 年创立的。同盟要求贸易的完全自由，力求废除谷物法，以达到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目的。1846 年谷物法废除后，该同盟即不再存在。—— 第 52 页。

44　根据英国以前的惯例，在当时的大约 100 个爱尔兰贵族（1801 年合并前在爱尔兰领到土地的英国地主）中有 26 人选入上院，其余的人可以选入下院。—— 第 52 页。

45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是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周刊，1843 年在伦敦创刊；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 第 53 页。

46　‘通报’（《Moniteur》）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 versel》）的简称，政府的正式机关报；1789年在巴黎出版。——第55页。

47　1854 年 1 月底到 2 月初，阿·费·奥尔洛夫奉尼古拉一世之命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 约瑟夫举行了谈判。奥尔洛夫的使命是以俄国保证绝对不侵犯奥地利的领土并负责敦促普鲁士和整个德意志联邦也同意提供这一保证作为条件，换取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保持友好的中立。另外，沙皇建议奥地利共同保护土耳其一旦解体而在巴尔干可能建立的国家。

由于在东方问题上俄国和奥地利之间存在矛盾，奥尔洛夫的使命没有胜利完成。—— 第 56 页。

48 指 1833 年 5 月至 7 月间阿·费·奥尔洛夫以特使和俄军（前去帮助土耳其苏丹马茂德二世镇压叛乱的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利）的总司令的身分在君士坦丁堡进行的谈判。谈判的结果，于 1833 年 7 月 8 日（6 月 26 日）签订了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见注 28）。俄国在外交上的胜利使英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 第 57 页。

49 马克思指 1853 年 6 月 22 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刊载的他的一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32—142 页）。—— 第 57 页。

50 指在 1854 年初讨论的并在 1854 年 7 月颁布的丹麦王国的新的根本法（见本卷第 415—416 页）。它用削弱王国的各组成部分（丹麦本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劳恩堡）的自治权的办法加强了它们对丹麦王权的依附。这个根本法遭到强烈的反对，1863 年，由于通过了新宪法，它就被废除了。

本文最后一段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第 60 页。

51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

此处马克思是指蓝皮书“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奉女王陛下之命提交议会两院。1854 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54）。—— 第 61 页。

52 1839 年，关于英国驻喀布尔全权代表白恩士和阿富汗王多斯特—穆罕默德之间的谈判的报告提交议会。1838 年，英国政府曾经根据这个报告并按照帕麦斯顿的要求向阿富汗宣战。后来查明，一些最重要的公文被从文件专辑中抽掉了，这就使人有可能把多斯特—穆罕默德的政策说成

是明显反英的政策。——第62页。

53　1839年爆发土埃战争。战争结果，在四十年代初东方问题尖锐化了，各强国之间的矛盾也加剧了。1839年，苏丹军队进入埃及执政者穆罕默德－阿利在1831—1833年占领的叙利亚，但被击溃。西方强国由于害怕俄国单独干涉土埃冲突，坚持于1839年7月27日向苏丹提出联合照会，建议土耳其政府接受所有大国的援助。但是，由于英法争夺在近东，特别是在埃及的势力范围，英、俄、奥、普四国于1840年7月15日背着法国签订了关于各国在军事上援助苏丹的若干措施的伦敦公约。真正想指靠穆罕默德－阿利的法国不久就被迫让步，把穆罕默德－阿利丢开不管了。——第62页。

54　指开往墨尔本的英国轮船“泰勒号”的沉没；这次灾难是1854年1月21日发生在朗贝岛一带（都柏林附近）；审讯表明，“泰勒号”的全体船员都是从外行的技术不熟练的水手中招来的。——第66页。

55　*唐宁街*是伦敦中心的一条街，英国政府的所在地。

*爱尔兰旅*是大不列颠议会里的爱尔兰议员团。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爱尔兰旅的很大一部分成员是反映爱尔兰上层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天主教教权派集团的利益的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即妥协派的代表。同时，它的成员还有依靠富裕佃农的爱尔兰自由派活动家。在托利党和辉格党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爱尔兰旅加上曼彻斯特学派就能改变议会里的力量对比，影响议会内部斗争的进程，有时还能够决定政府的命运。——第67页。

56　指领导议会里的爱尔兰旅的爱尔兰资产阶级民族运动领袖奥康奈尔和辉格党领袖们在1835年2月签署的协定。因为谈判是在伦敦利奇菲耳德勋爵的府邸举行的，所以这个协定被称为利奇菲耳德府邸协定。——第67页。

57　*“艺术和骗术协会”*是马克思对1754年成立的带有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和慈善性质的艺术和手工业协会的称呼；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这个协会的领导人是阿尔伯特亲王。该会冠冕堂皇地宣布它的宗旨是：“鼓励艺术、手工业和商业”并奖励那些帮助“为贫民提供生计、扩大商业、使

国家富足等等的人”。1853年，艺术和手工业协会为了达到阻挠英国群众性罢工运动发展和宪章派酝酿成立工人议会（见注92）的目的，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1854年1月，协会举行会议，与会的约有二百个属于各个派别的人。厄·琼斯企图提出一个承认工人有罢工权利和谴责同盟歇业的决议案，但琼斯被禁止发言。在这以后，他和他的同伴退出了会场。结果，会议成为空谈同盟歇业、罢工、工资水平等问题的会议。——第67页。

58 指所谓的卢森堡委员会——由路易·勃朗主持在卢森堡宫开会的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1848年2月28日法国临时政府在要求建立劳动部的工人的压力下成立的。这个由工人和企业主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的实际活动是调解劳动纠纷，由于路易·勃朗的妥协政策，这些活动常常对企业主有利。在1848年5月15日人民群众发动后，政府于1848年5月16日撤销了卢森堡委员会。——第67页。

59 1849年奥俄两国政府要求土耳其政府引渡1848—1849年革命被镇压后逃亡到土耳其的匈牙利和波兰的革命者。由于害怕俄国在土耳其的势力增强的英法两国施加压力（英国分舰队于1849年12月进入达达尼尔海峡），这个要求当时被撤回了。——第70页。

60 特惠条例（来源于拉丁字capitulare）是规定给予东方国家（其中包括土耳其）中的欧洲各国臣民以商业上的优惠和特权的文件（见卡·马克思“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本卷第178—187页）。——第71页。

61 教皇因阿拉贡的国王斐迪南（1479—1516）从西班牙驱逐摩尔人有功而赐予的一个封号，后来被罗马教皇经常用来称呼西班牙的国王。马克思在这里讥讽地使用这个封号。——第71页。

62 指莱·弗·辛普森的著作“东方问题：莱宁根伯爵和缅施科夫公爵使团访问君士坦丁堡以来所发生的历次事件的始末”。1854年伦敦版（L.F.Simpson.《The Eastern Question: a Connected Narrative of Events from the Missions of Count Leiningen and Prince Menschikoff to Constantincple,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1854）。马克思在下面引证

的有关奥土争夺门的内哥罗而发生的冲突的材料，见该书第3—6页和第8—10页。——第72页。

63　指1821年春爆发的希腊起义。这次起义是由希腊爱国者的各秘密协会（赫特里）准备的。1821年3月亚历山大·伊普西朗蒂——曾领导过敖德萨的一个赫特里的在俄军中供职的希腊籍军官——的部队渡过普鲁特河进入多瑙河各公国，企图潜入希腊。这是这次起义的信号。伊普西朗蒂部队的进军结果失败了，但是推动了不久以后席卷全国的群众性起义。1822年1月，在厄皮达夫尔召开的国民议会宣布了希腊的独立，并且通过了宪法。土耳其苏丹由于光靠自己的力量对付不了起义的希腊人，便求助于它的藩臣，埃及执政者穆罕默德-阿利。穆罕默德-阿利的军队在伊布拉吉姆-帕沙的指挥下侵入摩里亚（伯罗奔尼撒），到处残杀希腊居民。在起义之初，神圣同盟各强国，其中包括沙皇俄国对起义抱有强烈的反对态度。但是英国、沙皇俄国和法国看到希腊人的斗争到处获得极大的同情，而主要是可以利用这个斗争来巩固自己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影响，于是承认了希腊为交战的一方，并给予它以军事援助。俄国在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对希腊赢得独立具有决定的意义。由于俄国的胜利，土耳其不得不承认希腊为独立国家。但是根据欧洲各强国的统治集团的决定，把反动的君主制度强加给了希腊人民。——第73页。

64　指1854年1月29日拿破仑第三给尼古拉皇帝的信。该信载于2月14日“总汇通报”，1854年3月6日转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第77页。

65　*第一次维也纳照会*是恩格斯对俄土之间的折衷协定草案的称呼。这个草案为奥地利大臣布奥尔拟定，1853年7月底在维也纳法、英、普三国大使会议上通过。照会规定苏丹必须遵守库楚克-凯纳吉条约（1774）和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并维护奥斯曼帝国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不可侵犯性。按照会议的决定，照会应先送交给沙皇，如果沙皇同意，再送交苏丹。尼古拉一世同意照会的内容，但保留按照自己的意见解释这个照会的权利。土耳其苏丹则提出一系列修正意见和附带条件作为同意

签署这个照会的先决条件，而沙皇政府认为这些修正意见和附带条件都是他不能接受的。——第78页。

66 恩格斯指的是1793年至1815年的英国对法国的战争。——第79页。

67 本文最后原有“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一段：“在另外的地方，本报驻伦敦记者暗示他不愿相信这种背叛行为，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理智最终必须承认这些事实。在西方强国采取这样绝望的措施以求摆脱战争以后，很难设想，还有什么事情它们做不出来。”编辑部这里所说的驻伦敦记者指的是阿·普尔斯基。——第81页。

68 本文中所刊载的消息是斐·拉萨尔在1854年2月10日的一封信中告诉马克思的。马克思认为把普鲁士政府的计划，其中包括逮捕民主主义者的意图公布于世，可以阻止这些计划的实现。——第82页。

69 马克思在本文和后面几篇分析英国议会关于战争的辩论的文章里利用了“泰晤士报”的速记记录，这些记录有时在事实上有出入并有刊误的地方。马克思多半是利用伦敦出版的汉萨德的“议会辩论”（《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来分析前几年的议会辩论的。

本文第一段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第85页。

70 根据英国议会沿用的议事程序，在讨论某些重大问题时，下院可以宣布自己为全院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whole House），这等于不公开的会议；在这种会议上，执行主席（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s）职务由下院议长专门指定主席名单中的一人担任。在讨论有关抵补国家开支的一些重大问题时，下院的会议即为筹款委员会（Committee of Ways and Means）。——第85页。

71 1844年，英国内务大臣格莱安为了讨好奥地利政府，命令邮政主管部门把意大利流亡革命家的信件交给警察当局秘密检查。在其他一些信件中发现了邦迪埃拉兄弟写给马志尼的信，信中叙述他们远征卡拉布里亚的计划。在实现这次远征时，参加者被逮捕，邦迪埃拉兄弟被枪杀。——第86页。

72 1851年5月，法国大使拉瓦累特到达君士坦丁堡，向苏丹转达了法兰西

共和国总统路易- 拿破仑关于尊重耶路撒冷天主教会的一切权利和特权的要求。苏丹于 1852 年 2 月 9 日颁布敕令承认从前一系列法土条约所规定的法国的权利。而俄国外交也在为正教教会争取同样的特权；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实际上是俄法两国在东方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这样就使得俄法关系日趋尖锐，而成为以后的克里木战争的起因之一。—— 第 88 页。

73　1827 年 10 月 20 日，在纳瓦林（现在的皮洛斯—— 希腊的城市和港口）附近，土埃舰队同英国海军上将爱·科德林顿指挥的英、法、俄联合分舰队发生了会战，这支联合分舰队是欧洲列强派往希腊海面武装调解土耳其和希腊起义者之间的战争的。这次会战是因土耳其统帅部拒绝停止残杀希腊居民而开始的。结果，土埃舰队全军复没，并且加速了俄国赢得胜利的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的爆发。在纳瓦林会战中，俄国分舰队，特别是米·彼·拉扎列夫所指挥的“阿速夫号”旗舰起了出色的作用。—— 第 92 页。

74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772 年至 1937 年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中叶是纠集在帕麦斯顿周围的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 第 102 页。

75　指 1825 年 10 月 16 日（4 日）俄国驻法国大使波茨措- 迪- 博尔哥给总理大臣涅谢尔罗迭伯爵的紧急报告。这个紧急报告是对 1825 年 8 月 18 日（6 日）涅谢尔罗迭按亚历山大一世的指示草拟的通令的答复，通令征询俄国驻外使节对西方强国在东方问题上所采取的对俄政策的实质和对俄国外交路线的意见。波茨措- 迪- 博尔哥在他的紧急报告中分析了各强国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进而建议俄国对土耳其直接采取军事行动。这个紧急报告载于“关于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1854 年巴黎版（《Recueil des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Russie 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édits utiles à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Paris，1854）。这个文件集于 1853 年 7 月在巴黎第一次出版，标题是“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未经发表的文件和其他历

史文件是有益的（1853年7月）。”（《Recueil des documents 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édits et d’autres pièces historiques utiles à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 (juillet 1853)》）。——第103页。

76 见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历史”，1835年圣彼得堡版第11卷第1章第23页（《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т. XI，Спб. 1835，гл. I，стр. 23）。——第103页。

77 马克思这里说的反对法国的神圣同盟是指1840年英国孤立法国的外交活动（见注53）。

达达尼尔海峡条约（见注13）。——第105页。

78 指1854年1月爆发的希腊居民的暴动。这次暴动席卷了许多并入土耳其帝国版图的希腊地区。暴动者力争同希腊合并，希腊曾派兵到暴动地区去。土耳其政府依靠英法的支持，于1854年6月镇压了这次暴动。——第108页。

79 1788—1790年奥土战争期间，奥地利军队占领了塞尔维亚（1789）。在英国和普鲁士的压力下，奥地利于1791年在西斯托夫（斯维施托夫）和土耳其缔结和约。根据这个和约，奥地利必须撤出它所占领的一切地区。——第108页。

80 Nervus belli是罗马谚语：pecunia est nervus belli（金钱是战争的神经）之略。——第110页。

81 指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贝列拉兄弟在1852年开办的一家法国大股份银行。该银行同拿破仑第三政府有密切联系，它在政府的庇护下进行投机活动；1867年破产，1871年倒闭。——第110页。

82 1846年2月在波兰各地准备举行以波兰民族解放为目的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是由于贵族阶级分子的背叛和起义领导人被普鲁士警察当局逮捕，总起义被破坏了，只有个别地方爆发革命。2月22日起义者仅仅在从1815年起由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

共管的克拉科夫共和国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该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同时加里西亚的乌克兰农民也举行了起义。克拉科夫起义于1846年3月被镇压下去，接着，奥地利政府又镇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关于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第113页。

83 根据1849年8月6日奥地利与撒丁王国（皮蒙特）签订的和约，皮蒙特应付给奥地利7500万弗罗伦的赔款。

1853年奥地利政府在伦巴第和威尼斯没收了流亡在外的1848—1849年革命参加者的财产。——第114页。

84 边屯区——十六至十九世纪时期奥地利帝国南部地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和巴纳特）被称为边屯区，那里的居民（边屯区居民）必须服边防兵役才能使用土地。——第115页。

85 1789年在奥属尼德兰（比利时）发生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民族起义，即所谓布拉班特革命。起义于1791年被奥地利军队镇压。——第116页。

86 见注26。——第117页。

87 沙多勃利昂。“维罗那会议。西班牙战争。谈判。西班牙的殖民地”1838年布鲁塞尔版第1、2卷（Chateaubriand.《Congrès de Véronne. Guerre d'Espagne. Négociations. Colonies espagnoles》. T. Ⅰ—Ⅱ. Bruxelles, 1838）。——第122页。

88 指1834年4月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所谓四国同盟）之间签订的条约。这个条约表面上反对专制的“北方强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而实际上却使英国有可能借口在军事上援助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反对葡萄牙的王位追求者唐·米格尔和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来巩固它在这两个国家的地位。这是英法关系恶化的原因。——第122页。

89 指1846年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同唐·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的婚姻，以及路易莎—斐迪南的公主同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的儿子蒙潘

西埃公爵的婚姻。由于伊萨伯拉没有直系继承人，蒙潘西埃公爵便成了第一批西班牙王位追求者中的一个。法国外交的这一胜利引起当时支持法国反路易—菲力浦政府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英国强烈不满。——第123页。

90 1838年，由于多斯特—穆罕默德（阿富汗的艾米尔）拒绝同英国结成反对伊朗和俄国的同盟，英国不能把阿富汗变成执行自己的政策的工具，于是决定用军事干涉的办法推翻多斯特—穆罕默德，并且扶植自己的走狗舒扎沙赫为王。英国军队侵入阿富汗，几乎把阿富汗全国抢劫一空，俘掳了多斯特—穆罕默德；但是，英国人的统治并没有继续多久。由于1841年11月的人民起义，英国军队被击滑并被歼灭。1842年，英国人又作了一次征服阿富汗的尝试，结果仍然彻底失败了。——第123页。

91 1851年，中国发生了带有强大的农民战争性质的反封建的解放运动。在战争过程中，起义者建立了“太平天国”，从此这一运动被称为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起义者消灭了统治中国的满清封建主，废除了赋税，取缔了大封建所有制。这次起义还具有农民运动特别是东方农民运动特有的宗教色彩，打击了作为满清王朝的支柱的佛教僧侣和寺院。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制度和异族侵略者的广泛斗争奠定了基础，但没有能够消灭中国的封建生产方式。在太平天国内部形成了同统治阶级妥协的封建上层，这是运动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英、美、法的公开干涉给这次革命以重大打击，在1864年这些国家的武装力量同中国封建主的军队一起把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了。——第124页。

92 由于1853年英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罢工运动的高涨，以琼斯为首的宪章派提出了成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群众运动”的思想，这一组织的任务是把工联以及未加入组织的工人联合起来，而首先是使全国各地的罢工协调起来。这一组织应当由定期召开的工人议会领导，工人议会由没有加入组织的工人的群众大会和参加“群众运动”的工联的会议选出的代表组成。工人议会于1854年3月6日在曼彻斯特开幕，1854年3月18日开幕。工人议会讨论并通过了“群众运动”纲领，成立了由5人组成的

执行委员会。被选为议会名誉代表的马克思曾给议会写了一封信（见本卷第133—134页），在3月10日的会上宣读了这封信。马克思在信里提出英国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马克思认为工人议会的召开具有重大意义，把它看做是使英国工人运动摆脱工联主义的狭小框子的一种尝试，是向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结合前进了一步。

但是，组织“群众运动”的尝试没有成功，因为工联的大多数领袖反对政治斗争，不支持建立一个统一的群众性工人组织的主张。同时，1854年夏季罢工运动的低落也对广大工人群众参加运动起了不利的影响。1854年3月以后，工人议会再没有召开会议。——第125页。

93　见注58。——第125页。

94　**宪章派全国协会**于1840年7月成立。这个协会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工人政党，在宪章运动高涨的年代参加的人数达到4万人。在协会的活动中，表现出协会会员中缺乏思想上和策略上的统一，表现出大多数宪章派领袖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宪章派在1848年遭到失败后，先进的、向往科学共产主义的革命宪章派的代表，首先是厄·琼斯，在五十年代初曾试图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组宪章运动。这一点在1851年宪章主义公会通过的纲领中可以看出。在五十年代后半期，由于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取得暂时的胜利和宪章运动的低落，这个协会实际上停止了自己的活动。——第126页。

95　指1854年2月21日（9日）尼古拉一世同法英断绝外交关系的宣言；尼古拉一世在1854年2月9日（1月28日）给拿破仑第三的信里拒绝在东方问题上作任何妥协。——第127页。

96　**南海公司**是1712年前后在同南美和太平洋各岛进行贸易的幌子下在英国成立的；其真正目的是进行国家证券的投机。该公司从政府那里得到许多特权和垄断权，包括国家有价证券的发行权，并展开了大规模的投机活动，结果公司在1720年宣告破产。破产的结果欠下了巨额国债，格莱斯顿在1853年曾试图用收购该公司贬值的股票的办法抵偿一部分国

债。——第132页。

97　希腊独立战争——见注63。——第140页。

98　弗·恩格斯所写的“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一文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一些文章一样，同时载于两个报刊上。像在其他类似场合下一样，由于手稿失落，因此俄译文只能根据现有的已刊登出来的文章中最完整、最可靠的文章翻译出来，而遇重大异文，则在脚注中注明。本篇俄译文是根据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所刊登的原文翻译的。——第143页。

99　崩采耳维茨（即维尔本）营垒是在七年战争期间根据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命令于1761年建立的。

托列斯—维德拉斯工事（在葡萄牙境内塔霍河和大西洋海岸之间）是1810年为了掩护里斯本免受法国进攻，根据威灵顿的命令而修筑的。

奥地利大公卡尔的军队在第三次反拿破仑法国的同盟战争（1805年）时期所修筑的工事，位于离维罗那不远的地方。

在上述三次战争中这些阵地都没有被敌人攻占。——第145页。

100　指英国驻彼得堡公使西摩尔勋爵同英国外交大臣关于西摩尔和尼古拉一世于1853年初就土耳其问题所进行的谈判的秘密往来的公文。对谈判的进程和英国政府在谈判中所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马克思在本文和本文后面的一篇文章“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见本卷第160—177页）中作了详细的分析。——第148页。

101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étersbourg》）是俄国外交部的机关报，它以这个名称于1825年至1914年在彼得堡用法文出版。

这里指的是1854年3月2日（2月18日）“圣彼得堡报”就约翰·罗素1854年2月17日在下院的发言（见本卷第87页）所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暗示沙皇政府和英国政府在土耳其问题上狼狈为奸，并引1853年西摩尔的秘密往来的公文和1844年的备忘录作为证据。——第148页。

102　马克思指普鲁士政府对他经常进行的监视。在五十年代，普鲁士驻伦敦大使本生在英国当局的某种帮助下曾是这种监视的组织者之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信件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们的信件遭到暗中检查。——第 159 页。

103　本文写成的日期是根据马克思的笔记本确定的。“纽约每日论坛报”误刊为“1854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第 178 页。

104　按照英国从 1662 年起实施的法律，对于向任何教区济贫所申请救济的贫民，可以根据法院的决定强迫他们返回原居住地。1854 年 2 月 10 日曾向下院提出了禁止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实行强迫贫民迁移的法案。——第 179 页。

105　1854 年 3 月 12 日法国、英国和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签订了一项条约，根据这项条约，盟国有义务在海军和陆军方面给予土耳其军事援助，而土耳其未经英法同意不得同俄国进行和谈和签订和约。——第 179 页。

106　乌列玛——中近东伊斯兰教国家中的最高等级：神学家和法学家，它掌握着诉讼程序和一切宗教机关和学校的管理权；乌列玛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第 179 页。

107　贝尔贝莱国家——在十九世纪文献中采用的对于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等）的称呼。——第 180 页。

108　塞·法明“基督教会在东方的竞争和对它们进行保护的历史”1853 年巴黎版（C. Famin.《Histoire de la rivalité et du protectorat des églises chrétiennes en Orient》，Paris，1853），第 13 页；下面引自第 15、49、50 页和 54—55 页。——第 180 页。

109　《Capitulations，ou Traités anciens et nouveaux entre la cour de France et la Porte ottomane，renouvelés et augmentés l’an de J. C. 1740，et de l’hégire 1153；traduits à Con— stantinople par le sieur Deval，secrétaireinterprète du roi et son premier drogman à la cour ottomane，

1761》. —— 第 183 页。

110 伏尔泰在为悲剧“塞米拉米达”(1748) 所写的题为“论古代悲剧和现代悲剧”一篇序言中谈到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时说:“可以认为,这部作品是喝醉的野人的幻想产物。但是在这些对现在仍然使英国戏剧变得如此荒谬和野蛮的形式的粗暴破坏中间,你会发现在‘哈姆雷特’中除了稀奇古怪的东西以外,还有一种无愧为最伟大的天才的崇高思想。”—— 第 188 页。

111 潘塔隆—— 意大利民间假面喜剧中的人物之一,他表现一个威尼斯商人—— 有钱的、吝啬的、愚蠢的老头的形象,—— 第 188 页。

112 潘多拉的盒子是装满罪恶和纠纷的盒子;这是一个文学典故,源出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故事。潘多拉由于好奇打开了关着各种各样灾祸的盒子,就把这些灾祸散布出来了。—— 第 191 页。

113 唐宁街—— 见注 55。—— 第 192 页。

114 指 1854 年 4 月 3 日“泰晤士报”的社论。编辑部在这篇社论中尖锐地批评了累亚德在下院的发言,并对他作为亚述考古学家的活动表示怀疑。累亚德在考古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 1848—1849 年在伦敦出版的“尼尼微遗址”(《Nineveh and its Remains》)和 1853 年在伦敦出版的“尼尼微和巴比伦”(《Nineveh and Babylon》)。—— 第 193 页。

115 马克思在 1853 年 10 月至 12 月初写的一组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387—461 页)中对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作了详尽的分析。—— 第 198 页。

116 1852 年 12 月成立联合内阁时,阿伯丁首相给予爱尔兰旅的三个成员—— 克奥、萨德勒和蒙塞耳大臣职位,因而引起了一些爱尔兰议员的激烈抗议,使该旅发生分裂。站在支持政府的爱尔兰议员背后的是天主教上层僧侣、爱尔兰资产阶级和害怕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大地主。以达菲为首的爱尔兰旅的另一部分人所依靠的是争取政府在爱尔兰实

行新土地租佃法的爱尔兰富裕佃农阶层。——第201页。

117 关于俄国人撤出阿兰群岛的错误报道载于1854年4月7日“泰晤士报”。——第201页。

118 指英、法、普三国的代表（三国驻奥地利大使）和奥地利外交大臣布奥尔于1853—1854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一系列会议。第一次会议是1853年7月召开的，这次会议还邀请了俄国大使，但俄国大使拒绝参加；会议的正式目的是因俄土关系紧张而出面调停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在多次召开的会议上意见逐渐一致，并拟定了四国对俄国和土耳其的要求；后来这些要求成为1855年维也纳会议和1856年结束克里木战争的巴黎和约的基础。——第206页。

119 1853年初，奥地利政府把五千多名原籍为瑞士德森州的人赶出伦巴第。它采取这一措施的借口是：1853年2月的米兰起义是在德森住过的意大利流亡革命家策划的。经过长期外交谈判，直到1855年3月，奥地利政府才允许被赶出的德森人返回原地。——第213页。

120 马克思所说的意大利立宪党是指以卡富尔为首的自由派（所谓moder-atti——温和派）；该党代表保皇派自由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的利益，在萨瓦王朝的庇护下力争自上而下地达到意大利的统一。该党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因而把它的策略建立在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和其他国家的援助上面。1853年至1854年，该党促使皮蒙特站在英法一边参加克里木战争，从而希望在意大利统一事业中取得英法两国的支持。皮蒙特于1855年参战。

都灵的“同盟报”（《Unione》）是这一派的左翼的机关报。——第215页。

121 指1854年4月19日“泰晤士报”的社论，该报在社论中批评了内阁在战争问题上的犹豫不决的态度。——第219页。

122 “劳埃德氏报”（《Lloyd》）——英国自由派报纸“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Lloyd’s Weekly London Newspaper》）的简称，1843年至1918年间该报用此名出版。——第221页。

123 奥普条约于1854年4月20日在柏林签订。——第223页。

124 指1854年4月9日英国、法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代表在维也纳举行的例会上签署的议定书。议定书签字国不得在调停俄国和土耳其的冲突的问题上单独行动。拟定了以下几点作为未来协议的基础:土耳其帝国的完整,俄军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给予苏丹的基督教臣民以不妨害苏丹独立和主权的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以及寻求在调整土耳其政治关系时保证欧洲的均势的必要保障。——第225页。

125 从马克思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出,1854年5月2日和5日,马克思先后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两篇文章。可是,该报编辑部把这两篇文章合而为一,用马克思的署名在1854年5月16日的报上发表。本卷中的这篇文章是按报纸发表的形式刊印的。编辑部把马克思寄去的材料的一部分(关于普鲁士政策)篡改得面目全非,并作为它的社论在1854年5月19日的报上发表。——第228页。

126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是资产阶级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自由派的机关报。——第229页。

127 "新闻报"(《Die Presse》)是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848年至1894年在维也纳出版;1861年至1862年期间,该报采取反波拿巴主义的立场,曾经刊载马克思的文章和通讯。——第233页。

128 "阿格拉姆报"(《Agramer Zeitung》)是从1826年起在阿格拉姆(萨格勒布)出版的一家日报,奥地利政府的半官方报纸。——第233页。

129 指德意志人民在拿破仑军队在俄国溃败后展开的反对法国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这个斗争中,统治阶级和执政王朝千方百计地燃起沙文主义情绪并利用人民的斗争来巩固德意志的封建反动制度。——第233页。

130 忠实者联盟(Treubund)是1848年底普鲁士保皇派在柏林建立的反动沙文主义组织。——第233页。

131 马克思指的是他在1853年春天写的一组关于格莱斯顿的财政预算的

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9—95页)。——第237页。

132 指俄国、英国和尼德兰的代表1815年5月19日(7日)在伦敦签订的关于赔偿俄国把拿破仑军队驱逐出荷兰和比利时各省的军事费用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英国和尼德兰政府必须以赔偿的形式向荷兰霍普公司的银行家清偿俄国借的一部分债款(各付2500万荷兰盾)和1816年1月以前尚未偿还的这一债款的利息。但协定的一项特别条款规定,一旦比利时的一些省脱离尼德兰,就将停止还债。1830年革命和独立的比利时国家成立后,尼德兰政府停止了付款。但是,帕麦斯顿代表英国政府于1831年11月16日(4日)同俄国签订了一项承认英国过去的财政债务的新协定。——第242页。

133 此处与事实不符:德·叶·奥斯坦—萨肯将军是驻守多瑙河的第三军指挥官,后来(从1853年12月起)他又担任防守从布格河到多瑙河的沿岸地区的军队的指挥官;他的司令部设在敖德萨。——第244页。

134 1849年4月5日的埃克恩弗尔德战斗是1848—1850年丹麦和普鲁士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中的一次战役。——第246页。

135 马克思写的关于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对领土的清扫的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69—576页和第9卷第177—183页)。

马克思接着引用的是厄·琼斯在1854年5月13日“人民报”的社论中发表的事实材料。——第250页。

136 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工人的一次大罢工。1853年8月,普雷斯顿和四郊的棉纺织厂的织布工和细纱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百分之十;其他行业工人支持了他们。企业主联合会为了对付罢工,1853年9月宣布了同盟歇业。在三万名普雷斯顿工人中大约有二万五千人停止工作。1853年罢工运动的特点是其他城市的工人支援了罢工工人,普雷斯顿工人由于这种支援,坚持了三十六周之久。1854年2月同盟歇业已停止,但罢工还在继续。为了破坏罢工,企业主联合会开始把爱尔兰和英格兰习艺所的工人运到普雷斯顿。1854年3月,罢工的领导人被捕。工人由于基金耗尽而被迫复工。5月罢工结束了。关于普雷斯

顿罢工的起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54页。

137 本文原载于“人民报”，以后又以“波罗的海和黑海上的军事行动。英法的作战方法”为题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

“人民报”编辑部在文章的正文前加了一段话：“为了腾出篇幅刊载目前侨居英国的一位著名的欧洲政治活动家写的这篇天才作品，我们不得不放弃一般性的时事报道。”——第255页。

138 指安梅林海军上将在1854年5月1日和5日给法国政府的关于联军舰队炮击敖德萨后在黑海的行动的报告。报告的摘要载于1854年5月21日的“总汇通报”。——第258页。

139 指1853年6月21日至8月20日为了准备对俄战争而在离伦敦不远的乔宾城郊外举行的大规模的野营集训和军事演习。——第265页。

140 梅费尔激进派——一小撮冒牌激进分子(摩耳斯沃思、贝尔纳·奥斯本等人)的绰号，他们实际上代表向民主派献媚的那一部分英国贵族。“梅费尔”一词从伦敦的豪门区之一的名称——梅费尔而来，这个区是贵族私邸所在地。——第267页。

141 指1854年5月23日在维也纳举行的英、法、奥、普四国代表例会的议定书。——第269页。

142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780年至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275页。

143 “地球报”（《The Globe》）是英国的一家晚报“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的简称，从1803年起在伦敦出版；辉格党机关报，辉格党人执政期间是政府的报纸；从1866年起是保守党的机关报。——第278页。

144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资产阶级报纸，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后来是自由党的机关报；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办。——第281页。

145　指土耳其军队1683年9月12日在维也纳附近被奥、德、波三国军队歼灭。在杨·萨比斯基指挥下的波兰军队在这个会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会战制止了土耳其人向中欧推进。——第282页。

146　约·哈麦尔“奥斯曼帝国史，根据以前未曾利用的手稿和档案编写的”1827—1832年佩斯版第1—10卷（J.Hammer.《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grossentheils aus bisher unbenützten Handschriften und Archiven》. Bd. 1—10, Pest, 1827—1832)。——第282页。

147　皮尔派是联合在罗·皮尔周围的一些温和的托利党人，他们支持皮尔在保持大土地占有者和金融家的政治统治的前提下在经济政策方面向工商业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1846年，皮尔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了谷物法，结果引起了托利党的保护关税派的强烈不满并导致托利党的分裂和皮尔派的孤文。1850年皮尔死后，皮尔派便成为一个没有明确纲领的政治集团。皮尔派参加了阿伯丁的联合政府（1852—1855)。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皮尔派加入了自由党。——第283页。

148　从马克思的笔记本中看出，1854年6月6日，马克思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一篇关于圣阿尔诺的文章。这篇文章没有发表。——第285页。

149　指1830年法国七月资产阶级革命。——第285页。

150　“*自助者天助之*”是1827年在法国成立的温和的自由派的政治团体的名称。许多后来的七月王朝的活动家（基佐、巴罗和拉斐德等人）参加了该团体；一批资产阶级共和派分子（弗洛孔、戈德弗鲁阿和卡芬雅克等人）也参加了该团体。

十二月十日会是1849年成立的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它的成员多半是游民。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73—176页）中对十二月十日会作了详尽的评述。——第286页。

151　指1851年12月2日的路易·波拿巴政变。——第288页。

152 莫尔特克“1828年和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第206页（Moltke.《Der russisch—türkische Feldzug in der europäischen Türkei 1828 und 1829》. Berlin，1845，S. 206）。——第297页。

153 *巴希布祖克*是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土耳其军队的非正规部队的名称。这个部队以缺乏纪律、残忍和抢劫成性而著称。——第299页。

154 本文是弗·恩格斯在1854年6月14日应马克思的请求写的。马克思对该文作了补充并于6月16日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将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并给它加上了下面一段按语：“昨日‘亚美利加号’轮船带给我们的欧洲通讯和几捆报纸，完全证实了关于俄军已被赶出锡利斯特里亚一带的堑壕以及他们后来从瓦拉几亚退往塞勒特河一线的消息。我们获悉，根据上月14日在君士坦丁堡签订的条约，奥地利人无疑地即将进入俄军撤出后的瓦拉几亚。就我们所知，这个在当前情况下对沙皇具有重大的意义的条约，是根据实际上重新指导哈布斯堡王朝对外政策的梅特涅公爵的直接指示签订的。”

从马克思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本文中还插进了有关圣阿尔诺的材料，以此来结束他在1854年6月9日的一篇文章（见本卷第285—288页）中对这个波拿巴派活动家的评述。编辑部把这一部分删去了。——第303页。

155 指沙俄军队1849年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第305页。

156 *“维也纳医学周刊”*（《Wiener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是从1851年起在维也纳出版的杂志。显然这里马克思是指1854年上半年在该杂志刊登的未署名的一系列瓦拉几亚通讯和一篇多布鲁甲通讯。——第306页。

157 指1854年6月19日上院讨论东方问题时阿伯丁为回答林德赫斯特的讲话而作的发言。林德赫斯特是当时的托利党反对派的代表，他尖锐地抨击了沙皇政府在对土耳其的关系上的对外政策，并指责联合政府作战不坚决。阿伯丁在发言中替沙皇政府的政策辩护。——第316页。

158　马克思这里引用的是俄国驻英大使利文公爵和马土舍维奇伯爵 1829 年 6 月 13 日 (1 日) 给涅谢尔罗迭伯爵的紧急报告。报告全文载于 1843 年 "公文集" 第 1 期第 17—19、21 页。—— 第 318 页。

159　四国同盟—— 见注 88。—— 第 322 页。

160　指 1854 年 6 月 28 日在马德里发生的军事政变。从 1854 年春天起，西班牙国内经济状况恶化和反动势力横行霸道激起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在议会因企图反对政府所颁发的关于提前 6 个月缴税的法令而被解散之后，群众的不满情绪就特别强烈了。军事政变的领导人奥当奈尔将军和杜耳塞将军抱着个人目的力图推翻圣路易斯的专政，他们企图利用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而不得不答应在征税方面进行某些资产阶级的改革；他们还答应肃清权奸，召开议会，组织国民军和进行其他的改革。人民群众参加斗争引起了 1854—1856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过程中，以埃斯帕特罗为首的进步派在 1854 年重新取得了政权。但是，被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吓破胆的资产阶级转到反革命方面，1856 年，极端反动集团又重新执政。—— 第 324 页。

161　马克思看来是指 1854 年 2 月在萨拉哥沙的守备部队中发生的起义。—— 第 324 页。

162　所谓 "著名的布隆采耳战斗" 是马克思对 1850 年 11 月 8 日普奥两国前进部队之间的一次小战斗的讽刺。为争夺德意志领导权而斗争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彼此争夺干涉库尔黑森内部事务的权利以镇压那里爆发的起义；由于奥地利得到了沙皇政府的外交支持，普鲁士被迫让步。—— 第 326 页。

163　维也纳照会—— 见注 65。—— 第 327 页。

164　俄土两国的阿德里安堡条约 (1829 年) 中的一条规定，俄国军队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直到土耳其支付赔款为止 (占领继续到 1834 年)。土耳其必须承认多瑙河各公国的自治权并给予他们自选国君的权利。1831 年，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贵族和僧侣会议根据沙皇政府

所拟定的方案通过了组织规程。按照这个规程，把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了大土地占有者所选出的议会，而把行政权交给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君。从前的各种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都保存了下来，政权集中在大地主—农奴主手中。同时，规程列入了若干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国内关税，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允许农民从一个占有者转到另一个占有者，禁止刑讯。1848年革命时，组织规程被废除。——第330页。

165 **巴尔塔利曼尼条约**是1849年5月1日（4月19日）俄国和土耳其在两国军队前往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镇压革命运动时签订的公约。按照这个公约，占领制度一直保持到革命的危险完全被消除时为止（外国军队直到1851年才撤出多瑙河各公国），暂时实行苏丹根据同沙皇的协议任命国君的原则，并由俄国和土耳其规定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一旦发生革命，重新实行军事占领的措施。在这两个公国又恢复了组织规程（见注164）。——第331页。

166 从马克思在1854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多瑙河战争”（在马克思的笔记本中写为“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续完”）一文曾被马克思耽搁了几天，7月11日才寄出。——第334页。

167 “泰晤士报”记者查·奈斯密斯的6月2日的报道“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载于1854年7月3日“泰晤士报”。——第335页。

168 “日报”（《Gaceta》）是西班牙的报纸“马德里日报”（《Gaceta de Madrid》）的简称，1661年创刊；是政府的正式机关报。——第340页。

169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进步派形成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进步派依靠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军官。他们的基本要求是实现有限的君主制。1854年，由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1854—1856年），以埃斯帕特罗为首的进步派取得了政权。在革命过程中，被人民群众运动的发展吓破胆的进步派，向反革命作了让步，为在西班牙建立反动制度扫清了道路。——第343页。

170　指西班牙政府关于提前6个月缴纳土地税和工业税的法令（1854年5月）。——第344页。

171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日报，该报从1802年起即以此名在科伦出版；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以及在后来的反动年代，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的和叛卖的政策；它激烈地反对“新莱茵报”。——第344页。

172　指1854年6月12日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曼托伊费尔给驻彼得堡公使威尔特尔男爵的急件。——第344页。

173　“施本纳报”（《Spenersche Zeitung》）即“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 chen》），因该报出版者施本纳得名，1740年至1874年在柏林出版。该报遵循君主立宪的方针。——第346页。

174　“世纪报”（《Le Siècle》）是1836年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日报。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该报反映一部分只要求温和的立宪改良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五十年代成为温和的共和派报纸。——第347页。

175　在1834—1843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期间，1837年6月18日通过了新宪法。这个宪法是一部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自由派贵族之间妥协的结果。1837年的宪法赋予议会独立召开会议的权利，但同时保留了国王的否决权和解散议会的权利。下院选举资格被放宽，下院的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参议院由国王从专门选举团向他提出的名单中任命。宪法承认天主教是西班牙国教。1837年的宪法存在到1845年。——第352页。

176　指涅谢尔罗迭伯爵1854年6月29日（17日）给俄国驻维也纳的代表哥尔查科夫公爵的急件；这个急件是俄国政府对奥地利坚决要求俄军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答复。根据1854年6月14日奥土条约，这两个公国应由奥地利军队占领。马克思引用的是“比利时独立报”1854年7月12日关于这个急件的报道，当时这个急件尚未全文发表。——第352页。

177 指1854年4月20日的奥普条约。马克思在“希腊人暴动。——波兰侨民。——奥地利—普鲁士条约。——关于俄国武装的文件”一文（见本卷第221—227页）中对这个条约作了详尽的分析。——第354页。

178 “奥地利通讯”（《Oesterreichische Correspondenz》）是奥地利政府的半官方的石印报纸；1850年至1863年在维也纳用这个名称出版。——第354页。

179 指1854年4月17日（5日）“塞尔维亚政府就奥地利军队侵入本公国问题给土耳其政府的备忘录”。1854年6月20日，在下院提出备忘录的问题，1854年6月22日要求公布这个文件的书面质问被送交下院。——第354页。

180 德意志联邦是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成立的。参加联邦的除了德意志各邦之外，还有藩属丹麦王国的霍尔施坦公国和尼德兰国王的领地卢森堡。丹麦国王以霍尔施坦公爵的身分，尼德兰国王以卢森堡大公的身分参加了德意志联邦的联邦议会。——第356页。

181 本文最后关于佩特曼案件这一部分以及本卷第367页和第393页马克思文章的有关部分都是第一次译成俄文发表的。——第356页。

182 马克思指1854年5—6月参加在班堡召开的代表会议的许多德意志邦（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维尔腾堡、巴登、库尔黑森、黑森—达姆斯塔特和拿骚）的代表。他们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参加1854年4月20日的奥普条约（见本卷第223页）。——第360页。

183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79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361页。

184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日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在巴黎创刊。七月王朝时期是政府的报纸，是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喉舌。1848年革命时期，该报反映所谓秩序党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政变后是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喉舌。——第363页。

185 白厅是伦敦的一个街坊区，是许多政府机关的所在地。—— 第 366 页。

186 斯库伊尔斯是狄更斯的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生平和奇遇”中的主人公，是残忍、贪婪无知和虚伪的典型。—— 第 366 页。

187 1843 年的政变是纳尔瓦艾斯将军、孔查将军和其他一些人为了反对进步派领袖埃斯帕特罗的独裁在 5 月发动的反革命军事叛乱。他们得到一部分不满意独裁者的政策的进步派的支持。1843 年 7 月 30 日，埃斯帕特罗逃出西班牙；温和派的领袖之一纳尔瓦艾斯依靠大土地占有者，当了独裁者。从此在西班牙建立了长期的反动统治，直到 1854—1856 年的革命。—— 第 368 页。

188 所谓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或西班牙战争，是英国和法国在 1808 年至 1814 年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领土上进行的战争。同时，在整个半岛上展开了西班牙人民和葡萄牙人民争取独立、反对法国占领的战争。—— 第 368 页。

189 马克思指 1812 年通过的加迪斯宪法（见注 191）。

1822 年是 1820—1823 年资产阶级革命发展中的顶点。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在 1822 年夏天保皇派的阴谋被粉碎后，革命运动的左派—— 激进派（ecsaltados）的代表取得了政权，里埃哥是激进派的领袖之一。得到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一部分军官，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工人支持的激进派上台执政，证明了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关于革命军队的作用，见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本卷第 453—511 页）。—— 第 368 页。

190 卡洛斯派是西班牙的反动的教权派专制集团，支持斐迪南七世的弟弟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卡洛斯派依靠军阀和天主教僧侣，并利用西班牙某些地区落后农民的支持，在 1833 年至 1840 年发动了国内战争，这个战争实际上变成了封建天主教分子和自由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斗争，而且导致了第三次资产阶级革命。1872 年至 1876 年，卡洛斯派再一次发动了战争，要求由唐·卡洛斯的后裔继承西班牙王位。这次战争也是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 第 369 页。

191 **1812年宪法**（加迪斯宪法）是1810—1813年的议会通过的。宪法限制了君主制度，宣布国民是最高权力的体现者，赋予由普选产生的一院制的议会以立法职能。议会在内政和外交方面获得了广泛的权利。宪法规定实行地方自治、累进税和普通义务兵役制。各省都组织了地方国民军；整个司法制度进行了改造。宪法虽然实行了西班牙国内生活的民主化，但保持了西班牙对殖民地的统治。在1841年，由于反动派取得胜利，加迪斯宪法被废除。在十九世纪上半叶，1812年宪法是许多欧洲国家的自由主义立宪运动的一面旗帜。——第369页。

192 关于巴塞罗纳事件的消息于1854年7月19日载于拿破仑第三政府的正式机关报法国“总汇通报”。——第371页。

193 1848年3月，由纠集在“国民报”周围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所操纵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巴黎筹办了一些国家工厂，企图使这些工厂的工人成为它在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斗争中的支柱。这种分裂工人阶级的企图并没有得逞，国家工厂的工人成了1848年六月起义的起义者的核心。——第372页。

194 英国蒸汽巡航舰“老虎号”在侦察黑海海岸时于1854年5月12日在敖德萨附近触礁；该舰遭到炮击，损伤严重，水兵被俘，舰身焚毁。——第388页。

19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和第6卷刊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第392页。

196 暗示帕麦斯顿在1850年英希两国关于英国籍的葡萄牙商人帕西菲科事件的冲突中帕麦斯顿所采取的立场。帕西菲科在雅典的住宅被焚毁，当时任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为此派出一支英国舰队到希腊并向希腊政府提出强硬的最后通牒。帕麦斯顿在议会所作的侵略性发言中，把英国国民比作古罗马公民，用必须维护英国国民的威信来为他的行动辩解。帕麦斯顿当时所使用的这句话《civis romanus sum》（“我是罗马公民”）成了标志特权和罗马公民所享有的那种崇高地位的公式。——第393页。

197　指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法国殖民者为了征服阿尔及利亚在这个国家所进行的侵略性战争。法军入侵阿尔及利亚引起了阿拉伯居民的长期的顽强的反抗。法国人以极其残酷的手段进行战争。到1847年，阿尔及利亚已基本上被占领了，但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并未停止。——第399页。

198　**锡克教徒**是十六世纪在旁遮普地区（印度北部）产生的教派。锡克教徒关于人类平等的教义成了从十七世纪末叶展开的农民反对印度封建主和阿富汗掠夺者的斗争的思想体系。后来，锡克教徒分化出封建的上层，它的代表领导着这个在十九世纪初包括整个旁遮普和一系列邻近地区的锡克教徒国家，在1845年至1846年和1848年至1849年，英国两度对锡克教徒进行血腥的侵略战争，结果建立了英国在旁遮普的统治，从而使整个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

从1811年起，英国断断续续地在开普兰对科萨各部族进行掠夺性的“卡弗尔战争”（卡弗尔人是在十九世纪所通用的对居住在非洲东南部的各部族的统称）。1853年，科萨各部族根据和约被迫割让一部分领土给英国殖民者。——第399页。

199　指1847年瑞士和意大利的运动。它是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先声。见弗·恩格斯“1847年的运动”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05—515页）。——第400页。

200　指1848年6月23—26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英勇起义。这次起义遭到法国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六月起义的失败是欧洲各国反革命到来的信号。——第400页。

201　西班牙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霍赛·塞贡多·弗洛雷斯的四卷集著作“埃斯帕特罗。他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以及他当前的巨大成就的历史”（《Espartero. Historia de Su vida Militar y Politica y de los grandes Sucesos contemporáneos》）于1843年在马德里出版。马克思引用的是这部著作的第2版；第2版的第1卷和第2卷出版于1844年，第3卷和第4卷出版于1845年。——第402页。

202　艾阿库裘平原（秘鲁）会战是在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1810—

1826）中最大的一次会战，发生在1824年12月9日。在这次会战中，哥伦比亚和秘鲁的军队几乎全部消灭了西班牙军队。结果建立了独立的玻利维亚共和国并保证了南美洲的独立。——第402页。

203　1839年8月31日，卡洛斯派军队总司令马罗托将军和王国军队的统帅埃斯帕特罗在韦尔加拉签订了协议，结束了西班牙内战。当时卡洛斯派的军队被解散了，而唐·卡洛斯则在1839年9月14日迁居到法国。由于卡洛斯派的加布雷腊将军企图继续顽抗，1840年7月卡洛斯派被彻底击溃。——第402页。

204　马克思显然是指1840年在巴塞罗纳出版的马尔利安尼“现代西班牙的政治史”（《Historia politica de la España moderna》）一书。——第403页。

205　马克思引证的是休斯的匿名书“1845年西班牙真相。一个久居西班牙的英国人的作品”1845年伦敦版第1卷第14页（《Revelations of Spain in 1845. By an English resident》. London，1845，v. I，p. 14）。后面马克思引自同书的第15—16页。——第403页。

206　温和派（moderados）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一派，它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利益，出现于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初期。四十—五十年代，该派的领袖之一是1843年反革命军事叛乱（见注187）的组织者和后来为西班牙事实上的独裁者的纳尔瓦艾斯将军。在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854—1856），温和派反对任何资产阶级改良并同最反动的势力妥协。——第403页。

207　M. A. Principe，R. Giron，R. Satorres，A. Ribot.《Espartero：su pasado，su presente，su porvenir》. Madrid，1848. ——第406页。

208　指1820年在英国发生的国王乔治四世和被控告为对丈夫不忠实的卡罗琳娜王后的离婚案。——第408页。

209　下面原有“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一句话：“让我们的读者来判断一下，西班牙革命是否会有积极的结果。”马克思在1854年11月10

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这句话是编辑部加的。——第408页。

210 本文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一篇军事评论，是马克思1854年8月8日寄往纽约的一篇长文章的一部分。然而“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将这一评论作为8月21日该报的社论发表，而将其余部分以卡·马克思的署名发表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见本卷第412—419页）。在本版中，这两篇文章是按该报原来的形式刊印的。——第409页。

211 指1847年10月成立的极端反动的内阁。这个内阁是西班牙事实上的独裁者、温和派的领袖纳尔瓦艾斯领导的。——第414页。

212 马克思引证的是1854年8月5日“人民报”登载的厄内斯特·琼斯的演说。——第419页。

213 奥土条约规定奥地利有权在战时，在俄军撤出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后占领这两个公国。这个条约签订于1854年6月14日。——第421页。

214 “马铃薯战争”是人们对奥普之间争夺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权的战争（1778—1779）的讽刺性称呼。因为，在这次战争中几乎所有的军事行动都不外是想剥夺对方的粮食储备。

马克思在这里把1850年秋天因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而发生的奥普冲突称为“马铃薯战争”（见注162）。——第422页。

215 指俄国军舰“弗拉基米尔号”在黑海的行动。1854年8月初，“弗拉基米尔号”从塞瓦斯托波尔驶往博斯普鲁斯海峡时袭击了英国轮船“塞克洛普号”，击沉了几只土耳其船，它没有遭到英法舰队的反击，安然返回了塞瓦斯托波尔。——第424页。

216 武装中立宣言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1775—1783年）叶卡特林娜二世在1780年3月11日（2月28日）针对英国发表的。宣言中宣布中立国船只在海上以武装保卫自己免受交战国的攻击的权利，中立国与交战国自由进行贸易的权利，悬挂中立国国旗的敌方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宣布只有在被封锁的港口的入口确已被海军封闭的情况下，封锁才有效。这个宣言成了俄国和一系列国家签订协定的基础。从1780—

1783年，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两西西里王国先后参加了这个宣言。——第425页。

217 “喧声报”（《Le Charivari》）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讽刺性报纸；从1832年起在巴黎出版；七月王朝期间，曾对政府进行过辛辣的抨击；1848年转入反革命阵营。——第425页。

218 1845年，议会批准关于修改1837年宪法（见注175）的法律；根据新法律，选举资格的限制更为苛刻，王权享有任命参议员的无限权利，废除了议会毋须君主的特别准许而召开会议的权利，并且议会所审查的问题的范围由国王确定。——第426页。

219 罗马教皇庇护九世和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之间的条约签订于1851年3月16日并于1851年10月经议会批准。按照这个条约，西班牙王国必须从国库开支天主教僧侣的经费，停止没收教会的土地并归还修道院在第三次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834—1843）被没收的但尚未出卖的那一部分土地。——第426页。

220 所谓“柏林革命者的密谋”是警察当局的挑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1—34页）。——第427页。

221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的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的11名成员被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控告的物证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根据伪造文件和虚假证词，7名被告人被分别判处3年到6年的徒刑。这个案件的组织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用来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揭穿了（见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页，第457—536页）。——第427页。

222 维也纳照会——见注65。——第428页。

223　指1841年7月13日的伦敦公物（见注13）。——第429页。

224　暗示1845年提出的英国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堂弟列奥波特·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和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结婚的计划。这个计划将加强英国在比利牛斯半岛的地位。帕麦斯顿1846年担任外交大臣后积极支持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未能实现（见注89）。——第430页。

225　Chateaubriand.《Congrès de Vérone. Guerre d'Espagne. Négociations. Colonies espagnoles》. Bruxelles, 1838, t. I, pp. 112, 119—120, 132—133; t. Ⅱ, pp. 220—221, 225. ——第430页。

226　指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1823年12月2日向美国国会提出的著名的咨文。这个咨文宣布了旨在反对欧洲强国侵犯美洲国家的所谓门罗主义。后来，门罗主义被美国扩张主义者利用来建立美国在美洲大陆的霸权。——第430页。

227　Marliani.《Historia politica de la España moderna》. Barce-lona, 1840. ——第431页。

228　自由贸易派（科布顿是该派的领袖之一）为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缩减国家的一切非生产性的行政管理费用。他们认为与占领殖民地和管辖殖民地有关的费用也属于此类费用。科布顿和其他一些人认为，英国是一个工业最发达的强国，可以用较廉价的商品排挤自己的竞争者，夺取任何市场。——第432页。

229　根据1812年西班牙宪法第四章规定，西班牙殖民地居民除黑人外，均可取得西班牙国籍并享有和西班牙本国居民同等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本地的代表参加议会的权利。制定宪法的西班牙自由派，企图用殖民地和宗主国的表面上的平等来阻挠当时在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日益扩大的独立战争。——第432页。

230　"笨拙"（《Punch》）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简称。1841年起在

伦敦出版。——第433页。

231 同盟俱乐部是在西班牙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初期产生的最民主的组织之一。参加这个组织的有共和主义者，而且还有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菲格拉斯、彼—依—马尔格里和奥伦斯等人。这个组织要求普选权和信仰、出版、集会、请愿的自由，废除间接税和死刑，同时要求武装全体人民。然而这个纲领完全忽略了土地问题。1854年底随着反动势力的猖獗，俱乐部被封闭（见本卷第513页）。——第435页。

232 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在西班牙除民主俱乐部之外还出现了许多联合城市资产阶级、军官和城市下层代表人物的秘密协会。这些协会在全国各地拥有善于进行秘密活动的组织和分会，对政府和议会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它们的最著名的活动家有里埃哥、圣米格尔和阿尔普恩特等人。——第438页。

233 科堡—布拉冈萨是葡萄牙的执政王朝。

联合派是指那些主张在比利牛斯半岛建立统一的君主国的人。——第438页。

234 恩格斯在写关于博马尔松德的夺取这两篇文章时，正如他本人所指出的那样，他掌握的关于战事的进程的消息很有限，同时关于阿兰群岛上的这个俄国要塞的材料也极不完备。因而关于夺取博马尔松德的许多情节在恩格斯的达两篇文章中都没有提到。

尽管要塞工程尚未完工（只完成全部工程的五分之一），而且敌人在兵力和火炮方面拥有近十倍的优势，但要塞围攻战仍继续了一个月左右。要塞的守军在6昼夜内击退了一切猛烈的攻击，使围攻的英法军队遭到巨大的损失，只是在接到统帅部的命令后才投降。攻击这个要塞的行动证明英国军方已放弃直接进攻喀琅施塔得的计划。1854年8月16日（4日）攻克博马尔松德只是联军暂时的战术胜利，这对波罗的海军事行动的进程并不发生重大的影响，总的说来，波罗的海的战事仍然胜负未分。

本文和下一篇文章以同一个标题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副标题是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442页。

235 沃邦“要塞围攻法”(Vauban.《Traité de l’attaque des places》)。该书于1739年在巴黎出版，是“要塞的围攻法和防守法”(《Traité de l’attaque et de la défense des places》)两卷本的第一部分。——第445页。

236 道格拉斯“海军炮兵论”(Douglas.《A Treatise on naval gun-nery》)。1820年在伦敦发行第一版。——第448页。

237 “革命的西班牙”这一组文章是马克思在1854年8—12月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马克思当时密切注视着欧洲革命运动的一切征兆，他非常注意1854年夏季在西班牙发生的事件；他认为西班牙的革命斗争能够推动欧洲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发展。为了更好地了解新的西班牙革命的特殊性质和特点，马克思仔细地研究了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西班牙革命历史；马克思摘录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作者的著作的5本笔记本被保存下来了。从马克思的笔记本可以看出，他共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11篇涉及第一次(1808—1814)、第二次(1820—1823)和第三次(1834—1843)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文章。“纽约每日论坛报”只刊载了其中的前8篇(1820年以前的)。其余3篇论述1820—1822年事件和1833年事件的文章没有发表。在没有发表的文章中目前保存下来的只有论述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的手稿片断，载于本卷第669—672页。——第453页。

238 神圣同盟战争(1520—1522)是加斯梯里亚城市(自治城市)反对查理一世专制制度的起义。起义最初带有争取保持城市的封建特权的性质，从1521年起，由于城市下层群众和部分农民被吸引到运动中来，起义具有反封建的性质。1520年7月在阿维拉成立了起义城市的神圣同盟(即洪达)，9月同盟被迫迁到托尔特西利亚斯，11月又迁到伐利亚多利德，在那里成立了议会。参加议会的有10个城市的代表。——第456页。

239 在马克思摘有西班牙问题的材料的一本笔记本的首页上，马克思曾亲笔记下了他所研究过的部分著作。现将能辨认出的原文刊在下面并译成中文：

(Campomanes. Jovellanos)

London. 1854. May. June. July.

(1) Parish (H.H.)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Monarchy of Greece, London, 1838.

(2) Thierry. (A.)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formation et du progrès du Tiers Etat. 2nd ed. 2 vol. Paris 1853.

(3) Una Plumada sobre la Indole y Tendencia de la Revolu— cion en España, Madrid. 1846.

(4) Révolution d'Espagne. Examen critique. 1820—1836. Paris. 1836.

(5) The Crisis of Spain. 2d edit. London. 1823.

(6) Revelations on Spain in 1845. 2 vol. London. 1845.

(7) Señor de Marliani. Historia Politica de la España Mod— erna. Barselona. 1849.

(8) Principe. Espartero, su Passado etc. Madrid, 1848.

(康波曼内斯。霍韦利亚诺斯)

1854年5、6、7月于伦敦

(1) 帕里什 (H. H.)。希腊君主国的外交史。1838年伦敦版。

(2) 梯叶里 (奥·)。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1853年巴黎第2版第2卷。

(3) 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性质和趋向的札记。1846年马德里版。

(4) 西班牙革命,评论。1820—1836年。1836年巴黎版。

(5) 西班牙危机。1823年伦敦第2版。

(6) 1845年西班牙真相。1845年伦敦版第2卷。

(7) 德·马尔利安尼先生。现代西班牙政治史。1849年巴塞罗纳版。

(8) 普林西佩。埃斯帕特罗,他的过去等等,1848年马德里版。——第457页。

240 西班牙地方自治机关 (Ayuntamiento),在雷亢吉斯达——西班牙推翻阿拉伯人统治的斗争 (八—十五世纪)——时期曾起过很大的政治作用。在十六世纪自治城市起义被镇压以后 (见注238),地方自治机关基本上被取消了。恢复地方自治机关是十九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民主要求之一。1812年的宪法和1820年议会曾一度恢复地方自治机关。——第459页。

241　指 1518 年 1—2 月在伐利亚多利德召开的加斯梯里亚议会，这个议会应当批准查理为加斯梯里亚国王，宣誓效忠于查理，同时接受查理遵守法典（见注 266）的誓言。

这里是马克思的笔误：议会是在查理被选为国王（1519）和他去德国即位（1520）以前召开的。——第 460 页。

242　**圣友会，即神圣的埃尔曼达德**是十五世纪末叶由西班牙王权建立的西班牙城市联盟，目的是利用资产阶级来反对大封建主，以维护专制制度的利益。从十六世纪中叶起，神圣的埃尔曼达德的武装力量执行警察的职能。——第 460 页。

243　1808 年 7 月西班牙贵族的代表在法国贝云城召开会议（贝云议会），通过拿破仑第一为西班牙制订的宪法。根据宪法，国王（约瑟夫·波拿巴）得到了几乎无限的权力。他指定西班牙贵族代表参加新建立的参议院并任命了近半数的议会议员。根据宪法规定，实行公开审讯，废除刑讯，取消国内关税。天主教被承认为唯一的国教。由于通过了使波拿巴王朝在西班牙的统治得到巩固的贝云宪法，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占领者的解放斗争加剧了，资产阶级革命（1808—1814）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个革命过程中，加迪斯的革命议会在 1812 年通过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宪法（见注 191）。——第 463 页。

244　下面有一句“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话：“我们希望，西班牙人民载入史册的新的一页，将无愧于西班牙人民，而且将会给西班牙人民，以至于给全世界带来良好的结果。”（见 1854 年 11 月 10 日卡·马克思给弗·恩格斯的信）——第 464 页。

245　“约瑟夫国王有关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回忆录和通信集”1853—1854 年巴黎版（《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 Paris，1853—1854）。秘密条约据说是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第一在提尔西特签订的，第 4 卷（第 246—247 页）引用的秘密条约的原文是从 1812 年 8 月 25 日马德里“日报”引来的。

无论 1807 年 7 月 7 日（6 月 25 日）俄法签订的提尔西特条约或是补充这个条约的秘密公约，都没有这样的条文。——第 465 页。

246 指西班牙参加第一次反共和制法国的同盟战争（1793—1795）。1793年西班牙军队在取得某些胜利以后，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西班牙因而被迫于1795年7月同法国签订了单独和约。——第466页。

247 罗·沙赛："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史"三卷集，1823—1832年伦敦版（R.Southey.《History of the Peninsular War》，3 vol.，London，1823—1832）。马克思引的是第1卷第301页。——第467页。

248 卡尔尼塞鲁"拿破伦，即欧洲的真正唐·吉诃德，即对拿破仑和他的哥哥约瑟夫的各种敕令的批判的、爱国的、讽刺的评论，共分两部分，五十章，一个热爱祖国的西班牙人的著作"1813年马德里版第1—6卷（Carnicero.《Napoleón o El verdadero D.Quixote de la Europa，o sean Comentarios critico-patriotico-burlescos a varios decretos de Napoleón y su hermano José，distribuidos en dos partes y cincuenta capitulos y escritos por un español amante de su patria》. V. 1—6，Madrid，1813）；"评光荣的西班牙革命的主要事件的历史"1814—1815年马德里版第1—4卷（《Historia razonada de los principales sucesos de la gloriosa revolucion de España》. V. 1—4，Madrid，1814—1815）；"合法地恢复宗教裁判所和驳廖伦特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大事记'一书"1816年马德里版第1、2卷（《La Inquisición justamente restablecida e impugnación de la obra《Anales de la Inquisición en España》por Llorente》. V. 1—2，Madrid，1816）。——第468页。

249 指1795年在马德里第一次出版的霍韦利亚诺斯写的报告"马德里经济协会致加斯梯里亚最高王政会议的关于土地法的备忘录"（《Informe de la sociedad económica de esta corte al real y supremo Consejo de Castilla en el expediente de ley agraria》）。马克思引用的是1839—1840年在巴塞罗纳出版的霍韦利亚诺斯8卷文集的第7卷。——第468页。

250 西斯蒙第"论南欧文学"，1813年巴黎—斯特拉斯堡版第4卷第

258—259 页（Sismondi.《De la Littérature du Midi de l'Europe》，t. 4，Paris—Strasbourg，1813，p. 258—259)。——第 470 页。

251 反对法国占领者的比尔巴鄂人民起义发生在 1808 年 8 月。起义遭到梅尔兰将军的残酷的镇玉，他的军队曾以强攻夺下这个城市。——第 472 页。

252 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于 1808 年 9 月 27 日—10 月 14 日在爱尔福特会晤。巴伐利亚、萨克森、维尔腾堡的国王和其他许多讨好拿破仑的德国君主出席了谈判期间举行的庆祝会。——第 473 页。

253 马克思指的是法国国民公会式的代表会议，国民公会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 1792 年 8 月 10 日人民起义之后建立的。国民公会是由全国所有男性居民（家仆除外）选举的，共有 750 个代表。在雅各宾党专政时期（1793 年 6 月 2 日—1794 年 7 月 27 日），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国民公会废除了法国的封建关系，并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执行了革命的恐怖政策。1794 年 7 月 27 日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公会变成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1795 年 10 月国民公会被解散。——第 473 页。

254 这句被认为是培根说过的话引自西班牙历史学家托雷诺“西班牙起义，战争和革命的历史”1838 年巴黎版第 1 卷第 278 页（《Historia del levantamiento，guerra y revolucion de España》，t. I，Paris，1838，p. 278)。——第 474 页。

255 耶稣会教徒在 1767 年被驱逐出西班牙；这个决定是根据西班牙王政会议检察长弗洛里达布朗卡的建议而采取的。——第 475 页。

256 马克思引自 1703 年在维也纳出版的西班牙僧侣贝尼托·索勒达的著作“历史和政治纪要，揭示笃信基督教的路易十四的思想，以使西班牙摆脱因合法国王查理三世而蒙受的不幸”（《Memorial historico y politico，que descubre las ideas del Christianissimo Luis XIV，para librar a España de los infortunios，que experimenta por medio de su le-

gitimo Rey Don Carlos Ⅲ》)。—— 第 478 页。

257 马克思指十三世纪西班牙制订的共分 7 部分 (las Partidas) 的法典的有关的章节;从十四世纪起这个法典被称为“巴尔吉特”。—— 第 479 页。

258 Toreno.《Historia del levantamiento, guerra y revolucion de España》, Paris, 1838, t. I, p. 374. —— 第 480 页。

259 马克思引自中央洪达 1809 年 10 月 28 日的告西班牙人民书。—— 第 482 页。

260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社会拯救委员会) 是 1793 年 4 月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在雅各宾党专政时期 (1793 年 6 月 2 日—1794 年 7 月 27 日),社会拯救委员会在同国内外反革命进行斗争中和用平民的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热月 9 日反革命政变后,委员会丧失了自己的领导作用,并在 1795 年 10 月被解散。—— 第 482 页。

261 普腊德“西班牙革命史回忆录”1816 年巴黎版第 224 页 (Pradt.《Mémoires historiques sur la révolution d'Espagne》, Paris, 1816, p. 224)。后面引自该书 202—203 页。—— 第 483 页。

262 718 年西班牙军队在卡瓦丹加山谷 (阿斯土里亚山区) 打败了阿拉伯人。这一胜利的结果,在阿斯土里亚山区出现了一个不大的独立国家,它成为反对阿拉伯占领者的堡垒之一。

在索勃拉尔贝,即阿拉贡北部山区的一块不大的地方,继阿斯土里亚之后,不久也出现了一个反抗阿拉伯占领者的地区。—— 第 489 页。

263 Mita —— 强迫印第安人到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的金矿和银矿劳动。

Repartimiento —— 以抽签的方法定期重新分配村社土地;1813 年 1 月 4 日的法令废除了 repartimiento,村社的土地因而变为私有财产。—— 第 494 页。

264 资产阶级制宪议会通过的 1791 年宪法确立了法国的君主立宪制并保证了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利益。宪法给予国王全部行政权和否

决权；宪法把公民划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这实际上剥夺了大多数居民的政治权利。这个宪法被1792年8月10日的人民起义所废除。人民起义曾推翻了王权。——第494页。

265 普腊德“现代的西班牙革命及其后果”1820年巴黎—卢昂版第177—178页（Pradt.《De la révolution actuelle de l'Espagne, et de ses suites》. Paris—Rouen, 1820, p. 177—178）。——第494页。

266 法典是中世纪的西班牙规定在自治、司法、课税和兵役等方面给予城市和村镇特殊权利和特权的文献。法典限制了封建的专横，同时促进了地方割据的发展。——第494页。

267 指1793年4月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93年雅各宾党宪法的导言——第三十五条。这一条规定：“如果政府破坏人民的权利，起义即为全体人民和任何一部分人民的最神圣的权利和最必要的义务。”——第494页。

268 奴才派（serviles）是西班牙反动的教权派专制集团的绰号。这个集团在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808—1814）期间反对任何资产阶级的改革并维护专制的君主政体；以后，奴才派成为斐迪南七世的宫廷权奸，而在斐迪南七世的晚年，该派又把自己的利益和斐迪南七世的弟弟唐·卡洛斯结合在一起。

自由派代表西班牙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利益，提出以1812年宪法（见注191）为纲领。

“美洲派”是对居住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在议会里的一小撮代表的称呼。“美洲派”在议会里时而支持奴才派，时而支持自由派，不起什么重大作用。——第500页。

269 天主教会的特里延特会议于1545—1563年在特里延特和博洛尼亚开会。会议谴责新教并通过一系列有关天主教会的决议，其中包括宣布教皇的权力高于会议的权力并加强了主教的权力。这个会议的决议成为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封建的天主教反动派的拥护者的纲领。——第500页。

270 拉察罗尼是意大利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的绰号；他们不止一次地被反动的君主专制集团利用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第 501 页。

271 埃·圣米格尔“西班牙内战”1836 年马德里版（E. San Miguel.《De la guerra civil en España》，Madrid，1836）。——第 507 页。

272 斐迪南七世回国后，自 1814 年 5 月起，在西班牙建立了反动统治，消灭了 1808—1814 年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成果；革命志士被投入监狱，部分革命志士被处死。

1822 年 3 月 1 日，在 1820—1823 年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根据 1812 年宪法选出的议会召开了会议；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在议会里占多数（见注 189）。——第 509 页。

273 1812 年 7 月 20 日（8 日），俄国政府和加迪斯议会代表在韦利基耶鲁基就俄国和西班牙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的友好同盟关系以及恢复和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问题签订了一个条约。俄国在这个条约上签了字，从而也就承认了加迪斯议会和它制订的宪法的合法性。——第 509 页。

274 指匿名书“对 1820—1823 年和 1836 年西班牙革命的批判的分析”（《Examen critique des révolutions d'Espagne de 1820 à 1823 et de 1836》）的作者，该书于 1837 年在巴黎出版，共两卷。——第 510 页。

275 见注 226。——第 510 页。

276 引文摘自马丁雅克“1823 年西班牙革命和干涉的历史概述”1832 年巴黎版第一卷（Martignac.《Essai historque sur la révolution d'Espagne et sur l'intervention de 1823》，Paris，1832）。“西班牙及其革命”一书是马尔利安尼著的。——第 511 页。

277 本文的标题是采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标题。在马克思的笔记本中，本文的标题是“西班牙的革命”。——第 512 页。

278 马克思引证休斯的一本书（见注 205）。——第 515 页。

279　1852年1月22日路易·波拿巴下令没收奥尔良王室的财产。——第520页。

280　马克思把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1556—1598），菲力浦三世（1598—1621），菲力浦四世（1621—1665）的统治时期称之为菲力浦时代。——第522页。

281　统计材料引自1854年9月9日“经济学家”杂志第576期。——第531页。

282　指1842年在英国实行的有利于工业资产阶级的税率改革。这次改革降低了粮食和许多其他进口商品的进口税。——第533页。

283　1815年6月16日，拿破仑的军队和普鲁士元帅布吕歇尔统率的普鲁士军队在利尼（比利时境内）附近发生了会战。普军虽然战败，但布吕歇尔率领他的军队摆脱了法军的追击，与在滑铁卢和法军主力进行激战的英荷联军会合。法军本已胜利在望，但由于普军的来到终于失败。——第539页。

284　1851年12月1日午夜，埃斯潘纳斯指挥的团的一个营奉命担任国民议会的警卫；埃斯潘纳斯受了波拿巴主义者的贿赂，于12月2日派兵占领了国民议会开会的大厦，从而促成了路易·波拿巴的政变。——第539页。

285　原稿上的Lower Empire〔没落帝国〕一词在历史文献上是指拜占庭帝国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现在已泛指处于没落腐朽阶段的国家。——第540页。

286　指路易·波拿巴企图在1840年8月6日发动政变。他利用在法国波拿巴主义情绪的某种程度的抬头，率领一小撮阴谋家在布伦登陆，企图在当地守军中煽起暴动。这个企图结果破产了，波拿巴被判处无期徒刑，但在1846年逃往了英国。——第542页。

287　指第五次反拿破仑法国的同盟战争期间英国舰队于1809年远征些耳德河口。英军在占领伐耳赫伦岛以后，未能扩大战果，四万名登陆部队因饥饿和疾病损失了一万人左右，因而被迫从伐耳赫伦岛撤退。——

第 544 页。

288 罗多芒特是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一诗中的主人公之一，善于吹牛。—— 第 549 页。

289 在这一号“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刊登了拿破仑第三对军队讲话的消息。本段可以证明“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篡改过恩格斯所写的文章。—— 第 550 页。

290 指 1852 年 5 月 8 日由俄、奥、英、法、普、瑞典等国代表和丹麦代表共同签订的关于丹麦君主国的领土完整的伦敦议定书。条约的基础是 1850 年 7 月 4 日上述伦敦会议参加国（除普鲁士以外）通过的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了丹麦王室的领地（包括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在内）的不可分割的原则。伦敦议定书中提到，俄国皇帝（作为曾经以彼得三世这个名字统治过俄国的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的卡尔・彼得・乌尔利希公爵的后裔）是丹麦王位的合法追求者之一，这些追求者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让位给那个被宣布为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格吕克斯堡王朝的克里斯提安公爵。这给俄国沙皇在将来一旦格吕克斯堡王朝中断时要求继承丹麦王位提供了口实。—— 第 557 页。

291 指拿破仑第三于 1854 年 10 月 3 日发布的命令。按照这个命令，因参加 1848 年 5 月 15 日巴黎群众的革命活动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阿・巴尔贝斯（从 1850 年起他就被关入贝耳岛上的监狱）被无条件释放。发布这个命令的理由是截获了巴尔贝斯在 1854 年 9 月 18 日所写的一封私人信，巴尔贝斯在信中表示欢迎对俄国作战并“为了文明”而祝愿法军胜利。1854 年 10 月 5 日的“总汇通报”刊登了命令的全文和信的摘要。巴尔贝斯获释后在 1854 年 10 月 11 日给“通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他承认那封信确实是他写的，同时声称“法兰西的伟大始终是他的信仰”，但是又说他过去和现在始终都是波拿巴政体的敌人。此信曾载于民主派的报刊，例如 1853—1855 年由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先后在泽棱岛和伦敦出版的周报“人。世界民主主义报”（《L’Homme. Journal de la democratie universelle》）也于 1854 年 10 月 18 日刊载了此信。此后不久巴尔贝斯离开法国，不再参加政治

活动。——第 559 页。

292　“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概评”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4年10月5—6日写的一篇文章的一部分；文章的另一部分作为社论载于同一天的“纽约每日论坛报”（见本卷第551—555页）。“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概评”一文登载时没有署名，因为报纸编辑部从1854年9月起登载马克思的所有文章都不署名，马克思在1854年9月29日写信给恩格斯谈到过这一点。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这篇文章最后加了一段：“关于一支美国舰队，即两艘巡航舰、三艘轻巡航舰和两艘蒸汽舰为了赢得对美国的让步而进入萨马纳海湾，以及关于另一支舰队从纽约开赴格雷敦的消息是英国人从牙买加岛获悉并刊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上。200名被囚禁的俄国军官、兵士和他们的家眷被押送到戴文郡的一个监狱。海军陆战队的兵士，不论在海上或陆上，现在都允许留胡子。女王和她的宫廷现在在苏格兰群山中的巴尔莫拉尔。10月4日特派信使把一份关于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电报送到巴尔莫拉尔，这个消息轰动了王宫。在博马尔松德附近缴获的可供2000名兵士使用的武器已交到伦敦塔军火库。”——第 559 页。

293　西班牙的英籍军团是卡洛斯派战争期间（见注190）在英国招募来援助玛丽·克里斯亭娜政府的部队的名称，共约有一万人，在伊文思将军的指挥下参加了1835—1837年的军事行动。——第 561 页。

294　指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皮蒙特军队和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北部进行的战斗。——第 562 页。

295　拿破仑第一的军队和俄普联军之间的吕特岑（萨克森地区）会战发生在1813年5月2日（4月20日）。联军和法军在包岑城（萨克森地区）会战发生在同年5月20—21日（8—9日）。在这两次会战中，拿破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迫使俄普联军退却；正像在其他场合一样，这次退却秩序井然。

法军和俄普联军的卡茨巴赫河会战发生在1813年8月26日（14日）。由于布吕歇尔采取了巧妙的策略，法军遭到惨败。——第 564 页。

296 恩格斯在这里使用英国资产者和法国农民的讽刺性绰号来讽刺英法两国的庸俗的居民阶层。——第566页。

297 朗卡斯特炮是以其发明者的名字命名的英国八英寸椭圆形螺旋膛火炮。朗卡斯特炮首次被英国人用于克里木战争；以后没有被广泛使用。——第575页。

298 本文开头和许多其他地方均被“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直接篡改过，其目的是要使在该报作为社论发表的恩格斯的军事论文具有在美国所写的文章的特点。马克思1854年4月22日写信给恩格斯时早已指出过这一点。他说：“用你写的军事论文来自我吹嘘已经成了编辑部的‘合法的’做法。”——第577页。

299 这里例举的是几次最激烈的会战，在这些会战中俄国军队表现了高度的勇敢和坚强。

1758年8月25日（14日）俄普军队的措尔恩多夫会战是七年战争（1756—1763）中的大会战之一。普军的多次进攻都因俄军的顽强反击而失败。俄军以反攻和炮兵的火力使敌人遭到严重的损失。

1807年2月7—8日（1月26—27日）法俄军队的普略西什—埃劳（东普鲁士）会战是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争中最残酷的会战之一。拿破仑虽然损失惨重，但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1812年9月7日（8月26日）的博罗迪诺会战是1812年卫国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会战。俄国军队在这次会战中表现了高度的战斗素质并使法军遭到重大损失；会战的结果为战争向有利于俄国的方向发展和拿破仑军队失败准备了条件，尽管俄军当时被迫放弃了莫斯科（在当时条件下这种做法是适宜的）。——第579页。

300 本文以“东方战争”的标题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

文章的第一段被编辑部篡改过。——第586页。

301 本文的第一段和结尾被“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篡改过。——第594页。

302 阿耳布埃拉（西班牙）会战是1811年5月16日贝雷斯福德率领的围攻被法军占领的巴达霍斯要塞的英军和前去援救要塞的苏尔特元帅的法

军之间发生的战争。这次会战以拿破仑军队的失败而结束。——第596页。

303　“俄国残废者”是陆军部的机关报，从1813年至1917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从1816年起为日报。——第600页。

304　1805年12月2日（11月20日）俄奥军队（第三次同盟）和法军之间的奥斯特尔利茨会战以拿破仑第一的胜利而告终。

普略西什—埃劳会战。见注299。——第601页。

305　从马克思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出，本文结尾原有一节论述1854年12月2日签订的英、法、奥三国同盟条约的文字。根据这个条约，三国不得单独同俄国谈判和不允许俄军占领多瑙河各公国。同俄国谈判的基础应当是著名的四项条款（见本卷第646—651页）。——第606页。

306　1854年12月2日是路易·波拿巴政变三周年和他称帝的二周年；路易·波拿巴把以上事件正好安排在拿破仑·波拿巴宣布为法国皇帝的纪念日（1804年12月2日）和同它重日的奥斯特尔利茨会战纪念日（1805年12月2日）。——第607页。

307　关于边屯区居民见注84。——第618页。

308　卡·马克思从本文开始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新奥得报”撰稿。这家报纸从1849年至1855年用这个名称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出版。

由于从1846年开始出版的反对派天主教的“奥得总汇报”的编辑部发生分裂，1849年3月创办了“新奥得报”，它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五十年代，它被认为是德国最激进的报纸并遭到政府机关的迫害。

五十年代初，编辑部的领导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尔斯纳、泰梅和施泰因等人，摩里茨·埃尔斯纳从1855年1月起是“新奥得报”的编辑之一，从9月起是该报主编；报纸的出版者是德国政论家，斐·拉萨尔的表兄弟麦克斯·弗里德兰德。马克思通过拉萨尔的介绍为该报撰稿。1855年，马克思作为伦敦通讯员每周寄给“新奥得报”两三篇通讯。在反动年代几乎没有工人的报刊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

重视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派报刊来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给“新奥得报”撰稿使马克思有可能同德国保持联系，并向德国读者介绍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发展的最重大的问题。在克里木战争时，马克思经常寄给“新奥得报”有关战事进程的文章；在阐述战争进程时，马克思有时把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军事评论全部译成德文加以利用；有时，马克思把恩格斯的文章加以压缩后寄给“新奥得报”，有时还对这些文章作一些修改和补充。

本卷刊载了“新奥得报”发表过的十二篇马克思的文章和一篇恩格斯的文章；这家报纸发表过的绝大部分文章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

本文以“回顾”（《Rückblicke》）为标题载于“新奥得报”。——第620页。

309 指沙皇接受向它提出的四项条款（见注321）后，英、法、奥、俄四国代表于1854年12月至1855年1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谈判因沙皇拒绝接受西方国家在会上提出的关于限制俄国在黑海的海军力量的要求而失败。——第620页。

310 招募外国人服役的法案规定要建立15000人的军团。这个法案是陆军大臣纽卡斯尔为了补充克里木的英国军队于1854年12月12日向议会提出的。这个法案于12月22日被议会通过并得到女王的批准。但是，由于国内人民纷纷起来反对在战争中使用外国雇佣军队，外籍军团未能建成。——第621页。

311 1854年5月，议会通过了关于将民军服役期延长到战争结束的法案。在英国，民军是按郡征集的志愿部队，服役期为6年。1907年，民军经过改组而成为正规军的一部分。——第621页。

312 普军和法军的耶拿会战发生于1806年10月14日，以普军的溃败而结束。——第624页。

313 1643年5月19日，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时期的罗克鲁阿（比利时边境上的法国要塞）会战中，围攻要塞的西班牙军队全军复没。一

向被认为是无敌的西班牙步兵的失败使战争进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第 625 页。

314　见注 52 和 90。——第 629 页。

315　指英、俄、奥、普四国于 1840 年 7 月 15 日签订的关于援助土耳其苏丹反对埃及执政者穆罕默德－阿利（见注 53）的伦敦公约。签订这个公约并没有让支持穆罕默德的法国参加，这使法国面临形成反法同盟的威胁，而不得不放弃了对埃及执政者的支持。——第 629 页。

316　“把猫头鹰运到雅典去了”是希腊的谚语，同俄国谚语“带茶炊到土拉”意思相近。在雅典及其城郊猫头鹰非常之多。——第 639 页。

317　和平协会是教友会派于 1816 年在伦敦成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这个协会得到自由贸易派的积极支持。自由贸易派认为，英国在和平的条件下可以借助于自由贸易更充分地发挥它的工业优势并取得经济和政治的霸权。——第 640 页。

318　指 1806—1812 年的俄土战争和 1828—1829 年的俄土战争。——第 641 页。

319　曼彻斯特学派——见注 38。——第 643 页。

320　马克思指的是在曼彻斯特出版的英国自由派报纸“观察家时报”（《Examiner and Times》）。该报是 1848 年由“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和“曼彻斯特观察家”（《Manchester Examiner》）两家报纸合并成的。在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该报支持自由贸易派；以不同的名称出版到 1894 年。——第 643 页。

321　指西方强国在 1854 年 8 月 8 日的照会中向俄国提出的作为开始和谈的先决条件的要求。俄国应当放弃对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的保护权，代之以全欧的保证；允许多瑙河上的航行自由；同意修改 1841 年伦敦海峡公约并放弃对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的保护权。沙皇政府最初拒绝接受这四项条款，1854 年 11 月终于被迫同意把这四项条款作为以后和谈的基础。——第 646 页。

322 见注 65。——第 646 页。

323 见注 13。——第 647 页。

324 在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时期，波兰革命者曾在华沙夺得康斯坦丁大公的档案库，其中有许多沙皇外交的秘密文件。一部分载于 1835—1836 年出版的“公文集”，一部分载于 1854 年在巴黎出版的《Recueil de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Russie 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édits utiles à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一书。1825 年 10 月 16 日（4 日）波茨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载于该书第 4—47 页。——第 647 页。

325 印刷所广场是伦敦的一个广场，“泰晤士报”总编辑部所在地。——第 649 页。

326 见注 71。——第 649 页。

327 “星期日时报”（《The Sunday Times》）是英国的一家周报，从 1822 年起在伦敦出版；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辉格党的机关报。——第 650 页。

328 “先驱”（《The Leader》）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1850 年在伦敦创刊。——第 650 页。

329 “观察家”（《The Examiner》）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刊，1808 年至 1881 年在伦敦出版。——第 650 页。

330 根据俄、英、法三国针对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于 1827 年 7 月 6 日签订的伦敦公约的第五条，缔约国不得进行任何的领土扩张，不得单独设法取得其他两国所没有同时得到的贸易上的权利或特权。

根据 1829 年签订的结束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的阿德里安堡条约，俄国得到了多瑙河口的岛屿，这个条约还保证了各强国的船舶在多瑙河的航行自由。

1836 年 3 月 2 日（2 月 19 日）沙皇政府命令在多瑙河的苏利纳河口建立检疫所，它实际上执行海关的任务。——第 651 页。

331　指1853年9—11月“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的马克思的文章“政治态度。——欧洲缺粮”、“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战争。——罢工。——生活费用上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41—349、360—371、491—500页)。——第655页。

332　见注91。——第657页。

333　见注53。——第660页。

334　Douglas.《A Treatise on Naval Gunnery》, London, 1855,——第661页。

335　指1854年12月30日法国立法团通过的发行5亿法郎公债以弥补战争开支的决定。——第662页。

336　“太阳报”(《The Sun》)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798年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第664页。

337　见注305。——第665页。

338　从马克思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1854年11月14日、21日和12月8日先后把“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中的三篇文章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它们的标题是“1820—1822年7月的西班牙”、“西班牙。武装干涉”和“西班牙。1833年”。这三篇文章都没有见报。这里发表的片断是1854年11月21日寄出的文章的一部分。——第669页。

339　马克思把里埃哥1823年的进军称之为*第二次加迪斯远征*。1823年8月，里埃哥从被法军包围的加迪斯到达马拉加，打算从这里冲到卡塔卢尼亚，当时米纳将军正在那里和干涉者进行顽强的斗争。里埃哥试图将已经停止抵抗的巴列斯帖罗斯军队带走，但未能成功，于是他率领一小支部队向卡塔黑纳且战且走。在赫雷斯城下，他的部队被兵力强大得多的法军击溃；9月15日，里埃哥被捉住并被交给法军。

*第一次加迪斯远征*是里埃哥在1820年的进军。这次进军是革命的开端(见本卷第507—508页)。——第669页。

340　“信军”是天主教专制主义集团(阿波斯托尔教派)所组织的部队的称

号，这支部队1822年在卡塔卢尼亚、纳瓦腊和比斯开发动反对革命政府的叛乱；1823年，法国武装干涉时期，“信军”站在干涉者方面作战。——第669页。

341 康姆尼罗斯是对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建立的西班牙的秘密政治联盟（西班牙康姆尼罗斯联盟）的成员的称呼。康姆尼罗斯代表城市居民中最民主的阶层——手工业者、工人、一部分知识分子、一部分军官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共有7万人。康姆尼罗斯主张与反革命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在革命被镇压之后，康姆尼罗斯遭到最残酷的迫害并停止了活动。——第670页。

342 E. San Miguel.《De la guerra civil en España》, Madrid 1836. ——第671页。

343 指斐迪南七世的专制制度在1820—1823年革命被镇压后在西班牙复辟。斐迪南七世政权的第一次复辟是在1814年拿破仑第一失败之后。——第671页。

344 指1833—1840年的卡洛斯派战争和1834—1843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第672页。

345 1832年9月，患重病的斐迪南七世撤销了1830年关于西班牙王位必须由其幼女伊萨伯拉继承的敕令；斐迪南病愈后，又恢复了她继承王位的权利，从而使支持斐迪南的弟弟唐·卡洛斯的奴才派（见注268）的期望落空。——第672页。

346 “喀琅施塔得要塞”手稿第一次在本卷发表，它是恩格斯打算为给伦敦出版的“每日新闻”写的军事论文之一。恩格斯在1854年3月提出为该报撰稿。恩格斯打算当该报的通讯员，希望以此摆脱曼彻斯特商业办事处的工作并迁到伦敦马克思那里去。这篇手稿没有刊出，而在4月底恩格斯就已告诉马克思说，“同‘每日新闻’的交通垮台了”（见1854年3月30日恩格斯致“每日新闻”编辑的信和他1854年4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

恩格斯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看法，如关于喀琅施塔得对俄国的战略

意义、要塞攻击战中使用螺旋推进式舰队的可能性等等，从军事理论观点来看具有很大的意义。恩格斯文章中有关喀琅施塔得工事的火炮配备的数字材料，有几处与俄国指挥部的材料不符，这是由于缺少完整的情报的缘故，恩格斯本人也谈到过这一点。—— 第 673 页。

347　“英国资产阶级” 一文可能是马克思在 1854 年 3 月 31 日寄到纽约的。本文刊载于本卷的附录，是因为 “纽约每日论坛报” 编辑部把它作为社论发表时曾作过重大的篡改。文章的第一部分显然被歪曲了，有许多论点不符合马克思的观点。例如，关于考察资产阶级政策不能从阶级观点，而必须从一般的人道主义观点着眼的说法便是如此。另一方面，文章里还有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论点无疑是马克思的。这首先是对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的评价和关于 1853 年至 1854 年普雷斯顿罢工的部分。马克思的许多文章都谈到过这次罢工（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 9 卷和本卷第 254 页）。—— 第 683 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54年1月——1855年1月)

1854

1—12月	马克思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系统地收集有关具体经济的统计资料和其他资料,他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中利用了其中的一部分。 恩格斯加紧研究军事理论问题和具体分析军事事件,并在应马克思的请求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军事评论中加以系统的阐述。
1月1日	恩格斯在伦敦马克思处逗留几天之后返回曼彻斯特。
1月2日	马克思接到“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德纳1853年12月16日的来信说,他寄去的“多瑙河战争”一文,和他更早以前寄去的军事评论一样,已经作为社论发表,没有署名。
1月5日	马克思通知恩格斯,说恩格斯应他的请求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评论在美国引起强烈的反应,并且这些评论被认为是出于著名的司各脱将军的手笔。
1月8日	针对英法分舰队进入黑海,恩格斯写文章分析战争的前途和因战争而在欧洲引起革命的可能性。该文以“欧洲战争”为题在2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该文的德译文2月3—4日在纽约出版的德国旅美工人联盟(美国工人同盟)的机关报“改革报”上发表。

1月10日 马克思收到伦敦出版商塔克尔关于抨击性小册子“帕麦斯顿和俄国”第一版已经售完需要再版的建议。马克思表示同意。

马克思把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改革报”记者阿·克路斯的信转给恩格斯。马克思经常同克路斯通信，对他在美国传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活动提出各种建议。马克思经常从克路斯那里得到关于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情况。

1月14日 根据自己的亲戚约·卡·尤特的建议，马克思给在卡普施塔德(开普敦)出版的“南非人报”写“东方战争”一文。该文在3月6日发表。马克思在2月14日和3月14日寄给该报的其他两篇文章没有发表。

1月中旬 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高尚意识的骑士”在纽约出版，马克思在这本小册子中通过维利希的实例揭露了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所特有的宗派主义、清谈习气和玩弄革命的蛊惑手法。这本小册子由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出版。

1月18日 马克思把自己对切塔特会战的意见告诉给恩格斯，并且请他就这个题目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一篇文章。

1月19日 恩格斯写一篇专门论述切塔特会战的文章“欧洲战区最近的一次会战”。该文作为社论在2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

1月20日 马克思写“东方的军事行动。——奥地利和法国的财政。——君士坦丁堡的设防”一文。该文在2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

1月下半月 马克思交涉出版新的论帕麦斯顿的小册子的问题。这本小册子是由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编成的。

1月27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君士坦丁堡的设防。——丹麦的中立。——英国议会的成分。——欧洲的歉收”一文。马克思在英国议会的组成一节中指出，英国现行的选举制度保证贵族寡头政体的统治。该文发表在2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马克思收到从美国寄来的他的小册子“高尚意识的骑士”100本。
2月初	马克思的小册子“帕麦斯顿和俄国”再版。另一本小册子“帕麦斯顿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同时在同一书局出版，这本小册子翻印了1853年底马克思在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
2月初—2月10日	马克思研读蓝皮书中关于东方问题的文件并撰写“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门的内哥罗”一文。该文在2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
2月3日	马克思写“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俄国的战时财政”一文。该文在2月2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
2月6日—3月7日	马克思注视英国议会关于东方问题和军事预算问题的发言，并且写了一系列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来揭露英国执政的寡头政体的政策。这些文章分别在2月21日，3月9日、13日和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
2月7日	马克思非常注意琼斯和其他革命的宪章派筹备召开工人议会的活动，在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中揭露了资产阶级激进派破坏这次工人代表会议召开的企图。该文在2月21日发表。
2月9日	马克思寄给恩格斯几本“高尚意识的骑士”和小册子“帕麦斯顿和俄国”，并且请他转交给威·沃尔弗和恩·德朗克各一本；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们像同其他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一样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2月13日	恩格斯写“欧洲战争问题”一文。该文在3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
2月17日左右	马克思从斐·拉萨尔那里得知普鲁士政府打算大规模逮捕民主主义活动家的消息以后，决定揭露这些计划，以阻止其实现；为此他写了“普鲁士内阁的声明。——波拿巴的计划。——普鲁士的政策”一文。该文在3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
2月底—3月	恩格斯为了实现他给伦敦自由派报纸“每日新闻”写一组关于俄国兵力的文章的计划，开始写“喀琅施塔得要塞”一文。他希望担任该报军事专栏的固定通讯员，并且希望通过给该报撰稿这一工作使他能够摆脱掉他在曼彻斯特“欧门和恩格斯”公司的办事员的工作，并迁居到伦敦马克思那里去。 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德国民主派政论家亨·海泽（1848—1850年期间担任在加塞尔出版的讽刺性报纸“大胡蜂”的编辑）在曼彻斯特定居。
3月3日	马克思写关于奥地利的财政的文章。该文以“奥地利的破产”为题在3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 马克思把“法国和英国的军事计划。——希腊人暴动。——西班牙。——中国”一文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该文于3月18日发表。
3月6日	在曼彻斯特开幕的工人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邀请马克思博士作为名誉代表参加会议的决议。
3月7日和10日	马克思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一些文章中阐述了工人议会的活动。“工人议会开幕。——英国的军事预算”和“工人议会”两篇文章分别于3月24日和29日在该报上发表。

3月9日	马克思寄贺信答谢曼彻斯特工人议会要他作为名誉代表参加会议的邀请，信中提出英国工人当前的任务是建立独立的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马克思给工人议会的信在3月10日的会议上宣读，并在3月18日“人民报”上发表。
3月10日	恩格斯接到琼斯要恩格斯到他那里去了解马克思给工人议会的信的内容的邀请。
3月13日	恩格斯写“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一文；该文在3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马克思继续对厄·琼斯在出版和编辑“人民报”方面加以支持，并把这篇文章寄给他。文章于3月18日在该报上发表。
3月21—24日	马克思在阅读了蓝皮书中发表的英国驻彼得堡大使同英国外交大臣在1853年秘密往来的公文之后，写“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两篇文章。文章分别在4月5日和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
3月23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对拉萨尔关于进行克里木战争的看法提出批评；拉萨尔在他给马克思的信中曾阐述过他的这些看法。
3月27日	马克思在给德纳的信中抗议“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他的文章所采取的无礼态度。他坚决反对用他的文章(军事论文除外)作为社论，否则他就提议在发表他的文章时一律不署名，因为他不愿意把他的名字只是署在没有多大意义的材料下面。
3月28日	马克思写“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一文，在写这篇文章时，马克思利用了官方文件以及法明的“基督教会在东方的竞争和对它们进行保护的历史”一

	书。该文发表在4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3月30日	恩格斯把"喀琅施塔得要塞"一文寄给"每日新闻"。该报编辑部由于得知恩格斯进行革命活动和信仰共产主义而拒绝让他撰稿。该文一直没有发表。
3月底—4月初	马克思因研究东方问题而阅读哈麦尔的"奥斯曼帝国史"一书。
4月4日	马克思写"议会的战争辩论"一文,该文详细地谈到1844年沙皇同英国外交官们就瓜分土耳其问题进行的秘密谈判。该文发表在4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德译文则发表在4月20—22日"改革报"上。
4月6日—6月1日	马克思在同拉萨尔辩论克里木战争的性质时指出,英国统治阶级由于害怕欧洲革命运动的加强而不愿意使沙皇政府在军事上遭到溃败,因而他们不能始终不渝地坚决地对俄作战。
4月7日	马克思写"俄国和德意志强国。——粮食价格"一文。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认为,由于奥地利和普鲁士参战而使战争具有全欧性质并且可能加速全欧革命危机的到来。该文发表在4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4月13日	恩格斯写"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一文,该文在4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
4月18日	马克思写"列施德-帕沙的照会。——意大利报纸论东方问题"一文。马克思在该文中指出,东方问题的正确解决对德意志、匈牙利和意大利的人民有着特别的利害关系;他指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靠牺牲他民族的独立而为自己争得自由。该文在5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
4月20日	恩格斯在接到"每日新闻"编辑部拒绝发表他的军事论

文的通知之后告诉马克思说，他打算把关于俄国兵力的论文寄给伦敦最大的一家报纸“泰晤士报”。恩格斯的文章并没有在“泰晤士报”上发表。

4月28日 马克思写“希腊人暴动。——波兰侨民。——奥地利—普鲁士条约。——关于俄国武装的文件”一文，文中援引了一系列说明沙皇俄国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性质的俄国官方文件。该文发表在5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4月底 恩格斯帮助盖扎写一篇文章批评曾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同在美国的维利希分裂集团有联系的亚·席梅尔普芬尼希的军事冒险计划。该文本来是给在纽约出版的“改革报”写的，但由于该报停刊，没有发表。

4月底—5月 马克思研究西班牙文——阅读卡德龙的原著，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以及其他书籍。

5月—6月初 马克思阅读“从庇护九世即位到放弃威尼斯的三年期间意大利问题文献”中有关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的文件。他认为公布包括各种不同文件和截获的信件的文献，对研究意大利革命是很有价值的。

5月初 由于加入土耳其帝国的特萨利亚和伊皮罗斯的希腊居民暴动，马克思研究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独立的希腊国家形成的历史，阅读帕里什的“1830年以来希腊君主国的外交史”一书，并且作了摘录。

5月2日和5日 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两篇关于当前事件的文章。该报编辑部把这两篇文章合为一篇——“炮击敖德萨。——希腊。——门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伊费尔的演说”，于5月16日发表。该文尖锐地批胜了普鲁士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和整个普鲁

	士国家制度。编辑部把一部分材料篡改得面目全非后以“普鲁士的政策”这个标题作为该报的社论在5月19日发表。
5月9日	马克思写“不列颠的财政”一文，揭露了格莱斯顿的财政措施的蛊惑性。文章在5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后，在纽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被转载于5月25日“纽约时报”。
5月10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克路斯的来信说，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打算在伦敦出版一份英文报纸，并且请马克思参加编辑部工作。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5月10日左右—5月底	马克思患重病。因此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大部分文章是恩格斯写的。
5月12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克路斯的通知说，由于资金不足，“改革报”于4月26日停刊。
5月22日	恩格斯写定期的军事评论，这篇评论以“战争”为题在5月27日“人民报”上发表，同时还在6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
5月24日	恩格斯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一篇文章中对陈旧的英国军事制度作了全面的批评。该文以“英国军队的现状及其战术、服装置备、军需部等等”为题发表在6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署名马克思。
5月30日	马克思写“奥地利—普鲁士条约。——五月二十九日的议会辩论”一文，指出英国的外交极力使奥地利和普鲁士中立，以便保持克里木战争的局限性。该文在6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
5月底	由于警察局监视马克思的通信，马克思不得不借用人的通信地址；他有两个可以同德国通信的地址。

6—7 月 鉴于西班牙革命事件的迫近，马克思着手研究西班牙历史。他阅读弗洛雷斯、普林西佩、马尔利安尼、休斯和其他作者的书籍并且从中作了大量的摘录。

6—11 月 恩格斯研究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战争的历史，预计在冬季就这个问题写一本书。

6 月 3 日左右—6 月 21 日左右 马克思的妻子患病，马克思没钱请医生。恩格斯和往常一样来帮助自己的朋友。

6 月 6 日 马克思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一篇开始揭露波拿巴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总司令圣阿尔诺的文章。该文没有发表。

6 月 9 日 马克思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英国军事部门的改组。——奥地利的要求。——英国的经济状况。——圣阿尔诺”一文中指出，因为法国和英国的统治阶级力图保持由维也纳会议在欧洲建立起来的反动秩序，害怕沙皇制度被彻底粉碎，所以决不能把盟国同俄国的战争看做是自由同专制的战争。马克思在批评英国政论家戴·乌尔卡尔特的立场时着重指出，能够消灭英国的腐败的政府制度的唯一政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该文在 6 月 24 日发表。

6 月 10 日 恩格斯写关于俄军围攻土耳其要塞——锡利斯特里亚的文章。这篇文章包括大量的军事历史材料，并以“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为题发表在 6 月 2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6 月 16 日 马克思对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俄土战场的形势”一文作了补充并将该文寄往纽约。文章于 7 月 8 日在该报上发表。

6 月 23 日 马克思利用恩格斯给他寄来的材料为“纽约每日论坛

	报”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是“俄军的撤退”，7月10日在该报上发表。
6月27日	马克思写“战争。——议会辩论”一文。文章对英国的秘密外交作了揭露，发表在7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7月6日	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定期的军事评论。该文以“多瑙河战争”为题在7月25日作为社论发表。
7月7日	马克思在细心地观察了西班牙事件之后写“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债。——瓦拉几亚”一文，文章除了阐明一些其他问题之外指出，在西班牙业已开始的军事叛乱在人民群众的不满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可能变成普遍起义。该文在7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
7月14日	马克思写“意大利的紧张。——西班牙事件。——德意志各邦的立场。——英国法官”一文。该文发表在7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7月20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根据德朗克所述告诉关于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瑙特、丹尼尔斯、贝克尔和其他人的一些消息。
7月下半月	马克思读1853年出版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奥·梯叶里的“第三等级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一书（马克思从前曾读过他的其他著作），并且从该书中作了很多摘录；他在7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这本书提出批判性的分析，指出该书作者是能够在历史过程中最先发现阶级斗争存在的人之一，虽然他没有从这一点在理论上作出相应的结论。
7月21日	马克思写“西班牙的革命。——土耳其和希腊”一文，指出在西班牙已经开始的革命运动正在超出普通的军事

叛乱的范围，并且由于人民群众的参加而具有民主性。该文发表在8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7月24—25日 马克思到英国议会会议旁听，会议对战争问题进行了辩论；他在“议会的战争辩论”和“奥地利的政策。——下院的战争辩论”两篇文章中叙述了自己的感想；这两篇文章分别在8月7日和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

7月27日 马克思把塔克尔关于把“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出版单行本的建议告诉给恩格斯。马克思打算同恩格斯合写一本关于英国人从宣战以来的外交和军事行动的抨击性小册子，并且还打算把“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一文和论帕麦斯顿的小册子交给塔克尔重印。他征求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7月29日—8月1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无聊的战争”一文，指出西班牙的革命事件可以开辟欧洲革命的新纪元。该文发表在8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8月—12月初 马克思继续在英国博物馆研究西班牙历史。他阅读大量的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书刊，从托雷诺、普腊德、霍韦利亚诺斯和其他作者的著作中作了大量的摘录。

8月4日 马克思根据他已经研究过的有关西班牙进步派领袖的传记的材料写“埃斯帕特罗”一文。达篇文章揭露埃斯帕特罗是一个没有能力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解放斗争的人。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8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8月8日 马克思认为使美国工人了解革命的宪章运动的斗争经验有很大意义，因而在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一篇定期的文章中援引了琼斯在1854年夏天在英国各地作宣传旅行的材料。文章在8月21日发表。

8月25日—12月8日	马克思写“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他写的11篇文章中只有8篇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9月9日和25日,10月20、27日和30日,11月24日,12月1日和2日)。在这些文章中阐述了1808—1814年和1820年西班牙革命事件的历史。最后3篇论述1820—1823年和1833年的事件的文章没有发表。
9月8—13日	马克思接到厄内斯特·琼斯的两封来信,谈到“人民报”的困难情况并请马克思给他以可能的帮助。
9月13日	马克思把自己经常保持联系的、流亡的德国共产主义者皮佩尔和施特芬的物质上的困难情况告诉恩格斯。
9月15日	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联军舰队的活动。——多瑙河各公国的局势。——西班牙。——英国的对外贸易”一文,文中除了阐述一些其他问题之外,还根据他所收集的统计材料对英国对外贸易的动态作了阐述。该文发表于10月2日。
9月18日	针对英法开始进攻塞瓦斯托波尔,恩格斯写了一篇评论盟国的军事行动的文章。文章以“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为题在10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
至迟9月29日	马克思接到“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通知说,该报由于物质上的困难不得不把马克思的稿酬削减一半,请他每周只寄一篇文章并且在发表这些文章时不署名。
10月2日	恩格斯写“克里木的消息”一文,对当时得到的关于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消息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且对消息的可靠性表示怀疑。该文发表在10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10月5—6日	由于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消息不可靠,马克思和恩格

斯写一篇文章揭露法国和英国政府利用谣言来达到蛊惑性目的的手法。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尔贝斯所持的沙文主义立场，并且指出奥·布朗基是革命的法国的真正领导者。“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把这篇文章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以“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为题在 10 月 21 日作为社论发表，另一部分以“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概评”为题在该报同一号上发表，没有署名。

10 月 9—30 日　恩格斯写“阿尔马河会战”、“俄国的兵力”、“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作为社论分别发表在 10 月 26 日和 31 日以及 11 月 1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文章在纽约产生很大的影响。

10 月 29 日以后　马克思被邀请参加因拿破仑第三拟来英国访问而由伦敦的宪章派组织的反波拿巴委员会的工作。根据琼斯的提议，马克思同马志尼、维·雨果、路易·勃朗等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活动家一起被选为这个委员会的名誉委员。马克思表示拒绝；他向琼斯说明，如果这种发动具有纯粹英国的性质，将有更大得多的效果；琼斯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并且后来他在委员会的工作中遵循这一点。

11 月 9 日—12 月 4 日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继续定期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关于塞瓦斯托波尔战役进程的军事评论。他的“克里木战局”、“巴拉克拉瓦会战”、“因克尔芒会战”和“克里木战局”等文章分别在 11 月 27 日和 30 日、12 月 14 日和 27 日发表。

11 月 22 日　马克思告诉恩格斯：布林德以及其他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首领企图组织有德国流亡者一切派别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马克思）参加的抗议俄国和抗议德意志各邦君主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场的群众大会。由

	于不同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首领们对克里木战争的立场，马克思拒绝参加，并且打算在必要时组织有英国宪章派参加的反群众大会。
1854 年 12 月—1855 年 1 月	马克思重读他前几年作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笔记本，“如果不是为了把它们加工，那末至少是为了掌握材料并且把材料准备好以便整理”。他作了简单的纲要，并且加上了“货币，信贷，危机”的标题，同时在每一个条目之后都援引了摘有不同作者（吉耳布雷思、桑顿、图克、哈巴德、约·斯·穆勒、富拉顿等）的文章的有关笔记本，标出作者、著作名称和自己笔记本的页码。他后来在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纲要”和“资本论”第三卷时利用了这份材料。 恩格斯研究一系列有关俄国和斯拉夫人民的历史的德文、俄文和其他文字的书籍和材料。他阅读哈克斯特豪森、赫尔岑（“来自对岸”、“俄国和旧世界”、“往事和追思”）以及帕顿、兰克、沙法里克、马切奥夫斯基、恩格尔等人的书籍。
12 月初	恩格斯在和德朗克通信中谈到送递从德国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瑙特那里收到的 65—70 份用红油墨印的最近一号“新莱茵报”的问题。
12 月 2 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由拉萨尔转来的要他给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撰稿的建议；该报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出版并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摩·弗里德兰德和摩·埃尔斯纳参加。
12 月 15 日	马克思对恩格斯寄来的文章作了补充，该文再一次强调这样的思想，即奥地利和普鲁士参战会有助于欧洲革命的开始。文章以“战况的进展”为题发表在 1855 年 1 月 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12月20日 马克思把他同意为“新奥得报”撰稿一事告诉恩格斯。

12月21日 恩格斯写“奥地利的兵力”一文，该文作为社论发表在1855年1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1854年12月22日左右—1855年1月初 恩格斯在伦敦马克思处。

1854年12月29日—1855年1月1日 马克思写两篇总标题为“克里木战局的回顾”的文章，马克思从这两篇文章开始给“新奥得报”撰稿。文章在1855年1月2日和4日发表。

1855

1月—2月初 马克思继续阅读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笔记本。他主要是按照地租和人口论问题编制这些笔记本的索引，其中包括多年的“经济学家”杂志的摘录和戴夫南、艾利生、配弟、布阿吉尔贝尔、洛克、斯图亚特等人著作的摘录。

1月4日 恩格斯一回曼彻斯特就写了一篇激烈批评整个英国军事制度的文章。文章以“英军在克里木的灾难”为题在1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

1月5—6日 马克思把恩格斯写的“英军在克里木的灾难”一文译成德文寄给“新奥得报”，并作了一些修改。文章于1月8日和9日在该报上发表。

1月8—22日 马克思给“新奥得报”写一组以“工商业危机”为题的文章，文章根据对英国商业的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周期又达到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投机为危机代替”的阶段。这一组文章分别在1月11、12、20日和25日发表。马克思把一篇同样题目的文章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并于1月26日发表。

1月9—23日 马克思继续定期给“新奥得报”寄关于英国内政问题的

	文章以及利用恩格斯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中的材料所写的军事评论;这些文章分别在1月13、15、18、22、23日和26日发表。
1月16日	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诞生。
1月23日	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答复一系列经济问题,其中包括关于废除谷物税对工业品价格和工资数量的影响问题。马克思答应一有机会就从自己的经济学笔记本中把拉萨尔感兴趣的问题的一些确切数字材料收集给他,现在提供的只限于一般的资料。

人 名 索 引

四 画

巴罗，奥迪隆（Barrot，Odilon 1791—1873）——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年2月前是自由主义王朝反对派首领，1848年12月—1849年10月领导以各保皇派组成的反革命联盟为支柱的内阁。——第71页。

巴特，伊萨克（Butt，Isaac 1813—1879）——爱尔兰律师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在七十年代是爱尔兰自治运动的组织者之一。——第66、92、394页。

巴林顿，威廉·克佩耳（Barrington，William Keppel 生于1793年）——英国贵族，议会议员。——第52页。

巴特勒，詹姆斯·阿默尔（Butler，James Armar 1827—1854）——英国军官，1854年锡利斯特里亚防御战的组织者之一。——第390、395页。

巴腊伊班（Baraiban）——西班牙军官，曾参加1854—1856年的资产阶级革命。——第372页。

巴尔贝斯，阿尔芒（Barbès．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848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制宪议会议员，因参加1848年5月15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1854年遇大赦被释，赦免后侨居国外，不久便脱离政治活动。——第559页。

巴尔博亚，华斯哥·努涅斯（Balboa，Vasco Nuñez 1475—1517）——西班牙航海家和征服者，第一个横穿巴拿马地峡到达太平洋海岸的欧洲人。——第461页。

巴腊斯帖基（Barastequi）——西班牙军官，埃斯帕特罗的拥护者。——第371页。

巴拉盖·狄利埃，阿希尔（Baraguayd’Hilliers，Achille 1795—1878）——法国将军，1854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3—1854）；1854年就统率波罗的海的法国远征军。——第10、28、65、75、78、107、121、217、348、363、527页。

巴列斯帖罗斯，弗朗西斯科·洛佩斯（Ballesteros，Francisco Lopez 1770—1833）——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在反动年代任陆军大臣（1815）；曾参加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第669页。

比伯斯库——见施梯尔贝。

比达耳夫，迈克尔·安东尼（Biddulph，Michael Anthony 1823—1901）——英国军官，后为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加

者,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一书(1854年出版)的作者。——第576页。

比列—布腊赫,亨利(Bille-Brahe,Henrik 生于1798年)——伯爵,丹麦外交家,五十年代为驻维也纳公使。——第360页。

孔查,霍赛·古蒂埃勒斯·德·拉(Concha,José Gutiérrez de la 1809—1895)——西班牙将军,反动分子,古巴的军事总督(1850—1852、1854—1859),曾残酷镇压古巴的民族解放运动,政府首脑(1868)。——第432页。

孔查,曼努埃尔·古蒂埃勒斯·德·拉(Concha,Manuel Gutiérrez de la1808—1874)——西班牙将军,属于温和派,1854年为军事洪达主席,镇压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之一。——第404、438、523页。

邓科布,托马斯·斯令斯比(Duncombe,Thomas Slingsby 1796—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四十年代曾参加宪章运动,议会议员。——第254页。

邓达斯,詹姆斯·威特利·迪恩斯(Dundas,James Whitley Deans 1785—1862)——英国海军上将,自1852年至1855年1月为参加克里木战争的英国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第3、93、107、245、247、308、424、582页。

丹年洛别尔格,彼得·安得列也维奇(Данненберг,Петр Андреевич 1792—1872)——俄国将军,1853—1854年在多瑙河和克里木任军长。——第144、597、608、609页。

丹尼洛·涅哥什(Danilo Negoš 1826—1860)——门的内哥罗国君(1852—1860)。——第233、234页。

天王——见洪秀全。

天主教徒斐迪南五世(1452—1516)——加斯梯里亚国王(1474—1504)和执政者(1507—1516),阿腊贡国王,称斐迪南二世(1479—1516)。——第456—460页。

戈多伊,曼努埃尔(Godoy,Manuel 1767—1851)——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的大臣,实际上是西班牙的执政者(1792—1798和1801—1808),1795年起受封为"和平公爵";曾帮助法国人占领西班牙,1808年被人民起义打倒。——第456、463、467、474、475、495、516页。

韦德耳,多米尼克·奥诺莱·玛丽·安都昂(Vedel,Dominique-Honoré-Marie-Antoine 1771—1848)——法国将军,1808年在西班牙作战时,在拜兰附近率本师投降。——第471页。

厄斯特德,安德斯·桑戴(Ørsted,Anders Sandøe 1778—1860)——丹麦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1853—1854年为首相。——第49页。

扎莫伊斯基,弗拉斯拉夫(Zamoyski,Wladyslaw)——伯爵,波兰大地主,曾参加1830—1831年的起义,起义被镇压后成为在巴黎的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领导人之一;克里木战争时,企图组织波兰军团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第222页。

切奥达也夫,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Чеодаев,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死于1859年)——俄国将军,曾参加1812年战争,克里木战争时期任军长和预备部队的指挥官。——第144、146、147页。

五　画

布朗,乔治(Brown,George 1790—

1865)——英国将军,1854—1855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第423、561、562页。
布莱,詹姆斯(Bligh,James)——五十年代宪章运动的积极活动家之一。——第125、139页。
布塞塔(Buceta)——西班牙陆军上校,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曾参加1854—1856年的资产阶级革命。——第365、372页。
布雷迪,约翰(Brady,John 生于1812年)——英国医生,议会议员。——第53页。
布莱特,约翰(Bright,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自六十年代初为自由党左翼领袖之一;曾多次担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职务。——第44、50、88、198、272、273、451、643页。
布拉克,华金(Blake,Joaquin 1759—1827)——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1810年被任命为摄政会议主席,在1814年斐迪南七世回国后他反对专制制度。——第487页。
布坎南,安得鲁(Buchanan,Andrew 1807—1882)——英国外交家,1853—1858年任驻哥本哈根公使。——第49页。
布鲁姆,亨利·彼得(Brougham,Henry Peter 1778—1868)——男爵,英国法学家和文学家,在二十至三十年代是辉格党的著名活动家,大法官(1830—1834);五十年代起在政治生活中不起重大作用。——第30、189、323页。
布鲁克,卡尔·路德维希(Bruck,Karl Ludwig 1798—1860)——男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大企业主;曾任工商和公共工程大臣(1848—1851),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53—1855),财政大臣(1855—1860)。——第217、384、385页。
布鲁土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Marcus Junius Brutus 公元前85左右—42)——罗马政治活动家,贵族共和派的反尤利乌斯·凯撒密谋的发起人之一。——第46页。
布律阿,阿尔芒·约瑟夫(Bruat,Armand-Joseph 1796—1855)——法国海军上将,1854年为黑海分舰队司令,1855年为黑海舰队总司令。——第70、363、423页。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Louis 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许多秘密团体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最杰出的领导者;曾多次被判处徒刑。——第559页。
布朗尼埃,安那托尔(Brenier,Anatole 1807—1885)——男爵,法国外交家,外交部长(1851),驻那不勒斯公使(1855—1856和1859—1860),1861年起办参议员。——第82、83页。
布莱克特,约翰·芬威克·伯戈因(Blackett,John Fenwick Burgoyne 1821—1856)——英国议会议员。——第269页。
布隆诺夫,菲力浦·伊万诺维奇(Бруннов,Филипп Иванович 1797—1875)——男爵,俄国外交家,驻伦敦公使(1840—1854、1858—1860),后为驻伦敦大使(1860—1874)。——第27、43、77、

155、191、353 页。

布吕歇尔，格布哈尔德·勒勃莱希特（Blücher，Gebhardt Leberecht 1742—1819）——普鲁士元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第 263、539、564、592、636 页。

布腊提昂诺，伊昂（Bratiano，Joan 1822—1891）——罗马尼亚政治活动家，1848 年革命时期瓦拉几亚临时政府的成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巴黎；1866 年起为罗马尼亚民族自由派领袖之一，曾任首相（1867—1868 和 1876—1888）。——第331 页。

布莱克伍德，亨利·史蒂文森（Blackwood，Henry Stevenson 生于 1819 年）——英国外交信使。——第 178 页。

布德贝尔格，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Будберг，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798—1876）——俄国将军；1853—1854 年为驻多瑙河各公国的特派专员。——第 327、349、384、413、527 页。

布腊沃·穆里洛，璜（Bravo Murillo，Juan 1803—1873）——西班牙国家活动家，属于温和派，政府首脑（1851—1852）。——第 515 页。

布尔韦尔－利顿，爱德华·乔治·利顿（Bulwer－Lytton，Edward George Lytton 1803—1873）——英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初为辉格党人，1852 年起为托利党人，议会议员。——第 53 页。

布奥尔－绍恩施坦，卡尔·斐迪南（Buol-Schauenstein，Karl Ferdinand 1797—1865）——伯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驻彼得堡公使（1848—1850），后为驻伦敦公使（1851—1852），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52—1859）。——第 30、171、352、360、428 页。

布拉塞－伊－圣马丁，安赛尔莫·德·西格（Blaser y San Martin，Ancelmo de Ciga 1813—1872）——西班牙将军，反动分子，萨尔托里乌斯政府（1853—1854）的陆军大臣。——第 340、341、352、373 页。

布尔昂的哥特弗利德（Godefroi de Bouillon 约 1060—1100）——下洛林公爵（1089—1100），第一次十字军远征（1096—1099）的首领之一。——第 91 页。

卡罗，霍赛·文土腊（Caro，José Ventura 1742—1809）——西班牙将军，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第 481 页。

卡洛斯，唐（Carlos，Don 1788—1855）——斐迪南七世的弟弟，西班牙王位的追求者，曾领导反动的封建教权派发动西班牙内战（1833—1840）。——第 510、672 页。

卡利克，安东（Kalik，Anton 生于 1818 年）——奥地利陆军上校，1854 年夏负特别使命赴多瑙河各公国。——第 428 页。

卡富尔，卡米洛·本佐（Cavour，Camillo Benso 1810—1861）——伯爵，意大利国家活动家、思想家以及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的领袖；撒丁政府首脑（1852—1859 和 1860—1861），依靠拿破向第三的带助，奉行在萨瓦王朝领导下自上而下地统一意大利的政策，1861 年主持第一个意大利政府。——第 82 页。

卡里哥，安东尼奥·马利阿（Garrigò，Antonio Maria）——西班牙军官，曾参加 1854—1856 年资产阶级革命。——第 521 页。

卡罗琳娜(Caroline 1768—1821)——英国女王(1820—1821),乔治四世的妻子。——第408页。

卡斯特罗——见佩雷斯·德·卡斯特罗,埃瓦里斯托。

卡瑟克特,乔治(Cathcart,George 1794—1854)——英国将军,1854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第561、579、590页。

卡德威尔,爱德华(Cardwell,Edward 1813—1886)——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派领袖之一,后为自由党人;曾任贸易大臣(1852—1855),爱尔兰事务大臣(1859—1861),殖民大臣(1864—1866)和陆军大臣(1868—1874)。——第213页。

卡拉斯科,奥古斯丁(Carrasco,Agustin)——十九世纪上半叶西班牙经济学家。——第433页。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Louis 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三十至四十年代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5月起为法国陆军部长,极端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曾任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第540页。

卡拉姆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Карамзин,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766—1826)——俄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作家,亚历山大一世的御用历史学家。——第103页。

卡拉多克,约翰·侯巴特,豪登男爵(Caradoc,John Hobart,Baron Howden 1799—1873)——英国外交家,驻马德里公使(1850—1858)。——第373、430、432页。

卡利尔吉斯,德米特利(Kalergis,Demetrios 1803—1867)——希腊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曾参加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压迫的解放斗争(1821—1829),曾任陆军大臣(1854—1855)。——第524页。

卡尔尼塞罗,霍赛·克利门特(Carnicero,José Clemente)——十九世纪初西班牙作家,著有许多西班牙历史著作。——第468页。

卡迪根伯爵,詹姆斯·托马斯·布鲁德内耳(Cardigan,James Thomas Brudenell 1797—1868)——英国将军,1854年任克里木英军骑兵旅长。——第539、590页。

卡尔沃·德·罗萨斯,洛伦索(Calvo de Rozas,Lorenzo)——西班牙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中的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曾参加1808—1814年和1820—1823年的资产阶级革命,1808年英勇的萨拉哥沙防御战的组织者之一,中央洪达委员,加迪斯议会的倡导者之一。——第476页。

卡德龙·德·拉·巴卡,彼得罗(Calderon de la Barca,Pedro 1600—1681)——杰出的西班牙剧作家。——第476页。

卡斯特尔巴雅克,巴特尔禾·多米尼克·雅克·阿尔芒(Castelbajac,Barthélemy Dominique Jacques Armand 1787—1864)——侯爵,法国将军,正统主义者;1850—1854年任驻彼得堡公使,1856年起为第二帝国的参议员。——第44、77页。

卡尔-路德维希-约翰(Karl Ludwig Johann 1771—1847)——奥地利大公,元帅,在历次对法战争(1796、1799、1805和1809)中任总司令;曾任陆军大臣

(1805—1809)。——第145页。
卡斯坦尼约斯-伊-阿拉贡尼，弗朗西斯科·哈维埃尔(Castaños y Aragoni, Francisco Xavier 1758—1852)——西班牙将军，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在拜兰会战中任西班牙军队指挥官。——第471、472、487页。
卡波第斯特里亚，约翰(Kapodistrias, Ioannes 1776—1831)——伯爵，希腊国家活动家；1809—1822年在俄国供职，曾任俄国外交副大臣(1815—1822)；1827当选为希腊总统(1827—1831)。——第523页。
弗莱明(Flemming)——伯爵，普鲁士外交家，驻维也纳大使馆秘书(1854—1859左右)。——第360页。
弗洛雷斯，霍赛·赛贡多·德(Florez, José Segundo de 生于1789年)——西班牙资产阶级自由派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埃斯帕特罗的历史”一书的作者。——第402页。
弗兰茨一世(Franz Ⅰ 1768—1835)——奥地利皇帝(1844—1835)，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称弗兰茨二世(1792—1806)。——第115、116页。
弗朗斯瓦一世(Francois Ⅰ 1494—1547)——法国国王(1515—1547)。——第182、373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Ⅱ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第120、145、373、474、670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Ⅳ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第57、83、158、201、205、284、379页。
弗雷德里克七世(Frederik Ⅶ 1808—1863)——丹麦国王(1848—1863)。——第425、441、557页。
弗洛里达布朗卡伯爵，霍赛·蒙尼诺(Floridablanca, José Moñino 1728—1808)——西班牙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曾任大臣(1777—1792)，实行过一系列进步的改革；反对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08年为中央洪达主席，曾企图阻止1808—1814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第474、475、480、497页。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Joseph Ⅰ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第75、111、116、284、310、397、430、556、558页。
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马利阿·费南多(Francisco de Acis, Maria Fer-nando 1822—1902)——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的丈夫，——第514、557页。
圣罗曼(San Román)——西班牙将军，1853—1854年任陆军副大臣。——第352页。
圣路易斯——见萨尔托里乌斯，路易斯·霍赛，圣路易斯伯爵。
圣海伦斯——见菲茨赫伯特，阿伦，圣海伦斯男爵。
圣阿尔诺，阿尔芒·雅克·勒卢阿·德(Saint-Arnaud, Armand-Jacques-Leroy de 1801—1854)——法国元帅，波拿巴主义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组织者之一，曾任陆军大臣(1851—1854)，1854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第78、260、266、276、285—288、304、307、350、397、398、423、526、539—542、545、546、548、554、564、580页。
圣费南多公爵，华金·霍赛·梅耳加雷霍

(San-Fernando, Joaquin José Melgarejo 死于 1835 年)——西班牙的反动政治活动家，政府首脑(1819)。——第506、510 页。

圣米格尔-伊-瓦尔埃多，埃瓦里斯托(San Miguel y Valledor, Evaristo 1785—1862)——西班牙将军，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和 1820—1823 年资产阶级革命，曾任自由派内阁首脑(1822)，后参加温和派，任陆军大臣(1840—1842)。——第 343、505—507、512、523、671 页。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和派(这一派因他的名字而被称为皮尔派)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 和 1828—1830)，首相(1834—1835 和 1841—1846)，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第 67、86、150、190、191、629 页。

皮萨罗，弗朗西斯科(Pizarro, Francisco 1475 左右—1541)——西班牙征服者，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征服印加人的国家(秘鲁)。——第 461 页。

皮达尔，彼得罗·霍赛(Pidal, Pedro José 1800—1865)——西班牙反动国家活动家，属于温和派，曾任议会议长(1843)，内务大臣(1844—1848)，外交大臣(1848—1851)。——第 343 页。

加斯克耳，伊丽莎白(Gaskell, Elisabeth 1810—1865)——英国女作家，她的优秀作品表明，她是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第 686 页。

加布雷腊-伊-格里尼约，拉蒙，莫雷利亚伯爵(Cabrera y Griño, Ramon, conde de Morella 1806—1877)——西班牙将军，反动分子，卡洛斯派的首领之一。——第 402 页。

加尔西亚·德·拉·库埃斯塔，格莱哥里奥(Garcia de la Cuesta, Gregorio 1741—1811)——西班牙将军，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第 473、487 页。

汉利，约瑟夫·沃讷(Henley, Joseph Warner 1793—1884)——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贸易大臣(1852 和 1858—1859)。——第 393 页。

汉密尔顿——见西摩尔，乔治·汉密尔顿。

卢纳，阿尔瓦罗(Luna, Alvaro 1388—1453)——加斯梯里亚和累翁的国王璜二世的大臣。——第 455 页。

卢肯伯爵，乔治·查理·宾加姆(Lucan, George Charles Bingham 1800—1888)——英国将军，托利党人，1854—1855 年初任克里木英军骑兵师长。——第 561、591 页。

叶卡特林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第58、120、153、334 页。

叶列娜·巴甫洛夫娜(Елена Павловна 1806—1873)——俄国大公妃，尼古拉一世的弟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的妻子。——第 151 页。

瓦斯康谢尔奥斯，米格尔(Vasconcellos, Miguel 死于 1640 年)——西班牙在葡萄牙的执政者萨瓦的玛格丽特的大臣，在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中被杀死。——第 455 页。

瓦列夫斯基伯爵，亚历山大·弗洛里安·约瑟夫·科伦纳(Walewski, Alexander-Florian-Joseph Colonna 1810—1868)——法国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拿破仑第一和波兰的瓦列夫斯卡娅伯

爵夫人的儿子；曾参加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外交大臣（1855—1860）；曾主持巴黎会议（1856）。——第 165 页。

本生，克利斯提安·卡尔·约西亚斯（Bunsen，Christian Karl Josias 1791—1860）——男爵，普鲁士外交家，政论家和神学家，曾任驻伦敦大使（1842—1854）。——第 159、217 页。

白朗特，夏绿蒂（Brontë，Charlotte 1816—1855）——英国女作家，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第 686 页。

古里也夫，德米特利·亚历山大罗维奇（Гурьев，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751—1825）——俄国国家活动家，曾任财政大臣（1816—1823）。——第 58 页。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第 3、4、11、12、20、22、23、27、34、35、37、43、44、49、51、52、56、57、59、62、65、69—72、77—79、87—91、96、108、117、120、122—124、127、148、150—155、158—173、176—178、188、190—192、198、203、204、219、224、229—232、212、244、259、279、304、305、310、313、315、335、344、349、364、366、378、379、386、415421、424、430、449、450、526、558、569、570、600、601、614、621、649、659、665 页。

兰斯唐侯爵，亨利·配第—菲茨莫里斯（Lansdowne，Henry Petty—Fitzmaurice 1780—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806—1807），枢密院院长（1830—1841、1846—1852），不管部大臣（1852—1863）。——第 189 页。

印范塔多公爵，彼得罗·阿尔康塔腊·德·托勒多（Infantado，Pedro Alcántara de Toledo 1773—1841）——西班牙将军和反动的政治活动家，1823 年任摄政会议主席，1824 年为政府首脑。——第 466 页。

六 画

米涅，克劳德·埃蒂耶纳（Minié，Claude—Étienne 1804—1879）——法国军官，新式步枪的发明者。——第 265、268、583、596—598 页。

米纳，弗朗西斯科·哈维埃尔（Mina，Francisco Xavier 1789—1817）——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家，独立战争（1808—1814）时期游击队领袖之一；1814 年发动反对专制制度的起义的企图失败后，前往美洲，在美洲参加墨西哥独立战争时阵亡。——第 486、488、510 页。

米纳（埃斯波斯—伊—米纳），弗朗西斯科（Mina（Espoz y Mina），Francisco 1781—1836）——西班牙将军，独立战争（1808—1814）时期为游击队领袖之一，1820—1823 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参加者，1833—1836 年曾参加反对卡洛斯派的战争。——第 488 页。

米尼希，布尔哈德·克利斯托夫（克里斯托弗尔·安东诺维奇）（Миних，Бурхард Кристоф（ХристоФор Антонович）1683—1767）——俄国元帅、筑城工程师，在 1735—1739 年俄土战争时任总司令；德国人。——第 399 页。

米耳恩斯，理查·蒙克顿（Milnes，Richard Monckton 1809—1885）——英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十九世纪下半叶为自由党人，议会议

员。——第 53、141、271 页。
米洛什·奥布廉诺维奇(Милош Обренович 1780—1860)——塞尔维亚公爵(1817—1839 和 1858—1860),奥布廉诺维奇王朝的奠基人。——第 26、35 页。
米哈伊尔·奥布廉诺维奇(Михаил Обренович 1823—1868)——塞尔维亚公爵(1839—1842 和 1860—1868)。——第26、35 页。
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32—1909)——俄国大公,尼古拉一世的第四个儿子。——第 168 页。
伊文思,乔治·德·雷希(Evans,George de Lacy 1787—1870)——英国军官,1846 年起为将军,自由派的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1854 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第 561 页。
伊塞特-帕沙(Izzet Pasha)——1853—1854 年为贝尔格莱德的土耳其军事总督。——第 355、428 页。
伊斯土里斯,弗朗西斯科·哈维埃尔(Isturiz, Francisco Xavier 1790—1871)——西班牙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和 1820—1823 年资产阶级革命;曾任政府首脑(1836、1846 和 1858),驻伦敦大使(1848 和 1858)。——第 365 页。
伊萨伯拉一世(Isabella Ⅰ 1451—1504)——加斯梯里亚女王(1474—1504)。——第 459 页。
伊萨伯拉二世(Isabella Ⅱ 1830—1904)——西班牙女王(1833—1868)。——第 123、340、343、352、368、369、405—408、430、432、433、435、512、514、557、672 页。
伊斯甘德-贝伊(亚历山大·伊林斯基)(Iskender Beg (Alexander Ilinski) 1810—1861)——土耳其将军,波兰人,三十至四十年代先后在西班牙、葡萄牙、波斯、法国的军队中供职,曾参加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加入土耳其国籍;曾任多瑙河土军指挥官(1853—1854),克里木土军指挥官(1855)和高加索土军指挥官(1855—1856)。——第 422 页。
伊斯马伊耳-帕沙(Ismail Pasha 1805—1861)——土耳其将军,切尔克斯人;1853—1854 年任多瑙河土军指挥官。——第 144、145 页。
伊斯马伊耳-帕沙(乔治·克美蒂)(Ismail Pasha (György Kmety) 1810—1865)——土耳其将军,匈牙利人;曾参加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加入土耳其国籍;曾任多瑙河土军指挥官(1853—1854),高加索土军指挥官(1854—1855)。——第 57 页。
安斯利,威廉·理查(Annesley,William Richard 1830—1874)——英国贵族,托利党人,议会议员。——第 52 页。
安梅林,弗朗斯瓦·阿尔丰斯(Hamelin, Francois Alphonse 1796—1864)——法国海军上将,1853—1854 年是地中海和黑海舰队总司令,后为海军大臣(1855—1860)。——第 3、97、107、228、245、258、279、560 页。
安烈普-厄尔姆普特,约瑟夫·罗曼诺维奇(Анреп-Эльмпт, Иосиф Романович 1798—1860)——伯爵,俄国将军,1853—1854 年初任多瑙河驻军的司令官。——第 35 页。

安东尼奥·帕斯摩阿耳·波旁(Antonio Pascual Bourbon 1755—1817)——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的儿子,马德里最高洪达(1808年4月奉斐迪南七世之命成立的)主席。——第469页。

休斯,特·姆·(Hnghes,T.M.)——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作家,长期侨居西班牙。——第403、404、515页。

休谟,约瑟夫(Hume,Joseph 1777—1855)——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之一,议会议员。——第100、101、380页。

休森-帕沙(Hussein Pasha)——土耳其将军,1854年锡利斯特里亚防御战的指挥者之一。——第337页。

多纳,卡尔·弗里德里希·艾米尔(Dohna,Karl Fiedrich Emil 1784—1859)——伯爵,普鲁士将军,曾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1812—1815年在俄军中供职,1842—1854年为驻科尼斯堡的普军军长。——第233页。

多特扎克,阿道夫(Dotézac,Adolphe 1808—1889)——法国外交家,驻哥本哈根公使(1848—1869)。——第49页。

多斯特-穆罕默德(Dost Muhammad 1793—1863)——阿富汗的艾米尔(1826—1839和1842—1863)。——第123页。

列施德-帕沙(Reschid Pasha 1802—1858)——土耳其国家活动家;历任总理大臣和外交大臣。——第27、29、107、213、222、347、349、383—385页。

列奥波特二世(Leopold Ⅱ 1747—1792)——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790—1792)。——第116页。

列奥波特二世(Leopold Ⅱ 1797—1870)——托斯卡纳大公(1824—1859)。——第552页。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Ⅰ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第59页。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Ⅱ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第163页。

亚历山大·卡拉格奥尔基耶维奇(Александр Карагеоргиевич 1806—1885)——塞尔维亚公爵(1842—1858)。——第35、428页。

吉卡,格里哥里·亚历山大(Ghika,Gregor Alexander 1807—1857)——莫尔达维亚国君(1849—1853和1854—1856)。——第385页。

吉比奇,伊万·伊万诺维奇(Дибич,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785—1831)——伯爵,俄国元帅,1828—1829年俄土战争时为总司令;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第165、166、293、295、322页。

考威尔,乔治(Cowell,George)——英国工人,宪章运动活动家,1853—1854年普雷斯顿大罢工领导人之一。——第254页。

考莱男爵,亨利·理查·查理·威尔斯里(Cowley,Henry Richard Charles Wellesley 1804—1884)——英国外交家,驻巴黎大使(1852—1867)。——第95、97页。

乔斯林,罗伯特(Jocelyn,Robert 1816—1854)——子爵,英国军官,议会议员。——第87页。

乔治四世(George Ⅳ 1762—1830)——英国国王(1820—1830)。——第262、430页。

迈克尔，威廉（Michell，William）——英国医生，议会议员。——第53页。

迈奥尔，爱德华（Miall，Edward 1809—1881）——英国政论家和非国教宣传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四十年代倾向宪章运动，曾积极参加反对英国国教的斗争；议会议员。——第53页。

西摩尔，乔治·汉密尔顿（Seymour，George Hamilton 1797—1880）——英国外交家，1851—1854年任驻彼得堡公使。——第23、62、77、95—97、122、151—156、160—172、175、176、231、232、237、648、649页。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Sismondi，Jean—Charles—Léone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第470页。

艾释黎，安东尼·库伯，舍夫茨别利伯爵（1851年受封）（Ashley，Anthony Cooper，Earl of Shaftesbury 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议会里的托利党人慈善家集团首领，1847年起为辉格党人。——第141页。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Voltaire，Francois—Marie）（本姓阿鲁埃Arouet de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反对专制政体和天主教。——第188页。

华尔希，约翰·贝恩·奥尔马特威特（Walsh，John Benn 1798—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议会议员。——第105页。

托雷诺伯爵，霍赛·马利阿·凯波·德·利亚诺·鲁伊斯·德·萨拉维阿（To—reno，José Maria Queipo de Llano Ruiz de Saravia 1786—1843）——西班牙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曾参加1808—1814年和1820—1823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加迪斯议会议员，曾任财政大臣和首相（1834—1835），1814—1820、1823—1833年和从1835年起侨居国外。——第480页。

毕若·德·拉·比贡利，托马·罗伯尔（Bugeaud de la Piconnerie，Thomas Robert 1784—1849）——法国将军，1843年起为元帅；奥尔良派，七月王朝时期是众议院议员，1848—1849年是阿尔卑斯山驻军总司令，立法议会议员。——第286、287页。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Tal—leyrand—Périgord，Charles Maurice 1754—1838）——公爵，著名的法国外交家，外交大臣（1797—1799、1799—1807、1814—1815），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1814—1815），驻伦敦大使（1830—1834），其特点是在政治上毫无原则性和唯利是图。——第322、465页。

七　画

贝利，亨利·詹姆斯（Baillie，Henry James 生于1804年）——英国议会议员，托利党人。——第61页。

贝多，玛丽·阿尔丰斯（Bedeau，Marie Alphonse 1804—1863）——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副议长，1851年十

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逐出法国。——第287、288、540页。

贝尔格 (Берг)——俄国外交家，驻伦敦大使馆一等秘书。——第63页。

贝克莱，莫里斯·弗雷德里克·菲茨哈丁 (Berkeley, Maurice Frederick Fitzhardinge 1788—1867)——英国海军上将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任海军部部务委员 (1833—1839 和 1846—1857)。——第387、390、391页。

贝西埃尔，让·巴蒂斯特 (Bessières, Jean-Baptiste 1768—1813)——法国元帅，曾参加拿破仑第一的远征，1808年和1811年曾参加西班牙战争。——第472页。

贝尔纳·奥斯本，拉尔夫 (Bernal Osborne, Ralph 1808—1882)——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 (属于所谓梅费尔激进派)，议会议员，海军部秘书长 (1852—1858)。——第267、268页。

贝里公爵夫人，玛丽·卡洛琳·斐迪南·路易莎 (Berry, Marie-Caroline-Ferdinande-Louise 1798—1870)——正统派法国王位追求者尚博尔伯爵的母亲；1832年企图在万第发动暴乱推翻路易-菲力浦。——第286、287页。

苏舍，路易·加布里埃尔 (Suchet, Louis-Gabriel 1770—1826)——法国元帅，曾参加西班牙战争 (1808—1814)，1812—1813年为瓦伦西亚的法国军事总督。——第482页。

苏巴诺，马丁 (Zurbano, Martin 1788—1844)——西班牙将军，资产阶级革命家，独立战争 (1808—1814) 时期游击队领袖之一，因企图宣布1837年宪法而被处死。——第403、404页。

苏尔特，尼古拉·让 (Soult, Nicolas Jean 1769—1851)——法国元帅，国家活动家，1808—1814年为驻西班牙的法军司令官，七月王朝时期任陆军大臣 (1830—1834、1840—1845)，外交大臣 (1839—1840) 和首相 (1832—1834、1839—1840 和 1840—1847)。——第480页。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 (Сув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30—1800)——伟大的俄国统帅。——第300、302、399、597页。

苏里曼-帕沙 (Suleiman Pasha)——土耳其将军，1854年统率在多瑙河的非正规军队。——第330页。

苏里曼大帝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见苏里曼一世·坎努尼。

苏里曼一世·坎努尼 (Suleiman I Elkanuni 1494—1566)——土耳其苏丹 (1520—1566)。——第182页。

利文，达丽娅 (多罗苔娅)·赫里斯托弗罗夫娜 (Ливен, Дарья (Доротея) Христофоровна 1785—1857)——公爵夫人，俄国外交家赫·安·利文之妻；她在欧洲外交生活中，作为伦敦和巴黎的政治沙龙的女主人起着显著的作用。——第628页。

利文公爵，赫里斯托弗尔·安得列也维奇 (Ливн, Христофор Андреевич 1774—1839)——俄国外交家，曾任驻帕林公使 (1810—1812)，驻伦敦大使 (1812—1834)。——第317页。

利奈公爵，卡尔·约瑟夫 (Ligne, Karl Joseph 1735—1814)——奥地利将军，外交家和作家，1809年起为元帅。——第666页。

利普兰迪，巴维尔·彼得罗维奇

（Липранди，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1796—1864）——俄国将军，1853—1854年在多瑙河和1854—1855年在克里木任师长。——第325、577、584、588、590、592、603页。

利迭尔斯，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Лидерс，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0—1874）——俄国将军；1853—1854年任多瑙河俄军军长，1855年任南方军团司令官，1856年初为克里木驻军总司令。——第144、303、325、350、606页。

利物浦伯爵，罗伯特·班克斯·詹金森（Liverpool，Robert banks Jenkinson 1770—1828）——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多次担任大臣职务，曾任首相（1812—1827）。——第672页。

沙赛，罗伯特（Southey，Robert 1774—1843）——英国诗人和作家，托利党人。——第467页。

沙米尔（Шамиль 1798左右—1871）——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领导达格斯坦和彻岑的山民反对沙皇殖民主义者，反动的狂信派（曾被苏丹土耳其利用来实现侵略野心）思想家之一。——第259、311、312、374、527页。

沙克莱，威廉·麦克皮斯（Thackerey，William Makepeace 1811—1863）——杰出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第686页。

沙尔腊斯，让·巴蒂斯特·阿道夫（Charras，Jean-Baptiste-Adolphe 1810—1865）——法国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曾参加镇压1848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反对路易·波拿巴；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逐出法国。——第414页。

沙多勃利昂子爵，弗朗斯瓦·勒奈（Chateaubriand，Francois-René vicomte de 1768—1848）——著名的法国作家，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22—1824），法国出席维罗那会议的代表（1822）。——第122、430页。

杜科，德奥多（Ducos，Théodore 1801—1855）——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期归附波拿巴派，曾任海军大臣（1851—1855）。——第256页。

杜福尔，吉约姆·昂利（Dufour，Guillaume Henri 1787—1875）——瑞士将军，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7年率领联邦军队击溃宗得崩德军队；著有许多筑城学、炮兵和战策方面的著作。——第547页。

杜加美尔，亚历山大·奥西波维奇（Дюгамель，Александр Осипович 1801—1880）——俄国将军，1848年负特别使命赴多瑙河各公国。——第331页。

杜邦·德·勒坦，比埃尔·安都昂（Dupont de l'Etang，Pierre-Antoine 1765—1840）——法国将军，1808年于西班牙作战时在拜兰附近率本师投降。——第471页。

杜耳塞-伊-加腊伊，多敏古（Dulce y Garay，Domingo 1808—1869）——侯爵，西班牙将军，属于温和派；曾领导1854年马德里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第324、340、352、364、430、433、438、523页。

克里斯亭娜——见玛丽亚—克里斯亭娜。
克鲁津什特恩，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Крузенштерн，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时为敖德萨军事总督。——第527页。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韦利尔斯（Clarendon，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1800—1870）——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爱尔兰总督（1847—1852），残酷镇压1848年爱尔兰起义；曾任外交大臣（1853—1858、1865—1866和1868—1870）。——第62、63、88、89、95—98、108、120、121、160、164、171—176、188、189、193、200、323、366、377、420、421、429页。
克兰里卡德侯爵，乌利克·约翰·德·巴勒（Clanricarde，Ulick John de Burgh 1802—1874）——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辉格党人；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38—1841）。——第11、62、317、321、322、377、659、660页。
克耳纳·冯·克伦施坦，弗里德里希（Kellner von Köllenstein，Friedrich 生于1802年）——男爵，奥利将军，1849年起为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侍卫长。——第75页。
伯戈因，约翰·福克斯（Burgoyne，John Fox 1782—1871）——英国将军，军事工程师，1868年起为元帅；1854—1855年在克里木任英军军事顾问和工程长官。——第66页。
伯勒普什，玛丽·约瑟法·盖尔特鲁黛（Berlepsch，Maria Josephe Gertrud 死于1723年）——西班牙女王纽堡的玛丽—安娜的宫中御前文官，1699年人民起义之后，被逐出西班牙。——第455页。
伯恩施托尔夫，阿尔勃莱希特（Bernstorff，Albrecht 1809—1873）——伯爵，普鲁士外交家，曾任驻伦敦公使（1854—1861），外交大臣（1861—1862），驻伦敦大使（1862—1873）。——第217页。
亨策，阿·（Hentze，A.）——德国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参加维利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原告证人。——第427页。
亨利四世（Heinrich Ⅳ 1425—1474）——加斯梯里亚国王（1454—1465和1408—1474）。——第455、456页。
亨利四世（Heinrich Ⅳ 1553—1610）——法国国王（1589—1610）。——第182页。
里扎—帕沙（Riza Pasha 1809—1859）——土耳其将军和国家活动家，四十至五十年代，曾多次担任陆军大臣职务。——第29、107页。
里埃哥—伊—努涅斯，拉斐尔·德（Riego y Nuñez，Rafael de 1785—1823）——西班牙军官，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的最著名的领导人之一。——第488、506—508、669页。
里奥斯—伊—罗萨斯，安东尼奥（Ryos y Rosas，Antonio 1812—1873）——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属于温和派，议会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56）。——第433页。
沃邦，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尔（Vauban，Sébastien le Prêtre 1633—1707）——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著有许多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第

445、581 页。
沃龙佐夫，米哈伊尔·谢明诺维奇（Воронцов，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1782—1856）——公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将军，1844—1854 年为高加索驻军总司令和高加索总督。——第 309、311、312、315、388、392 页。
辛普森，莱昂纳德·弗兰西斯（Simpson，Leonard Francis）——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作家。——第 72、75 页。
辛辛纳图斯（鲁齐乌斯·昆克提乌斯·辛辛纳图斯）（Lucius Quinctius Cincinnatus 公元前五世纪）——古罗马贵族，执政官（公元前 460 年），独裁者（公元前 458 年和 439 年），据传说，他生活俭朴，亲自耕种。——第 405 页。
麦金伦，威廉·亚历山大（Mackinnon，William Alexander 1789—1870）——英国政治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第 53 页。
麦克格莱哥尔，约翰（MacGregor，John 1797—1857）——英国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自由贸易论者，议会议员，不列颠皇家银行的创办人并为该行董事之一（1849—1856）。——第 53 页。
狄更斯，查理（Dickens，Charles 1812—1870）——伟大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第 366、686 页。
狄亚斯·玻利埃尔，璜（Diaz Porlier，Juan 1788—1815）——西班牙将军，自由主义者，独立战争（1808—1814）时曾指挥游击队，因企图发动起义反对斐迪南七世的专制制度而被处死。——第 488、504、510 页。
芒，亚历山大罗（Mon，Alejandro 1801—1882）——西班牙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曾任财政大臣（1837、1844—1846），政府首脑（1864）。——第 343、433 页。
坎宁，乔治（Canning，George 1770—1827）——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1807—1809、1822—1827），首相（1827）。——第 156、319 页。
庇护九世（Pius Ⅸ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第 71、188 页。
吕利埃尔，约瑟夫·马尔塞伦（Rulhières，Joseph-Marcelin 1787—1862）——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曾参加拿破仑第一的远征，三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1849 年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和陆军部长，1851 年十二月二月政变后退职。——第 288 页。
希耳德亚德，罗伯特·查理（Hildyard，Robert Charles）——英国议会活动家，托利党人。——第 391 页。
邦迪埃拉兄弟，阿提利奥（1810—1844）和埃米利奥（1819—1844）（Bandiera，Attilio ed Emilio）——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奥地利舰队的军官，“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员；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被处死（1844）。——第 86、649 页。

八　画

阿尔丹，保尔·约瑟夫（Ardant，Paul Joseph 1800—1858）——法国陆军上校，1855 年起为将军，军事工程师；1854 年负军事使命赴土耳其。——第 66 页。
阿尔宁，亨利希·弗里德里希（Arnim，Heinrich Friedrich 1791—1859）——

伯爵，普鲁士外交家，勃兰登堡反动内阁的外交大臣（1849），驻维也纳公使（1845—1848、1851—1858）。——第360页。

阿梅莉亚——见玛丽-阿梅莉亚。

阿尔伯特（Albert 1819—1861）——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第29、44—46、56、367、393页。

阿耳科克，托马斯（Alcock，Thomas 生于1810年）——英国政治活动家，初为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第380页。

阿勃迪-帕沙（Abdi Pasha 生于1801年）——土耳其将军，1853年任高加索土军司令官。——第25、33页。

阿巴斯-帕沙（Abbȧs Pasha 1813—1854）——埃及的帕沙（1849—1854）。——第23页。

阿集斯-帕沙（Aziz Pasha）——1854—1857年是贝尔格莱德的土耳其军事总督。——第355页。

阿伯丁伯爵，乔治·戈登（Aberdeen，George Gordon 1784—186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曾任外交大臣（1828—1830、1841—1846）和联合内阁首相（1852—1855）。——第4、7、10、49、97、146、148、150、151、178、188—191、194、199、257、313—323、375、376、378、392、405、610、628、629页。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Ariosto，Lodovico 1474—1533）——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杰出的诗人，长诗“疯狂的罗兰”的作者。——第549页。

阿尔奎列斯，奥古斯丁（Argüelles，Agustin 1776—1844）——西班牙国家活动家，自由主义者，1808—1814年和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参加者，曾任内务大臣（1820—1821），议会议员（1822—1823）。——第509页。

阿罕默德一世（Ahmed I 1589—1617）——土耳其苏丹（1603—1617）。——第182页。

阿罕默德-帕沙（Ahmed Pasha）——土耳其将军，1853年底任高加索土军司令官。——第25、33页。

阿卜杜-麦吉德，（Abdul-Medjid 1823—1861）——土耳其苏丹（1839—1861）。——第11、29、75、120、160、161、168、175、179、269、285、330、331、385页。

阿尔科·阿古埃罗，菲力浦（Arco Agüero，Felipe）——西班牙军官，曾参加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革命激进派领袖之一。——第505页。

阿美特勒-伊-德·卡布勒，纳西索（Ametller y de Cabrer，Narcis 死于1877）——西班牙陆军上校，1843—1844年是共和派和进步派在卡塔卢尼亚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曾参加1854—1856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第530页。

帕金顿，约翰·索美塞特（Pakington，John Somerset 1799—188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海军首席大臣（1858—1859和1866—1867）和陆军大臣（1867—1868）。——第367页。

帕切科，璜，维尔埃纳侯爵（Pacheco，Juan，marqués de Villena 1419—1474）——加斯梯里亚国王亨利四世的大臣。——第455、456页。

帕纽亭，费多尔·谢尔盖也维奇

（Панютин, Федор Сергеевич 1790—1865）——俄国将军，在克里木战争初期任军长，1855—1856年为俄国西南部的后备军团司令官。——第325、339、664页。

帕伊科斯（Paikos，A.）——希腊国家活动家，1851—1854年任外交大臣。——第232页。

帕波利亚，璜（Padilla，Juan 1490左右—1521）——西班牙贵族，1520—1522年加斯梯里亚各城市起义（自治城市起义）的领袖之一，起义失败后在维利雅拉尔附近被处死。——第460页。

帕斯凯维奇，伊万·费多罗维奇（Паскевич,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1782—1856）——公爵，俄国元帅，1831年夏起为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1832年起为波兰王国的总督，1849年为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军总司令；1854年为俄国西部和南部边境的驻军总司令，5—6月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第58、222、300、301、303、312、325、336、349、399页。

帕斯托尔·狄亚斯，尼科梅德斯（Pastor Diaz，Nicomedes 1811—1863）——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属于温和派，参议员，曾任驻都灵大使（1854）。——第433页。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Henry John Temple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依仗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支持，成为该党的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1859—1865）。——第4、17、19、45、46、52、61—63、99—102、121、123、128、179、191、194、198、199、242、243、257、275、283、316、318、321、322、332、366、367、380—383、393、394、405、430、523、553、557、620、627—629、651页。

帕尔马的玛丽－路易莎（Maria Luise von Parma 1751—1819）——西班牙女王（1788—1808），查理四世之妻。——第456、463页。

帕拉福克斯－伊－梅耳西，霍赛（Palafox y Melci，José 1776—1847）——西班牙将军，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领导了1808—1809年萨拉哥沙防御战。——第471页。

帕拉福克斯－伊－梅耳西，弗朗西斯科（Palafox y Melci，Francisco 生于1774年）——西班牙政治活动家，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中央洪达委员（1808—1809），后因反对召开议会和企图在西班牙设立摄政而被开除出洪达。——第487页。

帕尔凯－卡斯特里耳奥公爵，迪埃哥·卡尼亚斯－伊－波尔托卡雷罗（Parque-Castrillo，Diego Cañas y Portocarrero 1755—1832）——西班牙将军，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和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1820年为议会议长。——第466页。

帕切科－伊－古提雷斯·卡德龙，华金·弗朗西斯科（Pacheco y Gutierrez Calderon，Joaquin Francisco 1808—1865）——西班牙法学家、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属于温和派，曾参加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曾任外交大臣（1854）。——第413页。

拉西，路易斯·德（Lacy，Luis de 1775—1817）——西班牙将军，独立战争

（1808—1814）的著名参加者，因企图在卡塔卢尼亚发动起义反对斐迪南七世的专制制度而被枪决。——第 488、504、511 页。

拉腊，璜（Lara，Juan）——西班牙将军，曾任陆军大臣（1851—1853），1854 年任新加斯梯里亚的军区司令官。——第 340、341、372 页。

拉斐德，玛丽·约瑟夫·保尔（Lafayette，Marie-Joseph Paul 1757—1834）——法国将军，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 1830 年资产阶级七月革命时期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第 505 页。

拉巴索拉（Labazora）——曾参加西班牙独立战争（1808—1814），中央洪达委员。——第 481 页。

拉瓦累特，沙尔·让·玛丽·费里克斯（Lavalette 或 La Valette，Charles-Jean-Marie-Félix 1806—1881）——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1851—1853 年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曾任内务大臣（1865—1867），外交大臣（1868—1869）。——第 87 页。

拉德茨基，约瑟夫（Radetzky，Joseph 1766—1858）——伯爵，奥地利元帅，1831 年起为意大利北部的奥军指挥官，1848—1849 年曾残酷镇压意大利革命民族解放运动；1850—1856 年为伦巴第-威尼斯王国的总督。——第 209、350、596 页。

拉·马尔摩拉，阿尔丰梭·费勒罗（La Marmora，Alfonso Ferrero 1804—1878）——意大利将军和国家活动家，曾任皮蒙特陆军大臣（1848、1849—1855、1856—1859），1855 年在克里木任撒丁军军长，后为首相。——第 350 页。

拉摩里西尔，克利斯托夫·路易·莱昂（Lamoricière，Christophe-Louis Léon 1806—1865）——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 年积极参加镇压六月起义，后为卡芬雅克政府的陆军部长（6—12 月），对路易·波拿巴政府采取反对立场，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国。——第 540 页。

拉利-托朗达尔，特罗菲姆·热拉尔（Lally-Tollendal，Trophime-Gérard 1751—1830）——法国政治活动家，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属于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阶级的温和的保皇派。——第 475 页。

拉比斯巴伯爵，恩利克·霍赛·奥当奈尔（La Bisbal，Enriqui José O'Donnell 1769—1834）——西班牙将军，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善于玩弄权术；在反动年代（1814—1820）一面和自由派保持联系，一面向政府出卖革命者；1820 年被派去镇压里埃哥起义时，又站到革命者一边，企图利用起义以达到个人目的。——第 487、505、506、508 页。

拉罗什雅克兰，昂利·奥古斯特·若尔日（La Rochejaquelein，Henri-Auguste-Georges 1805—1867）——侯爵，法国政治活动家，贵族院议员，正统派领导人之一，在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后为第二帝国的参议员。——第 44 页。

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波拿巴，约瑟夫（Bonaparte，Joseph 1768—1844）——拿破仑第一的哥哥，西班牙国王（1808—1813）。——第

122、463—467、471、472、475、486、503页。

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Bonaparte，Napoléon－Joseph－Charles－Paul 1822—1891）——拿破仑第三的堂弟，1854年任克里木法军师长。——第561、562页。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1589—1792、1814—1815和1815—1830）和西班牙王朝（1700—1868和1874—1931）。——第30、44、286、461、489页。

波波维奇，季莫费（Popovič，Timotheus 1795—1867）——奥地利将军，1854年奥地利占领多瑙河各公国时为布加勒斯特军事总督。——第529页。

波门特男爵，迈尔斯·托马斯·斯特普尔顿（Beaumont，Mails Thomas Stey－peltone 1805—1854）——英国贵族，上院议员，自由党人。——第321页。

波茨措－迪－博尔哥，卡尔·奥西波维奇（Поццо-ди-Борго，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1764—1842）——伯爵，俄国外交家，科西嘉人，1814—1821年任驻巴黎公使，1821—1835年任驻巴黎大使，后来是驻伦敦大使（1835—1839）。——第103、153、647页。

罗素，约翰（Russell，John 1792—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枢密院院长（1854—1855）。——第43、53、63、76、87、94、96、99、104、106、108、121、127、151、153、156、160—165、169—171、178、193、200、242、243、269—273、283、315、316、323、366、367、375、378—382、386、387、391、392、552、610、611、629页。

罗斯，休·亨利（Rose，Hugh Henry 1801—1885）——英国军官，1854年起为将军，后为元帅；驻君士坦丁堡代办（1852—1853）；克里木战争时期为驻克里木法军司令部代表；印度民族解放起义（1857—1859）的镇压者之一。——第97、237、242页。

罗巴克，约翰·阿瑟（Roebuck，John Arthur 1801—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分子，议会议员，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第30、87页。

罗宾逊，阿伯拉罕（Robinson，Abra－ham）——五十年代宪章运动活动家之一。——第139页。

罗宾逊，弗雷德里克·约翰，葛德里奇子爵（Robinson，Frederick John viscount Goderich 1782—1859）——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23—1827年任财政大臣，首相（1827—1828）。——第644页。

罗曼纳侯爵，彼得罗·卡罗－伊－苏雷达（Romana，Pedro Caro y Sureda，marqués de la 1761—1811）——西班牙将军，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阿斯土里亚中央洪达委员。——第471、480、481、487页。

佩特曼（Peitman）——德国教育家。——第356、357、367、393页。

佩克桑，昂利·约瑟夫（Paixhans，Henri－Joseph 1783—1854）——法国将军，军事工程师和发明家，著有许多有关火炮的著作。——第6、391页。

佩勒姆，弗雷德里克·托马斯（Pelham，Frederick Thomas 1808—1861）——英国海军军官，1858年起为海军中将。——第448页。

佩利西埃，让·雅克（Pelisier，Jean-Jacques 1794—1864）——法国将军，1855年起为元帅，三十至五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曾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1855年5月—1856年7月）。——第66页。

佩雷斯·德·卡斯特罗，埃瓦里斯托（Perez de Castro，Evaristo 1778—1848）——西班牙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加迪斯议会议员（1810—1813），曾参加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曾任政府首脑（1838—1840）。——第509页。

佩苏埃拉-伊-塞巴耳奥斯，璜（Pezuela y Ceballos，Juan 1809—1906）——西班牙将军和军事著作家，属于温和派，曾任海军大臣（1846），1867年起为参议员。——第404页。

奈，米歇尔（Ney，Michel 1769—1815）——法国元帅，曾参加拿破仑第一的远征，1808—1811年参加西班牙战争。——第481页。

奈特，弗雷德里克·温（Knight，Frederick Winn 生于1812年）——英国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第380页。

奈斯密斯，查理（Nasmyth，Charles 1826—1861）——英国军官，"泰晤士报"驻多瑙河奥美尔-帕沙司令部的军事通讯员。——第298、335、336、390、395页。

奈穆尔公爵，路易·沙尔·菲力浦·拉法埃尔（Nemours，Luis-Charles-Philippe-Raphaël 1814—1896）——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的第二个儿子。——第30页。

庞培（格奈尤斯·庞培·马格努斯）（Pompejus Gnäus Magnus 公元前106—48）——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369页。

庞森比，约翰（Ponsonby，John 1770左右—1855）——子爵，英国外交家，驻那不勒斯公使（1832），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32—1841）和驻维也纳大使（1846—1850）。——第179页。

庞巴尔、塞巴斯提安·约瑟（Pombal，Sebastian José 1699—1782）——侯爵，葡萄牙国家活动家，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葡萄牙的实际上的执政者（1756—1777）。——第474页。

门罗，詹姆斯（Monroe，James 1758—1831）——美国国家活动家，美国总统（1817—1825），共和党人。——第430、510页。

门茨，乔治·弗雷德里克（Muntz，George Frederick 1794—1857）——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分子，议会议员。——第268页。

法卢，阿尔弗勒德（Falloux，Alfred 1811—188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1848年解散国家工厂的发起者和镇压巴黎六月起义的鼓吹者，曾任教育部长（1848—1849）。——第71页。

法耳梅赖耶尔，雅科布·菲力浦（Fallmerayer，Jakob Philipp 1790—1861）——德国历史学家和旅行家。——第142页。

尚博尔，昂利·沙尔（Chambord，Henri Charles 1820—1883）——伯爵，波旁王朝长系的最后代表，查理十世的孙子，法国亨利五世王位的追求者。——第30页。

尚加尔涅，尼古拉·安·德奥杜尔（Chan-garnier，Nicolas Anne Théodule

1793—1877）——法国将军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保皇派；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第二共和国时期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第540页。

林纳赫，弗朗西斯科（Linage，Francisco 1795—1847）——西班牙将军，属于进步派，埃斯帕特罗的密友，从1835年起为他的秘书，1843年任步兵和国民军总监；埃斯帕特罗的专政被推翻之后，随同埃斯帕特罗逃亡英国。——第403页。

林德赫斯特男爵，约翰·辛格尔顿·柯普利（Lyndhurst，John，Singleton Copley 1772—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著名的法学家，托利党人；曾任大法官（1827—1830、1834—1835和1841—1846）。——第316、319、659页。

彼得一世（Петр I 1672—1725）——1682年起为俄罗斯皇帝，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第601、625、673、675页。

彼得鲁五世（Pedro V 1837—1861）——葡萄牙国王（1853—1861）。——第365页。

芬伦，詹姆斯（Finlen，James）——宪章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52—1858年为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第126、139页。

图尔，伊什特万（Türr，István 1825—1908）——匈牙利军官，曾参加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和1848—1849年德国革命；曾随同土耳其和英国军队参加克里木战争。——第519页。

帖木儿（塔梅尔兰）（1336—1405）——中亚细亚的统帅和征服者，东方幅员广大的国家的奠基者。——第49、303页。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伟大的罗马诗人。——第451页。

金塔纳，曼努埃尔·霍赛（Quintana，Manuel José 1722—1857）——西班牙诗人和政治活动家，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派的拥护者，曾参加1808—1814年和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1808—1810年任中央洪达的秘书。——第476、484页。

孟德斯鸠，沙尔（Montesquieu，Charles 1689—1755）——杰出的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君主立宪制的理论家。——第475页。

昂古列姆公爵，路易·安都昂（Angoulème，Louis Antoine 1755—1844）——法国国王查理十世的儿子，1823年曾指挥法国军队镇压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第510、671页。

杰罗尔德，道格拉斯·威廉（Jerrold，Douglas Wiliam 1803—1857）——英国资产阶级讽刺作家和剧作家。——第659页。

舍夫茨别利——见艾释黎，安东尼·库伯。

冈萨勒斯·布腊沃，路易斯（Gonzalez Bravo，Luis 1811—1871）——西班牙国家活动家，温和派领袖之一，曾任政府首脑（1843和1868），内务大臣（1866—1868），1868年转到卡洛斯派方面。——第407、408、433、515页。

九　画

科克，保尔·德（Kock，Paul de 1794左

右—1871)——法国资产阶级作家，著有一些轻浮的消遣小说。——第 168 页。

科贝特，威廉 (Cobbett，William 1762—1835)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第 189、274、644 页。

科布顿，理查 (Cobden，Richard 1804—1865)——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的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第 44、50、51、87—91、93、198、380、432、644 页。

科拉第，费南多 (Corradi，Fernando 死于 1885) ——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和记者，“人民呼声报” 主编。——第 513 页。

科苏特，拉约什 (路德维希) (Kossuth，Lajos (Ludwig) 1802—1894) ——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1848—1849 年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人，匈牙利革命政府的首脑；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第 9、100、222、282、283 页。

科堡家族 (Coburg) ——德国的一个公爵家族，比利时、葡萄牙、英国以及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王朝不是属于这个家族，就是和这个家族有关系。——第 30、123、393 页。

科尔特斯，艾尔南 (费南多) (Cortes，Hernan (Fernando) 1485—1547)——西班牙征服者，曾征服阿西德克人 (墨西哥人) 的国家。——第 461 页。

科耳亚多，霍赛·曼努埃尔 (Collado，José Manuel)——西班牙政治活动家，银行家，属于进步派，曾任财政大臣 (1854—1856)。——第 343、430、514 页。

科尔尼洛夫，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也维奇 (Корнилов,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06—1854) ——俄国杰出的海军活动家，海军上将，黑海舰队参谋长 (1849—1853)，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鼓舞者和组织者之一。——第 23 页。

科罗尼尼-克隆贝尔格，约翰·巴普提斯特 (Coronini-Cronberg，Johann Baptist 1794—1880) ——伯爵，奥地利将军，1854 年任驻多瑙河各公国奥军军长。——第 325、360 页。

查理一世 (Karl Ⅰ 1500—1559) ——西班牙国王 (1516—1556)，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帝号查理五世 (1519—1556)。——第 456、459—461、468、496 页。

查理一世 (Charles Ⅰ 1600—1649) ——英国国王 (1625—1649)，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 621 页。

查理二世 (Karl Ⅱ 1661—1700) ——西班牙国王 (1665—1700)。——第 455 页。

查理三世 (Karl Ⅲ 1716—1788) ——西班牙国王 (1759—1788)。——第 474、504 页。

查理四世 (Karl Ⅳ 1748—1819) ——西班牙国王 (1788—1808)。——第 456、463、474、509 页。

查理六世 (Karl Ⅵ 1685—1740) ——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1711—1740)。——第 115 页。

查理十世 (Charles Ⅹ 1757—1836) ——法国国王 (1824—1830)。——第 319、431 页。

查理十二(Karl Ⅻ 1682—1718)——瑞典国王(1697—1718)。——第612页。

查尔托雷斯基，亚当·埃日伊(Czartoryski，Adam Jerzy 1770—1861)——公爵，波兰大地主，十九世纪初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密友，曾任俄国外交大臣(1804—1806)；1830—1831年波兰起义时任临时政府首脑；起义被镇压后流亡巴黎，在那里领导波兰的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第100、222页。

威廉斯，詹姆斯(Williams，James)——五十年代宪章运动活动家之一。——第125、139页。

威尔逊，詹姆斯(Wilson，James 1805—186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1853—1858年任财政部秘书长。——第53、394、530、642页。

威廉一世(Wilhelm Ⅰ 1797—1888)——普鲁士亲王，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第83页。

威廉三世(William Ⅲ 1817—1890)——尼德兰国王(1849—1890)。——第59页。

威廉四世(William Ⅳ 1765—1837)——英国国王(1830—1837)。——第45、67页。

威尔逊-派顿，约翰(Wilson-Patten，John 1802—1892)——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议会议员。——第659页。

威灵顿公爵，阿瑟·威尔斯里(Wellington，Arthur Wellesley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中任统帅；曾任军械总长(1818—1827)，总司令(1827—1828、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第150、154、190、191、262、263、267、269、289、317、319、387、398、405、482、484、542、635、636页。

威尔斯里侯爵，理查·科利(Wellesley，Richard Colley 1760—1842)——英国国家活动家，曾任印度总督(1797—1805)，驻西班牙大使(1809)，外交大臣(1809—1812)，爱尔兰总督(1821—1828、1833—1834)，曾残酷镇压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第484、636页。

哈丁，亨利(Hardinge，Henry 1785—1856)——子爵，英国将军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55年起为元帅；曾任军务大臣(1828—1830和1841—1844)，印度总督(1844—1847)，英军总司令(1852—1856)。——第9页。

哈利耳-帕沙(Halil Pasha 死于1856年)——土耳其军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多次任大臣职务；1854—1855年为海军大臣。——第29页。

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er)——自1273年起至1806年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王朝(中有间断)、西班牙(1516—1700)、奥地利帝国(1804—1876)和奥匈帝国(1867—1918)的王朝。——第313、461页。

哈德威克伯爵，查理·菲力浦·约克(Hardwicke，Charles Philip Yorke 1799—1873)——英国海军上将，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第189、376页。

哈麦尔-普格施塔尔，约瑟夫(Hammer-Purgstall，Joseph 1714—1856)——奥

地利资产阶级的东方学的历史学家，著有许多关于土耳其历史的著作；1796年至1835年担任近东方面的外交职务。——第282页。

洛佩斯，华金·马利阿（Lopez，Joaquin Maria 1798—1855）——西班牙法学家、文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进步派的领袖之一，1843年为政府首脑。——第404、407页。

洛佩斯·巴尼约斯（Lopez Baños）——西班牙军官，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年）和1820—1823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西班牙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之一，1820年任陆军大臣。——第505页。

洛桑诺·德·托勒斯，璜·艾斯特班（Lozano de Torres，Juan Esteban）——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反动分子，1817—1819年任司法大臣。——第482页。

施利克，弗兰茨·亨利希（Schick，Franz Heinrich 1789—1862）——伯爵，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1854—1859年任加里西亚和布柯维纳的奥军指挥官。——第37页。

施尔德尔，卡尔·安得列也维奇（Шильдер，Карл Андреевич 1785—1854）——俄国将军，卓越的军事工程师和发明家，1828—1829年和1854年俄土战争时在多瑙河领导俄军进行围攻作业。——第79、146、295、301—303、337、399页。

施梯尔贝公爵，巴尔布·德米特利·比伯斯库（Stirbei，Barbu Demetrius Bibesco 1801—1869）——瓦拉几亚国君（1849—1853和1854—1856）。——第347、385页。

胡尔扬——见桑切斯，胡尔扬。

咸丰（1831—1861）——中国皇帝（1850—1861）。——第124页。

勃朗，路易（Balanc，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1848年是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曾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是在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第67、125页。

欧文，罗伯特（Owen，Robert 1771—1858）——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68页。

洪秀全（1814—1864）——中国农民革命战争（1851—1864）的领袖和思想家之一，乡村教师，1851年领导太平天国，封为天王。——第124页。

英格兰，理查（England，Richard 1793—1883）——英国将军，1854—1855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第561页。

玻利埃尔——见狄亚斯·玻利埃尔，璜。

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 1741—1790）——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765—1790）。——第116、474、666页。

美延多尔夫，彼得·卡季米罗维奇（Мейендорф，Петр Казимирович 1796—1863）——男爵，俄国外交家，1850—1854年任驻维也纳公使。——第30页。

柯瓦列夫斯基，叶哥尔·彼得罗维奇（Ковалевский，Егор Петрович 1811—1868）——俄国军官、旅行家、作家和外交家；1853年任驻门的内哥罗专员，后来在多瑙河（1853—1854）和克里木（1854）的俄军司令部任职。——第234页。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1871年受封）（Disraeli，Benjamin，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后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首相（1868和1874—1880）。——第43、53、87、94—96、98—100、131、132、193、199、236、272、273、323、366、375、380、381、387、392、552、610、651页。

范哈兰，安东尼奥，彼腊卡姆波斯伯爵（Van-Halen，Antonio，conde de Peracamps 死于1858年）——西班牙将军，属于进步派，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以及1820—1823年和1834—1843年资产阶级革命，1843—1847年随同埃斯帕特罗流亡国外。——第404页。

十　画

马克思，卡尔（Marx，Karl 1818—1883）（传记材料）。——第13、49、56、61、71、82、100、125、126、133、134、158、201、392、427、519页。

马德维，约翰·尼古拉（Madvig，Johan Nicolai 1804—1886）——丹麦语言学家和国家活动家，议会议员（1849—1874），议会议长（1856—1863）。——第441页。

马考莱，托马斯（Macaulay，Thomas 1800—1859）——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第53页。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之一，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为伦敦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第222、519页。

马罗托，拉斐尔（Maroto，Rafael 1783—1847）——西班牙将军，反动分子，卡洛斯派军队的总司令。——第402页。

马尔蒙，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德（Marmont，Auguste Frédéric Louis de 1774—1852）——法国元帅，曾参加拿破仑第一的远征，1814年4月投靠波旁王朝，在1830年七月革命时期为查理十世军队的指挥官。——第119页。

马基耶罗，乔治乌（Maghiero，Georgiu 生于1804年）——瓦拉几亚将军，资产阶级革命家，1848年是临时政府成员和瓦拉几亚革命军司令官。——第333页。

马扎里尼，朱利奥·雷蒙多（Mazzarini，Giulio Raymondo 1602—1661）——法国国家活动家，红衣主教；1643年起为大臣，在路易十四成年以前是法国实际上的执政者。——第186页。

马丁雅克，让·巴蒂斯特·西耳韦尔·格·德（Martignac，Jean-Baptiste-Sylvère Gaye de 1778—1832）——法国律师和反动政治活动家，保皇党人，1823年曾参加镇压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1828—1829年任内务大臣，实际上是内阁首脑。——第510、511页。

马萨尔雷多，曼努埃尔（Mazarredo，Manuel 1807—1857）——西班牙将军，反动分子，曾任陆军大臣（1847），1854年巴斯克军区司令官。——第371页。

马土舍维奇，安得列依（Матушевич，Андрей 1796—1842）——伯爵，俄国外

交家，曾参加特劳波会议（1820）和维罗那会议（1822）以及1830年的伦敦会议。——第317页。

马尔利安尼，曼努埃尔（Marliani，Manuel 死于1873年）——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1859年以前住在西班牙，后侨居意大利。——第402、431页。

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霍华德·哈里斯（Malmesbury，James Howard Harris 1807—1889）——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的著名活动家；曾任外交大臣（1852、1858—1859），掌玺大臣（1866—1868、1874—1876）。——第74、189—191页。

马丁涅斯·德·拉·罗萨，贝尔迪霍·哥梅斯－伊－阿罗伊奥（Martinez de la Rosa，Berdejo Gomez y Arroyo 1787—1862）——西班牙作家和政治活动家，1808—1814年和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温和派领袖之一，曾任政府首脑（1834—1835），内务大臣（1844—1846）。——第365页。

马尔切西－伊－奥累阿加，霍赛·马利阿（Marchesi y Oleaga，José Maria 1801—1879）——西班牙将军，属于温和派，曾任卡塔卢尼亚军区司令官（1853—1854），陆军大臣（1864）。——第371页。

格雷，乔治（Grey，George 1799—1882）——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46—1852、1855—1858和1861—1866）和殖民大臣（1854—1855）。——第189、283页。

格里贝（Грибе）——俄国将军，曾参加克里木战争。——第588页。

格兰特，詹姆斯（Grant，James 1802—1879）——英国激进派记者和作家，"晨报"的编辑（1850—1871）。——第658页。

格拉赫，弗里德里希（Grach，Friedrich 1812—约1856）——普鲁士军官，1841年起在土耳其供职，1854年锡利斯特里亚防御战领导人之一。——第296—298页。

格莱安，詹姆斯·罗伯特·乔治（Graham，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英国国家活动家；初为辉格党人，后为皮尔分子；曾任内务大臣（1841—1846），海军首席大臣（1830—1834、1852—1855）。——第67、86、94、99、101、106、121、199、281、428、649页。

格林姆肖，摩提默（Grimshaw，Mortimer 生于1827年左右）——宪章运动的活动家，1853—1854年普雷斯顿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第254页。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第53、98、128—132、201、236—239、242、530、629、642页。

格兰维耳伯爵，乔治·鲁森－高尔（Granville，George Leveson－Gower 1815—1891）——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1851—1852、1870—1874和1880—1885），殖民大臣（1868—1870、1886）；1852—1854年任枢密院院长。——第190、191、648页。

格奥尔基·彼得罗维奇（Georgij Petro－

witsch）——门的内哥罗的将军，丹尼洛·涅哥什的亲戚。——第 234 页。

埃利奥，弗朗西斯科·哈维埃尔（Elio, Francisco Xavier 1767—1822）——西班牙将军和反动的政治活动家，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1814 年曾帮助斐迪南七世建立专制制度，1820—1823 年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作为反动暴乱的组织者之一被处死。——第 487、504 页。

埃查古埃，拉斐尔（Echagüe, Rafael 1815—1887）——西班牙军官，曾参加 1854—1856 年资产阶级革命，属于温和派。——第 341、433 页。

埃雷罗斯，曼努埃尔·加尔西亚（Herreros, Manuel Garcia）——西班牙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加迪斯议会议员，曾任司法大臣（1808—1814 和 1820）。——第 509 页。

埃斯帕特罗，巴尔多梅罗（Espartero, Baldomero 1793—1879）——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进步派领袖，西班牙的摄政（1841—1843），政府首脑（1854—1856）。——第 364、369、371、372、401—408、413、414、426、432、433、435、512—514、522、557 页。

埃斯潘纳斯，沙尔·玛丽·埃斯普里（Espinasse, Charles-Marie-Esprit 1815—1859）——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曾参加克里木战争。——第 539、540 页。

埃伦伯勒伯爵，爱德华·罗（Ellenborough, Edward Law 1790—1871）——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印度总督（1842—1844），海军首席大臣（1846），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8）。——第 376 页。

埃罗勒斯男爵，华金·伊邦涅斯（Eroles, Jaoquin, baron de 1785—1825）——西班牙将军，独立战争（1808—1814）时期游击队指挥官，1820—1823 年资产阶级革命时为保皇运动首领之一。——第 488 页。

埃斯特哈济·冯·加兰塔，瓦伦亭·拉迪斯劳斯（Esterhazy von Galanta, Valentin Ladislaus 1814—1858）——伯爵，奥地利外交家，1854—1858 年任驻俄国公使。——第 231 页。

乌沙可夫，亚历山大·克列奥纳科维奇（Уш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Клеонакович 1803—1877）——俄国将军，1854 年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1855 年在克里木任师长。——第 350 页。

乌尔基霍，马利安诺·路易斯（Urquijo, Mariano Luis 1768—1817）——西班牙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保皇派，法国占领西班牙时期（1808—1814）投靠法国人，曾任约瑟夫·波拿巴国王的政府首脑，1813 年侨居法国。——第 473 页。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反动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1847—1852 年为议会议员，托利党人。——第 12、13、19、62、70—72、179、275、283、386、422、557、658 页。

乌尔卡尔特，威廉·波拉德（Urquhart, William Pollard 1814—1871）——英国经济学家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第 53 页。

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Adrian Utrecht 1459—1523）——西班牙国王查理一

世的教师，1517年起为红衣主教，1518年起为大宗教裁判者，1520—1521年为西班牙执政者，1522年起为罗马教皇，称阿德里安六世。——第456页。

乌加尔特—伊—拉里萨巴尔，安东尼奥（Ugarte y Larrizabal，Antonio 1780—约1833）——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反动分子，斐迪南七世的宫廷权奸的首领。——第509、510页。

索尔，比埃尔（Soulé，Pierre 1801—1870）——美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曾任驻马德里大使（1853—1854），曾力图使西班牙政府把古巴让给美国。——第432页。

索拉，璜·马利阿（Sola，Juan Maria 死于1819年）——西班牙军官，资产阶级革命家，因参加反对斐迪南七世的专制制度的瓦伦西亚起义被处死。——第511页。

索勒达，贝尼托（Soledad，Benito）——西班牙僧侣，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第478页。

索麦维尔，亚历山大（Somerville，Alexander 1811—1885）——英国记者，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第52页。

索伊蒙诺夫，费多尔·伊万诺维奇（Соймонов，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1800—1854）——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时期任多瑙河和克里木俄军指挥官，在因克尔芒战斗中阵亡。——第412页。

纳多，马丁（Nadaud，Martin 1815—1898）——法国泥水匠，政论家，蒲鲁东的追随者，1849—1851年为立法议会议员，属山岳派，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逐出法国，1859年以前侨居英国。——第125页。

纳瓦罗（Navarro 死于1817年）——西班牙革命家，因企图在瓦伦西亚宣布1812年宪法而被处死。——第511页。

纳皮尔，查理（Napier，Charles 1786—1860）——英国海军上将，曾参加葡萄牙战争（1810和1834）和叙利亚战争（1840），1854年任波罗的海舰队总司令。——第64、79、117、255—257、308、348、349、356、391、392、449、450、552、673页。

纳尔瓦艾斯，拉蒙·马利阿（Narvaez，Romón Maria 1800—1868）——西班牙将军和反动的国家活动家，温和派领袖，政府首脑（1844—1846、1847—1851、1856—1857、1864—1865和1866—1868），曾残酷镇压群众的革命发动。——第343、364、369、402—405、407、413、414、432、433页。

纳斯尔—埃德—丁（Nasr—ed—din 1831—1896）——伊朗沙赫（1848—1896）。——第10页。

桑切斯，胡尔扬（Sanchez，Julian）——独立战争（1808—1814）时期游击队领袖之一。——第486页。

桑塔—科洛马伯爵，达马西奥·凯腊耳特（Santa—Coloma，Dalmacuo Queralt 死于1640年）——西班牙国家活动家，卡塔卢尼亚总督，巴塞罗纳人民起义时被杀死。——第455页。

桑塔—克鲁斯—伊—帕切科，弗朗西斯科（Santa Cruz y Pacheco，Francisco 1802左右—1883）——侯爵，西班牙政治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1854—1856）和财政大臣（1856）。——第407、414、435、513页。

拿破仑亲王——见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Napoléon Ⅰ Bona-

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 和 1815）。——第 109、173、183、258、262、267、269、271、282、456、463—469、471—473、476、478、484、485、497、502、548—550、570、571、573、594、595、597、598、605、612、613、616、624、625、636 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Ⅲ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第 4、5、20、36、44、46、60、71、74、77、82—84、88、92、105、109、117、122、126、127、159、178、261、266、271、283、286、356、364、366、373、389、394、414、520、540、548—550、552、556、559、574 页。

海斯，亨利希（Heß，Heinrich 1788—1870）——男爵，奥地利将军，后为元帅，曾积极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1854—1855 年任驻匈牙利、加里西亚和多瑙河各公国的奥军总司令。——第 203、345、529 页。

海瑙，尤利乌斯·雅科布（Haynau，Julius Jacob 1780—1853）——奥地利元帅，曾残酷镇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运动。——第 529 页。

库拉金，亚历山大·波利索维奇（Куракин，Александр Борисович 1752—1818）——公爵，俄国外交家，总理副大臣（1796—1798 和 1801—1802），1807 年参加签订俄法之间提尔西特和约，曾任驻巴黎大使（1808—1812）。——第 465 页。

库埃斯塔——见加尔西亚·德·拉·库埃斯塔，格莱哥里奥。

纽卡斯尔公爵，亨利·佩勒姆·费恩斯·佩勒姆·克林顿（Newcastle，Henry Pelham Fiennes Pelham－Clinton 1811—1864）——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分子，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1854），陆军大臣（1854—1855）和殖民大臣（1859—1864）。——第 275、283、316、366、367、554、629 页。

纽堡的玛丽－安娜（Maria－Anna de Neuburg 1667—1740）——西班牙女王（1689—1700），查理二世的妻子。——第 456 页。

哥尔查科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Горчаков，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98—1883）——公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驻维也纳大使（1854—1856），外交大臣（1856—1882）。——第 344、352、353、360、428、647 页。

哥尔查科夫，米哈伊尔·德米特利也维奇（Горчаков，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1793—1861）——公爵，俄国将军，曾任多瑙河军团司令官（1853—1854），南方军团总司令（1854 年 9 月—1855 年 2 月），后为克里木驻军总司令（1855 年 2—12 月）；波兰王国的总督（1856—1861）。——第 40、43、143、144、147、223、303、350、360、384、412 页。

倍恩，托马斯（Paine，Thomas 1737—1809）——英国激进派政论家，共和主义者，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和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 393 页。

浦若尔，路易（Pujol，Louis）——法国政论家，布朗基分子，曾参加法国 1848 年六月起义和 1854 年西班牙的革命事件。——第 426 页。

班克斯，乔治（Bankes，George 1788—

1856）——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财政部官员。——第 380 页。

高尔威子爵，乔治・爱德华・阿伦德耳（Galway，George Edward Arundell 1805—1876）——英国贵族，托利党人，议会议员。——第 52 页。

恩佩西纳多，马丁・璜（Empecinado，Martin Juan 1775—1825）——西班牙农民，独立战争时期（1808—1814）游击队领袖，从议会获得将军头衔，曾积极参加 1820—1823 年资产阶级革命，因企图发动起义反对斐迪南七世的反动制度而被处死。——第 488 页。

翁格恩-施特恩堡，恩斯特・威廉（Унгерн-Штернберг，Эрнст Вильгельм）——男爵，俄国外交家，五十年代任驻哥本哈根公使。——第 49 页。

涅谢尔罗迭，卡尔・瓦西里也维奇（Нессельроде，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0—1862）——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总理大臣（1816—1856）。——第 49、95—97、103、148、152、169、170、190、203、223、231、429 页。

十 一 画

梅萨，克利斯提安・尤利乌斯（Meza，Christian Julius 1792—1865）——丹麦将军，1849—1856 年为炮兵旅长。——第 425 页。

梅肯集，托马斯・弗米奇（Мекензи，Фома Фомич 死于 1786 年）——俄国海军上将，1783—1786 年任黑海分舰队司令，塞瓦斯托波尔的创建人；苏格兰人。——第 580 页。

梅特涅，克雷门斯（Metternich，Clemens 1773—1859）——公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民主革命运动的死敌；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反动的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 36、315、321 页。

梅尔兰，克利斯托夫・安都昂（Merlin，Christophe Antoine 1771—1852）——1808—1813 年为驻西班牙法国占领军将军。——第 472 页。

梅塔克萨斯，安得列依（Metaxas，Andreas 1786 左右—1860）——伯爵，希腊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首相（1843—1844），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0—1854）。——第 213、217、218 页。

梅耳加尔伯爵，璜・托马斯・卡布雷腊（Melgar，Juan Thomas Cabrera 1652—1705）——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的大臣（1693—1699），1699 年人民起义后被驱逐出西班牙。——第 456 页。

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格奥尔格（Mecklenburg-Strelitz，Georg 1824—1876）——公爵，德国贵族，在俄军中供职的将军。——第 201 页。

康涅多，阿隆索（Cañedo，Alonzo）——西班牙神甫，极端反动分子，加迪斯议会议员（1810—1813）。——第 500 页。

康罗贝尔，弗朗斯瓦・塞尔坦（Canrobert，François-Certain 1809—1895）——法国将军，1856 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曾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1854 年 9 月—1855 年 5 月）。——第 423、574、594、600、607 页。

康斯坦丁・尼古拉也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7—1892）——俄国大公，尼古拉一世的次子，海军上将，曾领导海军部门（1853—1881）和舰队

(1855—1881)。——第299页。

康波曼内斯，彼得罗·罗德里格斯（Cam－pomanes，Pedro Rodriguez 1723—1803）——伯爵，西班牙国家活动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开明君主制度的拥护者；曾任财政大臣(1762—1791)。——第497页。

莫兰诺，安东尼奥·吉埃尔莫（Moreno，Antonio Guillermo）——西班牙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第343页。

莫里耳奥，帕布洛（Morillo，Pablo 1778—1837）——西班牙将军，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1815—1820年指挥西班牙军队镇压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战争，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站在反革命方面。——第402、671页。

莫尔特克，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Moltke，Helmut Karl Bernhard 1800—1891）——普鲁士军官，后为元帅，反动的军事活动家和作家，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1835—1839年在土耳其军队供职；曾任普鲁士总参谋长（1857—1871）和帝国总参谋长(1871—1888)。——第297页。

莫利托尔，加布里埃尔·让·约瑟夫（Molitor，Gabriel－Jean－Joseph 1770—1849）——法国将军，1823年武装干涉西班牙时任军长。——第669页。

梯尔泰（Tyrtaios（Τυρταῖος）公元前七至六世纪）——古希腊的诗人。——第279页。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1832、1834），首相（1836、1840），共和国总统（1871—1873），绞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286页。

梯利希，弗雷德里克·斐迪南（Tillisch，Frederik Ferdinand 1801—1889）——丹麦的反动国家活动家，保皇派，曾任内务大臣（1851—1852、1854、1864—1865)。——第425页。

曼纳斯，约翰·詹姆斯·罗伯特（Man－ners，John James Robert 1818—1906）——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四十年代参加“青年英国”社，议会议员，多次任保守党政府的大臣职务。——第89、90页。

曼斯巴赫，卡尔（Mansbach，Karl 1790—1867）——瑞典将军和外交家，曾任驻维也纳公使(1852—1855)。——第360页。

曼托伊费尔，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Otto Theodor 1805—1882）——男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僚制度的代表；曾任内务大臣（1848—1850），首相兼外交大臣（1850—1858)。——第83、159、204、206、223—225、233—235页。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Bacon，Francis，Baron of Verulam 1561—1626）——杰出的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第474页。

培尔西尼，让·日尔贝尔·维克多（Per－signy，Jean Gilbert Victor 1808—1872）——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组织者之一，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4和1860—1863)。——第36页。

基罗加，安东尼奥（Quiroga，Antonio

1784—1841）——西班牙军官，自由主义者，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和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第505—507页。
基谢廖夫，尼古拉·德米特利也维奇（Киселев，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1800—1869）——俄国外交家，1851—1854年任驻巴黎公使。——第27、63、77、229页。
理查，维散特（Richard，Vicente 死于1816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家，曾发动起义反对斐迪南七世的专制制度，失败后被处死。——第511页。
累亚德，奥斯丁·亨利（Layard，Austin Henry 1817—1894）——英国考古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第53、85、86、179、193、194、316、381页。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William 1564—1616）——伟大的英国作家。——第101、188、267、361、659页。
勒弗夫尔，比埃尔·弗朗斯瓦·约瑟夫（Lefebvre，Pierre François—Joseph 1755—1820）——法国元帅，曾参加拿破仑第一的远征，1808年参加西班牙战争。——第471页。
捷尔沙文，加甫里拉·罗曼诺维奇（Державин，Гаврила Романович 1743—1816）——杰出的俄国诗人，古典主义的代表。——第334页。
得比伯爵（1851年受封），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Derby，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1799—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后为保守党领袖之一；曾任殖民大臣（1833—1834、1841—1844），首相（1852、1858—1859和1866—1868）。——第22、67、74、179、188、191—193、273、610页。
符拉德五世（Ulad Ⅴ）——瓦拉几亚国君（1456—1462和1476—1479）。——第328页。

十 二 画

菲耳德（Fildet）——英国将军，1854—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军需司令。——第387页。
菲埃隆，雅克·阿梅德·菲力浦（Fiéron，Jacques—Amédé—Philippe 生于1796年）——法国将军，曾参加克里木战争。——第348页。
菲茨威廉，查理·威廉（Fitzwilliam，Charles William 1786—1857）——伯爵，英国议会活动家，辉格党人。——第376页。
菲力浦二世（Philipp Ⅱ 1527—1598）——西班牙国王（1556—1598）。——第478页。
菲力浦四世（Philipp Ⅳ 1605—1665）——西班牙国王（1621—1665）。——第455页。
菲力浦五世（Philipp Ⅴ 1683—1746）——西班牙国王（1700—1746）。——第478页。
菲茨赫伯特，阿伦，圣海伦斯男爵（Fitzherbert，Alleyne，Baron St. Helens 1753—1839）——英国外交家，1783—1787年任驻彼得堡公使。——第92页。
斯坦利——见得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
斯梯林，威廉（Stirling，William 1818—1878）——英国历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温和的托利党人，议会议员，著有

许多西班牙艺术史方面的著作。——第 53 页。

斯蒂芬逊，罗伯特 (Stephenson，Robert 1803—1859) ——英国工程师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第 53 页。

斯卡利特，詹姆斯·约克 (Scarlett，James Yorke 1799—1871) ——英国将军，1854—1855 年初任骑兵旅长，后任克里木英军骑兵司令 (1855—1856)。——第 591 页。

斯图亚特，达德利·库茨 (Stuart，Dudley Coutts 1803—1854) ——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与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有联系。——第 65、76、87、332、381、382、387、390 页。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腊特弗德·坎宁 (Stratford de Redcliffe，Stratford Canning 1786—1880) ——英国外交家，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 (1810—1812、1825—1828、1841—1858)。——第 10、27、37、65、71、75、88、95—98、107、108、117、121、143、160、175、201、213、214、217、222、332、333、363、421、524、553、557 页。

普切塔——见蒙尼奥斯·本纳温特，霍赛 (普切塔)。

普腊德，多米尼克·杜福尔·德 (Pradt，Dominique Dufour de 1759—1837) ——法国神甫，外交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第 483、486、494 页。

普里契特，罗伯特·泰勒 (Pritchett，Robert Taylor 1828—1907) ——英国枪炮工匠，曾改进米涅式步枪。——第 265 页。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普里姆-伊-普腊斯，璜 (Prim y Prats，Juan 1814—1870) ——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进步派领袖之一，曾参加 1834—1843 年和 1854—1856 年资产阶级革命，1843—1844 年残酷镇压共和派和进步派左翼在卡塔卢尼亚的起义。——第 530、531 页。

普林西佩-伊-维达乌德，米格尔·奥古斯丁 (Principe y Vidaud，Miguel Agustin 1811—1866) ——西班牙作家，著有许多西班牙历史和文学方面的著作，属进步派。——第 406 页。

斐迪南一世 (Ferdinand I 1793—1875) ——奥地利皇帝 (1835—1848)。——第 116 页。

斐迪南二世 (Ferdinand II 1810—1859) ——那不勒斯国王 (1830—1859)，因 1848 年炮击墨西拿而有炮弹国王之称。——第 351、414、430、552 页。

斐迪南四世 (Ferdinand IV 1285—1312) ——加斯梯里亚和累翁的国王 (1295—1312)。——第 495 页。

斐迪南七世 (Ferdinand VII 1784—1833) ——西班牙国王 (1808 和 1814—1833)。——第 407、436、456、463、466、467、469、482、488、490、494、501、504—511、669、670、672 页。

琼斯，哈利·大卫 (Jones，Harry David 1791—1866) ——英国将军，军事工程师；1810—1813 年参加西班牙战争；1854 年为波罗的海英国远征军指挥官，1855 年在克里木作战时曾负责工程勤务。——第 445、450、527 页。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 (Jones，Ernest Charles 1819—1869) ——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革命的宪章派领袖之一，“北极

星报”编辑之一，“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的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67、125、126、139、416—419页。

莱昂斯，艾德蒙（Lyons，Edmund 1790—1858）——英国海军上将；曾任驻雅典公使（1835—1849），1854年任副总司令，1855年任黑海舰队总司令。——第117、259、363、553、582页。

莱宁根-威斯特堡，克利斯提安·弗兰茨（Leiningen-Westerburg，Christian Franz 1812—1856）——伯爵，奥地利将军，1853年率领特派使团赴君士坦丁堡。——第75、76页。

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C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100左右—44）——著名的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369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杰出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探讨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第541页。

博斯凯，比埃尔·约瑟夫·弗朗瓦（Bosquet，Pierre-Joseph-François 1810—1861）——法国将军，1856年起为元帅，三十至五十年代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4年任克里木法军师长，后任军长（1854—1855）。——第561—563、579、587、588、590、592、597页。

温特兰德（Wendland）——1854年是希腊国王奥托一世的私人秘书。——第360页。

腊格伦男爵，菲茨罗伊·詹姆斯·亨利·索美塞特（Raglan，Fitzroy James Henry Somerset 1788—1855）——英国将军，1854年起为元帅；以威灵顿的参谋的身分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1808—1814和1815），曾任总司令办公室的军务秘书（1827—1852），军械总长（1852—1854），克里木的英军总司令（1854—1855）。——第276、304、306、388、397、398、423、539、541、542、545、554、572、574—576、580、583、586、592、594、596、600、623、627、630、633页。

傅阿德-埃芬蒂（Fuad-Effendi 1814—1869）——土耳其国家活动家，1848年是驻多瑙河各公国的政府专员，血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五十至六十年代曾多次担任总理大臣和外交大臣。——第331、332页。

登克林男爵，乌利克·坎宁（Dunkellin，Ulick Canning 生于1827年）——英国军官，曾参加克里木战争，后为议会议员。——第659页。

十 三 画

奥达利，彼得罗（O'Daly，Pedro）——西班牙军官，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和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第505页。

奥特韦，阿瑟·约翰（Otway，Arthur John 1822—1912）——英国议会活动家，五十年代是托利党人。——第357、367、393页。

奥托一世（Otto Ⅰ 1815—1867）——巴伐利亚王子，后为希腊国王（1832—1862）。——第105、121、212、249、360页。

奥罗斯科（Orozco）——西班牙军官，曾参加1854—1856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第352页。

奥尔特腊（Oltra）——西班牙军官，曾参加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

第 506 页。

奥捷罗夫（Озеров）——俄国外交家，1853 年任驻君士坦丁堡临时代办。——第 75 页。

奥利维腊，本杰明（Oliveira，Benjamin）——英国议会议员。——第 53 页。

奥康奈尔，丹尼尔（O’Connell，Daniel 1775—1847）——爱尔兰律师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由派的领袖。——第 67 页。

奥当奈尔，列奥波多（O’Donnell，Leopoldo 1809—1867）——西班牙将军和反动政治活动家，温和派领袖之一；1854 年，企图利用国内革命危机来建立军事独裁；曾以陆军大臣的身分领导镇压 1854—1856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曾任反动政府的首脑（1856、1858—1863 和 1865—1866）。——第 324、340、352、364、365、369、373、404、413、414、426、430、505、516、522 页。

奥尔洛夫，尼古拉·阿列克谢也维奇（Орлов，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27—1885）——伯爵，俄国陆军上校，1854 年参加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强攻；后为将军和外交家，多次任俄国驻许多欧洲国家的代表。——第 300、303 页。

奥尔洛夫，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Орлов，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 1786—1861）——伯爵，1856 年后为公爵，俄国军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外交家；曾同土耳其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1833），曾率领俄国代表团出席巴黎会议（1856）。——第 56、64、69、70、202 页。

奥罗佩萨，艾曼努埃尔·华金（Oropesa，Emanual Joachim 1642—约 1707）——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的大臣（1685—1691 和 1698—1699），1699 年人民起义后被驱逐出西班牙。——第 456 页。

奥洛萨加，萨鲁斯蒂亚诺·德（Olozaga，Salustiano de 1805—1873）——西班牙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进步派领袖之一，曾任政府首脑（1843），驻巴黎公使（1840—1843 和 1854），曾参加 1854—1856 年资产阶级革命。——第 403、407、408、433 页。

奥尔良王朝——法国王朝（1830—1848）。——第 30、123、520 页。

奥美尔－帕沙（米哈伊尔·拉塔斯）（Omer Pasha（Michail Latas）1806—1871）——土耳其将军，克罗地亚人，二十年代在奥地利军队供职，三十年代初加入土耳其国籍；曾任驻瓦拉几亚土军指挥官（1848—1849），门的内哥罗土军指挥官（1853），多瑙河土军总司令（1853—1854），克里木土军总司令（1855）和高加索总司令（1855—1856）。——第 3、35、40、57、66、72、80、81、143、145、146、208—210、276—278、293、299、304、311、331、338、361、362、383、389、390、396、397、412、422、423、428、529、548、551、555、556、609、624 页。

奥斯坦－萨肯，德米特利·叶罗费也维奇（Остен-Сакен，Дмитрий Ерофеевич 1789—1881）——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时期在俄国南部任军长（1853—1854），塞瓦斯托波尔城防司令（1854 年底—1855 年）。——第 40、144、244、245、597 页。

奥勃鲁切夫，亚历山大·阿法纳西也维奇（Обручев，Александр Афанасьевич）——俄国将军。——第 25、33 页。

奥斯卡尔一世（Oskar Ⅰ 1799—1859）

—— 瑞典和挪威的国王 (1844—1859)。——第 201、425、440、451 页。
奥伦治的威廉三世 (William Ⅲ of Orange 1650—1702)——尼德兰总督 (1672—1702),英国国王 (1689—1702)。——第 621 页。
奥布廉诺维奇王朝——塞尔维亚公国王朝 (1817—1842 和 1858—1882),后为皇朝 (1882—1903)。——第 26、35 页。
奥修尔利万·德·格拉斯,阿尔丰斯·阿尔伯·昂利 (O'Sullivan, de Grass, Alphonse-Albert-Henri 1798—1866)——伯爵,比利时外交家,1837—1866 年任驻维也纳公使。——第 360 页。塞奥昂奈,安东尼奥 (Seoane, Antonio)——西班牙将军,支持埃斯帕特罗的独裁,1843 年后转到温和派方面,曾参加 1854—1856 年资产阶级革命。——第 404 页。
塞里姆-帕沙 (Selim Pasha)——土耳其将军,1853—1854 年任高加索土军军长。——第 309 页。
塞里姆-帕沙(捷德林斯基)(Selim Pasha (Zedlinsky))——土耳其将军,波兰人;1853—1854 年任多瑙河土军指挥官。——第 35、57 页。
塞维耳昂诺,西霍腊·璜,富安特斯·德·杜埃罗侯爵 (Sevillano, Sijora Juan, marqués de Fuentes de Due-ro)——西班牙政治活动家,财政大臣 (1854)。——第 343 页。
塞巴斯提昂尼,奥拉斯 (Sébastiani, Horace 1772—1851)——伯爵,法国元帅,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2),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1806—1807) 和驻伦敦大使 (1835—1840)。——第 549 页。
塞拉诺-伊-多敏格斯,弗朗西斯科 (Serrano y Dominguez, Francisco 1810—1885)——西班牙将军和国家活动家,陆军大臣 (1843),1856 年政变的参加者,政府首脑 (1868—1869、1871、1874),外交大臣 (1862—1863),王国摄政 (1869—1871)。——第 351、369、373、433 页。
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米格尔 (Cer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1547—1616)——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第 406、485、521、672 页。
路汉,弗朗西斯科 (Lujan, Francisco 1798—1867)——西班牙将军,作家和学者,西班牙科学院创始人之一,1836 年起为议会议员,属于温和派,曾任国民经济发展大臣 (1854、1856 和 1863)。——第 413 页。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路易-菲力浦 (Louis 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 (1830—1848)。——第 105、109、117、123、188、286、403、406、433 页。
路易十一 (Louis Ⅺ 1423—1483)——法国国王 (1461—1483)。——第 456 页。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 (1643—1715)。——第 182 页。
雷德克利夫——见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腊特弗德。
雷芬特洛夫-格里敏尼尔,亨利希 (Reventlow-Criminil, Heinrich 1798—1869)——伯爵,丹麦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 (1842—1848),霍尔施坦事务大臣 (1852—1854)。——第 27 页。

福雷，埃利·弗雷德里克（Forey，Elie Frédéric 1804—1872）——法国将军，后为元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1854—1855年为克里木法军指挥官。——第249、562页。

福克斯，威廉·约翰逊（Fox，William Johnson 1786—1864）——英国政治活动家，宣传家和政论家，自由贸易论者，后归附自由党；议会议员。——第53页。

瑟美列，贝尔塔兰（Szemere，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曾任内务部长（1848）和革命政府首脑（1849）；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第9页。

葛伊甸，洛金·彼得罗维奇（Гейден，Логин Петрович 1772—1850）——俄国海军上将，在1827年纳瓦林会战中为分舰队司令，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为俄国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第317页。

塔提舍夫，德米特利·巴甫洛维奇（Татищев，Дмитрий Павлович 1767—1845）——俄国外交家，曾任驻马德里公使（1815—1821），俄国出席维罗那会议的代表（1822），驻维也纳大使（1826—1841）。——第509—511页。

道格拉斯，霍华德（Douglas，Howard 1776—1861）——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著有炮兵和筑城学方面的著作。——第448、661页。

十 四 画

维达尔，华金（Vidal，Joaquin 死于1819年）——西班牙军官，自由主义者，1819年领导瓦伦西亚起义反对斐迪南七世专制制度。——第511页。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第29、45、46、56、170、178、188、199、262、285、367、373、375、382、393、405、556、610页。

维里阿特（Viriathus 死于公元前139年）——公元前150—139年古代西班牙部落发动起义反对罗马统治的首领。——第437页。

维尔埃纳——见帕切科，璜·维尔埃纳侯爵。

维耳埃耳（Villel）——西班牙贵族，中央洪达委员（1808）。——第482页。

维索茨基，约瑟夫（Wysocki，Józef 1809—1873）——波兰政治活动家，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波兰1830—1831年和1863—1864年起义以及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起义和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克里木战争时曾企图组织波兰军团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第222页。

维耳亚康帕，彼得罗（Villacampa，Pedro 1776—1845）——西班牙将军，独立战争（1808—1814）时期游击队指挥官，曾参加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后任军队的指挥官，参议员。——第488页。

维斯达·埃尔莫萨，安赫尔·哈尔西亚·洛伊哥里（Vista Hermosa，Angel Garcia Loygorri 死于1887年）——伯爵，西班牙将军，1854年指挥政府军力图镇压西班牙革命，失败后逃往国外。——第352页。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Viktor Emanuel Ⅱ 1820—1878）——皮蒙特国王

(1849—1861)，意大利国王（1861—1878）。——第 82 页。
蒙克，查理·斯坦利（Monck，Charles Stanley 1819—1894）——子爵，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曾任财政部部务委员（1855—1858），加拿大总督（1861—1866 和 1867—1868）。——第 52 页。
蒙太莫林，卡洛斯·路易斯·马利阿（Montemolin，Carlos Luis Maria 1818—1861）——西班牙王子，唐·卡洛斯的长子，五十年代为西班牙王位的追求者，称查理六世。——第 365 页。
蒙潘西埃公爵，安都昂·玛丽·菲力浦·路易（Montpensier，Antoine Marie Philippe Louis 1824—1890）——法王路易—菲力浦的儿子，西班牙公主玛丽—路易莎—费南达的丈夫，1868—1869 年为西班牙王位的追求者。——第 123 页。
蒙尼奥斯，奥古斯丁·费南多，里安萨雷斯公爵（Muñoz，Agustin Fernando，duque de Riansares 1808 左右—1873）——王国军队的士官，西班牙摄政女王玛丽—克里斯亭娜的丈夫。——第 516、521 页。
蒙塔郎贝尔，沙尔（Montalembert，Charles 1810—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奥尔良分子，天主教派的首领。——第 71 页。
蒙塔郎贝尔，马尔克·勒奈（Montalembert，Marc—René 1714—1800）——法国将军，军事工程师，曾研究出一种新筑城法，这种方法在十九世纪被广泛采用。——第 409、443、444、543、582、675 页。
蒙蒂霍伯爵，欧仁尼奥·帕拉福克斯—伊—波尔托卡雷罗（Montijo，Eugenio Palafox y Portocarrero）——西班牙冒险主义者。——第 487 页。
蒙尼奥斯—托雷罗，迪埃哥（Muñoz—Torrero，Diego 1761—1829）——西班牙神甫，萨拉芒卡大学校长，加迪斯议会（1810—1813）中最激进的议员之一，曾参加 1820—1823 年资产阶级革命。——第 500 页。
蒙尼奥斯·本纳温特，霍赛（普切塔）（Muñoz Benavente，José（Pucheta）1820—1856）——西班牙斗牛士，曾积极参加 1854—1856 年资产阶级革命，马德里人民群众领导人之一，在街垒战中阵亡。——第 426、433 页。
玛丽—泰莉莎（Maria Theresia 17171780）——奥地利女大公（1740—1780），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女皇（1745—1780）。——第 112、113 页。
玛丽—阿梅莉亚（Marie—Amélie 1782—1866）——法国女王（1830—1848），路易—菲力浦之妻。——第 373 页。
玛丽亚—克里斯亭娜（Maria Christina 1806—1878）——西班牙女王（1829—1833），斐迪南七世之妻，王国摄政女王（1838—1840）。——第 343、364、368、371、403、407、413、426、433、434、513、514、516、520—522 页。
赫伯特·悉尼（Herbert，Sidney 1810—1861）——英国国家活动家，初期是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曾任军务大臣（1845—1846 和 1852—1855）和陆军大臣（1859—1860）。——第 93、94、387—390、622 页。
赫克林，雅科布（Heeckeren，Jakob）——男爵，荷兰外交家，三十年代任驻彼得

堡公使，1842—1876 年是驻维也纳大使。——第 360 页。

豪登——见卡拉多克，约翰·侯巴特，豪登男爵。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Goethe，Johann Wolfgang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 643 页。

十 五 画

德尔马（Delmas）——在西班牙的法国侨民。——第 426 页。

德律埃，昂利（Druey，Henri 1799—1855）——瑞士国家活动家，激进分子，联邦委员会委员（1848—1854），1850 年是瑞士联邦主席。——第 519 页。

德拉蒙德，亨利（Drummond，Henry 1786—1860）——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委员（1855）。——第 91、92 页。

德鲁安·德·路易斯，爱德华（Drouyn de Lhuys，Edouard 1805—1881）——法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在四十年代是温和的奥尔良保皇派；1851 年后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外交部长（1848—1849、1851、1852—1855、1862—1866）。——第 7、10、12、27、429 页。

摩尔拉·托马斯（Morla，Tomás 1752—1820）——西班牙将军，最高洪达委员，1808 年站在法国占领者方面，曾任约瑟夫·波拿巴政府的陆军和海军大臣。——第 487 页。

摩耳斯沃思，威廉（Molesworth，William 1810—1855）——英国国家活动家，自由党人（属于所谓梅费尔激进派），议会议员；公共工程部长官（1853—1855）和殖民大臣（1855）。——第 53、267 页。

璜二世（Juan Ⅱ 1405—1454）——加斯梯里亚和累翁的国王（1406—1454）。——第 455 页。

剑桥公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查理（Cambridge，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Charles 1819—1904）——英国将军，1854 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后为英国陆军总司令（1856—1895）。——第 561、562、590 页。

缅施科夫，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Меншиков，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87—1869）——公爵，俄国军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1853 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特使，克里木陆海军总司令。——第 23、43、76、90、96—98、163、169、171、175、176、543、545、546、549、554、556、557、562—565、574、577—581、584、594、595、600、603、624 页。

墨尔本子爵，威廉·拉姆（Melbourne，William Lamb 1779—1848）——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30—1834），首相（1834 和 1835—1841）。——第 67、628 页。

十 六 画

穆尔，乔治·亨利（Moore，George Henry 1811—1870）——爱尔兰政治活动家，保障租佃者权利运动的领袖之一，议会议员。——第 200 页。

穆尼哀，让·约瑟夫（Mounier，Jean-Joseph 1758—1806）——法国政治活动家，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属于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的温和的保皇派。——第 475 页。

穆萨—帕沙（Mussa Pasha 1810左右—1854）——土耳其将军，1853—1854年任锡利斯特里亚土军统帅。——第299、336页。

穆罕默德—帕沙（Mechmed Pasha 1810左右—1871）——土耳其军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1854年初为海军大臣，后为总理大臣。——第107页。

穆罕默德二世（Mechmed Ⅱ 1430—1481）——土耳其苏丹（1451—1481）。——第108、328页。

穆罕默德四世（Mechmed Ⅳ 约1641—1692）——土耳其苏丹（1648—1687）。——第182页。

穆罕默德—阿利—帕沙（Mechmed Ali Pasha 1807—1868）——土耳其军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1852年—1853年5月任总理大臣，后任陆军大臣（1853—1854）。——第107页。

霍桑，波门特（Hotham，Beaumont 1794—1870）——男爵，英国将军，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议会议员。——第52页。

霍布斯，托马斯（Hobbes，Thomas 1588—1679）——杰出的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具有鲜明的反民主主义的倾向。——第53、267页。

霍斯福耳，托马斯·贝里（Horsfall，Thomas Berry 生于1805年）——英国大矿主，托利党人，议会议员。——第90、91、102页。

霍韦利亚诺斯—伊—腊米雷斯，加斯帕尔（Jovellanos y Ramirez，Gaspar 1744—1811）——西班牙国家活动家，作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派的继承者，反对西班牙的封建教权制度；曾任司法大臣（1797—1798），1808—1810年为中央洪达左翼少数派的领导者。——第468、474—476、480、497页。

诺塔腊斯，鲁卡（Notaras，Lukas 死于1453年）——著名的拜占庭国家活动家，舰队司令，反天主教派的首领，君士坦丁堡失陷后，根据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命令被处死。——第108页。

诺福克公爵，亨利·查理·霍华德（Norfolk，Henry Charles Howard 1791—1856）——英国贵族，辉格党人。——第9页。

鲍蒂提尼·卡季米尔（Batthyány，Kasimir 1807—1854）——伯爵，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匈牙利贵族自由派的代表，匈于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任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后迁居法国。——第9页。

萧，约翰（Shaw，John）——五十年代宪章运动活动家之一，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第126页。

十 七 画

缪尔，威廉（Mure，William 1799—1860）——英国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古希腊文专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第53页。

缪拉特，约阿希姆（Murat，Joachim 1767—1815）——法国元帅，曾参加拿破仑第一的远征，1808年为驻西班牙法军总司令，那不勒斯国王（1808—1815）。——第414、463页。

缪拉特亲王，拿破仑·律西安·沙尔（Murat，Napoléon Lucien Charles 1803—1878）——第二共和国和第二

帝国时期的法国政治活动家；约阿希姆·缪拉特的儿子，拿破仑第三的堂兄。——第4、414页。

谢耳万（Сельван死于1854年）——俄国将军，1854年为锡利斯特里亚俄军指挥官。——第300页。

谢里敦，理查·布林斯利（Sheridan，Richard Brinsley 1751—1816）——英国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激进派的代表。——第408页。

赛义德－帕沙（Said Pasha）——土耳其将军，1854年为多瑙河土军指挥官。——第362页。

十八画

萨菲，阿乌利奥（Saffi，Aurelio 1819—1890）——意大利革命家和作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马志尼的战友；曾参加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1851年侨居英国；1872年为意大利共和派的领导者。——第519页。

萨德勒，约翰（Sadleir，John 1814—1856）——爱尔兰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议会中爱尔兰议员团的领袖之一，1853年任财政副大臣。——第10页。

萨米－帕沙（Sami Pasha）——土耳其国家活动家，1852—1854年为维丁的总督。——第338页。

萨比斯基，扬（Sobieski，Johann 1624—1696）——波兰国王（1674—1696），1683年前统率波兰和奥德联军在维也纳战胜土耳其军队。——第282页。

萨加斯蒂，曼努埃尔（Sagasti，Manuel）——西班牙将军，曾支持埃斯帕特罗的独裁，马德里的总督（1843和1854—1855）。——第438、513页。

萨拉萨尔，霍赛·阿耳安德（Salazar，José Allende 1802—1893）——西班牙将军，属于进步派，曾任海军大臣（1854）。——第414页。

萨尔托里乌斯，费南多·路易斯·霍赛，圣路易伯爵（Sartorius，Fernando Luis José，primer conde San－Luis 1820—1871）——西班牙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温和派领袖之一，曾任内务大臣（1847—1851），政府首脑（1853—1854）。——第340、343、368、372、405、407、413、438、455、513—515、522页。

萨巴拉－伊－德·拉·普恩特，璜（Zabala y de la Puente，Juan 1804—1879）——西班牙将军，属于温和派，曾参加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第370、372页。

萨拉曼卡－伊－马伊奥尔，霍赛（Salamanca y Mayol，José 1811—1883）——西班牙政治活动家，银行家，属于温和派，曾任财政大臣（1847）。——第438页。

期　刊　索　引

二　　画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伦敦出版。——第134、147、261页。

"人民杂志"(《Boletin del pueblo》)——马德里出版。——第434页。

"人民呼声报"(《El Clamor Público》)——马德里出版。——第343、433、434、513页。

三　　画

"士兵之友"(《Soldatenfreund》)——见"奥地利士兵之友"。

四　　画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布鲁塞尔出版。——第229、341、343、352、353、414、521页。

"天主教徒"(《El Catolico》)——马德里出版。——第434页。

"太阳报"(《The Sun》)——伦敦出版。——第664页。

"公文集"(《The Portfolio》)——伦敦出版。——第50、649页。

"世纪报"(《Le Siècle》)——巴黎出版。——第347、440页。

五　　画

"北方旗帜报"(《The Northern Ensign》)——苏格兰威克城出版。——第250、251页。

"汉堡记者"(《Hamburger Correspondent》)——见"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

"汉诺威日报"(《Hannoversche Zeitung》)——第223页。

"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Staats und Gelehrte Zeitung des Hamburgischen unparteiischen Correspondenten》)——第179、363页。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étersbourg》)——第148、170、176、225、230、279页。

"东德意志邮报"(《Ost-Deutsche Post》)——维也纳出版。——第325页。

"民族报"(《La Nación》)——马德里出版。——第343、434页。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巴黎出版。——第526页。

六　　画

"先驱报"(《Herald》——见"先驱晨报"。

"先驱报"(《El Heraldo》)——马德里出版。——第434页。

"先驱"(《The Leader》)——伦敦出版。——第650页。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伦敦出版。——第275、281、316、366、

424、594、629页。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伦敦出版。——第278、283、346、393、665页。
“同盟报”(《La Union》)——马德里出版。——第434页。
“同盟报”(《Unione》)——都灵出版。——第386页。
“观察家”(《The Examiner》)——伦敦出版。——第650、651页。
“观察家时报”(《Examiner and Times》)——曼彻斯特出版。——第643页。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伦敦出版。——第361页。
“自由党人报”(《El Liberal》)——马德里出版。——第434页。
“伊比利安日报”(《La Iberia》)——马德里出版。——第434页。
“西班牙报”(《La España》)——马德里出版。——第343、434、521页。
“西班牙日报”(《El Diario español》)——马德里出版。——第343、434页。
“米兰官报”(《Gazzetta Ufficiale di Milano》)——第57、519页。

七　　画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伦敦出版。——第12、37、201、275、529、627、628、646页。
“希望”(《La Esperanza》)——马德里出版。——第434页。
“进步报”(《Journal de Progrès》)——里斯本出版。——第438页。
“劳埃德氏报”(《Lloyd》)——见“维也纳劳埃德氏报”。
“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Lloyd's Weekly London Newspaper》)——第221、659页。
“君士坦丁堡日报”(《Journal de Constantinople》)——第213、524页。
“时代报”(《La Época》)——马德里出版。——第343、434、531页。
“杜塞尔多夫日报”(《Düsseldorfer Zeitung》)——第425页。
“贝云信使报”(《Messager de Bayonne》)——第341、352、365、437页。

八　　画

“国民报”(《Le National》)——巴黎出版。——第372页。
“国民军报”(《El Miliciano》)——马德里出版。——第434页。
“国民议会报”(《L'Assemblée nationale》)——巴黎出版。——第435页。
“国民自卫军报”(《El Guardia Nacional》)——马德里出版。——第434页。
“阿格拉姆报”(《Agramer Zeitung》)——阿格拉姆(今萨格勒布)出版。——第233、234页。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第557页。
“法兰克福邮报”(《Frankfurter Postzeitung》)——第345页。
“官报”(《Gazette》)——见“伦敦官报”。
“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界”(《L'Univers religieux, philosophique, politique, scientifique et littéraire》)——巴黎出版。——第71页。

九　　画

“俄国残废者”(《Русскій инвалидъ》)——圣彼得堡出版。——第600页。
“信使报”(《Mensajero》)——马德里出版。——第434页。

"英国人，政治和工业周刊"（《Englishman, a weekly political and industrial jour- nal》）——伦敦出版。——第 49 页。
"革命回声报"（《El Eco de la revolución》）——马德里出版。——第 434 页。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奥格斯堡出版。——第 33、72、73、231、526 页。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巴黎出版。——第 54、55、60、105、221、228、270、277、287、325、342、353、362、373、394、420、428、450、514、525、526、548、559、608 页。
"南方日报"（《Gazette du Midi》）——马赛出版。——第 423 页。
"南非人报"（《De Zuid- Afrikaan》）（《The Zuid Afrikaan》）——开普敦出版。——第 31 页。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第 346 页。
"独立报"（《La Independencia》）——马德里出版。——第 434 页。
"政论家报"（《El Tribuno》）——马德里出版。——第 426、434 页。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巴黎出版。——第 363、365、435、520 页。
"欧罗巴日报"（《La Europa》）——马德里出版。——第 434 页。
"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伦敦出版。——第 650 页。
"施本纳报"（《Spenersche Zeitung》）——见"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
"祖国报"（《La Patrie》）——巴黎出版。——第 10、37、640 页。
"纪事报"（《Chronicle》）——见"纪事晨报"。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伦敦出版。——第 12、271、275、277、279、284、304、324、325、351、354、361、413、627、629、646、665 页。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第 344、427、521 页。
"军报"（《Le Moniteur de l'Armée》）——巴黎出版。——第 412 页。

十 画

"伦敦官报"（《The London Gazette》）——第 178、219、553、644 页。
"埃斯帕特罗派"（《El Esparterista》）——马德里出版。——第 434 页。
"通讯"（《Correspondenz》）——见"普鲁士石印通讯"。
"旁观者"（《Espectador》）——马德里出版。——第 434 页。
"旁观者"（《The Spectator》）——伦敦出版。——第 45 页。
"泰晤士报"（《The Times》）——伦敦出版。——第 11、22、56、64、69、70、79、109、118、121、146、155、165、179、193、194、200、219、232、269—271、275—280、282、284、298、308、315、335、361、365、374、392、395、409、420、422—424、428—430、432、435—437、442、513、547、548、552、572、586、593、594、605、622、623、626、627、630、635、646—649、658、661、662 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 bune》）——第 8、19、38、42、47、55、60、68、76、81、84、99、109、116、124、132、139、142、147、159、177、187、199、206、211、216、220、221、227、235、243、247、254、257、260、261、268、274、281、

288、302、309、314、323、333、339、348、359、367、374、382、394、400、408、411、419、421、426、430、434、441、446、451、453、518、524、534、535、544、550、551、553、555、559、565、571、576、580、585、593、599、606、614、619、636、655、657、663、688 页。
“马赛新闻”(《Nouvelliste de Marseilles》)——第 232 页。
“马德里日报”(《Gaceta de Madrid》)——第 340、341、351、365、372、435、465、485、508、514、522、670 页。

十 一 画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伦敦出版。——第 46、62、128、242、279、316、357、367、647、658、659 页。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伦敦出版。——第 102、201、219、283、284、385、620、627、628、646—649 页。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第 281 页。
“曼彻斯特观察家”(《Manchester Examiner》)——见“观察家时报”。
“都柏林晚邮报”(《The Dublin Evening Mail》)——第 9 页。
“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第 433 页。

十 二 画

“喧声报”(《Le Charivari》)——巴黎出版。——第 425、426 页。
“街垒之声报”(《Clamor de las Barricades》)——马德里出版。——第 512 页。
“晚报”(《Aftonbladet》)——斯德哥尔摩出版。——第 527 页。
“普鲁士通讯”(《Preussische Correspondenz》)——见“普鲁士石印通讯”。
“普鲁士石印通讯”(《Preussische Lithographische Correspondenz》)——柏林出版。——第 37、217 页。
“最后街垒报”(《Ultimas Barricades》)——马德里出版。——第 512 页。
“闲谈”杂志(《El Guirigay》)——马德里出版。——第 433 页。

十 三 画

“新闻报”(《Las Novedades》)——马德里出版。——第 434 页。
“新闻报”(《The Press》)——伦敦出版。——第 12、43、47、189、199、620 页。
“新闻报”(《Die Presse》)——维也纳出版。——第 233、325、424 页。
“新闻报”(《La Presse》)——巴黎出版。——第 230、528 页。
“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布勒斯劳(今弗罗茨拉夫)出版。——第 625、629、635、645、651、663、666 页。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柏林出版。——第 12、22、361、431 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伦出版。——第 392 页。
“奥格斯堡报”(《Augsburger Zeitung》)——见“总汇报”。
“奥地利通讯”(《Oesterreichische Correspondenz》)——维也纳出版。——第 354、360 页。
“奥地利士兵之友”(《Oesterreichischer Soldatenfreund》)——维也纳出版。——第 9、345 页。
“奥地利军事杂志”(《Oestreichische militärische Zeitschrift》)——维也纳出版。

——第485页。
“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Oesterrelchisch Kaiserliche Wiener Zeitung》)——第64、110页。
“意大利信使报”(《Il Corriere Italiano》)——维也纳出版。——第325页。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伦敦出版。——第53、394、530、533、558、638、642页。
“粮食交易所快报,农业报”(《The Mark Lane Express, Agricultural Journal》)——伦敦出版。——第220、280、285页。

十 四 画

“维也纳日报”(《Wiener Zeitung》)——见“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
“维也纳医学周刊”(《Wiener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维也纳出版。——第306页。
“维也纳劳埃德氏报”(《Wiener Lloyd》)——第345、346页。
“旗帜报”(《The Standard》)——伦敦出版。——第12页。

十 五 画

“论坛报”(《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二 十 画

“议会报”(《Las Cortes》)——马德里出版。——第512页。

地 名 索 引

三 画

土伦——第65、78页。
土拉省——第613页。
土耳恰——第424页。
土尔图凯(土特腊坎)——第208、299、395页。
大湾——第410、411、546、553、587页。
大西洋——第6、653页。
大贝耳特海峡——第26、256、526页。
万第——第286页。
土麦那(伊斯密尔)——第214、318页。
干地亚(克里特)岛——第167页。
下新城省——第613页。

四 画

巴登——第83页。
巴黎——第8—10、38、60、63、71、77、82、95、107、108、125、126、140、159、261、286—288、351、360、372、403、424、433、510、536、542、555、607、611、644页。
巴尔干——第62、92、209、210、260、270、277、290、293、304、322页。
巴土姆——第20、34、65页。
巴纳特——第37页。
巴塞尔——第519页。
巴格达——第37页。
巴勒摩——第287页。
巴巴达格——在罗马尼亚。——第424页。
巴达霍斯——第445页。
巴耳契克——在保加利亚。——第398、423页。
巴塞罗纳——第370、371、403、406、434、437、466、508页。
巴雅泽特(多古巴雅西特)——在土耳其。——第524页。
巴扎尔吉克(道布里奇,托耳布欣)——第208、209页。
巴拉克拉瓦——第572、574、577、580、587、588、592、593、595、601、603、623、624、662—664页。
巴拉克拉瓦海湾——第553页。
巳塞罗奈塔——巴塞罗纳郊区。——第371页。
巴赫契萨赖——第564、580、584、587、588、603、607、664页。
巴尔塔利曼尼——第331页。
巴利阿里群岛——第370、499、557页。
切斯特——第53页。
切塔特——第34、39、41、79、145、169、301、311、361、602页。
切纳沃达——第207、208、293页。
切尔克西亚——第258、260页。
切尔尼果夫省——第613页。
切尔诺维茨(切尔诺夫策)——第345页。
比斯开——第370、497页。
比尔巴鄂——第472页。

比利牛斯半岛—— 第 267、344、368、404、431、459、483、596、636 页。
比利牛斯山脉—— 第 468 页。
比埃罗- 科里尔—— 第 520 页。
日内瓦—— 第 519 页。
日德兰半岛—— 第 290 页。
牛津—— 第 53 页。
太晤士河—— 第 64、79 页。
木尔西亚—— 第 370、499 页。
什列斯维希—— 第 49、246 页。
扎勃利亚克—— 第 72、234 页。
韦利基耶鲁基—— 第 509 页。
文塔斯- 德耳- 埃斯皮里士- 桑托—— 马德里附近的一个居民点。—— 第 341 页。

五　画

卡法(费奥多西亚)—— 第 65、120 页。
卡塔罗(科托尔)—— 在门的内哥罗。—— 第 75 页。
卡特希—— 克里木的一个居民点。—— 第 580 页。
卡查河—— 第 546 页。
卡尔斯—— 第 24、32、33、309、524 页。
卡萨勒—— 意大利的要塞。—— 第 350 页。
卡勒特—— 第 352 页。
卡耳恩—— 第 53 页。
卡卢加—— 第 592 页。
卡卢加省—— 第 613 页。
卡缅茨—— 第 325 页。
卡塔黑纳—— 第 370、467 页。
卡茨巴赫(卡查瓦)—— 西里西亚的河流。—— 第 564、592 页。
卡腊卡耳—— 第 311 页。
卡腊苏河—— 第 208、294 页。
卡拉腊什(克勒腊希)—— 第 207、293、298、396 页。
卡拉法特—— 第 25、34—36、39—41、43、66、79—81、144—147、169、207、210、221、307、395、397、399、573、624、663 页。
卡瓦丹加—— 在西班牙。—— 第 489 页。
卡斯提奥涅—— 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 第 562 页。
卡塔卢尼亚—— 第 365、370、371、414、437、456、499、530 页。
卡兰亭湾—— 第 575 页。
卡姆契克河(卡姆契亚河)—— 第 293 页。
卡内里群岛—— 第 473 页。
卡尔斯克伦纳—— 在瑞典。—— 第 425 页。
卡特加特海峡—— 第 308 页。
布伦—— 第 356、542、550、552、556、574 页。
布累—— 第 286 页。
布哈拉—— 第 123、639 页。
布格河(南布格河)—— 第 144、569、609 页。
布格河(西布格河)—— 第 613 页。
布勒斯特—— 在法国。—— 第 70、78、256 页。
布尔果斯—— 第 370、471、472 页。
布鲁塞尔—— 第 63、352 页。
布隆采耳—— 第 326 页。
布柯维纳—— 第 338 页。
布泽乌河—— 第 338、420 页。
布尔留克—— 第 561 页。
布来洛夫(布来拉)—— 第 144、146、147、293、325、350、527 页。
布加勒斯特—— 第 39—41、66、80、81、118、207、223、293、294、305、306、315、325、331、332、350、361、362、412、422、428、529、548、551—557、624、641 页。
布列斯托瓦茨—— 第 428 页。

布列斯特— 里托夫斯克(布列斯特)——第 570、612 页。
圣莫里斯——第 350 页。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 6、8、21、35、37、38、62、69、70、77、103、106、149、151、155、163、165、172、190、191、194、204、234、312、315、321、379、440、526、557、558、569、570、673 页。
圣奥梅尔——在法国。——第 256 页。
圣尼古拉(舍夫卡捷尔)——码头和炮台。——第 24、32、107、309、446 页。
圣海伦岛——第 173 页。
圣塞瓦斯田——第 370、445、466 页。
圣玛丽亚港——第 506 页。
加来——第 349、366、373 页。
加拉兹——第 147、293、413、423 页。
加埃塔——第 351 页。
加迪斯——第 404、430、467、473、482、489、495、498、499、502、505—507、669 页。
加利西亚——第 432、466、480、481、486、499、508、671 页。
加里西亚——第 104、113、270、338、420、536、609、614 页。
加特契纳——第 43 页。
加利波利(格利博卢)——第 219、259、266、275、276、307、535、541、632、633 页。
加利福尼亚——第 643、653 页。
加斯梯里亚——第 340、370、456—461、466、468、473、478、494—496 页。
尼什——在塞尔维亚。——第 202 页。
尼门河——第 472 页。
尼泊尔——第 124 页。
尼克希奇——在门的内哥罗。——第 234 页。
尼科波尔——在罗马尼亚。——第 144 页。
尼古拉也夫——第 603、609、664 页。
瓦尔那——第 199、209、210、218、260、276、290、299、304、307、356、362、374、378、388、392、397、398、409、423、446、524、536—541、543、548、553、563、565、574、632、633 页。
瓦拉几亚——第 7、11、25、39、41、51、57、65、73、79、88、90、98、103、118、120、140、143、146、167、171、176、190、207、221、244、270、276—278、293、294、297、303—305、310—313、319、322、325—332、344、347—349、353、354、356、360、361、376、379、380、383—385、388、389、391、397、413、420—423、428、429、432、523、524、527、529、530、535、539、555、602、641、654、655 页。
瓦伦西亚——第 352、365、370、404、414、437、466、467、482、487、499、501、504、508、511、515 页。
印度——第 26、263、266、630、631 页。
印度河——第 266、399 页。
印度斯坦——半岛。——第 639 页。
北海——第 49 页。
北明翰——第 280、283、284、645 页。
弗雷特什提——第 362、363、574 页。
弗里德兰德(普拉夫丁斯克)——第 612 页。
弗雷德里西亚——在丹麦。——第 290 页。
弗拉基高加索(奥尔忠尼启泽)——第 25 页。
叶尼卡列——见刻赤。
叶夫帕托利亚——第 542、663、664 页。
皮阿琴察——第 82 页。
皮列柯普——第 120、446、554、564、606、664 页。

古巴岛——第426、432页。
古斯塔夫斯维恩——第255、526页。
瓜斯塔拉——在意大利。——第82页。
瓜的亚纳河——第352页。
汉堡——第325、440、450、526页。
汉古特（汉科）——第255、526页。
白海——第373、389、424、568、569页。
白金汉郡——第53、54页。
包岑——在萨克森。——第564页。
龙达——第507页。
东印度——第621、638页。
本德雷——第607页。
旧要塞——即旧堡。——第542、546、549、553、578页。

六　画

托勒多——第351页。
托洛萨——第370页。
托列杭（托列杭—德尔—雷）——第372、404页。
托斯卡纳——第351页。
托尔托萨——第437页。
托列洛巴顿——第460页。
托列斯—维德拉斯（托列治—维德拉什）——在葡萄牙。——第145页。
托尔特西利亚斯（托尔塔列斯—德—埃斯格瓦）——第460页。
伊鲁萨——希腊的省。——第120页。
伊万城——第570页。
伊萨克查——第325页。
伊皮罗斯——第108、141、233页。
伊兹马伊尔——第293、609页。
伊斯坦布尔——见君士坦丁堡。
伊奥尼亚群岛——第108、140页。
西罗——第520页。
西藏——第123、124页。
西印度——第645页。
西诺普——第10—12、22、23、28、33、44、65、86、90、98、107、258、381、389、611页。
西西里岛——第351页。
西斯托夫（斯维施托夫）——第74页。
亚波（土尔库）——第527页。
亚尼纳——第121页。
亚历山大里亚——第350页。
亚历山大罗波尔（列宁纳坎）——第24、32页。
列里达——第370、437页。
列维里（塔林）——第568、569、608页。
列尼亚哥——在意大利。——第209页。
列加涅斯——第369页。
列杜特—卡列——高加索海岸要塞。——第258页。
安达鲁西亚——第351、365、370、373、414、466、507页。
安德罗斯岛——第218页。
安那托里亚——第167、524页。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第28、57、320页。
艾顿——在土耳其。——第524页。
艾阿库裘——第402页。
艾尔斯贝里——第53页。
达里安湾——在中美洲。——第461页。
达达尼尔海峡——第48、105、118、318、430、535、647、651页。
达尔雅尔峡谷——第309页。
多瑙河——第7、25、35、39—41、43、50、57、79—81、91、122、143—145、147、207—210、242、255、270、276、290、293—296、298、301、302、304、305、312、319、322、325、332、334、335、337、338、350、362、363、376、383、388、389、395—398、421、422、429、525、527、535、539、556、606、609、610、641、642、648、650、

651、655页。
多布鲁甲——第200、207、208、210、221、290、293、294、299、306、325、327、349、350、389、396、397、424、539、540、555页。
多瑙河各公国——见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
色雷斯——第167页。
色雷斯的赫尔松涅斯(加利波利半岛)——第119、259、535页。
伐耳赫伦岛——第544页。
伐利亚多利德——第370、459、467页。
乔宾——在伦敦附近。——第265页。
华沙——第8、57、79、424、446、569、570页。
地中海——第103、317页。
匈牙利——第4、7、57、104、114—116、202、205、215、270、282、364、380、424、614—616页。
朴次茅斯——第52页。
因克尔芒——第574、594—596、599—601、604、607、624、625页。
吉普斯科阿——第371页。

七　画

贝云——第370、463、486、513、514页。
贝耳岛——比斯开湾的岛屿。——第559页。
贝凯普——第416页。
贝科兹——第3、65、200页。
贝捷克湾(贝希克湾)——在爱琴海。——第88页。
贝尔格莱德——第26、35、202、217、355、385、428页。
贝尔贝克河——第553页。
贝斯特里察——第446页。
贝萨拉比亚——第143、147、294、319、339、422、527、555、602、608、609页。
克里木——第5、21、119、258、308、312、315、319、380、381、422—424、536、541、542、545、551—555、558、566、568、570、572、573、578、579、599、600、602—606、608、630、633—635、661、662、664页。
克勒迪顿——第10页。
克拉科夫——第113、242、349页。
克罗地亚——第118、167页。
克拉约瓦——第25、34、66、145页。
克鲁谢伐茨——在塞尔维亚。——第202页。
克鲁格廉尼——第412页。
沃温——在苏格兰。——第253页。
沃伦(沃伦省)——第338、569、613页。
沃尔塔——在意大利。——第350页。
沃尔肖伐——第325页。
沃龙涅什省——第613页。
沃耳特尼察——第3、39、40、80、99、145、169、207、208、294、311、361、362、395、412、555、573、689、624页。
苏阿索——第506页。
苏格兰——第53、54、129、242、249页。
苏黎世——第519页。
苏姆拉(科拉罗夫格勒)——第40、80、209、210、290、293、294、299、306、307、322、337、362页。
苏胡姆-卡列——第258页。
苏利纳河口——在多瑙河三角洲。——第350、363、424、655页。
里子——第126、644页。
里加——第6、440页。
里昂——第364页。
里海——第309、568页。
里斯本——第433、455、513页。
利尼——在比利时。——第539页。
利物浦——第102、550、599、621页。

利伏诺——第 552 页。
利特里姆——第 53 页。
希瓦——第 59、123 页。
希布拉克——多瑙河的岛屿。——第 299 页。
希尔索瓦(希尔朔瓦)——第 39、41、80、208、294、396 页。
麦茨——第 66、83、84 页。
麦哈提亚——第 202 页。
伯克郡——第 52、54 页。
伯尔尼——第 519 页。
但泽(格但斯克)——第 280、338、440、570 页。
杜恩——在苏格兰。——第 250 页。
吕特岑——在萨克森。——第 564 页。
那不勒斯——第 83、351、365、552 页。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第 3、10、12、26—29、37、38、41、48、57、65、66、70、71、74、75、90、95、96、100、106—108、117、119、120、143、147、154、161、163、167、169、175、180、185、186、190、200、211、214、217—219、221、222、229、231、260、275、307、320、322、331、332、349、354、363、383、388、397、421、423、428、433、515、525、526、536、541、548、549、553、555、556、574、610、623、632、639、657 页。
辛费罗波尔——第 557、580、608、623、663 页。

八 画

阿拉丁——第 541 页。
阿拉斯——第 66 页。
阿维拉——第 460 页。
阿鲁拉——第 352、365 页。
阿尔马——克里木的一个村庄。——第 561 页。
阿尔马河——第 545—549、551、552、554、556、557、560、561、565、566、572、579、581、583、586、587、592、593、603、623 页。
阿尔塔——第 121、212 页。
阿纳帕——第 258、363、390、409、423、554、564 页。
阿腊贡——第 365、370、404、437、456、494 页。
阿尔达汉——第 24、32 页。
阿拉伯堡——炮台。——第 298—302、335—338、443、539 页。
阿兰惠斯——第 343、438、473、501、531 页。
阿速夫海——第 5、21、119、373、648 页。
阿兰群岛——第 201、409、442、450、451、549 页。
阿利康特——第 370 页。
阿耳梅达——第 514 页。
阿留塔河(奥尔特河)——第 35、361、384 页。
阿雷基帕——在玻利维亚。——第 402 页。
阿伦德耳——第 53 页。
阿迪杰河——第 209 页。
阿尔科斯(阿尔科斯—德—拉—弗隆特拉)——第 506 页。
阿尔及尔——第 70 页。
阿尔及利亚——第 66、399 页。
阿尔明尼亚——第 24、32 页。
阿尔巴尼亚——第 107、118、121、167、218、234 页。
阿耳巴塞特——第 404 页。
阿耳布埃拉——第 596 页。
阿特拉斯山——第 563 页。
阿布鲁威山(阿在鲁威亚平宁山脉)——第 351 页。

阿德腊米提(埃德勒米特)——第317页。
阿德里安堡(爱德尔纳)——第28、119、147、276、296、307、318—321、329、376、651页。
阿德里安堡平原——第166页。
阿姆斯特丹——第305、324页。
阿尔哲什河——第412页。
阿哈尔齐赫——第24、32页。
阿斯土里亚——第463、466、480、481、486、497、520页。
阿斯特拉罕——第569页。
阿卡尔纳尼亚——希腊的省。——第120页。
阿耳黑西腊斯——第507、515页。
阿尔卑斯山脉——第8、301、610页。
阿尔汉格尔斯克——第281页。
阿耳卡拉-德-埃纳雷斯——第324页。
罗马——第8页。
罗曼——第325页。
罗兹岛——第524页。
罗多斯托(特基尔达)——第118、119、122页。
罗克鲁阿——在法国。——第625页。
罗契得尔——第53页。
罗斯托克——第280页。
罗德里哥城——第445、467、486页。
罗瑟土姆山口(土尔努-罗舒)——第325页。
波托西——在玻利维亚。——第402页。
波兹南——第270、614页。
波尔多——第351页。
波多利亚——第325、338、569、613页。
波斯尼亚——第118、120、167、641页。
波罗的海——第5—8、21、49、103、189、256、257、261、308、348、350、356、363、376、377、389、391、392、415、527、552、568、569、673、674页。
波尔塔瓦——第612页。
波尔塔瓦省——第613页。
波索布郎科——第365页。
拉索瓦——第295页。
拉巴斯——在玻利维亚。——第402页。
拉曼彻——第364、373、406、508页。
拉科鲁尼亚——第471、481、510页。
拉卡罗利纳——第365、467页。
拉芒什海峡——第6、38、308页。
拉斯-卡贝萨斯-德-圣璜——第506页。
芬兰——第6、7、21、27、255、257、299、308、319、440、568、570页。
芬兰湾——第255、526、673页。
芬宁(芬)——岛屿。——第466、471页。
帕尔马——第82、386页。
帕特讷——第286页。
帕维亚——第519页。
迭夫尼亚——第388、541页。
迭夫年斯卡河——第293、539、540页。
刻赤——第564页。
刻赤海峡——第65页。
佩斯——匈牙利首都,现在布达佩斯的左岸部分。——第8页。
佩特郡——第53页。
金角——港湾。——第48页。
昆卡——第365、372页。
林肯郡——第54页。
肯皮纳——第325页。
明斯克省——第613页。
直布罗陀——第308页。
居斯坦杰(康斯坦察)——第207、208、293、305、423、540页。
松德海峡(厄勒海峡)——第26、49、427页。
图拉真垒墙——第208、210、294、325页。
帖姆勃列克——第352页。
的里雅斯特——第520页。

舍夫卡捷尔——见圣尼古拉炮台。
门的内哥罗——第72—74、120、151、168、176、398页。
奇申格尔棱堡——在锡利斯特里亚。——第298页。
庞特弗拉克特——第53页。

九　画

科伦——第427页。
科马雷——克里木的一个居民点。——第588页。
科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第233、440页。
科尔贝克(科洛布热克)——第338、440页。
科多尼约——第350页。
科恰班巴——在玻利维亚。——第402页。
哈安——第370、373、467、557页。
哈提瓦——第352页。
哈瓦那——第514页。
哈特福郡——第53页。
哈里法克斯——在加拿大。——第550、565页。
哈里法克斯——在英国。——第416页。
威特——第372页。
威特比——第53页。
威尔士——第54、219、621页。
威斯特贝里——第53页。
威斯特米特——第53页。
施拉瓦——第412页。
施特廷(兹杰辛)——第280页。
施梯里亚——第617页。
施塔尔莱因——在奥地利。——第111页。
施维讷谬德(施维诺威西策)——第440页。
南特——第286页。
南威克——第53页。
南安普顿——第356页。
保加利亚——第118、167、232、270、276—278、305、384、397、399、536、540、602、641页。
保加利亚高原——第297页。
耶拿——第7、64、594、595、624页。
耶路撒冷——第11、96、183—187页。
约克郡——第52页。
约萨法特河——第186页。
美格定茨(美赫定茨)——第347、348页。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111、325页。
拜兰——第471、472页。
拜达尔盆地——第573、574、603页。
柏林——第37、38、64、158、201—204、325、346、361、427页。
军港——第576页。
叙利亚——第183页。
突尼斯——第168页。
信德省——在巴基斯坦。——第638页。
郎卡郡——第47、54、656、687页。
契切斯特——第53页。
查尔卡斯——在玻利维亚。——第402页。
品都斯山脉——在巴尔干半岛。——第140页。
洛格罗尼奥——第406、557页。

十　画

埃及——第167、296页。
埃劳——见普略西什-埃劳。
埃内兹——第118、119、122、535页。
埃内兹湾——第317页。
埃托利亚——希腊的省。——第120页。
埃尔斯伦(埃尔祖鲁姆)——第37页。
埃格里波(卡尔基斯)——第120页。

埃维厄岛——第 120、216 页。
埃布罗河——第 472 页。
埃克恩弗尔德——第 246 页。
埃斯特勒马杜腊——第 351 页。
格利纳——布加勒斯特附近的一个居民点。——第 412 页。
格蒙登——在奥地利。——第 111 页。
格拉纳达——第 370、456、467、472、502 页。
格鲁吉亚——第 308 页。
格拉斯哥——第 53、251、253、351 页。
格罗德诺省——第 613 页。
格里姆斯比——苏格兰的一个居民点。——第 52 页。
格腊纳土拉——第 406 页。
格拉克列亚高地——在克里木。——第 587、588、590 页。
格拉克列亚的赫尔松涅斯——第 587、634、663 页。
特雷维佐——第 520 页。
特里卡拉——第 218 页。
特萨利亚——第 108、118、140、141、167、218、233 页。
特拉皮亚(塔拉比亚)——第 525 页。
特鲁韦耳——第 404 页。
特果维希特——第 207 页。
特拉比曾德(特拉布松)——第 10、107 页。
特兰西瓦尼亚——第 57、115、146、260、420、536、609 页。
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第 350 页。
马赛——第 348、363 页。
马德里——第 123、324、340—343、351、352、364、365、368—372、404、405、407、413、414、431—434、438、439、455、456、463、466、467、469、471—475、479、487、497、502、505、507、508、511—513、515、516、520、522、530、669 页。
马其顿——第 108、167 页。
马拉加——第 438、507、557 页。
马尔他岛——第 65、79 页。
马里乍河——第 118 页。
马尔马拉海——第 48、119 页。
马斯特沙克——土耳其的省。——第 524 页。
马利奥尔卡岛——第 511 页。
爱丁堡——第 53 页。
爱尔兰——第 53、54、66、70、129、242、243、249 页。
爱尔福特——第 473 页。
纽里——在爱尔兰。——第 12 页。
纽约——第 550 页。
纽卡斯尔-安德-莱恩——第 53 页。
伦敦——第 29、30、58、63、77、82、100、107、108、111、125、126、133、134、136、140、146、149、150、159、164、171、194、275、285、286、314、317、324、356、360、362、366、389、405、536、548、553、594、599、611、620、621、651 页。
伦巴第——第 114、116、351、386 页。
伦弗鲁郡——苏格兰的一个郡。——第 53 页。
纳尔瓦——第 601、625 页。
纳瓦腊——第 370、486、495—497、510 页。
纳瓦林(皮洛斯)——第 92、212 页。
索拉——在意大利。——第 351 页。
索非亚——第 40、202 页。
索勃拉尔贝——西班牙山区。——第 489、494 页。
乌特雷腊——第 506 页。
乌尔济琴——第 412 页。
乌列什提——罗马尼亚的一个居民点。

——第412页。
桑河——第338页。
桑卢卡尔(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第467页。
泰尔(苏尔)——在土耳其帝国。——第524页。
泰梅希山口(普雷迪亚耳)——在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第350页。
席尔河(日伊乌河)——第35页。
库尔涅斯——第79页。
库尔迪斯坦——第24、303页。
库楚克-凯纳吉(凯纳吉)——第28、95、183页。
哥多瓦——第507页。
哥本哈根——第26、49、64、415、425、441、526页。
涅瓦河——第673页。
涅格罗庞特——见埃维厄岛。
班堡——第360页。
贡比臬——第463页。
高加索——第5、25、33、308、319、554、568、570页。
俾路支——第639页。
热那亚——第386页。
敖德萨——第5—7、21、23、24、33、34、49、119、144、147、200、228—230、236、244、245、247、249、255、260、279、349、378、389、527、602、641、664页。
旁遮普——第638页。
朗格雷奥——第520页。
茹尔日沃(朱尔朱)——第43、293、294、315、325、350、362、363、397、422页。
海尔曼施塔特(锡比乌)——第373页。

十一画

莫契纳——第412页。
莫尔顿——第53页。
莫德林(诺沃格奥尔基也夫斯克)——第570页。
莫斯科——第78、144、570、592、612、613页。
莫斯科省——第613页。
莫吉廖夫——第612页。
莫吉廖夫省——第613页。
莫尔达维亚(莫尔多瓦)——第7、11、51、57、73、79、88、90、98、103、188、120、143、167、171、176、190、244、270、276—278、305、310—313、319、322、325—332、338、339、347、349、350、353、360、376—379、380、383—385、389、391、397、420—423、428、429、523、524、527、530、539、602、609、641、654、655页。
基辅——第610页。
基辅省——第613页。
基什涅夫——第7页。
基德里亚岛(伊德拉岛)——第218页。
曼成——第25、43、325、326、396、527页。
曼都亚——第351页。
曼彻斯特——第8、47、50、68、125、134、136、280、284、324、645页。
曼萨那累斯——第364、426页。
康太斯湾(沃尔法尼湾)——第121页。
康士坦丁角——第411页。
累翁岛——第370、430、483、487、489、499、506、507、511页。
累夫里哈——第506页。
都灵——第82、433页。
都柏林——第46页。
梯弗里斯(梯比里斯)——第24、32、309、311、527页。
梯维尔顿——第52页。
蛇岛——第525页。
梁赞省——第613页。
勒阿耳城——第352、364页。

设菲尔德——第282页。
措尔恩多夫——第579页。
崩采耳维茨(列格尼茨凯地区)——在西里西亚。——第145页。
密多塞克斯——第54页。

十 二 画

斯来果——第201页。
斯泰福郡——第54、645页。
斯塔提腊——第361页。
斯拉廷纳——第412页。
斯库塔里——第118、259、275、308、541、623、632、633页。
斯德哥尔摩——第26、201、440页。
斯特拉斯堡——第66、83、84页。
斯摩棱斯克——第612、613页。
斯摩棱斯克省——第613页。
斯洛博德捷亚(斯洛博德集亚)——第325页。
斯维阿波尔格(苏奥缅林纳)——第308、552页。
斯托克波尔特——第125页。
斯特腊特卡隆——在苏格兰。——第252、253页。
博德明——第53页。
博托夏尼——第325页。
博罗迪诺——第579页。
博尔诺斯——第506页。
博恩霍尔姆——第37页。
博马尔松德——第350、391、409、410、440、442—451、526、543、582、583、661页。
博斯普鲁斯海峡——第48、99、106、118、119、200、307、525、526、536、549、641页。
普鲁特河——第144、147、278、311、315、325、331、332、420页。
普罗凡斯——第459页。
普里埃果——第669页。
普雷斯顿——第254、687页。
普洛耶什特——第325页。
普略西什-埃劳(巴格腊提奥诺夫斯克)——第579、601、612页。
普斯特拉尔佐——第351页。
黑山——在克里木。——第573页。
黑河——第546、574、579—581、587、588、592、595、600、607、608页。
黑海——第3—7、12、20、21、24、27、34、35、37、80、93、99、106、117—119、199、207、210.256、258、290、305、308、311、312、348、373、376、377、389、409、423、424、525、568、599、605、641、647、648页。
黑森——第83页。
黑塞哥维那——第118、167、234页。
雅西——第222、325、330、336、641页。
雅典——第121、212、249、271、523、559页。
雅洛米察河——第294、350、412页。
雅罗斯拉夫里省——第613页。
喀布尔——第123页。
喀琅施塔得——第6、22、104、308、314、348、349、356、391、409、552、673—679页。
喀尔巴阡山脉——第333、384页。
提尔西特(苏维埃斯克)——第465页。
提诺斯岛——在爱琴海。——第218页。
莱茵河——第8、610、612页。
莱斯特郡——第54页。
菲律宾——第408、514页。
菲盖腊斯——第466、530页。
凯恩——第109页。
费拉拉——第385页。
腊兹格腊特——第208、336页。

喜马拉雅山脉——第 124 页。

十 三 画

奥尔丹——第 53 页。
奥斯泽——第 111 页。
奥得河——第 472 页。
奥里缪茨(奥洛摩茨)——第 64 页。
奥尔斯脱——第 12 页。
奥查科夫——第 446 页。
奥涅加河——第 424 页。
奥维耶多——第 469、480、481、520 页。
奥康尼亚——第 485、508 页。
奥苏尔盖特——第 309 页。
奥斯特尔利茨(斯拉夫科夫)——第 601、607 页。
塞维尔——第 370、373、403、404、469、470、472、473、480、483、487、501、530、670 页。
塞尔维亚——第 7、26、35、39、108、120、140、167、207、217、354—356、385、428、429、641 页。
塞勒特河——第 147、293、304、305、311、335、383、396 页。
塞瓦斯托波尔——第 3—7、20、21、23、25、34、49、104、107、119、200、299、247、249、258、260、289、308、312、314、315、348、349、378、380、381、386、387、389—391、398、409—411、423、446、535、542、543、545—554、556、557、564—566、570—587、597、599—601、603、604、607、608、623、624、626、661—663、675 页。
卡兰亭炮台——第 575、582、584 页。
北区——第 553、603、663 页。
北炮台——即北堡。——第 543、546、572、607、623、624 页。
电报局炮台——第 582 页。
亚历山大罗夫炮台——第 582 页。
南区——第 410、584 页。
康士坦丁炮台——第 549、582 页。
塞瓦斯托波尔湾——见大湾。
塔干罗格——第 641 页。
塔腊果纳——第 370 页。
雷乌斯——第 365 页。
雷特沃尔德——第 52 页。
顿河——第 399 页。
瑟堡——第 675 页。
滑铁卢——第 173、263、539、548、555、636 页。
福克夏尼——第 293、350、384、412 页。
枫丹白露——第 456、463 页。

十 四 画

维丁——第 40、41、118、144、202、338 页。
维也纳——第 5、21、27、35—38、57、62、64、70、72、76、106、110、111、171、173、204、221、242、283、312、323、344、345、355、360—364、384、515、646、648 页。
维罗那——第 145、209、350、430、489、562 页。
维尔诺(维尔纽斯)——第 612 页。
维尔腾堡——第 83 页。
维多利亚——第 200 页。
维多利亚——在澳大利亚。——第 370、371 页。
维斯拉河——第 569、570 页。
维卡耳瓦罗——第 341、342、512 页。
维利雅拉尔(利布罗斯)——第 460 页。
维切布斯克——第 612 页。
赫罗纳——第 370 页。
赫尔松——第 119、422、603、609、664 页。
赫雷斯(赫雷斯-迪-拉-弗隆特拉)——第 506 页。
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第 409 页。
赫尔松涅斯角——第 553 页。

满洲——第124页。
魁北克——在加拿大。——第219页。
蒙特卡西诺——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第351页。

十五画

德黑兰——第10、26、37页。
德维纳河——第612页。
德洛尼亚——希腊的省。——第120页。
德涅泊河——第610、612页。
德尼兹利——在土耳其。——第524页。
德涅斯特尔河——第208、338、399、539、569、608、613页。
德斯佩尼亚斯佩罗斯——第365页。
撒丁岛——第351页。
撒哈拉——大沙漠。——第540页。
摩地那——第82、386页。
摩勒纳山——第365、507页。
鲁舒克(鲁塞)——第39、80、208、209、293、307、362、374、396、397、422、555页。
鲁美利亚——第118、120页。
潘普洛纳——第370、466、502、508、510页。

十六画

诺定昂——第659页。
诺塔列尔顿——第53页。
诺依达尔特——苏格兰的一个居民点。——第250页。
锡罗斯岛——在爱琴海。——第218页。
锡利斯特里亚(锡利斯特腊)——第41、207—209、276、277、284、289、290、293—312、315、322、325、334—338、361、390、395、396、398、421、446、536、539、543、548、555、573、589、597、601、602、624、647、663页。
霍亭——第7、569页。
默麦尔(克莱彼达)——第440页。
赖伊——第53页。

十七画

戴文郡——第10页。

十八画

萨瓦——第83、350页。
萨塞克斯——第54页。
萨拉哥沙——第324、370—372、437、455、471、476、508、515、523页。
萨罗斯湾——第317页。
萨拉芒卡——第502页。
萨罗尼加湾——第121页。